



# 麦克米伦回忆录

## 4

乘风破浪

商务印书馆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财政部 .....         | 1   |
| 第二章   | 预算及其后 .....       | 20  |
| 第三章   | G字计划 .....        | 62  |
| 第四章   | 英美的分裂 .....       | 89  |
| 第五章   | 政府的更迭 .....       | 181 |
| 第六章   | 苏伊士的善后 .....      | 206 |
| 第七章   | 一个新战略 .....       | 241 |
| 第八章   | 阿拉伯之夜 .....       | 270 |
| 第九章   | 俄国和核弹 .....       | 289 |
| 第十章   | 华盛顿蜜月 .....       | 313 |
| 第十一章  | 钱和人 .....         | 342 |
| 第十二章  | 英联邦之行 .....       | 374 |
| 第十三章  | 银行贴现率“泄密”奇案 ..... | 414 |
| 第十四章  | 向欧洲求爱 .....       | 429 |
| 第十五章  | 两个世界 .....        | 456 |
| 第十六章  | 天方夜谭续编 .....      | 496 |
| 第十七章  | 中国之谜 .....        | 529 |
| 第十八章  | 一次探索的航行 .....     | 546 |
| 第十九章  | 塞浦路斯纠纷 .....      | 639 |
| 第二十章  | 繁荣还是衰退 .....      | 683 |
| 第二十一章 | 最后阶段 .....        | 713 |

|   |     |
|---|-----|
| 附录(一) G 方案: 1956 年 9 月 29 日 .....                     | 733 |
| (二) 内阁成员: 1957 年 1 月 .....                            | 734 |
| (三) 共同目标宣言 .....                                      | 735 |
| (四) 关于塞尔温·劳埃德辞职一事同他的通信<br>1958 年 2 月 24 日和 25 日 ..... | 738 |

## 第一章 财政部

1

我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同时还有政府的其他变动，是1955年12月21日宣布的。对我来说，离开外交部是一大憾事。我在那里时间虽短，但感到十分愉快。那里遇到的问题，虽然往往很伤脑筋，却很引人入胜。和我一起工作的官员，都是能干的顾问和令人喜爱的同事。我喜欢旅行，而这个职务恰恰需要经常出去走走；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躲开乱哄哄的下院。此外，我又有机会重新和我在欧洲的美国一些老朋友直接接触。还有，我总算对这项工作，对我需要和他们打交道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物，开始有所了解。因此，第一次提出调动职务时，我感到有点震惊，我拒绝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只好遵从首相的意旨。1956年4月我向下院提出我负责编制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预算时，曾经提起这样一段往事：据说，丘吉尔1924年11月获悉自己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时，也感到十分惊奇；然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比三十一年后我惊奇的程度还不到一半呢。

12月22日，在外交部向同事们告别以后，我步行到财政部去。这个偌大的部，设在一座正式名称叫“新公共办公楼”的不显眼的房子里。这是一栋爱德华式建筑物，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非常不适宜作办公地点，其他的用途也不大。大家都管它叫“陵墓”。我们占了这栋大楼眺临大乔治街和议会广场一面的一长串房间。原来那座正面是肯特式模样的财政部办公楼，战时被炸毁了，这时还没有重建。后来，它算是修复了；但是，我当首相的时候，把它安排做内阁办公厅和秘书处的住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晓

2

得那样狭小的房子再也容不下财政部，一方面也因为我贪图白厅的那个特别令人喜欢的葡萄园。

我的两位大臣级同事都各有令人钦佩的地方。财务大臣亨利·布鲁克是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可以看出是个天生担任高级官员的人才。他不但有丰富的中央行政工作经验，而且地方行政工作也很熟悉，因为他当过好些年伦敦郡议会的议员。他是个杰出的学者，踏实稳健，不露锋芒，而且十分忠实可靠。爱德华·博伊尔爵士是经济大臣，象他这样短短的政治经历，担任这样高的职务，升迁是够快的了，但是他丝毫没有辜负对他的提拔。在他身上兼有学识渊博而深沉幽默，能言善辩而公平正直的优点。他们带着不同的谈话内容来见我，向我说明他们的任务和职能。

常务次官兼秘书长是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是我学生时代就认识和非常钦佩的一个人。他1945年起便担任这个职务，一直主持了十一年部务。他一方面负责经济和财政政策，一方面又负责管理部内文官。他是一个在性格上和秉赋上都集中了文官制度最优良传统的公务人员。他本身是个人本主义者，也是位学者，在他的近乎天真稚气的幽默感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即使他还够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权威，也是个眼光锐敏、思虑明晰的人物。在他手下，是一大批财务专业人员——伯纳德·吉尔伯特、托马斯·帕德莫尔，亚历山大·约翰斯顿，赫伯特·布里顿和莱斯利·罗恩，都是出色的行政官员，无不忠于职守。我发现上述人员中的最后一名，负责海外金融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原来他在战时曾担任过丘吉尔的首席私人秘书。

布里奇斯在这一年退休了。我说服首相答应我任命罗杰·梅金斯接替他的职务。把外交部的一名成员调到财政部来，本来是严重违背传统的，但是，我认为这样大胆创新是有理由的，因为我  
3 对罗杰爵士的优良品质有过切身的体会。他在阿尔及尔曾经以非

凡的才能和忠诚帮助过我工作。这时候，他正要卸除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职务。他对美国的情况极为熟悉，这点对我们财政部来说，与对外交部一样地重要，而且他的组织能力很强。所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时，狭义的经济业务还没有大量开展。在财政部内外设立很多机构，用统计形式归纳过去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大量的情报和指导性资料，都是现在才有的事。如果人们可以用专业经济学家这个术语的话，那么，我们的罗伯特·霍尔爵士就是。我一见面就喜欢他。他不善言谈，但这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从来不强词夺理。至于现在称之为“公共关系”的那项工作，我很高兴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克莱·莱斯利在负责。1940年他在供应部赫伯特·莫里森手下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了。

至于“全国形势”，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是不安定的。但是对如何诊断和治疗，却没有一致的意见。<sup>①</sup>

财政大臣就象个新型魔术师似的，充分就业、扩张的经济、稳定的价格和硬挺的英镑就是他手里的小球，观众要求把它们同时抛在空中，一个也不让落地。这时候虽然也有少数理论家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不顾英镑的价值和合理的价格水平，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和扩张；但是，来自所有的权威学者、财政部、伦敦金融市场和经济报刊的压力，却都毫不迟疑地赞成谨慎，而且主张在必要时紧缩通货。我们仍然处于低利率政策时期，甚至到1955年1月，银行利率仍然只有三厘。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给英镑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使英镑至少在名义上得到保护。这些工事包括一大套管制办法，简直和中世纪城堡的护城河、石筐掩体一样复杂。但是，这些工事日久也就很自然地变得比较薄弱，内行的经营

---

<sup>①</sup> 1955年12月22日。凡是引自我的日记和私人笔记本的话，都只注明纪录的日期。

4 者可以制造许多缺口。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世界各地区的货币利率还没有提高到竞争性的水平。

巴特勒曾经大胆地重新实行灵活变动的银行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虽然不是唯一的措施。<sup>①</sup>1955年初，他分两个阶段把利率从三厘提高到四厘半。当时，对恢复以货币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做法有很多剧烈的议论。多尔顿年代的那种受人欢迎的简化制度已经消声匿迹，普遍都同意应该按传统的方法来使用银行利率这项武器。与此同时，巴特勒还对分期赊购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通过外汇平衡管理局来尽可能地支持英镑。但是，他认为应该实行他称之为有“刺激性”的那个预算。所得税降低了六个便士，作了各种降低购物税<sup>②</sup>的规定，其中有的是特别为了支持兰开夏的棉纺织业的。在提出这个预算时，巴特勒很有信心地宣布，总的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1955年的预算，从竞选的角度看，虽然反对党当然地责备它是“劫贫预算”，但仍然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遗憾的是，1955年大选以后的几个月里，出现了许多阻难。令人讨厌的铁路罢工延续了好几个星期；夏天的码头罢工给出口造成重大的损失；到7月中，工业战线和金融战线的情况都令人十分担心。成本和工资提高了，但是生产率却没有相应地上升。到夏末，财政大臣曾经告诉他的同事们说，他仍然希望用正统的办法来医治这场病患，这就是紧缩信贷，开放市场交易，等等。

1955年夏天，首相曾经要我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不好意思推托，照他的意思办了。我本人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政策。我们不能回到管制、高税收和其他的江湖疗法去。在艾登的

---

① R. A. 巴特勒(后来是巴特勒勋爵)1951年至1955年曾任财政大臣。

② purchase tax, 英国的一种税收，其税率视商品的奢侈或必需程度而定。——

要求下，我写了一个文件，在正统办法的范围内提出我自己的建<sup>5</sup>议。文件的草稿我现在还保留着，它的题目叫“胜利冲昏头脑”，主题当然是说我们以现有的资源力量企图办的事情太多了，指的是既包括生产资料生产，也包括消费品生产。已经出现充分就业，甚至是就业过剩。大批失业的可怕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前进了一段很大的路程；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我从来也不敢期望能够活到看见这样一个大转变。但是，我们不能欺骗自己，闭眼不看这种负荷过重的局面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所产生的新问题。

对付这种局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象在战时那样，封锁或者社会主义）是恢复硬性的控制，特别是对进口实行管制，并且用政府计划来调节生产。[我们已经]试验过这种办法；如果我们想再度使用它，那不如让社会党人来干，他们喜欢这个办法，因为他们确实是把财富的扩张和增长看成很不道德的事情。社会党人是经济上的清教徒。

接下去我就描述了另外一种我认为比较适合于保守党人的办法，这就是：采取一整套补救性的措施，承认增长本身是可取的，应该继续下去，但是步子不宜跨得太大和太急。概括地说，这个计划的内容在货币方面是用较高的银行利率来继续压缩信贷，或者说加紧压缩信贷；减少或者取消政府的各种补助，包括过高的住房补助和面包牛奶补助，以及推迟各种基本建设计划；以传统的志愿兵役制来代替浪费性的国民短期义务兵役制，放弃过时的或者非必需的武器；用各种方法鼓励生产，包括降低而不是提高直接税，其中特别注意支持经理和企业主阶层；降低或者取消对不分红利润的税收，提高对分红利润的税收，以及鼓励储蓄，采取新的方法使储蓄更有吸引力。

剩下的就是英镑的兑换能力问题。一般都认为这是我们合乎逻辑地应该追求的目的。事实上，既然我们已经开放了商品市场，又决定支持可兑英镑，我们的通货对于那些懂得怎样兑换的人来



6 说,实际上就是有兑换能力的。如果更正统的办法能够有效的话,我们尽可听其自然;但是,如果我们面临另一次英镑贬值;我们就必须恢复两三年前就有人不断主张的让英镑浮动的办法:

不要把英镑的价值贬低到一个固定的汇率,而实行浮动汇率。

开始,汇率可能猛烈下降。如果真的如此,就会有不少烫伤手指,吃点小亏。不管怎样,在目前情况下,用这个方法承受考验比其他方法可能安全些。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我国一个健全政府如果遭到危险,更大可能是由于储备枯竭,或者是因为有成百万人在依靠救济为生,而不是由于英镑对美元的价值偶然的波动。当然,这种办法将降低英镑作为一种长期储备手段的作用;但是,今天世界上除了美元以外,没有别的货币能够真正起这种作用。

但是,在驶上这样一条尚未探测的航道之前,显然还是应该使用通常的武器;所以,巴特勒提出了一个秋季预算,规定增加购物税和分红利润税;削减政府对地方当局的贷款;除了因为清理贫民区以外,取消了国库对住房的补助;以及提高电话费和租金。

预算和其他一些措施似乎收效都很慢。到12月底,即我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十天以后,我的日记本里写道:“情况比我担心的还要糟糕,……而且储备不断在下降。”<sup>①</sup>我现在既然负责了财政部,显然必须拟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并且坚决地执行下去。我是主张扩张主义的,而且一直没有改变。但是,不管主张以一切代价来扩张经济,把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或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出现的贬值置之不顾的人论据如何充分,政治形势并不适宜于这样做,权威学者们也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政策是不时地煞车,那么,迟迟不实行补救性措施,就比实行得太快的危险更大。《金融时报》在我的任命宣布的第二天,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个论点:

<sup>①</sup> 1955年12月30日。

如果银行利率在三个月前就提高的话，经济发展就很难具有现在这样大的动力。因为利率的提高要依靠比现在完善得多的统计制度，而且需要对出现的任何浪潮更为迅速地作出反应。<sup>①</sup>

这两点要求我都同意。关于第一点要求，无论如何我是可以逐渐取得一些成就的。这篇文章接着又说：

财政大臣不应该以为自己是个轮船的船长，只要不时改变一下航道就行。他的地位更应类似一个在平滑的道路上驾驶着车子飞快前进的司机，必须善于最迅速地作出反应。<sup>②</sup>

这是否就是“煞车一开动”政策的起源呢？它反正好比同时使用煞车挡和加速挡来得明智——后者是后来流行的做法。

在圣诞节以前，除了认识一下我需要指靠的一些官员之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虽然只有几天功夫，除了从我的正式顾问那里外，从我的朋友们也听到不少的建议。遗憾的是，尽管所有这些建议对我都很有益处，但是它们大多互相矛盾。有的报刊，特别是《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只有当我们象美国和德国那样，不让就业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六，或九十七，我们的麻烦才能克服。另外一些人却又唱起他们的老调，主张毫不妥协，完全无视需要适应当前的局势。在节日的几天假期里，我写了一份题为“从财政部的窗户眺望形势后的初步设想”的文件。我强烈地感到：如果我们承认需要采取措施来限制通货膨胀，就必须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这一点从储备所受的压力不断增大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要么决定采取一项完全革命性的政策，实行新的贬值或者浮动汇率，要么就需要尽速恢复英镑在国内外的信用。一旦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就可以进而采取刺激生产和储蓄的措施。

1月2日，在部内传阅了我这个文件。各部门都以难得的速

---

①② 《金融时报》，1955年12月22日。

度认真负责地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的笔记本里迄今还全部记载着。我的建议包括的范围很广，无疑是有点草率，考虑不周，大部分没有什么价值，虽然其中有一些成了未来政策的基础。这些建议分成好几类。第一，需要用税收来限制购买力以及通过压缩信贷和提高银行利率从根本上减少私人开支。第二，缩减整个公共开支，甚至那些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开支项目也要缩减。第三，运用管制制度；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不应该害怕建立管制制度。第四，我们怎样才能提高生产率？也许，可以对机械化和现代化采取某些适当的刺激措施。如果上述办法仍然不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我们便必须考虑修改关税或实行进口管制，并以有区别地进口相配合。我们必须准备好一个实行进口管制的全面计划。最后，我们必须鼓励储蓄。虽然储蓄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采取的其他措施是否确实表明我们至少已经遏止了通货膨胀，但是，也许我们还可以想点其他办法来吸引新的投资阶层。这个初步意见后来在麦金托什勋爵的出色帮助下，发展成包括设立有奖公债在内的整套完善的国民储蓄制度。

在退休以后来浏览这些已经褪色的文件，重温一下我的一些大臣级顾问和主要的专门顾问们所提的有真知灼见、雄辩有力、有时也未免令人气短的意见，实在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原来收集的大量材料，仍然保存在我的笔记本里，使你伤感地想起一些新任的大臣们如何满怀着希望和勇气，热情地钻进一大堆老问题里去的情形。各种论点有如激流，湍急地向前流动，各自又汇合无数的其他水流，逐渐形成许多巨大的河流；但是，可惜的是，正如许多大河一样，它们往往又分散消失在沙砾中，永远到不了大海。

在坐下来仔细研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以前，我在1月2日会见了第一位客人，即英格兰银行行长 C. F. 科博德。我在财政大臣和首相任内，一直和他维持着牢固的友谊。我要尽快地摆脱目

前不中意的政策而转上比较近乎扩张主义的道路。我想他一定认为这种努力是过于危险的非正统做法。但是，我鼓励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从货币的角度对政府的开支浪费尽可能提出批评。他明确地指出：不论是1955年2月开始实行、7月又进一步加强的压缩信贷的措施，或者是10月间预算案所规定的措施，都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贸易平衡进一步恶化，而且，就象他再三提醒我的，储备的数字只比公认的危险标志二十亿元稍高一点点。劳力储备完全没有——12月份的失业数字是战后最低的。尽管只是第一次会面，我就意识到那种使行长与财政部官员互相脱节的旧传统还在起着作用。我决心要建立比较密切、比较经常的联系。此外，我渴望在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圈子之外，另外吸收进一些顾问。因此，我在卡尔顿花园一号（我们这时还没有搬进唐宁街十一号）举行了一次晚宴，招待行长、劳埃德系统的董事长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拉扎德系统的董事长汤米·布兰德，还有代表工业界的珀西·米尔斯爵士。我请了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爱德华·博伊尔爵士和罗伯特·霍尔爵士来和他们见面。

这样，我就组成一个人们不会允许我建立的顾问委员会！这次集会十分成功。进行了极其坦率和有益的谈话，充分交流了情况，而且就应该做的事情取得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看法（幸运的是，这些意见和我们原定的计划没有多大的出入）。至于这些办法是否能收效，看来成败的可能性参半。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象目前这样继续漂流下去，一定会碰上礁石。<sup>①</sup>

第二天，我和博伊尔、布里奇斯和布里顿一起，与行长、副行长、总经理开了一个会。这样，我就终于举行了一次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正式联席会议——既有会议记录，决议也制成文件——10这样的会过去是一直不让开的。

<sup>①</sup> 1956年1月19日。

为了办成这件事，在开会以前，我还(另外)和行长单独会晤了二十分钟左右。这样，礼节就尽到了。<sup>①</sup>

这个做法显然是必要的，过去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完全是因为沿袭旧例。

为了使我的同事们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我在1月6日传阅了一份以霍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为依据的报告书。我明确地指出：我们面临的形势要求我们立即采取牵涉面很广而且剧烈程度比我们原先认为必要的还要大的行动。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到我们讨论这个报告书时，大臣们“都对局势的严重性印象很深；有一两位确实感到震惊”。<sup>②</sup>这样的思想准备无论如何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将来我的补救计划比我现在想的要不那么严厉，大臣们将相应地感到放心；如果将来计划不得不包括一些很不受欢迎的项目，他们也会以比较谅解的态度默示同意。在提出一项突击措施之前，没有比稳定内阁的情绪更为重要的了。

在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接任的财政大臣，必然要在一个重要方面遇到很大障碍。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各项预算数字已经确定下来，或者事实上定下来了，没有多大的活动余地，甚至表示异议也不行了。还有少数几个未解决的问题尚待确定。一个是国防预算数字。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在新任国防大臣沃尔特·蒙克顿的慷慨帮助下，我们从所有各军种的要求数字中争取到大笔的节约，包括从民防费用中节约一千五百万英镑。主要斗争发生在增加军人俸给的问题上。原来提出的计划需要花费大笔款项，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取得成功，自愿当兵的就会增加，结果就可以导致减少义务兵，也许还可能废除国民义务兵役制。不管这种做法可能使当前社会利益遭受多大的损失，未来将证明是一笔很好的财政

---

① 1956年1月20日。

② 1956年1月12日。

投资；所以，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后，我同意了七千到七千五百万英镑的数字作增加军人俸给之用。

11

尽管削减和限制对我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而且也违背我天生的倾向，但是，既然我们必须这样做，那还是愈快决定下来愈好。银行利率并没有象原来所期待的那样控制住购买力，原因一方面是直到这时候很大一部分购买力是政府本身的开支，一方面是由于税率既然高，通货又不断膨胀，人们碰到认为便宜或者可以转手卖出得利的东西，往往宁可借钱也要买。我们也不能忘记，银行高利率也增加了主要来自国外的政府借款的利息负担。我的一些年青同事特别坚持这个论点，由此就产生一个方法，就是由政府规定结算银行库存现金与它的总存款额间的一定比率，借以控制信贷总额。后来的“特别存款制度”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我的所有顾问，不论是正式顾问或非正式顾问，全都认为：如果需要实行一套新的措施，时间最好在2月的第一周；1月显得太仓促，3月又太晚。1月24日，内阁会议审议了我准备好的建议，很快就在原则上通过了，不过细节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意见，在时间问题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人希望一切都拖到制定预算的时候再说，但是，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使我们不能这么办。既然需要采取行动，不管是对还是错，由于全国的情况，最好还是赶紧办；另外，有一个更难于驳倒的理由是：反对党一定会在议会一开幕就要求辩论，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接着便和往常一样，与各位大臣进行一系列的谈判。我仍然希望削减军队的人数，而且，我对英国本土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的用处非常怀疑，尽管这样的战斗机中队在海外也许有很大用途。

众所周知，[对核攻击]是没有防御可言的，可是我们仍然耗费大量金钱来设计、试制和生产“战斗机”——该计划一直要到1962年，甚至还

11

要长。这不但对国库、而且对工业都是一个重大的负担。<sup>①</sup>

12 和我的同事们谈判，费了好几天时间。每一位财政大臣都会碰到这样倒霉的命运，需要和自己的老朋友吵架——或者说好象在吵架。但是这一次大臣们都很合作，够帮忙的。不巧的是，在这个紧要时刻，首相到美国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去了。在我的整个计划里，他不满意的主要是关于取消面包和牛奶补助的问题。他认为：有一些工资谈判，特别是机器业的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任何看来有可能增加生活费用的事情，肯定是推迟到这些工资要求解决以后再办为好。为什么不把这一切至少延缓到制定预算时再说呢？其他的大臣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却决心要立即采取行动。

为了试探工业界的意见，我在全国生产咨询委员会2月3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详细地说明了形势的严重性。从1946年到1954年，我们的商品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但是花费的成本总额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去年我们的储备几乎下降了四分之一。无论怎么令人不愉快，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一份负担。对这个演说的反应很好，雇主和工会人士总的态度使我增添了勇气。

与此同时，关于进口管制问题，财政部内还在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博伊尔和我都喜欢这个办法；但是，反对的论点也颇为有力，比方说，我们的顾客可能会进行报复。总的说来，我们售货的必要性比他们购货的必要性更大。我最后同意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应该准备好一个计划供紧急时之用，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前，先依靠其他的措施。这就是说，这项武器应该储藏在武器库里备用，非到最必要时不轻易动用。

现在，需要使这件事情有个结果了。我再三催促应该在2月

---

<sup>①</sup> 1956年1月29日。

15日发表一个声明。这时艾登回来了。事情弄明白了，成问题的主要是取消面包和牛奶的补助一事。由于内阁还在犹豫，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写信给首相把事情钉死。我把所有的论据都复核了一遍，在2月11日把信发出。下面是这封信里最重要的一段：

13

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实在感到需要请求你的支持。我正处于某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不愿意显得我是在威胁内阁，我从事公务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手段；但是，我也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误解，以致日后也许会责备我没有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你。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如果我得不到你和同事们的信任，不能按照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方式来处理你委托给我的这个问题，我也不应该建议一些看来并不能达到目的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你和对内阁也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在内阁经常出现的政策上的小分歧，是可以妥协的；但是，如果我试图为我所不赞成的政策作辩护，那是没有任何好处的。<sup>①</sup>

在生活费用这个特定问题上，国民救济局也不知道出自他们的好意还是偶然，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们认为物价上升造成的影响将会很小，没有必要提高救济金的数额。

2月13日星期一下午，继续与阁僚们商谈——单独谈或者几个人一起谈。同时，英格兰银行行长因为英镑出现严重外流的迹象而很担忧，所以前来看我。危机似乎没有暂停发展的迹象。我明确地表示，如果我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就无法继续做下去。我必须等待答复。

主要有关大臣的讨论在幕后继续进行。我准备好了我的辞呈（我的卷宗里还保存着底稿），并且等待着将决定我未来命运的关键性内阁会议。首相明智地推迟作最后的决定，继续依靠友好的协商。2月14日

巴特勒、希思科特·艾默里和桑尼克罗夫特到我办公室来看我，试

<sup>①</sup> 1956年2月11日。



图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他们说，首相坚决不在面包和牛奶问题上妥协。既然这样，我就回答说：他需要另请高明来当财政大臣。这几位大臣（晚饭后）带着妥协的主张又来了一趟。是不是能想出个方案来做个开始呢？我说，我愿意考虑这点，但并不太喜欢妥协！这次危机奇怪的地方就是：1)我几乎没有和首相谈过话，他一直避开我，只是通过密使来打交道；2)关于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见报。这确实是很不平常的，它表明我们大家多么地友好和通情达理！的确，我们内阁讨论问题时的风格和姿态一直是很高的。<sup>①</sup>

最后，终于提出了一个我可以接受的计划。我们将马上从二点五便士的面包补助中减掉一个便士，剩下的以后再减。牛奶补助延至7月份再按照我原提的建议处理。这个方案最后在2月15日晚上经内阁会议批准。

在比较平静的气氛中来回忆这件事，是很难想象或者描绘出这类危机的紧张情况的，因为它比起那些更重大更危险的事件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当时可真够激动人心。我必须对表现了忍让和善意的所有有关人员表示敬意。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但是都不存怨恨和恶意。在取得最后解决的前一天

深夜，我与布里奇斯及行长谈了一次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问题：辞职和妥协究竟哪一种做法害处大？行长毫不怀疑地认为我如果辞职，一定在伦敦财政金融界引起慌乱。<sup>②</sup>

因此，我也就决定满足于实现五分之四的要求。

2月16日，有鉴于市场的情况，银行利率从四厘半提高到五厘半。第二天，17日，星期五，我在下院发表了声明。我从来没见过星期五上午的会议有这样多的议员出席，不过，到会人数异乎寻常地多，是因为发了正式通知。声明只念了二十分钟左右，接着是15分钟快速的质询和答辨；辩论定于下星期继续。我所宣布的用

<sup>①②</sup> 1956年2月14日。

以补充秋季预算的进一步措施有：1) 赊购：增加消费品的定金，扩大对某些生产资料商品赊购的限制；2) 食品补助：削减三千八百万英镑，这样，每个 1.75 磅面包的价格将提高一便士，每一品脱牛奶提高半便士；3) 私营工业开支：基本建设的投资补助暂停，恢复以前的限额补助；4) 公共开支：当年国营工业建设计划再削减五千万英镑，政府各部的基本建设开支减少二千万英镑以上，限制地方当局的基本建设工程。

我很后悔决定暂停投资补助和恢复从前的限额补助。虽然也注意到一般地规定已订立的合同和已开工的项目除外，而且还特别规定不适用于造船和科学研究的项目，但是现在看来，撤销这种对基本建设投资的鼓励，是错误的，尽管投资量还是有不少增长。我希望这个办法不会是永久的。在政府的公共开支项下，政府各部进一步裁员一万至一万五千人，包括负责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这一点在执行时虽然碰到困难，阻力也很大，我们还是做成功了。至于对私营企业贷款的限制，资本发放委员会仍然存在，它的工作证明很有效果。面包和牛奶补助，在现代社会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再存在。但是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对这个问题都有点看得太严重：有的人认为取消这种补助是对工人阶级的无情打击，另外一些人又认为这次采取的措施可以证明我们的诚意。其实，在国内外加强人们的信心是必要的，不容忽视，因为，“能够不用护照走遍全世界的，不是真理，而是舆论”。

在宣布这些决定时，我强调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我们希望依靠成功的贸易来弥平我们的进出口逆差，而不是靠耗费我们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我们希望更进一步通过增加我们的储备来 16 提高整个英镑区的实力和作用。事实上，我们是想捍卫我们战后在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过去，生活水平从来没有这样高，一般福利也从来没有这样广泛，英

国的持续繁荣和它的偿付能力，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地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因此，我相信，虽然这些措施很自然会造成某些牺牲或者引起某种失望情绪，但是，人们一定会承认这是明智和及时的措施而加以接受。<sup>①</sup>

辩论在2月20日举行，我的演说延续了一个钟头。开始才不到几分钟，大家就全神贯注地听。我禁不住要拿两次战争之间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来和今天的新问题相对比。那时候，生活费用极低，失业达到顶峰。现在，我们是充分就业——有人会说这是人为的充分就业——但是物价总是在涨。我完全否定那种认为我们正试图制造失业的说法。甚至比弗里奇勋爵所说的必须有百分之三的平均失业率的主张，我也不准备接受；而这个主张，盖茨克尔反而打算在一定情况下加以接受。采取这些措施，正是为了维持就业，因为，如果收入的增加继续比生产的增长迅速一定会反过来造成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就减少了销售出口品的机会；从长远来说，这一定会造成国内很多地方的失业，特别是那些过去失业最严重的地区。大家都一致承认，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得多（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从工党和合作派的出版物里找到许多证据）。但是，

麻烦在于，我们的做法却好象日子只比过去好那么一点点。所以，虽然我认为目前形势是严重的，如果不认真对待，就容易出现危险的局势；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我们的力量所难以控制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sup>②</sup>

- 17 工党事实上对这个诊断并不反对，他们的修正案也并没有采取有一些人支持的观点，即为了追求经济扩张，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实行贬值或者实行浮动汇率来把负担转嫁到英镑价值上。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2月17日。

<sup>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2月20日。

但是,既然这种做法被排除在外,就只有两种主要的处理方针:

有那么一些人说:“让我们对内和对外都采取直接硬性管制的办法吧。让我们重新实行建房管制吧。让我们回复到用发放许可证来管制进口的办法吧。让我们用管制、调拨、定量配售以及其他一切办法来保证不过多耗用作为管制对象的物资——当然包括粮食在内。”于是,这种论调就会这样结束:“而且,当然啰,让我们不要害怕物价管制”。这是一种治疗方法。<sup>①</sup>

在战时以及战后初期,我们已经有过实行管制的丰富经验;但是,一旦通货开始膨胀,这种管制制度便不能真正对付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治标。在两党共同支持的政策范围内,我不能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实际的问题:建议中的管制办法能取得成效吗?我所建议的措施是否有把握既能收到效果又不致对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造成长期的损害呢?

哈罗德·威尔逊回答了我,他发表了……

……一篇漂亮的辩论性演说。他给他的党赢得了好多分,……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挑动工会的话。<sup>②</sup>

最重要的是工会的反应,在这方面威尔逊表现了很大的克制。和我的多少有点沉闷单调的演说比起来,他的发言生动活泼,才华横溢。在这些发言后,辩论已近尾声。新闻界的反应是令人满意的: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报纸评论,出乎意料地好,今天的更好。我确实非常满意。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吗?<sup>③</sup>

我当然放心多了,但是过去这十天确实累人,当然,内阁里的 18 困难也是使人精疲力竭的一个原因。

我现在需要: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2月20日。

② 1956年2月20日。

③ 1956年2月21日。

- 1) 拟定进一步的措施来保护储备,如果原来的措施不够的话。
- 2) 编制预算。
- 3) 制定对待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对待欧洲的政策。
- 4) 确定总编制——也就是给政府和财政部规定合适的组织。
- 5) 实行节约——特别是国防开支的节约。①

和往常一样,每天都忙于会客、讲演、回答议会质询、出席各委员会和内阁的会议、处理一大堆文件,诸如此类,简直没有时间考虑问题。使我意外地如释重负的是,内阁危机的消息没有以任何方式泄露给新闻界。这对于我的内阁同事以及所有了解这场紧张争论和最后可能出现的分裂危机的人们说来,是一份难得的礼物。

对我来说,这有点出乎意料。有一个时候,多罗西曾经告诉工作人员不要再在唐宁街十一号挂起我们的照片之类东西,原因是她认为我们不久就得搬走!②

表决之后第三天晚上,我和丘吉尔单独进晚餐。我发现他心情很愉快。

他说:“你紧抓住面包和牛奶问题,完全正确。如果你不干这不得人心的事,他们就会以为你并不怎么认真负责。”——这是个很有眼光的评论。③

行长亲笔写来一封使人高兴的信,他根据最可靠的估计向我担保说,商业界和工业界人士虽然一般地很不喜欢限制,但是他们同意我们的行动,并且认为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目前形势的需要。更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我们已经开始收进一些现金,储备有所增加了。

19 既然我们必须走传统的道路,我们这样大胆地行动,给自己争

---

① 1956年2月22日。

②③ 1956年2月23日。

取一点喘息机会,我敢肯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还不很明确下一步又该怎么办。预算还摆在我面前,在以后几天里就得把它编写修订好。

虽然到财政部最初几个星期的经历,几乎和我过去的经历一样地充满刺激和忙乱,但是这个部门究竟和外交部有些不同。这两个部遇到的问题都很繁多,而且往往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但是速度却不一样。我常常把外交大臣比作一名日报编辑,他收到的电报往往是报道某某事件出现了意外的变化,或者报告发生了他多半事先不晓得、也推测不到的头号危机。这些报道灾难的文字使者每日每时不分昼夜地前来扣门。财政大臣则更象一名月刊编辑,或者顶多是个周刊编辑。他时间稍为从容,不必那样关心特急新闻。不过,在这两个部里,都需要在当前事件的压力下努力制订一个长期的政策。在财政部的这头一场战斗中,不管我正确与否,反正我是胜利了。但是,在政治事务中,也和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一样,一次成功给人带来的满足,往往证明是靠不住的。据说,墨尔本勋爵曾经说过:“汤姆·麦考利对什么事情都自信,我哪怕有一件事情象他那样自信就好了。”我已经按自己的路子走,但是,暂时我还绝对不敢说我一定走对了。

## 第二章 预算及其后

我们夫妇现在从卡尔顿花园一号的外交大臣寓所搬出来了。这套住房有点凑合,它是用大楼里的一个大卧室改建成的,楼房的一二层保留给公家招待客人用。饭厅象豪华的客轮一样,镶上了黑橡木;但是却没有地方或者说只有很小的地方给仆人住。不过,住起来倒还方便,因为它离外交部只有几步路。这一年往后我们要住的唐宁街十一号,是一栋实用而平淡无奇的房子,比隔壁的宏伟房子相形见绌;但是,它也有一些令人喜爱的特点。它一边是乔治二世指定给沃波尔居住的那栋著名的首相官邸。这位伟大人物以他少有的克制接受了这座房子,暂时住着,准备传给他的后任们。另外一边是唐宁街十二号,顶上的几层在十九世纪中叶焚毁了,一直没有重建,显得特别寒酸小气;底下几层没有烧掉,原来由财政部的铨叙处占着,现在用作执政党议会党团督导员的办公地点。这栋楼最近已经重建了,顶上给财政大臣盖了一套朝西的精美住宅。但是我担任财政大臣时,十一号算是一栋朴实的不错的房子了,我的很多前任都住过,而且都认为很理想,因为当时楼梯对主人和仆人都不成什么问题。从唐宁街的正面看,它似乎很狭小;但是,楼下对着花园有两个大房间,是我们主要使用的屋子,一间是休息室,一间是书房。休息室有一道门,门外是个石筑游廊,廊下便是花园。格拉斯通先生当财政大臣时,曾写过一份据说足有二十多个段落的文件,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地证明这个花园应该由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住户分享。但是,大家都晓得,他当了首相以后,又拟了一个更长、理由更充分的文件来证明花园是属于首

相官邸的。反正，我们夫妇都非常小心，注意不要打扰艾登一家，顶多是夏天在窗下紧靠着我们的墙边放一两把花园椅子。

书房是个结实的屋子，放着一张结实的书桌，一些结实的家具和一些结实的参考书。主要的装饰品是米莱<sup>①</sup>画的一幅逼真的格拉斯通画像，也许过去陈设一直就是这样简单。不过，在我就任以前，这幅画像已经取掉，听说是多尔顿要求去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据说，多尔顿声称：“一天到晚让那双炯亮的责备人的眼睛盯着，我实在受不了。”我却觉得，重新挂起这幅画像，跟交给我的这份工作倒颇为协调。

这两个房间的顶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客厅，或者叫沙龙，有两个挺漂亮的壁炉，摆设得还可以。沿着一条有点迂回的小廊，可以通到十号。这两栋房子楼下各自的前厅之间往来还要容易。十一号最引以为荣的是那个苏恩纳饭厅，幸亏这时还保存着。这屋子不大，但是颇有特色，房顶是很奇妙的圆拱形，装饰有衬蓝的金质星星。

这座房子的毛病是向北，老也见不着太阳。朝南的几间屋子，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一定是很逗人喜爱的，后来被大街对面外交部大楼的陡峭的大石墙给挡住了。我们在三楼上布置的一个小饭厅，就朝着这一面。偶然，在夏天的下午，有那么一个钟头或者多一点，外交部那座庞大建筑物的巨影没把我们全给挡上，不过这种时候实在很少。我的前任们有的人就受不了这股阴暗劲。比方，巴特勒就在史密斯广场保留一栋美丽的房子居住，十一号的房子只做办公用。我夫人本来就忍受不了伦敦那种阳光稀少的天气，这一栋房子完全见不到太阳更使她难受，所以只要一没事，她就溜回苏塞克斯去。在她心目中，我们后来搬到十号去，她得到的

---

<sup>①</sup> 约翰·埃弗雷茨·米莱，十九世纪英国画家。——译者



主要好处——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一间有个西窗的客厅，傍晚的落霞灿烂地照得满屋都是。

我们搬进十一号时，碰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在丘吉尔的最后一届政府任期内，彻韦尔勋爵占了最顶上的一层，既当寝室，又做休息室，还布置了一个办公室。我原先就很钦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又和他有过愉快的交往。丘吉尔政府改组以后，因为财政大臣巴特勒用不着这房子的顶层，所以彻韦尔勋爵继续随便使用这部分房子。我们当然想要回来给工作人员用。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发现四壁尽是一书架一书架的平装侦探小说，还有一排排的肉汤罐头和蔬菜罐头。这位伟大人物一定是用这些罐头来维持他那羸弱的身体，那些侦探小说则用来清醒一下疲乏的脑筋。我有点犹豫，不知该怎么办好。虽然我非常希望要回这些房间，但是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把房子要回来又不致于伤住客的感情。这个问题终于还是象许多其他问题一样，由内阁办公厅用巧妙的办法解决了。根本就不用多罗西或我提起那些刑事俱乐部的出版物或者是海因茨出售的可口产品的事。

虽然1956—1957年度的预算数字在我担任财政大臣以前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但是有一个很不好办的例外项目——这是一件可怕的新事情，我虽然也模模糊糊地记得过去大臣们往往来回讨论这个令人厌烦的复杂问题，但是我从来不敢纠缠进去。这就是农产品价格补贴问题。每年一度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总是迂回曲折，带点拜占庭式的味道，只凭一大堆没有几个人懂得而谁都怀疑的数字来争论。最近几年，我也不得不逐渐习惯于这种《爱丽丝漫游奇境记》<sup>①</sup>式的计算方法了，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预算数字，总是和每个农业年度结束时送到财政部报销的补贴总数完全

<sup>①</sup>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十九世纪英国数学家道奇森以笔名卡罗尔写的一本童话。——译者

不一样的。

简单地说，农产品价格补贴这一项目，是要确定财政部应该拨出多少款项来给农场主，使他们在与进口的世界上价格最低的粮食作销售竞争中，能够维持他们自己适当的生活水平和发放合理的工资给农业工人。（进口粮食的价格低，是因为与一些较大的自治领，主要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订有某些特殊的贸易合同。）这个做法给我们的好处是获得便宜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进口的；同时，又可以保存兴旺的国内农业，根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来看，这是一笔十分重要的财产；不过由于大量进口粮食，国际收支平衡受到经常性的压力。

实际上，存在着很多不利之处。“价格补贴”主要是满足小农场主的需要，他们之所以亏损，可能是由于经营效率低，或者农场规模小，或者是地理条件不好。每年一度就补贴数字进行的讨价还价，总是很不愉快，甚至成了人所共知的丑事；而补贴所根据的数学估算方法，准确性又大有疑问。但是，人们可以为它辩护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投资的增加、机械化的发展和一般效率的提高方面，农业比其他行业的进步都要大。我在担任首相期间，一直接受这种有着许多麻烦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制度，我也没有试图对它作任何急剧的或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因为，在最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希望我们一参加共同市场，这种制度便可以作重大的修改。

1956年的价格补贴仍照常实行。农场主要求增加四千一百万英镑，我们决定先答应增加一千七百万，希望最后能限制在二千二百五十万英镑左右。农业大臣德里克·希斯科特·艾默里和苏格兰事务部国务大臣詹姆斯·斯图尔特既坚定又通情达理。他们一致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

……取消〔农场主联合会〕在牛奶上所要求增加的大笔补贴；而且，

从饲料(燕麦和大麦)和食用牛上再扣下一笔额外的钱。①

24 根据已成的惯例,有两种确定最后数字的方法。或者是由双方(政府和农场主联合会)达成“一致方案”;或者先“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然后由政府确定一个“强制方案”。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有充分理由采取后一种方法;因此,当3月9日各主管的大臣们通知我说将按这一方法解决时,我十分高兴。

我认为〔农场主〕不致于发动一场猛烈反对政府的运动,因为〔詹姆斯〕特纳爵士不会愚蠢到连这样一点也意识不到,就是:在目前经济情况下,公众将认为每年额外再增加二千四百万英镑已经够慷慨的了。用一个“强制”的方案作样板,将是很可取的。②

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定下来,但是,内阁同事中又有人变卦。他们给首相施加压力,要求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只好同意作一些小的调整,把补贴的增加数字改为二千五百万英镑。这个决定3月15日公布后,报章上反映很好,尤其是《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但是,由于最后的结果根本无法预言,所以我只能以下列想法来自我安慰:如果年终的实际数字因为世界价格的下跌而使财政负担比原定增大,国际收支方面的压力却可以减轻,因为粮食的进口价格也降低了。

补贴数字最终确定以后,我还继续和农业大臣希斯科特·艾默里研究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感到,我们把这种保证价格确定在一个足以使每个农场主得以继续经营的水平上,肯定会妨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使农业分散为过多生产单位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更进一步的后果是:我们不得不按全部农产品的保证价格向数量极多的农场主发放补贴;而实际上如果农场主的数目大量减少,余下的农场主生活境况就会很好,用不着我们作很多补

① 1956年2月27日。

② 1956年3月9日。

贴。此外,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进口饲料用于较小型的农场的部分,超过应有的百分比。我们的困难当然在于:对土地使用 25 权最近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保障,如果在此同时却把价格补贴定得太低,使小农场主处于真正毫无保障的地位,以致他们不能不放弃经营或者把他们的农场合并到较大的农场去,这种做法将很不得人心——人道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可以把办法改变一下,积极鼓励农场合并,比方说,提供资金援助,对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农场提供改革贷款。另外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在那些小农场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宜于完全联合起来经营同时却存在强烈的社会原因需要保存小农场的地区,对小农场主提供特殊的保护(象对高地佃户一样<sup>①</sup>)。也可能还有其他可供采取的行动,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究竟这种人有多少,他们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如何,为什么他们的成本这样高,他们生产量有多少,等等。有了这些有关资料,我们才能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步骤。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过,由于我后任的几位财政大臣的协助,由于补贴制度的管理得到了改进,也由于出现了农业为了应付设备和机器方面的大笔开支而需要合并成较大的单位这一总的趋势,所以我们确实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过去,当我们的前辈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一个强大的帝国时,由于安排上经验不多,所以,需要财政大臣决定的问题只是怎样从课税或其他来源中获得适当的收入来应付国家预计的开支。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实行了几个世纪的国家账目以现金为计算基础的制度,已经经多尔顿之手代之以一种更为科学的制度。过去的预算,只是“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的流水账目,它连商业账目或者盈亏账目都不如,更不用说资产负债表了。它不把各部在年初和年终的库存价值计算在内。1946年和

<sup>①</sup> 高地佃户主要指苏格兰西北部高地独家小农庄的佃户。——译者

1947 年的多尔顿预算，开始实行一种自后一直沿用的办法。现金  
26 支出和现金收入都列为“线上”数字，包括国债的利息——但本金  
的偿付不在内。基本建设投资则列在“线下”，包括任何基建资本  
的回收。我们已经远离十九世纪紧缩财政的时代了，现代政府要  
负责批准巨额的投资，不仅是国营工业投资，还包括许多方面的投  
资。在这样一个时代，多尔顿的办法无疑是比较妥善的。只要它  
还有优点，就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但是，正如许多现代的发明创  
造一样，这种办法本身也有它的危险和复杂之处。因为，现代的财  
政大臣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对全国的财政经济局势需要考虑到的  
情况更为多方面，也更难于捉摸，一旦犯错误，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也更严重。

此外，即使这种划分开支的办法，也不是完全科学的。有一些  
实际上属于投资项目的大笔支出，或者受传统的限制，或者由于过  
去的立法规定，仍然包括在一般供应项下；而且，除了这些比较细  
致的问题外，现在不象过去无知时候那样，只需要“使预算平衡”，  
而且需要决定是实行“赤字预算”还是“盈余预算”。换句话说，我  
现在必须根据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小来确定预计的收入是否能够  
不仅满足“线上”支出的需要，而且可以拨出适当的款项来作“线  
下”的开支。当然，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更多的经验，而  
且各项事情也处理得妥当多了，至少，人们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  
在这个新的财政启蒙时期的初期，存在过不少的怀疑和争论。有  
的人主张预算应该做到全面平衡，也就是说，收入应该满足“线上”  
和“线下”的全部开支。甚至这种彻底的办法其实也没有把地方当  
局的大量投资计算在内，这些投资有一些是自己借来的，所以没有  
列入国家数字；另外一些是依靠中央财政部门发放的贷款。此外，  
有一些国营工业是由政府作担保自行在市场上借款；还有许多其  
他的复杂情况和各种附带的问题——包括私人储蓄这样一个重要

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到。

不久我就发现: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財政大臣在否定一切死板<sup>27</sup>或偽科學的公式的同時,都力求達到一個總的目標,這就是:全國的全部投資,不論是私人投資或者公共投資,都應該完全來自可用的儲蓄——所謂儲蓄,包括投入再生產的利潤、歲入盈餘和私人儲蓄。出售金邊證券<sup>①</sup>一般地可以相當於實際的儲蓄。

撇開技術細節不談,如果全部基本建設開支,包括國家的、地方的和私人的投資,全部來自各種類型的儲蓄的話,通貨膨脹的危險也會相應地減少。

1963年5月發表的那份著名的白皮書,又提出一種稍微不同而更為科學的主張。它的最後一段值得在這裡加以引述:

對經濟發展情況的預測以及對特定稅收的變動會產生什麼效果的估計,雖然不可避免地難以十分精確;但是,仍然需要有一個判斷,來指導預算總的方向。這個判斷將決定政府必須借貸或者“投撥”的淨款項,而這個數字又要根據信貸管理制度和貨幣政策來決定。<sup>②</sup>

但是,我們的預見能力還不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就我自己來說,我一方面反對那種追求下一年“預算全面平衡”的膚淺的主張,一方面又認為,最主要的是要增加全國的總儲蓄額。我根據自己經商的經驗懂得,一切工商企業的擴大,大部分是依靠自己提供資金。照我的看法,可以用擴大分紅利潤稅和不分紅利潤稅的稅率差距的辦法來鼓勵企業這樣做。(這種辦法後來被認為是一種異端學說)不幸的是,最近幾年來,現代工業設備成本昂貴,加上在納稅以後所剩利潤比以前減少了,公共企業不得不從市場借貸愈來

---

① 金邊證券是英國為吸收游資而發行的有息股票,壟斷資本家宣傳它是所謂“最可靠的投資”。——譯者

② “財政賬目的改革”,敕書第2014號(皇家文書局,1963年5月),第33段。

愈多的款项，或者大量依靠银行的贷款。私人企业由于纳税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多余利润，所以，被迫与更大的单位合并或者出售企业，这种情况日益增多。但是，1956年的情况有些不同。在工  
28 商业界，我们可以采用有区别的利润税率来鼓励它们储蓄和投资，在公共投资方面，我们可以规定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办法，或者采取一些新颖的办法来鼓励个人节约，吸收他们的储蓄用于公共投资。因此，我认为预算的主要课题是储蓄，包括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

那时候，我当然希望能经过连续三四个预算来逐步实现一个目标远大的计划，至少是一直到1959或1960年这届议会任期结束时为止。但是结果，我只负责编制1956年的预算，虽然我当了首相，对后任的几位财政大臣所编制的预算自然是十分关心的。但是，首相对预算的关心究竟和财政大臣不一样。财政大臣对他自己每年的亲生儿总是有一种亲密的感情，特别钟爱和关怀它。（有时候，一年十二个月里要有两部甚至三部预算；不过，这种多产的做法一般认为并不正常，是不可取的。）

早在1月31日，当我正在等待我们的补救措施的结果和它对储备的影响时，我就给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送去一份备忘录，另外，也给我的几位大臣级同事各送一份。我仍然在认真考虑如何节约这一年的开支。不过，实行这些节约的同时，又应该规定一些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应的放松措施。例如，与取消面包补助相对应，应该适当增加儿童补助金以帮助穷苦的家庭。因此，任何预算都或者属于“勒紧的”预算，通过增加税收从公众手中取得更多的钱；或者属于“松弛的”预算，通过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来平衡税收的降低。

我的备忘录中有这样几个段落：

看来，要实行一部惊人的或者革命性的预算显然不行了。我们必

须接受税务署的观点，今年谈不上征收资本利得税了。……但是，预算总应该有一个主题。劳合·乔治 1909 年预算的主题是“打击土地所有者”；多尔顿的预算主题是“打击地租收入者”。要是我们能够征收资本利得税，我们预算的主题就将是“打击投机者”。……因此，我们现在这部预算的主题可以定为“储蓄和鼓励”。

(1) 我所说的储蓄包括：

甲、现在埃德蒙·康普顿爵士手上的所有计划和所有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应该和预算同时公布的改进措施。

乙、用尽可能广泛的方式诱导财产的普及，例如，取消自用所有主的印花税。

此外，我们根据〔米勒德·塔克〕的报告为非受雇人员<sup>①</sup>所作的一切，或属于这一类的个人收益，都归入储蓄项内。

(2) 我希望把有关如何鼓励储蓄的全部办法都集中起来，例如，对每年收入一千五百英镑以上的行政人员减免税收，等等。

局势这时正在改善，表现在储备方面的状况已经不那么危急了。2 月份我们的储备增加了六千万美元，3 月份也有类似的进展。但是，储备数字仍然比 1945 年底少二亿美元，比 1951 年年中的战后储备最高峰少十六亿美元。战争结束以来，接受的赠款和贷款共达八十亿美元，这是一个威胁着未来的惊人数字。这些债务，在本世纪结束以前，需要每年偿付二亿美元。此外，储备状况的恶化是联合王国本身的困难造成的，而不是整个英镑区虚弱的结果。

因此就产生两个问题：怎样维持稳定和应该增加什么税收，或者——在税收不敷的情况下——可以鼓励什么储蓄来支持英镑。第一个问题已经在那个题为“充分就业的经济意义”的白皮书<sup>②</sup>

---

<sup>①</sup> 非受雇人员指从自己经营的业务直接得到收入的人，而不是挣工资或年俸的人，如小店主，个体经营者等。——译者

<sup>②</sup> 敕书第 9725 号（皇家文书局，1956 年）。



中谈到。这个白皮书不是我写的，但是，是以我的名义负责发表的。新闻界有点讥笑它，认为这个文件说教太多而行动太少。但是，所谓行动只能意味着实行某种强制性的工资冻结，这样做将违背我们准备遵循的自愿原则。这个问题在1961年又重新提起，而且最近几年里一直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题目。根据我亲自与比较友好和容易打交道的职工大会领导人的接触，我深信，任何强制性  
30 的冻结都会引起严重的不满和遭到顽强的抗拒；而且，即使暂时取得成效，往后解冻也将会很突然，反而可能造成灾难。工会的领袖们十分友好，他们说：“我们倒想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不希望被人称为‘托利党的走狗’。你们必须帮助我们。”

现在，已经接近必须作出决定性结论的时候了。“储蓄”预算一切都很好，但是开始时需要先损失一笔钱。为了使公债和证券的条件更有吸引力，我们至少要花二千万英镑。为了抵销这笔支出，

我们将取消余下的面包补助（今年可省下一千万英镑，明年将省下二千万英镑）。我们将再增加烟草税（今年二千七百万英镑，明年二千八百万英镑）。有一个大问题仍然存在——还必须搞点什么？如果可以，怎么搞法？事实上，问题的实质在于：是通过规定新的利润税，还是一下子规定六便士的所得税（恢复巴特勒去年取消的税收），二者必居其一，来再多弄到五千多万英镑。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抉择；从政治上说，如果我不得不选择所得税，一定会造成头等严重的争吵。<sup>①</sup>

这样做一定会引起一个牵涉到我的前任巴特勒的十分微妙的问题，对此他自然会很敏感。推翻他去年那个受到很多批评的取消六便士的决定，他一定认为是对他的直接非难，也许甚至会因此而辞职。我把这一切开诚布公地和他讨论。我说这样做法丝毫无损于他在财政部任职四年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我们确实不得不

---

<sup>①</sup> 1956年3月28日。

按照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愿意规定任何只会引起增加工资要求的间接税,不过,仍然有活动的余地。我的一些顾问,包括大臣级顾问和专门顾问,意见是分歧的。最后,部分是根据一般理由,部分也出于政治上考虑,我决定把所得税搁下。我自己也觉得,一个政府如果在政策上这样不体面地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外国人一定会认为它很不稳定和软弱无力。提高所得税标准税率的做法,用另外的办法代替了,这就是:分红利润税从百分之二十七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不分红利润税从二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三(这项规定将大约增加三千万英镑的税收,但要到1957—1958年度才能列入国库收入)。为了抵销取消面包补助所造成的影响,在家庭补助金项内对第三个以后的孩子每周增加补助 31  
二先令,在学或当学徒的儿童领取补助金的年龄限制也适当地提高。在鼓励储蓄方面,根据米勒德·塔克的报告,对非受雇人员退休补助金的税率适当降低。与此同时,我没有忘记我最感兴趣的住房问题,决定大幅度降低价格满五千英镑的房屋交易的印花税。结果,预算虽然还是亏缺,未能补足,但是它放弃了二千万英镑,而拿回来的则有二千八百万英镑,另外明年度还有三千万英镑的利润税。

如果所得税增加六个便士,便可以多收一亿英镑。我虽然放弃了对我的同胞的这项税收,却使它成为我对我的内阁同事们施加压力的方便工具。我利用我在国家账目的这一方面的忍让做法,要求从另一方面给我同样的报偿,这就是:要求各部作出确实保证,把政府开支再削减一亿英镑。巴特勒是这个解决办法的热情支持者。

在这整个担忧和踌躇不定的过程中,我发现首相总是表示同情和给予帮助的。增加家庭补助金的计划立即就批准了。现在,预算本身和预算演说算是有谱了。

反正现在它的主题很简单了，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储蓄。(1)有一整套关于个人储蓄的建议——新的公债，在所得税上的让步，等等。(2)有一亿英镑的政府“储蓄”。(3)有公共的或强制性的储蓄——巨额政府盈余，那是通过烟草税和利润税而保持，甚至有所增加的。(1)

我现在住在首相隔壁，所以经常看到他。他心情很好，和往常一样风度优雅，待人周到。象许多高度敏锐的人一样，他往往更多地是因为小的麻烦而激动，而不是由于严重的困难。真正碰到危机时，他镇定而坚决。他虽然专心于外交事务，对国内问题的判断仍然很明智，他总是根据自己对大多数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的深切了解来作出决定的。

审议预算的前几天，对主角说来是很激动的日子——特别是当这是他提出的第一部预算时，更是如此。幸亏有私人秘书处的路易斯·佩奇和埃文·莫德当我出色的“保姆”，他们亲切而严厉地照管着我。在讨论预算的内阁会议上，大臣们对整个计划似乎颇为中意，

……而且连削减一亿英镑开支的要求也接受了——虽然到执行这个保证时一定会碰到很多麻烦。(2)

但是，有一件新奇的事物，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在有一段时期里简直与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访所造成的轰动不相上下，这就是关于发行有奖公债的建议。

在财政部安顿下来不到几个星期，我就要求重新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发行一种带有中奖机会的新的证券或公债，以便鼓励私人储蓄。

由于正统的财政观点和道德上原因，完全象发彩票那样的办

---

① 1956年4月14日。

② 1956年4月16日。

法是行不通的。但是，是不是可以想出另外一种办法，奖金的数额不大，既不致遭到财政清教徒的反对，又能为国民储蓄促进会的普通成员所接受呢？争取这个出色的组织的会员和我们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它一直负责维持大量的个人储蓄川流不息地进入银行。我们需要依靠它的会员自觉自愿、孜孜不倦的认真工作精神。能不能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和一般的赌博不同，投入的资本不必冒风险，而奖金只从利息收益拨付？即使这种做法造成一定程度的“倒退”，会冒犯一些比较严厉的道德家，我们能否争取得到大多数会员、特别是那些每周负责进行宣传和征集储蓄的会员接受这个计划呢？

有奖公债的第一个计划正是从这样一些考虑出发制订的。1月23日我和国民储蓄促进会会长麦金托什勋爵商量这个计划时，<sup>33</sup>我意识到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把问题从个人方面和总的方面考虑一下。他所受的教育和强烈的宗教信仰，使他本能地对一切有可能鼓励人们赌博并带来各种恶果的事情都表示怀疑。他完全承认我们的计划与彩票或者通常的赌博有区别。但是，除了他本人的认真的看法以外，他还必须从客观上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以便能够如实地根据他的会员可能的反应来给我提供意见。在苏格兰出生、在约克郡长大（而且带有约克郡口音）的麦克托什勋爵，是我所知的最诚实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他天生有一种幽默感。他创建了一项目的在于给大量儿童——幼年 and 少年——带来快乐的十分成功的事业，然后又全心投入储蓄运动。无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方面，他都是一个卓有声誉的人。作为一个非国教教徒的领导人物，他很受那些对任何容易煽起人们赌博本能的事物都表示怀疑的人的尊敬。情况确实是这样：在我国，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或其他联欢活动时，抽彩售货，甚至搞一些小规模的抽彩发奖，来募集宗教用款或慈善事业用款，是很普通的事。大家都知道，甚至英国圣

公会的权贵也以一块馅饼或者一口肥猪的重量来猜赌,而且,他们身为主教或副主教,据信也会对这类事情视若无睹,不予闻问。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对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更为容忍的话,最少也和英国圣公会不相上下。不过,人们还可能争辩说,私人组织的规模有限的活动,与国家规定用来吸收上百万投资的制度,究竟有很大的区别;十八世纪财政上那种声名扫地的彩票制度,早就被抛弃了。其实,大英博物馆的修建本来就应归功于一种彩票,可是经常到它的画廊和阅览室里来的可敬而博学的士绅们却无疑已经忘掉这段奇妙的历史插曲了。

除了道德上的理由以外,还有人争辩说,任何这类计划在财政上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国家因为自己的信用下降而需要利用彩票或者类似的“骗局”来吸收金钱,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失去自信心,以致不得不使用碰运气的方法来博取自己公民的支持。此外,这样的计划究竟能否从尚未发现的财源吸收到金钱呢?肯定不能够。这样的计划只是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储蓄将按对国库比以前稍为不利的条件转变为可供使用的资金罢了。最后的这个论点,我认为是可以驳倒的,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每一张公债的票面额规定得很小——不超过一英镑——而且,不是设立少量的高额奖金,而是规定大量的小额奖金,使人们对家里的亲人或者工厂里的同事常常有中奖的事都习以为常,那么,我们就能开始从很多过去一直不愿把钱用作这种形式的投资的人们手里吸收到储金。当然,我们的有奖公债不能去和赛马、跑狗相竞争,不能着眼于吸引那些积习很深的赛场赌棍;但是,我们却可以很轻易地从那些希望碰点小运气而又不愿冒失去资金的风险的人们那里开辟出新的财源。反正,这些都是性质比较特殊的预测,谁都是在凭空猜度,只有时间才能表明究竟是我的朋友们看法正确,还是我的主张对。

上述的反对论点中，毕竟还是第一个比较有说服力。如果在公众当中，在教会里，特别是在那些为国民储蓄促进会服务的忠诚的男男女女当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储蓄证券或储蓄公债从道德上看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这些出自崇高的动机而在推广节约的人们的精神和传统的，那么，我们的确将处于危险中。很显然，从大小教堂里会施展出某种压力。我并不想自己欺骗自己，否认有些大主教和主教一定会采取反对态度；但是，要是碰运气的话，他们的责备也可能比较隐晦一点，表示的是遗憾多于愤怒。至于一些宗教界显要人物，特别是国教里的显要人物，他们自己一定晓得，最近他们在管理教会事务的过程中，又给自己增加了多么大笔的进款；他们的收入本来就来自地价剥削，来自把金边证券合法地转变为股票投资，以及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至于政府方面，我们在足球赛赌注里的股份相当大——这是为害更甚的赌博方式，因为失败的“投资人”将丧失全部赌本。通过高达几百万英镑的税收，财政部实际上早就成了这种赌博的隐名股东。这种收入，甚至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那样严峻的财政大臣，也认为可取而加以接受。

就这样，这个计划开始具体化了。3月26日，我收到麦金托什勋爵的信，说他准备支持我；因此，我给他写了一封如下的回信：

我原来就知道可以指望你作出明智的判断。既然你自己信服，你就一定能很快地说服国民储蓄促进会。而且我敢肯定，在回顾这件事情时，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地感到满意，因为有奖公债的购买人确实是在储蓄。足球赌注或者赛马赌注的所谓“投资人”，是在浪费本金。有奖公债的投资人则是在储蓄，因为他们和保利证券的投资人一样，只是暂时放弃使用这笔款项的权利。这两种投资人都由于克制自己花钱而获得报酬。不同的是：普通投资人是选择本金的利息作为报酬，而有奖公债的投资人则选择得奖机会作为报酬。

现在，我决定在公布预算时同时宣布发行公债。重要的是政府要坚定，不要企图用名义上的“自由票”躲到幕后去。我准备把公债作为一种具体建议来宣布，规定好具体的条件和日期，以便公众了解他们可以得到些什么，也使储蓄促进会知道要求他们支持的是什麼。为了避免发生大量提取现有储金的现象，我们规定一个个人持有公债的较小限额。最初的建议是预算里规定的二百五十英镑，但是，在辩论财政法案的过程中，我把它提高到五百英镑。每一万英镑公债额就设有一些免税的奖金名额，可以按月还本，但是，必须保持六个月才有资格获奖。奖金基金将包括四厘利息，公债一律免税。每一万英镑公债额中有二百三十七个免税奖金名额，其中奖金最高的是一千英镑，只有一个名额；最低奖金是二十五英镑，有二百个名额。未成年人不能购买有奖公债，但是父母有权代表他们的孩子购买。

36 麦金托什勋爵不顾有些人的批评，忠诚地、甚至十分热情地完成他所承担的任务。他提出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如果我们无法挽救每一个罪人，我们最低限度也应该保证罪人进行储蓄”。<sup>①</sup> 苏格兰储蓄促进会的领导人约翰·厄斯金爵士表示完全同意。在财政部里，功劳最大的应该算埃德蒙·康普顿。他外表沉默寡言——甚至有点孤僻——内心却藏着坚强的意志。他是这个计划的热心推动者；而且，我认为他的道德水平与麦金托什勋爵一样无可指摘，因为他是巴赫合唱团的团员。

对计划的反应不出我们的预料。坎特伯雷大主教评论说：

要运用一个人的道德判断，有很多比区别白色赌博与黑色赌博的细微差异更为重要的事情可做；而且，一个基督徒对赌博唯一最简单的信条就是根本不参加赌博。<sup>②</sup>

<sup>①</sup> 英语 save 一词兼含拯救、储蓄之义，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sup>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6月18日。

他所下的这个判断，虽然比较隐晦，语法上也不很通顺，却很令人泄气。不过，利物浦的罗马天主教会大主教在几天后却说，碰运气的办法只是在使用得过分时才是不好的。这样一来，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颠倒过来，克兰默的后继人<sup>①</sup>已经允许中间道路原则从坎特伯雷转到罗马去了。

4月18日进行预算辩论时，哈罗德·威尔逊突然发动一场虽然猛烈、但又带点风趣的攻击；这也许很自然，因为这看来是个好机会。他把我的演说描绘为“杂乱无章，心中无数，大部分离题万丈，而且在有一个问题上道德堕落的”。<sup>②</sup>关于有奖公债，他竟然说：

现在，英国的威力、自由和财力显然在依靠一种下流彩票的收入。……下一届大选时，他们将会用“忠实的查理总是愿意付钱”这样的口号来竞选。<sup>③</sup>

他认为，为了这样的目的而使用国家的权力和威信是严重违背宗教信条和道德原则的。几天以后，他在国内的另一次讲演里，调子喊得更高，除了攻击其他事情以外还说：“麦克米伦先生的灵感是得自霍雷肖·博顿利<sup>④</sup>的”。但是，当我们进入财政法案本身的辩论时，反对党的调门就低多了。无疑，工党的议员已经发现他们所指靠的好斗的公鸡并不象是想挑起一场剧烈的斗争。人们都在传说（因而我在答辩时也提到）：反对党关于反对这个条款的决定，是在一次只有五十五名议员出席的会议上作出的，其中同意投票反对有奖公债的，几乎不到半数。虽然威尔逊坚持说这个数字不准确，但是好象还是承认数字也错不了很多。

---

① 克兰默是1533—155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

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18日。

④ 霍雷肖·博顿利(1860—1933)，英国报刊编辑和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名盛一时，1922年，因滥用公款被判处劳役监禁五年，后贫困屈辱而死。——译者



6月18日在委员会讨论阶段,我禁不住想嘲笑一下威尔逊关于公债会引诱人们不顾后果地滥赌的夸大其词的说法。根据他自己的计算,每一英镑赌注,或者说每一英镑公债中,只有九点五便士真正在冒风险。

我实在无法想象仅仅由于购买有奖公债太多便会弄得家破人亡,衣衫褴褛,遗弃妻儿,或者会有什么“浪子行迹”那样的可怕景象降临到一个家庭。不会有一个现代的霍格思准备绘制一套名为“有奖公债储蓄人堕落记”那样的骇人漫画。<sup>①</sup>

由于有一些虽然诚心诚意,但是我认为误入迷途的热心人,其中也有一两个我们党的人,发表了感人的演说,所以辩论继续激烈进行,但是,最后还是慢慢冷落下去。到表决的时候,我们的建议以接近于我们正常的多数票获得通过。

有奖公债从11月1日起开始发行。到12月5日,我就有可能给麦金托什勋爵写这样的信了:

38 我刚接到报告说,有奖公债发行第一个月总共已经售出四千五百万英镑,所以,我急忙给你写信,祝贺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你预计第一个月数字还要稍高一点。但是我认为,在目前公众的注意力正集中于中东问题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应该算是很难得的成就。这预示着未来的情况一定也不错;而且我知道,你和储蓄促进会的全体人员,一定会因为第一个月的推销成绩而感到鼓舞。

事实证明公债很受公众的欢迎,而且有很多奖金显然又重新被用来购买公债。现在,对于这种公债能够给国库开辟新的财源,也没有人再怀疑了;按照正统的办法,肯定挖掘不到这种财源。数字也一直令人鼓舞,例如,在以后的七年里,年平均发行额达七千三百七十万英镑。

---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6月18日。

事情的结果也使人十分惊奇。1964年大选以后，对我的这项革命性的大胆创举根据财政上或道德上理由进行过批评的一些主要人物，现在从这种“下流彩票”里找到的唯一缺点竟然是：奖金太低，不足以吸引投资者。原先我定的最高奖金额是一千英镑，后来大家勉强同意只提高到五千英镑，到这时候，竟提高到二万五千英镑。温布尔顿的保守党议员西里尔·布莱克爵士，是这个计划最真诚最可敬的反对者之一，他在当初计划提出来时就发言反对，而且以后一直是光明正大的反对派。但是，在十年以后的一次辩论里，正是他出来指出：当时在任的工党内阁中有十三名大臣——包括财政大臣在内，另外还有九名不入阁的大臣和很多后座议员，都曾经在1956年投票反对过有奖公债。他形容这种情况是“圣灵降临节的三千人集体叛教以来最惊人的事件之一。”<sup>①</sup>不过，主要的，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叛教人，恐怕就是当时在任的首相了。只有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才会认为永远坚持己见是一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甚或可取的品质。

除了有奖公债以外，这部预算不是那种足以引起许多政治冲突的预算；可是，发表一个预算演说——特别是第一次作预算演说——却需要花费不少的精力。过去一般惯例要求预算演说必须阐明过去一年的经济情况和来年的前景，这样的演说往往就比较沉闷，要吸引听众实在不容易。议会内外的听众感兴趣的是税收的变动，而不是经济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论述，不管这种论述怎样深刻也没有用。因此，我一开始就指出：我一直认为预算日很象学校的开学典礼——是件有点令人厌烦的事，但是又必须忍受。

家长和老同学倒是喜欢开学典礼。两种场合很相象：倒霉的听众不得不端坐在那里听一篇冗长的演说，最后才能听到宣布哪些学生幸运地得奖。当然，这个类比并不完全确切，因为预算日更可能的是既发奖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66年1月31日。

又要增税,而且有的时候除了增税之外别无其他。①

实际上,这次税收的增加和减少差不多相等。在大量盈余之外又增加了一些余额,这是为了对付经济局势和给国内外的批评家们以良好的印象。尽管因为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太大,今年需要采取一些步骤来制止这种情况,但是我仍然认为,应该尽早地重新实行扩张主义的政策。我不得不承认,储备状况和贸易平衡都并不令人满意。但是,这幅多少有点暗淡的图景也有它另外的一面:1955年对普通男女来说,是一个高度繁荣的年头。人人都有职业;消费量大幅度增长;投资额也增加了;工业生产比上一年度提高了百分之五。但是,因为生产率只提高百分之二,而工资和薪金却增加了百分之八,所以物价开始上涨。劳力和原料感到不足。进口增加了,出口因为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减少了,因此,国际收支一直在亏损。教训很明显:

我们不能让经济像脱缰之马那样发展。那样的结果是职业比人还多,定货比工厂所能供应的要多,国内很容易取得利润,物价不断地上涨。②

这个主张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普通常识,连“进步的”经济学家也不反对。实际上,对我的措施主要的批评不是说它们太凶猛,而是太温和了。几乎所有的专家们都认为我的刹不是煞得太猛了,相反地是太松了。当时也没有人反驳我的一个总的看法,就是:管理经济必须有一套本领,温度可能人为地过分增高,也可能不适当地降低。管理经济的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节。这个原则是到后来才有人反对,给它起了个侮辱性的名字,叫“煞车一开动”;也只是到日后才出现那种主张可以不顾一切后果、不考虑任何影响拚命地追求经济增长的理论。现在,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17日。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实行这种新的办法，而且往往因为补救太晚而不得不采取一些剧烈的措施；如果能够及时行动，本来只要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措施就足够了。

1956年时，大家也同意继续执行巴特勒恢复使用的那种方法，就是以货币政策、首先是银行利率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当然，关于如何正确地运用这个工具，争论还是不少。但是，有两点是明确的：

第一，除了用高利率，仍然没有人能找出一种易于限制信贷的办法。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指定一个委员会来专门研究一下，就能找出办法来；我对此却并不乐观。第二，货币政策不能“单独起作用”，必须由当时的政府采取一些为公众舆论所理解和拥护的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措施与它配合起来，以抑制需求，才能收到效果。<sup>①</sup>

然后，我转而谈到公共债务：

国债的总额现在高达二百七十亿四千万英镑。委员会对下列数字一定会感到兴趣：1939年9月3日的国家债务总额约为八十四亿英镑；1914年8月4日是大约六亿四千五百万英镑。这些数字对比起来实在令人吃惊。<sup>②</sup>

但是，在最近四十年里，包括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内，很少国家在努力清偿国内外债务方面有我们这样光荣的纪录。如果说，备有偿付基金的付息长期贷款是一种负担的话，那么，那种缺乏偿付基金的短期债务则是经常使人十分担忧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坚持我所指出的一条教训：我们可能因为跑得太快而吃点苦头，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前进，我们便将输光。通货膨胀必须制止，因为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本身会起限制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象那样的紧缩通货的做法，如用一些会增加债务负担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或者会重新造成失业现象的方法来追求稳定，也是行不通的。“我们

<sup>①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17日。

大家都必须当扩张主义者，但是必须是真正的财富扩张主义者。”<sup>①</sup>

然后，我给下院念了麦考利一篇散文里的一个著名段落。作者描写十八世纪历次战争造成了似乎泛滥成灾的国债，而最后这笔国债负担的解决，不是靠减少它的绝对量，而是靠减少它的相对量，这就是说，不是靠偿付债务，而是靠大量地增加财富。这位散文家问道：“如果说我们回顾起来全是成就，而前景却只能是一片毁灭，这算什么逻辑呢？”这句话十分适合目前的形势；如果我们能够象我们的前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在谨慎和大胆之间掌握好适当的分寸，我们就能再度取得成功。

我的演说里有一段谈到难以准确地估计未来的情况，很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一门真正的科学能够使我们在这个变化无常的领域内得出比较肯定的看法。有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与其说象天文学，不如说象占卜学。林杜或老穆尔这样的名家，其可靠性无异于无名教授或某某博士。我并不赞同这种极端的说法；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即使真有这样一门科学，也不会是很精确的科学。未知数和变化实在太多了。另外，也有人对我说：我们有的统计数字本来是有用处的，但是因为出来太晚，也就失去作用了。打个比喻，我们往往是从去年的铁路时刻表里查今天的火车时刻。<sup>②</sup>

“去年的铁路时刻表”，这话的确打中了要害。

42 那些我们可以立即实行的措施，我8月份就在下院宣布了；接着又采取了另外一些步骤。我要求工厂和商号提供最详细的情况，当然，这会遇到一些困难，而且需要进行一些工作。我们开始改进和扩展财政部经济处和中央统计局的工作。现在，国家机关内外有许多机构协助提供情况，大大提高了经济形势估计的准确

<sup>①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17日。

性,可以据以预测经济气候。我们由于处于岛国地位,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特别敏感,所以,还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困难和风暴,但是,我们的经济预报工作的确有了一些改进。

在重新使用货币方法以前,用来恢复和维持稳定的主要工具,一直是所谓公共储蓄——这就是大量的预算盈余。所谓公共储蓄,实际上就是从公民或者法人手中取得的超过政府工作需要的多余的款项。这是克里普斯所依靠的而且也十分喜欢使用的工具。我编制的预算,虽然在“线上”部分也有四亿六千万英镑的盈余,其中包括由于税收变动而增加的一千五百万英镑;但是,我顶住要求再提高盈余数字的压力。我保证从政府开支中另外节省一亿英镑。但是,总的说来,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看来依靠各种形式的私人储蓄作为来源是更为可靠和更为理想的。公共储蓄究竟是强制性的储蓄,在正常时期里并不吸引人。它是战时的产物和战争的后果。

现在,有没有人——当然,俄国人除外——还在读狄更斯的小说呢?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记得“荒凉的房子”里的帕狄格尔夫人。这位仁慈的主妇自夸说:“我这个家庭可不喜欢玩乐……他们在我的引导下把全部零用钱用于认捐。各人根据自己的年龄,按照自己力所能及分别地捐助。”我们正应该这样:首先给人民以远比他们需要的为多的钱,然后再通过税收把它全拿回来。这真和剥豌豆一样,十分简单。<sup>①</sup>

因此,这部预算虽然主题是储蓄,但是还应该强调另一点,就是依靠自愿。对工业界,是鼓励他们把利润投入发展。对非受雇 43 人员是规定新的措施来吸引他们储蓄以备不再工作时之用。对于个人储蓄,则是改善大家熟知的制度,也就是用“旧刀开新刃”的方法来加以鼓励。金融界的批评家们曾经声言我必须减少银行存款和浮动债务(短期信贷)以减少货币的发行。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17日。

很好。让我们看看银行存款怎样变成国民储蓄吧！当国民储蓄增加，财政拨款自然就减少。这样，国民储蓄运动就是一种最有效又最有利的筹集资金的活动，它将证明是我们在反通货膨胀斗争中的一支强有力的同盟军。<sup>①</sup>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为筹集资金而储蓄”，“为增强国家财力而储蓄”，“为安全而储蓄”。但是，我们筹集资金不仅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也是为了发展其他国家，使他们和我们一道投入争取中立世界人心的斗争。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为自由而储蓄”，“为富强而储蓄”。

按照传统，辩论在4月18日和19日继续举行，4月23日结束。

我最后的一次发言，在结束时主要是回顾过去。在重述了我们存在的问题以后，我宣布说，照我的看法，尽管要制定和实施一个符合于现代情况的精确的方案并不容易，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我反对社会主义所采取的那种过于严格的管理方式。我也同样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我们不可能回复到一百年前的自由放任主义。我相信，托利党过去从来没有信奉过的主义，今天即使是自由党人也不会去信奉它。无论如何，我们最好还是把那些过时的教条束之高阁。我们必须在过分的自由与过分的限制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只能通过不断试验和摸索来找出中央政府实行什么程度的指导和管理最为正确。不过，概括地说，我认为

44 政府应该象一个战役里的司令官。他必须拟定一个大体的战略计划。……但是，如果他试图直接控制各师、旅、团、营，他就要吃败仗。议会双方必须共同行动，研讨出一个战略性的方针和政策；在我们方面，我们下决心研究的正是这样的方针政策。<sup>②</sup>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17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4月23日。

这样的研讨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从议会辩论的角度看,在这年的余下会期内,我们似乎不致于碰到新的麻烦了。但是,6月份又出现晴天霹雳,突然发生一场风暴。议会生活之所以紧张热烈,正是因为情况变化多端;同时,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也有可能使人迷失方向,甚至造成危险。这次风暴是因为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提出要购买特立尼达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和权利而引起的。它出价很高,达六千三百万英镑,约等于股票市场上价格的两倍。议会双方对这件事最初的反应都持否定态度;保守党的1922年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敦促政府行使权力禁止这项交易。

现在,我必须决定究竟是让这项买卖成交,还是根据外汇管制法案制止这项交易。从财政经济角度看,这项交易显然是有利的,后一个方针看来并不妥当。但是,报章上和党内都出现一片激愤的叫嚣。<sup>①</sup>

其后几天里终于把详细情况弄清楚,有可能对利害作出权衡了。凡是有关石油投资和石油贸易的事情,好象总是十分复杂的,这一件当然也不例外。

这家公司的年产量只有一百万吨,所以就原油产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另外负责提炼三百万吨原油,大部分是委内瑞拉的一家美国公司运来的。特立尼达石油公司在加拿大还拥有一块不大的油田的开采权,这与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名下在加拿大已有的投资量相比,小得多了;而且后两家公司只要有合适机会就可以很容易地再增加投资。这两个公司是特立尼达石油公司的仅有的两家承标人。特立尼达公司原来招标出售,并不包括勘探 45  
权;需要勘探的大部分是海底油田,已经委托给一家叫特立尼达北区公司的商号进行,而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各握有这家

---

<sup>①</sup> 1956年6月7日。



公司的三分之一股票,并且准备继续保持这些股份。

特立尼达石油公司招标出售,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可以取得在英国设有日益增多的零售油站的雷根特石油公司的一半股份——另外一半由德士古石油公司掌握着。但是,因为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原来已经是英国市场上主要的供应者,因此,对于这两家公司来说,除了造成一个垄断企业所产生的问题外,在作为竞争对手的一家企业里合伙,是很不方便,没有什么好处的。

特立尼达经济上得到的好处是很明显的。现有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有效地发挥它的设备能力,一家强大的美国公司将可能而且愿意尽快地这样做。另一方面,允许英国投资转归美国人控制,很不是滋味,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灾难性的做法。

我们需要把所有这些观点都加以考虑。我即使没有什么其他理由,至少在感情上不愿意放弃这笔财产。不过,这个石油公司也说不上有什么战略重要性。如果英国石油公司或壳牌石油公司愿意挺身而出承买,当然方便得多,至少在政治上比较好办。但是,不难看出,从这两家公司来考虑,这桩交易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会有严重的反对意见。因此,我请壳牌石油公司的戈德伯勋爵和英国石油公司的巴兹尔·杰克逊分别前来会商。不出我所料,他们两位都强烈主张允许出售。他们的理由似乎相当有说服力。联合王国零售业里的半数股份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有自己的机构;如果他们不得不进入那样一种合伙关系,将会造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至于在加拿大,他们即使获得特立尼达公司原来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开采权,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可言。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早已单独地和联合地在加拿大参加了规模大得多的发展工作;而且,如果它们想扩大它们的业务,也不难筹集到必需的资金。保护特立尼达当前和未来的利益,是我们的首要责任。经过与它的政府商量后,我相信,不论从联合王国

或者从这个殖民地的观点来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根据外汇管制法案行使我们的权力来否决这项交易。但是，由于这些论据还不足以驳倒有着更多方面理由的强烈的反对意见，所以，这场政治危机似乎不容易解决。

特立尼达事件正发展成一个重大的政治危机。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每日快报》、工党的《每日先驱报》和共产党的《工人日报》竟结成一个有点奇怪的联盟——全都反对政府。我被谴责为“出卖帝国”给美国佬。这时政府如何决定还没有宣布；但是，我准备向内阁建议，只要附有一定的条件，包括一些保护联合王国和英镑区的利益的条件和一些保护当地居民利益的条件，可以……予以批准。<sup>①</sup>

条件确实十分重要，而且必须有效。第一，为了保护英镑，我们要求在英镑区内的市场业务一定要按照英国政府认为满意的安排来进行。在特立尼达境内的生产和提炼业务必须由一个在特立尼达注册的公司来进行。我们还特别要求，我们和特立尼达政府必须获得一项满意的保证，就是必须尽经济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充分利用炼油能力，必须加快勘探，必须用先进的操作技术以最高的经济效率来开采特立尼达现有的石油资源。另外，还要求作出有关劳资关系的保证：给现有雇员以公平的待遇，增加本地人接受公司高级职务训练的机会。最后是，公司的工地和宿舍不得有种族歧视。

我安排布里奇斯和罗恩去会晤特立尼达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西蒙·沃斯，以便就主要条款取得明确的一致意见。

我当然急于知道这些条件（特别是关于将来在英镑区出售石油的英镑—美元支付问题和关于公司必须在特立尼达注册等条件）是否能 47  
为得克萨斯公司所接受；同时，我又想避免与得克萨斯进行任何谈判。不管怎么说，如果搞得不好，在政治上便很不利，因为批准这项交易

<sup>①</sup> 1956年6月12日。

将招致各种怨恨，而交易的本身却因为一两项条件没有达成协议而告吹。<sup>①</sup>

沃斯先生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都向财政部的代表口头保证将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当然还需要变成正式协议，而且这件事仍有待内阁的批准。经过一次详细的讨论，事成在即，所以，当天下午我在下院作了一个必要的声明，宣布了这件事。<sup>②</sup>我完全预料到反对党一定会援引适当的程序要求休会。这样，就将在下午七点进行辩论，十点表决。但是，因为我故意把声明弄得又冗长又含糊，而且答应就整个事情发表一个白皮书，所以，反对党就宁愿等待一下。这对我当然很合适，因为我认为公众舆论一旦了解了详细条款和它的全部含义，意见一定会开始改变。所以我十分希望推迟辩论，但是不要推迟决定。

我拒绝把行动推迟到辩论以后。我将在宣布这件事后立即正式批准成交。如果下院想指责我，他们尽可以这样做。盖茨克尔企图虚声恫吓一番，但是大家都清楚，事情正在开始“冷却”下去。<sup>③</sup>

一星期以后开始辩论时，气氛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很多工党议员，特别是那些真正关心殖民地居民福利的议员，已经开始改变主意。有一些保守党议员显然对白皮书所阐述的很有分量的论据很信服，而且受到新闻界态度转变的影响。前者避不到会；后者干脆到阿斯科特<sup>④</sup>看赛马去了。

与其他被过分渲染的议会事件常有的情况一样，临到真正进行辩论时，危机一下子又沉寂了。说实在的，唯一给这个事件壮点声色的就是威尔逊所作的极其漂亮的攻击。过去我听过他很多演

① 1956年6月14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6月14日。

③ 1956年6月14日。

④ 阿斯科特，英国传统赛马地点。——译者

说,而且在往后的年月里注定还得听不少,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欣赏过象这一次这样高超的表演艺术。警句隽语层出不穷,闪烁着机智的打趣话接连不断,不时又插进一段严肃的论辩。他当然不难借此嘲笑说托利党人在放弃自己的信条。有一点威尔逊强调得颇有效果。他抨击说,如果这项买卖成交,现有的股东将增加巨额不劳而获的资本利润。他又抓到一个机会来大谈他所谓的“横财王国”,说有人得了大笔偶然的不义之财,对国家却不作任何贡献。(幸运的是他还不知道我怎样急迫地催促我的顾问们赶紧在这方面订出税收办法来。)《年鉴》的一位作者对这个场面作了很中肯的总结:

这次辩论……呈现出有点可笑的奇怪景象: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党在议会里拚命高举在一个遥远的海岛里的大英帝国国旗(在他发言的一些段落里,还直接反对那些受欺压的岛民的利益);结果,却挫败在一个显然很容易叫自己的帝国主义分子听话的政府手里。……不过,威尔逊还是说了一句聪明的俏皮话,讽刺保守党是“枯萎的樱草花”;因此,这场辩论看来是值得的。<sup>①</sup>

开始辩论时,我的发言只限于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论据。其中有一点虽然可能很不受欢迎,我认为还是应该加以发挥的。公众和大部分的报章都冷静地对待事实,而且对政府的困难日益表示同情。但是也有很突出的例外。

对这件事反对最激烈的三家报纸《工人日报》、《每日先驱报》和《每日快报》结成了奇妙的联盟。

对我来说,如果去打听这个集团究竟有什么精神上联系,未免有点不太礼貌,……<sup>②</sup>

不过,《每日快报》上有一段小标题为“卑鄙,可耻”的文章,我 49

① 《1956年年鉴》,第30页。1957年伦敦。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6月20日。

认为应该提请人们注意。它写道：

象石油和水力这样的资源，是国家祖传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它免受外国的控制，是维持我们生存必不可少的行动。对此不采取保卫措施是不负责的。<sup>①</sup>

对此，我作了以下评论：

我很难设想有比这个主张对我们更为危险的学说了。我们海岛上的五千万人民，住在一个只有很少原料资源的国家里。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严格实行这样的学说，我们的情况将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石油方面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更需要反对这种狭隘的、排外主义的观点了。我们从过去惨痛的经验里懂得这一点，而且，外国的摩萨台们<sup>②</sup>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不想再在国内鼓励他们。<sup>③</sup>

这种仇外的孤立主义情绪或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常常影响一些大小国家。不管这种政策对别的国家为害程度如何，反正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我们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必须反击这种倾向，因为，可能经我们手丧失掉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保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殖民地事务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演说，结束了这一天的辩论。他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下院。表决时我们获得六十八票多数，比我们正常的票数高得多。这件使我在政府内外的同事和朋友们激动了两个多星期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我确实感到高兴。而且，它还有一段很有趣的尾声。威尔逊对不劳而获的资本所得和伦敦城里“投机活动”所作的讽刺，使我怎

<sup>①</sup> 《每日快报》，1956年6月15日。

<sup>②</sup> 摩萨台是1951—1953年伊朗首相。1951年4月，伊朗议会在人民压力下，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10月摩萨台政府下令接收英伊石油公司，1952年10月宣布与英国断绝邦交。——译者

<sup>③</sup> 《每日快报》，1956年6月15日。

么也忘不了。在此之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我的有奖公债所做的有点袒护性的批评,也是这样。我知道,教会当局由于他们的财务顾问本领高超,从特立尼达的转手交易中捞到的资本利润,不是几万 50 英镑,而是几十万英镑。在这一年的稍晚一个时候,我在伦敦一家公司的晚宴上遇见大主教。我很客气地向他提到他对我的有奖公债的责备,当时我只好默不作声地忍受着。可是,现在既然大主教阁下可以心满意足地回顾自己在特立尼达石油上从事的小小投机活动的成就,也许他会对有奖公债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了吧!

在提出预算时,我承担了一项执行起来十分乏味而且往往十分令人为难的任务。我一方面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一方面也因为我相信仍然有可能大量节约,所以4月间曾和首相商定:如果我放弃提高所得税的建议,我就有权要求各部大臣的合作,从政府开支中再削减一亿英镑。艾登早已同意了这一点,而且在几个星期的使人厌烦的争论中一直诚心地支持我。虽然在辩论预算的过程中,不少人怀疑这个做法是否能成功,但是,事后财政部还是立即开始对各部施加压力。我希望国防部最低限度能节约上述数字的一半。5月初,我给国防大臣沃尔特·蒙克顿送去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他是我的一位亲密的老朋友,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合作。在这个文件里,我详细开列了我认为可以削减的陆、海、空三军的具体开支以及国防部为三军负担的其他开支。不幸的是,按照当时国防部的组织情况,国防大臣的权力很有限。虽然他名义上是三军的首领和它们在内阁的代言人,可是他的权威却象中世纪的某些国王和皇帝那样,受到他手下强有力的诸侯公开而有力的挑战。一直到我任首相的后期,整个国防部的组织机构彻底改变以后,这个缺点才弥补过来。

在执行这个决定时,各部大臣和公众一样,对公共节约的原则比对实际进行节约更为热心。如果说他们在给别的部提出节约建

51 议时往往表现很积极，很有创造性，那么，对自己部门的节约就总是迟疑和抗拒的。到6月中旬，我终于能够向内阁报告我已经落实了七千六百万英镑，其中，三千六百五十万是从国防部开支里削减的，一千二百五十万是从原来已经商定的面包和牛奶补助里节省下来的。

看来，把数字让议会知道是聪明的做法。汇报时，我强调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数字，只是八周工作的结果。（当然我心里明白，最后一个季度是最难搞到钱的。）

下院似乎有些犹豫，不知道怎么对待才好。反对党有点失望，因为他们本来预料对“社会福利”项目会有一次广泛的进攻，结果我们削减的数字里却并没有这方面的（除了沿袭先例，对入学儿童的午餐津贴削减一个便士）。我们方面没有人出来发言，不过总的说来是满意的。<sup>①</sup>

7月3日，反对党提出举行信任投票的动议，其实还是原来的意见，并没有其他特殊的理由。

哈罗德·威尔逊用一篇很巧妙的、但是“党派政治”味道颇浓的演说揭开辩论的帷幕。这就使我可以相反地作一篇高姿态的、从国家利益着眼的、非党派的演说。（不过，我的演说词原来也就是照这个方向准备的，因为我早就猜中威尔逊一定会这样干的。）<sup>②</sup>

我采取这样的态度确实很得法，因为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工党议员对我的演说的大部分内容都点头表示同意。在演说过程中，不管怎样说我已经有可能宣布我们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业已增加了将近一亿英镑——虽然不如我们原先希望的数字那么大，但有了个开始。

到了年底，我又有可能宣布另外削减政府开支一千七百二十五万英镑。这笔钱大致刚好是国防和民用开支各半。这样的结果

---

① 1956年6月26日。

② 1956年7月3日。

不算坏了,离我们原来的目标只差七百万英镑。

当然,这种在当年的预算数字已经确定和公布以后还继续设法作进一步节约的做法,是很不成熟和不寻常的做法。只有当财政大臣就职时预估工作业已完成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样一种行政上的创举,绝不能代替一项经常的工作,就是不断地 52 根据当前情况和长远政策来审查政府的开支。不过,不断地对我的内阁同事们施加压力,并且经常向内阁报告我们努力的成果和挫折,是一个有益的做法。它除了使我们能够取得实际的节约成果以外,无疑还能促使各部大臣及其助手加强对本部门的监督,使他们下更大决心避免提出那种常常会破坏整个预算结构的补充预算。

这一年里,除了这些需要分心的事情以外,我们主要的精力仍然集中在恢复国内外的稳定上。因此,货币政策的所有工具以及其他一些能够限制经济过分扩张的措施,包括压缩信贷和限制赊购等,都需要继续使用和维持下去。资本发放委员会仍然存在,可以起一道关卡的作用。我们成功地加快各项工作来满足政府的需要,不仅发行国库券,而且提供一些实际的投资基金,结果,到4月底为止发行的长期有息债券达到二亿五千万英镑。

在这段时期里,还需要对交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加大压力,因此到夏末,我建议邀请他们到财政部来举行一次会议。英格兰银行行长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做法,因为,他认为应该由他来和这些机构的负责人打交道。因此我们订了个折衷方案。他首先和这些负责人会晤,然后我再会见他们。这次聚会如期在7月24日举行,结果十分成功。银行家毕竟也是人,一篇简短的恭维演说,再来点名牌葡萄酒,还是能搞出点奇迹来的。我不晓得我的后任人是否效法这个做法,反正我并不后悔开创这个先例。

到了年底,我们就看到一些成果了。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



状况都在改善，国际信用也在恢复。虽然在例行的伦敦市长官邸晚宴上，我不得不对银行家们说还谈不上情况缓和，但是我感到风向已经改变了。我给他们念了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的一句名言：“这仗可难打啊，先生们；不过，让我们看谁坚持得住吧！”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都是难打的仗，但是，这场仗虽然还没有打胜，毕竟眼前打得还不错。

在这样一种时期里，财政大臣最难做到的一点是，既要保持足够的乐观态度来给国外以良好的印象，对国内又要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的态度来鼓励各个阶层表现出忍让和克制。他必须对外是头“公牛”，对内却是只“狗熊”。

5月，在外国记者协会的一次午宴会上，我发表了一篇公牛式的讲话。很多外国观察家在估计我国的经济力量时照例总是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项目。一个是防务，其次是海外投资。根据我手头最近的数字，英国把它的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九投入防务，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所有国家投入防务的数字只有百分之五。换一句话说，我们的欧洲战友每负担一杆枪，我们就负担两杆枪。我们如果仿照欧洲人的做法，每年就可以节省七亿英镑。只要把这些资源的半数转为出口，我们的外汇平衡情况就改观了。如果其余的一半用来投资，那么，批评我们的投资率低于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就少多了。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就是：我们的海外军事开支经常保持在一亿六千万英镑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我们整个拖拉机工业、农业机械工业、全部飞机，外加威士忌和可可制成品的全部出口价值——“实际上全都花费在我们的国外军事开支上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海外净投资额每年在一亿五千万到一亿七千五百万英镑之间——“它与国民收入的比例，比较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要高得多”。我认为应该说这些事情——我的听众看来对这一点感到很惊奇——以便维护我们的荣誉和声名，也算对

得起我们花费的精力。

与此同时，一直悬着的驻德英军“维持费”问题正在尖锐起来，这还只是我后来整个政治生涯里连续好多年一直在进行的一场长期而毫无结果的争论的开端。在宣布我担任财政大臣的前几天，我曾经到巴黎去出席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次会议。当时，为了使欧洲从重新武装自己的计划所引起的一团混乱中解脱出来，以便保证我们有强大的共同防务组织，英国需要付出的代价之高，使我大吃一惊。<sup>①</sup>

我们（联合王国）在货币和国际收支两方面碰到的最头痛的事情，就是我们驻德军队未来的费用问题。德国人不但今年拒绝提供任何“维持费”，而且不愿意对联合防务力量提供与我们相等的费用。

昨天晚上我们在大使馆里讨论到很晚，决定由爱德华·博伊尔和塞尔温·劳埃德尽力做一下〔弗里茨·〕舍费尔先生和〔西奥多·〕布兰克先生的工作。我本人的想法则是：我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总理（阿登纳博士）身上。除了他以外，谁也不会作出慷慨的决定（或者说，什么决定也做不了）。<sup>②</sup>

到6月底，德国人还是迟迟不动。我们用德国货币支付的维持英国军队的费用共达六千四百万英镑。我们曾要求德国提供五千万英镑。德国政府开始时说他们一分钱也不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拿出三千四百万英镑，可是他们竟然以他们特有的无礼态度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以后再也不出钱了。尤其使人生气的是，路得维希·艾哈德博士——财政部长——竟公开地宣称：英镑应该贬值，而且快要贬值了。我虽然同意财政部发表一个坚决的声明否认这件事，但并不是很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格言：“事情只有当它被正式否认时才值得相信。”我后来和

①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569—570页。

② 1955年12月16日。

艾哈德博士十分熟悉，觉得他也不是没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他外表象个扮演亨利八世的演员。虽然他在阿登纳辞职以后担任国家总理时，成绩并不怎么好，但是，在他的本行里可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员。

55 当时，虽然这些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占去了我不少时间，文电极其频繁，但是，和以后一样，主要的问题还是工资和物价。当时这方面的形势，和后来我们司空见惯的情况完全相同。很快就看得出来，如果物价继续上升，就没有希望实行自愿限制工资的计划，更不用说冻结工资了。但是，因为最近的一轮增加工资还没有充分反映到零售价格上，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零售价格肯定会再有某些上涨。因此，我们很可能会又一次成为无可避免的物价螺旋形上升的受害者。负责国营工业部门的大臣们固然可以给有关的董事长施加压力，阻止他们向铁路和煤矿增加工资的要求屈服，但是，正当工业处于景气、大量需要劳力的时候，工业家们一般的态度会怎样呢？工会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向他们发出呼吁，希望也许能给态度虽然难以捉摸、但是还不致于不友好的工业界的两个方面都施加些影响。鉴于我和东北海岸有过长期联系，而且相信过去的痛苦会使这个地区的人民特别敏感，认为国家的经济力量如果虚弱将威胁到他们的持续繁荣，所以，我选择了纽卡斯尔市作为我的讲坛。5月25日我在那里向北方保守党俱乐部成员发表了一个讲话。

在回顾了总的形势和报告了迄今为止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后，我就直接进入本题——物价这个重大问题：

什么原因使物价上涨呢？啊，我晓得你们一定会说这是政府造成的。我倒希望事情真的那么简单。

当然，有的人会争论说，政府本来应该固定所有的物价。这些人说，这点他们办得到，或者用管制，或者用补助的办法。好吧！如果我

们用管制办法来固定物价，我们显然必须把工资、薪俸和利润全都固定下来。

这是一种可能实行的制度，但是，它确实和自由民主不相容。这既是资本家的末日，也是工会人士的末日。

然后我转而谈到关于物价也许可以用补助来压低的主张：

我们在食品上试用过这个办法。但是，当补助费每年达到将近五亿 56 英镑的时候，甚至一个社会党人的财政大臣也要喊停。

我认为应该结束这种补助。因为，很明显——不论是对食品、煤炭的补助，或者是对交通、煤气、电力的补助——如果我们允许提高工资和薪俸（而生产没有相应的增长），然后又企图用补助基本价格、免征税收等办法来强制压低由于增加工资而必然上涨的物价，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减少那威胁着我们出口的国内的过分需求，相反地，我们是在增加这种需求。

很明显，这些额外的货币既然已经投入社会，它就必须找个去路。如果某些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用补助的办法人为地压低，对其他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将相应地增加。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年里，即使取消了余下的食品补助，再把国营工业部门最近一轮增加工资考虑在内，物价上涨的指数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或三。我也相信，不论是由于气候不正常或者贸易条件发生不利变化而引起的物价波动，都不会对生活费用发生太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论企业内部的成本，或者政府所实行的措施，或者是国营工业部门所采取的行动，看来都不可能导致物价大幅度地上涨。造成大幅度上涨的唯一因素，可能是工业界集团内部的势力，外国人无从伤害我们，政府也无能为力，问题在于雇主和工会——在于工商企业里的管理机构和工人。我们已经处于物价稳定的时期，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完全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个稳定时期。

我并不是说不能有灵活性，不能作较小的调整。随着生产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这种工资变动是正当而合理的。但是，如果再来一轮我们已经实行过的普遍提高工资，就一定会带来灾难，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如果某一个特定部门单独地提高工资，这个部门的人将从中得到好处。可是，他们是无法单独提高工资的，只要有一个部门开始了，别的许多部门就一定跟上来。这样，除了货币愈来愈多，它能买到的东西却愈来愈少之外，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我的结论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首相和我希望与雇主和工会合作，共同制定一个只要我们认真执行就能给我们大家带来持久利益的政策。

来自工会领袖的初步反应，并不是持否定态度的。

所有的工会都快要举行代表大会，而所有的代表大会都将分别以不同的强硬态度，提出各种期限要求增加工资。但是，我希望政府领导能促使雇主拒绝这些要求。如果雇主能这样做，就没有人会比温和的工会“领袖”更为高兴的了。<sup>①</sup>

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管公开说了些什么，效果如何并不表现在他们提出什么样新的工资要求。关键是他们对这些要求坚持到什么程度。

这个月的月底，我在全英商会的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上重复了我在纽卡斯尔市讲话的主题，很受与会者的欢迎。

和往常一样，既出现令人气愤的错误，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例如，一次早已商定的煤炭提价，由于没有作充分的解释，看来竟成了曾经几个月协商的一系列工资要求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又如，下院对汽车业的一项麻烦的争端，不是平心静气地讨论解决。事情最初是因为英国汽车联合公司所属各厂解雇一批人员而引起的。争端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经理的实际决定错了，而是由于他不

---

<sup>①</sup> 1956年5月28日。

讲究谈判方法，或者说比较缺乏谈判技巧，所以，争端本来很有希望顺利地获得解决，结果却不然，7月23日星期一开始了罢工。幸亏这场罢工只限于英国汽车联合公司，没有扩及整个行业，而且有许多人仍然继续上班。劳工大臣向我保证说，他根据工会领导人 58 的私下劝告，不准备进行干预。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有一个妥善的办法来安置解雇的劳工。特别是，当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在开始减轻，换句话说，当我们使用的药剂正在起作用的时候，安置解雇劳工问题尤其重要。我高兴地获悉，被解雇的人员中有六分之五已经在别处找到职业；当争端到8月10日最后结束时，从经济观点看，我们确实得大于失。不过，很显然，我们必将面对劳工过剩的问题。7月底我向全国生产顾问委员会讲话时，特别强调指出：国家如果没有对劳工进行指导，就无法保证个人就业和避免过剩。我们肯定必须制订办法来减轻这种困难和改善一下条件，使人们能够变换他们的职业或者接受新的技术训练。这就是目前已经大大发展了的一种新制度的开端。

我们的努力一直继续到年底，总的说来，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8月29日，我在财政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进一步呼吁保持工资和物价的稳定。

我们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稿——而且我认为成果还不错。克莱·莱斯利下的功夫最大，我在细节上和语气上作些修改，财政部的小伙子们负责核对事实。我送了一份给[文森特·]图森爵士(职工大会书记)。他对我向代表大会(这时快要召开)发出这样明确的呼吁，感到相当吃惊。我又作了一点修改来迁就他的观点。图森是一个好人……<sup>①</sup>

代表大会开会时，代表们正式拒绝了我的呼吁。虽然如此，  
……根据他们的决议[的词句]和他们的发言来看，他们实际上是

---

<sup>①</sup> 1956年8月29日。

接受了我的论点。他们根本没有重新谈利润和股息问题。他们没有真正在攻击雇主。他们抨击政府放弃“计划化”。这实际上不过是在打笔仗，因为(除了建筑业以外)，我们普遍地实行了一种相当严格的一般计划控制，甚至是特定计划控制的制度：资本发放委员会(这意味着凡是贷款一万英镑以上必须得到这个委员会的批准)；赊购；进口执照；紧缩信贷以及其他等等。这事实上是一种虚假的攻击，是用来掩护工会领导人的一种烟幕。<sup>①</sup>

人们不难感觉到，这番关于计划化的议论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所以，我就故意利用一个机会谈起这个被工会放下了的问题。我是在9月19日给我的选区选民讲话时这样做的。如果说有什么人真的希望实现“彻底的计划经济”，那只是在骗人。没有人比盖茨克尔说得更明白了，他曾经指出，彻底的计划经济必须包括：

……“一个全国性的工资政策和一个劳工管制制度”。他写道：“只要不存在自由的集体谈判，而且工会只充当国家政策的工具，便不可避免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升”。

盖茨克尔往下在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段落里写道：

……在自由经济里，这种〔自由制度〕很容易导致一场国际收支的危机，而在彻底的计划经济里，就不会产生这种后果……。唯一的后果只是排长龙、黑市扩大和物价上涨。继之而起的不满，在极权独裁制度下可以置之不理，而在民主制度下却可能推翻一个政府。

我宣称，在如何控制和指导的具体方法上，我们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很小的。这些分歧几乎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否应该实行一种新的建筑管制制度，以及是否应该恢复和加强进口管制。

这些就是重大的问题。但是，照我的看法，这些并不是信仰问题。它们并不是那种值得人们为之去面对火刑柱的教义问题；首先，它们并

---

<sup>①</sup> 1956年9月3日。

不是劳工和资本家需要为它们而互相搏斗从而使整个国家走向毁灭的事情。

很多报纸又一次广泛地报道了我这段话，它们的社论也表示支持。

《每日先驱报》确实无法作答——只能批评我们“虚弱”。他们当然懂得，要驳倒这些论据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60

这一年里，我一直接着这样的方针不断加强宣传压力，维护我们的主张。虽然我的政策没有得到工会领袖们公开的赞同（这点我是不能期望的），但是，实际上在好几个月时间里，我们一直成功地维持住受到很多幼稚批评的所谓“稳定时期”，相应地缓和了我们的经济制度所受的压力。

---

<sup>①</sup> 1956年9月20日。



### 第三章 G字计划

61 为了使读者了解 1955 年底我就任财政大臣时欧洲统一运动的各种情况,有必要简短地回溯一下前几年的发展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一段时期里,世界的政治家面对的是一个纷乱分裂的欧洲。但是,欧洲在失望之余,通过欧洲运动,又出现一种新的希望。1948 年春,在丘吉尔崇高威信的号召下,在海牙成功地举行了一次有西欧所有国家的政治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出席的会议。作为会议的一项成果,经过一番商讨后,终于在英国政府表示某些反对意见的情况下,1948 年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一个名为欧洲委员会的欧洲团结组织。<sup>①</sup>它包括有两个机构,一个由欧洲各国的部长组成,另一个由它们的议会代表组成。造成这种席卷欧洲大陆的热潮的主要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如果说这种运动在英国尚未获得广泛的支持,那无疑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岛没有受到过实际进攻,缺乏这种惨痛经历之故。

欧洲广泛存在着这样一种决心,就是法国与德国曾被拖入的三次毁灭性战争——1870, 1914 和 1939 年——那种可怕的冲突,绝对不能再重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德冲突把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卷了进去,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人力物力损失,而且现在终于威胁到欧洲在世界上的传统的卓越地位。因此,62 热心争取欧洲统一的人的第一个动机,也许也是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希望最终结束条顿人与高卢人之间世世代代的仇视。虽然有着过去三代人的惨痛记忆,法兰西民族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年青人,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 7、8 章。

都决心“抛弃过去——把世界从死人的统治下挽救出来”。但是，仍然存在一种很自然的疑虑，甚至是害怕情绪，很多法国人，特别是老年人感到忧虑；这种心情对任何一个朝着欧洲统一走得太快的法国政府都是一种威胁。有很多人在一个侵略性的俄国所造成的现实危险与一个复活的德国所造成的未来危险之间长期犹豫不决。

向往欧洲统一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就是人们意识到，面对着人口多和资源潜力丰富的东西方巨人——俄国和美国，欧洲各国只有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团结一致和强大有力的统一体，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才有可能保持它们自己的独立，才有希望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施加旧日的那种影响。

在最初的几年里，欧洲统一运动，或者欧洲一体化运动，或者叫其他什么名称都可以，进展虽然慢，看来还是朝着实现这个雄心在稳步地前进。由于大不列颠要优先考虑帝国所承担的义务以及这个老大的国家与英联邦各国之间的相互义务，所以，欧洲的政治家们一般都承认英国具有它独特的地位。但是，人们也充满信心地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既使这些义务得到保障，又使英国能够充分参与欧洲正在发展的生活。

与此同时，这个运动的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有所谓联邦主义者——他们盼望的是成立一个类似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欧洲合众国，把所有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都组织在一种联邦民主制度下，选举出联邦机构，联邦的成员国将降低到联邦内附属国家的地位。这个运动的一些比较谨慎的拥护者则意识到，欧洲各国有其独立发展和分立的历史，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传统，有的国家实行共和制，有的却是君主制。因此，和美国的情况并不相同。美国是由同样操英语的各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出来，然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所以，这些人主张欧洲应该组成

“邦联”，而不是联邦。在这个邦联里，可以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设立一些享有超等权力的机构，以谋求共同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些机构要成为某一个特定领域，如经济的、军事的或甚至政治的领域内的超国家的组织机构，必须经各国一致同意，为了满足特定需要而把自己的主权转移给这个中央机构。如果欧洲是准备把西欧所有的国家都包括进去，而不想在西欧再出现一重分裂的话，这样做就更为必要；因为，有一些象瑞典这样的欧洲国家，坚决在防务方面奉行中立政策。因此，新欧洲的模式如果想成为包罗一切的，就必须灵活，而且首先必须是重实效的而不是理论性的。

当这些宪法性的讨论正在斯特拉斯堡和欧洲各国首都进行时，有一些迫切的需要必须满足，也有一些当前的危险必须应付。这就是，不论在经济或军事方面，饱受战争折磨和破坏的欧洲，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恢复。欧洲的经济需要通过马歇尔计划来恢复。现在有的批评家随便地忘记掉这段历史事实；但是，任何贬低美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受尽苦难的同伴，不仅是盟国而且包括前交战国中的同伴在内的巨大援助，都只能是一种极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个崇高的想法，需要建立一个机构，由此就创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sup>①</sup>同样地，为了对抗看来很有可能的苏联侵略，又匆忙地筹划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欧洲国家，而且美国和加拿大都对这个组织作了慷慨的贡献。的确，  
64 客观地说，正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财力独力使北大西洋联盟成为现实。

就这样，即使说不上什么实际冲突，至少初期就出现了两种态度。在经济合作方面，1950年5月舒曼提出了关于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范围包括工业生产的最重要部分。因为英国政府不愿意参加，所以参加这个联营的事实上只限于西欧中部的六个国家，外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117页。

围国家都不包括在内。这六国政府还试图按类似方式建立一个欧洲防务体系；但是因为这牵涉到西德的重新武装问题，所以进展不快。事实上，长期地、往往十分剧烈地争论“欧洲军”应该按什么原则来组成，用了将近三年时间。最后，一个经六国政府同意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方案，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拒绝。关于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德国军队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只是到了1954年年底才多亏艾登的外交努力而得到解决。<sup>①</sup>回忆起来也有点可笑：在这几年里，法国议会和人民一直由于害怕德国的再起和怀疑德国的动机而不愿意接受德国人作为军事盟友。只是因为英国在欧洲承担了繁重的军事义务，法国人才最终表示同意；也只是由于英国答应在欧洲保持驻军五十年，法国才被说服与德国作最后和解。

这样，当1955年春天我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时候，走向欧洲统一这一目标，就不是只有笔直而单纯的一条道路，而是有着好几条道路；它们有时候彼此平行，有时候则互相交错。这样一个合作单位是否应该扩大为北大西洋公约联盟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否应该代替欧洲理想？在另一个极端，问题则是：已经划分成东欧西欧、共产主义与自由的两个部分的欧洲，是不是还要再次划分成两部分，就是以西欧大陆的三个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为一方，而以英国所领导的其他西欧国家为另 65 一方呢？欧洲未来的经济是依靠其成员甚至比欧洲委员会更为广泛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呢，还是以现在正要发展成一个关税同盟并且命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实际只包括半个欧洲的半数国家的舒曼概念为基础呢？在防务方面，我们是应该依靠那个曾经作为说服法国人接受德国人参加进来的工具的西欧联盟呢，还是应该集中在除了西欧联盟的七个成员国外还包括美国人、加拿大人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第14章。

和其他国家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这些确实是牵涉很广而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丘吉尔虽然小心地避免使自己纠缠进细节里去，但是他始终主张英国由于情况不同，有必要作特殊的考虑。英国在语言、法律和传统上，都与美国有密切的联系，两次大战中英美进行过紧密的合作，因此两国是亲密的盟邦。英国曾经是一个现在已组成英联邦的联盟的首领。英联邦是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几个祖籍为英国的旧自治领为基础，现在又因为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加入而扩大了。对所有这些国家，英国不但在一般政策上，而且在贸易和商业上都有长期的了解。英国又是一个欧洲国家，是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现代历史里，它一直充分起着——一个欧洲强国的作用——有时候是勉强的，但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没有人详细地研究过怎样使这两方面的概念协调起来。的确，不论是在两大政党里，或者是在我们国内的人民中，对于任何可能与我们的其他纽带发生矛盾的参加进欧洲去的新方案，都有些犹疑却步。在丘吉尔的最后一届政府里，我曾经尽我的力量敦促我的同事们对欧洲统一事业起推动和带头的作用。<sup>①</sup>但是，虽然我得到一些朋友的支持——特别是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邓肯·桑兹——由于外交部坚决反对，财政部又很冷淡，所以丘吉尔不愿意强行决定这件事。此外，我们想改变工党政府原来关于不参加欧洲煤钢联营的决定，也已经为时过晚。在丘吉尔执政的最后几年，整个欧洲的局面是防  
66 务问题压倒一切。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及法国政府和人民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是不能有任何进展的。确实，要想对这个时期有一个了解，重要的是要体会到法国人是多么不信任德国——特别是对年迈的阿登纳逝世以后的德国不信任，尤其十分害怕重新出现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第7、8和14章。

一个德意志军事强国。

1955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毫不隐讳地谈到他的忧虑。安托万·皮奈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在国内事务上是个保守派，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却心胸宽阔，气度大方。我发现他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同行。他说话坦率，毫无保留，而且我觉得他总是态度公正，忠实可信。此外，我们还有一点共同的地方，我们两人都是“布尔乔亚”，<sup>①</sup>都与人合伙经营着中等规模的买卖。在他来访期间，我们在回顾了由于西欧联盟组成而产生的很多迫切问题，特别是详谈了萨尔问题以后，就一般地讨论了欧洲事务。皮奈表示他的观点说，欧洲防务集团之所以遭到法国拒绝，是因为它的超国家性质无法接受。但是，他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西方大国应该拿出行动来证明它们愿意继续争取欧洲统一，特别是愿意和德国合作。我欢迎他的这种表示，并强调指出维持欧洲一体化的势头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种原动力能使我们有希望把德国保留在欧洲大家庭里。但是，我们必须避免过于繁复、往往互相重叠的欧洲组织。我们两人都一致认为西欧联盟的第一项任务——除了它在防务方面更广泛的作用以外——就是主持萨尔问题的最后解决，作为法德和解的一个象征。而且，西欧联盟应该发展成一个道地的、有生气的组织，通过这个组织不但可以共同讨论和解决军事问题，而且可以讨论解决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也同意，这个组织在进行工作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密切合作是很重要的。象瑞士这样的国家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但是没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瑞典加入了欧洲委员会，也没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现象应该采取某种办法加以改变。欧洲应该是综合的，而不是排他的。

从这些谈话以及我和皮奈在别的时候进行的一些谈话中可以

---

<sup>①</sup> bourgeois, 资产阶级, 这里指做生意的商人。——译者

67 清楚地看出,法国面对着正在复兴的德国,想依靠英国的支持来保持欧洲的平衡。有一些较小的国家也争先恐后表示类似的不安心情。虽然我们总是明确表示我们的保留意见,但是我们支持把“邦联”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把德国也包括进去的主张,因为这样做对欧洲、而且实际上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当时德国的政策还是比较稳重的,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将来。在德国的政策和领导人发生任何改变之前,争取德国与我们欧洲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充分地联合,是比较妥善的。因此,6月9日,我向外交部全体人员宣布了我希望我的大臣级同事和全部人员遵循的总的态度:

我们需要做的……是研究我们应该怎样给欧洲委员会和西欧联盟的骨架装上更多的肌肉,或者更实际地说,就是应该怎样使各种各样欧洲组织互相配合,有成效地共同工作。这会产生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是,照我的看法,我们的目的肯定应该是支持任何能使欧洲按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原则走向统一的事物,这个原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与联邦概念相对立的邦联概念。

下院早在1955年初就同意我们接受邀请,与欧洲煤钢联营建立联系。这个组织经过有关六国的批准后终于在11月中旬成立。但是,这时有一个更为彻底——几乎是革命性的新方案正准备提出来。

6月10日,欧洲煤钢联营的六国在墨西哥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个历史性会议上,带头的是保罗·亨利·斯巴克领导下的比、荷、卢三国政府。法国和德国政府起先都有些犹豫;最后六国政府虽然有些勉强,还是一致同意在六国间建立一个“总共同市场”的目标,并且决定加紧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这粒小小的种子,后来终于长成一棵粗壮结实的树木。

68 虽然在墨西哥通过的这个决议注定要发展以舒曼计划的六个成员为基础建立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是,当时看来谁也没有预

料到后来会订立象最后商定的那样一个条约，至少对此是颇有疑问的。原来的墨西拿决议规定了四个目标，头三个是联合发展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联合生产和交换动力资源，以及制定一个发展原子能的联合计划，这个计划要考虑到成员国政府与第三国业已作出的安排。后来变得最重要的是第四个目标，当时的写法是：“分阶段地建立一个免除一切关税障碍、不受任何数量限制的欧洲共同市场。”<sup>①</sup>

荷兰的外交大臣约翰尼·比扬博士到伦敦来了一趟，在一系列由当时的财政大臣巴特勒主持的会议上解释墨西拿会议的目的和结果。接着，英国又被正式邀请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这件事在内阁会议上经过详细的讨论；我作为外交大臣受委托起草一封接受六国邀请的正式复函。在这封信里我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这个组织不要不必要地重复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工作或者忽视其他有关国家的观点。根据这样的谅解，我们愿意派出一名代表参加研究。我的信接下去说：

你们无疑一定理解：考虑任何关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建议，对我国来说，都会有特殊的困难。我们[女王陛下政府]将乐于在不事先承诺受会议决议约束的情况下，不抱成见地考虑这次研讨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而且将本着达成最有利于全部有关各方的决定的愿望来考虑这些问题。<sup>②</sup>

我们使用了“代表”这个字，是为了明确表示，代表我们出席会议的贸易部次官并不只是一名观察员。我们的愿望是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当然并不事先承诺受其他国家同意的决议的约束。我们挑选了贸易部的 R. F. 布雷瑟顿做代表。他才能出众，而

<sup>①</sup> 《外交研究月刊》，(保守党研究部编，1955年7月)第76期，第7页。

<sup>②</sup> 引自米里亚姆·坎普斯：《英国和欧洲共同体，1955—1963年》，第30页。1964年，伦敦。



且完全赞成他的政治首长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的“欧洲派”观点。

这时候，所有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愈来愈关心正在发展中的各个欧洲组织之间的关系。6月10日我和前来伦敦访问的法国总理居伊·摩勒长时间地讨论了

……斯特拉斯堡会议的计划。这一次又加上要举行西欧联盟的成员国会议。最重要的是不要使这个新组织与欧洲委员会发生摩擦。<sup>①</sup>

7月3日我在斯特拉斯堡讲的正是这个主题。我对这个在墨西哥会议以后成立的委员会表示欢迎，把它作为发展所有欧洲国家正在向往的更大的欧洲单位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法。至于已经同意建立的以比、荷、卢备忘录为基础的那样一个共同市场，在当时那个时期，在1956年最初几个月里，前景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比、卢、荷的备忘录规定共同市场是由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指导的组织紧密的共同体。法国人对这个计划的冷淡态度是众所周知的。艾哈德博士所代表的德国的工商业界，肯定地反对这个计划。虽然据悉阿登纳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对此颇感兴趣，可是他的经济顾问们却不仅怀疑，而且反对。英国内阁鉴于德国的犹豫和法国政府在议会中的软弱地位，而且自己还有不少麻烦事要处理，所以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是，我们本来显然应该对危险有更高的警惕，因为墨西哥委员会的会议是在保罗·亨利·斯巴克坚强有力的指导下举行的，他完全有可能用某种方法争取会议通过一个符合他的主张的报告。而且，我们曾经接到警告说，法国的态度在大选后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目前，法国的态度是犹豫或敌视的，但是，当大选安全地渡过以后，法国的政治家将会变得比较赞成共同市场这一主张。

快到年底，萨尔公民投票的结果出来了。<sup>②</sup> 三分之二的投票人

<sup>①</sup> 1955年6月10日。

<sup>②</sup>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563—566页。

都反对那个事实上是使萨尔脱离德国的所谓“法规”。虽然这对法国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

以惊人的镇静态度和高尚风格对待这个挫折。虽然法律地位回复到了阿登纳—孟戴斯·弗朗斯协议以前的原状,但是他们将同意:(1)霍夫曼辞职;(2)成立一个留守政府;(3)12月举行自由选举。(我希望)我们所害怕的很多事情不要发生。<sup>①</sup>

这种真正政治家的忍让态度使人放心多了。但是,也许这件事向我们表明了法德的和解比我们原先以为的要深得多。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中曾经是强烈的“欧洲派”的人,也意识到党内和全国支持自己的力量很薄弱。在内阁本身,包括艾登本人在内,考虑到我们还承担着其他的义务,许多人真心抱着怀疑态度。我知道巴特勒和他的财政部顾问们也有这种忧虑。快到10月底,我还听说有人甚至在议论应该退出会议,撤回我们派到在墨西拿建立的委员会工作的代表。我的一位老朋友哈里·克鲁克香克,是强烈反对对欧洲承担义务的;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向巴特勒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在9月23日给巴特勒写信说:

掌玺大臣[哈里·克鲁克香克]已经把他10月21日写给你的那封信抄送给我,在信内他认为我们被拖进欧洲关税同盟是危险的。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他对我们愈来愈深地卷入欧洲统一的活动可能 71 给我们与英联邦各国关系上造成的麻烦感到忧虑,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退出下周将继续进行的讨论,会给我们的欧洲外交政策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也应该仔细考虑。我相信你一定会在采取任何这类步骤之前进行必要的磋商。

同时,我高兴地注意到,目前,还没有人提议撤回我们的代表。尤其是,我们最近的情报暗示说,很可能我们要到明年法国大选以后才需要应付委员会的任何决定。这样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这个[委员会]正在准备的报告。

<sup>①</sup> 1955年10月24日。约翰尼斯·霍夫曼是萨尔区首席部长。

所幸的是，贸易大臣桑尼克罗夫特一直认真地支持和鼓励他的代表。但是，既然决心等下去，我就得担心。

12月底，我们运动的预言家里斯·威廉斯夫人给我写了一封预言式的警告信：

照我的看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欧洲领导权接过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对关税同盟骑墙太久。必须让大家根据一些明确的计划来修建新工厂——例如，原子电站，人们必须了解这些工厂将有多大容量的市场，应该订购多大能力的设备。如果只有狭小的国内市场，那么一般就不值得废弃旧的设备，因为，要是贸易额不大，美国机器就显得不经济。市场增大就需要降低关税，有一些现有的工厂将会吃亏，除非它们能过渡到新的技术设备，开展一些补充业务……。但是，在我看来，“靠海峡来保护”的心理状态已经太过时了。我们如果不加入欧洲，所冒的风险要比参加进去更大……。如果我们不在大门还敞开的时候就进去插一手加以制止，一个美国一直在推动建立的把英国排斥在外的共同市场……可能会意外迅速地建立起来。

72 我当外交大臣最后一项任务，几乎就是12月14日在巴黎的  
西欧联盟会议上为政府的态度作辩护：

比扬（荷兰）和斯巴克（比利时）带头对联合王国对待“墨西拿”或“六国”共同市场计划的政策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攻击。……①

有意思的是，不论德国人或法国人都根本没有说话。我只能回答说，我们的代表一直在积极参加墨西拿计划的讨论。我们仍然认为：我们之间是否能合作，将取决于任何只包括六国或更多国家的新组织与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来活动的其他欧洲国家之间是否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因此，当我1955年底离开外交部转到财政部的时候，局势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结果很值得怀疑，无法捉摸。我很清楚，不论是在政府里、保守党里、反对党里或者新闻界，英国

① 1955年12月14日。

人的意见是反对我们作为正式伙伴参加共同市场，特别是如果这个组织倾向于按内向而不是外向的原则来建立的话。但是，我十分害怕我们两头落空。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必须放弃优先考虑英联邦的做法。如果我们被排除在那个看来很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共同市场之外而得不到它的好处，我们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此外，虽然法国政府以表面的平静态度接受了他们在萨尔的挫折，可是在我任外交大臣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他们一直在强烈地抗议恢复德国军队。

一场关于德国“军队水平”的争吵开始在发展。我看，法国人正在愚蠢地行事。……德国人的军队愈多愈好，特别是因为法国军队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不管怎么说)已经到摩洛哥去了。<sup>①</sup>

看来，这件事情表明法国对一个复兴的德国所抱的疑虑和恐惧丝毫没有减轻。

现在我是财政大臣了。由于我认为我们不能坐待事态发展，<sup>73</sup>而应该准备好某种建设性的建议，所以我在1月23日给负责海外金融和类似问题的莱斯利·罗恩爵士送去一份如下的备忘录：

### 墨 西 拿

- 1) 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 2) 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过分消极。
- 3) 我想建议由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官员共同研究一下可供选择的方案。
- 4) 这些方案可以以下列组织为基础：
  - a)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 b)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5) 我应怎样安排这件事？

---

<sup>①</sup> 1955年11月28日。

我对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面临的危险局势感到不安，但是又很难决定怎么办。2月1日我把我的忧虑总结成一个提纲，送给财政部秘书长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其中提到了我和罗恩的谈话以及我们两人对我们正在采取愈来愈消极的立场共同感到的忧虑。官方的观点似乎很有把握地认定墨西拿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在1955年年底送给各国首都的信件里，我们已经事先明确声明我们不受决议的约束。虽然我们愿意参加研究一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十分担心这个共同市场将根据排他的、有限制的而不是广泛接纳的原则建立。我在西欧联盟中的同行们（我当时是外交大臣）都很不满意我的那封信，而我只能根据这样的理由来辩护，就是：英国经常被人责备说总是迟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所以这一次我们想从一开始就消除人们对我们的误解。虽然法国和德国存在着强大的力量能够制止通过墨西拿计划，但是，也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些与白厅的愿望相反的压力。例如，美国一定在大力活动来促成这个计划，理由不外是：既然美利坚合众国简直是建立“上帝之国”的神明计划的样板，那么，衰微的欧洲也可以依靠这种类似的政治结构恢复过来。主要依靠人民共和党的力量取得政权的摩勒，将会使法国国民议会加强对欧洲统一的支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光坐着等待事态朝最好的方向发展吗？如果我们这样做，对我们将十分危险；因为，墨西拿计划毕竟还是有实现的可能，果真如此，就意味着西欧实际上受德国的支配，被用来作为通过经济手段恢复德国力量的工具。这确实等于把我们打了两次大战来保卫的东西拱手奉送给德国人。当然，俄国和美国力量大大增长使一个复活的德国所带来的危险远不如从前那样可怕，而且，这一点也会影响法国的舆论。但是，我不愿意看到世界被划分为俄国、美国和我们不在其内的统一的欧洲三者各自的势力范围。

提出问题当然很容易，但是解决问题却很困难。这就是怎样

把我们作为英镑区和英联邦首领的地位与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协调起来。我感到我们应该努力拟定一个由我们充当促进者的计划，哪怕是很概略的计划也行。除了六国以外，毕竟还有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会欢迎有人来带头。为了进行这件事情，我建议组织一个有外交部、贸易部和财政部代表参加的小组，要求他们参照政府各部门的不同观点，提出一个实际可行而又能为大家接受的方案。布里奇斯积极地响应我的要求，一个阵容强大的小组迅速就建立起来并开始工作了。

艾登和新任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 1956 年 2 月访问美国回来后向我谈到，华盛顿对墨西拿方案的态度和他们原来对欧洲防务集团一样地热情。我们对防务问题的悲惨经过是了解的。美国人对这个新计划的一切困难同样是那样无知；他们对英联邦这一概念及其力量，如果不是怀着敌意的话，就是一无所知。杜勒斯 75 尤其是这样，他的自负超过他的才能。与此同时，美国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而且不好对付。加拿大政府表现出对欧洲建成一个内向的、自给自足的、高关税壁垒的集团所造成的危险要警觉得多。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显得好象只是在进行后卫战。我们必须提出某种会被认为是进攻行动的建议。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建议也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才提出。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快要开会了，所以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多少能够调和各种不同计划的政策。几天以后，2 月 25 日，首相告诉我说：斯巴克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英国可能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应该怎样答复呢？我劝告他说：

如果目前对这个问题详细列举理由作复，对我们并不利。我们自己正需要时间来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制定一些对欧洲人的吸引力不次于斯巴克先生的建议而对我们损害又较小的反建议。在斯巴克方面，他们实际上还远没有确定究竟打算做什么和可能做出什么来。

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只作简短的答复,并且让我月底在巴黎开会时和斯巴克讨论一下全面的形势。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曾经接到报告说,法国的行动在许多方面违背了它所承担的义务。我身为主席,有责任提出抗议;这件事实在为难。因此,我去拜望法国财政部长保罗·拉马迪埃。

他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老同学,既精明又非常固执。我的目的是抗议法国人无视他们对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所承担的义务的恶劣做法。他们违反规章,公开地背弃自己的承诺,发放出口补助和征收特殊进口税。他答应得很圆滑,但是我怀疑他们不一定会应我们的要求采取多少行动。<sup>①</sup>

2月28日,斯巴克这个可敬的老朋友在开会前来看我。他是76 欧洲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欧洲委员会全体大会的第一任主席。他虽然热心拥护欧洲统一的原则,但是在实行这个原则时往往温和忍让,而且通情达理。他是英国的好朋友,提起战时比利时政府流亡伦敦时英国给他的照顾,表示高兴和感激。斯巴克

十分友好,但是对欧洲的看法很悲观:法国一无是处,意大利正走在共产主义的边缘,德国则愈来愈带侵略性。联合王国难道不能出来带头吗?六国运动他虽然做了努力,还是会失败的,因为法国永远不想真正加入一个“共同市场”。这将完全重蹈欧洲防务集团的覆辙。<sup>②</sup>

斯巴克象往常那样强调说,因为他来自一个小国,所以总是努力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事情。我相信他的预言是坦率和出自真心的。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写成详细的报告,送给艾登和劳埃德。斯巴克最迫切的请求是要英国掌握主动。欧洲如果没有英国,未来只能是进一步分裂。共同市场是否能建立,他本来就有所怀疑;即使建成了,也将会出现不愉快的关系。

---

① 1956年2月27日。

② 1956年2月28日。

甚至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里，[法国人]也不遵守关于出口补助和进口税的规定；他不相信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会允许它参加一个共同市场。

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这是统一欧洲的最后机会。就他那方面说，他并不关心规章制度。

他当初建议成立共同市场时，本来就不相信法国人会接受；他心里明白，法国人后来接受是有保留的。他们永远不会执行共同市场的规定。因此，他愿意向你、我以及任何其他英国人呼吁，要英国在为时未晚时出来带头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sup>①</sup>

因为比利时置身于大国冲突之外，所以我认为他的建议特别可贵；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现在回忆一下当时他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未来所表示的怀疑态度，是颇有意义的。77

贸易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是一个最热心探索可行的解决办法的人。他曾经长期向他的同僚们宣传自己的观点。我担任财政大臣以前，财政部看来一直不愿意参与实际研究解决办法。现在桑尼克罗夫特可以指望得到财政部积极而热情的帮助了。

往后的那个月里，我们的部际委员会——到这时规模又扩大了——一直在辛勤地工作。由斯巴克主持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墨西哥各国的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是在4月间发表的。到5月底，六国外交部长正式讨论了这个报告，并且接受它作为起草两个协定的基础，一个是关于原子合作，一个是关于共同市场的。起草工作延续了夏秋两季。

这样，我们也更迫切地需要商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尤其是因为英联邦总理会议将在6月底举行，事情更显得必要。我不断向艾登详细地报告已经提出来的各种解决方案。关于这个新鲜的激动

---

<sup>①</sup> 1956年2月28日。



人心的课题，一共提出了九个方案。象常有的情况一样，最后采取的那个所谓 G 字计划，实际上就是上一年桑尼克罗夫特自己拟订的计划。不过，这个 G 字计划到 7 月底才完全拟成具体方案送政府讨论，因此，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我们只能把正在发展的形势通知一下各国总理。由于我们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他们当然也就只限于提出一些一般性意见。有的意见很片面，看来这也是难免的。例如，澳大利亚人希望

78 取消（或者减少到等于零）联合王国在澳大利亚的优惠权，但是又要保持——以及加强——他们在我们市场里的有利地位。我们进行了两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非常艰苦的谈判——根本没有结果。我认为罗伯特·孟席斯似乎颇感惭愧，但是麦克尤恩（乡村党）却很无情，面无表情。<sup>①</sup>

讨论进行中大多数代表愈来愈同情我们。另外一些人则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是依旧坚持他们的成见。

还有另外一些使人担心的事。例如，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就英国的农业作出任何使我们活动余地太小的长期保证。现在我们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欧洲的农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利益以及英国农业的合法需要。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困难重重的迷宫，几年以后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迷宫里觅路前进。

在 7 月 17 日至 19 日举行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会上，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即六国和欧洲其余国家在原子能发展上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合作问题。从讨论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有达成协议的真正愿望，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互相补充的计划也是可以拟订出来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是贸易自由化问题。在会议之前，各低关税国家

---

<sup>①</sup> 1956 年 7 月 13 日。约翰·麦克尤恩是澳大利亚贸易部长。

——比荷卢三国、挪威、瑞典、瑞士——曾经散发一个关于自动降低主要在欧洲内部销售的某些商品的关税的方案。但是他们明确地指出，在进一步降低数量限制或者同意实行原来所有参加国共同宣布的百分之九十货物自由化的措施以前，他们要求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作出某些明确的规定。要使这个立场与墨西哥的有限制的制度协调起来，实在不容易。

我作为理事会的主席，有责任举行一次晚宴招待各国代表。我认为应该提到我们的一些特殊困难：

我接任这个职务六个月以来，收到了很多建议。建议大都指出一件事即近年来商品一直没有涨价，也从来不曾有过配给，它是自由买卖的——而且供应情况良好。事实上，总存在着过剩。国内一直强烈要求<sup>79</sup>我拒绝自由化和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来限制进口，以解决我们当前的困难。这是所有批评我的人经常的话题——天天如此，一场辩论接着另一场辩论。这是所有反对派领袖以至我的某些政治同行的共同要求。很多所谓“进步舆论”、经济学家或者自封的经济学家，都在催促我这样做。这听起来挺容易。如果你们进口太多，就加强管制制度好啦。引诱我屈服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顶住了。相反地，我们决定提一个方向相反的建议——用接受百分之九十自由化来履行我们对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义务。

这个宣布受到热情的欢迎。因此，当秘书长建议设立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墨西哥集团和六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之间各种可能的合作形式时，意见马上就被接受了。

回到伦敦以后，我终于能够在7月20日向议会宣布说，我作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席，已经设法把我们的工作导向促进两部分国家、即墨西哥计划以内和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英国政府欢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进行那些研究工作，因为只有通过研究，我们才能找出一种最有效地进行合作的方法——原则上说，

各种方法都可供选择。这样，在我的同事们讨论决定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方案以及应该提什么样的方案作为我们的建议时，我们的立场至少算稳住了。到7月底，桑尼克罗夫特和我终于有可能散发一份由外交部、财政部、贸易部、农业部、英联邦事务部、殖民地事务部、海关与国产税务署和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共同拟定的文件。这个文件冗长而复杂，但是我们急于想把文件准备好以供讨论，以便我们能在9月间就可明确决定是否向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工作小组提出这个方案作为英国的建议。最后确定的文件，出发点是假定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共同市场或者关税同盟；因此，文件建议应该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由六国——作为一个单位——联合王国和我们希望会同意的其他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组成。挪威、瑞典、丹麦、瑞士和奥地利几乎肯定首先会包括在这些国家之内。

食品将排除在外。当然，要精确地规定所谓食品的范围颇为困难，但是，这可以作为谈判的内容之一。当时，实行全面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即使是在六国范围内，困难看来肯定也是很大，要协调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不同利益，可能性似乎很小，何况还有荷兰和一些水果和园艺品生产者提出的一些特殊要求。这种情况使我们抱有一个希望，就是：所有的欧洲国家，甚至是墨西哥计划各国，将同意把农业留下来作为长期讨论的事情。对于所有其他的货物，我们建议关税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比方说十年时间内，逐步予以取消，限额也将放弃，但可以规定一个但书条款：为了应付国际收支危机，允许有一定的限额。但是，即使是这种例外情况，也应该按照严格的条件来实行，而且不许规定保护性限额。我们和其他参加国将仍然保留对世界其他地区在进口和关税问题上现有的自由行动权，只受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约束。我们必须保留让英联邦货物自由进口的权利。我们赋予欧洲以外国家的关

税优惠将不受影响。

拥护这个方案——英国的计划——的人，都坚决主张说这样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区，对英国的工业最终是有利的。当然，我们也承认，要做到把食品排除在外，首先就有困难，我们恐怕需要给我们的一些欧洲朋友以帮助，特别是在生猪、火腿方面，也许还有水果。不过，这将在主要计划之外讨论的事情。

当这个文件分发给内阁成员时，贸易大臣和我附送了一个备忘录，敦促阁僚们接受这些建议。我们的理由是，英联邦的优惠制度正在逐渐过时了，对英国的工业好处已经不大。一个欧洲自由 81  
贸易区将创造一个在大小与资源上与美国相当的市场。这个方案将给我们一个重新占据欧洲商业领导地位的机会。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行动迅速，就有很大的可能取得普遍的同意。当然，在农业方面将会有困难和失望，但是，众所周知，六国之间也将有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并不是没有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会看到自由贸易区给欧洲增加额外的实力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需要作些让步，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使我们的方案站得住。当然，我们关于把食品排除在自由贸易区之外的建议，将会遭到批评。除了固有的一些困难以外，我们也不隐讳我们希望保持英联邦各国的利益，希望保持剩余下来的优惠制度。但是，在欧洲目前的混乱情况下，德国三心两意，俄国又在威胁着，我们希望我们的欧洲朋友将意识到英联邦的力量足以加强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

9月4日，斯巴克到伦敦来看我。

我们(还有一批官员)就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墨西拿计划以及英国参加进去(即我们所称的G字计划)的可能性问题举行了长时间会谈。这是一次很有益的讨论，但重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王陛下政府决定“我们究竟干不干”。论据都已经由双方的官员们在大批文件里阐明了，但是

重大决定还是要由我们大臣们来作出。<sup>①</sup>

这几年的情况回顾起来似乎很奇怪：本来我们的建议如果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显然对我们很有好处，这点现在很清楚了，但是当时大臣们却那样地怀疑。我们大家很自然地都注意过去的传统和斗争。我们很难预见到后来的十年变化如此迅速。当时英联邦和帝国构成一股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很强大的力量。大部分国家对德国的疑虑甚至比对俄国还深。而且，墨西拿集团同意签订一个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当时也似乎不大可能。法国政府很虚弱，它的人事不断地更换，对国民议会和全国的控制也时时易手。欧洲概念还不能吸引我国人民的想望。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个运动在我国还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英国工业界是意见分歧的；我们当时还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期，就是：比较缺乏竞争能力、效率较低的工业部门仍然认为通过外汇管制或其他管制方法来实现某种形式的保护制度是它们的一种慰藉。因此，要说服我的内阁同事们作出重大的决定，并不容易。

9月5日，内阁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举行了三小时会议，目的是在把G字计划最后提交内阁之前再讨论一遍。使我惊奇的是，几乎所有到会的大臣都对这件事情十分热心。

会议进行得很好。首先是讨论这个政策的优缺点，其次是研究它在英联邦和英国人民中是否能通得过。我对这批年轻大臣们的知识和热情印象很深。……但是，我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就是：要说服整个内阁是很困难的，在党内和人民中也要费很大力量才通得过。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在这样危险的水中嬉戏。我们只能或者呆在岸上，或者勇敢地跳进急流，竭力向对岸游去。<sup>②</sup>

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将于9月26日在华盛顿举行。因此，需

---

① 1956年9月4日。

② 1956年9月5日。

要在这个日子以前得出某些结论。虽然这时有其他的麻烦事情开始压到大臣们身上,而且文件也愈来愈多了,讨论时大家对情况还比较了解,意见也相当中肯。看来,年轻一点的大臣都比较肯定地表示赞成,年纪大的就怀疑或反对。会上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但是都同意由我就我们所建议的一般原则与我的英联邦各国同行们<sup>83</sup>进行商讨。

这次会议在9月的最后几天在华盛顿英国大使馆里举行。会前准备了一份文件,尽可能简明地提出英国内阁正在郑重讨论的计划。<sup>①</sup>

根据事前商定,由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尽量客观地说明这个计划。我接着对政治背景作了一些介绍。然后我们分发了一份备忘录,短时间地体会,好让他们研究这个文件。(当然,每一位财政部长在会前都已收到我的一封简单介绍这个文件的信件。)<sup>②</sup>

然后,我们又在细节上作了一些补充。联合王国将与作为一个单位的墨西拿六国以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中所有其他愿意加入的国家一齐参加自由贸易区,而且,我们希望这个贸易区将逐步把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包括进去。我们不应该期待它能包括任何参加国的附属领土,但是独立的自治领则相反,应该包括在内。不过这一点在我们得到人们对主要建议的反应以前,暂不肯定。我们已经通知了共同市场各国,说我们已经开始和我们自己的英联邦朋友协商。自由贸易区将无例外地包括一切商品——只有食品除外,其范围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确定把饲料、饮料和烟草包括在内。在贸易区内,关税——除了严格意义的财政关税——保护性限额和一切其他保护性措施,包括出口税、管制和出口补助,都将降低,并在一个大约十年的期间内分阶段地最终取消。自由贸易

<sup>①</sup> 见本书附录(一)。

<sup>②</sup> 1956年9月29日。

区的成员国将保留它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货物征收关税的行动自由，当然要受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约束。这实际上正是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的主要区别所在。这一条规定将充分保护英联邦各国的利益。墨西拿六国的互惠对自由贸易区的其他成员不得有歧  
84 视。换一句话说，关税降低的时间表应该普遍适用。我们将保留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英镑的权利。新成立的自由贸易区将按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现行规章行事，受这些规章的约束。这个计划并不妨碍更自由的世界贸易和国际收支，而应是有助于它的实现，并且应该在适当时候导致实现各国货币的普遍可兑性。应该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朝着降低世界贸易壁垒前进的一个步骤。自由贸易区的规模有限，以及它在欧洲以外的利益很大，这就保证它不致于发展成一个内向的地区性集团。

这个文件不长，在休会以后用一个小时或多一点时间由每一位部长提出询问。然后，我对讨论做了总结。

我认为部长和他们的顾问对计划的反应很好。但是，当消息不可避免地被报纸透露出去以后，当然会发生一些麻烦。<sup>①</sup>

这时候，即使是还在犹豫的墨西拿各国愿意签订一个明确的条约，也谈不上英国参加六国的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由于我们对英联邦的义务以及我们在海外的利益，我们不可能参加一个结合得很紧密、又有它的各种超国家机构的共同市场计划。争论和怀疑的地方只是我们究竟是否应该作出坚决的努力来说服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作为一个单位的六国，来共同建立这个欧洲自由贸易区。即使是这一做法，我的阁僚中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在进入可疑的危险地带。计划的拥护者也不能声称这个计划在各个政党内或全国已经获得普遍的支持。

---

<sup>①</sup> 1956年9月29日。

报章上当然马上出现了关于G字计划的消息和关于华盛顿会谈的报道。

星期天各报都用大字标题登载,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报纸大量报道了欧洲计划。整个说来,反应尚好,不过,不少报纸对计划的许多重要细节作了错误的介绍。唐宁街十号和财政部的人员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去纠正,而且说明我们在华盛顿的讨论只是探索性的,我们——作为政府来说——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说明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sup>①</sup>

我10月2日回到伦敦,当天便见了首相。当然,那时有许多其他的急事要解决。

主要是苏伊士和联合国,约旦和阿拉伯国家总的情况,另外一次纳赛尔政变的危险,以及俄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问题。<sup>②</sup>

艾登个人是同情我们的计划的,他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提醒我说,在内阁和在党内都将会有麻烦。很多年老的阁员是怀疑甚至反对的。但是,既然计划已经“泄露”出去,重要的是使人们对它有正确的了确。因此,

我说服首相让我(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来正确阐明整个欧洲计划。他马上同意了——但是我能够看出巴特勒并不喜欢。但是,(不管这个计划是正确还是错误,)总应该向国内和海外的公众作准确无误的介绍。<sup>③</sup>

第二天,10月3日上午,很快就知道我的同事们极大部分都赞成我们提出自己的计划——有些人比较热心,有的是随大溜。无论如何,我感到现在我们是过了河,回不了头啦。记者招待会如期召开了,而且进行得很顺利。我的下一步是给斯巴克写信,要他尽量努力在六国中使形势不要太固定,我对他的明智和谨慎是完全有信心的。我把在华盛顿与英联邦各国部长们会谈的结果和英国国内舆论的发展情况告诉了他。虽然内阁要等收到英联邦各国

<sup>①②③</sup> 1956年10月2日。



总理的进一步反应以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但是我对结果是抱有希望的。我的信接下去说：

86 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让你了解确切的情况。这都是些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作最后的考虑。另一方面，我没有忘记我们上次在伦敦的谈话，我真诚地希望，你在下星期和外交部长们会面时，能够尽量把事情说得灵活一点，以便一旦我们认为办得到的话，也许改而和关税同盟联合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在目前就把决定说死了，可能会给这件事造成一些困难。

有鉴于我们在欧洲运动中长期的联系，我敢肯定你一定愿意在当前这个时候给我以帮助。

这年的保守党年会在兰杜诺举行。这是一个令人喜爱的休养地，岸上有舒适的饭店，海上有一种美丽的水母在晒太阳。天气非常好——是一个真正的圣卢克的夏天。当然，代表们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纳赛尔的行动和恫吓所造成的中东危机上；但是他们对欧洲问题也有相当大的兴趣。看来，应该向代表们一般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创议，并且把目前阶段是否采取行动的各种利弊告诉他们。在10月12日的发言里我说：

我必须强调的是，政府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和英联邦各国讨论这个计划。我们将和工业界，包括雇主和雇员在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很快就决定是否开始和我们的欧洲朋友们讨论。

我不想向代表大会隐讳这个政策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也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的工业将不得不迎接竞争。但是工业必须有竞争力，否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欧洲以内或以外，它都将丧失出口市场。现代的工业生产要求有大规模的市场和大规模的经济单位。这是美国人取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我在结束发言时用党的长期传统来启发代表们，说明我们党

的哲学向来就是灵活的,甚至是实用主义的:

我们党从本杰明·迪斯雷利到约瑟夫·张伯伦,从来都不害怕新思想。当我们的对手还在以一种虔诚教徒的全部热忱死抱住陈旧的社会主义经典里的过时教条的时候,我们必须迈步从事一场新的紧张战斗。

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里,而必须为未来而生活。

六国的外交部长预定在10月20日开会。原来收到的报告暗示说谈判中发生过某种近似破裂的迹象;但是后来的消息又说,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得到妥协,不过还没有达成最后协议。据称德国人很不愿意接受法国人关于协调工资、特别是协调每周工作时数和加班费的建议。他们也反对有人提出的关于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垄断性条款。换句话说,他们深深地陷在六国一体化的政治要求与反对法国占上风的实际考虑两者的矛盾中。另一方面,法国人愈是临近决定时刻,就愈是关心争取一切可能的保障,力求使自己的加入关税同盟能成为一种无痛手术。

英国政府现在必须在议会重开以前作出明确的结论,因为那时议会一定要举行关于欧洲政策的辩论。国内舆论赞成这个计划的逐渐增多。英联邦各国虽然很自然地并不热心,但是整个说来也并不强烈反对。因此,桑尼克罗夫特和我要求内阁同事们同意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大家表示赞成。

在向下院报告我们准备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开始谈判时,我尽可能明确地说明英国所负的三重责任:

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海岛上,但是我们是那个伟大共同体的创始成员之一。我们都觉得与这个共同体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伙伴的财政经济力量,很大一部分依靠我们与英联邦内各个独立国或附属国的联系。但是,当然还有比这种经济上巨大的利益联系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深厚的感情联

系。①

88

第二，

我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属于欧洲，因此，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不能与欧洲分离。战后人们为加强这个旧世界的团结和统一而作的不断努力，使我们深受感动。②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

我们是那个把大西洋两岸新旧世界联结起来的伟大联盟的成员。因此，对我们发生影响的这三股力量，任何一股我们也永远不能忽视。③

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种行动方针，既能为我们岛国人民国内的根本利益服务，又使我们有可能起应起的作用，以加强欧洲，使其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又绝不能忽视加强我们同英联邦的联系。

威尔逊发表了一篇谨慎而客观的演说作答，整个辩论水平很高。对这次辩论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的儿子莫里斯在辩论中发表了他的处女演说。他在提到我时说：“我尊敬的朋友财政大臣先生，我并不十分高兴他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使议员们都欢笑起来。④

从总的态度可以看出，虽然下院双方都有很多疑虑，但是总的还是支持政府推行原来大体上规定了计划。不过，这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很现实，因为，下院觉得很难在同一时期里处理两个重大的问题，原来这时我们已经到达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中东危机的高潮，这场危机困扰我们达五个多月之久了。

---

①②③④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11月26日。

## 第四章 英美的分裂

89

1955年4月至12月我在外交部的短短任期内，中东的形势便已经使人忧虑，而且不时传来险恶信号，但是，还没有发展成危机。这一年我们严格地履行了我们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开始撤出运河区，把军事工程人员调离，只留下文职技术人员管理运河。虽然撤退的最后阶段到1956年6月才完成，但是我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接近于零。我们着手在苏丹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埃及虽然同意得比较勉强，但是和我们没有发生什么无法解决的争议。我们放松了英镑进入埃及的控制，对此作了慷慨的安排，而且同意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还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对以色列的封锁以及他进攻以色列领土的威胁了。1955年5月，以色列总理莫谢·沙勒特要求美国给以色列的边界提供切实的保证，杜勒斯却加以拒绝，说是以色列的边界还没有得到它的邻国同意，所以不能提供保证。这样的决定虽然好象很合逻辑，但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要是以色列与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真能达成一项总的协议的话，美国的保证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同时，我们曾经全力支持过杜勒斯精心拟定的一个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的计划<sup>①</sup>，既然那个计划已经落空了，就很难拒绝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论点，就是：如果需要等到边界达成最后协议才能提供保证，事实上就等于让纳赛尔享有否决权。

1955年的整个夏天，在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纳赛尔的宣传活动和颠覆阴谋都逐渐造成愈来愈大的不安全感。俄国人的 90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631页。

外交活动突然进入这个他们以前没有插手的地区，成了一种新的因素。俄国人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大量地供应武器，也严重地背离了他们原先的政策，并且相应地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如果我们作为回答也把以色列武装起来，我们就会完全失去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如果我们拒绝武装以色列，又可能会迫使以色列人不得不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虽然如此，而且尽管纳赛尔对我们的所有的和解行动反应都很冷淡，不管正确与否，艾登和我都同意了杜勒斯的意见，答应帮助埃及实现它改善尼罗河谷灌溉系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原有的水坝以南数英里的阿斯旺新建一道横跨尼罗河的水坝来发展水力发电事业。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厂商已经联合组成一个国际公司来承包这项工程。三国政府都愿意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美国政府也同意资助；而且，鉴于需要的款项数量巨大，决定由世界银行参加进来起主要作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到1955年年底，实际上已经和埃及人达成了谅解。当然，由于世界银行使用的是各国信托给它的款项，所以需要埃及提供一定的保证，这也只是一些合理的和通常的条件。水坝建设必须优先于其他工程；合同必须是招标承包；必须实行世界银行贷款制度中历来就有的通常程度的监督。1955年底，我感到签订一项协议已经大有希望，尽管可能还会有一段长时间的麻烦的争论。

1956年开门不利，约旦发生了一场显然是由埃及煽动的骚乱。不过，看来这一局也没有完全输掉。

年青的约旦国王颇为镇定，干得不错。他与沙特阿拉伯人的宿怨现在出现了新的形势（沙特阿拉伯人有了……石油收入和埃及野心的支持，力量加强了）。他们利用巨额的收入……试图在中东收买所有的领导人物和主要报纸。他们还花费大量金钱在约旦和其他地方组织叛乱。经过使人焦虑的几天以后，阿拉伯军团（在格拉布·巴沙的指挥下）似乎已经在安曼和其他地方恢复了秩序。我们从别的基地调了一些援军到

安曼,并且派了一个伞兵旅到塞浦路斯,准备必要时开往约旦。①

我告诉艾登说,根据我的看法,我们应该设法在伊拉克政府的协助下鼓励叙利亚抵抗它所受到的埃及的压力。因为这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显,纳赛尔是不会和西方国家共事的,他不愿意和我们合作维护和平事业。他的目的显然在夺取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根本不想解决与以色列的争端。相反地,他的电台广播和贿赂活动,目的是把以色列这个独立国家完全消灭掉。

2月初,艾登和塞尔温·劳埃德访问了华盛顿。杜勒斯那个使别人遭殃的边缘政策,它那最使我们烦恼的试验之一就是他对巴格达条约的态度。他曾经使用一切可能的压力,要我们成为这个条约的成员,并提供积极的支持;但是他自己却在1955年整整一年长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地拒绝让美国也充当成员国。②这个决定把全部重担压到我们肩上。美国人急于要我们说服约旦参加这个条约,以解脱当时条约成员国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孤立处境。其实,只要美国毅然改变方针,参加进来,就会大大增强人们对这个条约的信心。所以,我特别希望从艾登那里知道一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看来,杜勒斯仍然在犹豫,有意回避。

在巴格达条约问题上,美国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愿意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多方支持我们,但“不作为成员国”(至少在大选以前是这样)。他们将向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土耳其等成员国提供各种援助。他们将向我们购买更多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送给伊拉克。③

艾登对这次和美国进行的范围很广的会谈,似乎大体感到满

---

① 1956年1月12日。

②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631—55页某些段落。

③ 1956年2月9日。

意<sup>①</sup>。他告诉我说：

他发现总统身体很好，而且和往常一样，态度十分友好。他们俩人[艾登和杜勒斯]都给我发来很多电报。<sup>②</sup>

92 但是，就和很多这一类的会谈一样，实际结果很少。

3月1日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侯赛因国王在纳赛尔的影响下，也许也受到他叔父的影响和得到沙特国王的支持，竟然任性采取了个刚愎自用的行动，免除了格拉布·巴沙的职务。虽然英国给了约旦大量的财政援助，但是人民仍不断起来反对国王，在当时和以后，他都是依靠巧妙地把灵活性和坚决性结合起来，才保持住对国内的控制。有时他被迫屈服于风暴。他这次事先没有通知，又没有正当的理由的行动，恰巧是在塞尔温·劳埃德访问纳赛尔的时候采取的，肯定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纳赛尔当然当着劳埃德的面炫耀这张王牌。创建了约旦军队的英国人约翰·格拉布爵士是位传奇式人物，免除他的职务，对英国威信的攻击相当严重。国王私下作了保证，说这次“政变”目的并不是想断绝大不列颠与约旦的关系，并且承认他也十分担心两国关系如果长期不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在格拉布离开以后，英国军官再相继被解职，就必然会使阿拉伯军团瓦解，或者使它的方向改变。这时，我们没有什么实际可行的反击办法，因此，我支持艾登的意见，拒绝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撤回对约旦的财政援助，俄国人就完全可能插手进去。果然，过不了几个月，在纳赛尔强占运河的前夕，苏联政府就向约旦建议无偿供应武器。对中东有长期经验、担任过我们驻约旦大使的亚历克·柯克布赖德爵士告诉我说，他

敢肯定，如果我们放弃约旦，它就一定会落入沙特或者埃及的手

---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兜了一圈》，1960年伦敦，第328页以后各页。

② 1956年2月9日。

中，或者由它们两家共同控制；这种状况将很容易导致伊拉克的哈希米政权的崩溃。<sup>①</sup>

这时候，以色列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是能够存在下去的，而且，一旦被迫进行预防性战争，自信也能取胜。伊拉克和约旦的政府也不愿不顾国内外的压力，主动发起什么进攻。我从首相平常的谈话里得出的印象是，他担心更多的是华盛顿的长期举棋不定。93 看来，美国是不会提出明确的政策，也不会答应作什么支持的。当局势日益令人担忧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包括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都向我建议说，我们应该和以色列缔结一项明确的条约，使我们由于退出运河区而受到威胁的与约旦及伊拉克的交通线能得到保障。这样一个建议，相信特拉维夫是会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美国恐怕不会支持我们，如果美国不支持，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就不好办了。与此同时，开罗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坏。

关于纳赛尔的情况，我们收到一些相当使人吃惊的消息。看来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阿拉伯共和国联盟（君主政权都得完蛋），除了小亚细亚的阿拉伯各国以外，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都要包括进去。这样一个联盟，力量将相当强大，特别是如果各国的石油收入集中起来的话，它的财政力量就十分雄厚。埃及在这个联盟中将拥有某种类似霸主的地位。这个联盟一搞成，为了取得威信，6月间埃及就要进攻以色列（即英国根据条约撤走最后一批军队之后）。他们将夺取以色列的一部分领土（比尔沙巴地区），等联合国一呼吁停火，他们就答应。但是，他们不会准备撤退，而[打算]坚持占领，以此来在阿拉伯人中博取巨大的声望。<sup>②</sup>

我们从各种可靠来源获悉的这个相当顺理成章的计划，征诸后来发生的事件，确实值得在此重提一下。

---

① 1956年3月8日。

② 1956年3月16日。



阿斯旺水坝的谈判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我却开始怀疑起来。俄国人显然逐渐插手进来。利比亚现在也要求给它修一座电站,用的是通常含蓄的威胁口吻:

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修建一座电站,俄国人将给他们造。这将是约旦的翻版——给了大量的援助,结果却一无所得。<sup>①</sup>

94 我因为现在是财政大臣了,对于这样大笔的开支,当然比担任外交大臣时迟疑得多。不过,除了这方面的考虑以外,我这时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预示着俄国人准备干预那个更为重大的水坝问题。

华盛顿和我们的关系仍然有点模棱两可。我听到的消息说,杜勒斯正处于最犹豫不决的状态中。我们的做法是继续敦促他们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对抗埃及日益严重的敌对行为。显然,这就需要加强对巴格达条约的支持,设法使伊拉克和约旦的关系密切一些,也许,还需要美国施加影响,使沙特阿拉伯能疏远埃及。沙特阿拉伯的当权人物,对纳赛尔与共产主义调情,本来就有怀疑和不满。实行上述的英美共同政策,还需要设法使叙利亚有一个对我们比较友好的政府,并且给利比亚以更多的支持,同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作出真正的努力来反击埃及在波斯湾和苏丹的颠覆活动。除了我们对埃及施加各种可能的压力以外,英美如果能够象战时那样进行合作就一定不会产生决定性的效果;可惜的是,这种合作迟至1957年才恢复起来。我们的政府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和私下谈话,提出过很多建议,美国的反应尽管友好,却始终犹疑不决。这种情况反映了杜勒斯本人的动摇不定的奇怪性格,也说明总统是选择比较放任的办法来驾驭杜勒斯的。在国务院的暧昧不明的态度和白宫的腼腆的沉默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政策。

---

<sup>①</sup> 1956年3月21日。

他们并没有拒绝我们的建议，可是却把这些建议淹没在毫无结果的冗长讨论的汪洋大海里。艾登感到杜勒斯实在不好对付，所以转而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呼吁。但是这种战术，就象丘吉尔所发现的，在目前条件下是既不受欢迎，也难以收效的。在丘吉尔领导他的最后一届政府时，就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总统只是出于对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的尊敬，才默许使用这种私人通信的方法。现在对待艾登，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凑巧，好象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

显然，总统确实犯了一次失言的错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并没有收到首相的来信。（似乎白宫把这信给丢了！）然后他说了一段关于美国如何干预埃及争端的话，内容和杜勒斯要他说的刚好相反。……他经常主持这样的记者招待会（这种会比我们议会里的质询糟糕多了，因为你事先不知道究竟要问你一些什么问题），说上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往往是前后矛盾的），然后就离开，度假去了。美国有些刻薄一点的评论家估计他每年的高尔夫球假日大约有一百五十天左右！<sup>①</sup>

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前来进行人们等待已久的访问。邀请是1955年在日内瓦会议时发出的，那时俄国领导人显然很盼望进行这样一次新的旅行。诚然，赫鲁晓夫最近发表的一些猛烈攻击“殖民主义强国”的演说，作为这次访问的前奏，的确不很美妙。不过，艾登正确地认定，多多少少地进行一些形式上的辱骂，是共产主义传统讲演术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段事情作了很详尽、但是还比较克制的叙述。<sup>②</sup>

不管怎么说，俄国人在原则上还是同意我们的意见，呼吁有关国家避免加剧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并且答应支持联合国为了和

① 1956年4月10日日记。

② 阿翁伯爵前书，第354页。

平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争端而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些都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直截了当地作了一番有趣的评论：

他们（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怀着毫不掩饰的自信心到达这里，明目张胆地对我们说，尽管世界上其他地区不会发生什么冲突，他们将想方设法在中东给我们制造麻烦。他们确实就象他们所说的那么办了。<sup>①</sup>

因为我主持的新部门除了英俄贸易会谈外，和这次访问的关系不多，所以我除了出席一些正式场面之外，很少参加其他接待活动。俄国领导人是4月18日到达的，一共逗留了一个星期。在他们真正到来之前，有过许多使人担心的事情。

96 我们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的来访[作准备]，渡过一个相当不安的星期。首先是，外交部公布了……详至每天每一小时的活动日程。这可是给那些想当刺客的人送了好礼物！其次，公众愈来愈心烦意乱，特别对他们将访问女王感到不满。第三，内阁里有些人不喜欢这次访问。……首相一直非常冷静和明智。<sup>②</sup>

预算日的第二天，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到达了。——这件事，加上格莱斯·凯莉与摩纳哥王子的婚事，压倒了预算。在俄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午宴——灯光耀眼（英国电视公司进行实况广播，俄国人拍摄彩色电影）。有鱼子酱，伏特加，以及那些烈性俄国酒。但是，意料不到的是赫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即席演说。首相认为，也许有可能和他们做点交易——不是关于欧洲或德国（这方面没有什么希望），而是关于中东。<sup>③</sup>

艾登的确很坦率。他明确告诉俄国人说，中东的石油是英国

---

① 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内层圈子》，第262页。1959年，伦敦。

② 1956年4月14日。

③ 1956年4月19日。

生命攸关的利益，必要时我们将为我们的权利而战斗。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明智，反正这话好象给了客人以深刻的印象。艾登正确地认为，秋天发生麻烦的时候，俄国人开始的行动还是比较谨慎的，甚而是比较克制的。只是当英国与美国在政策上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分歧时，俄国人才参加逐鹿。参加会谈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赫鲁晓夫公开地蔑视无核国家。一当美国和英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俄国人就重视起来了。

有一件可笑的事情特别引起公众的兴趣。

在工党执行委员会在下院为他们举行的宴会上，他们和工党领袖们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的工党朋友们问起目前在俄国及其卫星国监狱里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命运，得到的是非常暧昧的回答。<sup>①</sup>

我必须说，我的同情是在工党提抗议的人一边的。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也许有点好处，可以使他们对共产主义观点比他们经常自己设想的景象稍为现实一点。在这期间，英国公众

非常难得地沉默寡言和谨慎行事。俄国人的参观活动减少了，以便腾出更多时间来和我们的的大臣们进行严肃的会谈。英国人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民族。有人告诉我赫鲁晓夫一次演说的情况：当他在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问题时，一部分听众是很注意地听的。可是，当他一开始讲带氢弹头的火箭时，听众就不耐烦了。那时候……他们就厌烦了！<sup>②</sup>

访问结束前，“布和赫由詹姆斯·斯图尔特（苏格兰事务部国务大臣）陪同到苏格兰去了一趟——这是一个奇怪的搭档”。<sup>③</sup>

根据1954年的条约，英国的最后一批部队在6月14日撤离苏伊士运河基地。埃及的报纸和讲演人对英国撤退的评论，总的说来态度比较和解。纳赛尔甚至对英国光荣地履行了它的义务表

<sup>①②</sup> 1956年4月25日。

<sup>③</sup> 1956年4月26日。

示感谢。6、7 两个月里，一直就埃及接受援建阿斯旺水坝的条件，进行着令人厌烦的讨价还价。纳赛尔决心不让任何财政援助，包括对水坝建设的援助，阻碍他实现他的野心计划。他也不肯同意对中东的军备作任何控制。但是，当艾登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对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有一个明确无疑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既不应该意气用事地放弃[水坝]工程，也不能在这问题上落人圈套。我们和美国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并且坦率而公开地申明这个立场。<sup>①</sup>

这几个月内，我们从中东各个地区收到大量证据，说明埃及的代理人在进行活动，埃及的宣传正竭力在搞颠覆。在埃及人继续催促西方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却夜以继日地播发敌视西方的言论。

98 这年夏天，我们和美國人对达成水坝工程协议的可能性都愈来愈怀疑——甚至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但是，当我们听说7月19日杜勒斯粗卤地告诉埃及大使艾哈迈德·侯赛因说美国已经决定撤回对水坝计划的支持时，实在感到震惊。据说，当时的场面完全违背外交礼节。在一次长时间的会晤中，这位大使面红耳赤地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请你不必说你们打算撤回原来的建议了，俄国人资助我们建设水坝的建议就在我这口袋里哩！”听说杜勒斯被惹火了，当场就回答说：“好吧！你们既然已经有钱，就用不着我们的钱了！我们现在就撤回建议！”<sup>②</sup>无论有关这出曲折的戏的最后一场的描述是否精确，反正美国人显然已对埃及人的两面作风和傲慢态度愈来愈感到失望了。一系列这类事件早就引起杜勒斯及其同事的反感。4月间，纳赛尔接见一家纽约报纸的记者时

---

① 1956年7月5日。

② 赫尔曼·芬纳：《苏伊士危机中的杜勒斯》，1964年伦敦英文版，第48页。

宣称,他已经接到苏联关于援助修建水坝的建议,如果目前的谈判出现任何僵局,他肯定将考虑苏联的建议。5月间,埃及与中国签订一项换货协定,用四万五千吨埃及棉花换取6万吨中国的钢。由于这个协定,埃及在5月16日正式承认共产党中国,尽管这会引起美国的不快。6月中旬,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访问开罗,到处都传说苏联已经建议贷给修建水坝的全部费用,利息很低,偿还期限也很长。谢皮洛夫的确到塞得港和纳赛尔一道观看了最后一名英国士兵撤离苏伊士基地。纳赛尔得票百分之九十九当选为总统一事(选举办法类似俄国及其他极权国家),受到狂热的欢呼。俄国的武器在大街上接受检阅;俄国的飞机举行表演。约旦、黎巴嫩、也门、利比亚、苏丹、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都派来了象征性部队。<sup>①</sup>对所有这些事件,伦敦和华盛顿都感到同样的不安。美国国会愈来愈不愿意批准贷款,而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尤其采取否定的态度。他恐怕美国和世界银行最后都收不回这笔贷款。他在总统跟前和杜勒斯一样地举足轻重,在很多事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英国也有自己的疑虑。我们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作出这样巨大的牺牲来帮助一个愈来愈不友好、而且日渐受到俄国影响的政府,是否正确呢?只帮助我们的许多朋友不是更好吗?正如艾登所回忆的,我们是慢慢地被迫作出难以继续进行这项工程的结论的,但是,我们丝毫不想把这个结论强加于人。虽然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和世界银行来作最后决定,我们也明确表示我们不希望他们仓卒行动。我们希望“慢慢来”。当我们听说埃及大使动身前往华盛顿洽取这笔条件可能还待商讨的贷款时,我们尤其盼望美国人不要做出任何足以使局势发生急速和强烈变化的事情来。法国人和我们的观点一样,而且实际上比我们还害怕突然的破裂可

<sup>①</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422页。

能引起的反应。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也和往常一样,表现出他们一向高明的外交手腕。在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强烈表示我们必须采取“慢慢来”战术以后,美国人竟然采用完全相反的战术,当然使我们大为震惊。他们只是事后通知我们,而不是事先和我们商量。关于这件事,艾登用他一向的温和口吻回忆说:

事情处理得如此突然,实在使我们遗憾;因为,这样就使我们两国没有机会在时间上和方法上协调意见,而处理这个问题的时机和方法,与问题的实际内容是同样重要的。纳赛尔这时候正好在布里俄尼岛与铁托元帅和尼赫鲁先生会谈,这个消息当然伤害了他的自尊心。<sup>①</sup>

纳赛尔后来声称他强占运河主要是因为阿斯旺水坝的谈判破裂了,这是明目张胆在说谎。把谈判拖延好几个月的是埃及人。本来,在1955年底,或者最迟到1956年初,很容易就能拍板成交。100 那时候,不论英国人或美国人,对承受这项负担都没有什么犹疑;世界银行提出的条件也没什么苛刻或特殊的地方。杜勒斯唐突地处理这件事情,无疑是外交上的错误,但绝不是纳赛尔采取非法行动的真正原因。这年的春天和夏初,纳赛尔就愈来愈陷入苏联的外交圈套。这样,他原来关于阿拉伯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的危险梦想,简直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杜勒斯在谈判最后阶段的笨拙做法,对纳赛尔来说是正中下怀。从纳赛尔在整个中东进行的狂热的宣传以及他当时所采取的所有的行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正在准备采取一个足以激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人心的惊人举动。在得到俄国人的武器和金钱支援后,他将打击英国及其美国盟友的威信。他本来在很多方面类似墨索里尼,追查一下他使用的手法,竟与墨索里尼如出一辙。和他打交道的人,只要表现出一点懦怯或软弱,他马上就抓住加以利用;别人不论以什么慷慨或好心好意的行动来对待他,都得不到半点报偿。他从英国政府手里

<sup>①</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422页。

得到的全是体面而又慷慨的帮助，但是他总是用新的伤害来回报给予他的好处，提出新的要求来回答我们的慷慨行动。因此，虽然杜勒斯对最后阶段谈判的处理，应该受到，而且确实也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认为谈判的破裂是纳赛尔作出暴力回答的真正原因，那是错误的，是违背事实的。

7月20日，即杜勒斯把撤回建议的决定通知埃及大使的第二天，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表示。同一天，世界银行也正式撤回贷款建议，理由是，原计划中三方的资助是互相关连的。7月26日，纳赛尔发表了一篇满口咒骂和侮辱西方大国的恶毒演说，宣布把运河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公司及其一切资产与债务一律转移给埃及政府。埃及的军队和警察随即占领运河公司在开罗和运河各地的办公地点和各项设施。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了。

7月26日当晚，到伦敦进行正式访问的伊拉克国王、摄政王 101 和努里·艾·赛义德正在唐宁街参加晚宴，艾登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他接到这个消息时的情景。我呢，是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发生了这严重事件。

纳赛尔已经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也就是强占。他建议“按市场价格赔偿股金”。他将“用运河的收益来支付阿斯旺水坝的修建费用”。他的演说非常刻毒——一个亚洲墨索里尼，满篇对美国 and 联合王国的辱骂和轻蔑。首相清早给我打来电话，上午11点前我们会了面，商定一个准备在祷告后（这天是星期五）发表的事实性声明。这一切都安排好了。盖茨克尔作了一番比较客气的吵闹，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麻烦。<sup>①</sup>

我的同事们一致主张采取强烈而坚决的行动。我们的理由很简单，但是很有说服力。艾登在8月2日辩论时非常明确地阐述

---

<sup>①</sup> 1956年7月27日。



了这些理由。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和西方世界的物质利益。当时，大型油轮还没有问世，运河是西欧取得供应的最重要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的通道。每年有七千万吨石油通过运河，至少占西欧石油供应的一半。此外，通往澳大利亚、印度、锡兰和东南亚的正常航道，都通过运河；日常的贸易往来也使用这条水道。运河的国际地位是1888年会议上签订的协定承认了的，纳赛尔也不敢说后继的政府有理由否认这项义务。1954年的英埃条约又特别确认了运河公司的地位和1888年协定签字国各方的权利。更多的东西处于危险中。埃及不经协商，事前又不通知，便单方面地采取专横行动，违背自己庄严承担的义务，其中很多还是新近承担的义务，这种做法暴露了这个政权的真正性质。

102 艾登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容忍和慎重态度，因为有很多方面的考虑影响着他和他的同事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一直长期和阿拉伯各国维持着友好的联系。它们从旧奥斯曼帝国解放出来，是我们起的主导作用。我们给了它们慷慨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我们的军事设施，包括重要的空军分遣队，维护着这些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助于维护中东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存在着共产主义对欧洲和亚洲发动侵略的威胁，这种联系就更为重要。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当权人一直友好相处，帮助他们开发资源，支持他们发展经济。我们尽我们所能出色地在巴勒斯坦履行托管义务近三十年，而且，当我们失望地不得不放弃托管以后，我们还是认真地争取互相忍让和和解。<sup>①</sup>

显然，在当前均势有些动荡不定的时候，纳赛尔决心借助共产党人的阴谋，在共产党人的金钱和武器的支持下，把自己的砝码加在革命和阿拉伯扩张事业一边。他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产油国家，决心执行一项侵略政策，对此，我们的经验实在是太新鲜，太痛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147页。

苦了。正象盖茨克尔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十分熟悉的。这和我们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所遭遇到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所作所为  
如出一辙。”<sup>①</sup>当然，盖茨克尔的演说可以严厉地控诉埃及人，无需  
使用首相不得不使用的那种外交辞令。他根据四个主要理由来谴  
责纳赛尔的行动：第一，侵犯所有海运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第二，  
纳赛尔所采取的不经谈判、不作商讨的方式以及他所提出的把运  
河收入用于修建阿斯旺水坝的借口，都完全违背国际义务。第三，  
我们不能忘记纳赛尔所夸耀的要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阿  
拉伯帝国的意图。最后，阿拉伯各国都处于危险之中，特别是伊拉  
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当时大家都注意到这位反对党领袖所使  
用的语气开始是多么坚定，甚至是多么杀气腾腾。但是不久口气  
就改变了。

可是艾登呢？如果说他在公开场合还比较克制的话，在私人 103  
谈话里却是够强硬的。从这时起经过整个危机期间，我们始终和  
我们的法国朋友们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和法国的社会党人总理  
摩勒以及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不断进行密切的商讨。但是  
更重要的还是美国的态度。艾登7月底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立  
场极其鲜明，态度绝不含糊的重要电报。在列举当前面临的形  
势——石油供应受到的危险，纳赛尔如果得逞可能造成的险恶前  
景——以后，艾登清楚地指出，我们将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全力进  
行经济制裁和施加政治压力，非到成功，绝不罢休。

我的同事们和我都确信，我们必须准备在最后不得已时使用武力来  
使纳赛尔清醒过来。对我们来说，这方面是有准备的。今天早上我已经  
指示三军参谋长拟定一个相应的军事计划。<sup>②</sup>

艾登把电报的抄件给我看，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不仅说得简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8月2日。

② 阿翁伯爵前书，第428页。

单明确,而且态度极其坚决。

通过长期而复杂的商讨和谈判,以及从杜勒斯为谋求通过和平方式取得国际解决而提出的各种方案看来,无论杜勒斯或艾森豪威尔对我们的立场都不可能有过什么误解。英国和法国从长远说来是不会规避使用武力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运河的自由通航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对我们都有重大的战略上和商业上利益,而且也因为我们担心这种粗暴地践踏新近重申的国际协定的行为,将和当年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情况一样,使国际信义开始下降。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眼前的忧虑,就是纳赛尔将毫不迟疑地颠覆邻国的政权,而且在通过威胁和阴谋活动攫取了阿拉伯各国的领导权以后,一定会转而最后消灭以色列。

104 当时,我们还相信美国政府,认为特别是由一位对我们这样友好,又曾经指挥过我们伟大的军队,并且高度赞扬过英国人的坚定和勇敢的品质的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一定不会因为争论,因为感情用事或者误解我们对既定目标的坚定决心而使我们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在以后的几周里,当世界的海运国家在杜勒斯的鼓励下草拟出篇幅冗长的种种计划时,我很乐意地同意了。我相信,只要行动的时刻到来,美国的政府和人民总会给我们以同情和支持,即使不肯公开这样做,至少也会暗中帮助的。

不久就有一个机会使我的警觉性提高了。我在阿尔及尔时交上的一位老朋友、老同事,当时仍在国务院任职的罗伯特·墨菲很快奉命到伦敦来。由于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这时正在度假,所以墨菲的来访意义极其重大。艾森豪威尔事先通知艾登说,墨菲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来的。他随身没有带什么指示,只是来了解情况,然后回去汇报。这正是我的一次机会,在首相的完全默许下,我决定充分加以利用。

7月30日我请他到唐宁街十一号吃晚饭。客人除他以外只

有美国代办安德鲁·福斯特和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勋爵。墨菲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客观地记述了我们的谈话。象他这样有经验的外交家当然很了解这次谈话的目的。

我和麦克米伦和亚历山大共同工作过好几个月，对他们两位都十分钦佩。他们都出色地履行过重大的职责，享有崇高的声誉，也都难能可贵地既保持着他们的现实感，又富于幽默感。那天晚上的谈话毫无拘束，很轻松愉快，但是并不是回忆过去的往事，我们的思想都集中在苏伊士问题上……<sup>①</sup>

我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和法国必须接受这个挑战，否则就要沦为二等国。墨菲接过去说：

我完全相信英国政府认为苏伊士问题是一个只能以武力来迎接的考验，他们作出这样的反应，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这看来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告诉我，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意见完全一致，认为需要坚持斗争，而且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亚历山大虽然已经退休，但是这位杰出的战士显然和作战计划有密切关系，他一定同意了 this 计划。<sup>②</sup>

第二天上午，我出席唐宁街十号的午宴，到场的除了皮诺以外也有墨菲。法国人表示的态度十分坚决。在后来的一次会晤里，墨菲向我评论说：

法国社会党人一旦发现他们的公牛被对方抵伤了，就比谁都更无情地玩弄强权政治，更巧妙地侮慢别人。皮诺毫不掩饰对他所谓“美国式天真”的蔑视。<sup>③</sup>

关于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墨菲给我们说得很少。他坦白地承认没有接到什么正式的指示。艾森豪威尔只是对他说：“到那边去

---

①② 罗伯特·墨菲：《奔走于战士之间的外交家》，第463页。1964年，伦敦。

③ 同上书，第465页。

把堡垒守住吧。”也许也只能这样做，因为这时杜勒斯正出国到秘鲁去了。我们当然尽我们所能来恐吓墨菲，至少也要使他对我们的决心不致有什么怀疑。

看来我们已经成功地使墨菲感到震惊。他一定已经按照我们的意思作了汇报。福斯特·杜勒斯现在正十万火急地赶回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sup>①</sup>

这时候，我主管的部门堆着许多事情要办。其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交纳通航税的问题。我建议我们应该通知我们的船主们——并且争取其他海运国家也向它们的船主发出同样的指示——要他们按照原来的办法，把通航税交给旧运河公司（这就是说，英国船主在伦敦交纳，法国船主在巴黎交纳，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船主则在埃及交纳），在进入运河时可以声明已经交纳了通航税。如果这个做法遭到阻挠，我们就应该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另外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是埃及的英镑问题。我们是想尽可能地加以控制，但是要考虑采取比较慎重的方式，避免影响全世界的英镑持有人对英镑的信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发了一道命令把埃及排除在可兑英镑的结算账户之外，凡是和埃及控制的账户进行交易，都要经过特别批准。我们还采取了以黄金来保护公司股票的措施。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在7月底以前商定的，法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财政部里我的一些顾问们和往常一样，在那些时间很长、有时十分剧烈的讨论中给我以极其热诚而巧妙的支持。虽然我在谈判中并不是正式代表，但是杜勒斯到英国来的时候，因为我当外交大臣时彼此曾经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所以特地前来看望我。他带着墨菲和已经回任的美国大使前来。

我们谈了一个钟头。我尽量坦率地告诉杜勒斯说，我们实在输不

---

<sup>①</sup> 1956年7月31日。

起这一局；这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我想他一定相当震动，因为我猜想他原来一定没想到我会这样极端。我们必须使美国人真正感到震惊，不能让他们有丝毫幻想。然后他们才会帮助我们不必使用武力而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东西。<sup>①</sup>

这几个月里，我除了忙于作为财政大臣应管的事情以外，还参加了一个专门处理危机事宜的大臣级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这个委员会是刚成立的，后来一直存在了好几个月。艾登和许多历史学家对当时采取的各种行动，已经作了详细的叙述，我这里只想谈一些与我特别有关的事情。当然，从运河被强占时起一直到宣布停火这一段焦虑不安的日子里，首相一直让我充分了解他的一切计划。当时所有的决定，都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内阁大臣当然负有责任，而且是因为我是艾登经常谘询意见的圈子内人物之一。不过，由于我忙于处理我职责内的财政方面问题，所以对当时为了寻求一个符合于公理和正义的和平解决办法所作的复杂而又可惜是无效的尝试，也就只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8月2日，美国国务卿、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外交大臣联名向规定运河国际性质的1888年协定的八个创始签字国和十六个船舶吨位和贸易数量比较大的运河主要使用国发出邀请，准备尽速在伦敦举行会议。“总的说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成果。美国确实已经前进了一大步。”<sup>②</sup> 邀请书还谴责了纳赛尔的行动，并且表示支持国际共管原则。

现在有一段短暂的空隙时间。在这期间，我曾经和一家银行派来见我的代表发生了一场有点可笑的冲突。

---

① 1956年8月1日。

② 1956年8月2日。

他们怀疑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账户里交钱给苏伊士运河公司（即那个合法的公司）。我问道：“为什么不应该？”他们说，说不定将来有一个法庭主张纳赛尔的行动合法，这笔钱应归新的国有化当局所有。我很气愤，向他们发起脾气来，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他们只好愁容满脸地离开了，不过还是答应碰一碰运气，照看来比较正确的做法办。<sup>①</sup>

英国和法国政府在所有这些金融制裁措施上，立场都很坚定，所以欧洲国家也开始表现出真正愿意帮助我们。8月12日，埃及宣布拒绝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但是被邀请的二十四个国家中有二十二国接受邀请，除了埃及以外，唯一缺席的是希腊。

杜勒斯希望会期挪后一点，后来达成妥协，于是会议在8月16日开幕，到23日结束。在这个阶段里，我觉得杜勒斯好象决心采取强硬的方针。他甚至在争论里亲自打前锋。他和艾森豪威尔都完全了解，必须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不过，杜勒斯认为，首先使用一切和平方法，然后再使用武力，全世界就会谅解我们。他和英国外交大臣谈话时，甚至同意这样一个提法，就是  
108 必须使纳赛尔“把他企图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杜勒斯认为，完全有可能“造成一种世界性的反对纳赛尔的舆论，使他孤立起来。那时候，如果不得不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比起现在仓卒地出兵，更容易取得胜利，引起的反应也比较小。”<sup>②</sup>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负责管理运河，得到十八个国家的同意。印度在俄国的支持下，提出一个由埃及管理运河，同时设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计划。美国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这种办法一定很快就会证明不过是一场闹剧。会议的第二步是指派一个由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领导，有伊朗、埃塞俄比亚、瑞典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委员会，负责与埃及政府直接接触。在会议结束前，杜勒斯又来看了我

① 1956年8月3日。

② 阿翁伯爵前书，第437页。

一次。根据他的谈话,我事后向首相汇报说,杜勒斯看来态度十分坚决。他的确表现得很友好,坦率地谈到他自己在艾森豪威尔一旦重新当选后的打算。

我这方面担心的是程序问题。

比较弱小的弟兄们希望的是进行一次“谈判”,这可是最糟糕的了。我们的宣言将送给纳赛尔,并且要求他答复是否愿意谈判一项符合或接近宣言所提条件的条约。可以组成一个小型的委员会(不包括联合王国和法国)来就他所想询问的问题作出解答和说明,但不负责谈判。有人提出要这个委员会到开罗去谈判,这是个荒谬而危险的主张,令人感到震惊。这太像“卡诺沙”<sup>①</sup>了!<sup>②</sup>

但是,这个计划还是被普遍接受了,而我也觉得,“杜勒斯既然在这里扮演了这样重要的角色,肯定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威信。”<sup>③</sup>他离开前,我对他说:

如果我们用外交压力找不到出路,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诉诸武力。法国人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对此,杜勒斯好象并没有感到震惊。<sup>④</sup>

虽然杜勒斯不准备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亲自到开罗去,但是事情做得还不错,美国把洛伊·亨德森派到委员会里当代表,而且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委员会主席孟席斯的高尚品德和他那坚韧不拔、忠诚正直的性格。现在,除了等待事态发展外,没有别的什么要做的了。

在这段间隙时间里,我利用在财政部领导之下由各有关大臣对财政状况进行综合审查的机会,向我的同事们介绍了我们对英

① 卡诺沙,在意大利北部,1077年德王亨利第四在此向教皇格列哥利七世请罪。这个地名就此被作为屈辱、投降的代名词。——译者

② 1956年8月21日。

③ 1956年8月22日。

④ 1956年8月24日。



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所作的某些估计。8月和9月军事戒备措施直接从预算支出的费用不会很大——不超过一千二百万英镑。如果紧急状态持续下去，每月的开支将约为二百万英镑。与全部国防开支的十六亿英镑比起来，这个数字不会造成什么问题。由于最近失业人数增加到将近六万人，所以，从劳动力市场征调二万六千名后备军人也不会产生什么困难。至于国际收支方面，外汇所受的直接影响很小。最大宗的支出恐怕是租船费用。考虑到在旅游旺季征调客轮会造成很大浪费，所以我已经说服海军部把它能弄到手的一切后备船只，包括大型运输舰和巡洋舰等，全部投入使用。依靠进口的一般商品，除了石油以外，眼前的价格还不致受到什么严重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采取的戒备措施，直接费用并不大，间接的影响就比较难于预见。美国人拒绝向他们的船主发出和我们内容一致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不安，因为这样一方面会减弱对纳赛尔的压力，他可以拿到正常通航税的百分之三十五；另一方面是，一旦公众知道美国这样做，他们的信心必然降低。我们虽然采取了最妥善的办法来控制埃及的英镑收付，尽量不惊动英镑持有者，但是必然会出现某种不安的感觉。当然啦，只要美国在主要问题上还是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就不致发生抛售英镑的浪潮。

我们也估计了一下一旦需要进行军事行动时实际开支将需要多少。除非行动时间比较短，又只限于局部地区，费用肯定很浩大。110 不过，我们认为本年度预算的超支数字，顶多也就是一亿英镑。

严重得多的是石油供应的中断。不论是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纳赛尔一旦成功地动员起阿拉伯世界来采取进一步行动反对我们，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假如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的供应仍然继续开放，而且美国又能够充分地合作，那么，在经过两三个月可以忍受的短缺以后，欧洲的全部需要还是可以得到满足

的；如果运河和油管全被切断，那么即使有美国的支持，情况也会十分严重。倘若运河长期关闭，需要建立个新的贸易格局，那么，整个欧洲将额外增加数达好几亿美元的支出。物价将要上升，欧洲也将以美元来支付。

就近期说，幸运的是英国这时的石油库存正达到最高峰，而且可以从战略库存和海军库存中调拨一定的数量，但是过一段时期就将出现紊乱，那时只好把汽车用油削减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个肯定要实行的措施，对经济不致有重大损害。我们也尽我们所能来预测航运和商品的情况。可能会象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一样，运费、也许还有物价，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

我们总的结论是：如果不得不采取行动，就必须力求时间短，成效大。我们短期内的需要无疑可以指望美国的支援。但是，从长远看，英国和整个西欧终究需要依靠自由地使用来自亚洲的石油。如果我们容许纳赛尔毫无阻拦地进行侵略，我们就会很容易完全受制于人。权衡一下利害，我们冒一场短期战斗的风险，当然比整个西欧长此以往臣服于中东的当权者要强得多。

这时候，我们的困难是怎样才能既“使纳赛尔吐出来”，又不致影响英镑的信用。这一点所以显得特别困难，是因为美国这时既没有冻结埃及私人账户，也没有阻止埃及政府取得新的美元收益。他们只是把危机开始时埃及账户的存款冻结起来。这种决定既不 111  
合情理，也无济于事。如果美国人同意冻结埃及政府新的美元收益，我们就容易说服德国和那些对此还犹豫不决的国家也这样做。在美国做到这一点之前，是很难说服其他国家仿效的。甚至这一点完全实现了，人们也还是有办法躲开外汇管制。例如，中国人欠了埃及人的钱，现在他们正在买进瑞士法郎，而答应以英镑来支付。到9月初，我们将需要公布储备流失数字，估计不会少于一亿二千万美元。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作任何有可能破坏

英镑信用的宣传。我们倒是有很多很容易就收回来的英镑债权，但是，由于这些实际原因，我们受到一些拘束，很难把我们的全部收支状况向海内外披露。

关于我们的军事行动应具的性质和目标，本来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但是我还是大胆地表示了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如果只是重新占领运河，顶多使我们回复到前些年所处的地位，存在一个敌对的埃及政府在那里发号施令，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和不便。换句话说，我们将回到我们本来已经感到无法坚持的阵地上去——何况军队数量要比以前少得多。既然要使用武力，目的就必须是制止或者消除中东整个和平事业所受到的威胁。我们都很了解——因为我们全都从那些可怕的年月里生活过来——1935年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的时候，或者1936年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兰的时候，如果我们当时就进行反击，全世界就可以免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可怕苦难。此外，以色列肯定会利用当前的形势来摆脱它所受到的经常的威胁。全部历史都表明，有骨气的政治家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而以色列人是勇敢而坚决的。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制止他们进攻约旦，因为我们和约旦是盟国，一旦以色列进攻约旦，我们将处于无法解脱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

112 以色列真的动手，我们至少应该派英法军队介入，守住阵地，把双方隔离开来，同时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不仅仅限于解决运河问题，而应该包括整个中东的和平问题；因为运河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是比起整个中东的和平问题来，究竟次要一些。首相和三军参谋长都接受了我的这些主张。我所以要干预这件事情，是受到丘吉尔的鼓励。8月5日我曾经在查特韦尔和他一起吃晚饭，我们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希望美国人能够利用他们所领导的世界性压力，帮助我们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这点失败了，我们就必须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对英国和自由

世界的责任。

关于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也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我们肯定应该设法使埃及尽快出现一个对我们友好的政府。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和它商定一个慷慨的运河计划，既使国际共管获得保障，又使埃及有可能得到重大的财政收益。在整个中东，我们应该执行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政策。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组织产油国家、石油转运国，也许还包括那些根本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一起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如果能在这整个地区恢复和谐和合作，并且为不断增加欧美投资提供牢固的基础，我们就能够描绘出一幅中东发挥巨大潜力的美好图景。总而言之，我们不应该再以反动强国的姿态回到旧日的“殖民主义”去，而应该作为一个试图导致持久的、建设性解决办法的进步力量出现在中东。这样，我们就不致于成为1815年愚蠢地进行复辟的路易十八，而成为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重新统一意大利的拿破仑。这样的雄心虽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但是我始终相信，如果西方联盟能够坚持，本来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

这几个星期里，全国的态度一直很坚决。艾登8月8日作了一次很出色的广播和电视演说，效果非常好。危机开始时，《泰晤士报》的调子就不错，以后也一直很帮忙。8月2日议会举行第一次辩论的前一天，这家报纸说了下面一段话：

明天下院开始讨论苏伊士问题的时候，有一点议员们必须加以肯定，而且应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如果容许纳赛尔发动突击得逞，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全部利益就将化为乌有。象希特勒进军莱茵兰，斯大林主义者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这样一些行为，已经使现代世界遭受了不少灾难，他们却都声称这是在行使国家主权。其实，那时正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纳赛尔强占运河公司，是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如果热衷于辩论纳赛尔是否有“合法的权利”从事这种劫夺，就

只会使那些专门与我们作对的人高兴，使怯懦的人心安理得，却完全放过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sup>①</sup>

可惜的是，在印刷大厦的广场上，这样美好的晨曦往往被一层奇怪的乌云所遮盖。“一般”的报刊倒是一样地坚决——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上层”的报纸却已经在动摇了。不过，我对这种现象并不感到惊奇。

为了使西方和大西洋各国的意见能够一致起来，英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艾登的建议下，由塞尔温·劳埃德主持，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会议。杜勒斯对此并不热心，他自己没有出席，只派了代表来。其他各国的外交部长都出席了，而且采取了非常强硬的路线。荷兰外交大臣约瑟夫·伦斯博士

敦促北大西洋各国拒绝承认纳赛尔对运河的强占，不向新的运河当局交纳通航税，并且联名向安理会控告。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赞成这个意见。他虽然反对军事制裁，但是不排除把它作为最后的手段。<sup>②</sup>

斯巴克甚至更加坚决。他相信西方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如果在这次危机中退缩，就将不得不继续很不光彩地作长距离撤退，给下一代人种下恶果。就象许多经历过希特勒崛起时期的欧洲人一样，他痛切感到有必要在早期就采取行动。

114 孟席斯这时正在开罗等待纳赛尔的答复。他向会议发来一份有关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的详细报告，前所未有地给这次历史性会议带来了一线明确的戏剧性的希望。孟席斯对纳赛尔的风采和性格印象不错，十分注意公平地对待他。

纳赛尔是一个体格魁梧、外表威严的人；一看就是个牢牢掌握着自

---

<sup>①②</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458页。

己政府的人，而且才智出众；但是显得有点不成熟，而且不免缺乏经验。他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显然很有勇气。<sup>①</sup>

这位澳大利亚总理7月份刚好在英国进行一些贸易谈判，所以他勉强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关心的当然是尽快地回国，但是，他受到很大的压力要他留在英国，最后出于爱国心，终于接受了这个使命，这点我们确实是很幸运的。他的政敌当然责备他想出风头。我认识孟席斯好多年了，后来在当首相时又有机会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爱出风头；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像大树一样给人以浓密的树荫，让人们在树下乘凉休息。

孟席斯实际上是被“征召”来的。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和澳大利亚的利益关系也很大，他答应艾登的恳切要求，恐怕也不足为奇。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没有抱什么幻想。9月3日，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纯属形式的会议以后，第二天便发出一份备忘录，授与代表十八个运河主要使用国以全权证书，并附上一份备忘录，用合乎礼节的非挑衅性的语言提出各项主要的建议。备忘录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如果想维护和发展运河，必须使它摆脱政治上的考虑，运河的管理要以保障最大限度的国际信义和国际合作为基础。同时，他们还明确表示十八国对待这个问题丝毫不存任何敌意。相反地，<sup>115</sup>它们都很珍惜与埃及长期存在的友谊，并且欢迎埃及最近在自治和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种精神在伦敦会议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委员会接着说：

我们深信，按照我们建议的原则谈判一项协定，无论对埃及或者对使用运河的所有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利的，而且一定有助于恢复目前世界上迫切需要的那种和平的国际气氛。<sup>②</sup>

---

① 罗伯特·孟席斯博士：《下午的阳光》，第164页，1967年，伦敦。

② 同上书，第163页。

委员会接着又指出,它认为 1888 年的协定并没有损害埃及的主权,而且,将来经过自愿的友好协商而达成的新协议,也不会有损埃及主权。委员会希望通过与埃及政府的商讨和会谈,寻求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和平解决办法。孟席斯代表委员会在一篇既温和又有说服力的发言里提出了全部意见。建议的全文也正式提交埃及。

但是,不论他本人或者整个委员会,都不很指望得到满意的答复,因此孟席斯自愿地承担一项重大的责任。他决定要求纳赛尔单独接见他,尽管这样做严格说是超越了他的授权范围。纳赛尔同意了这个要求。孟席斯希望在一种私人的、非官方的谈话气氛中使纳赛尔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会见的前一天他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纳赛尔在向军队将领发表讲话时保证说英法的动员备战只是虚张声势,可以放心,不予理会。如果这确实是纳赛尔的看法,那么,使他醒悟过来就非常必要。在谈话过程中,孟席斯讲明不应该把他所说的话视为威胁,而且他也没有得到授权来讲这些话,同时他又认为对纳赛尔应该开诚布公,坦率相见。因此,他用了这样的词句:

116 我注意到你昨天把英法的军事动员说成是“虚张声势”。可是,我刚从伦敦来,我对那里的意见有一些了解;我也知道法国人心里的想法。埃及的报纸似乎都普遍认为伦敦会议已经决定反对使用武力。其实并不是这样。<sup>①</sup>

接下去他又说:

伦敦会议根本没有讨论使用武力的问题;它只是集中力量拟定一些公平和建设性的建议,以保证问题能够和平地解决。我想不以一方代表的身份,而以最友善的态度来表示一下我的看法:对于你来说,如果完

---

<sup>①</sup> 罗伯特·孟席斯博士前书,第 164 页。

全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不加考虑，那将是一个错误。不过我想再说一遍：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们和我本人，都没有谈到武力，也没有设想将来需要使用或者实际使用武力。但是我不希望你对伦敦和巴黎的意见作出错误的估计。<sup>①</sup>

这种坚定而又温和的态度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纳赛尔，所以孟席斯以为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了。但是，用孟席斯自己的话说，“第二天早晨，我一看报纸就晓得一切都完了。艾森豪威尔已经说话了。”<sup>②</sup>

十八国已经在伦敦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它们已经指定了一个由世界上最坚定的政治家之一来领导的强有力的委员会。它们开了会，也看到了一些情况，但是他们还没有取得成功。美国的国务卿在组织各个海运国方面起过主要领导作用，而且这些国家所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国务卿自己起草的。可是，这些国家的计划却被美国总统无意中、而且无疑是相当不自觉地给破坏了。这个致命的打击是怎么发生的呢？9月5日，就是孟席斯对纳赛尔提出私下警告的第二天上午，开罗的英文和法文报纸以醒目的标题登载的并不是纳赛尔与孟席斯会谈的消息，而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报界发表的一份声明：

就我们方面说，我们决心竭尽全力，用一切可行的办法来谋求和平解决……而且我们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至于别的国家如何行事，我不准备加以评论。我对我们的这个建议将被人所接受，是抱有很大希望 117 的；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即使我们碰到其他的障碍，也绝不放弃这个建议。

我们的责任是和平解决这场争端，别无其他。<sup>③</sup>

最后一句话仔细揣摩起来也可以解释为只是指现在正在进行

① 罗伯特·孟席斯博士前书，第164页。

②③ 同上书，第165页。



的事情，但是，这句话却把事情钉死了。既然使用武力已排除在外，纳赛尔需要做的只是稳坐钓鱼台，等待这些怒气冲冲的国家在会议上分崩离析，成为无所作为的乌合之众。就如孟席斯忧伤地回忆的那样，美国政治家对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喜欢答以“无可奉告”。这一次艾森豪威尔要是也使用这样一句难得的老套话，就不致于使他自己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这样殷切期待的计划陷于失败。现在有两点纳赛尔是很清楚的：第一，使用武力一事可以不用顾虑，因为他相信既然美国不同意，使用武力的问题就不存在。第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拒绝当前的建议，因为他相信美国不久一定会提出一些对他更为有利的新建议。这就是在民主条件下进行国际谈判的困难所在。科学的奇迹创造了自由的报刊、自由的无线电广播和自由的电视，使得任何政治问题出现时，在地球转动的二十四小时内，无时无刻不有人在议论。但是，在私人生活里，总统却是以精通扑克驰名的。

孟席斯在离开开罗以前，还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来支持我们的财政地位，表现了他的合作态度。快到8月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是否可以出售价值二千万英镑的澳大利亚黄金给英格兰银行，以便改善中央储备的状况。他和他的同事们商量后表示同意，事情就作了相应的安排。就象我在给他的感谢信里说的，这确实是“表示支持和团结一致的及时而令人鼓舞的行动”。

118 纳赛尔死不让步的消息，使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自埃及强占运河以来内阁过去曾经再三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不必再找麻烦，干脆通过安理会把问题提到联合国去。盖茨克尔早在8月2日发言猛烈攻击纳赛尔时，在最后一段话里就曾经提出这个主张。一直到这时候，我们还只是决定等待一下，至少也要等到外交谈判有个结果再说。8月19日温思罗普·阿尔德里奇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赫得菲尔德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给我的

印象特别深刻。这位美国大使坚持说杜勒斯是强烈反对这个方针的。也不知道这是因为杜勒斯认为我们的要求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呢，还是象我所猜测的，因为美国人自己有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所以对运河通道由国际共管这样一个主张特别地敏感。反对提交联合国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是：这样做法可能会遇到否决权而完全陷入僵局。我们不能忘记，联合国能够动员起来捍卫正义和保卫和平，唯一的一次就是在朝鲜问题上，但是当时之所以可能做到，是因为俄国人完全抵制联合国。这一次俄国人看来不大可能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但是，盖茨克尔原来提出的这个主张现在大家都自由地讨论开了。当我们正打算继续等待伦敦会议的结果时，纳赛尔就拒绝了孟席斯委员会的建议，因此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当然，在纽约可能出现旷日持久而终于毫无成效的辩论局面；但是，英国和世界的舆论都要求我们在采取比较激烈的补救办法之前至少应该尝试一下通过联合国来谋求公正的解决。

快到8月底，大臣们考虑到舆论的情况，都倾向于把事情提到安理会去。我们预料在安理会上我们可以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确实，杜勒斯在8月下旬曾经“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说是联合国里有可能草率通过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相当好的决议。”<sup>①</sup>

几天以后，他又改口了，回到他原先的观点。他把安理会形容为流沙，你一踩进去就没个底，也许永远也拔不出脚来。尽管总统 119  
早先给艾登的电报里曾经主张在考虑武力之前必须先诉诸联合国，可是杜勒斯却不愿意保证在安理会里充分支持我们。8月30日我们送了一个决议草案给华盛顿，杜勒斯几乎对每一条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确实，要不是我们还相信我们美国盟友的善意，我们一定会认为国务院只是在设法浪费时间。这时候，我的确毫不

<sup>①</sup> 1956年8月24日。

怀疑从长远来说,或者在真正的危急时刻,我们可以指望得到美国朋友的帮助,至少也可以得到他们不动声色的支持。也许,根据国务院新近的态度,以及在听见他们不祥地提到他们不愿意被人看成似乎在“和英法结成一伙”的时候,我本来就应该有所警觉。美国领导人对中东权力斗争的真正的战术战略意义,一直出奇地视而不见,等到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1957年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是放到1956年来,就会把我们大家都拯救了。

连我这样一个同美国打过交道,在地中海战役时对美国政府核心又有所了解的人,也被这一大堆矛盾所困扰,就更不用说塞尔温·劳埃德了,他碰到的障碍更其严重。不过从当时一直到危机结束,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非常能干,而且充满信心。这几个月里他经受的紧张劳累不下于艾登,而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有倦容或者发脾气。

考虑到议会很快就要复会,而且国内要求我们现在就诉诸联合国的情绪日益高涨,所以当局势有所变化时,我们就及时作出决定。杜勒斯草拟了一个新的计划。早在得知孟席斯执行使命的结果之前,杜勒斯就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组织“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简称“使用国协会”。表面上看来,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所有的海运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全部组织起来,对埃及系统地施加有效的、也许能起决定作用的压力。

使用国协会的计划希望绝大多数海运国家和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参加协会。这个组织可以通过组织船舶、管理运河、聘用领航员和对运河实行有效的控制等活动来否定埃及政府的权威,剥夺埃及政府企图靠海盗行为取得的收益。

计划的要点如下:

英国、法国、美国和尽可能多的伦敦会议参加国将共同组成一个协会。成员国的船只将一致按照它们各自通常的需要驶经运河;协会将自

行雇用领航员及其他人员以保证正常航行，并且收取通航税。协会将从收到的款项中把它认为纳赛尔应得的份额交付给他。协会将争取埃及的合作。如果纳赛尔乐于帮助，那很好；否则，协会成员国的船只将依靠自己的领航员驶过运河。<sup>①</sup>

当然，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会成员国的船只受阻，应该给它们什么命令？前进还是返航？正是这个根本问题杜勒斯给回避了，故意让人去做两可的解释。

9月10日，议会开幕的前几天，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立场。

我真实感到，如果我们真能得到美国对“使用国俱乐部”的协助，就宁可面对下院[关于联合国]的难题。因为，倘若包括美国在内的协会成员国的船只真的不顾纳赛尔而驶过运河（用自己的领航员），结果要不是纳赛尔完全“丢脸”，那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被卷进一个“事件”，证明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但是杜勒斯说话算数吗？协会能行动起来，而且很快就行动起来吗？它会不会去和纳赛尔搞谈判呢？我们决定给杜勒斯去个电报要求澄清这些问题。最要紧的是：所有的通航税一定要交给使用国协会（包括美国船和美国租用的船只）。这是个试金石。<sup>②</sup>

当晚法国人到达伦敦，我坐在总理居伊·摩勒旁边。

我问摩勒他能不能给盖茨克尔一点影响，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毕竟都是社会党人。摩勒回答说：“不错，可是英国是个奇怪的国家。这里的保守党人”意见和行动都是社会主义的，而社会党人却是老式的自由派。<sup>③</sup>

经过多次商讨，英国和法国还是同意了美国的计划。就象艾登所说，要不要赞成这个计划，是整个苏伊士危机中我们面临的最

---

① 赫尔曼·芬纳前书，第207—208页。

②③ 1956年9月10日。

关键性的问题之一。这确实是件进退两难的事情。如果我们事先知道我们作决定的当天总统要发表那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我们也许就会犹豫不决。当然，假使我们当时马上就拒绝这个计划，把原来杜勒斯拒绝支持的那个决议草案原封不动地直接提交到联合国，美国就可能已经和我们翻起脸来。另一方面，我们本来有可能避免“卷进那些为了建立使用国俱乐部而进行的旷日持久、使人厌烦的谈判”。<sup>①</sup>由于第二天议会要开会，形势迫人，我们也就作了决定。艾登很大方地承担了这次决定的主要责任。他经过一夜的思索，对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有所怀疑，所以第二天一早就给我来了电话。这时还有时间再作考虑。

可供抉择的办法不外是：1) 在下午辩论时宣布我们将立即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2) 宣布组织使用国俱乐部(使用国协会)。美国人(最近和他们一直很难打交道)是反对第一个办法，赞成第二个办法的。这当然会使我们在议会里碰到麻烦。不过现在还是采取第二个办法好，因为美国的支持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关于第一个办法，讲演词里故意含糊其词。<sup>②</sup>

我对杜勒斯处理整个事情时理智是否健全真有点怀疑，但是我仍然抱着希望，认为当我们被迫采取某种行动时，还是可以得到122 美国的支持，即使不是积极的支持，至少也会默许吧。当然，他们允许船主向纳赛尔交纳通航税，实际上已经使运河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落入纳赛尔的手里。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严重的漏洞在适当的时候是会堵塞的。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如果美国人能给英镑以合理的支持，并且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向我们提供石油援助而不是美元，那么，我们和欧洲各国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住我们的地位。当然，如果美国人抛售英镑——不论是官方抛售

① 阿翁伯爵前书，第480页。

② 1956年9月12日。

或者非官方抛售——而且其行动连中立也不如，竟然是敌对的，那么，我们就没什么指望了。所以我们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只好信任我们的朋友，再接受一段时期的拖延。当时我们谁也不会预料到杜勒斯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艾森豪威尔又优柔寡断地加以支持。

杜勒斯的来电里有一句话竟然可笑地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事情也表明当时我们简直没有共同的语言了。他提到

使用国俱乐部将付给埃及以“补偿”。这句话使英国的大臣们非常气愤，以至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补偿在美国是指薪金、工资、土地使用费等等，而并不（象在英语里）意味着一方因给对方造成损失而付给的款项。如果埃及确实提供了各种劳务，而且允许使用国协会使用运河，那么协会付钱给埃及，还是比较合理的。<sup>①</sup>

说真的，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补偿”这个指薪俸和工资的字眼，因为使用这个名词就假定了存在着一个永久的乐园，我们有权到那里去欣赏乔尔乔涅<sup>②</sup>所描绘的永不闭幕的“田园音乐会”。如果我们因为工作而放弃这种赏心乐事，那我们就有权取得相应的报偿。

由于杜勒斯一直反对我们诉诸联合国，而且华盛顿不断发出反对这种做法的各种各样论调，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使用国协会的计划，我们对安理会的态度就只好限制在形式上的往来。我们意识到，既然我们同意美国人这局牌的打法，那末半心半意地干是不会有好处的。杜勒斯在以后虽然成了联合国的卫道士，扮演着一个国际加拉赫爵士<sup>③</sup>的角色，但是这时候却猛烈地反对法国和英国求助于这个机构。我们在下院和全国将会碰到麻烦。曾经疏忽

① 1956年9月12日。

② 乔尔乔涅，十六世纪初威尼斯画家，《田园音乐会》是他的一幅画。——译者

③ 加拉赫爵士，传奇中英国阿瑟王手下的一名圆桌骑士。——译者

他们自己在伊朗石油争端上未能取得联合国任何支持的反对党的领袖们,现在非常强烈地要求诉诸联合国。

首相在辩论开始时解释了他所理解的使用国协会的计划,使自己的同盟者和议会有清楚的了解,不留半点含糊。

协会将要求埃及当局合作以保持运河最大限度的通航量。协会准备就埃及所提供的设施付给埃及适当的款项。但是通航税必须交给使用国协会,而不是交给埃及当局。<sup>①</sup>

他补充了这样一段话:

我有必要明确地指出,埃及政府如果试图干扰协会的活动,或者拒绝给予协会以最低限度必要的合作,这个政府就再一次违反1888年的协定。在这种情况下,女王陛下政府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将有权通过联合国或以其他的手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sup>②</sup>

对于这一点,失败主义者当然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作出明确的说明。艾登后来声称,他拒绝对他所说过的这段话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些词句是经过三国仔细斟酌的。伦敦和巴黎分别与华盛顿往来的文电和说明,确实是支持这种提法的。<sup>③</sup>对温思罗普·阿尔德里奇大使来说,应该把他坚持给我们警告这一点记录在案才算公平,他对杜勒斯确实是很了解的。

124 为了安抚那些真诚拥护联合国的人们的感情,我们在法国盟友的同意下,采取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程序。艾登明确地指出,从长远来说我们并不排除诉诸联合国;至于目前,我们认为在尝试其他办法的同时,可以和法国人联名给安理会主席去一封信,把情况通知他。有一位法国朋友轻蔑地形容这种做法就象给这位尊贵的国际人物“留下我们的名片”。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9月12日。

③ 阿翁伯爵前书,第482页。

整个说来，辩论进行得还顺利。

首相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受到热烈的欢呼。盖茨克尔显然被使用国协会的计划吓住了，有点失去常态。他发言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已经离开他8月间无意中采取的爱国主义路线，转到“党派”路线上了。<sup>①</sup>

第二天，9月13日，议会里的情况就比较困难。为了使美国人完全卷进使用国协会，我们确实有意冒一下我们早就预料到的风险，宁可让人们批评我们不愿找联合国。

我们说，我们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行事的。批评我们的人说：“你们敢答应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同意之前绝不使用武力吗？”我们说：“俄国人在那里有否决权，我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保证呢？”但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联合国有那么一种奇怪的神秘感，所以他们还是说：“这话倒没错，但是，反正还是得上联合国去。那样，你们事情才算做对了。”社会党人当然昨天和今天都催迫得很紧。自由党人——克莱姆·戴维斯及其一伙——还有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当然站在他们一边（其实他们一定晓得我们为什么不怕拖延而选择使用国协会）。这就使我们处境十分困难，特别是因为有相当多的保守党人，主要是年青的党员，其中又主要是“慕尼黑派”的后代……也开始叛离我们。尤其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本来完全愿意“找安理会”……只是因为杜勒斯仍然不同意投票反对俄国或者南斯拉夫对我们的决议草案可能提出的修正案，甚至连弃权也不肯，我们才不得不暂时不上安理会去。<sup>②</sup>

结果，这次辩论变得比8月份的那次更难掌握。第二天，塞尔温·劳埃德提出动议，要求就谴责埃及政府和赞同英国政府为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断进行的努力，举行信任投票。这时盖茨克尔显然在各左翼党派的压力下，已经改变了几个星期以前采取的立场。反对党仍然要求立即把整个争端提交联合国。这局面的确难办。

---

① 1956年9月12日。

② 1956年9月13日。



在这样多方面的压力下，首相当然开始动摇。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太明显地改变立场，党内比较好斗的一派（沃特豪斯——艾默里派）又很可能闹起来。同时，外交大臣已经在两点半动议举行信任投票——他的发言很动人；莱昂内尔·希尔德（曾任副检察长）宣布他不准备投票支持政府，其他一些保守党人也照他的样子办。下午六点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巴特勒主张作出“在提交联合国之前不使用武力”的保证。我主张坚持下去，要首相向议会说：“我不收回我所说过的话”。如果首相在社会党人的压力下“撤回原议”，他的声誉和地位将受到致命的打击。既然我们确实准备找安理会——只要在那里能够指靠美国的支持，我们马上就去——那么，将来事实自然会给我们说话，用不着用言词来辩护。不过，我认为一两天前我（还有索尔兹伯里、巴特勒和基尔穆尔）商定的那个提法也就行了。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他们都应该坚守立场。那个提法给首相送去，得到了他的同意。<sup>①</sup>

辩论刚好进行到首相作总结的时候，杜勒斯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的消息通过电报传过来了。

杜勒斯就使用国协会问题发表了一个相当正确的声明，完全符合已经商定的条款，但是在解答“补充问题”时出了漏子（象往常一样）。他说，美国船只如果受到阻拦，它们将不会再重复静候通过运河的做法。不会的。它们将绕道好望角。<sup>②</sup>

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美国政府所犯的大错，他们好比一手给人东西，另外一只手又把东西拿回去。这一次仍然是只要用一句“无可奉告”就能守住阵地，让埃及人去猜测。“盖茨克尔在它的总结发言里当然大事利用这件事情……首相也弄得有点狼狈。”<sup>③</sup> 盖茨克尔利用美国人的表态来推销自己的新政策：“绕道好望角，订购或者自行修造大型油轮，忍受额外的开支”。这一切的结果是，  
126 当有人打断他的话，质问说如果使用国协会的活动被迫中止的话

---

①②③ 1956年9月13日。

我们准备怎么办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回答说：“如果埃及政府不履行义务，我们就提到安全理事会去。”

这一下子，社会党议席上发出一片喝采声，保守党议席却一片静寂，当然，动摇派分子除外……。幸亏首相仍然照着发言稿结尾部分原来就比较强硬的提法讲下去。这些话虽然和刚才他说的在逻辑上有些矛盾，但是看来还稳住了阵脚，显示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sup>①</sup>

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女王陛下政府是否将保证在问题提交安理会之前绝不使用武力？如果这指的是绝对的保证，那么，无论我或者政府席里任何一位英国大臣，都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因为，任何人也无法预言纳赛尔在运河或者在埃及还将采取什么行动。

但是，我愿意作出目前情况下任何政府所能作出的最明确的答复，这就是：如果形势许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当然准备把这类性质的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我想，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作出比这更进一步的回答。<sup>②</sup>

我认为盖茨克尔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艾登是在十点差三分钟讲完回自己座位的。既然首相已经作出了这样的保证——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被迫出来的保证——盖茨克尔本来应该不动声色地站起来，要求撤回自己的动议。要是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己爱国的声誉，因为他毕竟遵守了传统：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反对党应该顾全大局尽力协助在任的政府。他既赢得了关于安理会问题的这一分，说来奇怪，他又可以帮助政府去做反对党最近六个星期来一直要求做的事情。

盖茨克尔在辩论以后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责备政府关于使用武力问题的立场前后矛盾和含糊不清。 127

<sup>①</sup> 1956年9月13日。

<sup>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9月13日。

首相为这事给我打来了电话，看来他十分关心。我对他说，盖先生采取这样的方针，我倒放心多了，因为这样就完全推翻了那种认为首相已经“撤回原议”的说法。我建议首相发表一个声明，说“除了首相和外交大臣已经在辩论中发表的意见，女王陛下政府没有什么需要补充”。报刊舆论自然会认为盖先生是个十分幼稚和很不慎重的政客。难道有必要把我们手里每一张牌准备怎么打法事先都告诉纳赛尔吗？<sup>①</sup>

事情如此捉摸不定，储备所受的压力当然开始起作用。我和财政部的同事以及各方面的官员，包括英格兰银行的代表在内，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当前市场的形势。

我们决定不顾代价多高，继续支持“可兑英镑”——至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结束以前要这样做。普遍的意见认为我们必须设法“乘风破浪”，动用我们的储备来维护英镑。第二次会议（出席的人大体和上次一样）是讨论要求美国人放弃部分债权的问题。各种方案都研究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华盛顿进行一下这方面的谈判，但是我认为11月6日〔美国总统大选日〕以前一定不会有多大的结果。<sup>②</sup>

第二次伦敦会议将在几天内开幕，目的是成立使用国协会。现在我们已经认定，只要使用国协会一成立，我们就应该马上“上安理会去”，但是还得等待杜勒斯9月18号到达以后商量一下。这天晚上，

多罗西和我在美国大使馆吃晚饭。饭后，福斯特·杜勒斯、索尔兹伯里勋爵、美国大使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尽力使杜勒斯相信必须采取最强硬的路线。不过我有意不提要美国以贷款或其他方式从财政上支持我们的问题，以免分散他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注意力，也免得美国人有一个印象，以为我们已经放弃了（依靠武力或者通过谈判）使用运河的打算，准备绕道好望角了。虽然我们家里有社会党反对派和其他的失败主

---

① 1956年9月15日。

② 1956年9月14日。

义分子,我们还是千万不能让美国人以为我们正在软弱下去。①

过去三个星期里,我们的储备流失了大约一亿七千万美元,不过现在好象比较稳住了。当然,我还是害怕数字一公布,会给伦敦金融市场造成很大的震动。

9月20日我要到美国去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会议,这是我作为财政大臣应该去出席的。我还打算在那里和英联邦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商讨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动身的前一天,在一次会议散会以后,首相要我留下来单独谈一下。

我们无法知道使用国协会情况将会怎样,很多国家都有点害怕。不过福斯特·杜勒斯好象正在竭力把事情搞起来。首相告诉我说(他要我绝对保密,因为他不准备再告诉别人),议会党团首领向他报告了党内的一大堆麻烦。有人对使用武力连作为“最后手段”也反对——或者是害怕。②

艾登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所表现的沉着的信心,使我深为感动。他的勇气及精神上和体力上的力量使他战胜了所有困难。只有在小事情上他才有的时候发火或者不好相处。当前的问题是最重大的事情。看来他相当坚决。这是又一个1938年,他绝不会参预新的绥靖行动。

然后,我们谈了一下我将到华盛顿的访问。他似乎有点担心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是不是应该离开;可是我对他说,如果我取消这次出行,可能会影响对我们的信任,对此他表示同意。我离开一两天以后,英国政府就作出结论,认为现在有必要把苏伊士问题提到联合国,并且要求安理会召开一次会议。对这个决定,法国的部长们虽然有点勉强,但是出自他们一向对盟友的忠诚友谊,也表

---

① 1956年9月18日。

② 1956年9月20日。

示同意了。他们对这样做的效果有所怀疑，不过还是接受了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观点，就是：不管这个仪式怎么无效，反正需要走走过场，尽到礼节。第二次伦敦会议从9月19日起连续开了两三天，其他的国家看来显然欢迎在成立使用国协会的同时把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做法。我们的决定无论如何有一个好处，就是消除了政府和反对党之间争论的一个重要根源。我们在实际采取行动以前，当然详细通知了杜勒斯。当时他好象比较顺从，特别是因为使用国协会的计划并没有放弃。但是他拒绝在英法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联署”。我们9月23日发出了信件，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尽早加以讨论。当时多数人断定，后来也有很多评论家们硬说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没有提到安理会，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愿意，或者说是法国拒绝这样做。其实都不然。从一开始就反对的是杜勒斯，而且直到运河被强占已经两个月以后我们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表示同意。

我是9月20日动身去华盛顿，10月1日才回来的。在我出国的这段期间，除了安理会开始正式讨论英法和埃及分别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外，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讨论的第一阶段也纯粹是程序性的。

我当然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各种公开场合和私人聚会，尽量表达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忧虑和决心。我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我母亲的家乡印第安纳州。9月22日在布鲁明顿市接受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当晚在那里过夜。第二天到一个叫斯宾塞的小镇去，这是我母亲出生成长的地方，那里的人都还记得我外祖父乔舒亚·贝利斯博士。不过我到那里除了访亲问故之外，还有另外的目的。美国中西部是孤立主义传统比较严重的地区，人们保留着很多对“殖民主义”的记忆和成见，所以我决定

130 在这里坦率而自豪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

在州立大学里，我的演说主要是攀亲道故，表达情谊，谈到了我们两国是怎样同甘苦共患难，怎样一起战斗过来的。但是当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向一批主要是商人的听众讲话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直截了当谈起苏伊士危机来。我开始先介绍一下英国的经济情况，指出在欧洲国家里几乎只有我们一个国家靠自己作出重大的努力来认真偿还我们的债务和争取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目前，我们的预算有盈余，而且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税收用在防务上，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国家的自由，而且也是捍卫全世界的自由。

在叙述了我们这个岛国的经济形势，指出我们是依靠出口工业品来换取石油和原料等情况以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到当前的危机：

纳赛尔上校强占运河的所作所为，背后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对你们跟对我们一样地重要。当然，就当前来说，对我们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运河的管理、维护和通航自由，关系到英国的存亡，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只是英国，还应该加上西欧和苏伊士以东各国。

过去我们的经济是煤炭经济，现在呢？正在逐渐变为石油经济。我们的石油消费量在最近六七年里增加了一倍。我们的生存依靠着中东的石油供应，它占我们全部石油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当然，从理论上说，通过运河运来的石油也可以用西半球供应的石油来代替；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的美元支出将惊人地增加，而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额外负担。

因此运河争端的解决办法必须不致威胁到我们的石油供应。

这些话也许已经足以打动这些铁石心肠和头脑实际的听众，不过我认为还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谈，好让他们了解问题的关系多么重大。这场关于运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争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对你们跟对我们一样地重要”。美国已经帮助组织起一些庞大的防务体系，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集团等。

过去有句老话，虽然有点陈旧，但毕竟还是真理：只要有一环是脆弱的，整根链条便是脆弱的。如果欧洲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也要垮台。

所以说，这既是我们的事情，也是你们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我转而谈到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来提高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只有依靠英国、欧洲、尤其是美国才能做到。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要求你们国家的人民在这些国家大量投资呢？

显然，如果想使投资产生效果，必须保证契约的尊严。这些国家既然向我们要钱，就得守信义，而不能象纳赛尔上校强占运河那样行事。他事先不找我们谈判，一下子就撕毁了两个条约。

这种做法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所起的破坏作用，跟对比较发达国家的稳定所起的破坏作用一样地严重。

我知道慕尼黑和绥靖政策仍然是美国舆论憎恶的字眼。所以我特别强调我亲身体会到的软弱政策的危害性。我当然引用了盖茨克尔把纳赛尔比做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那句名言，此外还加上他所提的另外一个警告。

如果纳赛尔上校的威信大大地提高，而我们的威信却大大地降低，其结果就是我们在那个地区里的朋友纷纷离开我们，因为他们会认为我们已经输了。

是的，这一切过去都发生过。希特勒就是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树立起自己的地位来的。

首先是占领莱茵兰，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是很多人却说：“算了，这是他自己的领土，为什么不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132 然后是进攻奥地利。那些人又说了：“是啊，奥地利人确实是日耳曼人；如果他们想并到德国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之后就是捷克，接着便是慕尼黑。往下是波兰，最后就是战争。

每一次事件发生时，都有很多主张拖延的论据，但是拖延最后证明是致命的做法。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都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每一个阶段里我都反对软弱政策。这话也不是今天才说，以前我就讲过。

然后我又提到柏林的封锁，以及美英两国的迅速反应如何挫败了这次封锁。当然有人会争辩说，埃及究竟和德国或者俄国很不相同，它是个小国，没什么力量。甚至有人会说，就算纳赛尔得逞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关系大啦！如果事先不通知不谈判，契约就可以随便撕毁，财产可以随便抢走，那么在整個中东，包括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伊拉克、苏丹等等，将出现什么结果？新的革命将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共产主义力量将强大起来。

强占别人财产的胆子一定愈来愈大，不管是英国的、美国的、荷兰的，或者随便哪一个国家的财产，他们都敢抢。结果西欧无论如何得靠它过活的主要石油供应，还没等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控制权早就落入那些实际是苏俄卫星国的政权手里了。

接着我就用十分严肃的语气宣布我们绝不能让纳赛尔得逞。我不相信英国和美国会容许他这样做。我并不是说一旦我们失败了，那里就马上分崩离析，这也许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也许是几年后的事。但是一些不稳定的政府，或者犹豫不决的政府，本来愿意和我们友好，可能很容易受骗，或者容易被胜利的独裁者吓倒，早晚会被颠覆或者消灭掉。因此，必须制止纳赛尔，而且现在就制止他。

我的讲话被广泛地报道了，不但在本地见报，而且传遍美国东西两岸。这些话——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说给总统和国务卿听的。

23日是星期天，在参观了大学以后，



我们坐车到我母亲的“故乡”斯宾塞。我们受到一个接待委员会的热情欢迎。委员会里有几位老人，据他们自己说还记得我母亲和外祖父。美以美教会的教堂里挤满了大批男女老少，这座教堂早在我母亲在世时便用石头重修了，地点没有改变。我诵读了一段圣经——天才者的喻言——向大家讲了话，谈到我的母亲和她的祖辈。我心情激动得说不下去，好不容易才结束了讲话。我觉得母亲好象就在我身旁，高兴地看到她对我的殷切期待和远大抱负终于实现了。当我想起她对我的精心培育，想起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其艰辛简直难以言表。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集会，到场的人都非常亲切和富于同情。①

做完礼拜，我到城镇公墓我外祖父坟前献了花圈，他和外祖母，还有几个小孩同葬在一块合家墓地上。这个公墓位于怀特河高高的两岸上，显然是在这个小小的城镇出现的初期就开辟的——很可能是1830年前后。

这次对中西部的短暂访问，与普通老百姓的接触，使我受到了鼓舞。9月24日我回到华盛顿去会见他们的当权人，我们的命运正是主要掌握在这些当权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请我立即到白宫去的通知。我被领着从总统的专用便门进去。

总统看来身体十分健康，这使我很惊讶，因为在我们所看到的照片里，总统总显得苍老疲乏。不过，我相信这多少是因为经过无线电传真，照片有点失真。我在美国报纸上看到的照片里的艾登，也有点憔悴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反正总统的情绪不错。他气色很好，而且显然对选举很积极，兴趣很大，热望能取胜。他确实急于击退他的批评者。他正准备下午动身到衣阿华州作一次讲演。②

他的态度极其诚挚，我们就象从前在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

① 1956年9月23日。

② 1956年9月25日。

里谈话一样。他亲切地问到丘吉尔，并且花了不少时间谈论这位“伟大的老人”。

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他肯定说我们必须压倒纳赛尔，问题是怎么去做。我明确地表示，我们不能拖得太久，问题牵涉太大，我们拖不起——这就是说，如果长期拖延，就必须用美元买石油。①

然后我们转到防务问题和装备我们的“堪培拉”轰炸机携带原子弹的费用问题。接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新武装问题。由于我们方面的军队数量肯定比较少，我们的装备需要超过他们，所以，战术原子武器就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出现一种不利于我们的新情况。

由于我们不能使用威力巨大的氢弹，不敢冒全球战争的风险，所以小国可以讹诈我们。福摩萨、印度支那都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埃及又是这种麻烦。这些都要重新想个办法。②

接着他谈到联合国问题：

我们创立的这个机构，只要我们控制住它，那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恐怕不久以后即使我们行动一致也做不到这一点了。不管怎么说，美国为了联合国的票数，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给人经济援助，等等。他很担心往后几年里会出现更坏的情况。为什么美国、联合王国、德国和法国不能组成一个集团，在事情到达危机阶段以前就事先设法解决呢？③

总统的话题又转到国内政治。

他简直让有的批评者给“气疯”了。他们总是说过去这事那事办错了，或者给未来许下各种美好的诺言，可就是从来不说现在应该干什么。（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不把苏伊士问题作为竞选题目。民主党人根本提不出什么主张来）④

---

①②③④ 1956年9月25日。

然后就是一段人们熟悉的愉快插曲——打高尔夫球，总统借此显示了一下白宫花园的一个优越性。

这是一条狭长的“高尔夫球道”，但是是在栏杆外面，大约二百七十码远有一盏路灯。他可以瞄准这盏灯来发球，但是又伤不着灯。<sup>①</sup>

回来以后我当然把这一切都向艾登作了汇报。我告诉他，我强烈地感觉总统真的决心和纳赛尔干一场。当我给总统说明“慢慢来”给我们造成的经济困难时，他似乎很谅解。他还同意，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争取到一个明显的胜利。

上午十点半我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会议。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主要是听取主席尤金·布莱克做的一个令人钦佩的总结报告。

我明确地指出我们决心维护英镑的价值。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权在得到基金组织当局的正式批准后，从基金中提取大笔款项。此外，我们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我们对基金的美元投资作为向进出口银行或其他类似机构借取美元的担保。当时，不管情况多么复杂，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要给我们设置障碍，或者是英国的财政将无法取得充分的支持。

快到黄昏时我到国务院去和杜勒斯会谈。我由驻美大使陪同，杜勒斯带着一批顾问。彼此进行了一段一般性谈话以后，他把我领到一个私人的小房间单独谈话。在我离开伦敦以后，就宣布了英法要求安理会把苏伊士问题列入议程的消息，所以我事先就准备好要挨杜勒斯一顿脾气。果然，他感到受人亏待了。他的理解是，他离开伦敦的时候我们曾同意再拖一段时期暂时不找联合国。所以，当他听说我们没有和他进一步商量就作出了决定，感到十分气愤。他说我们到纽约去只会自找麻烦，制造灾难，此外则一无所获。（照杜勒斯说话的口气，你一定会以为他是在警告你别

<sup>①</sup> 1956年9月25日。

逛窑子去。)过了一会,他比较平静下来。他说,他了解我们是在压力136下这样做的,所以也不致于把这事再挂在心上。“纠缠往事”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必须想出最好的办法来摆脱联合国里的麻烦。

国务卿的这段谈话,我还有着详细的纪录。<sup>①</sup>根据他后来的一些行动,以及他简直是慷慨激昂地表示的对联合国事业的效忠——至少在公开场合里是这样说的——看来,这段话确实有点奇怪。接下去他又谈了对付纳赛尔的各种办法。他说使用国协会的新计划可能成功,不过当然需要有六个月时间才能见效。说到这里,我插进去说,我们可等不了六个月,当然除非纳赛尔不断地丢失面子。但是据来自中东的情报,情况却不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慢慢来”,运河通航税的交纳,便成了头等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杜勒斯给了我一点鼓舞。他们肯定可以让美国船只把通航税交给使用国协会,稍后,悬挂外国旗的美国人船只也可以这样做。

杜勒斯接着谈到大选问题。他承认苏伊士运河问题对目前的选举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因为共和党人对此不了解,而民主党人又很害怕这个问题。但是,他仍然希望在大选结束以前,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谈话的其余部分是关于美国给予英国财政援助的问题。他认为军事方面也可以帮点忙,并且说他已经给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去过电话,要他考虑是否可以放松一下偿还战后债务的规定。关于给予英国财政援助的问题,他嘱咐我严守秘密,看来他很害怕这类事情在大选期间透露出去。

在这次谈话里,杜勒斯除了要求我们在大选结束以前不要操之过急外,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否认我们有权在必要时诉诸武力,实际上是有点承认我们需要这样做。也许我本来应该对总统大选的日子更加重视。因为,尽管舆论一般都认为艾森豪威尔取胜将

<sup>①</sup> 1956年9月25日。

137 “易如反掌”，盖洛普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种看法，但是共和党总部可能还是有些紧张。

第二天，9月26日，开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午会议以后，我和乔治·汉弗莱谈了一次话。他的主要目的是建议我在总统选出以后，到美国来讨论一下如何对还债的规定作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修改，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苏伊士危机。他谈到了他和巴特勒共事时的友好关系，表示希望我们之间也能进行同样亲密的合作。他大谈美国经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这段长篇的独白就占去了会谈的大部分时间。他说最近八年来每年都流失黄金。对内对外的开支都太大了。只消费商品和劳务而不作出相应贡献的人太多了。

衬托着这一幅美国实力下降的黯淡而且迹近悲惨的图景的，却是汉弗莱微笑和安详的态度，这反映了他天生的乐观性格。由于他有丰富的商业经验，谈话充满精明老练的计算。他又引人入胜地谈了他建立私人产业的情形和广泛的多种经营；也谈到他对英镑区面临的问题的看法。就这样，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大约三刻钟。汉弗莱说话时那种动人的表情和潇洒而又友善的态度，使我对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何在有点糊涂起来。但是，他这时却提出一个主张来，说是我们两国政府应该重新制定一个全球性战略。我们现在花钱太多了，特别是用在援助和军备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加以重新考虑。另外一点是彼此花费的力量互相重复。我想，一定是总统或杜勒斯和他谈过这个问题，因为，他开始发挥起这样一个论点来，说我们在某些类型的武器问题上不应该互相竞争，而应该互相补充。最后，他十分强调地指出，美国必须帮助联合王国渡过一切难关。他说他意识到英国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英国遇到严重困难，美国的整个安全也将处于危险之中。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一个印象：这位财政部长可能是我们一个很有用处和强有力的朋友。因为他根本没有提到我们心里念念不忘的中东危机，我认为他一定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我不久就发觉是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以后两天的时间被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占去了。除了主要的议题——欧洲一体化——以外，还就纳赛尔上校给我们造成的财政经济后果进行了一番有益的讨论。

在回国以前，我拜访了两位老朋友、老同事——罗伯特·墨菲和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墨菲是国务院里有影响的人物，而且深得总统青睐。我重述了7月底在伦敦向他表示过的观点。史密斯是总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战时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总参谋长，白宫里没有人比他的影响更大。碰巧的是，他对杜勒斯不怎么欣赏，所以同情地听取了我不得不说的话，而且毫无疑问，一定把我的话传到适当的地方去了。

10月1日我到达伦敦时，知道使用国协会已经在一次由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主持、有十八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但是就在同一天，杜勒斯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先就殖民主义国家发了一通议论——这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无论如何也是离题万里的，因为殖民主义国家已经在着手赋予帝国领地以自由和独立——然后就讲到美国对问题的看法与英、法的传统如何如何不同。当“脱离殖民主义”之风正盛时，这种不同看法当然导致美国政策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这个“脱离”过程，他毫无根据地估计为五十年。接着杜勒斯竟然给自己作出判决，要杀死亲生的孩子。事情是这样的：记者们问他，究竟使用国协会有没有真正的实力，这个计划是否有真正的牙齿？你猜他怎么回答：

现在有人在谈论说这个计划的牙齿被拔掉了，可是就我所知，它本 139

来就没有什么牙齿。①

甚至一向不偏不倚的《年鉴》编者也认为：

杜勒斯先生在他本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似乎已经从他原来在伦敦提出的关于协会宗旨和权力的建议大步后退，以致于这个协会是否还有什么用处值得怀疑了。②

但是，塞尔温·劳埃德抱着百折不挠的勇气，在主持完这个已注定要垮台的使用国协会一次正式的、但是毫无成果的会议以后，立即动身到纽约去，和法国的外交部长皮诺一道，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我们的控诉。

联合国的审议持续了八天。公开辩论的情况和各国代表发言的内容，可以从报章和外交部的电报里详细地了解到；可是复杂微妙的私人会谈，虽然有外交大臣的个人汇报，情况也不容易及时弄清楚。在杜勒斯的要求下，劳埃德同意除了安理会的正式会议外，还要另外举行秘密会议和由各主要国家进行私下谈判。

第一天，10月5日，塞尔温·劳埃德在公开会议上作了出色的发言，提出了英法的决议草案。这个发言虽然措词温和，实质却很强硬和坚决。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几天后发表的一篇重要声明里借用了其中的一句话：“联合国宪章认为，不维护正义和国际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皮诺也用了类似的词句。

其后的一两天里有不少的唇枪舌战。塞尔温·劳埃德再次向杜勒斯提出紧急要求，要他采取措施制止不论是悬挂美国旗帜或者其他旗帜的美国船只向纳赛尔交纳通航税。但是国务卿仍然搪塞了事。虽然《圣经》里告诫我们要宽恕我们的朋友，但是我实在感到很难谅解或原宥杜勒斯的态度。使用国协会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剥夺纳赛尔用非法行动取得的收益。如果美国人明确宣布他

① 阿翁伯爵前书，第499页。

② 《1956年年鉴》，第49—50页。

们的决定,就会给埃及的代表和埃及政府以重大的影响,可以使纳赛尔懂得他真正面临着丧失其利益的危险。现在,纳赛尔免除了这种忧虑,而且看到美国政府这样动摇不定,当然觉得自己力量很足,完全可以抗拒安理会,甚至加以侮辱。10月7日他就在开罗宣称:“联合国如果支持英法的国际共管计划,它就要彻底垮台。”<sup>①</sup>

埃及人长期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这显然是不合法的,然而他们毫无后悔的表示。我们从某些报告里听说,他们居然嘲笑说,如果苏伊士运河要受国际管制,别的类似水道也需要同样对待。这就触及美国人的痛处。事实上巴拿马运河的法律地位和苏伊士运河确实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取得巴拿马运河所用的方法,如果是出自一个比较老牌的国家之手,肯定会被称为最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

英法的决议草案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安理会上最后以一致票通过。它规定六项原则,作为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遵守的必要条件,这些原则主要取自杜勒斯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1) 运河应允许自由航行,向一切船只开放,不得有任何公开或暗中的歧视。

(2) 埃及的主权应得到尊重。

(3) 运河的管理应不受任何国家政策的影响。

(4) 通航税和其他费用的收取办法,应由埃及与使用者之间协商确定。

(5) 运河收入应拨出合理份额供发展之用。

141

(6) 苏伊士运河公司和埃及政府之间如发生争议,应经仲裁解决。<sup>②</sup>

---

① 赫尔曼·芬纳前书,第298页。

② 阿翁伯爵前书,第504页。



第二部分也同样重要,艾登曾经明确无误地概括如下:

决议案的第二部分指出十八国的建议符合于这些必要条件,并且提请埃及政府提出自己对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它要求埃及、法国和联合王国的政府继续交换意见。它还规定在谈判期间运河应允许一切船只自由通航。……它还进一步指出:使用国协会将收取其会员国船只所缴纳的通航税;埃及国有化当局应与协会进行合作以保证运河得到完善的管理。<sup>①</sup>

如果决议的这一部分也能一致通过的话,不但可以给解决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航的问题确立一个准则,而且会使决议的第一部分有实际的效力。

在劳埃德和皮诺发言以后,埃及外交部长马哈茂德·法齐做了一个搪塞性的,但是颇为巧妙的回答,他企图煽动各种过时的反殖民主义偏见。他争辩说,这是一场奴役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是十九世纪旧的唯物主义与二十世纪新的理想主义之间的斗争。不过,他提出一个表面上有些吸引力的建议,主张成立一个谈判机构,并且立即开始讨论这个机构的组成与开会的地点和日期。当然,这仅仅是回避问题。根据过去这几个月的经验,这实际上就是建议“谈判如何进行谈判”。也许他的发言比较动听的一点就是吹嘘运河被强占以后管理如何成功。

142 法齐是个标准的滑头掮客(真的,人们说他比泥鳅还要滑),而居然敢嘲笑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看来这说明他有一种不寻常的信心。我当外交大臣的时候就和法齐见过面,觉得他是个小心谨慎的外交官,除非对自己的立场有足够的把握,不然他是不会轻易显出那样凶狠好斗的。吉本<sup>②</sup>曾经引用一位罗马政治家的话,

① 阿翁伯爵前书,第504页。

②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英国十八世纪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译者

形容埃及人的性格是“别人的仁慈，很难打动他们；别人的威力，却极易使他们陷于恐惧”。什么原因使法齐对自己的立场这样信心十足呢？不论英国或者法国的政府，在公开场合和私人会晤中都毫不隐讳自己的决心，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作为最后手段来维护自己和其他海运国家的权利，以及在中东恢复和平与秩序。英联邦各国的观点，也已经在仅仅一周前由孟席斯有力地表达了。甚至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也已经宣布，一旦其他办法都失败，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一定是有两件事情法齐对之有充分的把握，这就是：苏联政府将给埃及以充分的支持，而一旦到了关键时刻，美国则必然吓破了胆。所以法齐才敢于特别刻薄地讥笑杜勒斯。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看到有关他发言的报道时，我心里多么难受。他尤其胆大包天的是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中说那样的话。不过，他毕竟抛出了一个关于进一步谈判的模糊的计划，并且准备在私人会谈里作进一步的说明。

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用最恶毒的苏联式谩骂来款待他在安理会里的同行以及安理会以外的世界听众。我因为对俄国人的争论方法有过一些经验，早就懂得：许多随意播弄的头衔，象“腐朽的剥削者”、“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资本家走狗”，等等，都只能看作荷马式的形容词，照例安到相应的名词前面。一旦进入私下会谈时，他们自然会使用比较平静和正常的语言。所以，谢皮洛夫的辱骂，我并没有当成多大一回事。可是美国代表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对这些攻击特别敏感，不断地发表声明来反驳俄国人的非难。美国政治家不仅在当时，而且一直到现在都对外界的批评异常敏感，总不想让人误解。他们渴望得到同情。我常常对我的美国朋友们说，既然老式的大英帝国已经完结，而美国人不但继承了我们的遗产，而且也承担了我们原来的责任，他们就只好忍受别人的憎恨。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既是特权，也是惩罚。为了安慰他

们一下，我还提醒他们说，现在外国人所说的关于美国人的坏话，比起多少年以来美国人对乔治三世的议论，或者是那些被扔进波士顿海港的一箱箱不幸的茶叶所受的待遇来，都不算厉害。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总是希望人家喜欢他们。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无论是埃及人的目中无人还是俄国人的无礼谩骂，在目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因为杜勒斯被气得发言比我们所敢期待的还要激烈，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他是在10月9日进行答辩的。在列举了各种谋求和平的建议并且称赞了各主要有关国家的耐心以后，他表示完全支持我们关于运河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的观点。本来埃及人自己曾经多次同意过这种解释，就在安理会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埃及代表还作过承认我们整个论点的声明。杜勒斯很成功地引用了这个代表的一段话：

管理航道的运河公司是一个国际性公司，它由一个既不属于埃及、也不一定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当局管辖。这是一个全球性公司，将来运河仍将按这种方式管理。<sup>①</sup>

为那个主要是他自己起草的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的声明，杜勒斯作了热情而有力的辩护。其中有一句话给了在场的人以及世界上渴望听到他意见的人很深刻的印象。他说：如果运河被用来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工具——例如，它已经被用来反对以色列——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处在达莫克利斯经济之剑<sup>②</sup>的威胁下”。他也没有上谢皮洛夫和法齐那个伪善建议的圈套，不同意“建立一个根据它的组成情况我们事先就可以肯定它永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委员会”。他在结束讲话时宣布美国将投票赞

① 赫尔曼·芬纳前书，第304页。

② 达莫克利斯的剑：传说叙拉古国王狄奥尼希斯邀其佞人达莫克利斯赴宴，在他的头顶上空用一根头发悬挂一把剑，达莫克利斯如坐针毡，恐惧万状。——译者

成英法的提案。

现在,全体大会休会了,开始进行私下的会谈和商讨。暂时一切都还顺利。杜勒斯坚定地站起来支持我们,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一旦关键时刻到来,美国人民是会积极支持或同情我们的。有些批评我们的人硬说,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气不可遏,热衷于报复,所以错过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大的让步。达格·哈马舍尔德出席了私下会谈(杜勒斯也参加了),他尽力争取大家接受关于运河管理的六项原则。拟定伦敦建议的十八国的代表也为此进行会晤,听取会谈的进展情况和提出自己的意见。塞尔温·劳埃德不愧是一个出色而有建设性的谈判代表,他怀着争取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真诚愿望,代表自己的政府作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我们同意运河由埃及政府“管理”,条件是要建立一个代表使用国的委员会,它有权参与制定和监督有关运河的通航税、发展、船型、歧视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必须有这样一个谅解,就是:如果埃及政府不执行业已商妥的规定,委员会可以“自行”采取行动。这些原则很不错,完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执行。如果这些原则被置之不顾,或束之高阁,国际委员会必须有权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这个计划必须有点“牙齿”。这个谘询机构如果在自己的意见不受尊重时无权采取补救措施,它就毫无意义了。

同意由埃及人管理运河,否定原定运河公司的权利,这是一个真正的让步。它比我们的朋友所同意的让步走得还要远。但是,对这样一个让步,法齐作出的回答也不过是几句漂亮话。

也有人争辩说,埃及人本来可能同意在发生争议时把案件提交联合国或者国际法庭。在安理会上他们是相当保险的,因为有一票否决权可以依靠;国际法庭就不同了,它缺乏有效的办法来强制执行它的裁决,而且不论什么案件一般都是经过长期拖延才作

出裁决的。

因此,当安理会正式复会时,除了各国政府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以外,什么事也办不成。塞尔温·劳埃德再次作了有力的发言,指出英法政府的行动一直是忍让和克制的。斯巴克也作了给人深刻印象的发言。澳大利亚的代表表示坚决支持英国的立场。杜勒斯仍然希望使用国协会问题能够搞出点名堂来,但是却又回避交纳通航税这个最关键的问题。10月1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巧是由皮诺任执行主席。在杜勒斯发言以后,皮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决议案提付表决。

英法提案的两部分是分别表决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原则的那部分,一致通过了。第二部分有九个国家投赞成票,两个国家投反对票——俄国和南斯拉夫。由于这个表决结果将使提案的两部分都有效,所以俄国人使用了否决权。《年鉴》用简洁的语言说:

“就这样,安全理事会摆脱了对这件事情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义务;埃及则摆脱了尊重大多数国家意见的义务。”<sup>①</sup>

与此同时,使用国协会本身也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船主还是向开罗交纳通航税。协会本身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机构。美国在伦敦的代表仍然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在银行开设收取其他国家交纳的运河通航税的账户;关于通航税怎样分配,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使用国协会这个杜勒斯的智慧的产物,虽然为第二次伦敦会议所一致接受了,而且大家对它寄托很大的希望,却终于逐渐陷入无能状态。

146 几个月来,纳赛尔一直在实施他的泛阿拉伯纲领,在他心目中,这个纲领意味着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甚至非阿拉伯国家里的所有阿拉伯人,全都统一起来归他领导。很多比较有经验的阿拉伯

<sup>①</sup> 《1956年年鉴》,第49页。

领导人,对于他的非宗教倾向和他与共产主义的勾搭,都存在一些戒心。象沙特国王一类的当权人物,都察觉到自己没有石油的埃及正在垂涎欲滴地注视着用沙特阿拉伯油田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约旦国王当时和现在一样,都一直处在互相敌对的两方面力量的争夺下;不过,因为约旦与英国有长期的联系,而且它是一个没有英国经济上的支持便生存不下去的国家,所以总是希望尽可能抗拒埃及危险的拥抱。叙利亚是无可挽救地分裂了。只有在伊拉克,我们还有两位继承了王室优良传统的国王和他的叔父可以信赖,还有首相努里·帕沙的才智也可以指靠。

在这整个地区里,比较明智的阿拉伯人都对1955年苏联的军火买卖有不少议论。1956年7月强占运河的行动,虽然颇为吸引公众,但是各国的当权人物却以疑虑的眼光看待它。第一次伦敦会议后似乎要采取的强烈行动,也使他们更加不安。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显然不会让纳赛尔“得逞”。但是,第二次伦敦会议的毫无结果,使用国协会明显的无能为力,使他们逐渐怀疑起来;安全理事会的无所作为,更加强了他们的这种看法。早在9月底,纳赛尔就成功地迫使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发表一个支持他的联合声明。尤其不祥和令人不安的是,以色列的所有邻国,包括叙利亚、约旦和埃及,不断地侵犯以色列的领土,使以色列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这种进攻长期以来就时断时续,现在变得更为频繁了。加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突击队”,也就是志愿的潜入者,他们采取新的袭击方式,愈来愈不好对付。显然,这些袭击是三个国家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协调进行的。以色列必须进行报复,否则就只好灭亡。以色列有可能对约旦采取军事进攻行动,当然使我们深为忧虑。不幸的是,破坏性最大的一些袭击,大部分是在纳赛尔领导下从约旦发动的。我们负有保卫约旦的条约义务;约旦因为没有强大的

147

形容这个局面是“一场很容易成为事实的恶梦：约旦向纳赛尔和我们求援，纳赛尔又向俄国求援，法国却站在以色列那一边”<sup>①</sup>。我们被迫在10月12日向以色列提出警告：如果约旦受到大规模进攻，侯赛因国王根据条约要求援助的话，英国将不得不帮助它的盟国。同时，我们又尽力说服与以色列关系比我们密切得多的法国，要它也警告以色列不管来自约旦领土的袭击如何严重，也不要因为这种挑衅行为而向约旦采取正式军事行动，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纳赛尔“得逞”的可能性愈来愈明显，袭击活动也日益频繁。现在，“突击队”不但从约旦和叙利亚发动袭击，而且从加沙地带出动；他们在那里作好准备，然后潜入以色列，给以色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纳赛尔居然公开声言“他将选择适宜的时机和地点进行总攻击”。毫无疑问，埃及现在已经置自己于侵略者的地位，甚至在这个地区执行任务的联合国当局也这样认为。显然，

埃及正在纠集同盟者，储存苏制武器，接受苏联技术援助，加强宣传和加紧进行袭击活动。强占运河所冒的风险，已经平安无事地在谈判解决，现在，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个目标在作准备。<sup>②</sup>

与此同时，开罗电台不断地进行愈来愈恶毒的宣传。

苏联的武器正在源源运抵叙利亚；而且，我们在伊拉克的朋友虽然暂时还坚持住，但是如果纳赛尔果真达到他所声言的消灭以色列国的目的，他的威信将大大提高，以致我们的伊拉克朋友也抵挡不住。十八个月以后，他们中许多人终于被纳赛尔密使唆使的人所杀害。

148 如果说我们因为对约旦负有条约义务而担忧，那么我们的法国朋友对纳赛尔的宣传在法国北非领土的影响，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也感到同样的不安。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只要使纳赛

① 阿翁伯爵前书，第512页。

② 同上书，第516页。

尔倒台，就可以明显地解除法国在地中海南岸长期保有的阵地所受到的压力；连戴高乐将军那样坚强的人后来也终于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压力，被迫放弃这些对法国关系重大的阵地。这时候，法国之所以决心抵抗，当然不仅是着眼于运河本身被强占，而且担心纳赛尔在埃及境外的政治活动。实际上，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着的。和我们的反对党领袖一样，法国看到了和墨索里尼、希特勒类似的历史人物。如果纳赛尔开始时可以无视欧洲各国对他强占运河的抗议，然后又成功地消灭了以色列，那么，阿拉伯世界的其余部分将很容易就归他掌握。所有的国王和王室人员，世袭的贵族，甚至经过比较民主的方法选举出来的部长，所有这些人，连同来自产油地区的巨大财富，都将落入他手中。当时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是时间毕竟表明并非如此。

艾登曾经描述了他和最接近他的一些人在这段危机时期所经受的种种焦虑。联合国辜负了我们。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友好，但是看来不可能执行任何明确而一贯的政策。总统不但忙于选举，还为自己的健康分心，似乎并不想出来带头。根据我过去对他的了解，他的想法一定是对我们友好的，但是不管他的想法如何，反正他不会下什么决心。有时候我简直以为他和杜勒斯两人一定是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了，而且我真的有点相信如果我们采取强烈的行动，俄国人出来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我们在国内的人都丝毫没有这种顾虑，从艾登给我看的俄国领导人的来信来看，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他们会想方设法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给我们制造麻烦，他们会用武器和金钱来帮助纳赛尔，并且公开支持他；但是他们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决心避免发生一场双方都不可能成为胜利者的冲突。只是到了后来，看到美国已经转 149 过来反对我们，英国和法国已经被抛弃了，俄国人才进行更加凶恶的恫吓。



10月的下半月，问题显得紧迫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英法是不是应该给纳赛尔下一道最后通牒，而且在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派遣军队去占领埃及呢？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意图告诉美国政府？是和他们商量呢还是只是通知他们？在这点上我承认我判断错了。我认为美国政府尽管会公开责备我们的行动，私下里还是会同情的，所以他们将仅限于作形式上的抗议。我从许多美国朋友那里了解到，他们也渴望看到纳赛尔垮台。虽然事实证明这是我自己判断错误，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的舆论在事件发生后竟然变化得那样快，而且后来却又有那么多的美国最杰出最著名的舆论界领袖跑出来责备我们不把苏伊士的军事行动进行到胜利的结局。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供抉择的办法，那就是彻底投降，不仅放弃运河，而且放弃西方在中东的威信；抛弃我们在这整个地区里的老朋友，抛弃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手打败土耳其而解放出来的那些国家，它们的许多政治家和舆论界领袖都曾经忠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实行这个办法的结果将使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泛阿拉伯主义变为现实，欧洲的右翼防线将从此易手。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上述的这些考虑，我们密切地注视着中东的形势发展，并且在经过再三的研究以后，决定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发展。

一连串的事件发展得很迅速。10月23日埃及和叙利亚成立了一个由埃及领导的联合司令部，这不过是把已经在进行的活动公开化罢了。两天以后，即10月25日，约旦加入了这个联合司令部。这是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最后一着。以色列本来就不仅受到经济抵制，而且在地理上也受到封锁。它既不能通过运河，也不能使用自己在红海的滨海港口埃拉特。它这时又受到入侵的威胁。扼死以色列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150 对于周围紧紧的包围圈以及面临的被纳赛尔指挥下的优势军

队和武器所消灭的危险，以色列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它在10月27日总动员，29日攻进西奈半岛。十一年以后，几乎重演了同样的历史，他们发动著名的“六天战争”，取得了胜利。的确，两次战事惊人地相似。毫无疑问，正是侯赛因国王1967年夏天对开罗的访问以及他和纳赛尔的亲密拥抱，促使以色列人作出与十一年前一样有根据的结论，并且立下与十一年前一样震惊了许多批评者的决心，不当屠宰场上的牲畜，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末日，而是先发制人，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正如艾登对头一次事件所作的冷酷的评论：“一个临刑的无辜者，如果在绞索套上脖子之前大打出手，是无可责备的。”<sup>①</sup>

英法政府因为事先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作过研究，所以很容易就确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这就是：呼吁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从运河撤退各自的军队。如果任何一方拒绝执行，英法军队将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的关键阵地。如果在十二小时内有一方或两方政府不表示接受这些要求，英法军队将以必要的力量进行干预。

最后通牒是10月30日发出的，当晚8时，艾登在下院发表了简短的声明。在休会后的辩论中，盖茨克尔和反对党的其他领袖主要只是要求政府保证在再度诉诸安理会之前不采取军事行动。由于艾登拒绝作出这项保证，在经过两小时辩论后，问题提付表决，政府获得了正常的多数票。奇怪的是，当时工党发言的议员似乎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不要采取任何违背以色列利益的行动。

同一天，艾登在与前来伦敦的法国部长们会谈之前和之后，先后发出两封电报，把我们决定采取的行动通知美国总统，就我们没  
151  
有经过充分协商便迅速行动表示歉意，并且希望美国政府给我们以全面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封回电是不错的。他虽然表示

<sup>①</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523页。

不安，但是提出两国政府应迅速会晤交换意见。当天总统知道英法给埃及和以色列的照会所提的条件以后，又打来一个电报。即使在这个电报里，他也只是表示深切的忧虑，说他相信问题终将以和平方式解决。

10月30日当天，美国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急急忙忙地在安理会上提出一个实际上是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撤退到边界线自己一边，并且呼吁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避免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对这个提案，英国自从参加联合国以来第一次使用了否决权。当然，国务院使出了它的全部力量，争得了七票赞成。我们和法国人投票反对；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弃权。俄国人这时候机灵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它实质上美国的草案相同，不过删掉了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段落。我们的大使本来倾向于让它通过，但是因为法国代表决定使用否决权而且时间紧迫，我们和法国的代表都没有机会请示本国的政府，为了维护英法的团结，我们两国采取了一致行动，都使用了否决权。

我们的代表皮尔逊·狄克逊一直保持高度的尊严和灵活性。相反，美国的正式代表卡伯特·洛奇却心怀敌意，感情用事。他成了联合国的头号风云人物，出人意料地积极。有的观察家解释说，他之所以表现这样热心，是为了抵偿他祖父在上一代里的所作所为，原因是他祖父，另一位亨利·卡伯特·洛奇，曾经带头反对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从而阻止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sup>①</sup>另外一些观察家则把这位孙辈的狂热归因于他的新英格兰传统，特别是他的波士顿传统。他确实对英国抱有成见。他没有忘记1776年。

152 他有点象古密芝夫人<sup>②</sup>一样，“老是想起那位‘约翰叔’”——这里

---

① 赫尔曼·芬纳前书，第375页以下。

② 古密芝夫人：狄更斯所著小说《大卫·考柏菲尔德》中的一个贫穷孤独的寡妇。——译者

指的是乔治三世。

10月31日，以色列接受了英法的照会，埃及却拒绝了。因此，就在当天，埃及的军事目标受到从塞浦路斯出动的英法轰炸机的袭击。

现在，无论是军事危机或政治危机，都充分暴露了。接下去是一个紧张和激动的星期。这是我一生中经历中最奇妙也最考验人的一个星期。它正巧和慕尼黑相反。

政治问题一般是不容易引起英国广大人民群众很大的冲动的。工业争端和经济危机日益扩大，税收急速提高，生活费用不断增涨和货币不断贬值，他们都能忍受，顶多发点一般牢骚。当然，他们也各自采取一些补救办法来对付这些灾难：如果属于工资收入者或者薪俸阶层，就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薪俸；如果是依靠养老金或者所谓不劳而得的收入的，就采取权宜的办法，变卖东西，搞股票投机，或者最后不得已移居国外。他们总是默默地、不动感情地承受这些负担。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完全冲破了我国人民的沉默和忍耐，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感情，甚至是狂热的反应。在过去的年代里，引起这种危机的一般是宗教争端。革命<sup>①</sup>以后最强有力和最有成就的一届政府，是被一篇布道词搞垮的。马尔巴勒的所有战功竟敌不过萨谢弗雷尔长老的一席雄辩。我甚至终生也会依稀地记得1902年那些反对鲍尔弗先生提出的教育法案中某些规定的人，曾经掀起多么激烈的感情，隐约记得约翰·克利福德博士组织的消极抵抗运动的情景。后来甘地就是效法他的榜样搞起消极抵抗来的，不过规模更大吧了。但是，最近这些年代里，使全国陷入剧烈的争论，使一些家庭分裂和长年挚友分手的，却是外交政策问题。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触动了 153

---

<sup>①</sup> 这里指1688年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译者

深刻的感情,以致老朋友之间暂时地或者就此永远地分道扬镳,家庭各奔东西,党派组织发生严重危机,牵涉的不只是那些正常与政治争论有关的人,而且是广大的居民。慕尼黑事件便引起过这样的情绪,而大约二十年以后,则是苏伊士问题。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下院几乎是连续地开会,而且往往争论十分剧烈。有时是利用休会程序,有时是用不信任投票或其他程序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各方情绪都很激动。政府大臣们的发言,特别是首相的讲话,不断地被打断。有一次,议长为了使会场情绪冷静下来,不得不中断会议半小时。艾登和塞尔温·劳埃德虽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急务,仍然以惊人的精力承受着这副重担。在这段剧烈斗争期间,我主要是忙于财政部的事情,而且反正没有要求我参加各种商讨,所以除了坐在政府席上给同僚们一些精神上支持以外,我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在议会外,艾登11月3日作了一次广播演说,收效很大。盖茨克尔有礼貌地要求进行广播答辩。他的演说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虽然有些歇斯底里,但是由于态度还比较真诚,也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企图诱使保守党人推翻首相,并且答应支持任何准备遵从联合国要求的继任人。有两名低级大臣,安东尼·纳丁和爱德华·博伊尔提出辞职;保守党的其他议员中也出现某种犹豫的迹象。在这点上我们倒要感谢盖茨克尔,因为他的圈套太明显了,连我们这一边的怀疑派托马斯分子也不愿意上当。对爱德华·博伊尔的辞职,我特别感到遗憾,因为他作为财政部的经济次官,是我一位勤勤恳恳、工作出色的同事,我对他的才智和品德都十分敬重。

丘吉尔在退休以后,从来没有干预过任何有争论的问题;但是,这次却在11月3日发表了一封意义重大的信件,表示完全支持政府的政策。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也许是这样一句话:“我深信我们的美国朋友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为共同的利益而独自

行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sup>①</sup> 我们的确希望这句话能给目前采取这样凶狠态度的美国政府一点影响。丘吉尔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都是首当其冲，而美国人后来也被卷了进去；希腊的情况也是这样。1944年我们为了从共产主义威胁下拯救希腊而采取了行动，美国国务院和大部分美国报刊都曾经猛烈地反对，但是，过不了几年，美国就承继了我们的地位。在中东问题上，在短短几个月以后，情形又是这样。

英国的报刊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另外还有一些则标榜中立，装出一副天性高雅、知识渊博的样子。在一场剧烈的争论里，双方都最气愤这种态度。到了联合国的形势明朗化以后，大家的情绪就更为激动了。盖茨克尔责备艾登藐视联合国大会，在盖茨克尔看来，联合国大会的权威好象有点神圣不可侵犯。可是今天呢？连工党的政府也学会了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不符合自己心意时便置之不顾了，例如，联合国大会曾经庄严地呼吁英国从直布罗陀撤退，工党政府就没有执行。但那时工党政府得到了我们的强有力的热诚支持。当美国的压力加大，俄国与美国间奇异的联合公开化以后，保守党这方面的愤怒简直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

我走出白厅辖区的时间并不多，但是那怕只离开几小时到外面跑跑，就发现这种尖锐的争论已经扩散到平常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如俱乐部、酒吧间、大街上和地下火车里。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人在热烈地争论——有的倒还客气一点，使用有礼貌的语言，但是更多的是用家常的直截了当的语言来争论。这种盛极一时的互相怨恨一直散布到私人家庭里，甚至在这场危机结束以后很长时间里仍然没有消失。象在慕尼黑时候一样，彼此之间的争吵搅乱了私人生活的宁静，在有的情况下甚至使老朋友之间永久地疏远，我自己就遗憾地有过这种亲身的体会。

<sup>①</sup> 《1956年年鉴》，第52页。

155 各个政党的立场也很奇怪地颠倒过来。在慕尼黑时期支持过张伯伦的保守党人，这一次大部分都拥护艾登。当然，热烈的程度并不一样。我发现，那些最强烈地反对慕尼黑政策的党员，这次是政府政策最热心的拥护者；而那些慕尼黑派却多半是动摇派或者反对派，这倒是合乎逻辑的。不但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是这样，而且普通人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在1935年至1939年曾经藐视和贬低丘吉尔的人，现在仍然照样轻蔑艾登。虽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社交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事隔二十年以后，在只要仍然有可能举行盛大社交活动的家庭里，你就可以听到与前一代所流行的观点十分类似的关于绥靖政策优缺点的种种意见。

最使人奇怪的恐怕还是自由党和工党里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里。盖茨克尔和他的同僚们简直以一种信奉教皇权力至上主义的狂热在宣扬一种新的教义，认为只要是联合国，不论它是安理会还是会员国大会，都是绝对正确的。在这一点上，1956年的盖茨克尔和1870年的红衣主教曼宁很相似。工党议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求采取强烈行动，现在却又反对这种行动，前后两种做法是很难协调的。那时候，他们叫嚷“起来反对希特勒”，“绝不让墨索里尼得逞”，十分热诚地反复号召使用武力，连平常最不喜欢战争的阶层也起来响应他们。三十年代进步的政治家和左翼报刊每日每时都在责备绥靖政策，要求显示力量和决心。但是，根据他们这一次的态度来看，如果那时张伯伦政府真的接受了他们的劝告，他们又会采取什么立场呢？设想一下这个问题倒是颇为有趣的。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兰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反击的最好机会，也许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但是，如果英法政府当时动手用武力来制止他，难道工党和自由党的批评家们  
156 会听从政府的领导吗？他们不会对我们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提出怀

疑，对我们按照国联章程和国际法是否有权这样做提出质问吗？既然他们现在敢给纳赛尔辩护，说运河是埃及的，纳赛尔不过是在实现合法的民族抱负，那么，当时他们难道不会照样给希特勒辩护，说希特勒是民族领袖，说莱茵兰是他的领土吗（用那时候流行的语言说是他的“后院”）？大概我们会挨一顿教训，教我们学会对新兴的民族运动表示友好和谅解吧！但是，由于1936年没有反击希特勒，我们付出了将近两千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同样，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进攻，本来也只能用武力来制止。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任何经济制裁，即使是石油封锁，也是无效的。但是，出动海军切断墨索里尼横渡地中海的交通命脉，总还是很容易奏效的，可惜这将是国联当局所不会容许的侵略行为。盖茨克尔在1956年的8月初，有一段时期似乎已经懂得了历史上的这些教训，可是很快又把它忘掉了。

也许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些不合逻辑的现象，所以尽管我们有现代严格的政党制度，我仍然感觉到下院里有某种不安定的气氛。有一批工会会员，很不喜欢他们领袖的那种刻毒的做法，而且出自他们天生的爱国主义情绪，对这些领袖们发言的调子和态度很不满意。另外，有一些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过长期密切联系的工党议员，又十分同情以色列的政府和人民。我们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不久，彻斯特郡举行过一次补缺选举。这确实有点象在试验一下所有这些麻烦对公众的影响如何。但奇怪的是，结果却表明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有点影响的话，倒是保守党得票有所恢复，原来7、8月间是稍微下降，而11月份却回升了。盖洛普民意测验也同样地表明公众广泛地同情处于困难中的政府。确实，在最初这段时期里，虽然有各种吵吵嚷嚷和令人不安的迹象，但是不论在议会里或者在全国，我们都很容易就保住了地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国内的压力无论如何严重，表现得如何强 157



烈，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怀着崇高的责任感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下来的道路。我们也不会被嚣张的共产党人恫吓所吓倒。我们不得不忍受某种比国内的分歧和来自我们明显的敌人的敌意恫吓更为苦恼的事情，因为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传统的朋友和强大的盟邦的非难。

关于华盛顿对英法的干预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英国内阁确实是作了十分错误的估计。有人说，艾登本来应该把决定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出最后通牒一事事先告诉艾森豪威尔。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光是“通知”而不“商量”，几乎和不告诉人家一样地伤害感情。而且军方强烈地反对事先通知，因为那样就无法保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可能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的力量的确估计不足。这一点我应负重大的责任。我因为从战争年代里就熟悉艾森豪威尔，所以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性格。我在短短的外交大臣任内，也和杜勒斯有过密切的交往，在伦敦、华盛顿、巴黎和日内瓦都相处过不少日子。我的想法是，美国人尽管会在公开场合里表示抗议，甚至是强烈的抗议，但是他们心里一定乐于看到事情能够进行到有一个结局。因此他们会仅限于公开不赞成而暗地里却表示同情。他们本来很容易这样做的。确实不错，在几星期的危机以前和以后，都有许多美国领袖人物，甚至是政府的首脑，私下里表示过希望能够搞倒纳赛尔，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无疑是五角大楼的观点，他们尖锐地意识到中东的局势如果继续恶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利益，最终是美国的利益将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我们的希望被无情地粉碎了。国务卿似乎把英法的行动看成对他个人的冒犯，总统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他们特别气愤的是我们没有得到美国允许或同意便自行其是。杜勒斯一直把自己看作苏伊士案件的法律顾问，而且花了不少精力为它设计了一套又一套解决方案。现在他的当事人竟然把他撇在一边，自己干起

来。在他看来这是个侮辱，而且简直是背信弃义。因此到了关键时刻，他就表现出迹近疯狂的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比方，后来致他死命的那种可怕的疾病可能影响了它心理上 and 智力上的平衡。<sup>①</sup> 或者是，那时已经用可怕的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苏俄的魔影，已经开始经常在他的睡梦中出现了。他显然脾气很坏，也可能有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我们和法国盟友现在不得不面对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而且正在大力进行的攻击，我们的对手是反常地联合在一起的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10月30日被我们否决的华盛顿提案的语调中，我们就嗅到一点气味，不过我们仍然有理由希望美国将满足于表示一下态度。他们毕竟已经接受了俄国人对我们10月13日提出的重申六项原则并且规定了具体做法的决议案的否决。埃及政府完全不遵守这些原则。使用国协会正在销声匿迹。国务卿却似乎因为他自己起草并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大力主张的那些原则被人们形式上接受便心满意足了。事情就象初审他已经胜诉了，上诉审议再度获胜；至于决议是否执行，却无足轻重。不过，不久我们也就恍然大悟了。原先英国人想把问题提到安理会的时候，杜勒斯强烈主张拖延，而现在呢？他却近乎歇斯底里地急忙行动，他采取了一个甚至在那个包含有他自己判定的原则的提案于10月13日遭到否决时他也认为不宜于采取的步骤，这就是：要求根据安理会1950年11月3日《关于联合行动保障和平》的决议，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的紧急会议。说实在的，这种紧急措施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还从来没有采取过。在1950年时，因为苏联政府拒绝出席，所以很容易就说服安理会通过必要的决议来实现这个计划，而且还使决议具有一致通过的重大权威。可是，这一次呢？正象狄克逊所敏锐地指出的，已经没有战胜否决权的法律上

<sup>①</sup> 11月3日杜勒斯进行第一次癌症手术。

权威了。尽管如此，人们却违反宪章任意无视英法的权利。有一个情况值得在这里提一下：杜鲁门总统在安理会作出决议的前一天和联合国大会批准这个决议的四个月以前，就下达了出动海陆军的命令。不过，尽管以前的先例并不可取，美国人却还是要那么做。

于是，联合国大会在11月1日举行了会议来讨论美国的一个提案，其中除了别的内容外，主要是要求所有的参战部队停火撤退。这次辩论当然给各方面提供了一个猛烈抨击英国和法国的机会。苏联代表对它的美国同行甜言蜜语地恭维备至，恐怕连最严厉地批评我们的人听起来也会觉得难受。

这个提案在11月2日以压倒多数通过，六十四票赞成，五票反对。投反对票的少数国家是英国、法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弃权的国家里包括加拿大、南非、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但是大会的这个决定并不象当初乍一看来那样予人深刻印象。既然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俄联合起来，催督投票的工作也就不难了。二十六个亚非国家当然投票反对他们所谓的帝国主义；十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投票厅里是结成一团的；而二十个拉丁美洲共和国则机械地遵从美国的指挥。

这里当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由杜勒斯采取的、总统并不见得很乐意支持而且肯定不会坚决支持的决定，究竟代表了多大一部分美国人民的意见。我们认为美国各行各业的人，大部分是深切同情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因为英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美国的战友，并且和美国有着许多传统的感情联系。不过，这只是徒然的自我安慰。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既定的敌对态度。不过，对于如何答复联合国的决议，我们是毫无犹疑的。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是和法国盟友仔细地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正式的照会在11月3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我们不准备停止我们

的军事行动。不过，要是能够象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在发言解释他对美国提案投弃权票的理由时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支国际部队，那么，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准备作出让步。所谓一定条件，必须包括一个和平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争端的方案和一个有关运河的令人满意的协议。目前，我们的作战行动必须继续下去。关于军事行动的情况，这里需要简单加以叙述。

我们自 1955 年开始至 1956 年夏天完成的从埃及的撤退，完全改变了那里的军事形势，我们在军事上的困难加大了。当亚历山大港在我们手里，而且我们在运河地区保有一个基地时，要在埃及或者苏丹实现我们的愿望是比较容易的；而当我们需要从很远的港口运送部队来登陆，并且要跨越大片设防领土时，情形就完全两样。三军参谋长曾建议用以代替埃及基地的塞浦路斯，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缺乏深水港。所以它虽然对空军十分合适，对海军却没有用处。结果，支援在塞得港空降的首批伞兵的部队，是从九百英里外的马尔他岛用六天海上航程运来的。更多的后续部队不得不从英国本土或阿尔及利亚调来。时间因素使整个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第一步必须先消灭埃及的空军。我们希望能够把埃及的大部分飞机消灭在地面上，其余的由从航空母舰和塞浦路斯出发的战斗机在空中加以对付。我们也希望摧毁开罗电台，并且炸沉所有在运河妨碍航行的埃及封锁船只。

埃及空军在 11 月 2 日被消灭了，但是主要攻击需要等到登陆舰上的部队做好支援伞兵的准备时才能进行。在整个行动中，法国人担负了重大的任务，需要他们表现出效率和勇气。但是不难理解，这段间隙时间是使人十分焦虑的。政治家们正在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大厦里辩论；一群群上年纪的知识分子和热诚天真的年青人正在艾伯特大厅吵吵嚷嚷；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正在举行群众集

会，人们在兰西尔<sup>①</sup>那批默默无言、不理不睬的狮群间用粗暴的语言责骂英国政府；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正在大发脾气，发泄它道义的愤慨；联合国的大厅和休息室里挤满激动的代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坐在伦敦等待着那支小小的舰队到达指定的地点。

与此同时，流传着一些十分无稽的谣言，说是美国第六舰队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在从马尔他到塞得港的长途航程中拦截我们的部队；还说海军大臣蒙巴顿勋爵已经收到发现两艘俄国潜艇的报告。就在这时候，原来在美国坚定支持英法时保持着惊人沉默的苏联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俄国领导人给首相发来照会，威胁要“立即使用武力来恢复中东正常局势”；他们并且别有用心地在照会到达之前便公布了，企图使这份照会成为报刊惊人的头条消息。这些威胁虽然在伦敦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慌，我们却没有特别当一回事。俄国人这时自己正背着包袱，这样做可以为他们引起惬意的轰动。而且还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他们想使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找我们的毛病，而不去理会他们自己的大毛病；因为这时候匈牙利的革命和对这场革命的残酷镇压已经尽人皆知了。

11月5日清晨，英法空运部队在塞得港附近空降。傍晚，指挥第十六伞兵旅的默文·巴特勒准将宣布这座城市已经投降。无疑是因为盛传俄国甚至美国将进行干涉，所以战斗仍然在继续；但是尽管如此，陆军上将查尔斯·凯特利爵士（中东地区地面部队总司令）本来仍然有可能完成原定在11月12日以前占领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的计划。虽然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一样，动用了包括呼吁、威胁和在联合国内外进行各种外交活动等一切武器来对付我们，我们仍然坚决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们的队伍一定要登陆，取得一个立足点、一个根据地，作为谈判一项真正具有建

---

<sup>①</sup> 兰西尔，1802—1873，英国动物画家，1866年为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碑完成狮群。——译者

设性的解决办法的资本。

11月4日，莱斯特·皮尔逊提出一个新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是以他在上次会议上比较原则性地提出的建议和艾登本人11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中的某些话作为基础的。艾登的话是：

如果联合国当时愿意接管维护那个地区和平的实际工作的话，我们是会比谁都高兴的。<sup>①</sup>

加拿大的提案要求秘书长立即拟定“一项在有关国家的同意下建立一支联合国的国际紧急部队来保证和监督停止敌对行动的计划”。

皮尔逊担任的是一个困难的角色。加拿大的公众舆论既不了解情况，意见又分歧。后来几年他担任加拿大总理以后，我才对他有所了解。除了仪表出众之外，他还具有一切从事外交工作的天赋——镇静、忍耐、思想透彻、言语明确，而且具有洞察双方意图的能力。美国人或者俄国人都没有能吓倒他。在各种辩论里，他的发言总是采取自己独立的路线。他用十分恰当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敢于单独地或者和别人共同反驳洛奇和谢皮洛夫。他曾经对谢皮洛夫的一次极为放肆的发言作了一个著名的回答，谴责谢皮洛夫“对真理进行了言词侵略”。在这个阶段里以及在整個危机期间，他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一直抗拒美苏想迫使我们撤退军队和接受屈辱的联合压力。

皮尔逊的提案在11月5日上午开会后不久就通过了。没有反对票，只有十九票弃权。狄克逊申述了我们弃权的理由，指出这个决议案看来在某些方面走得太远，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嫌不够，而且没有提到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个决议后来还是成为谈判的基础。哈马舍尔德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利用自己的职权把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11月1日。

其中每一个争议点都解释为英法应向埃及让步，这不能归咎于皮尔逊。英国应该十分感谢皮尔逊。如果他处于能够对国务院施加更大压力的地位的话，他也许很可能说服美国采取建设性的政策，并且利用机会促使中东的所有问题、最少也是大部分的问题得到持久的解决。可惜的是，他所代表的国家，不论在财富和人口数量上，都不足以与美国的势力相抗衡。只是由于他个人的谈判才能以及他所具有的威信，才使他有可能在整个危机中起一种缓冲和斡旋的作用。

内阁在11月6日清晨开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作出关键性的决定，并且当天晚上就在下院宣布了。艾登声明：英国政府已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将命令它的部队除非受到攻击，一律在午夜停火。这项承诺以下列保证为前提，即：埃及政府和以色列政府都同意无条件停火，同时，必须派遣一支能够保证和监督实现11月2日决议所规定的目标的国际部队到这个地区去。

当时和现在都有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对政府采取这样严重决定的原因作种种的解释，有的是矛盾百出，有的是很不精确。有人硬说，是我这个财政大臣提出了紧急要求，主张我们应该顺应形势，承认我们确实打败了。我还经常受到责备，说我当初是最坚决拥护在中东采取强烈行动的，后来在这个政策遭到严重挫折时又最急于撤退。“第一个进去，第一个出来”，这是工党一个主要人物在后来很多场合用来批评我的优雅的词句。

有一点是确实无误的，就是：这几个星期以至这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件对我们金融储备的压力，比我原先预料的要沉重。我们储备的流失是巨大的，但是还不到灾难性的程度。9月份储备下降了  
164 五千七百万美元，10月份是八千四百万（按1967年贬值以前的英镑折算，这两个数目相当于二千零三十多万英镑和三千万英镑）。这还是可以容忍的数字；而且，由于美国那时看起来还象是在积极

支持我们，所以英镑的信用仍然得以维持。可是，当关键时刻到来，我们显然面对着美国的全部压力，包括来自华盛顿和纽约的双重压力，储备的流失便急速增长。11月份达到二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在这个月的头几天里流失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盟国间明显的分裂影响了英镑的信用；另一方面，俄国的示威也使问题更加尖锐化了。虽然我们对这种恫吓害怕的程度远比我们的美国朋友为小，但是英镑持有者毕竟受到一些影响。事实上，造成我们储备严重流失的是抛售英镑的投机活动和纽约市场上的大量抛售。至于这只是单纯因为害怕遭受损失呢，还是主要因为美国财政部带头这么干，就很难弄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抛售的英镑数额，看来远远超过它为了保持自己储备的价值、避免损失而必须出售的数字。如果当时我们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我们名下应得的款项，或者，更理想的是，从美国获得某种短期贷款的援助，那么，我就不必那么担心了。美国拒绝贷款倒还可以理解，但是阻挠我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款项，却是难以原谅的。根据章程的规定，我们完全有正当权利要求归还我们名下的份额，因此我作了必要的试探。我向纽约挂了紧急电话，问题转向华盛顿请示。到内阁开会的时候，我才接到回复，说是在我们接受停火以后，美国政府才同意履行提款的技术程序。当时我就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这种做法不但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以行动的章程的精神实质，而且违背章程的文字规定。这是使用压力的一种方式，完全要不得。它和美国人在运河被强占后对待埃及名下的基金和“账户”的软弱态度相对照，截然相反，实在令人诧异。

不过，我们得不到美国人的任何财政援助，以及人们拒绝我们行使对基金的权利，也都不是促使我们撤退的决定原因。在这个 165  
战线上我们还能够经受更多的打击，而且，只要我们在军事上能打



一场决定性的胜仗，英镑的信用就会很快恢复过来。实际上，流失量只及我们全部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八分之一。储备下降本身并不是灾难性的。

如果储备的下降是因为这个国家根本的贸易状况不佳，如果这个国家无法改变国内通货膨胀的不良状态，那么，储备的不断流失就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因为发生了某种暂时的困难而流失储备，那么，情形就不一样。储备正是为了这个用途而设置，而且也正是准备为此而使用的。<sup>①</sup>

此外，美国人也不可能永远阻挠我们提取基金。当然，他们可以通过不断地抛售来维持对英镑的压力，但是我们的政策愈是成功，他们的这个政策就愈难收效。石油的状况确实比较危险，但短期内还不会发生太大问题。所以虽然我并不否认我们的财政状况严重，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接受停火的原因。

也有人说，我们是被布尔加宁的威胁所吓倒。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看待这种威胁。对英国进行一次核攻击，必然导致一场美国不能不参加的全面核战争。这时候的核军备均势，仍然大大有利于美国。俄国的领袖们十分清楚：在一场核战争里，他们除了招致自己人民的毁灭以外，将一无所得，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能给对方以严重的、但是绝非决定性的破坏。当然，他们可以往这个地区送进一些飞机，就象他们已经大规模地做的那样；但是当时流传的关于这方面的谣言，我们都对之表示怀疑，事后也证明并非事实。不管怎么说，艾登给布尔加宁的态度强硬的复信，是得到阁僚们充分支持的。布尔加宁责备我们对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动战争。艾登所作的答复显然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示：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11月12日。

了一场真正属于民族独立运动性质的英勇的反抗……①

当然，当时我们并不晓得布尔加宁的恫吓对华盛顿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威胁和当时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财政状况一样，都不是停止军事行动的原因。

我们同意停火的原因，是直接源自我们据以进行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是从我们给埃及和以色列的最后通牒里引申出来的。艾登很简明地表述了这些原因：

我们原来进行干预是为了隔离冲突，首先是控制冲突。促使我们进行干预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战火已经扑灭。战斗一旦中止，继续干预的理由也就不存在。我毫不怀疑，我的内阁同事们之所以在开会时以及当晚在下院宣布之前的那几个小时里，没有任何人提出我们和法国人应该继续进行干预，正是由于上述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②

结论只能是这样。

虽然军队停止前进，但是英法看来已经占有一个强有力的从事讨价还价的地位。用艾登的话说是：

我们掌握着保证。纳赛尔已经在战场上遭受屈辱性的失败，他的绝大部分俄式装备，已经被以色列和我们的军队缴获或者摧毁。他的地位大大动摇了。我们认为，根据这样的形势，明智的国际政治家们一定能够为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和运河的未来制定一个持久性的解决方案。③

我们当时无法设想，在美国强有力的指导下联合国竟然会完全废弃或者无视它自己作出的有关运河未来以及中东解决办法的宣言。我们期待的是，美国现在将实行一项即使不是友好的、至少也是中立的或者甚至是建设性的方针。我们实在难以预见到“美

① 阿翁伯爵前书，第 556 页。

② 同上书，第 557 页。

③ 同上书，第 558 页。

国政府竟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难为我们，而且变得比停火以前更为苛刻”。<sup>①</sup>我们又一次对华盛顿的心理作了错误的判断。

167 现在，我们被迫差不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缓慢地退却，而且还要接受美国倡导的简直是对我们报复的屈辱。即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人还是存在摇摆不定和矛盾的心理。停火以后，艾登立即给总统去了一个电话。艾森豪威尔现在已经平安无事地以比上次选举更大的多数票重新当选，他立即同意艾登的建议，即由艾登和摩勒到美国进行一次全面的商讨。但是，不到一个钟头，显然是在国务院的压力下又迟疑不决起来；在最后一次电话里，他找了个借口，说是国内事务很忙，最好把会谈延期。这件事情也就石沉大海，没有再提起了。

美国人现在连“停火”也不满足了，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撤退。汉弗莱明白地对我说，在英法军队离开埃及以前，他将继续反对我们从国际货币基金中提取任何款项，也反对贷款支持我们。不过，我们的财力还不至于枯竭到要屈服于这种新的压力。我们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仍然超过二十亿美元。当我把与汉弗莱会谈的情况向我的同事报告时，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慨。但是，我们还是被迫着一步步往后退。到11月23日联合国大会复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意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一支先遣队进入塞得港，并且授权凯特利上将与联合国部队的司令伊德逊·伯恩斯将军进行预备性谈判。我们还象征性地撤走了一个步兵营。此外，我们就不准备作更多的让步了。

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授予秘书长以全权，不过权力的范围没有作严格的规定。俄国人现在和美国人分家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似乎已经出现了某些有利于我们的反应。我们尊敬的老朋友斯巴克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他一方

<sup>①</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561页。

面呼吁英法撤军，一方面强调指出迫切需要由联合国当局来掌握并解决整个中东更为广泛的问题。这个建议付表决时，包括我们在内的二十三票赞成，有三十七票反对，十八票弃权，其中就有美国。 168

于是，争论又继续下去，但是这时由于出现了运河清理问题，事情复杂起来了。埃及人曾经在运河沉没大量船只以阻挠运河航行。我们利用最先到达的部队所携带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就完全清理了塞得港。但是，埃及人却拒绝在英法部队撤离以前对运河本身进行任何清理工作；秘书长竟然屈服于这种压力。纳赛尔也不同意使用我们的任何打捞设备；他甚至不允许使用联合国的人员和物资马上开始工作。正象艾登所回忆的，只要还有任何军队留在埃及土地上，即使是联合国的部队，就无法保证纳赛尔会同意清理运河。在这整个问题上，哈马舍尔德表现出难以理解的软弱无能。

在这几个令人厌烦的星期里，身在纽约的塞尔温·劳埃德，在皮尔逊·狄克逊的得力帮助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后卫仗。但是，看来我们在华盛顿仍然多少遭到隔离。总统拒绝会见我们的外交大臣和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R.G. 凯西。

我们决心在秘书长就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组成和目的以及运河的清理问题向我们提供某些保证以前，绝不撤出塞得港。最后，他还是满足了我们提出的关于部队组成问题的要求，并且明确地保证联合国将尽速开始清理工作。不过，他采取了一个愚蠢的做法，不愿意使用我们现成的设备和人力。雷蒙德·惠勒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打捞部队，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本来我们可以在很短期间内就完成的工作，他们却拖延了好几个月。根据纳赛尔的要求，打捞工作一直延到 12 月 31 日才开始。后来，他毕竟还是同意了使用在塞得港操作过的六艘英法船只，不过附有一个谅解，就是英法的

169 水手要佩带联合国的臂章。运河最后是在 1952 年 4 月 9 日重新开放的。

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它的压力。11 月 15 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有我参加的会议上，美国坚决拒绝提供原来已经做好计划的全部石油援助。甚至西欧经济所面临的威胁，也没有能打动美国代表的心。这个月的下旬哈罗德·卡奇亚爵士在华盛顿进行了类似的努力，也遭到无礼的拒绝。我们的这位大使被告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塞尔温·劳埃德向我们报告说，杜勒斯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对我们未能搞倒纳赛尔表示惋惜，而且重申他认为必须采取某种办法使纳赛尔无法“得逞”。<sup>①</sup>这种自相矛盾的奇怪说法，是很难有合理的解释的。

最后，在我们作出结论认为我们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作了尽可能有利的交易，并且认为我们最起码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以后，我们就在 12 月 3 日决定撤退。撤退行动将根据两位将军商定的时间表分阶段进行，不仅要考虑到换防的方便，而且要考虑整个地区的军事形势。内阁是在艾登不在伦敦的时候作出这个决定的，不过完全得到他的同意。法国也同意了，不过有点勉强，因为他们对联合国在这整个事情上的信用比我们还要怀疑。这个决定当天在下院宣布了，稍微引起一点喧扰。

12 月 22 日，最后一批英国部队离开埃及领土。不管关于这次出兵是否明智在看法上有多大的分歧，这次行动的指导，仅就作战部队的指挥来说，却受到普遍的赞扬。空降进行得大胆而巧妙。不惜一切力量避免或减少居民所受的伤害。在停火以后的七个星期里，  
170 尽管受到各种严重的挑衅，部队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纪律性。

联合国承担的另一个重大职责，也很快就杳无声息，完全弃置

<sup>①</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 567 页。

不管。本来曾经商定，有关运河未来问题的谈判，必须根据安理会所同意的六项原则来进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本来没有多大理由对这种做法感到满意和鼓舞，因为这六项原则只是一些理想，并没有规定什么制裁。杜勒斯原先拟定而后来又放弃掉的那个十六国建议，倒是有些真正的力量。但是，即使是六项原则，也很快就被忘记掉了，简直有如石沉大海。

快到年底，以色列军队撤出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他们安全必不可少的加沙地带的阵地。他们还继续控制着濒临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高地，这就保证了他们有一条通自亚喀巴湾的通道，并且使以色列政府有可能立即采取步骤开放爱拉特港。考虑到运河将来不大可能向以色列船只开放，这个做法对以色列的经济来说也是至为重要的。由于以色列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完全撤军的要求，又引起了1957年头几个月剧烈的争论和错综复杂的谈判。

如果说，这几个月的危机中内阁所遇到的外交上困难使首相和他的主要阁僚十分烦恼和痛苦；那么，议会里和全国的形势也给他们带来同样的麻烦。在11月6日宣布英法共同接受停火以前，一直进行着长时间的、往往十分激烈的辩论。但是，作出决定以后，我们也没有就此轻松。相反地，当我们在联合国里进行各个阶段的迂回曲折的斗争时，议会的辩论不是松弛下来，而是更加尖锐了。除了双方的议会谈判次数不断增加外，几乎连续地进行着辩论。艾登的责任最重，他不在的时候就由外交大臣出色地担当起来。但是，有一段关键时期，他们两位都缺席，一位生病了，另一位在纽约。主要的责任就落在巴特勒身上，我们其他的人则竭尽所能来支持他。

不巧的是，新的一届议会会议就在11月6日举行，这正是宣布停火的日子。对女王开幕词的辩论，按传统总要延续将近一个

星期，结果就给双方提供了进行互相批评的大好机会。11月8日贸易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发言勇敢地捍卫政府的立场，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大胆地指出：俄国政府的计划里有一项是要利用纳赛尔的野心作工具来接管中东。英法的干预至少已经在紧要关头制止了俄国实现它的计划。11月12日议会审查危机期间的经济情况，当然那是我的责任出来答辩。在说明军事开支将达三千五百万至五千万英镑之后，我补充说：考虑到预算原来估计有四亿英镑的盈余，上述数字不会造成什么重大的困难。但是我坦率地承认，由于储备受到压力和石油供应情况愈来愈不稳定，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很多经济险情。我驳斥了人们说我“有亏财政大臣的职守”，没有为了维护经济而反对那种必然带来危险的中东政策等等指责，为自己作了辩护。我承认，当初如果能够提出一个危险性较小的方针当然再好不过了，特别是因为在我到财政部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经济形势显然比较轻松一点，而且有望继续改善。所以我的全部兴趣本来在于实行一般所谓的绥靖政策。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我曾经看见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曾经亲眼看到1914年是怎样不知不觉地陷入战争的，后来1936年到1939年又怎样再度发生这种情况。现在人们关于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义务谈论得很多。但是，在从前那些日子里，人们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人们要求我们违背我们所担负的一切明文规定的法律义务。假如我们在1936,1937或1938年向希特勒开战，我们就违背了凯洛格公约，违背了国际联盟，违背了我们的所有义务。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就陷了又陷，愈陷愈深。<sup>①</sup>

我用这样的话来结束我的答辩：

172

只有历史才能证明我们所做的是对还是错。当大臣的如果碰上运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11月12日。

气，可能在任期间只有普通的辩论和普通的商讨——这样的辩论和商讨为数很多，也相当愉快——从来不必面对象今天这样的决定。但是，当我们需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就只有两种方针：或者是躲避它们，或者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因为我一生中已经看到过两次这样的事情，我由衷地相信，这次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可以避免世界正在面临的第三次灾难。……

当这样的时刻到来时，“勇士总是挺身而出，而懦夫则临阵脱逃”。

不管经济上可能遇到什么不利和麻烦——这样的不利和麻烦将是严重的——我相信，历史将表明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sup>①</sup>

我认为，经过了这些年之后，这样的看法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第二天，巴特勒就女王开幕词的辩论作了总结发言，有力地捍卫了政府。

从这天起到11月20日宣布将从12月17日起实行石油配售的决定时止，是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我们所能作出的安排，似乎足以保证工业上的需要和主要运输业的需要，不仅是英国本土的运输，而且包括整个西欧的运输。不过，小汽车每月只限行驶二百英里，如果和战时的配售量比起来，也算够慷慨的了。

12月5日和6日，又进行了两天辩论，有点象对政府的干预政策盖棺论定。这一次是由从纽约回来的外交大臣最先发言，他坚决勇敢地为这个政策辩护。安奈林·比万作了一个他历来最有力量的发言，因为他语调比较温和，甚至表示了同情，所以特别打动人心。看来他至少是了解政府的困难的。他表现出他的全部智慧和热情，但是他显然不愿意逼人太甚。我心里认为，而且也完全敢公开地说：这是一篇来自反对党方面最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说。菲利普·诺埃尔-贝克代表反对党作辩论总结，而巴特勒代表政府总结。大家本来有点拿不准保守党内由沃特豪斯和朱理安·艾 173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6年11月12日。



默里所领导的那个集团是否愿意投票赞成政府的行动。他们代表着保守党内相当多人的悲观失望情绪。有一个时候好象他们有可能争取到大量的弃权票。但是，结果弃权的只有十五人。

辩论几乎一直进行到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艾登 12 月 20 日作了一个答辩演说，遗憾的是，这竟成了他在下院的最后一次演说。

这一轮辩论总的说来水平是相当高的。盖茨克尔是反对党方面最顽固也是最出众的发言人，他的一些主要同事给了他有力的支持。安奈林·比万和往常一样，是批评我们的人之中最深思熟虑的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批评是最有力的。艾登、塞尔温·劳埃德和巴特勒负起答辩的重担；我也参加了，虽然我的发言主要是有关财政经济方面问题的。不过只要有可能，我也谈到更加重大的问题。在名声不太显的人物中，对方比较厉害的是詹姆斯·格里菲斯和菲利普·诺埃尔-贝克，他们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我们方面的国防大臣安东尼·黑德。有时候出现过一些应该说是和议会传统不相称的场面，特别是艾登的发言经常被打断，受到怪声奚落，哄笑嘲讽。不过这也是关键时刻感情冲动时常有的现象。无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首相受到了在我们看来是既不公平、风格又很低的对待。连续好多天的长时间辩论，当然给他的健康增加了额外的破坏性压力。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屹立在讲坛上的高瘦英俊的形象，充满着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无比的勇气和毅力，毫无畏惧地应付着一系列企图打乱他的论辩、阻挠他继续发言的种种喧哗和插话。

因此，当霍勒斯·伊万斯爵士突然前来看我，我感到十分震惊。这是 11 月 18 日的晚上，我在唐宁街十一号的书房里，他向我说明，他已不得不劝告首相作某种休息，那怕是一个短时期的休息也是好的，否则他的健康将发生严重问题。这当然不是由于首相

缺乏精神上意志上的毅力，而是因为他过去几年对自己内脏的疾病没有重视，以致又复发了。在原来手术还比较容易见效的时候，他因为不愿意放下重要公务去做必要的手术，所以后来反而不得不开了好几次刀。不过，就我们所知，到1954年，他的健康已经完全恢复了。最近几个月，由于工作紧张，他的病又出现了一些可怕的征候。伊万斯坚持说，如果想避免不幸，首相最低限度要有几个星期的休息。

索尔兹伯里勋爵正巧在我那里，我们一道讨论了这个问题。显然，在目前存在那样多问题等待解决的时候，如果艾登离开英国，国外一定会引起误解，内阁的负担也太重了。但是，医生的决定不能置之不理。11月19日向议会宣布了这件事情，几天以后，首相就出发到牙买加去。12月14日他回来了。正是在他出国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作出全部撤离塞得港这一关键性的决定。不过，我们始终用电报和他保持联系，并且是在他的同意下作出决定的。

在艾登休养期间，因为有一段时间外交大臣也不在国内，所以艾登的副手巴特勒的工作特别繁重。如同在困难时期常有的情况一样，内阁成员对自己的临时领导人格外地忠诚，我们工作得很融洽。巴特勒要求我充当他的亲信顾问，我们工作中步调完全一致。我们需要保证内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我们需要在下院维护我们的立场。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恐怕就是应付那个1922年委员会会议，这是保守党议会党团的全体大会，它开会次数的频繁和辩论的激烈，有时几乎不下于下院。我和巴特勒订了一个规矩，就是共同出席会议，各自按事先共同商定的方针发言。不论在私人或公开场合，彼此都不能表示分歧意见。由于这样，我们才能在首相出国期间守住我们的阵地，在议会和全国维护住政府的立场。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如释重负地看到首相回到伦敦来，健康

显然已经恢复。

这些日子里，人们的感情都极为激动。那些真心诚意地相信使用武力不合法的人，不管形势如何，总是满腹怒气。那些观点比较现实的人，看来又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感到气愤。结果，几乎社会上的每一阶层里都爆发了激烈的反美情绪。最热情支持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人，当然对这次行动遭到明显失败感到十分失望。当圣诞节假期到来，我们得到期待已久的一段休息时，我们谁也不能不觉得我们这个政府所处的危险地位。许多外国观察家和我们国内的观察家一样，都认为这个政府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这类攻击，原因也许就是我们深知，而且甚至批评我们的人也承认：全国总的说来是同情我们所追求的目的的，只不过对我们所受的挫折感到惋惜吧了。

苏伊士插曲的一个不幸方面，就是英美友谊的破裂。双方都有一种幻灭感。有着长期传统的英美合作，曾经到达高度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境地，现在这种友谊似乎已经遭到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严重的损害。为了使总统的观点端正过来，丘吉尔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我是很久以后才获悉这件事的。这是这位年迈的政治家对世界事务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干预——也是最后的一次。由于艾登不在国内，信件通过美国大使馆直接送达总统，因为不论外交部或唐宁街十号的秘书处，丘吉尔都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个行动。不过，他送了一个抄本给女王。这封信是如此感人，使我不能不在这里全文加以引述：

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我并不希望、也没有精力再参与当前紧张纷繁的政治事务。但是我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念，认定英美联盟今天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个联盟能够提高到现在这样高的水平，你我都起过一些作用。不管在英国和美国由于赞成或反对安东尼在埃及的行动而引起了人们多么严重的争论，如果现在让中东

事件把我们分隔开，那将是一个愚蠢的行动，也许我们的全部文明将因此而沉沦。

在大西洋的两边，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日益加深的误解和失望情绪，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天空将被乌云遮住，驾驭风云的将是苏联。关于过去这些年里发生的事件，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留待历史家去争论。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这些事件已经在中东造成了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是怨恨、猜疑和恶意占着上风，一方面是我们的朋友们正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苦于未来的变化莫测。苏联正在试图进入这个危险的真空地带，因为，纳赛尔的胜利甚至是苏联人的更大的胜利。这一点你一定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我们所信仰的一切是否能存在下去，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下决心先发制人地对付他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协调一致地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将不得不看到中东和北非海岸线完全落入苏联的控制，西欧则任由苏联摆布。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要是我们放弃责任，不能断然地毫无畏惧地采取行动，我们就辜负了人们委托给我们的领导职责。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了解你热爱的是什么。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对联合国组织和自由世界的事变进程施加这样的影响，使根本的大事不致淹没在各国间的琐碎争吵之中。你的责任的确十分重大。对你担负这种责任的能力最信任的，对你的工作期待最殷切的，莫过于你的老朋友。

温斯顿·S·丘吉尔<sup>①</sup>

总统寄来了一封很长的复信，显然是他自己起草和亲笔书写的。我可以肯定，在第二年我们着手进行重建旧有关系的艰苦工作时，丘吉尔的这个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会谈能在十分诚挚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并且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既没有丧失尊严，也不必放弃我们的立场。

---

<sup>①</sup> 丘吉尔著作的版权所有人允许我抄引这封信，我在此表示感谢。

在一些比较紧迫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现在准备给我们帮助。当然，有点难受的是总觉得这是作为“奖赏”我们屈从美国压力而给我们的。不过，尽管条件不太理想，我也不至于愚蠢到加以拒绝。我们得到一些慷慨的援助来满足我们迫切的需要。此外，我有机会和汉弗莱开始一次谈判，对美国贷款的偿还条件作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废除了原来比较含糊的放弃债权的条款，代之以明确的规定，就是：在 2000 年以前，英国政府有权把每年应偿付的本金和利息，延期为七年总付。<sup>①</sup>

12 月 12 日福斯特·杜勒斯和汉弗莱两人都在伦敦。我和汉弗莱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谈的是总的形势，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公司在中东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我当时曾经记下了要点。

我说，我觉得现在是实行一个长期的政策，尝试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了。我表示，中东是自由世界的弱点所在，俄国人为了搞垮西欧，宁愿在中东制造动乱而不正面进攻欧洲。汉弗莱先生对我这个观点表示同意。然后他就发挥起他的论点来：美国生活的全部原则就是自由竞争，所以卡特尔、托拉斯等等是违背他们的哲学的。这种哲学在国内还行得通，但是在外国进行贸易时，采用这种哲学就使自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目前中东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十年以前，美国的公司力量雄厚，那里的酋长们也比较幼稚。现在，酋长们都成了大人物，他们威吓美国公司，美国公司都很害怕。但是，它们碍于谢尔曼的反托拉斯法案，不能联合起来。如果一个石油商和另外一个石油商合伙，就很容易被送进监狱。美国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汉弗莱认为，必须发展一种新的哲学，既一般地保留自由竞争和私人企业，又使在外国的这种经营受到美国政府权力的保障。然后我提到阿巴丹<sup>②</sup>的解决办法，并且表示我认为国际财团是有力量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还认为我们在伊拉克的做法很好，因为人民看到了他们的财富所结出的某些果实。我们在沙特阿

① 《1957 年年鉴》，第 373 页。

② 阿巴丹，伊朗西南部炼油业中心。——译者

拉伯和其他酋长国的地位就比较弱。我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共同研究一下,设法找出一个迅速解决中东的石油和政治问题的办法。他很欣赏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华盛顿设立一个英美联合研究小组,既从石油公司的角度着眼,也考虑到如何找出一个长期的政治解决方案。”<sup>①</sup>

从这个问题我们又转到财政问题,谈话的结果终于成为第二年3月签订的一项贷款协定的基础。

杜勒斯也来看了我。上述的大部分问题我们也都谈到了,但是他的意见散漫而不明确。

这次谈话使人非常难受。他情绪不好,肝火很盛。他特别埋怨我们把罗杰·梅金斯调走。我说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象喜欢梅金斯一样喜欢卡奇亚。但是,他不吃这一套,安慰不了他。他又唠唠叨叨地说了一番我们彼此缺乏信任,他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接下去他替自己和他的政策作了长篇的辩解。他显然对批评十分反感。他说,如果以为他和总统意见分歧,那是错误的。总统的绝大部分声明是他起草的。如果声明比较强硬,就以国务卿的名义发表;如果谈的主要是理想、原则,就以总统名义发表,不过还是国务卿起草的。看来,对于任何有关他们两人之间存在裂痕的说法,他都十分敏感。<sup>②</sup>

在听完杜勒斯和汉弗莱的谈话之后,我把情况总结成下面一段话。

总统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有点不知所措。福斯特·杜勒斯情况 179 也是这样。……汉弗莱虽然很强硬,而且在谈判具体问题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固执的,但是他对我们怨恨最少,所以我认为他会以平常的坦率方式和我们打交道,而不使造成怨恨。<sup>③</sup>

我应该补充一句:汉弗莱这时给了哈马舍尔德很大的压力,颇有成效,至少联合国部队在清理运河中使用了我们的一些船只。

---

①②③ 1956年12月13日。

虽然这些谈话总的说来还不致令人沮丧，但是来访的这两位客人并不隐讳美国政府对我们的不满。在我这方面，我清楚地说明，英国公众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挫伤，要重新开始我们的老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认为我们究竟还是迈开了一些步伐，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耐心地坚决地做下去，还是有可能在适当时机重新建立起我们两国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我毕生一直认为是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所不可缺少的。

## 第五章 政府的更迭

180

1957年1月9日上午我正在财政部办公时，接到一个通知，要我下午3点到唐宁街十号去。我还记得，我曾经让我的私人秘书询问一下要我去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知道首相想知道最新情报的事情，不外是英镑的行情、财政援助的谈判进展情况以及对油管是否可能恢复使用的估计。可是，从他私人办公室的回话看来，他显然要和我作一次个别谈话。

艾登在一个小会客室里接待我。这是这栋有名的房子正面三个客厅中最小的一间。三间都朝北，很少见太阳，但是这个小屋里却有一个朝西向着花园的窗户，到下午和傍晚，哪怕是伦敦的冬日，阳光也能透过阴沉的天空射进屋子里，给它带来一点温暖和生气。他简单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辞职了，神情十分严肃，似乎事情已经确定，不容讨论了。已经报告了女王。他前一天到桑德林厄姆，就是为了这件事去的。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并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他也跟索尔兹伯里和巴特勒谈过。没有别的办法了。医生已经把他的病情真相告诉他本人，虽然还不致有生命危险，但是必须结束他的政治生活。

我听后深为震惊，真想不到我们大约一年半以前愉快地共同开始的事业竟会遭到这样突然的、悲剧性的结局。诚然，从霍勒斯·伊文斯医生的谈话里，我也已经知道艾登所患疾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但是，这位杰出的医生在11月间似乎还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只要有几个星期的休息，再接上圣诞节的例行假期，也就很够了。的确，艾登12月中旬从牙买加回来的时候，身体看起来虽然

181



说不上痊愈，也算差不多康复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1月份医生会给他提出这样的劝告”。<sup>①</sup>不管怎么说，医生都是铁面无情的，除了接受他们的裁决外，没有别的办法。在这整个短暂而痛苦的谈话过程中，他一直和往常一样地仪表英俊、风度优雅和举止庄重。我简直难以相信，一位相对说来还这样年轻、还能够作出许多贡献的人物，就这样被迫结束他的公职生涯。

我们继续坐了一会，彼此谈了几句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往事，当时我们都服过役，也经受过苦难；还回忆了我们是怎样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进入议会的。虽然我们在意见上有过一些分歧，但是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重大的外交问题上，我们总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合作得卓有成效。在这阴郁的冬日下午，在我眼里他还是那样年青，那样愉快和欢乐——这是1914—1918年在军队中服役的优秀青年的形象。这样一批人曾经以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勇士精神面对着一场剧烈战争的各种恐怖场面。从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经常感到身负一种特殊的义务，就象宣过誓一样。我们两个人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政治界的。现在，他在担任了这样多年的公职以后，正处于权力的最高峰时，竟挫败在神秘莫测、难以脱逃的命运之神手下。

我伤感地经过通廊走向十一号，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各方面的消息。内阁已定在下午5点开会，但是通知里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大臣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当他们在会上知道这件事情时，都茫然若失。首相12月中旬回来时，所有的阁僚都因为看到他精神焕发而欢欣鼓舞；首相指导最后的几次辩论，掌握下院的局面，依然驾轻就熟，一如往昔。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只是因为前几个月的紧张劳累而病倒，不知道他真正的病因。这是一个令人伤心和难忘的场面。

<sup>①</sup> 阿翁伯爵前书，第574页。

艾登的讲话很短，态度十分严肃。医生们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他必须辞职。索尔兹伯里谈到他和艾登一生的友谊，感情十分激动，几乎掉下了眼泪。接着是巴特勒，他讲得很中肯。我也说了几句话。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番非凡的、在许多方面又非常独特的功名事业的悲剧性结局。令人难过的是，他曾经这样长时期地等待着首相职位，却只保持了这样短的时间。<sup>①</sup>

本来，最近几天里有几位大臣就有点惶惶不安，掩盖这一事实是不坦率的。

举行了许多会议——不是进行阴谋活动，而是对首相或者任何其他人都显然无力掌握当前局势感到担忧。没有人阁或任其他职务的议员也举行了会议。普遍都认为政府无法再维持下去。议会重开时，政府一定会陷入麻烦，几个星期内就得倒台。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sup>②</sup>

现在，又碰到这样一个新的打击。我们不但要在自己的党对事态的变化感到无比失望的情况下应付下院的局面，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在局势动荡时必然要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还必须渡过一个新的政府、新的领导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是，这些忧虑暂时都被放下，占据我们心头的是这场人世的悲剧。

我是最早一批离开的，悄悄地取道回十一号去。后来我听说巴特勒也走了。身为内阁高级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仍然在场的大臣们提出各自的意见，看谁应该接替这个在当时情况下并不吸引人的空缺。他们被邀请轮流到枢密院院长室会见索尔兹伯里勋爵（枢密院院长）和基尔穆尔勋爵（大法官）。

不出这座大楼就可以走到枢密院。只需要在两个人中作一下轻易的选择。几乎每人开始都说：“就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一样”。鲍伯蒂（索尔兹伯里）对每人都问：“好了，你看谁合适呢？瓦布还是哈沃德？”<sup>③</sup>

<sup>①②</sup> 1957年2月3日（记事始自1月9日）。

<sup>③</sup> 原文为 Wab or Hawold，即 Rab 和 Harold 两字，因口齿不清，误读。Rab 是巴特勒译号；哈罗德是麦克米伦的名字。——译者

除了征询留在会场的前内阁成员之外，我们还会见了下院的主任督导员和党的主席奥利弗·普尔。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约翰·莫里森第二天上午从伊思利给我打来电话。内阁大臣中绝大多数都主张麦克米伦充当艾登的继任人；据我们接到的报告，后座议员们也强烈赞同这个意见。<sup>①</sup>

不论索尔兹伯里或基尔穆尔，都没有试图对他们征求过意见的人施加任何说得上是行政命令式的影响。他们只是提一个问题，听取一个答复。由于他们两人都是政府的高级成员，而且他们实际上都不可能是首相候选人，所以，他们在困难情况下堂堂正正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在内阁开会以前，这两位高级大臣已经一致商定采取这个方针。不过，他们把最后裁夺的特权保留给女王，不使首相的遴选由党的会议来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盖茨克尔这时正在美国，工党的副领袖格里菲思企图反对已经采取的那个方针。他甚至责备保守党把皇上置于十分困难和尴尬的地位。到议会重开时，反对党很可能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并且要求举行不信任投票。盖茨克尔毕竟比他要明智得多，不干这种无理取闹的事。所以，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抗议。不过，有鉴于后来当我自己因病不得不卸任时所发生的那场争论，在这里把事情真相叙述一下，也许是有必要的。

当这种新颖的、效果也不错的程序正在进行时，艾登已经上王宫去了。晚上，一份由霍勒斯·伊文斯和另外三位医师签字的公报发表了，用的是这样的词句：

首相的健康使人焦虑。虽然圣诞节前的休息使他健康有所进步，但是腹部病症又在复发。由于1953年进行过重大手术，而且后来又发过几次烧，所以使我们很担心。我们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他再

<sup>①</sup> 基尔穆尔伯爵：《回忆录：政治生涯》，第285页，1962年，伦敦。

肩负首相职务所必然带来的重担。①

与此同时,宣布了女王已经接受首相的辞呈。

184

我夫人当天从乡间赶回来。她明达事理,对我很理解和同情,使我稍为得点安慰。我当时心情十分难过,因为当晚我就听到一些有关我离开内阁会议室后那里的情况的谣传。因此我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去看望,否则会以为我在拉人支持我。最使我伤心的是,我甚至无法过去和我的那位老朋友谈谈他的未来,或者一道回忆一下过去,借此稍予安慰。我本能地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看他,可是我夫人提醒我,即使是由连接十号和十一号的两道门过去,送信人和私人办公室的人员也会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觉得最好是不要上财政部去。

我听说女王召见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但是,因为没有人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所以我也猜不透他们会提什么样的建议。后来才知道,索尔兹伯里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只是把党内领导成员的一般看法向女王作了汇报。……由于社会党人后来力图证明我担任首相是赛西尔家族的头头亲自在私下使劲的结果,因此有必要把这样一点纪录在案,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起的作用,只是向女王上达党内的一般意见而已。从安东尼的谈话里(我是后来在星期四才看到他的),我得出的印象是女王并没有要他提供意见,他自己也没有主动表示过看法。②

我在楼下那间重新挂起格拉斯通先生画像的会客厅里渡过了一个上午。我读了《傲慢与偏见》——觉得这本小说读起来十分令人宽慰。中午,迈克尔·阿迪恩爵士打来电话,要我下午两点钟到达白金汉宫。看来,事情已经决定了。

当时,我们在十一号顶层布置了一个小饭厅,我们夫妇两人单

① 《1957年年鉴》,第1页。

② 1957年2月3日。

独在家吃饭时就使用它。我给夫人送了个讯，希望在一点整吃午饭，没有把女王召见的事告诉她。可是看我穿上一身不平常的燕尾服，而且一再叮嘱要准时开饭，她也早猜个差不离了。

185 女王十分亲切周到地接见了。虽然过去我担任各种职务时，特别是任外交大臣期间，曾经多次觐见过女王，但是这一次却开始了一种与前迥不相同的关系。首相首先是女王的首席大臣，他首先应该最忠诚于女王。我不能向她隐瞒局势的严重性。确实，我还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提醒她说，我担保不了新政府能够维持六个星期以上。六年以后，在一次接见时，她曾经微笑着向我提起这件事。

按照传统，一个首相或者一届政府辞职以后，皇上可以有两种做法。被选定为首相的政治家可能被邀请试组政府，其后向女王报告组阁是否成功；也可能立即被任命为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然后行“吻手”礼感谢皇上对他的任命。这一次对我用的是后面这种方式。

当我驱车回十一号时，主要想的是我可怜的母亲。下午靠后一点时候，我接到的第一个短筒是我嫂子（得文郡公爵夫人玛丽）写来的。她的心情和我一样，因为她很了解我母亲，对她感情很深。<sup>①</sup>

回来以后我马上就到内阁会议室工作。当务之急是组织政府班子，并在1月22日议会开幕以前使政府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我首先会见索尔兹伯里勋爵，请他留任枢密院长兼上院领袖。虽然他因为健康状况和自己的志趣，对继续参与繁忙的政治活动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但是终于还是毫不勉强地同意了，只是提出一个条件，希望政府里有适当数量的贵族参加。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我接着会见了巴特勒。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他这时的心情，因为艾登不在的时候挑起担子的正是他——

<sup>①</sup> 1957年2月3日。

我也尽了我的能力来分担他的重负。我意识到一定会有很多流言蜚语，一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企图在我们两人间制造不和。我知道一切事情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一道密切合作。我也了解，选定我当首相这样一个决定，由于某种原因，一定使他十分失望。但是，目前政府和我党正处于危险局势中，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大家的诚挚合作上。因此，我认为他除了担任下院领袖之外，完全有权再选择任何一个职位。但是，我又特别希望保留塞尔温·劳埃德做外交大臣，

186

因为，我感到有一个目标受人攻击就够受的了，如果出来两个目标，就不是英国的荣誉所能承受的了。虽然艾登确实因病引退，但是大多数国家仍然会认为他是患了“外交病”。<sup>①</sup>

因此，当巴特勒选择了内政大臣职位时，我心里就象放下一块大石头。

他十分友善，马上以我对待他的态度还报我。圣诞节以前艾登在牙买加期间，我们正是依靠我们的忠诚和战友情谊，共同维持住政府的。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不然我们就一定要倒台。<sup>②</sup>

现在，我可以放开手来请塞尔温·劳埃德继续留在外交部了，他一直在辛勤地工作，挑着重担子。他显得有点惊奇，但是马上就答应了。遗憾的是，这样安排就需要请我一位认识很久而且十分要好的朋友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给巴特勒让路。这是当首相必须做的最难受的工作之一，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历来的首相，不论在筹组新阁时或者在任职期间，碰到需要请老朋友引退和吸收新血液时，总是有些畏缩不前的。做这样的变动而不留下某些恶感，确实是很少见的。在事后散布不满情绪的所谓“朋友”，也不乏其人。但是，我这一次却幸免了。我收到了苏格兰事

<sup>①②</sup> 1957年2月3日。

务大臣詹姆斯·斯图尔特1月11日写来的一封独特的信。对他的才智我是完全信任的——他曾经长期担任议会主任督导员而且和丘吉尔关系特别密切。他的直率使我很受鼓舞：

187

1. 我想，R. A. 巴特勒一定选择内政部。

2. 因此，你最好是让格威利姆·劳·乔“和平撤离”，使你有个回旋余地（如果你要给他一份“闲差事”，又当别论）。

3. 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不过，还不知道你自己的计划是怎样的——我认为对你来说，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尽量取得你所希望有的回旋余地。

因此，我得出结论：如果格威利姆和我一齐离开（都是头脑僵化的老罪人了），给聪明能干的新小伙子们让路，对你一定很有帮助。

另外，如果朱利安·艾默里也属于新人之列（这点我是赞成的），而我这个和你有另一代亲属关系的人现在引退，也许对事情会有好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任何保守党人责备你任用亲戚……你就反驳说：“是的，可是我把詹·斯辞退了”。<sup>①</sup>

他接着补充说：

你应该把圈子扩大，既包括右翼，也包括左翼……我愿意在结束我的公职生涯（已经三十三年多了）之前当一段短时期的后座议员。这样可以证明，并不是所有退职的人都会受到亏待——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情。

劳埃德·乔治也表现了同样的高风格。

财政部现在还空着，因为，连格拉斯通先生在十九世纪当首相时也认为选择财政大臣是件困难事，我在二十世纪当然更不可能轻易就拿出主意来。彼得·桑尼克罗夫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位，他原来的贸易大臣职务由戴维·埃克尔斯接替。我另外一位老朋友沃尔特·蒙克顿真心希望退出政治界。他在苏伊士危机的

<sup>①</sup> 朱利安·艾默里是麦克米伦的女婿。——译者

最后阶段未曾辞职,完全是出自对艾登的忠诚。所以,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再保留他在内阁里的主计大臣职务。我很幸运地找到黑尔什姆勋爵这个难得的人才来接替埃克尔斯的教育大臣职务。原来在内阁里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的塞尔扣克勋爵同意改任不入阁的海军大臣。

我因为受到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观点的鼓励,吸收了一个全新的人物。

星期三午餐时我碰到珀西·米尔斯(多少有点偶然)。我请他星期四下午来看我(由花园门进来),见面时我建议他担任动力大臣。星期六接到他表示同意的信。<sup>①</sup> 188

这就意味着需要把奥布里·琼斯调到供应部。早在战争年代在供应部,后来又在住房部和他一道工作时,我就一直对他的品德很赞赏。虽然他不是下院议员,但是可以用接受一个贵族爵位的办法来补救。这个任命尽管有点标新立异,但是反映还不错。事后证明,把这样一个新人充实到内阁里很有好处,他博得了所有同僚的喜爱和敬重。主要的困难出在国防部。安东尼·黑德因为和三军有过长期的密切交往,而且在最近的危机期间工作很出色,本来完全有资格留任。但是,根据我当财政大臣时和三军军部打交道的经验,我怀疑他是否会同意我们从财政状况出发准备坚持的下一年度的国防开支数字。经过坦率的交谈以后,他决定不能同意我的建议。黑德对待这件事态度磊落,毫无怨言。我高兴的是,后来尼日利亚独立以后,我终于说服他接受驻拉各斯高级专员的重要职务;在这个职位上,他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的国防大臣职务,我挑选了邓肯·桑兹来接替。有的人认为,在这个职权范围还没有完全确定的部门安排一个性格这样强悍的人物,一定会有很

---

<sup>①</sup> 1957年2月3日。



多人反对。

185

我很想发布一个扩大国防大臣权力的“指示”。布鲁克<sup>①</sup>（他是困难中可信赖的人）拟了一个草案，我在任命之前，先争取到三军大臣同意这个草案。由于把黑尔什姆从海军部调到教育部，所以避免了一个潜在的危险。而且我想，他将是一位第一流的教育大臣。毕竟他是今天国内最精明的人物之一。<sup>②</sup>

亨利·布鲁克显然是接替桑兹的住房大臣职务的最合适的人，事实也证明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大臣。我还提拔哈罗德·沃金森到内阁里来。我认为担任运输大臣的人，威望必须和动力大臣大致相当。杰克·麦克莱接替了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苏格兰事务大臣职务；加上任命查尔斯·希尔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内阁总算齐全了。<sup>③</sup>

当天晚上，我拜访了丘吉尔。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应该向我的这位老上司表达敬意。多少年来我一直受到他的亲切关怀，长期得到他的支持和鼓舞。向这位当代的，不，应该说是一切时代里最伟大的英国人求教，看来是完全应当的。他象父辈一样接待我。为艾登的事他很伤心，但是对我表示祝贺，确实使我很感激。这天晚上的会面也不知道怎么漏了风声，摄影师们群集大门的台阶上。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好。

到星期天（1月13日）下午，女王从桑德林格姆前来伦敦听取我的汇报时，内阁的名单已经齐全了。

〔她〕看来很赞赏这些变动。对每一个细节，情况都惊人地熟悉。她特别赞同关于外交部的决定，对我所谈的珀西·米尔斯的情况也很感兴趣。<sup>④</sup>

---

① 诺尔曼·布鲁克爵士（后来是诺尔曼布鲁克勋爵）是内阁大臣。

② 1957年2月3日。

③ 参阅附录二。

④ 1957年2月3日。

于是,内阁名单送给报刊在星期一(1月14日)发表,反映挺不错。这一天我转入

下一件工作——也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工作——就是确定内阁以外的大臣和国务大臣的名单。我决定把欧内斯特·马普尔斯找回来,他本来在住房部干得很出色,但是艾登让他离开了。他高兴地担任了邮政总长。里基·莫德林十分通情达理地答应充当米尔斯在下院的代表和政务次官。他的职位“下降”了(名义上),但是在议会斗争中实际上却是个颇为重要的角色。<sup>①</sup> 191

不久他就被使用到更广泛的领域里去了。

我特别希望说服爱德华·博伊尔重新参加政府。他曾经是我的财务大臣,因为苏伊士问题辞了职。对他的品格和才能我都十分赞赏。我认为他一定对与黑尔什姆搭档以及教育部的工作比较感兴趣。稍为犹豫以后,他接受了政务次官的职务。

我们在16日星期三完成了第二批名单;最后一批——包括各部次官和比较次要的职位——是18日完成的。这时,女王已经回到桑德林格姆,但是她希望我正式呈递名单,由她批准,而不再接见我了。这样,整个政府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组织完毕。普遍认为这个名单很好地保持了各方面力量的平衡。

政府的组成以及不时需要进行的变动,除了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向当时的主任督导员或者私人秘书处和内阁办公厅的高级成员征询一下意见外,是很难找人出主意的。你当然不便在一个阁员面前议论另外一名阁员的优缺点,尤其是牵涉到高级职位时更是这样。即使事情比较次要,只是补充政府里一些较低级的空缺,问题往往也一样地复杂。除了权衡候选人的优缺点和是否合适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考虑。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到全国各地以及党内各种意见的代表性。忠诚固然理应得到报偿,但是,

<sup>①</sup> 1957年2月3日。莫德林的正式职务是主计大臣。

回忆起我的过去来,我认为,对于一些年青的议员,绝不能因为他们有过确实出于诚心好意的不服从行为而加以摒弃。高级大臣们有时候总是坚持要提拔替他们出过力气的年青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要组成一个包括八十多人的政府,就好比拼七巧板一样困难和复杂。只要有一个人下台,不论是高级还是低级的成员,就牵动全局,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动,七巧图案又得改变。我在这次初度尝试中,主要的方针是,根据我所认为的当前情况的需要,尽可能作比较小的变动。在整个工作中,主任督导员爱德华·希思是我最难得的助手。诺尔曼·布鲁克爵士是凡有相请,总是乐于给我出主意的;另外,我的首席私人秘书弗雷迪·毕晓普也是我得力的助手。

首相手下的办事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编制和经费都很可怜。自那时以后,算大大增加了;但是,比起美国总统来,简直微不足道;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相比,无疑也是这样。一直到我的首相任期终结,这个班子始终很小。它的效能主要就取决于那个称为私人秘书处的机构,它由三位、最多是四位职别不高的私人秘书组成;他们挤在一块办公,彼此在干什么全都知道。首席私人秘书的级别是部务次官,其他是主任级。这个出色地帮助我工作的小班子,起先是由弗雷迪·毕晓普负责,后来是蒂姆·布莱。菲利普·德·朱鲁塔主要处理外交事务,但也不是别的事都不管;他是困难中可以信赖的人,在我任期内一直在这里。另外几位,特别是尼尔·凯恩克罗斯、托尼·费尔普斯和菲利普·伍德菲尔德,主要处理国内事务,而且十分擅长答复议会的质询,包括重要的“补充质询”。帮助他们工作的是值勤办事员和所谓“花园室”的人员——这是一批很能干的书记员和打字员,都是很令人喜爱的“年青姑娘”(丘吉尔这样称呼她们,后来一直沿用下来)。她们由富有经验和忠心耿耿的 S. A. 明托小姐领导。上述名单还应该加上政务

次官。我在职期间有过三个人：博比·阿伦、托尼·巴伯和诺克斯·坎宁安——工作全都认真负责。这个小小的办事机构，不论在伦敦或者我的家乡苏塞克斯，不论在首相别墅或者是出访期间，都高效能地为我服务，使我得到经常性的帮助和便利。我必须补充一点：1957年5月，我给私人秘书处增加了一名成员，即约翰·温德姆（现在是爱格利蒙特勋爵），以前在供应部，整个地中海战役时在 193 殖民部，以及后来在外交部，他都在我手下工作过。前后断断续续二十多年来，他和我交往，帮助我出主意，他不领薪俸，但是什么工作都做。

最后，重要性不在上述人员之下的，是负责一项名字叫得比较好听的所谓“公共关系”工作的官员。我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一些前辈，对设置这样一个职务一定会感到诧异和莫明其妙。即使到本世纪初，尽管也用各种方法进行着这项工作，也还没有正式设立这样一个官职。现在，因为传播消息的机构十分庞大，多种多样——有本国的、英联邦的以及外国的报刊，还有无线电广播、电视广播——因此，至少得给这些五花八门的机构中的人员提供事实，这是很重要的。宣传工作当然最好留给党的组织去做。但是政府不但有义务，也有权利保证经常提供准确的消息。我很幸运有哈罗德·埃文斯帮助我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开始任职他就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我卸任。他声誉很好，大家都知道他聪明能干，为人坦率。那些“议会走廊记者”都很信任他的正直。他相信他们，反过来也得到他们的信任。

与唐宁街的办事机构相平行，但是也属于首相手下工作机构的是内阁办公厅。它的负责人是办公厅主任，办公厅的人员给哪一个大臣都办事。不过，因为所有内阁文件都要经首相允许才传阅，而且所有各种大臣级委员会，不论是常设的还是临时性的，都要经首相批准才能设立，所以，内阁办公厅主任事实上具有特殊的

身份，既象是他们的同级，又象是他们的助手。我十分幸运地从一开始就找到诺尔曼·布鲁克爵士担任这个职务。他1962年退休以后，由伯克·特伦德接任，后者也给了我同样出色的帮助。

这一个小小的班子，前后变动不大，一直是我任首相的全部惊险经历里的同事和战友。

194 这个班子里还有一个人我必须提到，她既不在正式编制内，也不领俸给，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这就是我的夫人。她不仅使我们唐宁街十号这个小小的集体里人人愉快满意，而且还帮助我履行各方面的职责——不论是党的工作或者是招待公私宾客，都是如此。她也没有忽视她在我们家乡应尽的义务和她从事多年的各项慈善事业。在我退休以后，她得到女王的封赐<sup>①</sup>，我当然十分高兴，全国也为此感到欢乐。

这个班子当时就在我心中留下了两个主要的印象：

第一是私人秘书处的非凡的办事效率。多罗西和我收到的函电确实不下数千件，凡是曾经认识的或者一块儿工作过的人都发来信件或电报——从渥太华政府大厦的男仆和阿尔及利亚的司机，一直到比较高级和著名的朋友。所有这些函电都经过分门别类，查明发件人的姓名地址（很多人只签自己的教名，所以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并且准备好复件。这对秘书处人员说来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我只是在复件上签字，就忙得不亦乐乎。第二点使我感动的是，他们所有的人行为都十分正直。政治家并不都是损人利己的。国外有一种类似于1940年的精神。除了极少数人例外（而且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他们都把公众的利益和帮助我做好工作的愿望放在其他考虑之上。这确实是一段相当愉快的经历。<sup>②</sup>

我收到的电报里，有一封真是别具特色，那是比弗布鲁克勋爵

---

① 麦克米伦夫人多罗西·麦克米伦1964年1月被封为“大英帝国夫人”，赐大十字勋章。

② 1957年2月3日。

打来的。他提醒我说,他一直盼望和预言我会当首相。果然,我从档案里翻出了一封 1952 年 12 月 31 日我还在住房部的时候他写给我的信,里面说:

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就我来说,很希望你能在那位跟我同时代的老人家决定退休的时候继承他的首相职位——我相信这不会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这次他的电报说:“我早就给你说过:一定有这一天。”

我的任命公布后,美国总统立即发来一封正式贺电,我用恰当 195 的词句回复了。两封电报都发表了。此外,他又写来一封亲笔信:亲爱的哈罗德:

今天早上知道你被女王陛下指定为新任首相以后,我给你发了一封正式贺电,那是一种甚至需要国务院同意的电报。我写这封短信的目的是欢迎你来处理新的头痛事。当然,过去你也有过你的一份头痛事;但是我敢向你担保,原来的一些头痛事比起新的来,简直将如破指比断腿,小巫见大巫。你唯一的乐趣将是看看在所有的人都在使用各种可能设想的武器向你砍来的情况下自己究竟还能前进多远。

由于认识你这样久,对你十分了解,我预言你的历程将是伟大的。但是,你必须牢记一句古老的箴言:“保持你的信心、希望和宽容吧,但是比这一切更为重要的是:幽默感。”

热烈问候你!

你的挚友

德·艾

这两封函电,我都作了恰如其分的答复,不过分热情。我认为在目前阶段,与其当追求者,不如当被追求者。

到这时为止,只出过一次小毛病。1月11日我受命的当天晚上,在经过一整天忙碌的会议和交谈以后,我请主任督导员出去吃晚饭;因为我的仆人还没有从苏塞克斯赶到,唐宁街十一号陈设还十分简陋。我们到图尔夫俱乐部去,我知道那里比较安静,如果有

哪位俱乐部会员在那里吃饭的话，也不大可能是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人，但是，我却完全没有想到已经会有人跟踪。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不会到卡尔顿俱乐部去。十分遗憾，消息让什么人知道了，等我们从俱乐部出来的时候，道路早被报馆、电视台的通常道具堵死了，我还没有习惯这套玩意儿。我原来想，我和我的这位客人经过一天紧张繁忙的活动以后，总有权利去喝上一杯香槟，尝点野味馅饼吧！那些食物、酒瓶，特别是那个俱乐部，全被争先恐后地拍摄下来，当作反动生活方式的标志。有的批评家暗示说，在两个敌

196 对的首相候选人中已经作出最后决定命运的抉择。在史密斯广场——巴特勒的家——大概生活一定比较朴素，思想也比较高尚吧！

1月17日星期四晚上，大臣的全部名单已经确定以后，大家认为我应该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发表一个讲话。这时候的广播技术还比较粗糙，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也不能期待他们成为完美无缺的演员。我以后也逐渐习惯于这种场面了，不过我总是免不了有点紧张，从来够不上内行。这一次碰到的主要问题是究竟应该把讲稿先读熟了，然后象在舞台上那样背诵呢，还是根本就不要讲稿。后一种办法当然有它的缺点，特别是讲话内容牵涉到外交问题的时候。我向组织这次电视讲话的专门顾问们建议说，我还是自然一点好，不时地低头看看讲稿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可是，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有失体统的做法。大约就在这时候，有人发明了一种叫电视讲话提示器的玩意儿，可以把讲稿内容在讲话人面前逐行映出。用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又有两个不利的地方。第一，因为我近视很厉害，看不见讲稿；第二，如果我眯着眼睛勉强看到讲稿，我的样子就会象个僵尸从窗户往外看。后来，我的后任们都已经学会比较熟练地使用这种工具。我最后还是采取了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尽量照我能记住的内容讲，要是底下一句话忘记了，就看一看提要。虽然职业批评家们有些惊讶，但是看来也没有

人去留心这件事。讲话里值得一提的恐怕是下面涉及美国的这一段：

很多人担心我们和美国的<sup>197</sup>关系。自由世界的生存要依靠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任何伙伴总免不了有时候发生一些分歧。我一直觉得是这样。不过真正的伙伴关系是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我们不想和美国人分手，但是也不想当卫星。我可以肯定，他们也不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愈是强大，我们彼此就会成为更要好的伙伴；而且我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关系一定会在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日益密切起来。

这次电视讲话和以后所有各次讲话一样，我很高兴地得到了“无线电博士”查尔斯·希尔和我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和难得的同事、杰出的政治记者乔治·克赖斯特两人专门知识的指导。

象所有的首相一样，我最先着手的是改革、或者说是改善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试图把议程安排得更好些——一天是外交或者殖民地问题，另外一天是国内问题或者财政经济问题等。我也设法使讨论不要过于“部门化”。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从事着一项共同事业的同志，成败大家都有份。<sup>①</sup>

当然，这样的安排不能绝对严格依照去做，但是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

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了。电视讲话过去了，只剩下一些不太重要的人事需要最后确定，因此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坐下来考虑一下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象生活在某种梦幻里。这一切事情果真发生在我身上吗？我真的当了首相吗？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这似乎是一个梦，也许还是个恶梦。这整个事情确实带有某种不很现实、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气氛。也许因为我一生花

---

<sup>①</sup> 1957年2月3日。



在读书上的时间很多，而且我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以旧学问为基础，所以不论从我的性格和所受训练来说，都有一面是属于穿学士袍的“文人”类型。这种文人是原来那种教育制度的产物。在中世纪时，这种制度是要培养“识字的人”去充当僧侣和行政官吏；其后，是培养在各种各样岗位上——国内文官系统、外交系统、军队、印度和各殖民地机构——为帝国服务的人员，以及为下一代提供教师。甚至我的家庭事业也和平静的文学艺术世界有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意想不到地把我变成一个拿刀剑的“武士”。行动——严厉的、残忍的、强制的行动——代替了学问，学士袍换成了军装。

198 从那时起，我一直意识到这种两重性。总的说来这对我是有某种好处的，可以使我在军事危险或者政治烦恼最严重的时刻，脱身回到书本的安乐世界里。我同样学会得到某种平静，当然这不是内心上的平静，因为我已经蒙受了神经兴奋的苦恼；但是，毕竟学得了表面上的平静——也就是后来所谓“镇定”。只有单方面个性的人，也就是说偏向于思索或者偏向于行动的人，是不是就在事业上更为愉快顺利，这一点我说不上来。我爱想到的是：我所崇拜的两位伟大的英雄人物迪斯雷利和丘吉尔，都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既是艺术家，又是行动者。我的一生，包括我所喜欢的经历和我不得不忍受的经历，正有点和他们相似，不过不象他们的生活那么宏伟壮丽吧了。正是想到这里，我拿起笔来在一张便条纸上写下那句我认为可以作为新政府工作指导原则的格言：“静思解万难”，并且把它挂在私人秘书处通向内阁会议室的那道镶着绿色粗呢的门上。这句座右铭后来镶上了镜架，比较高级的官员都认为这是我们的“信号曲”。

确实存在着一些马上就会碰到的困难和危险。最迫切的是需要恢复人民对政府和对他们自己的信心。最近几个月的事件，不

论是对前政府的行动赞成或者反对的人，都为之震动，感到悲伤。连英法联合起来行动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这一事实就足够使人震惊。在历史上西欧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软弱无能；英法竟然需要对付美国和俄国反常的联盟，尤其是一个不祥的怪事。那么，怎样才能恢复某种安全感呢？尖锐的互相指责和激烈的争论，象一场暴风雨似的席卷了议会，几乎一直延续到圣诞节；现在暂时中断，也只是因为身为首相的艾登悲剧性地身罹重病，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了。紧接着是一片惊人的静寂，几乎鸦雀无声，但是一旦“葬礼”结束，休战就会过去，一场反对他的后继人的持续而猛烈的战斗又会重新展开。议会很快又要召开，那时考验就将到来。议会内外保守党的各种裂痕，必须用某种办法加以弥合。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报刊——到目前为止，报刊的态度还是友好和宽容的；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我们利用广播和电视这样的新工具的能力如何——我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很少。未来如何还难以预测。

第二，苏伊士问题有许多善后工作需要做。运河要清理；必须进行斗争来抵制必然会强加到我们身上的屈辱；存在着石油问题以及油管可能重新中断的危险；还有，一旦运河通航，埃及当局是否接受以英镑支付，会不会要求以黄金或美元交纳费用。此外，还有一个迫切问题，就是赔偿英国臣民在战斗中所受的损失和他们被纳赛尔没收的资产。每解决一个疑难，都随时会暴露我们的某一个侧翼，给右派或左派提供进攻的机会。

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美国，怎样重新建立起我们明知是文明世界必不可少的那种联盟关系？现在来争论谁是谁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无损尊严地尽快恢复起来。华盛顿对待他们在中东的义务，态度上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转变，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在所有问题中，伤脑筋最少的

可能是这一个。

第四是经济形势。最近我们已经争取到美国的一些援助，而且由于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经济情况有了出乎意料的改善。但是，根据我在财政部的经验以及我从其他的政治活动里所了解到的情况，要把英国的经济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既不造成通货膨胀，又不致银根短缺，使增长的快慢适度，是一件很微妙细致的工作。不论年青有为的经济学家和记者，或者坐安乐椅的年老专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总是有无数意想不到的事情和难以捉摸的情况。这个课题不是用数学公式或者精确的计算所能解决的。就象骑自行车走钢丝一样。

第五是防务问题。苏伊士远征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塞浦路斯的真正价值如何，应该重新研究。更重要的是，象我在担任短短几个月国防大臣时就考虑到的，要重新估计常规武器与非常规武器两者之间相对的重要程度。如果我们主要依靠核威慑的话，最  
200 困难的事情就是争取美国修改麦克马洪法案，取消禁止向我们提供核情报的规定。但是，从华盛顿目前的气氛——至少是政府方面到目前为止的态度——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

最后是关于英联邦的未来。在苏伊士危机中，就我的判断，原有的一些英联邦国家，都抱着忠诚和谅解的态度，表现非常坚定。印度虽然天生就不喜欢以武力作为实现政策的工具，还是表示了同情和明智。巴基斯坦和锡兰也是这样。在这几个月内，将需要举行一次英联邦总理会议，这个会议一定要小心掌握。但是，未来又该怎样呢？我想起，来年加纳和马来亚都该到宣布独立的时候了。这个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能够抵挡得住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它纳入有利的轨道呢？是不是我命中注定要当帝国的改造者或者取消者呢？

在这段刚接任的紧张时期中唯一可以腾出来思考问题的短暂

间歇时间里，我把所有这些可以预见的障碍都考虑过了。如果新政府想维持下去，就必须尽我们所能来克服这些障碍。与此同时，眼前还有两道小小的栅栏需要尽可能轻快地跳越过去。

第一道栅栏是党的会议——就是按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照例要举行的会议，保守统一党的各方面组织都参加，目的是正式选出党的领袖，认可已经作出的选择。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所有参加保守党议会党团的下院议员和即将当选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参加上院党团的贵族议员，以及保守统一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委员，男女代表共达一千人。会议于1月22日星期二中午在威斯特敏斯特教会大厅举行。会议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我夫妇不参加，在会场外一个休息室里等候。索尔兹伯里勋爵主持会议，提出一个表示遗憾地接受艾登辞职的动议。因为丘吉尔缺席，由在场的年事最高的枢密顾问官沃尔特·埃略特附议。后来我听说，正如我应该预料的，他发表了一篇十分动人的演说。沃尔特·埃略特对托利党哲学的发展作过巨大的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很多老年的与他比较接近的人都还记得这位政治人物，但是一般公众恐怕都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了。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建议选举我为领袖。还是由索尔兹伯里勋爵动议，这回附议的是巴特勒。他理所当然地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发言以后，埃里克·埃林顿爵士以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表示拥护，决议以一致票通过。

这时候，多罗西和我在讲台后面的一个小休息室里等候，由议会党团主任督导员爱德华·希思招呼和照顾，他甚至还鼓励我。时间到了，他领我去就座，然后仪式的第三部分就开始了。幸亏开会的时间选择在中午12时，所以所有的发言，包括我自己的讲话，时间都受到限制。实际上，整个事情只用了五十分钟。我当然首先向我的前任表示敬意。

我是安东尼·艾登三十多年的朋友了。除了我们个人之间情谊与日俱增之外,我还了解并敬重他的两个显著特点:勇敢和正直。将来,当一切论战的云雾消散以后,他一定会因为这两点优秀的品质而长久受人怀念。

其次,我说我对被选为领袖,既感到鼓舞,也觉得惭愧。所以受到鼓舞,是因为这个职务的传统;所以觉得惭愧,是因为我肩负的将是极其重大的责任。我高兴的是我将不会是孤单的一个人。在这些年经历种种盛衰浮沉的过程中,我一直得到我夫人的支持;没有她的帮助,我可能一事无成。除了是我的一位最内行最热心的选票征集人之外,……

202 她经常帮助我注意生活的现实。各种白皮书和各部的文件里往往隐藏着这种生活现实。你可以从有四个子女和十一个孙儿女的这件事中了解到很多问题。每当我对于困扰着人民的那些日常生活问题表现出漠不关心的迹象时,我夫人总是把我拉回到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来,因为说到底,政治管的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

然后,我又谈到对党忠诚的问题,特别是力量不断增长的青年保守派运动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又转到政府的改组,

这必然要引起和某些老朋友难过地分手,正如需要吸收新鲜血液一样。在此,我愿意对大家所表现的那种把事业置于个人之上的精神表示敬佩。

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良好的内阁,一个良好的政府。如果没有巴特勒先生秉着高度的忠诚和合作精神给予我的帮助,我肯定无法接受这个任务。

在转而谈到广大的普通党员时,我回忆说,自从我第一次充当议员候选人以来,已经渡过了三十四年,总共经历过十次激烈的竞选。我曾经走遍全国大部分选区。

我所学到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那种我愿称之为我们党的温暖和友好的精神。你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以同志相称呼的人都一定能表现出最

兄弟般的感情的。

因为报刊上对我们党的右翼和左翼谈论得很多，所以我认为最好是谈一下我们党包含有各种不同成分的问题。虽然我的全部政治生活是在我想人们会称之为党的左翼的那部分人里渡过的，而且在两次大战之间我甚至还辞去过议会党团领袖的职务，但是，现在我却被认为属于党内的右翼。我不禁对某些政治评论家所写的短篇回忆录感到有点好笑。

我经常听到一大堆关于左翼和右翼的愚蠢议论。我们党的哲学洪流中有着许许多多支流。事实上，当各左派政党分裂成某种混乱的三角洲时，我们就增加了新的支流。这样，我们这股巨大的河流继续胜利地流向大海。我们不大相信开除党员有什么用处。我想这样看是好事情，否则许多年以前我无疑早就成为开除的对象了。

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坚强的原则。我们运用原则，<sup>203</sup>总是力图讲究实效，或者换句话说，总是力图合乎常理。对于旧的思想，我们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旧的就加以接受或摒弃；对于新的思想，我们也不仅仅因为它是新的就加以接受或摒弃。唯一的标准是这些思想是否符合共同的利益。

用迪斯雷利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做保存一切好事物的保守派和根除一切坏事物的激进派。我们党之所以从来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或某一种宗派利益的政党，原因就在这里，而且我确信，只要我是你们的领袖，它就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党。

男子和妇女都有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谓权利，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谋福利的权利；所谓义务，就是对皇上和对她的臣民应负的义务。这种哲学支配着我们对待社会问题的观点。

我们国家里有一些人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以为社会改革是社会党人在1945年开始进行的。这不对。我们的社会服务制度是几个世纪以来依靠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思想和行动建立起来的。我们的观点与社会党人的观点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相信，我们只有给强者能者提供机

会,才能有办法给弱者老者提供真正的保护。

也许最吸引会场内外听众的,正是最后这句话。这确实是两党之间目前仍然存在的真正区别。

最后,我宣布在国外也必须和在国内一样做法。我们不但有我们不会规避的对伙伴和盟友担负的义务,而且有我们决心加以维护的权利。

这一切似乎都十分顺利地过去了,所以我对当天下午将在下院进行的下一个考验不太担心。虽然我因为是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现,心里有点紧张,但是一切经过都很好。正如一家报纸所说的,我受到了“恰如其分的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欢迎”。对我的态度是够温暖的,但不是过分热烈的。显然,在这样一种场合里,主要目的应该是向我们的前任领导人表示敬意,同时对他的继任人表示有节制的欢迎。在最近几个月里习惯于大事喧闹的工党,在这次会上只限于发出少量嘲弄的叫喊声和笑声。

在质询以后,盖茨克尔站起来向前任首相表示敬意。就象他通常在类似场合下的习惯做法,话说得非常得体。下院双方都为他的宽宏气度和美好词句所感动。他在讲词的最后一段,有礼貌地提到我继任首相的事,表示了他的祝贺和他“纯粹个人的良好祝愿”。

我很难说我们希望他长期在任;我也无法表示我们准备给他轻松的日子——他也不会对此抱希望。……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我们将乐于卸去他的职务负担。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刻,在一连串议会战斗的风暴行将开始的时候,我愿意用上述几句话来表达我个人的良好祝愿。<sup>①</sup>

然后,乔·格里蒙德说了几句有关艾登的话;接着,是下院年事最高的议员戴维·格伦费尔发言。我致答词,只用了不多几句话。对艾登表示敬意,我是重复了在党的选举会议上所说的话。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月22日。

他有两个伟大的品质——勇敢和正直；他总是按照他认为正确的去做。对一个人的称颂也莫过于此了。至于反对党的领袖，我感谢他们的欢迎，不过我也知道，他们所说的关于我的那些美好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战斗前应景的前奏曲，有如决斗前的敬礼一样”。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感谢他们。我保证尽我的所能为整个下院效劳。

我夫人坐在旁听席上，会后我们一齐步行回唐宁街。我们的心思很自然地转到正在前往新西兰的长途旅程中的安东尼和克拉丽莎。我们也想到我们眼前的情况和未来的远景。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党和下院的情况，取决于双方的极端分子对他们的观点准备坚持到什么程度。这也将取决于我的内阁同僚们坚定的程度如何。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记住了墨尔本勋爵的友人汤姆·扬鼓励他的一句流传若干代的名言。当时，墨尔本勋爵因为首相职务是“该死的累赘”而不愿担任首相，扬告诉他说：“什么！滚他妈的！希腊和罗马从来没有人担任过这样的职务；不过，如果只是三个月期限，当一次英格兰首相也值得！”对此墨尔本回答说：“老天爷在上！这倒是真话！”<sup>①</sup>我呢，只答应女王干六个星期啊。

---

① 戴维·赛西尔：《墨尔本勋爵》，第111页，1954年，伦敦。



## 第六章 苏伊士的善后

不管在唐宁街十号居住的时间可能多么短,而且多么不安定,我们夫妇还是搬进去了。

这房子非常舒适。我有一间很好的屋子做书房,紧靠着多罗西的“闺房”(她在楼上布置了一间工作兼起居室)。房子大了点,不过颇有气派,挺吸引人,“很适宜于居住”。<sup>①</sup>

几天以后,丘吉尔单独前来吃午饭。

我在唐宁街十号招待他,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他已经上年纪了,但是对情况还是很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他很少放过。<sup>②</sup>

他对我在受命以后马上就去拜访他,感到很高兴;对我真是一片好意,简直象父辈一样为我的前程祝福。事后不久,他通过一位犹太复国运动的朋友给我送来一个短筒,中心意思是说: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1949 年起禁止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运河,拒绝让亚喀巴湾作为国际水道对待,所持的理由是它们与以色列尚处于战争状态,说它们这样做只不过在行使交战国的权利。与此同时,它们却抱怨说它们是以色列在 1956 年 11 月发动侵略的受害者。丘吉尔认为:如果阿拉伯人的第一个论据成立的话,以色列这次进攻西奈就不成其为侵略行为,而只是通常的军事进攻。2 月 24 日他送这份备忘录给我的时候,还说:“我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务院的做法感到很惊奇。”我能够得到他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并且得知

---

① 1957 年 2 月 8 日。

② 1957 年 2 月 14 日。

他对这些重大事情一贯这样深切关心，心里十分高兴。

2月的第三周，我们夫妇第一次去看首相别墅。

207

[这栋房子]对它的描述已经很多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多说了。它当然是一座很好的房子，不过已经被相当糟蹋了。那个大厅（利用一个露天庭院修盖起来的）最煞风景。有许多精美的家具，有些珍贵的美术品——（有的）也很平庸。但是，东西显得太拥挤了。不管怎么说，房子是挺舒适的——暖气很足，有很多空军女辅助人员在当仆役。<sup>①</sup>

后来在当首相的几年里，我觉得这座别墅用处很大。这确实是一份高贵的礼物。1917年房主捐献这座房子时，附带赠送了一笔可观的收益，用来维修这样一栋华丽的房屋和庄园；但是，遗憾的是现在却需要国库拨出大笔补助。花园设计和修整得很不错；房后有一片斜坡草地，衬托着没有破损的伊丽莎白时代式样的朝北正墙，景色秀丽，特别令人喜爱。有一条小道穿过一片小树林通上小山，上面是一个小丘，相传曾经是森贝灵王<sup>②</sup>的碉堡，从这里往下眺望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景色壮丽。房子朝南的一面经过较大的改建，伊丽莎白时代式样的石平台和现代的阳台太多了。这座别墅毕竟是国家的一座华丽建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它设备齐全，既适于公务使用，也宜于个人休憩；用来招待外国贵宾和英联邦各国的总理、部长们，尤其合适。我差不多全是拿它作这两个用途的——或者是接待大批公务上的客人，或者自己单独在那里住一个短时期，以便安静地工作，考虑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个地方我夫人一直不喜欢，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她的主要消遣是种花。但是人们显然天生有一种缺点：如果花园不是自己的，种起花来就不那么带劲，因为你不能肯定今年栽下的

---

① 1957年2月17日。

② Cymbeline, 莎士比亚同名著作中的英格兰国王，相传指公元初英格兰一个公国的君主库努贝灵王。——译者

208 小花木到来年春夏自己还是否能有机会欣赏。因此，我习惯于把别墅长期借给一些阁僚使用，特别是塞尔温·劳埃德。

这时我们已经在十号安顿下了。显然，每个在这座著名的房子里住过的人，总是给它增添一些他生活上和性格上的特色；我夫人也带来她一份特殊的礼品。她很快就熟悉了大家的名字，关心每一个人的寒暖忧乐，包括私人秘书处和“花园室”的人员——秘书和打字员——一直到通讯员、门警和女话务员。有意思的是这座房子没有后门，不过花园有一道通大街的门，有时候，一些贵宾和秘密访客就从这道门进出。但是牛奶瓶之类的东西平常却放在正门外，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好象也是打这个门送进来的。现在，除了往常这类挡路的东西以外，又加上自行车、三轮摩托、小孩踏板车，偶尔还有一辆婴儿车。这都是我那个大家庭里大大小小成员的东西。多罗西经常来往于伦敦和苏塞克斯，回来的时候总是坐一辆“福特”或者“奥斯汀”小货车，满装蔬菜、鲜花和大包小包的东西。因为她到达时一般正是各部大臣和其他贵宾开始前来的时间，所以往往造成某些混乱。我只好想法说服她安排其他适当的时间到达和卸车。同样，我还不得不告诉我的几个孙子，如果他们想和门警下棋或者打牌，我并不反对，不过不要因此妨碍大使和内阁大臣们进出大门。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在头几个月里倒使新政权给人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甚至还因此增强了人们对它的信心。

虽然我当然早就意识到首相的工作格外头绪纷繁，但是，这种新的生活与我过去的经历差别之大，实在使我有惊。当一名大臣，无论他的部多么重要，总是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问题上。我待过的那些部，情况确实都是如此。供应部的问题虽然五花八门，而且很伤脑筋，但总的就是一个问题：装备全国。在北非时，情况尽管错综复杂，我需要处理的只是

地中海的问题；而且，在我转到意大利或希腊问题时，法国的<sup>问题</sup>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住房部的工作虽然牵涉面很广，目的却很单纯。国防部也是这样。至于外交部，虽然在我短短的任期内全世界发生许多各色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不必很操心下院，也用不着多做公开演说，可以和我的顾问们安静地专心搞自己那份工作，或者到国外去作些有趣的旅行。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我又回过头来处理一些虽然困难、但是范围有限而且多少是沿着比较单纯的轨道进行的工作。现在我却发现自己孤单寂寞（因为除了那些首相不大想见的人以外，很少人求见首相），自己一个人长时间地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工作，只是到下院去才出一次门（因为我的住房就是办公地点），难得才上一次俱乐部。日子大部分打发在会客或者开会——内阁会议、国防会议或者为解决某一特殊问题而举行的大臣委员会会议。有时为了回答议会质询，要到下院去个把钟头，其余的时间就是批阅文件，准备电稿，处理那些最后都堆到我这里来解决的五花八门、复杂纷繁的难题。

2月9日，也就是我接任首相职务一个月以后，我写下这样一段笔记：

经过考虑，看来眼前迫切的问题有：

(1) 联合国和以色列。只要以色列拒绝撤离加沙等地，联合国就会宣布以色列没有履行决议，而且可能对它实行制裁。联合王国的意见是不赞同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出面，阿拉伯的舆论就会对我们更加不满。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拘泥条文，因循迂腐，表现非常软弱。

(2) 叙利亚和埃及……。由于第1点，叙利亚将不会允许修复地中海油管，埃及也可能封闭运河。

(3) 纳赛尔和运河。他可能拒绝英法船只通过。

(4) 运河通航税。纳赛尔将要求收取全部通航税。我们如果拒绝，就得不到石油；如果答应呢，又丢尽面子（还可能丧失在下院的多数）。<sup>210</sup>在这个问题上，杜勒斯又是光说漂亮话不干事。

所有这一切,使得未来几个星期的前景十分暗淡。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眼前的困难,日子就会好过得多。<sup>①</sup>

但是,即使这么多事情,也还没有包括一切在内。因为,还有公布预算数字的问题,特别是民用预算数字的大幅度增长,一定会动摇公众的信心。有农产品价格补贴问题——每年都是个头痛问题,常常造成危机,有时候人们感情激动,甚至会有人提出辞职。此外,我们又决心提出一个以核概念为基础的惊人的新防务政策。最后,我们还需要弥合和恢复我们和美国的关系。

两个星期以后,情况还是依然如故。

现在,半空中的“小球”<sup>②</sup>比原先我计算的还要多。在外交方面有: 1) 以色列——埃及; 2) 运河的清理(现在被埃及封闭了); 3) 运河通航税——短期的问题; 4) 运河的长期解决办法; 5) 叙利亚油管。在英联邦方面有: 1)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 印度威胁要退出英联邦; 2) 和马尔他的会谈, 由于明托夫的不妥协, 接近于破裂了。

在防务方面: 1) 驻德英军问题, 我们想缩减, 遭到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对; 2) 德国负担驻军维持费问题, 一两个星期前还好象“垂手可得”的五千万英镑的协议, 德国人正拚命想摆脱; 3) 部队的缩减——以及部队的新编制。

在内政方面: 1) 高额的民用开支; 2) 医生们要求二千万英镑; 3) 养老金; 4) 预算的前景。

即使哪一件事都很顺利, 我们还是会有困难。何况当然不可能什么事都顺利。<sup>③</sup>

此外, 当然还有避免不了的补缺选举, 全部结果都不佳, 其中有的特别糟; 选举学家们——民主制度的占卜家们——作了令人沮丧的估计, 按照《年鉴》的冷酷判断, 这些结果“不同程度地着重

---

① 1957年2月9日。

② 参阅本卷原书第3页。——译者

③ 1957年2月25日。

表明保守党已经不再拥有使它在 1955 年春季大选获得胜利的那 211 种程度的支持了。”<sup>①</sup> 我们票数的减少在有些地方达到百分之四、五，甚至百分之七。但是奇怪的是，减少的百分比并不比苏伊士危机前补缺选举时厉害，也许是因为公众根本不介意苏伊士问题，而更关心的是房租法案。

除了所有这些操心事，我们现在还得面对遍及各个工业部门的破坏性罢工的威胁。3 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从巴黎回来以后，我写下了下面一段日记：

回来以后有一大堆工作——全是麻烦事！造船业罢工，接着似乎肯定是席卷机器业的罢工。然后是铁路！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加沙地带，是一片乱糟糟。纳赛尔无礼侮慢联合国，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谴责。总统病了，杜勒斯在新加坡，而哈马舍尔德则无比软弱。<sup>②</sup>

罢工突然间好象扩及那样多的工业部门——造船业、整个通用机器业，现在再加上铁路，很可能接着又有电站和码头——原因不容易分析出来。有一位阁僚

（根据他在下院休息室听到的说法）相信这是共产党人、极端主义的工会领袖和工党议会党团搞的政治阴谋。他们因为用议会手段搞不倒政府，用普通方法、甚至依靠民意测验和补缺选举的变化也无法使我们“摇摇欲坠”，因此希望造成一种无法维持的工业形势来搞垮我们。<sup>③</sup>

我不大相信这种有点罗曼蒂克味道的解释。

我认为，工会（自从 1939 年）长期以来都是为所欲为，他们根本设想不到到达一定程度就会碰到坚决的抵抗。<sup>④</sup>

很快又加上别的事情：一名阁员发表了轻率的言论（结果需要在下院替他辩护）；另外一名又辞职，是个高级阁员，又是我的老朋

---

① 《1957 年年鉴》，第 8 页。

② 1957 年 3 月 10 日。

③④ 1957 年 3 月 15 日。

212 友(这件事看来几乎动摇了政府的稳定)。3月31日我写道:

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辞职、苏伊士的失败、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各行业的罢工和普遍感到出了毛病,报章上预言政府很快就要垮台。《星期日快报》特别刻毒。我一直感到这几个星期恐怕是最危险的。如果我们能渡过夏天,就能站得住脚。<sup>①</sup>

我初次受任首相的头四个月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只是到5月15日和16日关于苏伊士善后的最后一轮辩论结束以后,我才感到我们已经渡过了难关。我们现在只要稍为走点运气就应该可以把政府维持到议会的例行休会期。事情果然是这样。

我接任首相时,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清理运河航道上的各种人为障碍物;重新开放运河的条件,特别是有可能强加给英法船舶的各种条件;以色列的阵地,它的军队除了占领着俯瞰亚喀巴湾的关键的沙姆沙伊赫高地外,还占领着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西奈半岛;叙利亚油管的开放,这条油管去年11月停止了使用;最后还有,美国政府变化无常、难以捉摸的态度。

所有这些问题都互相联系着。经过多次争论后,虽然总算允许英国的打捞船队操作几个星期,但是,负责指挥联合国部队行动的惠勒将军却要求我们的船只最迟在1月底全部撤出,这个做法显然是美国指示的。结果,清理工作遭到不必要的严重拖延。虽然到了3月底已经清理出一条可供载重四千吨的船只通行的航道,但是全部工作一直拖到5月才最后完成。这项工作的延宕,部分是因为不愿使用英国的设备,部分是因为技术上的困难,部分也由于纳赛尔的阻挠,他在他的其他要求得到满足以前,一直拒绝允许把“埃德加·波纳特”号拖船移离航道。

213 就在这时候,美国的政策有了重大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在有关信念或道义的一切大小问题上,都继续以近乎狂热的虔诚态度,

<sup>①</sup> 1957年3月31日。

认定联合国绝对地正确,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另一方面,却开始在发展一种不久以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策。总统因为看到中东正在出现力量差距,并且经过长时期终于意识到俄国不断渗透的危险,所以这一年开初,他就要求国会授权他采取措施来弥补自由世界防务上的这个危险裂缝。俄国和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之间那种反常的调情,原来如果说还没达到法律上结合的程度,至少也是私通,现在却开始冷淡下来了。国务院看来已经意识到事情的危险,因此私下里甚至责备我们没有坚持对埃及的军事占领。按照总统的说法,这个新的主义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他将有权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

来保证和维护[中东]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只要这些国家遭到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任何国家的武装进攻,并且要求我们进行上述援助。<sup>①</sup>

第二,除了原来已拨的其他款项外,追加二亿美元作为对这些处于压力下的国家的额外援助。

这个亡羊补牢的大胆行动,我们当然欢迎,因为它至少表明美国重新面对现实世界。条条框框当然还是不少。必须别人提请援助,美国才能进行干预;但是,有那样多的公开和秘密的外交手段,这一点不会造成多大的困难。所谓“侵略”的确切含义,即使照杜勒斯在国会委员会上所作的解释,仍然很含糊。共产党人用他们惯用的手法颠覆一个政府,算不算侵略行为?我们大家记忆犹新的最近例子,就是1948年的捷克事件和1956的匈牙利事件。根据这个新教义,上述这两起事件算怎么一回事呢?这些问题经常 214 被问到,却很少得到答复。但是,总的说来,艾森豪威尔主义在西欧还是受到欢迎,尽管是满意与疑虑参半。至少,这个主义可以

<sup>①</sup> 《1957年年鉴》,第195页。



避开安理会的否决权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看起来，迄今为止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珍贵条规，现在统统要从属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实际利益了。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尽管1月5日宣布了这个新教义，1月30日众议院接受了，参议院在经过多次争论后3月初也最后通过了，可是，华盛顿对过去的事件和它的盟国所采取的行动，态度并没有改变。有点使我们吃惊的是，杜勒斯甚至宣称，“除非我们迅速进入这个地区，否则局势将不可收拾”。可是这话却只适用于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海陆军。对他们来说，一定的背离教规的越轨行动是允许的，而别的国家却必须严格遵守战后在旧金山拟定、现在在纽约联合国的宏伟的玻璃庙宇里供奉着的正统教义。

不过，所有这些都还是将来的、未知的、不确定的事情。眼前需要的是重新开放运河，以及重要性虽然稍次但也不小的另一件事，即修复叙利亚油管。麻烦在于：这些对我们说来意义重大的事情，我们的美国朋友并不感到迫切。早在1月6日，开罗电台就报道说，纳赛尔声言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占领着埃及的领土，就不允许英法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英法政府当然作出反应，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提供保证，不许埃及在以色列人同意完全撤退自己军队之前实行任何这样的歧视政策。1月17日至19日联合国辩论时，以色列人受到沉重的压力。到1月22日，他们同意完全撤出西奈半岛，但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除外。凡是以色列军队撤离的地区，立即由联合国部队接防。但是，以色列在得到对等的保证以前，当然不愿意撤出上述两块阵地。这时候，它实际上正同时受到两方面的讹诈。在开罗，纳赛尔企图运用他对运河的控制来争得海运国家的支持；在纽约，卡博特·洛奇则试图以歇斯底里的责骂和游说相结合来制服以色列的代表。

这种形势当然使伦敦十分忧虑。如果埃及非法地违背条约反

而得到奖赏，得以继续利用加沙地带作为突击队袭击以色列的基地，威胁要重新发动一场战争“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和切断以色列经过亚喀巴湾的海运，那么，不论是英国议会或英国国内的舆论都不会答应。埃及人禁止以色列船只使用运河，本来就违反了1888年的协定。如果他们竟然不让以色列人使用以色列自己的港口爱拉特，难道这还能容忍吗？美国人现在似乎正在争取一旦以色列人拒绝遵循联合国的要求时就对他们实施经济上甚至军事上的制裁。这样一个方针，我们的一个顾问把它形容为是“不可思议”的。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说法通常总是意味着事情将要发生。反过来，以色列如果绝不妥协，也会置我们于同样的困难地位。甚至对我们态度很友好的伊拉克首相努里·帕萨也对我们说，他认为从加沙地带撤离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要换取某些保证。如果现在英美两国政府能够执行一个共同的政策，就可以重新取得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加强自己对抗埃及的力量。就这样，我们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地位。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对以色列的影响，使它同意作一些妥协。但是如果赞成对它进行制裁，就既有失荣誉，也有失公平。要是不作任何让步，则运河不能重新开放，叙利亚的油管也会继续中断。不幸的是，以色列人和美国政府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怎么关心。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的内阁成员们大致上同意了塞尔温·劳埃德和我拟定的方针：

这就是：1)我们不能投票赞同对以色列实行制裁；2)为了使我们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尽可能保持友好，我们将设法由(比方说)加拿大提出 216 一个呼吁公平解决争端的“温和的”建议。<sup>①</sup>

如果以色列人坚决不妥协，美国人显然会感到忧虑。

现在已经“起来面对”现实的美国人，正感到愤怒和困惑，我们唯一

---

<sup>①</sup> 1957年2月11日。

的办法就是往后靠一点。国务院曾经找我们和加拿人一块商量，大家正在议论也许在最后一分钟能够找出一个妥协的办法。<sup>①</sup>

我仍然认为可以想出某种对以色列提供保障的办法。当然，埃及人很可能以阻止惠勒将军完成他清理运河的任务作为回击。同样地，除非以色列的条件能够得到同意，否则恢复叙利亚油管的希望就不大。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遭受重大的损失；伊拉克也是一样，因为它的石油要通过叙利亚外运，而且我们为了支持努里·帕萨继续当权，也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支援伊拉克。

上一个多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直在度假，打高尔夫球和猎鸟，现在回到华盛顿了。关于以色列和埃及有关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的争议，情况愈来愈混乱和危急。美国政府终于被推动起来面对现实，而可怜的福斯特·杜勒斯却仍然愈来愈犹疑不决。如果亚非国家提出另外一个“制裁”以色列的决议案，我们也将处于最困难的境地。<sup>②</sup>

遗憾的是，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以后，竟然发表了一篇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退的广播讲话。

2月20日以色列大使前来见我，我着重告诉他有必要作出某种姿态。我对他说，英国的舆论明显地倾向于“一揽子”交易，既要撤军，又要有一些适当和有效的保证。

217 从质询中显然可以看出，对总统昨天晚上的广播演说下院双方的不满情绪正愈来愈增长。我们全都认为他对以色列问题的态度是死扣条文，片面得很。当然，幕后正在进行的事情我们不能往外说，因此我们只好把所有的不是都包下来。我们的荣誉与我们的利益正处于矛盾中。我们希望以色列人尽快撤退——以便运河清理工作能够继续，压力也可以转到纳赛尔身上。一旦对以色列进行“制裁”，我们又实在很担心搞坏和产油国家的关系——不论我们自己投什么票。我们不能轻易投票赞

<sup>①</sup> 1957年2月18日。

<sup>②</sup> 1957年2月19日。

成“制裁”，因为我们认为以色列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即使是弃权，也一定会损害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而且可能动摇我们在国内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出一个解决办法。<sup>①</sup>

最后，我们决定投票赞成由加拿大人提出的决议案，并设法对它作某些修正。我们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支持制裁，而将根据事态发展来决定投反对票还是弃权。现在，我必须明确而公开地申明我们的立场了。我是在回答伊曼纽尔·欣韦尔的一次质询时这样做的，用的是下列词句：

我们认为以色列人应该撤出加沙地带。我们同样认为联合国应该负起责任来，而且联合国部队应该驻扎在那里。我们认为以色列部队应该撤出亚喀巴湾西岸。我们同样认为，在撤退的同时，联合国和一些主要的海运国家无疑应该明确地表示它们认为世界各国船只都可以自由进出这些水域。<sup>②</sup>

事后交换意见，表明下院各方都同意这个方针。

因为总统喜欢听取“普通人”的意见，我决定给他发一封私人电报（2月22日）。我想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在电报里我以老朋友的身份请求他以同情和谅解的态度研究我的呼吁。他在广播讲话里曾经对英法盟友通过撤退军队对世界秩序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敬意。接下去还说，这一情况使全世界有重大的义务 218 保证这两个国家不受损害。我国人民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外，也不能同意要以色列去做那些它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我宣称，我国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事先有一个明确的谅解，不许埃及继续违背国际法和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撤退将是合理的。关于加沙地带，最好的保证办法就是联合国部队立即接防，在民政管理上要作出某种安排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至于与

<sup>①</sup> 1957年2月21日。

<sup>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2月25日。

以色列生存攸关的亚喀巴湾的使用问题，由于埃及多年来一直拒不执行向以色列船只开放运河的决议而没有受到任何制裁，所以以色列当然对撤退有所犹豫。因此，可以由联合国作出一项决议，或者更好是由美国发表一项声明，其他国家也可以参加进来，保证以色列使用亚喀巴湾的权利。联合王国不在联合国内出面带头，可能比较明智；但是我敢肯定，如果这个计划是最可取的，加拿大一定愿意带这个头。

总统复电说，他认为对以色列进行谴责和表决制裁问题将是错误的，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候是这样。也许，一个既要求撤军、又对以色列提供保证的决议案将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认为这样一个决议如果不规定以色列拒绝执行时将对它产生什么后果，就难以获得必要的赞成票数。这封电报虽然逻辑上有毛病，至少还是表明总统对问题的症结有所了解。

由于杜勒斯私下向以色列人保证他们的条件将得到满足，所以以色列人3月1日在联合国宣布他们愿意撤出加沙地带和他们在亚喀巴湾的阵地。同时，我们在纽约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认为亚喀巴湾的进出口蒂朗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有权通过。美国代表在联合国支持了这个观点。

219 在下院，从质询中可以明显看出，所有的党派都因为联合国和美国态度暧昧和不公平而愈来愈尖锐地批评它们。叙利亚和埃及3月7日坚持说，除非以色列履行它们的条件，否则不论油管或运河都不能恢复使用。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相信杜勒斯的保证，开始撤退军队。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接收；几天之内，油管就恢复了。因此，局势看来正在逐步改善。

在这个转折关头，我因为我们的防务安排，需要到巴黎作一次短暂的访问。摩勒和皮诺给我作了

有关他们访问华盛顿的情况的非常生动有趣的报告。根据他们的

看法,在需要作重大决定的时候,总统完全可以作主。他象个国王,朝中大臣都谋算着取悦于他。皮诺详细地叙述了以色列在最后阶段同意撤出加沙和亚喀巴[湾]时的情况。看来,杜勒斯蒙骗了以色列人,要不就是卡博特·洛奇在联合国里执行了不顾国务院意旨的方针。<sup>①</sup>

我对这一切说法当然采取保留态度,但这究竟是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不幸的是,联合国部队一进入加沙地带,立即就把民政管理工作转交给埃及人。突击队的袭击马上又开始了。但是,以色列人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他们避免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且由于艾森豪威尔主义日益被强调,他们得到一定程度的鼓舞。不管怎么说,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的驻留,多少给了他们一种安全感。

因此,虽然存在着许多显然难以克服的障碍,某种类似正常化的状态算是初步恢复了。运河到3月底将可以使用,至少较小的船只可以通过了,大型船只则要稍晚几个星期。不过,现在需要应付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据什么条件才“允许”我们和其他海运国家使用运河?

在跨越这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之前,有另外一个比较小的、但 220 是关系也颇大的障碍,经过谈判顺利地解决了。年初,我们驻安曼的大使查尔斯·约翰斯顿曾经向我建议说:考虑到约旦公众的情绪,如果我们同意以一项新的安排来代替现存的英约条约,规定逐步撤出我们的军队,留下某些军事设施作价让给约旦,那么,我们将可能赢得而不是丧失约旦人民对我们的好感。因此,我们在1月16日通知约旦政府,表示我们愿意和它讨论取消旧有条约的问题。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达成了一项新的协定。这件事不是我们被迫同意做的,而是对我们有某种实际利益的行动。旧条约对我

<sup>①</sup> 1957年3月9日。

们说来战略重要性不大,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特别是签订了巴格达条约以后更是如此;而且旧约本身还使我们承担着繁重和开支浩大的义务。事实上,据后来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英国军队驻在那里,对约旦国王及其君主政权的好处,远比对我们的好处大。我们仍然继续维持与约旦的友好关系,而且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它发展经济。我们甚至在他们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同意他们延缓偿付已商定偿还期限的债务。我们理解国王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所处的困难地位。他当时和后来都一直耐心而勇敢地应付各种困难。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完成这全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但没有使约旦人民对美国的友好感情中断,而且使这种仍然在约旦人民中广泛存在着的感情得到了加强。

当我正在等待“苏伊士危机”最后的、也是最关键性阶段的结果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当首相所不得不忍受的纷纭复杂的种种事情,其中,有的是阁员们有意制造的,有的是由于轻率不慎造成的。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你也就习惯于充当首相必然要碰到的这类风波。不过,它发生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却是我一点也没有预料到的。第一件事发生在2月底,是由于贸易大臣戴维·埃克尔斯爵士的一句话闹出来的。埃克尔斯初露头角是在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年代,后来在艾登内阁里担任教育大臣,成绩卓著。到221 我筹组政府时,便任命他为贸易大臣。这样,在掌管经济工作的大臣里,他负责着一个重要性仅次于财政部的部门。在回答一项有关征收电影发行税与未来的娱乐税的关系的补充质询时,他作了一个未经准备的即席答复,被人煞有介事地夸大为“预算泄密”行为。2月28日这件事提出来后,看来似乎要大闹一场了。连新闻界也参加进来了,拥护我的一些人受到了严重干扰。

在质询以后,我经历了一场风波——盖茨克尔、比万、威尔逊等人全都起来大吵大闹。我看准他们是想利用这件事作为额外的压力来反

对一个正在倒霉的政府。所有的补缺选举全都表明我们的选票减少了。……埃克尔斯的过失其实很小，而且情有可原，所以我决心把火全引到自己身上以便保护他。<sup>①</sup>

这时，我面对着一一次正式的不信任投票，理由是我没有要求埃克尔斯辞职。

我们党内的年青党员（以及大部分的报刊）认为我太不妥协，反击也过分猛烈。但是我觉得比万假装“温和”是个圈套（当我没有上他的圈套时他就勃然大怒，这正是一个证据）。比万要埃克尔斯认错。我还记得以前多尔顿的事，他第一天刚认错，第二天就开始被追逼，最后只好完蛋。<sup>②</sup>

3月4日下院就埃克尔斯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盖茨克尔首先开炮——很软弱无力。财政大臣作了答辩（不很好），然后，辩论变成了轻歌剧。哈罗德·威尔逊用一篇漂亮、俏皮和有利的演说把话题又拉回来，但是因为他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内容，所以我在总结辩论时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反对党的控诉打掉。

事实上和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几天休会时间里，这种人为制造的愤慨就冷却下去。新闻界，包括象《曼彻斯特卫报》、《观察家》<sup>222</sup>和《星报》这样的报刊，都转过来批评反对党。因此，在表决时我们轻易地就以多数票取胜，同时，我们党内看来也满意我的讲话。在回顾这件事情时，下院得出一个看法，就是：在议会公开发表的讲话，即使不够谨慎，也很难说成是“泄密”。

这次辩论中最吸引人们好奇心的场面是多尔顿博士作了一个沉痛的（而且十分羞愧的）发言，（就象在俄国法庭上的囚犯一样）叙述了他失足的经过。<sup>③</sup>

---

① 1957年2月28日。

②③ 1957年3月4日。



这个小插曲本来不值得在这里提起，我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下院生活里常常发生这种奇怪的风暴，突然间刮起来，平息得也很快。埃克尔斯是一位能干的大臣，在敌手面前从来不怕表示他的蔑视。因此，这次对他的攻击，动机之一可能是一种个人报复。无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要是能够把一位新任首相纠缠到抛弃他的一个阁员，就有助于使这个已经处于严重困难的政府丧失信任。此外，也可能想捞取更大的好处。

联系起多尔顿的插曲（那件事确实令人恶心），这看来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反对党想把“埃克尔斯失慎”说成和多尔顿的著名“泄密”事件同样严重（当然这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他们指使多尔顿博士出来表演政治上布克曼主义<sup>①</sup>的丑恶行为，因为这样可以使公众从中得出结论，以为在社会主义下将实行严格的道德规范，而托利党人却是行为不检的。公众倒是很有可能受骗，但是多尔顿“忏悔”的情景却实在很煞风景。<sup>②</sup>

几个星期以后，我又经受了另一次严重得多的打击。3月27日，即我短期出访到百慕大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归来的当晚，就听说索尔兹伯里勋爵行将辞职。这样，我的政府组成还不到三个月，它的重要台柱之一就将撤走了。但是我们还是得面对这场重大的考验。这场风暴是从东地中海迅猛地刮起来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人们想望的那种来自基西拉岛的温和宜人的微风，而是一阵冷风，亦即当前最不合时宜的邪风。

自从我想在伦敦会议上达成一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办法的尝试失败<sup>③</sup>以及1955年12月我从外交部调到财政部以后，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我都很少过问塞浦路斯问题。我知道新总督陆军

<sup>①</sup> 布克曼主义即道德重整运动，亦称牛津集团运动，1921年由美国传教士弗兰克·布克曼发起。——译者

<sup>②</sup> 1957年3月5日。

<sup>③</sup>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第664页以下。

元帅约翰·哈定爵士下决心要谋求一个解决办法,只要有这可能;而且当我离开外交部时,谈判已经开始,在1956年头两个月里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日益严重的恐怖活动和动乱。我完全准备同意修改原来的那个著名的公式<sup>①</sup>,只要这样做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有帮助;对此,土耳其人也很大方地同意了。当时,我曾写道:

现在谈判将要恢复,我们需要看看大主教是否真的准备冒险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我感到事实比严谨的条款更为重要。因为大批共产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小组将转而反对大主教(不管协议上规定的是什么条款)。这些力量都是革命性的,无法加以安抚。<sup>②</sup>

艾登曾经渴望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他甚至考虑过自己亲自去一趟,但是显然也考虑到这样做只会使大主教抬高价钱,所以没有成行。

到1956年3月初,也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谈判中断了。一个问题刚好象要解决,又冒出来另外一个。虽然通过一些非官方的代表和在奇切斯特主教 G. K. A. 贝尔博士的协助下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总督已开始认定马卡里奥斯和克伦尼亚主教两人都和恐怖活动有牵连。3月9日,这两位显要人物都被逮捕并放逐到塞舌尔群岛。这个决定引起了议会的一场辩论,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都表示非常愤怒。艾登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说来维护这个决定,使自己的党感到很满意。<sup>224</sup>在上议院,……

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表了一篇八面玲珑、暧昧含糊的演说,可以和克兰默媲美<sup>③</sup>。奇切斯特主教……则作了一个感伤的、模棱两可不切实际

①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附录(五)。

② 1956年1月12日。

③ 参看本卷第37页注①。——译者

的发言,受到索尔兹伯里勋爵严正的批驳。<sup>①</sup>

但是,我从所有这类运动的历史,特别是爱尔兰的历史中清楚地懂得,单纯压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爱尔兰的麻烦最后是导致分治;但是塞浦路斯面积很小,而且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各自占据的地区都不是单一民族地区。不过,某种形式的分治也许仍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在塞浦路斯,要找出一个希腊和土耳其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仍然象去年夏天三方会议上我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地困难。无论是规定得怎样巧妙周到的文字公式都无法解决这个根本性难题。<sup>②</sup>

某种形式的谈判仍然在继续;到7月中,拉德克利夫勋爵被指定起草一部赋予内部自治地位的宪法。8月16日塞浦路斯的希腊族革命组织“埃奥卡”<sup>③</sup>宣布“为了便利问题的解决”决定暂时停止暴力行动。但是在总督公布他的条件后,他们认为不能接受,暴力行动又重新开始,而且在秋冬两季愈演愈烈。12月19日,拉德克利夫勋爵关于宪法的建议公布了<sup>④</sup>。英国和美国都欢迎这个建议,美国国务院甚至宣称拉德克利夫计划“可以作为走向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持久性和平解决办法的第一个步骤”。但是,不管这个建议规定得如何独具匠心,设计了一种双头制度<sup>⑤</sup>来使两个社会集团都感到安心,却仍然马上遭到拒绝,根据的不外还是众所周知的那个理由:没有规定自决。要么实行“伊诺西斯”计划,要么什么也不行。可是我们十分了解,所谓“伊诺西斯”就意味着土耳其与

---

① 1956年3月16日。

② 1956年6月19日。

③ EOKA(Ethniki Organosis Kypriakou Agonos),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译者

④ 这个建议规定实行内部自治,有一个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代表共同组成的立法议会。

⑤ 双头制度指由两个统治者或两个集团共同管理的政府。——译者

希腊的战争。

所以在年关前后，事情就这样拖着。但是，恐怖活动时松时紧，这种丑恶的局面似乎没个到头的日子。我们在塞浦路斯所需要的基地无疑可以适当维持下去，但是仍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无法促使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和解。压服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到12月底，紧急条例稍为放宽了。但是紧接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谋杀浪潮。士兵或平民在商店里或大街上无辜被杀害，几乎每星期都发生几起暴行。

我担任首相几天以后便给外交大臣送过一份备忘录，重新提到按分治方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秋天我征询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的意见时，他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我还要求国防大臣紧急调查一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需要，考虑一下如果把基地与领土划分开是否困难很大，还能不能有效地设防。当所有的大臣都在研究分治可能性时，恐怖分子的领导人出乎意料地提出了一个新建议。

3月15日总督向我们报告说，“埃奥卡”提出，如果马卡里奥斯获释，他们将停止恐怖活动。有关这个建议的传单到处散发。传单里比较老练的文字表明是在雅典搞的，这证明恐怖分子已经逐渐被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所制服。但是，这个建议不能置之不理。

这里的报纸，连同那些大主教们和主教们，从他们往常那种悲天悯人的心情出发，当然会认为这是表示这些人“回心转意”，“遵循宪法途径”了，诸如此类。我们需要做的是：1)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放松对恐怖分子的压力；2)不能失去土耳其族的支持；3)向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泰晤士报》）表示我们正在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对付新的局势，使它们感到满意。<sup>①</sup>

新近处决一名携带武器在现场被捕的青年，引起大西洋两岸 226

<sup>①</sup> 1957年3月15日。

很多人的责备。这些批评者似乎忽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青年供认了进行过多次残忍的谋杀。但是，很显然

这次处决并不影响“埃奥卡”的决定，这伙人作出这个决定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走头无路，要不就只是为争取时间进行改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sup>①</sup>

尽管有人明显地反对任何类似作交易的做法，我还是十分希望用某种方式来减轻我们承担的义务。

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飞机场，长期租借或者拥有主权（象直布罗陀）都可以。岛屿的其余部分可以由土耳其族和希腊族分而有之。<sup>②</sup>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伊斯梅勋爵建议由他出面当调停人。我认为我们应该指靠他这个主动行动。

我们这样子进入谈判，比根据“埃奥卡”的传单开始谈判，较为体面。我打电话到巴黎给伊斯梅勋爵，商定立即由他写信给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sup>③</sup>

我还把内阁里通常与殖民地事务有关的各部大臣召集起来，准备一个提交内阁考虑的文件，如果内阁大臣们都同意，就作为致土耳其政府照会的基础。

我想这样做是不错的。我们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我们“设想”大主教现在一定会建议结束暴力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他从塞舌尔群岛释放出来（但暂时不让他回塞浦路斯）。不过我认为（1）土耳其人和（2）部分阁员将对此踌躇不前。<sup>④</sup>

这事情提出来讨论时，显然意见是分歧的。大家都同意我们应该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但是看来谁也拿不定主意对大主教该怎么办。大部分人认为他已经在塞舌尔将近一年了，我

---

①②③④ 1957年3月15日。

们总不能无限期地把他拘禁在那里。我们又不愿意让他回到塞浦路斯领导恐怖主义运动；如果在华盛顿、纽约或者伦敦，他都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经过反复考虑，普遍还是认为，只要大主教肯发表一个反对“埃奥卡”进行暴力行动的声明，我们就准备结束他的监禁。以新态度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再加上停止恐怖活动，似乎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局面。

这是3月19日晚我动身去百慕大以前商妥的。第二天，我又高兴地接到在我出访期间主持内阁事务的巴特勒发来的一封电报，报告说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按商定的方针在下院作了声明，很受欢迎。以后的六天里，我在百慕大和总统会谈，到3月26日深夜才离开那里。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原先希望大主教能发表一个明确的声明，未免太乐观了。他的声明虽然充满美好的感情，表示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却含糊不清。他企图和我们讲价钱，想迫使我们取消紧急条例，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过，我仍然认为，尽管他回避明确表态，不等于说我们就必须继续把他关在塞舌尔群岛。我们必须肯定的是，我们不能表现出似乎打算接受他企图强加于我们的条件。

我不在伦敦，内阁的确很难处理这样一种局势。但是我在电报里向阁员们明确表示：我倾向于释放马卡里奥斯，只要这样做法不牵涉到变更紧急条例。

我连续收到一批电报——巴特勒来的，伦诺克斯·博伊德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来的。前两封电报主张对大主教的声明表示满意，把他从塞舌尔释放出来，宣布放宽紧急条例（上述意见得到哈定总督的支持）。第三封电报则强烈反对，而且实际上是以辞职相威胁。<sup>①</sup>

幸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正和我一道在百慕大，我们商定了一个我们认为会得到大多数大臣支持的方针。

<sup>①</sup> 1957年3月24日。

(1)指出大主教和以往一样,态度暧昧,逻辑混乱;(2)声明我们不能和他或者“埃奥卡”作交易——紧急条例是否放松以及何时放松完全由总督来决定;(3)不过,照样把他释放;(4)通知土耳其人;(5)不在议会内作出任何与马卡里奥斯进行“谈判”的诺言。<sup>①</sup>

我27日早上回到伦敦。第二天将举行内阁全体会议。索尔兹伯里晚饭后前来看我——和往常一样心情愉快——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决心找点什么事辞去职务。他好象带着某种引退的心情。多数人的意见显然是倾向于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和总督哈定爵士所建议的方针。3月28日,殖民大臣发表了一个经过精心起草尽量避免漏洞的声明。

出于通常的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同意延缓到第二天3月29日才递交辞呈。在那个时候,官场的礼节还仍然维持着。他写来两封信——一封是供公开发表的正式辞呈,向首相申述辞职的理由;一封是私人的非正式信件,对我所表现的耐心和周到表示感谢,同时就他这一行动给我造成的困难表示歉意。他并且答应,在正式辞呈公布以后,他不准备在下院提出质询。我在正式复函里,简短地重申了我对塞浦路斯问题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动的理由,指出我认为这一行动将收到应有的效果;但是我也承认,只有将来事态的发展才能证明我们彼此谁的主张正确。我还表示我和内阁全体同事们对失去他的合作感到十分遗憾。我的私人复信内容如下:

敬爱的鲍伯蒂:

229 收到你的两封来信,感到无以形容的难过。这个打击虽然是事先有所预料的,但是丝毫不减其严重性。(由于你的谦虚)你一定不会意识到你的辞职对我们所有的同僚是多么遗憾的损失,我们本来都期待着你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给我们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当然,对我来说,尤其

---

<sup>①</sup> 1957年3月24日。

是如此。我是在一个政治上史无前例的时期中担负起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原本盼望能够有你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使命。

此外，我们曾经共同工作了许多个年头（而且我想，我们在观点上总的说来是融洽一致的）。

使我欣慰的是，你提到我们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我们肯定将把这种友谊维持下去。

你永远的朋友

哈罗德

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的日记里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这一切来。

天气非常坏。我在内阁会议室从上午十点一直工作到下午七点半。我们重写了[国防]白皮书；长时间地讨论了罢工问题；接受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辞职（批准了辞呈）；任命了霍姆勋爵为枢密院长，黑尔什姆勋爵为上院副领袖；写好了星期一辩论（国防问题）的演说稿。<sup>①</sup>

失去这样一位老朋友，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十分难过的事情。此外，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在政治上才能出众，品德上高尚完美，是有口皆碑，人所公认的。他1938年曾经为了抗议对墨索里尼实行姑息政策而和艾登一道辞职。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对本世纪的保守党作过无与伦比的贡献的人物，他的名字将彪炳史册。

辞职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比我预料的要小得多。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他选择来作为辞职理由的是一个不致引起舆论强烈反应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观点又得到处于负责地位的人的支持。但是，我们前面隐约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危险，既然以色列人已经完成了撤军，对有关重开运河的条件作出决定就成为愈来愈迫切的事情了。我们很有可能被迫逐步退却，从一个阵地撤到另一个阵地，我很难

<sup>①</sup> 1957年3月29日。



230 预料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屈辱将有多大。因此,我感到,辞职事件尽管对我个人来说十分难过,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辞职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一定会给我造成更大的麻烦,现在事情这样结束了,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至于塞浦路斯,总统发来一封表示同情的电报,对此我只能回答说:全世界现在已经承认塞浦路斯是一个国际问题。我相信大主教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但是我仍然认为,从长远来说,总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美国现在似乎已经放弃了当初对“伊诺西斯”计划(亦即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计划)的支持。但是,有关各方的勾心斗角肯定还要继续相当长时期;果然,只是到将近两年以后,英国、希腊和土耳其才最后达成协议,接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才回到塞浦路斯。

在克服了这些初步的困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主要的危机,就是运河的未来问题。3月18日埃及人声明运河通航税必须事先交纳给埃及的运河当局。英法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建议通航税应向联合国或国际银行交纳。因此,纳赛尔与哈马舍尔德就这个问题开始了谈判。下院当然很不平静,特别是因为我们无法给英国船主以任何明确的指示。最后,到3月29日,纳赛尔提出了他对联合国的全部条件。他虽然重申埃及政府准备遵守1888年规定的通航自由的苏伊士协定,却又坚持通航税必须交纳给埃及当局。他还要求把他的这个包括有许多其他要求的备忘录作为国际文件列入联合国档案。现在的问题就是:埃及政府的条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联合国1956年10月通过的那六项原则<sup>①</sup>。接着就由美国大使雷蒙德·黑尔负责谈判,想设法调和这两个文件,但是没有实际成果。不过,至少还是出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情况:石油供应状况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在4月1日取消柴

231

<sup>①</sup> 参看本卷原书第145页。

油的配售。

虽然运河已经向小型船只正式开放，但是我们仍然劝说船主们暂停使用。人们当然会责问我们，拒绝使用运河究竟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还是技术上的理由。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明确的答复。美国所进行的谈判，在细节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能够争取到的实质性让步却很少。4月初，我们的大臣们长时间地讨论了

我们称之为“过河”的问题——也就是苏伊士运河问题。看来，我们又跨越了另外一些障碍，当然更多地是由于运气好，而不是因为处理得当。但是，我看我们难免要在运河这一关摔一大交。我们能够期待的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使尽力气拖着马渡过去，然后再骑上。但前途如何实在难说！<sup>①</sup>

只有一点是可以自我安慰的，那就是索尔兹伯里因为塞浦路斯问题而辞职，也许比因为埃及问题而辞职对我有利得多了。

4月8日，运河的清理工作实际完成了。我们很快就要面对实际问题了。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英国海运将吃大亏。已经传说有些公司正在考虑重新注册，改为悬挂利比里亚或其他国家的旗帜。美国人又重新和我们紧密地合作，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虽然也争取到对方一些细微的让步，但是再多的进展看来希望很渺茫。我们是否应该找安理会去？我是应不应该告到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不要恢复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

我们面前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在短期内尽可能少丢面子而争取到使用运河。<sup>②</sup>

鉴于这是政府存亡的危急阶段，我一直让内阁成员充分了解事情的全部情况。美国人倒是愿意接受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但是

① 1957年4月3日。

② 1957年4月8日。

是否可以除了保存面子之外争取到更多的东西呢？最后，我们一致认为

我们必须设法掩饰我们想使用运河的决定(如果纳赛尔愿意接受可兑英镑的话),办法是:1)诉诸安理会;2)向使用国协会的所有海运国家提出建议。<sup>①</sup>

232

我给孟席斯发了一封电报,把这个决定比较详细地告诉了他,向他解释了我们进退两难的情况。我们的竞争国已经开始使用运河。我们正尽力说服美国人,要他们在谈判中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但是,如果这一着失败了,我们就只好抵制运河,或者求助于安理会。抵制的办法会损害我们的商业利益,而且看起来理由不是很充分。如果问题提到安理会去,我们准备劝说各使用国在交纳通航税的同时也要提抗议。澳大利亚总理在复电里认为我们应该把寻求解决办法的责任加在联合国身上。联合国既然已经把事情抓起来,就不应该规避自己承担的义务。

但是,一个新的困难又使我们担忧起来。除了如何把那著名的六项原则与纳赛尔的新建议协调起来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有点纯属理论性的问题以外,究竟根据什么样的条件才允许这些船只通过?这时候,我们仍然支持美国人进行谈判。

美国大使黑尔先生(现在应改称托尔台斯先生<sup>②</sup>)慢吞吞地、但是很干练地进行着这场谈判。与此同时,我们则设法使所有国家的船只都暂不使用运河(颇有点成效)。<sup>③</sup>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考虑的

并不是我们应否让英国船只通过运河,而是纳赛尔是否允许我们通过,除非我们满足他的一些荒谬条件,例如,赔偿塞得港所遭受的损失。(这一点不论报界或议会似乎都没有任何人意识到。)<sup>④</sup>

---

① 1957年4月9日。

② 黑尔(Hare)在英语中意即兔子。托尔台斯(Tortoise)意即乌龟。——译者

③④ 1957年4月15日。

虽然我们还不能取消石油配售,但是已经可以从4月17日起把基本配售量增加百分之五十。这至少是石油的整个供应情况有所好转的一个标志。索尔兹伯里勋爵现在参加进争论来了,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

这封信在苏伊士问题上对政府批评挑剔,它将增加党内分裂的危险。我认为这不见得是真正要争夺权力,但是我毫不怀疑一定有很多人认为他的目的是在此。<sup>①</sup>

有一批托利党员,总共十五个人,被鼓动联名提出一个和他的 233 方针相类似的动议,署名人很快就增加到三十人。我仍然认为最好不要急于见分晓。尽管有一艘大型船只通过了运河,但是一些主要的海运国还继续在抵制。

苏伊士事件在缓慢地发展——就象我所期望的那样。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向纳赛尔屈服,我们也绝不能带这个头,而必须随大流。<sup>②</sup>

安理会4月26日根据美国的要求举行会议时,卡博特·洛奇虽然也批评埃及的条件不符合六项原则,但是只是建议给埃及人一次考验。

安全理事会多少是按照计划进行了。使用国协会将在星期二开会。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使一旦我们愿意让船只通过运河,纳赛尔是否愿意接受可兑英镑。<sup>③</sup>

使用国协会在4月30日开了会。虽然会上的看法认为埃及的建议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想重新使用运河的意图却很明显。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关于支付问题的谈判现在就应该开始。谈判本来预定在巴塞尔举行,但是事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障碍。

---

① 1957年4月18日。

② 1957年4月25日。

③ 1957年4月28日。

[会谈]要到明天(星期一)才开始。这是件大麻烦事。也不清楚这是有意的还是碰巧我们运气不佳。首先是埃及银行行长“感冒”了(他本来应该早在星期五到巴塞尔去)。其次,他的三位同事本来预定在星期六到达,星期天开始会谈,但是,一直到星期天晚上他们才到达。同时,我们怎样才能阻拦住其他海运国家使用运河呢?我们已经设法说服他们同意在美国人与纳赛尔的谈判实际破裂以后等待了两三个星期,但是他们正愈来愈不耐烦了。暂时还无法预见纳赛尔将采取什么方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他接受可兑英镑,也一定要在第一号账目的问题上再三讨价还价以后才答应。<sup>①</sup>

234 我们的目的是把大量的英镑差额冻结在第一号账目上,而说服埃及人同意我们以在各项交易中都有效的可兑英镑来交付通航税。我5月7日因事到波恩去了一趟,9日才回来。使我大为放心的是,在波恩逗留时,我收到电报说英格兰银行与埃及银行在巴塞尔举行的谈判进行得出乎意外地顺利。根据会上协议,将开设一个专门的可兑英镑账户,供支付运河通航税和有关航运的其他费用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大的头痛问题。在安理会里,我们只争取到把我们历次对强占运河的非法性所提的抗议载入纪录;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对现状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从而给埃及的六点计划一个考验的机会。这个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是不利的,就是承认我们为伸张自己权利和挫败纳赛尔野心而进行的长期斗争遭到了失败。法国人又坚持了一个月,并且建议再度诉诸安理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好,所以,到6月12日,他们也只好允许自己的船只使用运河。对我们政策的现实性,是不会有有什么争议的;如果要我们以黄金或者美元来支付或者要我们解冻第一号账目,那才是我们无法忍受的。法国的保留确实令人不耐烦,但是主要的危险总算渡过了。因此,5月11日我私下通知英联邦各国政

---

<sup>①</sup> 1957年5月5日。

府，说我们将不再阻止联合王国的船只通过运河。尽管局势并不令人满意，我还是补充说：“我们……十分希望尽力使我们在将来少受[纳赛尔]单方面行动的摆布。”这就是制造新油轮和储油政策的开始。

5月13日，我公开宣布将不再劝阻船主们使用运河，而且，我还解释了巴塞尔协议的条款。我强调指出，新的专款账户丝毫不改变被冻结的第一号账户的地位，在后面这个账户里，有大笔款项仍然由我们控制着。它将来如何处理，必须视我们在金融上的权利要求是否得到满意的安排而定。会谈将于适当时机在一个中立国的首都举行。当然，这样一个声明不会令人很高兴，话也不容易说；我使用的词句是：

我尽量简单和实事求是，下院双方提出的质询比我预料的都少得多，但是平静中带着相当紧张的气氛——就象一场暴风雨的前夕。

托利党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开始在组织起来……<sup>①</sup>

第二天我的日记写道：

索尔兹伯里勋爵“参加了反叛”，在上院就苏伊士问题作了一个相当尖锐的发言。但是我本人认为这作用不大（幸亏他在马卡里奥斯问题上辞职了！）<sup>②</sup>

现在，显然正酝酿着一场准备充分的大辩论，党内愈来愈多的人感到困难重重，甚至觉得有点大难临头。我已经采取了一个实际的步骤。我给海军大臣塞尔扣克勋爵送了一个备忘录，除了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从中东运输石油的任务，特别提醒他要重视储存工作。同时，我又幸运地得到马修·斯莱特里爵士的帮助，他以特别顾问的身份专门考虑了整个油船计划问题。他负责协调和督促修造更多和更大的油轮以及为油轮提供港口和修理设备的工

<sup>①</sup> 1957年5月13日。

<sup>②</sup> 1957年5月14日。

作；还负责领导油管的修建和保证供应足够的钢铁供修建油管之用。我想使我们在全世界油轮总吨数和修建油轮的能力中所占的比重尽可能地大些。所有这些工作，当然都需要和有利害关系的各方进行充分和及时的磋商。直到两年半多一点之后，他才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给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运河在1967年6月战争以后长期关闭，我国正是从这些未雨绸缪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

下院的辩论进行了两天，从5月15日下午开始，到16日晚上结束。头一天上午就宣布了最终取消石油配售。象通常在这类情况下常出现的那样，辩论起伏很大，气氛高度紧张。

236 光是阅读议会报道和一些主要辩论人的演说词，很难体会到这种辩论使人神经紧张到什么程度。我花了很大功夫准备我的讲演稿，因为它关系实在太大了。我甚至一直工作到5月15日凌晨二时才完成。可是我对等待着我的那场煎熬却毫无思想准备。盖茨克尔先开第一炮，提出一个想巧妙地把苏伊士行动的反对者或拥护者全都吸引过去的动议。他演说的前半部分倒说不上是攻击，后半部分就比较厉害。整个说来，虽然很有力和相当雄辩，但调子并不高。当我站起来讲话时，我心里很明白，反对党是决心要打乱我的部署的。

因此他们此起彼伏地讥笑、谩骂和吹口哨——既不闹到议长可以出来干涉的程度，又使秩序混乱。这种做法确实破坏了我演说里最重要的一些部分的效果——特别是关于将来石油运输问题的那一大段话，而且使我在讲其他部分时也相当紧张失常。但是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讲下去——尽可能勇敢地讲下去，一直到把演说结束。这次演说的确并不成功。<sup>①</sup>

我的讲稿作为议会纪录倒很不错，但是却不适合议会当时的

---

<sup>①</sup> 1957年5月15日。

情况。这第一天晚上,形势显得很糟。看来,托利党中弃权的人将达二十人甚至三十人左右。他们受到法国“战斗到底”态度的影响,甚至比所谓“苏伊士集团”所受的影响更甚。我们原来只有五十票多数,如果弃权达到上述数字,情况当然比较严重,甚至有些致命。我意识到一切将取决于我的总结发言,因此在上床休息以前就开始考虑怎样说法。

第二天,5月16日的上午,

报纸上对辩论过程和内容的报道都还不错。《曼彻斯特卫报》称我的演说“不及近来的水平”,并且批评我的有些话是陈词滥调。《快报》很凶猛,而且,尽管比弗布鲁克勋爵并不喜欢索尔兹伯里勋爵,现在却开始把他捧上了天。什么“出卖苏伊士”是麦克斯<sup>①</sup>的方针啦,“艾登被他的同僚所背弃”啦(这……确实稀奇!)。《泰晤士报》比较正确和公平。《每日电讯报》表现最好了。<sup>②</sup>

由于一个意外的运气,在辩论恢复以前,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了完全另外一个渠道。 237

氢弹昨天成功地爆炸了。(我昨天晚上得到消息。今天报纸上全是这个消息……这对苏伊士问题的局势极为有利)<sup>③</sup>

第二天,在肯尼思·扬格作了一个有力而尖刻的演说以后,塞尔温·劳埃德接着发言。

他表现很出色,受到我们一方大部分人的热烈欢迎。新闻界、社会党人和我们一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道猛烈地攻击他,试图迫使我让塞尔温辞职。(他曾经向我请辞,我当然已经拒绝了。)<sup>④</sup>

辩论继续在高水平上进行。安奈林·比万代表反对党作总结发言。他的演说

---

① 指麦克米伦。——译者

②③④ 1957年5月16日。



本来打算起彻底的摧毁作用,结果却完全失败了。他讲了四十五分钟——相当地沉闷,而且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过多地在布尔加宁致艾登的信件上发表议论(在匈牙利事件以后,甚至社会党人也不大喜欢布尔加宁的佩克斯尼夫式说教<sup>①</sup>。)他的演说和我的演说很相似,(我认为)甚至更不如。他说了两段颇为精采的讽刺话,也就只此而已。<sup>②</sup>

我九点半站起来发言时,完全意识到事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答辨。象是奇迹似的,前一天是大失败,今天却是大成功。出奇的是:尽管我不过是重复前一天演说里的论点,却能说到点子上,大家也几乎都肃静地听着。我设法如实地列出盈亏平衡表,指出我们的所得和所失。我们不能隐讳,我们未能把纳赛尔赶下台去或者迫使他吐出强占的东西。但是,足以弥补这点的是:我们换来了盖茨克尔曾经誉为对和平的宝贵贡献受到欢迎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说到这里,是说点议会俏皮话的机会。我回忆说,

238 当总统向国会提出必要时应该使用军队的要求时,反对党的领袖曾经形容这是“十分明智和勇敢的步骤”。可是那位代表埃伯韦尔<sup>③</sup>的尊敬的议员[比万]谴责这一行动的声音却和他自己党的领袖赞扬这一行动的声音一样地响亮。下面就是他评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话:

“这根本不是一种明确一贯的政策。”

在一次电台演说里,他还继续说,他本人和他的尊敬的朋友们抨击英国政府的主要一点就是:政府竟然撇开联合国而采取行动;接着他又说:

“总统似乎正在要求美国也来这样做。”<sup>④</sup>

我评论说,反对党的这两位领袖确实应该设法把关系处好一

---

① 佩克斯尼夫,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个伪君子,爱作道德说教,为自己的恶行辩解。——译者

② 1957年5月17日。

③ 埃伯韦尔,英国议会选区,是南威尔士煤钢工业区。——译者

④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5月16日。

点。然后我说，我们的所得还有：英联邦各国的态度比较一致，而且愈来愈表示同情和愿意帮助我们。还有阿拉伯各国的立场和巴格达条约各国的坚定态度。此外，埃及在军事上已经遭受了一次屈辱性的失败，整个中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这个动议的提法虽然只是对政府的苏伊士运河政策表示不安，实际上却是对政府的一次不信任投票。

因此，就象一切不信任的动议一样，它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凌驾一切的问题、一个我希望下院慎重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根据下院的意见，……如果英国的声望和经济利益转由反对党来掌握的话，究竟是不是就更为安全可靠呢？这是我们行将投票表决的唯一问题。<sup>①</sup>

结果，这个动议被四十九票多数所否决，托利党人弃权的只有十四票。票数公布以后，

托利党的全体议员起立向我欢呼。在议长席上我转身向大家鞠躬致谢。这是议员们表示忠诚的一种少见的自发行动，使我极其感动。英国人多么奇特呵！他们宁愿要一场英勇的失败。苏伊士已经变成某种类似蒙斯的撤退<sup>②</sup>一样的行动。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渡过这个特殊的难关——至少暂时是这样。<sup>③</sup>

报章也有同样的看法。各报都认为新政府已经成功地经受了第一次严重考验。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应该能够维持下去，一直到这届议会的正常闭会期为止。

在以后的将近两年里，我们与埃及的关系主要是进行金融上<sup>239</sup>的谈判。进展十分缓慢。虽然谈判1957年5月24日就开始，但是不到几个星期就破裂了。到9月，埃及政府似乎希望重开谈判。幸亏美国政府对埃及美元储备的态度仍然很坚定，这些储备一直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5月16日。

② 蒙斯，比利时地名。第一次大战时英国军队曾在此经剧烈战斗后撤退。——译者

③ 1957年5月17日。

没有解冻。到10月初，谈判在罗马重新开始。但是，只是到了壳牌公司在1958年12月取得一个民间解决办法以及尤金·布莱克先生出来干预以后，才终于在1959年1月17日拟出一项金融协定。但是，即使是这时候，也出现过新的复杂情况，问题是在如何区分被“扣押”的英国财产和已经“埃及化”的财产。最后，在1959年2月28日，协定签署了。这一年的年底，12月1日，恢复了代办级外交关系。要叙述这场长期而复杂的争论的全部起伏情况，是很沉闷乏味的，反正最后算是解决了。

更麻烦的问题出在我们决定要建立来补偿英国公司和公民所受损失的赔偿制度。这个办法碰到很多困难，因为我们所拟定的计划规定对那些损失额较小的申请人赔偿全部损失，这就意味着对损失额很大的公司或个人必须大量减少赔偿额。此外，在所有这段时期里，在议会里，特别是在上院，还碰到一些难以应付的情况。但是，由于被指定办理这件事情的专门委员会工作认真负责，作了十分公平的处理，结果没有给国库造成过重的负担。当然，有的申请数字是完全夸大的。

就这一届国会来说，苏伊士问题的争论就此结束了；在紧接的一届大选里，这个问题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一点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原因也许就在于：所有的党派和个人都普遍地不愿意重新揭开这个伤疤。此外，万花筒似的中东和全世界情况千变万化，也产生了新的希望和造成新的失望。中东的根本性问题和危险性仍然存在。

## 第七章 一个新战略

我就任首相时面临的最紧迫而又最微妙的任务，就是弥合以 240  
至最终恢复我们与华盛顿的旧有关系。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任务是：为联合王国制订一个充分考虑到核武器冲突的新的防务组织和防务战略。显然，想恢复我们与华盛顿的友好合作的任何尝试，都必须谨慎地进行。不论是我或者我的阁僚们，都根本不想象个悔过者，或者使自己处于屈辱的地位，不管这样做收获会有多大。我们觉得，杜勒斯在苏伊士危机开始阶段采取那种动摇和拖延的策略，以及他和他手下的人在英法开始军事行动以后对我们进行的那样恶毒攻击，如果不说是出卖了我们的话，至少也是弃我们于不顾。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与美国旧日的密切关系以及我以前与总统的私人交情会有点用处，但是，我丝毫无意由我来迈这第一步。

我并没有等待很久，1月22日美国大使就来见我了。他带来了白宫的一封绝密电报。总统急于想和我见面，问我是否可以在3月21日至24日之间到美国去，如果我认为合适的话，他愿意在华盛顿或者百慕大与我会晤。至于会谈的内容，我想在正式宣布这个消息时在公报里说明，议程将包括世界当前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不仅是中东问题。我告诉大使说，待我与我的高级阁僚们磋商后再作答复。不过，我当时就提出了是否邀请法国总理摩勒的问题。大使告诉我说，总统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作出决定。 241

从我这方面说，总统用这样友好的口气打来电报，当然令人欣

慰。但是我不大愿意到华盛顿去。看来现在还不是到卡诺沙朝圣的时候。<sup>①</sup>因此我对这位老朋友这样周到地建议以百慕大作为会谈地点颇为感动。关于法国将选择哪一种安排的问题，在经过商讨以后，确定法国的部长们另行到华盛顿访问，百慕大会议只在英美之间进行。摩勒和往常一样地通情达理，他认为这样计划比较合适，似乎相当地满意。对我们来说，因为百慕大是英国的领土，情形当然就完全不一样。2月11日正式宣布将进行这次访问，明确地提到是总统主动邀请的。

我发现有不少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本身也感到苦恼，只要一有可能，他们也想弥补一下他们所造成的损害。例如，1月23日，也就是我接到艾森豪威尔电报的第二天，我接见《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时，从他那里听到的情况就很使人鼓舞。苏兹贝格的那家报纸，在危机期间一直是采取对华盛顿不满、对伦敦友好的态度，但是发行额却增加了十万份。无论如何，这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公众的情绪。苏兹贝格还说：他最近见过总统，总统决心要恢复英美的全面合作，而且与政府里的其他成员一样，开始意识到目前联合国里亚非国家不断增涨的趋势所造成的危险。

这几个星期里，邓肯·桑兹一直以国防大臣身份待在华盛顿，他和杜勒斯会谈时采取十分强硬的路线。杜勒斯一开始就编造了一个颇为蹩脚的借口，来为他说过的一句“遗憾的话”开脱。原来他在参议院里曾经宣称，他不愿意看到中东双方有任何英法军队。桑兹强调指出：英国目前广泛存在着严重的反美情绪；一些原来对242 来对美国最有好感的人，也十分伤心地感到幻想破灭。我们都觉得被人无情地委弃了。现在需要美国人作出重大的努力，才能恢复我们对美国的信任。杜勒斯虽然很窘，但是似乎还是接受了这个批评，没有提出什么严厉的反驳，并且同意说目前我们无论如何

<sup>①</sup> 见本卷第109页注。——译者

必须设法恢复从前的合作关系。我很赞赏桑兹的坚定立场，当我听说总统邀请桑兹去会面，并且表示愿意尽他权限所及努力修整已经破损的篱笆时，我感到实在有意思。

这件事的最初阶段这样快地结束，而且又是由总统采取主动，我当然十分高兴。因此，在1月25日给他回电时，我觉得可以重提我们旧日的友谊了。他以前曾经到过百慕大的“中洋高尔夫俱乐部”；我认为这次会谈肯定会有价值，也会比较融洽。我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我必须再次告诉你，在我接任新职以后这样快就收到你关于会晤的建议，使我很受鼓舞。你喜欢百慕大，我确实感到高兴。在那里，我们可以摆脱正式访问时的致词、赴宴等等繁文褥节。这样，将有利于回复到你肩负重任和我也挑起了分量比你稍轻的担子以前我们谈话的那种良好气氛。……

我们将需要确定准备讨论的范围，也许，我们可以交换一份议题清表。我想我们彼此都不希望搞很多文件，只需要粗线条地作个规定。不过，我当然认为这是我们就广泛的政策作出共同决定的一个机会。我想，随行人员愈少、愈是亲信，我们能取得的成就将会愈大。

与此同时，我也给英联邦各国的总理去了电报，把即将举行会谈的事通知他们。3月9日，我又把我希望讨论的问题告诉他们。这些议题包括：从联合国最近发展情况看它的未来；裁军；我们与俄国及其卫星国的关系；苏伊士和巴勒斯坦；联合王国与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建议中的欧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从苏联最近的行动来看整个中东和非洲问题；中国和东西方贸易。考虑到会谈期间日程很紧，届时我甚至无法及时向我自己的阁僚们报告情况，所以，我希望英联邦各国总理能够体谅，等待我在会谈结束以后再给他们作全面的汇报。

殖民地事务部国务大臣杰克·麦克莱提醒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抗议一下美国对英国殖民政策所采取的那种多半出自无知的态度。我虽然不想用这种方式和美国讨论殖民主义问题，但是我确实决心使美国人能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迅速发展的程度，并且说明我们的政策所带来的益处和危险。

在动身去百慕大之前，我和孟席斯交换了一些很有益处的电报。他对目前联合国大会非法地僭夺了过大的权力而且有效地行使着这些权力一事表示担心，这是很对的。他在一封长篇电报里把他最近与杜勒斯就上述情况可能造成的危险所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他认为联合国大会正在僭夺安全理事会的权力，而大国看来正在逐渐丧失它们的权威。虽然杜勒斯回答说这个说法有点夸大，但是，据孟席斯的观察，杜勒斯也显然愈来愈担心他和卡波特·洛奇不小心地从亚非魔瓶里放出来的妖怪。因此，现在可能是到了一个心理上合适的时期，可以对有点后悔的美国政府施加点压力。美国人肯定正在重新考虑，逐渐意识到那些我们大家都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总统看来还认为对联合国的信赖可以作为外交政策的代用品。必须想办法开导开导他。我给孟席斯回电时，一方面提到，他对杜勒斯进行这样坚定和直率的谈话，肯定给我们的会谈作了很好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也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宣布，不管怎样含糊不清，起码证明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东的危险，意识到不能让颠覆性的共产主义力量去填补那里的权力真空。

244 在组织政府时，我就已经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彻底重订我们的防务政策在目前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头一个是机构问题。我在任命邓肯·桑兹为国防大臣时，便通知了三军司令部，建议对1946年通过的国防部法案第一部分所赋予国防大臣的任务规定一些实际内容，这个法案规定国防大臣负责“制定和全面执行一项有关整个皇家武装部队和军需的统一的政策”。因此，他的当前任务应该

是：根据目前的战略需要，制定一个能保证大量节约财力人力的新的防务政策；同时，草拟一项改编和重组武装部队的计划。为此目的，他应该有权决定武装部队的规模、编制、组织机构和部署，装备和供应，军饷和待遇。当然，他要服从国防委员会和整个内阁。为了处理这些事情时权限分明，三军大臣或供应部长就上列事务向国防委员会提出的任何建议，一律要通过国防大臣。将给国防大臣配备一名总参谋长——皇家空军上将威廉·迪克森爵士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他既是国防大臣的总参谋长，又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同样重要的是，国防大臣可以召询三军司令部或供应部的任何军官或官员，要求他们充分提供意见和协助。

我在发表新政府中新任命的或留任的三军大臣以前，都事先征得他们同意这项改革。所以，当1月18日我发布那份包含有与新的国防大臣商定的各项详细建议的正式指示时，遇到的阻力很小——当然，某些高级人员中也有些牢骚。我也预见到，在进行彻底改组（这一点我是到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办到的）以前，这种新的制度还得依靠大家有足够的善意和合作。总的说来，情况还是好的；当然，当某些特殊问题出现时，也有不少人抱怨。在当时情况<sup>245</sup>下，我不能做再多的事情；但是，我已经下了决心尽我所能起的作用使国防大臣的职权加大到足以实现议会所抱的目的。几天以后，蒙哥马利勋爵给我来了一封信，明确而热情地肯定了我的做法：

太好了！你采取的改组国防组织的措施很值得赞赏。邓肯·桑兹现在拥有您给予他的发布命令的权力；象他那样一个人，一定会使他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另外一点是迪克森现在是他的人了，可以直接向他提供军事上的专门意见，而不必事先征得三军参谋长的同意。桑兹可以命令他的总参谋长代表他（国防大臣）出席主持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我在担任国防大臣的短短时期内，曾多次和蒙哥马利元帅讨论过这整个问题。现在我终于有权力实行我们俩都认为必需的这



种新的组织形式了。

作为新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决心维护英国对核威慑力量作出贡献的信用。因此，我决定我们应该加快步伐，尽速在澳大利亚试验场进行核试验，并且在2月1日发出了相应的指示。

桑兹1月底访问华盛顿时，美国人突然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这就是，在英国部署一批中程弹道导弹，基地由经过训练的英国人员管理。这些武器和特殊装备不需要我们花钱，当然我们要负责基地的建设工程。这个办法使我们现在就能拥有火箭威慑力量，而不必等到很久以后自己能生产的时候；而且，可以使我们自己的人员在操作这种复杂的新型武器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细节是最后在百慕大决定的，会谈公报里还正式宣布了这个重大协议。人们普遍称赞这是英国外交的胜利以及英美关系恢复的一个明显证据。

桑兹对防务体系的改组工作很努力，进行得迅速。2月中旬，他已经拟定了一个对武装部队进行重大改编和重新部署的综合计划。2月23日在首相别墅举行的一次高级大臣周末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有一个把我们驻欧洲的军队从八万名缩减为五万名的建议。不久便发现，从我们的盟国的观点看来，这是我们的建议中最不合他们口味的一点。我提醒外交大臣说，在就这一变动进行谈判时——因为这是我们原来承担的义务，所以需要与盟国磋商才能变动<sup>①</sup>——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迫承担新的义务。而且，关于德国方面，除非我们总的负担低于以前商定的德国负担额，不要让德国在我们防务支出中负担的数额自动地减少。从最近的发展情况看来，有点奇怪的是，反对我们裁减驻欧军队最强烈的反而是法国人。我迫切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在百慕大

<sup>①</sup> 见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428页。

会谈以前，与法国人和德国人私下会谈一下，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内谈判这个问题，求得一个结果。要确定一个能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放心和满意的时机和策略，是不很容易的。我和阿登纳之间就驻军维持费问题交换过态度相当强硬的文电。我认为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坦率地回答他，不必隐瞒或者从轻表达我们坚定的意图。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十分精明，谁也骗不了他，连他自己的主意也要盘算再三。由于摩勒的身体不舒服，我到3月9日才见到他；这个日子很不凑巧，因为离预定举行百慕大会谈的日期太近了。在此以前，西欧联盟各国的部长们2月26日在伦敦集会。

我举行了一次大型晚宴(三十二人)，招待出席西欧联盟会议的外交部长们。我发现他们对我们裁减驻军的计划态度十分冷淡。<sup>①</sup>

但是，到3月3日，

收到一个好消息——与德国进行的关于“维持费”的谈判在官员一 247级成功地结束了。德国人同意在1957—58年度负担五千万英镑。现在我们必须争取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我们把驻军(从八万人)裁减到五万人的建议。我想，……德国人将会支持我们。比较难办的是法国人。<sup>②</sup>

艾森豪威尔总统现在开始对我们关于裁减驻军的建议表示担心；不过，我向他解释说，这样做对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很有必要，而且，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把军队的缩减分阶段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进行，以缓和对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直接影响。由于国防白皮书和预算的编制都十分迫切，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我要求总统在我们把这问题提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讨论时不要反对我们。我还

<sup>①</sup> 1957年2月26日。

<sup>②</sup> 1957年3月3日。

向加拿大总理路易斯·圣·劳伦特发出类似的呼吁，指出我们迫切需要作出最后的决定。他明确地表示说，他的代表准备给我们以充分的支持。在用电话与总统进行了一次比较杂乱的谈话以后，我给他一个电报，提出我们打算作的一些修改。

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来迎合诺斯塔德将军的意见，同意1957—58财政年度只裁减建议数字的一半，其余一半要到1958—59财政年度才裁减。我们还进一步同意，1957—58年度的裁减，大部分将放到1958年第一季度进行，而不是在1957年第四季度。诺斯塔德似乎满意了。我希望，通过把我们驻军的裁减安排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逐步完成，会大大减少你所担心的危险。

3月9日一早，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动身到巴黎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摩勒刚从华盛顿访问回来，和他会谈时，开始一段全是他介绍这次访问的体会，内容精彩，而且带点风趣。可是，当我们在有官员参加下进入正式会谈时，

248

关于我们裁减驻欧军队的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而且相当不愉快的争论。虽然法国的将领们，甚至奥塞伊码头<sup>①</sup>的官员们都相当谅解，但是摩勒和皮诺二人都拚命反对。这主要是因为国民议会的辩论即将举行，摩勒恐怕孟戴斯·弗朗斯攻击他“背叛”巴黎协定。<sup>②</sup>

经过将近两小时的争论，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当天晚上，在奥塞伊码头举行的一次正式晚宴以后，

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又试着和皮诺再谈一下我们裁减驻军的问题，我想，这次谈话对他起了某些作用。<sup>③</sup>

如果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经过还算相当顺利的话，西欧联盟的讨论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争取到[德国在这方面的负责人沃尔特·]哈尔斯坦博士和[赫

---

① 巴黎奥塞伊码头是法国一些政府机关所在地，通常指法国外交部。——译者

②③ 1957年3月9日。

尔伯特·J勃兰肯霍恩在一定程度上站到我们这边来。但是阿登纳(和摩勒一样)却拚命反对我们的计划。这个狡黠的老狐狸十分担心,他主要考虑的是德国的下届选举。(可惜的是不能使所有国家里的所有选举都在同一个时间里举行!现在,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国家在进行选举。)<sup>①</sup>

3月18日我必须到莱斯特去出席一次公众集会,当天午饭后就出发。除了台上有四百名青年保守党员以外,大厅里挤满着三千或者还要多的听众,这不是“凭票入座”的集会。

听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向我热烈欢呼。我们在饭店里举行了一次有二百个左右工人参加的晚茶会(酒和三明治),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半左右。<sup>②</sup>

然后回到我那间窗外长满爬山虎的房间,到了半夜,

收到伦敦来的一封电报,说西欧联盟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快上床休息时(大约1点半),传来了取得完满协议的消息。<sup>③</sup>

那天晚上我的演说大部分是谈国内形势。这时候,造船工业正苦于一场破坏性的争端,存在着好几种解决方案。大家正在愚蠢地争论究竟应该用“仲裁”办法还是“调停”办法。我说明“仲裁”实际上是“调停”过程的一个阶段,并且呼吁早日解决这场争端。这样一类内部冲突,只会有利于我们的竞争国;如果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大国想避免这种创伤,就必须有一种新的精神。“斗争到底”是一个不好的口号;这样的斗争谁也赢不了,遭殃的是整个国家。<sup>249</sup>

我第二天回到伦敦以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最低限度似乎可以避免一次行将来临的铁路工人罢工。虽然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决定不必采取取消百慕大会谈这样严重的措施。对在我出国期间将主持内阁的巴特勒以及劳

① 1957年3月14日。

②③ 1957年3月18日。

工大臣麦克劳德，我都非常信任。他们一定会忠实地按照我们商定的方针努力去做。如果取消百慕大会议，将会使国内的工业困难过分戏剧化，显得有点小题大做。

在莱斯特的演说里，我曾经说：“我们到百慕大的目的是解决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重新恢复作为世界和平基石的英美关系。”但是，尽管我表示对会谈结果抱有信心，我仍然应该承认，我对这次和总统和国务卿的初次会谈带有某种不安情绪。当我回到伦敦在下院演说时，我强调了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这次会谈不是我们建议的，而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举行的。而且，也是他建议在英国领土上进行。我愿意对他这两点做法表示感谢。<sup>①</sup>

我们把到达百慕大的时间安排在总统预定到达时间稍前一点，留下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空着。中洋俱乐部又照以前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举行会谈时的样子布置起来，整座建筑物都准备好  
250 供会议使用。陪同我前往的有诺曼·布鲁克、弗雷迪·毕晓普和通常的一批秘书和打字员，别的人员留在伦敦照顾国内的很多问题和保持及时和我联系。后来证明这样做完全必要，一方面是因为塞浦路斯的形势紧张，一方面也因为工业战线的危险日增。后者除了原有的困难以外，当时十分可能还会加上铁路罢工的麻烦。塞尔温·劳埃德随身带上帕特里克·迪安，这是个很有魄力的人，后来在华盛顿当大使，工作很出色。

俱乐部的饭厅和吸烟室安排供我们使用，中将总督约翰·伍德尔爵士盛情好客地接待我们，让他的全体幕僚归我们调遣。总统是坐船来的，下午4点钟到达这个海岛。

总督先上去迎接他，介绍了自己的夫人和女儿。然后总统和我握

---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日。

手。例行地检阅了仪仗队,等等。之后,我们同乘他的防弹玻璃车到中洋俱乐部。①

这辆防弹玻璃车是先期运来的,一道提前到达的还有大批警卫人员、联邦调查局人员和其他人员。

海岛的全体居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好象全都出来欢迎。总统看来身体很好,古铜色面孔,步履轻快。他患了讨厌的咳嗽;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得了重感冒,彼此有点半斤八两。福斯特·杜勒斯大约在同一时间从华盛顿乘飞机到达。②

在行车的二十分钟里,总统

和我很随便地谈话,完全象以前一样。彼此都没有埋怨;(更其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我的友情或信任有任何改变。他似乎很高兴能碰到一个可以说点知心话的人!他在美国,半是国王半是首相。这意思是说,他是个相当孤寂的人物,亲信很少。他很坦率地对我说,他很了解,福斯特·杜勒斯在我国人民中和在他本国的许多人民中 251 很不得人心。但是他还必须留住杜勒斯,没有杜勒斯不行,而且也找不到可以代替他的人。赫脱州长(现在是副国务卿)是个合适的人,但是健康情况不好。③

7点30分,总统、杜勒斯、劳埃德和我四个人共进晚餐。

晚饭后,我们真正坐下来工作了,对世界总的形势进行广泛的回顾。无甚惊人之语,也没有决定任何事情。不过我想,气氛很好,特别是考虑到已发生的一切事情,应该说现在的气氛意外地好。主要是他们在说,我们比较沉默。不过,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显然不打算当“乞求者”或者“被告”,还不如说正好相反。④

第二天,3月21日,会谈在10点半开始。作为主人,我有权首先发言。我还保存着为这次讲话准备的一份详细提纲:

---

①②③④ 1957年3月20日。

### 1. 感谢总统:

作为主人表示欢迎; 问候老战友; 欢迎世界上最伟大最富强的国家的首脑。

### 2. 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不久以前, 发生了与欧洲存亡攸关的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严重问题。

反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斗争也处于关键时刻; 还有, 联合国的未来。

国际联盟因为把和平置于正义之上而失败了, 结果和平和正义两者都丧失了。

### 3. 几点总的考虑:

强国的均势变化了; 变化非常快, 很难掌握。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列强的协调, 即欧洲列强的协调。

奥地利帝国、匈牙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已经消失了。

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地区都已巴尔干化。

欧洲在两次两败俱伤的战争中毁灭了自己。

美国和苏联的巨大威力正支配着全世界。

欧洲的许多国家被引诱放弃斗争。

中立主义(有时伪装为第三势力。概念)。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 最近的事件使中立主义在英国有所抬头。

但是, 我相信你们在一场两种原则的斗争中——其中一种原则, 即共产主义, 是邪恶的——不可能保持中立。

随着强国均势的改变, 西方和基督文明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将近两千五百年来, 白人一直有自己独特的文明。

现在是革命: 亚洲和非洲。

这片广大地区一定会出现巨大动乱和严重的权力真空。

谁将填补这些真空? 俄国, 中国还是自由联盟?

不结盟国家一定会增加, 当这些国家从殖民地或其他依附地位变成独立的时候。

在英国范围内, 我们不能阻止这种趋势; 但是可以不断控制这一

进程。

过去十至十五年来，有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

现在是加纳；8月份有马来亚；接着将是新加坡。

在法国领土上也出现了某种类似的过程：突尼斯、摩洛哥，不久还有阿尔及利亚。

印度尼西亚。

在十至十五年的欧洲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上述大片地区事实上已经变成中立了。

在中东，或多或少受别人诱导的那些国家变得动乱不安，并且为穆斯林和民族主义宣传所困扰。

在这样一种混乱情况下，欧洲发生分裂：有一些人想站在边线外旁观，等待变化；另外一些人则准备全力以赴，参加斗争。

我相信，英国——我了解我的政府——将留在竞赛场上，发挥自己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欢迎完全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一方面是由于感情上的原因。当然，感情也会从相反方面起作用——有一些人似乎仍然想重提波士顿港的茶叶事件。<sup>①</sup>

一方面也由于利益上的原因——我相信，即使象你们这样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作战。

所以你们需要我们：我们的力量，英联邦的力量，而且，还因为我们是欧洲的领导者。

但是，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之间缺乏一个共同战线和一种真正的 253  
伙伴关系，我怀疑我们所信仰的原则是否能得胜。

……我希望你们将原谅我在结束讲话时坦率地谈到一个迫切的问题，这种坦率态度，从真正的伙伴关系和战友关系的角度看，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应该说是必需的。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许多问题上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

① 指十八世纪北美波士顿人民沉毁英商茶叶的抗英事件，史称“波士顿茶会”。  
——译者



对远东，对巴勒斯坦问题，我们该做些什么，甚至，还有怎样控制联合国的问题。

(有时候是个理想，有时候又是个麻烦)

但是，当前有一个问题使我国人民的感情特别激动，它也是一个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可以指靠我国力量的问题。

这就是纳赛尔和运河问题。

让我们坦率地说吧。

我认为我们两国的政府或人民都不喜欢纳赛尔。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自封的独裁者，他要弄西方和东方——不过，他愈来愈卖身投靠共产党人。

情形很象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开始时也是装成一个意大利爱国者。最后，他终于充当希特勒的帮凶。

让我再坦率地说吧：你们的政府和你们的很多人民都认为我们的行动愚蠢、仓促和非法。

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许多人民则认为你们对我们太苛刻了——而且简直是委弃了我们。

好了，这些事都过去了——牛奶已经泼在地上了，事已如此。

让我们不要再惋惜它——不要再纠缠在这些往事上。

但是，运河的问题仍然存在。

我希望你们将尽你们的一切可能……来使运河问题得到一个暂时可行而又顾及未来的解决办法——特别是有关通航税问题——这个办法即使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至少也要使我们认为合理！

但是，如果办不到这一点——如果纳赛尔完全顽固不化……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在短期内暂时忍受屈辱，接受一个不妥善不公正的解决办法，我希望你们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里都不要说这是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

我希望你们用最强烈的词句谴责纳赛尔和他的所作所为。

对他施加一切压力——政治的和经济的。

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一次屈辱性的失败，让我们不要把这称为胜利或者平局。

让我们明确地说，我们迟早一定要打倒他。

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我国人民曾经为争取进步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日子。

我想，他们已经学会忍耐，也就是善于等待。

但是，他们不能受愚弄。

有趣的是，由于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公平感与他们的自利感同样强烈，所以，他们对加沙地带、亚喀巴湾的处理和以色列所受的待遇，反应之强烈，一如他们对运河和运河通航税问题的反应。

我们英国政府对产油国的现状，对那里所发生的危险，感到相当不安。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不管怎样，我们的确希望，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短期的不好的解决办法，你们将明确地表示，这是一个用欺骗手段强加给我们的不好的办法……

我担心，如果采取任何其他方针，将会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造成很大的裂痕，以致必须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弥合，这是世界目前的紧迫形势所不能允许的。

总统对我说的英国人民感到被美国所委弃这一点，反映很强烈。但是，他的答词

……很友好有礼。不过我想，我们做到了从一开始就采取攻势。<sup>①</sup>

接着，我们讨论了会谈结束以前的全部程序问题。经过我们四个人的一般性会谈后，总统和我将让国务卿和外交大臣去逐点讨论具体问题。当然外交部和我的秘书班子已经拟就一套很出色的简明文件，而且塞尔温和我对哪一些是我们要力争达成协议的主要问题，心里都有数。但是根据过去在阿尔及尔的经验，我深知总统是不愿意亲自参加所有讨论的。他喜欢让他手下的人去推敲答案，然后把结论送给他批准。因此，头一天的下午和第二天3月

<sup>①</sup> 1957年3月21日。

21日的上午，我们用来娱乐消遣和进行一般性的非正式谈话。那里也准备了良好的高尔夫球场，尽管天气不太好，总统还是抽时间打了几局。

255 与此同时，伦敦不断发来电报，主要是关于罢工问题的。内阁显然对怎样对待铁路问题拿不定主意。如果我们把工资增加率从百分之三提到百分之五，就可以避免一次罢工；但是很明显，我的阁僚们

要求我来作决定，或者，至少是提个指导性意见。我倒没有什么犹豫。我们确实经不起另一次铁路罢工，而且，可能接着就是煤矿罢工。我们的经济太虚弱了；所有这些灾难，比起再增加百分之二的工资来，无论如何都更为严重。<sup>①</sup>

22号星期五这一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关键的日子。我的伤风很厉害，一直蔓延到胸部，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房间里，靠霍华德·辛德尔将军给我的一些高效药品来支持。辛德尔将军多年来一直负责照顾总统的健康。他对我十分关心，治疗也很成功。3月2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和我一块度过一个小时，谈得很好，

部分时间用来谈已经接触过的问题，部分用来谈新的问题。他着重重复了第一天晚上和昨天所说过的话。他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已经在他自己与英国政府首脑之间重新建立起完全的信任。这是他最想望的目标。他认为我们两国人民只能逐渐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在大西洋两岸，还有许多人希望事情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他说，参议员们和国会议员们的一些愚蠢的演说和报纸上的一些愚蠢的文章，使他很烦恼。他自己倒是从来不看报纸，也不听广播；不过，[詹姆斯·]哈格蒂先生把这些都告诉了他。他十分理解，英国报纸当然会攻击他本人和杜勒斯。他认为这种情形只能逐渐地纠正过来，但是，首先一步是我们之间要互相信任。我说，事情当然是这样，但是，他也应该理解，我们的困

---

<sup>①</sup> 1957年3月21日。

难在于，感到最气愤的恰恰是我们国内最爱国、最热爱传统的人。极左派并不怎么希望英国再成为一个大国，而我们需要依靠的人却特别敏感。<sup>①</sup>

第二天，3月23日

10点钟左右，总统走进来。我正穿着睡衣坐在屋里，身体很不舒服。外面刮着讨厌的“西洛可”热带风。他呆了一个小时。中午12点，我到他房间去。他很喜欢这样的谈话，大部分时间是他在说。他认为他善于摆脱这一切——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sup>②</sup>

然后，我们开始谈到公报，这在任何会谈中都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说，我认为长篇的公报往往用来掩饰成果不大的谈判。我还明确地对他说，我不赞成公报只作一般性的叙述。英国人对这种做法已经感到厌烦。总统似乎认为，美国人民倒十分喜欢这样的公报。<sup>③</sup>

但是，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意见办了。美国的专家们草拟了

一份骇人的公报“草案”，满篇是关于联合国、自决等等的冠冕堂皇的废话，就是只字不提在私下会谈和全体会议上实际讨论过的任何问题。<sup>④</sup>

我说服总统把这些全部删掉，公报只用三两句话，然后附上一份清表，列举我们已达成协议和讨论过的问题。他同意了这个办法。公报的这样一部分，现在通称为“议定书”。塞尔温和我想出的这个办法，使我们回复到伟大的战时会议曾经采取过的办法。此外，用这样的办法，不论是已经达成协议的问题，或者是同意以后继续研究的问题，都能有一个实际的结论。这样一种会谈公报，看来会产生比较大的直接效果。但是，除非它规定得很明确，而且接着就迅速执行，否则，会谈成果还是会很快就消失的。

---

①②③④ 1957年3月23日。

在谈话过程中,除了一些重大的问题以外,艾森豪威尔总统还经常和我谈到他的内阁:

他想引进一些年青人,以便有一些具有总统才干的人来接替他。……他让尼克松参加所有的内阁委员会、防务委员会,等等,而且一有可能就派他到世界各地去,好增长他的经验。<sup>①</sup>

257 他花了不少时间和我谈他与尼赫鲁的一次长时间会晤的情况,而且很有眼光地总结了的印象。尼赫鲁对他长篇大论地唱了一番充满理想主义的高调。但是总统认为一接触到具体问题,例如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一定会十分固执。我们还长时间谈论我们英国的防务计划。总统根据他自己的全部经验,对这个计划深表同情。他从丘吉尔那里吸取了教训,懂得各个军种头重脚轻的危险,所以他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自己的人斗争。

这些日子里有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情:我发现国务院的代表团里包括有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墨菲。我们进行过几次很有益处、很有启发的私人谈话。他对总统感情很深,但是觉得杜勒斯难于相处。

24日晚饭以前,就议定书达成了一致意见,总统和我签署了包括多项协议的各种文件。公报的全文也通过了,其中包括关于核试验的协议。当晚晚餐时,我们四个人又会面。

我们长时间讨论了联合国问题——关于它的用途和未来。我发现艾克在这个问题上远不象我原先预料的那样武断。他对联合国有一种半宗教式的信仰——但不是盲目的。他对美国从前放弃国际联盟似乎感到十分难过,好象觉得这是他们的罪愆,必须做点事情来弥补。福斯特就有点看不起联合国。他只是认为如果没有联合国事情不好办就是了;但是,他认为,如果将来美国和联合王国能够事先拟定共同的方针,密切配合,也许仍然能够掌握那里的多数。我认为,我们总的结论应该

---

<sup>①</sup> 1957年3月23日。

是：我们必须努力重新在联合国内一致行动。我说，这需要卡博特·洛奇愿意和迪克森（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合作，而目前洛奇并没有这样做。<sup>①</sup>

艾森豪威尔很诚恳地谈到，欧洲人不断地批评美国，会造成一些危险：

他对英国人的反应感到很难过，尽管在他看来是谅解这些反应的。为了使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同意继续为欧洲花费这样大量的金钱，他碰到很多困难；有一种情绪很容易增长起来，就是：美国最好完全摆脱这一切负担，降低税收等等。只要他还有权力，他就要尽力和这种情绪作斗争。但是，他认为，英国人如果过多地批评美国，就只会助长本来在美国就一直存在的孤立主义倾向。<sup>②</sup> 258

这次会谈最可贵的成果之一，就是商定彼此定期通信——每周或每月一次，坦率而自由地讨论任何我们认为必须了解对方观点的问题。对这些通信他将保守秘密，只让福斯特·杜勒斯一个人看。

总统本人对记者招待会很不感兴趣，所以他建议：既然我是主人，还是由我来举行一次包括美英记者在内的记者招待会。他自己在星期天上午不事声张地离开了。公报就在这天上午公布<sup>③</sup>。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来自这样多方面的报界人物。但是，招待会进行得很顺利。这时天气已经恢复正常，阳光灿烂，温暖宜人，与会的人看来都兴高采烈。

由于国内的事情紧迫（运河问题，国防白皮书，还有预算），我没有能如愿到渥太华去走一趟。但是，路易斯·圣·劳伦斯和他的外交部长迈克·皮尔逊慷慨地同意到百慕大来。他们25日星期一前来参加了午宴，下午我们谈了三个钟头。我们谈到了我们

<sup>①②</sup> 1957年3月23日。

<sup>③</sup> 《百慕大会谈最后公报》，敕书第126号（皇家文书局，1957年3月）。

刚和美国讨论过的全部问题。26日星期二，我们又和他们继续谈了一整天。我告诉他们，我想在夏天召集一次英联邦会议。6点半，加拿大总理和我联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对未能在苏伊士问题上更为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有点不安，他热心想在当前给我们一点特殊的帮助。持续将近两天时间的很多小时的讨论，使我对这位彬彬有礼、才能出众的政治家的性格，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他简直是以一种父辈的感情来对待我的。

259 现在，需要把百慕大会议以及我们与加拿大人会谈的丰硕成果通知英联邦各国我的同行们。这件工作在我们离开百慕大以前就完成了。我们还做到了把英国和美国报界对会议的反映一齐告诉了他们。

我的首要责任是向议会汇报。我完全有理由宣布百慕大会议已经达到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了英美的关系：

双方都以非常坦率和诚恳的态度进行对话，这是明智的办法，因为，只有通过完全坦率的会谈，我们才能期望这个对世界的未来关系极其重大的伙伴关系得以恢复和加强。<sup>①</sup>

我们讨论了很多题目——总共是十一项，并且做出不少决定，有的是马上就要执行的，有的则留待进一步研究。有一些问题，象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我们意见不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磋商。另外有一些问题只是牵涉到长远的方针，还不是马上需要做出决定，特别是有关联合国未来的作用问题。

我如实地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指出对联合国的信任并不能代替外交政策。<sup>②</sup>

关于欧洲统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接受我们关于把国际自由贸易区扩大到包括六国在内的想法。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日。

我必须承认，在埃及和以色列问题上，我们还未能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未来还是模糊不清，难以肯定。但是我们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向我们的美国朋友表达了我们的不安。此外，我们还根据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比较详细地考虑了用什么办法最能保护我们的“石油供应和产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sup>①</sup>与此同时，我们还重申了这样的主张，就是：联合国紧急部队需要继续留驻加沙地带，以及各国船只都应拥有安全自然通过亚喀巴湾的权利。

联合国部队的留驻沙姆沙伊赫，是使这个规定受到尊重的一个额外的保障。<sup>②</sup> 260

除了这些内容广泛的结论以外，还就三个特殊问题达成了明确的协议。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决定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点特别使我感到满意，因为早在当外交大臣的时候，我就花过很多精力和时间来说服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这个条约<sup>③</sup>。我高兴的是美国人现在终于承认这个条约的作用，并且赞同条约成员国在最近的烦恼日子里共同采取的坚定方针。

我还发现，美国人十分赞赏我们在波斯湾所起的作用，也充分估计到我们对那些与我们有条约关系以及我们对之负有重大约束性义务的国家当权者采取恪守信用的政策的重要性。<sup>④</sup>

第二项协议是决定向我们提供导弹。这些导弹很快就可以运到，它对已经部署在联合王国的核威慑力量以及对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关于这些武器的控制权问题，曾经存在过一些争论。既然这些弹头暂时还是由美国人提供，当然应该象携带千吨级（现在是百万吨级）炸弹的轰炸机一样，由美国当局来控制。不过，协议规定，未经两国政府的同意，不

---

①②④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日。

③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632页。



得使用这些导弹。

[这些火箭]将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财产，由经美国专家优先加以训练的英国军队来管理。这些火箭只能由英国人员发射，但是，弹头将由美国控制——这是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对使用弹头有否决权。但是，这绝对不等于说，这些导弹何时发射和向谁发射，其决定权操在总统手里而不在英国政府手里。

261 只要我们还依靠着美国的弹头，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弹头的使用就仍然是两国政府共同的事情。<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有一位议员插话，责备这个计划对英国是一个屈辱。我只能回答说，这项协议与原先艾德礼负责谈判的规定美国控制轰炸机的协议是一样的。同时，我们有权自由发展英国制造的弹头和火箭体系。

根据辩论前下院所提的质询内容，我事先有所察觉，所以我把演说的大部分用来谈第二个专门协议，即关于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协议。这个策略有两个好处：它几乎把辩论从危险的运河问题完全引到核试验问题上，在运河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论据；这个策略还可以利用反对党队伍中在核试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盖茨克尔和工党的所有其他发言人因此陷入绝望的一团混乱之中。我用了很长时间来谈核试验对健康带来的危害问题以及公众理所当然地广泛存在的忧虑。关于外辐射和随后可能产生的危险，医学研究委员会最近曾经提出一个极其详细的报告；而且，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课题。直到这时候，试验核弹所造成的外辐射危险，程度还是很小的，几乎不足挂齿。但是，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尤其是俄国人试验的频繁，我本人也对外辐射的危险日益不安。我从这时起就抱有一个雄心，希望能促成三大国缔结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任何核试验的协议。但是，差不多到我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日。

快卸去首相职务时，这个希望才最终实现。当初无论如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所以我所能说的只是下面几句概括性的话：

不论是外辐射或者内辐射，我们都既不应该低估它的危险性，也确实不应该加以夸大。如果我们不去不断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不继续努力争取实现我已经描述的那样一种切实可行的限制试验的办法，那将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试图煽起歇斯底里的或者神经错乱的恐惧，也同样是错误的；如果为了政治目的而这样做，那就确实是掉进了犬儒主义的深坑。<sup>①</sup> 262

我们在百慕大所取得的另一个成果，就是美国人充分理解我们正在实行的新的防务政策，特别是关于裁减我们驻德部队的计划。

总的说来，这次辩论是成功的。当然，为了应付辩论，我不得不进行繁重的工作，特别是研究核问题的细节：

一大群“秀才”来到唐宁街十号，帮助我准备演说词。事情到下午1点钟才结束。我单独吃了中饭，然后休息到2点45分。我准备演说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张劳累过。按照报界的说法，政府能否维持下去，党内能否保持团结，将完全取决于我的表演了。<sup>②</sup>

回顾这次辩论，我感到我们确实是够幸运的，因为当时的局势实在令人难以乐观。就象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的，反对党似乎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

苏伊士及其后果，补缺选举中保守党选民的弃权，造船业和机器业罢工的继续（星期一），索尔兹伯里勋爵周末的辞职——在工党心目中，首相一定象是行将被“屠宰供盛宴之用”的牲畜。

辩论开始不久便完全粉碎了这种说法。当盖茨克尔先生在5点半发言完毕重新就座时，风向已经几乎完全变了。”<sup>③</sup>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日。

② 1957年4月1日。

③ 见《西方邮报》，1957年4月5日。

事实是最近几个月来他已经只习惯于冲杀而忘记了怎样躲闪了。

盖茨克尔发言时，我抓到一个机会插了一句话，要求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反对党是否主张取消即将在圣诞岛进行的英美联合核试验。盖茨克尔虽然平常说话机灵，也掉进圈套，当众明显地暴露出工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我在日记里写道：

午夜12点，辩论结束了。有点象奇迹似的，我的演说进行十分顺利，我们的小伙子们都很高兴。结果是托利党团结在一起（暂时的），社会党人却分裂为二。这是因为我把演说的大部分篇幅用来谈核弹和核弹试验，而且向盖茨克尔挑战，要他说出如果他处在我的地位他将继续还是放弃试验。他支支吾吾，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结果同时失去了他党内两翼的支持。就这样，我们越过了这道特殊的障碍。过河问题（苏伊士运河）马上就要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可能要倒下，不过暂时我们还活着！<sup>①</sup>

所有这些喜怒之情，当时虽然很强烈，使人不能克制，但不久也就忘记了。但是，在阅读这些褪色的文件和记录时，旧日的情景又呈现在我眼前。那时候，报上正在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大臣们、特别是首相们肩上的担子是不是重得愈来愈无法忍受？我怀着某种兴趣阅读了这些讨论文章。我担任首相才不过三个月时间，但是，回忆起来，这段时期的各种焦虑不安，已经在我身上留下痕迹。不过，因为这些焦虑都是属于公共事务的，所以总是可以忍受的。它们总不象晚年的一些个人问题那样，注定使人痛苦不堪。

我们的下一项工作是最后修改国防白皮书。在接到我的指示后的几个星期里，国防大臣一直以难能可贵的毅力和速度进行这项工作。到3月28日，他的建议就在内阁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

<sup>①</sup> 1957年4月1日。

了，并于4月4日公布。建议包括了一些在正常时期从未实现过的重大变动。虽然艾登在他的短短任期内曾经考虑过类似的某些改革，但是1956年的紧张局面使这些改革无法实现。因此，一直没有根据战后情况来全面彻底地重新研究我们的防务政策。

现在，我们下定决心提出一个在五年内实现的包含相互联系的一系列改革的计划。虽然防务开支的实际削减数字可能并不惊人，在目前这个年度只是七千八百万英镑，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成就。若干年来，国防预算是每年都在增加，而我们却是在降低总拨款额的前提下增加必须增加的现代武器费用。就象白皮书公布后第二天我在谢菲尔德的一次讲演里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使我们有更为机动、训练更好、装备更优良的部队。人数相应地比以前少了，但是战斗力将更强”。这个新编制的前提是，“我们决心把我们置于核军备的威慑力量的基础上”。我说明在最近这些年里，我们在西方的防务负担中承担了超过合理限度的份额。我们在莱茵地区的驻军，从七万七千人减到六万四千人——这是各盟国接受了的数字——已经公布了。在进行这些变动时，我们认真地履行对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义务；而且，4月17日我在总结辩论时，还对各国政府所表现的谅解态度表示谢意。此外，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立即表示他赞赏

这个国家在拟定这项计划时所表现的勇气和魄力。这项计划表明这个国家正努力使我们的军事建制适应今天的军事现实，努力使我们的经济更有生命力。<sup>①</sup>

我们承认，英国、还有西欧，实际上都无从有效地防御核攻击。因此，压倒一切的原则与其说是准备战争，不如说是避免战争。战斗机司令部的飞机数量需要大大减少，因为它在联合王国境内的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7日。

作用仅限于保卫核威慑基地。我们希望能在适当时候以一个地对空的导弹体系来取代这些战斗机。我们目前自己制造的核威慑武器的运载工具,主要就是V级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还将继续使用若干年。另外,再加上弹道火箭做辅助力量,开始时先使用美制导弹;不过,我们希望最终将依靠我们自己制造的导弹。百慕大的协议使这一切都成为可能了。

265 但是,最主要和最惊人的建议是从1961年起取消国民义务兵役制,这样,到1962年底,武装部队中将只由正规的志愿兵员组成。1957年仍然达到六十九万这一惊人数字的兵员总数,将减少为大约三十七万五千人。但是,我们也预先郑重声明,如果志愿兵役制证明不适应需要,将不得不实行某种类型的义务兵役制。

我并不赞同那种认为国民兵役制完全一无是处的意见。它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严重的缺点,浪费特别大。采用这种制度,将有大量人在经过训练、学会了军事技术以后又离开部队,而且需要大量人员从事教练。<sup>①</sup>

这时候,要补充海军和空军兵员,甚至要给陆军的第一线补充兵员,都没有什么困难。问题无疑将出在某些辅助和后勤人员上——配备“尾巴”要比配备“牙齿”困难。不过,我们认为还是有希望克服这一困难。

随着驻德陆军的裁减,那里的战术空军也将大约缩减一半;但是,由于皇家空运力量的大量扩充,将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把增援部队运到发生麻烦的地点。同样,提供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将大大缩减;不过,现役的九艘巡洋舰将以三艘正在建造中的虎级巡洋舰来替换。很多预备役舰只,包括四艘战列舰,将予处理或者报废。苏伊士以东我们的力量将维持原状,不予缩减,不过主要舰只将集中成几个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舰群。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7日。

这样一些变动,可能产生人员安置的问题,主要是民间行业如何吸收退伍的军官和士兵。劳工大臣伊恩·麦克劳德在下院介绍了他所建议的各种方法;议员们对他的演说反应很好。总的说来,1957年的国防白皮书,不管它是好是坏,反正是标志了战后军事思想的革命。这个白皮书的编制,应该归功于邓肯·桑兹。在这项工作中,他表现出一些显著特点:考虑细致,意志坚定,高度热诚。三军大臣协作得很好。照《年鉴》上不偏不倚的说法,这个白皮书的提出,“无疑地提高了政府原来有点狼藉的声誉。”<sup>①</sup>

不论在议会内外,争论的重点很自然地都转到这项新武器的制造和它在各种类型的战争中的用途问题上去了。反对党由于他们自己队伍里在是否依靠核武器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所以又一次陷入困境。很多后座议员都反对生产和使用这种武器。我当时在日记里写道:

因为国防白皮书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防务——还有国防开支——是以核战争为出发点,这就使社会党人陷入更大的混乱。盖茨克尔的地位变得愈来愈尴尬。不过,与此同时,他们的反对在政治上也给我们造成一些危险,很能煽动人们的感情。各种类型各种年龄里都有那么一些善良人,特别容易上他们的当,这些人当然会被他们卑鄙地加以利用。<sup>②</sup>

在辩论时,桑兹首先作了出色的发言,提出了计划,我当然把话题集中在反对党感到进退两难的问题上。我们是把核武器看作遏止大规模袭击的威慑力量。两年以前举行国防问题的辩论时——最后一次辩论丘吉尔还发了言——很多议员曾经企图迫使我们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依靠常规武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进行全面战争。

<sup>①</sup> 《1957年年鉴》,第20页。

<sup>②</sup> 1957年4月5日。

这是十分危险的。两年以前，我们曾经就一份白皮书进行过人所共知的辩论，我愿意重复我当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过分严格地说清楚，看来简直就是鼓励和邀请别人来侵略我们。<sup>①</sup>

无论如何，经常地估计形势并作出决定，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职能。

267 反对党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延迟核试验并作出最后的努力来使美国和俄国放弃核试验。由于俄国和美国政府正在准备进行一系列大规模试验，上述呼吁根本不可能实现；而对于英国来说，任何延缓试验都非常不利，因为我们自己不进行核试验，就根本无法自行制造独立的核弹头。

总的说来，要想一方面对真正的和平主义者表示同情和谅解，一方面又有力地驳倒反对党的建议，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困难。全面裁军也许有一天会实现，缔结一项禁试条约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如果以为“禁止核弹”——就算有可能达成协议而且实现了有效的监督——就能够解决欧洲安全问题，乃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相应地裁减常规军备，而只是取消非常规武器（即核武器），并不能保证欧洲免受苏联的侵略。<sup>②</sup>

接着我又指出：

我经历过两次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战争。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似乎那样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什么坏处，而且还相当高尚。

至于那个折衷的修正案，内容等于说：

我们需要依靠核威慑力量——但是不要过分依赖它。我们应该推迟我们的核试验——但不是推迟太久。我们必须要求其他大国同意取消一切核弹试验。但是，万一他们真的同意，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将

---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7日。并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579页。

<sup>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7日。

是：他们拥有经过充分试验的核弹，而我们手里握有的，却是一枚根本没有经过试验的核弹。这样一来，我们的国防当然只好依靠美国的核力量。刚才那几位尊敬的议员们，一方面提出这个修正案，一方面又对我们说：从美国取得火箭，不论是受赠或者购买，都是丢脸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以前，弹头要由美国来控制。最后，更糟糕的是，人们要求下院不要批准缺乏坚定决心的政策。<sup>①</sup>

268

辩论的第一天，反对党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乔治·布朗的发言。

考虑到反对党在核弹问题上陷入的尴尬境地，我认为，他的发言是相当勇敢的。当然，他只能又重复他那篇粗野的广播讲话。反对党的修正案是自相矛盾和滑稽可笑的，因为它企图把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折衷起来。<sup>②</sup>

本来对白皮书就很慷慨地表示欢迎的报界，现在进一步承认，在核问题上，争论的形势大大有利于政府。不过，可惜还有不少重大的困难哩。这种现代武器十分复杂和昂贵，加上各种新颖的、未经试验的方法必然带来一些严重的危险，在以后的若干年中，这些问题经常引起困难和失望。从更广泛的范围说，虽然全世界似乎不得不习惯于各大国都拥有毁灭他们自己和他们邻居的能力这样一种局面，但是由于核弹可能造成的灾难极其严重，又使人具有某种稳定感，甚至是安全感。在这种“恐惧均势”的掩盖下，世界的许多地区出现了规模虽小、危险性却很大的新冲突。虽然世界在转变，虽然英国旧日的帝国权力已经变成对新的英联邦的责任，我们仍然应该在世界上起自己的作用。我确信，用我们当时所计划的那种武装力量，完全足以妥善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4月17日。

② 1957年4月16日。



## 第八章 阿拉伯之夜

1957年下半年，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各地区产生了新的忧虑。尽管有过1956年的动乱，中东大部分地区总算安定下来了，意外地出现了异常平静的局面。英法在苏伊士军事行动的结束，联合国里对英法的猛烈攻击，加上亚非集团在美国和苏俄的共同带动下发出的高声鼓噪，无疑使欧洲各大国在这整个地区的力量和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纳赛尔被以色列人打败了，丢了面子，使这个埃及独裁者的实力和影响降低了，他至少在十年内不得不稍为收敛一下自己的锋芒。

6月初举行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常设委员会会议，的确是英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美国这时已经准备参加这个组织。这个联盟对局势的稳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它所属的经济委员会拟定的区域合作纲领，也显示了这个组织的力量和生气。联合王国除了提供二百万英镑作技术援助和改进交通之用，还增拨基金五十万英镑。美国人也一样地慷慨。外交大臣给内阁同事们报告说：六月会议最难得的副产品，也许就是会议上洋溢着的那股友好和满怀希望的气氛。

美国人一直都很帮忙，表现很有魄力。他们派来的“观察员”洛伊·亨德森的贡献特别可贵。总的说来，这次会议证明，巴格达条约的精神和目的并没有被上一年发生的事件所动摇。塞尔温·劳埃德把我们与美国的合作形容为“头等的”；当然也出现过常有的那种困难，就是怎样把冗长的公报压缩成恰当的篇幅和形式。

270 当我们听说伊拉克总理努里·帕夏由于健康不良而决定辞职时，

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不过，他仍将留任国王的亲信顾问，而且，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政权和政府的性质是不会有什麼改变的。可惜，这个希望后来却无情地破灭了。

这时候，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个地区发生了新的复杂情况，虽然不算很重要，却使英国政府处于某种进退两难的地位。在马斯喀特和阿曼发生了叛乱，伊斯兰教教长加利卜·本·阿里企图取代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加以保护的国王赛义德·本·泰穆尔。叛乱由教长的兄弟塔里布领导，范围只限于阿曼，原先开始于山区和贫瘠地带，后来才扩大到比较肥沃的地带，威胁到平原地区的定居点。国王不慌不忙地慢慢开始振作起来，去对付这个危险局面。他从马斯喀特向阿曼进发；但是他的军队很弱，缺乏援助。这时候，他呼吁我们帮助他恢复控制。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和那里的国王友好，并且给予支持；如果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我们不去帮助，就一定会严重丧失整个海湾地区所有友好的酋长和统治者对我们的信任。

此外，虽然还没有证实这个地区藏有石油，但是有两家公司目前正在全区积极进行勘探，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支持我们的同盟者。<sup>①</sup>

1955年的布赖米军事行动，是我当外交大臣时向艾登建议的。那次行动，得到艾德礼领导下的在野党工党的充分支持，进行得很成功：进犯的军队遭到严重的挫折，国王的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山区地带。从当时的情况看，和平的前景似乎十分有望。<sup>②</sup>但是，沙特阿拉伯政府对我们的干预怀恨在心，所以，教长的兄弟塔里布到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去了一趟，不但很容易地得到这两个国

271

---

① 后来果然发现了石油。到了1968年，这个过去十分贫穷的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高达三千五百万英镑。

②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641页。

家统治者的同情，而且获得大量的武器和金钱。“自由阿曼运动”在开罗设立了宣传处，开始通过电台以惯常的激烈语调攻击英帝国主义和剥削。

1957年夏天，叛乱者已经把国王的官员和卫戍部队逐出中部阿曼的城镇，并且以教长的名义宣布了独立。国王的军队被击溃，士气低落。虽然为了恢复局势只需要进行很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发生过1956年的事件，如果英国政府单枪匹马再去参与远方的军事冲突，即使规模不大，首先在我的内阁同事里有些人会认为是冒险行动，甚至认为是有勇无谋。除了会招致国内和联合国的批评外，我们还可能再度遭到美国的非议和反对。

另一方面，大臣们也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对老的盟友见死不救，我们在海湾的地位将大受损害，也许还是致命的损害。因此，大家赞成提供各种“非刺激性”的援助，诸如空运物资和武器给国王的军队，使用英国军官指挥的特鲁西尔阿曼的侦察兵。我们还增派了一艘快速舰去控制海岸。但是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就是是否应当使用皇家空军去袭击叛乱者所占领的阵地。毫无疑问，美国和联合国一定会表示反对。我们将被指责为不人道和实行“恐怖主义”。当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同情情绪正在普遍下降时，我们这样做也可能使自己和阿拉伯各国疏远。不过，内阁还是赞成冒一下险，决定只使用火箭而不进行轰炸，并且在散发大量警告性传单之后，只袭击山区的设防阵地。

内阁会议以后，我决定马上给总统去封电报，说明我们的困难。我明确地指出，虽然目前的叛乱显然是由外部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我们还是建议在我们的声明里尽量少提沙特阿拉伯人，而且加紧设法使阿曼国王与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关系得到改善。不过，  
272 无论从局部范围或从更大范围看，我们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阿曼国王已经呼吁我们给予援助，我们基于友谊而承担的义务看

来也不允许我们在困难时刻弃之不顾。此外，如果马斯喀特的动乱不尽快遏止和解决，就一定会有扩散的危险。我希望，通过我们有限度的空中援助，给叛乱首领们的信心和威信以快速的打击，就有可能迅速恢复阿曼国王的权力。

总统在他7月22日的回电中表示了同情态度，不过，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否认正在流传的一则谣言，说是阿曼国王统治区内的动乱，是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为了损害在这个地区已经取得开采权的英国对手而煽动起来的。我们当然接受这种辟谣，而且我以为根据总统的复电我们是可指望得到他的支持的。

皇家空军对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多次火箭袭击，事先都向平民发出警告。但是

在马斯喀特，教长的叛乱仍然在继续。我们是否能平息或者控制住它，看来还是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在陆上行动（天气太热），空中袭击又要十分谨慎。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头。<sup>①</sup>

在这关键时刻，杜勒斯国务卿又由于他的急躁性格，突然提出马上要到伦敦来。

除了总统的电报以外，还打来了许多电话，告诉我们说福斯特·杜勒斯将在星期一到达伦敦。我很担心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而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做法也有点恼火。但是，我们还是妥善地应付过去了；我想，公众会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是：杜勒斯到这里来是谈裁军问题（这就好），而不是谈马斯喀特问题（这可就很糟糕）的。<sup>②</sup>

我最关心的当然是如何尽快结束这次叛乱事件。但是，国王这时的残余部队都没经过什么训练，没有战斗力。我们呢？只有 273 不多几百军队。这个地区既广阔又多山，而且气候条件很坏。不过，我对我们在当地的两位负责人很有信心，早在战争年代我就认识他们了。

---

①② 1957年7月27日。

[伯纳特·]伯罗斯爵士(驻当地的政治代表)和[劳伦斯·]辛克莱爵士(空军中将)两位都是老手;我高兴地看到他们给我们发来联名电报(就象从前亚历山大元帅和我从希腊和意大利联名打电报的办法一样)。<sup>①</sup>

7月29日,外交大臣在下院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明确地指出,虽然我们没有援助阿曼国王的条约义务,但是,鉴于我们的长期友谊,我们有帮助他抵抗颠覆的道义上责任。当然,我们与海湾的统治者也有一些有约束力的正式协定,但是

当地的统治者和人民,对正式义务与由于长期存在的友好关系而产生的义务两者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区遭受失败,那末其他地方的人就会以为我们敌人的反英宣传也许有点根据,误认为女王陛下政府已经不再愿意、也没有能力来帮助它的朋友了。<sup>②</sup>

相当意外的是,这个声明得到下院的同意,反对党领袖对我们的决定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有一位议员质问是否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这次动乱是埃及政府或者沙特阿拉伯政府支持和煽动起来的。外交大臣机智地回答说,他没有指控任何特定国家的政府,但是,“显然……那些反坦克炮和机关枪不是中央阿曼本地生产的。”<sup>③</sup>现在很清楚,只要军事行动进行得迅速,而且又有成效,我们在议会里就用不着怎么害怕。

8月5日,我向国防大臣表示我对马斯喀特和阿曼的进展情况很不安。看来,那里事情十分混乱,而且行动相当拖沓。

274 空运系统似乎完全瘫痪。我们甚至要从一个地方运一连士兵到另一地方都办不到。考虑到这次行动的规模如此之小,实在令人奇怪为什么我们每年给三军花费十五亿英镑,所得的效果却这样可怜。

我给空军大臣送了一份类似的指责。

---

① 1957年7月30日。

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7月29日。

运输机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波斯湾那里这方面的麻烦似乎很大。我希望你就下列问题给我一份报告：1)空运司令部的情况怎样？2)给这个地区配备了多少力量？3)有多少退役的？等等。乍一看来，情况相当叫人担心。

事实上，我的责备有一些是不公道的，有关的大臣们能够作出有相当说服力的答复。不过，我急于结束这次事件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在国内外的批评扩大以前就结束这桩事。

国防大臣休假期间，我直接负起国防部和阿曼军事行动的责任。到8月中旬，叛乱似乎接近平息。平原地区的城镇，乱党已经被肃清，重归国王掌握；剩下的困难只是如何对付山区的一些叛乱分子。在那些地方，他们利用岩石和洞穴作掩护，躲避小股军队的追剿。读过斯各特的小说《罗伊大盗》的人，一定很熟悉这种情况。也许有点言之过早了，我8月13日写道：

阿曼的事情好象结束了，我放心多了。当人们还在考虑地形和天气的困难时，军事行动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而且只用了三个连的喀麦隆士兵和一些二三流的阿拉伯士兵。<sup>①</sup>

可是，到9月3日，我却不得不写道：

阿曼事件又拖下去了——这是指叛乱首领们（还有拥护他们的一些人）守住了一个山区阵地（四五千英尺高）。可供选择的办法是：1)围困他们；2)把他们“硬挤”出来。两个方针都有人反对。要考虑到公众舆论、联合国、阿拉伯世界的神经紧张状态和英国的报界，也要考虑到叛乱扩展的危险，还有，空中袭击问题。<sup>②</sup>

第二天，我们决定至少在短期内还得干下去。

如果消灭残余叛乱者的行动没有把握迅速取得胜利（由于地形、供应等等困难），不如干脆把他们围困在山上。麻烦的是，（由于现在有无

---

① 1957年8月13日。

② 1957年9月3日。

线电通讯工具等)他们可以声称他们仍然作为一个“运动”、甚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着。<sup>①</sup>

到了年底,虽然还有一些部族人在山区坚持,而且潜逃的塔里布还没有就捕,但是就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说,可以认为叛乱已经结束了。不过,整个事件一直拖到几年以后才最后告终。零星的战斗还在继续,在这一届议会余下的会期内,甚至一直到1959年年底以前,叛乱始终没有完全镇压下去。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在军事上也吸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因此,我坚持必须马上草拟一些适当的计划来应付海湾一带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的类似困难,特别是在巴林和科威特。

另外一个问题也使我费脑筋。这时候,英国军队已经撤出阿曼领土。虽然我们准备好正规部队,随时可以应付新的紧急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设法与国王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议,包括他自己军队的组织问题和对内地建立坚强的政治控制的问题。

国王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风度优雅,思虑机敏,很有耐性,有时简直流于固执。任何形式的革新他都不赞成。我把国防次官朱理安·艾默里派去,看看是否可能使国王接受一个合理的安排。我选择艾默里是因为我知道他擅长于进行这一类谈判。他既有耐性,又很坚决。经过长时间艰难的会谈,他终于争取到一份双方同意的备忘录,作为谈判一项更正式的协定的基础。就象在东方事务里常有的情况一样,事情又拖延些日子,一直到1958年9月才最后完全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国王还自愿把他在俾路支的一块占领地瓜达尔让给巴基斯坦政府。因为艾默里能干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所以我后来又使用他去进行另一次类似的、但是更为困难的谈判。

这时候,虽然英国的舆论仍然很沉着,但是,我们还是得面对

---

<sup>①</sup> 1957年9月4日。

联合国里通常的麻烦。8月12日，阿拉伯联盟的政治委员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英国对阿曼的侵略。我当时也许有点不太公平了，我在笔记本里写道：

美国人在阿曼问题上的做法，对我们太无情了。他们不敢投票反对安理会讨论这个议题。我和外交大臣商讨过，我想，我不得不给总统去一封强硬的电报。<sup>①</sup>

8月20日，我在笔记本里写道：“周末我和总统来往了一些电报。他的回答倒令人满意，可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sup>②</sup>

这个月里，有一大堆同样紧迫的问题涌到我这里来——叙利亚的形势，法郎暴跌以后英镑所受到的压力。但是，因为我的一些主要阁僚都在度假，所以至少行政手续比较简化了。“由于我现在同时行使着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的职权，我的地位很有力。”<sup>③</sup>

尽管我们作了努力，安理会还是在8月20日举行会议。我们能够说服美国政府做的，最多就是“弃权”。总统辩解说，这可能和投否决票一样起作用。他果然说对了，因为阿拉伯人的要求虽然有俄国人的支持，仍然未能获得必需的七票，问题因而搁置起来，没有讨论。

上面这段插曲虽然事情不大，但是却很有意思，所以我认为值得在这里重提。当时人们普遍在说，而且其后不断有人再三重复，认为1956年苏伊士的军事行动是最后一次了，从那以后，如果没有那个笨重臃肿、障碍重重的联合国机构的帮助，英国的任何一届政府，即使和另外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也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保护一个依附于它的国家了。当然，各方面都有不少人表示

① 1957年8月16日。

② 1957年8月20日。

③ 1957年8月22日。



犹豫和怀疑，连我自己的一些顾问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内阁同事们，尽管政府面对着各种困难，都表现出难能的坚定态度。我们又一次不得不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单独行动。此外，我们还冒着去年国内一些只热心于败坏自己政府和国家声誉的势力所掀起的某些情绪重新爆发的风险。阿曼行动的胜利，有助于恢复阿拉伯世界的那个地区、特别是海湾一带人们对我们的信任，因为这次行动证明，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国内或国外误解它的政策而动摇，也没有因为人们鸚鵡学舌地责骂它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而被吓倒。结果，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终于又能够在约旦和科威特采取行动，既保护了我们的朋友，又捍卫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究竟还是清醒的，想到这一点，至少也受点鼓舞。我给女王起草的议会闭幕词里有这样一段中肯的话，我感到十分自豪：

鉴于马斯喀特和阿曼与联合王国长期存在着友好联系，朕的政府已应阿曼国王提出的关于武装援助的请求，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平定了他领地内的一次叛乱。<sup>①</sup>

278 今年夏天，当马斯喀特和阿曼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我们在地中海东岸又遇到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由于共产主义严重渗入叙利亚而引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了美国朋友充分的、而且简直使你难办的支持。听起来仿佛难以置信似的，我们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并不是鼓动国务院，而是不时抑制它的鲁莽行动。国务院这回简直是以一个新近皈教的信徒的全部热情来解释新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杜勒斯带着福音传道者的心情，似乎准备——甚至渴望采取一些几个月前他一定会谴责为不正当和不道德的措施。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或者无法挽救了，但是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1日。

我们收到的情报确实使人担忧。年初以来，一些左翼军官被提升，而长期在职、一向比较稳健的军官却被清洗了。很多温和分子被定叛国罪受到审判，被控阴谋推翻现政权，证据都很含糊或者根本是捏造的。结果，许多中间和右翼人士纷纷逃亡避难。俄国大使馆相当公开地组织这些罪恶的事件。还有许多其他的迹象，表明这个国家里共产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俄国的影响不断在增长，而且几乎成了决定性的力量。

我们除了想挽救叙利亚不被北方大熊的拥抱所窒息这个政治原因以外，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有很大关系。通过叙利亚的油管，每年从伊拉克运出二千五百万吨石油，从沙特阿拉伯运出一千二百万吨。因此，我们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有时又互相矛盾的目的。我们既不愿意这整套石油设备落入俄国的控制，同时又不想促使叙利亚切断这些油管。如果我们想马上冒险行动，无论如何必须确保美国能坚持到底，在整个中东问题上求得有效的解决。我们再也经不起被杜勒斯用一些漂亮动人的计划推上第一线，然后又把我们弃置在危难之中。如果油管切断的时间稍长一点，不但我们的石油供应成了问题，而且伊拉克的经济也受到损害。一直和我们友好的伊拉克国王和政府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此外，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运河的石油供应也可能再一次受到影响。一切可能立即出现的风险，都将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经济的恢复、货币和储备状况的改善，都将受到干扰。但是，如果我们敢肯定美国的政策是诚意的和坚定的，我们就应该尽量设法施加压力，使叙利亚不致于几乎不放一枪一炮便落入俄国人之手。叙利亚的许多近邻，特别是那些保持着君主制度和保守政权的国家，当然也 279 和我们抱有完全同样的忧虑。

通过通常的外交渠道进行了几个星期商讨以后，我在8月22日收到杜勒斯的一封私人电报。他的口气仍然比较谨慎。我读到

他的最后一段话时，禁不住有点发笑。他用比较隐晦的词句提出一个试探性计划，然后写道：

我很想知道你对这个解决办法的意见。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以色列，而且西方各国都应该避免采取主动；但是，如果叙利亚形势的发展威胁到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可以相信，他们在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防御措施时，将得到我们道义上的支持。

与此同时，他通知我说他正派遣洛伊·亨德森到土耳其和其他友好国家去就地估计一下形势。在回电时，我虽然担心叙利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很容易扩散开去——也担心油管的控制权旁落，但是还是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尝试通过我们的朋友来行动。

我同意西方大国不应该显得好象是在带头反对叙利亚政权。但是我们应该设法鼓励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坐到一起商讨一下局势，并且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能够攻击叙利亚的做法是背叛了阿拉伯事业，那至少是个好的开端。必须争取做到的是，这些国家能揭穿叙利亚现政权自吹为优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谎言，并且照这个政权本来的面目，即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傀儡来谴责它。

这样，即使当前的努力全失败了，一个纯粹共产主义的叙利亚也可能使中东各国、特别是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和君主政权对共产主义危险有所警觉。

8月27日

280 我给内阁大致叙述了〔在叙利亚问题上〕我所收到的华盛顿历次来电的内容以及我准备好的复电草稿。这个问题将变得极其重要。美国人十分认真地对待，而且正在谈论要采取最剧烈的措施——正巧和苏伊士问题相反。如果他们这样做而没有抱严肃的态度的话……那就太可笑了。①

① 1957年8月27日。

现在，局势变得愈来愈明显了。苏联政府慑于核武器的威胁和任何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侵略，正改而偷偷地从事颠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反措施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模仿俄国人的做法，给中东的其他国家供应武器来收买他们呢？

关键在于：如果美国人真的郑重其事，准备把任何行动进行到底，我们就不要劝阻他们；与此相反，（如果他们仓促行事的话）我们不要鼓励他们去干任何可能致命的事情。<sup>①</sup>

杜勒斯这时急着要安排一次私人会谈。能否找个秘密会面的地点呢？不论我或者外交大臣，都认为这个时候不可能办到，因此，就安排让我的首席私人秘书弗雷迪·毕晓普立即到华盛顿去，杜勒斯以前见过他，也很喜欢他。事后证明，他这次访问十分成功，因为他的风度和才智给了国务卿很好的印象。但是，中东的局势仍然没有什么改善。黎巴嫩已经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不给它以某种援助，它将很难顶住叙利亚的压力。但是，叙利亚周围的其他国家，看来都不愿意扮演美国政府指派给它们的角色。

伊拉克（努里卸任了）的政府很虚弱，约旦也是如此（而且两个王族一直在凶猛地吵架）；黎巴嫩是棵脆弱的小苗。土耳其人倒可能担当起来，但是那样，俄国人会不管吗？<sup>②</sup>

我在苏格兰度了几天假，在等待一些新的会谈的结果。9月5日，收到杜勒斯的一封电报：

他〔总统〕和我考虑过是不是我们中有一个人与你当面会晤一下。281  
我们两人都同意你的想法，要是能象以前那样我们坐在一个房子里把这个事情讨论一下，该有多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样的困难，就是如何避免公众夸大或者曲解这次会晤的意义。

① 1957年8月28日。

② 1957年9月4日。

我欢迎毕晓普在这里再呆几天。

所有这些合作,或者可以说是勾结,是不是应该看作英美之间存在所谓“特殊关系”的证据,我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这种做法挺合适。

尽管华盛顿和伦敦之间有着这样密切和愉快的合作,但是解决问题看来仍然遥遥无期。我通知杜勒斯说,照我的看法,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可能采取的其他办法。9月6日,我再次向内阁详细报告了整个局势。虽然我们不打算承担采取任何公开行动的义务,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建议,就是:由我们出面来鼓励一下与叙利亚接壤的那些一直在抵抗苏联的压力而暂时还没有屈服的國家。

我的閣僚們很理解不要劝阻美國人(現在美國人正是想干到底的時候)這一點的重要性;而且,我想,他們都承認這是重大的關鍵。因為,除非俄國人在中東的影響被遏止,否則,英國和歐洲將只好“逆來順受”(就象閣僚們說的)。只有美國人才能拿出力量來:1)阻止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倒過去,2)冒發生嚴重後果的風險,這指的是俄國對土耳其、伊拉克等國的恫嚇,3)在美國還處於歷史上最強盛的時候,依靠它的空軍對俄國的威脅來防止發生全球性戰爭(在十年或者不到十年的時間內,洲際導彈將改變世界的均勢)。<sup>①</sup>

9月10日,努里·帕夏前來看我。

282 他看起來身體好多了。離職三個月,加上在英國的“治療”,對他的健康很有好處。他對局勢抱的希望不大。不過我們都認為,如果不做點工作的話,這整個地區將逐漸滑入共產主義。他準備回伊拉克去盡力而為。<sup>②</sup>

我本來打算用一周假期到伊士萊鎮約翰·莫里森家去作客,但是,現在我決定放棄自己的計劃。敘利亞周圍的國家變得愈來愈

① 1957年9月6日。

② 1957年9月10日。

愈不安。美国的建议是向它们保证说：它们将在联合国里得到支持，并且将获得充分的财政经济援助；虽然俄国看来不大可能进行干涉，但是一旦它真的干涉，这些国家将可以得到军事上的保护。就我来说，我怀疑给中东国家这样的讯息，是不是等于用空头支票来鼓励它们。我们激励他们去做的，绝不能超过我们打算保护和支援的限度。

我一直是每一个步骤都和外交大臣一块商量的。他这时候刚从南斯拉夫短期访问归来。他向我报告说：南斯拉夫对我们十分友好，但是他们愈来愈担心中东的动乱会引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巨人的冲突。

外交大臣随后又到华盛顿去。他和杜勒斯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达成了一项很好的谅解。现在，怎样帮助那些请求援助的国家，变成主要的问题了。这和对叙利亚施加压力是性质大不相同的事情。对叙利亚，我们是希望它不致倒过去；而现在的问题却是对援助请求作出答复。艾森豪威尔承认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且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可以适用于不论来自内部或外部的颠覆活动。事实上，一年之后，这个主义就是这样运用的。

因此，杜勒斯只限于给有关国家一个讯息，内容不过重申一下“艾森豪威尔主义”。接着，9月9日起开始运送大批武器给约旦，而且故意大事声张，好让公众知道。

俄国人现在也公开干涉了。他们硬说土耳其正在集结军队来反对叙利亚，而且警告土耳其说，俄国也可能在俄土边境集结军队 283 作为回答。布尔加宁——这时他表面上还是俄国的政府首脑——接着又直接要求土耳其不要参与美国对叙利亚的阴谋。对此，土耳其答以强硬的声明，指出自己的备战是纯粹防御性的。

我原先已经把中东情况的发展详细地通知了英联邦各国总理，把可能出现的危险预先告诉他们。现在，我又把进一步的消息

通知他们,使他们充分了解全貌。我的一些老朋友象孟席斯、霍利约克表示全力支持我们,迪芬贝克也发来电报,表示愿意帮助我们,①这些都使我很受鼓舞。新近加入英联邦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所表示的谅解和通情达理的态度,也同样值得感谢。尼赫鲁虽然并不反对我们遏制俄国扩张行动的想法,但是又怀疑叙利亚最近的发展是否确实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他认为那里的情况不过是由于巴格达条约的“包围”而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志。我对这个论点不大以为然,因为在两次大战发生之前,这种说法我早就听够了,不过背景不一样吧了。孟席斯9月19日的复信很说到点子上:

我认为,你能和美国人建立起这样密切的联系,收获实在不小;而且,我完全同意,你给美国人以广泛的道义支持,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因为过去美国人没有足够地谅解和支持我们,我们现在便往后靠不去支持他们,那是完全错误的。你也是这样看法,我感到很高兴。

整个9月里,华盛顿和伦敦之间文电来往几乎没有一天间断,现在一般所称的“应急计划”;也由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专家仔细地进行协调。谁也无法肯定这个危急局势将产生什么后果,因此,必须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华盛顿回来的外交大臣,9月26日前来看我,全面地报告了他和杜勒斯会谈的情况。

我的笔记本里写道: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不过,能够和美国人这样密切、这样充分信任地一道工作,却是很大的安慰。②

这时候,沙特阿拉伯国王从9月25日至27日在大马士革进

---

① 基思·霍利约克从1957年秋天起担任新西兰总理;约翰·G·迪芬贝克在1957年6月就任加拿大总理。

② 1957年9月26日。

行了三天访问,起了一点安定情绪的作用;而叙利亚人则开始驳斥任何说他们国内共产主义影响太大、对土耳其造成威胁的责备。

10月8日,叙利亚政府利用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为借口,向土耳其提出抗议,并且向联合国控告土耳其进行挑衅。大马士革现在笼罩着某种恐慌和歇斯底里的情绪。控诉和反控诉不仅出现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而且出现在美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之间。

在这场神经战中,有一件奇怪的小事情值得提一下。10月13日,盖茨克尔由安奈林·比万陪同,前来通知我说,他收到赫鲁晓夫写给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并且给我读了一小段(但是他们不愿意把全文给我看)。看来,赫鲁晓夫还写了类似的信件给挪威、丹麦、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也许还有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挪威人十分好心,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不愿意让我看的信件,全文送给了我们)。比万补充说,他最近访问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硬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洛伊·亨德森9月间到中东访问的目的是要在叙利亚组织一次政变,计划制造一些怠工和诸如切断油管一类的破坏活动作为借口,然后请求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前来支援。当然,我对盖茨克尔和比万担保说,就我所知,这全是无稽之谈。亨德森的目的并不是在叙利亚组织什么反革命活动,而是去给那些对俄国最近的干涉行动感到害怕的叙利亚邻国提供某些保证。我不能不感到,赫鲁晓夫的手法和希特勒在战前使用的手法有点类似。反对党的领袖们一定还记得,希特勒自己在组织政变时,总是谴责别人对这事任何反应是所谓挑衅。”因此,我们大可以预料苏联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反对伊拉克、约旦,甚至沙特阿拉伯。另一方面,俄国人也可能采取不论是沙皇或者共产党人都惯用的传统办法,在取得一小块阵地以后,便喊暂停,等待作好准备,再采取下一个行动。盖茨克尔没有作任何答话;的确,他看来很难过。但是安奈林·比万(他是我的老朋友)却继续



高谈阔论,甚么都扯。我倒是乐得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的谈话一向挺有风趣,部分也因为我意识到盖茨克尔会因此感到尴尬。

10月16日,叙利亚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告,并且在俄国人的强烈支持下,把所谓“土耳其的威胁”问题提到联合国大会。杜勒斯在答辩时宣布:如果苏联进攻土耳其,美国将不会仅限于“单纯的防御行动”,俄国将不可能保有“特许庇护所”的地位。事情现在好象已经到达危机的顶点。10月10日,正在黎巴嫩进行国事访问的沙特国王准备出面调停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争端。土耳其接受了这个建议;叙利亚是首先表示同意的,但是后来又反脸撤回了。阿拉伯国家现在开始有些动摇了,它们争先恐后地发表声明,表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都提出类似的抗议;但是,它们都感到有些害怕,渴望看到能用某种办法制止俄国人的侵略。

10月29日,经过这几个月的焦急等待,希望终于出现了。赫鲁晓夫在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轻松愉快地承认,中东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威胁,整个事件只是出自误解。两天以后,显然是在俄国人的指使下,叙利亚人从联合国议程中撤回了他们的控告,甚至也不强求建立他们原来建议组织的调查委员会。286 就这样,这整个事情表面上宣告结束。看来,杜勒斯对他的边缘政策的试验感到很满意。

今天,西方世界被迫不但要接受俄国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不断增长的现状,而且要接受俄国人以一支庞大的舰队为后盾完全控制了埃及的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难怪人们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当年还只是开始出现俄国人向东地中海渗透的严重迹象时,华盛顿和伦敦就那样担忧。尽管我们作了一切努力,我们在这个时期里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成就。不过,从1956年秋天到1957年秋天,美国政策的重大改变,尽管发生得稍晚了一些,究竟还是

很有戏剧性的。

阿曼教长的叛乱和俄国人对叙利亚的渗透这两段插曲，占去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阿曼问题的处理，不管怎么说，总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对国外唯一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行动解释清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在叙利亚问题上，杜勒斯每天都发来长篇内容复杂的文电，有一个时期简直是每小时都来电，间或还有总统的来信。所有这些文电都必须及时处理，帮助我的通常是外交大臣，他不在的时候，是外交部的常务次官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爵士。美国人特别喜爱通报情况的文件，而且不论问题主次，凡是想象得到的事情，或者由于这些问题而可能产生的各种紧急情况，都很热心研究，所以，需要大量的电报往来，不时还要用长途电话联系。当然，我并不是对这种做法有什么埋怨；我们终于能够回复到去年美国人采取灾难性态度以前的那种旧有关系，我实在感到高兴。不过，这样做当然使这个夏天和秋天特别地忙碌和紧张，结果，我总共只能给自己短短几天的假期。

在这整个时期中，我得到外交大臣非常得力的帮助；在第一个事件里，国防大臣的工作也很出色。1956年事件的紧张局势，以及苏伊士善后期间存在那样多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当然也使塞尔温·劳埃德有过一些动摇。但是，在所有这些考验中，他既表现了灵活性，又表现了坚决性。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要求他留任新政府的外交大臣，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他不但思路开阔，善于提出各种各样办法来解决复杂而艰巨的难题，而且总是脾气温和，态度友善。总统直接给我函电，甚至杜勒斯这样做，他全都不介意。当然，所有这些我都给他看；而他也认为，总统和国务卿对我表现的这种合作态度，是有旧日的友谊做基础的，而且也有实际的好处。

这两段插曲都有它们考验人的时刻，但是我们从中也得到报

偿。第一个插曲恢复了我们的自信心；第二个插曲则证明在百慕大重申的关于友谊、伙伴关系的誓言是诚心诚意的，经得起考验的。

## 第九章 俄国和核弹

288

我接任首相几天以后,就有人提醒我说,上一年7月布尔加宁和艾登曾经达成一项协议,约定艾登在1957年5月初回访莫斯科。但是,1956年春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到英国来的时候,政治气候还相对地比较明朗,现在却有点阴霾密布,甚至象风暴将临。苏伊士危机时苏联政府所作的恫吓,我们记忆犹新。虽然英国对这种恫吓的真正含义作了正确的估计,但是,它毕竟在我国广大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疑虑和恐惧;特别是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似乎结成了同盟来反对我们,我国人民益发感到我们所处的孤立地位。此外,匈牙利的可怕事件和对1956年11月人民运动的血腥镇压,造成了一股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浪潮,甚至那些平日同情俄国的英国人也受到感染。因此,我采取一个我认为正确的步骤:1月28日我通过我们的大使给布尔加宁送去一封电报,一面提醒他,他和我的前任曾经达成回访的协议,一面建议推迟执行这个协议。

我抱歉地通知你,由于需要处理许多其他事情,我恐怕不能在原定的时间到莫斯科访问。

我希望局势的发展能使这样一次访问既为你们所欢迎,而从全世界角度看也能适合时宜。

布尔加宁以下列词句答复了我:

你1月28日的来电已经收到。我和我的同事们仍然十分重视与英国政治活动家的个人接触,我们认为这是大不列颠和苏联关系中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一看法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即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将有利于我们两个国家,也有利于改善总的国际局势。

不言而喻，我和我的前任安东尼·艾登爵士达成的关于大不列颠首相回访莫斯科的协议仍然有效，我们将欢迎你今年5月到莫斯科来。但是，如果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访问苏联，我们希望你能把你认为更合适的时间通知我们，以便另行商定访问日期。

我确信，在莫斯科与你会晤，将使我们有机会就英苏关系直接有关的各项问题和双方都感兴趣的其他问题有成效地交换意见。

我仍然希望我能够在某一个时候尝试一下改善东西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显然还不是冒这种风险的适宜时机。

4月20日我收到布尔加宁写来的另一封个人署名的信。这是一份冗长得可怕的文件<sup>①</sup>。它从苏联的观点出发，谈到了国际局势紧张的原因，以及发生在中东、近东和世界各地的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事件。信里强调了裁军的必要性和英苏合作在解决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中的重要性。这个文件的篇幅长达一万字左右。

在仔细研究了布尔加宁来信的全文后发现：苏联政府是决心夺回它们在镇压匈牙利的事件中所丧失的道义地位，因此才集中谈论他们形容为“国际上最迫切和最重大的问题……裁军”的问题。他们首先呼吁

290 立即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因为，在目前科学发展情况下，有可能对核试验进行可靠的侦测，所以没有必要作任何复杂的行政安排。苏联政府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该和普遍裁军问题分开，单独加以解决，不以裁军问题的其他方面达成协议为前提。

他接着建议说，如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同意立即禁止核试验，也应该在一个特定的期间内暂停核试验，以便利于谈判一项最终的协议。接着，是一段类似恫吓的话：

---

<sup>①</sup> 《首相与布尔加宁先生书信集》，1957年4月20日至9月2日，敕书第380号（皇家文书局，1958年2月）。

不言而喻，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任何坚持继续试验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府，将担负重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使自己处于与世界多数国家、其中也包括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政府、议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布尔加宁声言他的政府的行动是出自最崇高的动机，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只是“因为，按照我们的信念，政治家们如果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的话，就不应该以人民的命运作赌注”。（但是，俄国人刚刚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试验这一事实却被随意忽略过去。）信件接着又作了一番总的回顾，提到军事集团的危险性，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造成的危险局势，并且认为，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接纳进这个组织，以及美国在世界很多地区建立核武器基地，使这种局势更为严重。

当各国人民日益坚决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正紧张地准备一场原子战争。

然后，信件又对最近英美百慕大会谈上关于在联合王国部署火箭的协议提出批评，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无助于大不列颠的安全。在军备竞赛的气氛中，这样的措施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就我所知，很多英国人是 291 意识到这一点的。

与西方的挑衅行为相反，“苏联政府丝毫不准备走上恐吓的道路”。（人们对捷克事件记忆犹新，而且有鉴于最近对匈牙利的血腥镇压，当然很难按表面价值来接受这种说法。）最后，信件对英国最近关于裁减驻德部队的决定称赞了一番，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威信提高也表示了恭维，然后在结尾几段中又再次提到改善俄英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必要性，指出这个问题虽然在 1955 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谈过多次，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成果。

我把信件的抄本分送给艾森豪威尔、摩勒和阿登纳。由于我

将在三两天内和阿登纳会晤，所以我还给他附去一封短信：

我对这封信的用意何在和如何答复它，还没有一定的主见。我希望下周末我们见面时，能够和你讨论一下这件事。你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不和我们的朋友们密切磋商便径自行事的。我已经把这封信的抄本送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送给摩勒，以征求他们的意见。

完全可以想见，由于俄国人这个文件所谈到的问题范围如此广泛，而且提出的建议又牵涉如此重大，所以盟国之间不得不进行反复的商讨。一直到6月13日，我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答复。而且另外一些迫切的问题也使局势复杂起来。如果按照事情的先后，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按照事件的重要性来排列的话，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德国总理同情和支持我们新的防务计划。我已经安排在5月7日到波恩访问。根据外交大臣报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几天以前会议进行的情况，我意识到我将遇到难关。塞尔温·劳埃德已经把德国人所担心的问题告诉了我。除了核裁军问题以外，他们渴望所谓核保护盾能够强大到足以使德军和比  
292 卢荷等低地国家免受常规武器进攻的蹂躏，而且，他们似乎仍然相信有可能组织一支足以和俄国可能投入战场的军队相匹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防卫力量。

幸亏的是，外交大臣能够和我一道去德国，而且在整个会谈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5月7日下午第一次会面时，正象我所预料的，议题就是防务问题：

阿登纳、豪尔斯坦、[法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国防部长)和豪尔辛格将军；我们方面有我、塞尔温、理查德·鲍威尔爵士。此外，通常数目的大使、外交部顾问，等等。不过房子正好合适，不太大也不太挤，谈话可以比较亲切和坦率。大家都不想作演说。<sup>①</sup>

---

① 1957年5月7日。

会谈一开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人，特别是总理本人，对我们的新政策抱有很大的怀疑。看来他们收到的情报也不真实：

他们的军事思想仍然是以过去的情况为依据——双方都有很多师团兵力，配备常规武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样，英国驻军的“削减”当然使他们恐慌。他们预料从英国裁减驻军到德国新军建立起来这段时期将会很危险。他们对德国军事力量发展这样缓慢表示抱歉，但是无法作出任何解释。<sup>①</sup>

我对他们很坦率，把我们国防白皮书所依据的军事概念告诉了他们，说明我们的观点是：欧洲不能只是依靠常规武器来保护；我们能够希望做到的，最多就是用有人称之为盾牌、另外一些人又称之为铁丝网的力量，争取拖延一段时期，以便在动用最后的防御力量核武器之前，有一个机会进行最高一级谈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从来就反对单纯的核裁军，认为核裁军的同时必须把常规军备裁减到东西方处于合理均势的水平上。德国人好象有点被打动，不过还没有完全被说服。因此，我又利用5月7日总理为我举行正式晚宴的机会，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非常严肃地谈到欧洲最近一百年的历史，谈到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受骗以及我们目前的机会。我开头先提到自从三年前我初次访问波恩以来这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十分迅速，以致我简直无法计算进展究竟有多大。

占领政权的正式结束，只不过是长期以来所取得进展的正式承认。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国的历届政府始终在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上起了带头作用。

西德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完全理解他们心中头等重大的问题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德国不统一就不可能最后解决欧洲问题。当然，当我们谈到欧洲的

---

<sup>①</sup> 1957年5月7日。



统一时，绝不能忘记铁幕那一边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正被迫在他们所厌恶的制度下生活。

我们一直对处在枷锁束缚下的德国人所表现的坚强的反抗精神十分钦佩。很多年以前，伏尔泰曾经对波兰人说：“如果你们不懂得如何避免被俄国人所吞噬，你们至少应该避免被他们消化掉。”我深信东德既不会被消化，也不会被吞噬。

然后，我又坦率地谈到英国的立场，谈到我们作为英联邦领袖的困难处，说明我们的长期传统虽然并不是孤立主义，但是毕竟总是努力避免对外承担太固定的义务。现在，我们的思想中已经出现了某种类似革命的变化。

294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地而且没有经过严重的争论便发生了的。但是，这标志着一种深刻的变革。现在我们是以一种完全新的精神来对待所有的问题，不论是防务问题或者经济合作问题。我们承认，无论在上述哪一个领域内，我们都不能独力行事。联合王国的边界再也不是在英法海峡或者在北海；我们除非作为一个大联盟的成员或伙伴，是没有国防可言的。在防务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当然是，我们必须把大西洋彼岸的大国，即美国和加拿大，包括在我们的联盟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无视文明世界对用某种方式来结束或者限制大量生产毁灭性武器的真实渴望。有的时候，这种真诚的愿望是被利用来作共产主义宣传；有的时候则是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完全善意地提出的要求。

我经常记起这样一段寓言：恶狼答应山羊只要把狗赶走，就和他们做朋友。你我都知道山羊结果是怎样啦。但是我们的很多同胞却闭眼不看这种危险。而且，安排来对付我们的武装力量都使用得很巧妙。值得经常记住的是，俄国人是世界上最精明的棋手。凡是棋迷，不论棋局延长多久都是不在乎的，而且总是想试验一下各种各样开局的方法。

所有这些情况，使得我们更有必要经常进行磋商，以便我们的政策和目的能够协调一致。

那么，欧洲的防务应该以什么原则为依据呢？它必须是双重原则：

为了对付敌人目的在于向欧洲领土渗透和侵蚀而制造的小型冲突或者有限度的小冒险，就必须有足够的常规力量来击退小规模进攻，使敌人不能在避免大风险的前提下取得小成功。

其次，如果这样一种进攻继续扩展，或者它是作为入侵和夺取自由欧洲的全面侵略行动的前奏，那么，就必须有一支配备有足够战术武器的军队来随时采取行动阻击敌人，以等待战略上的全面反攻——这可能只是相隔几个小时或几天的事情。只要俄国人心里相信这种反应必然不可避免，那么，他们冒险进攻我们的可能性便很小。因此，和平既要依靠盾，也要依靠剑。 295

关于欧洲的经济统一，由于我们这时正试图通过扩大欧洲自由贸易区，把共同市场六国也包括进去的办法来促进这种统一，所以我呼吁德国人对我们的建议给予同情的考虑。因为，如果已经分裂的欧洲又陷入一种新的分裂，肯定会是一场悲剧。

据说月亮之所以没有大气层是因为它太小了。我相信，如果欧洲本身再分裂下去，它就小到无法完成历史赋予它的在全世界发展事业中应起的作用。它已经分裂为一个自由欧洲和一个被占领的欧洲。我们已经失去大片领土和大量文明。我们实在经不起再把剩下的东西分割出去。

在结束讲话时，我赞扬了阿登纳的贡献，指出这种贡献将使他置身于国际政治家的前列。

在这样一种宴会上发表这样性质的演说，也许是异乎寻常的。但是，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看来它给了总理和他的主要阁僚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总理的态度缓和多了。我们转入讨论布尔加宁的信以及应该怎样答复好。晚上再次会面时，我们讨论了

欧洲共同市场和建议中的自由贸易区。我本来对这整个问题很担

心,但是德国人完全站在我们一边,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样说的。他们认为,墨西拿六国联盟如果不继之以自由贸易区,那将是一种灾难。<sup>①</sup>

关于公报,没有多大困难就取得一致。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英国大使馆举行晚宴。这一回是阿登纳作了长篇的友好讲话。宴会后,阿登纳和我退到隔壁的房间里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气氛十分友好。总理的情绪也很高,一会儿很严肃,一会儿又很轻松。

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反正在我的政府里至少有四个成员认为由他们来当政府首脑比我强,其中有两位就坐在那边沙发上。”关于德国和魔鬼,他谈了不少。他相信魔鬼确有其人。他说,凡是在希特勒年代生活过的人,没有不相信魔鬼的。他说:“我把我不能对任何德国人说的话告诉你吧:没有人真正体会到纳粹主义给德国人的灵魂造成多么大的毒害,这暂时还没有医治过来。我们重新富裕得太快了;我不想让我们重新强盛得太快。我讨厌军装,这是德国的灾祸。你一定会看到,我们出席会谈的将军们和你们的一样,只穿便服。我预见今后会有很大的危险,因此我才这样渴望欧洲统一,而且(鉴于法国的虚弱),渴望美国也参加进来。”

阿登纳还告诉我说,他被监禁的时候,他的牢房刚好就在纳粹的刑讯室楼上。<sup>②</sup>

5月15日,英国在太平洋的圣诞岛上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虽然它在物质上稍为污染了大气,但是在政治上却澄清了整个气氛。

同日,我收到总统关于我准备给布尔加宁的复信的意见,对我很有帮助。在给总统的感谢电里我说:

既然我们的氢弹已经爆炸了,我们的辩论也就结束了——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这两点都很满意——我必须坐下来准备一封最精采的复信。你的许多意见对我将有很大的帮助。

---

① 1957年5月8日。

② 1957年5月12日。

布尔加宁的来信很虚伪，但是写得很漂亮。它标志着一场狡猾而蛊惑人心的宣传攻势的开始。这封信道貌岸然地假装信奉国际合作这一最崇高的概念，辩解说他们在近东和中东唯一的兴趣便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完全的民族解放和经济进步，掩饰过去这些年来苏联以沙俄帝国主义精神在西方和东方所进行的侵略活动，甚至企图简单地用“并非事实”一句话就勾销他们在匈牙利进行镇压的残暴罪行，只集中谈论裁军的必要性和新的核武器的危险性。英国人民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本来就想忘记过去，抱着幻想展望未来；俄国人正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鼓励他们这样做。 297

现在很难理解那时英国人对核武装的不安情绪竟然那样严重，简直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这种不安情绪已经开始在发展，而且在某些阶层中继续存在了好些年。游行示威队伍和请愿代表团开始一年到头地在追逐着我，这种情况几乎一直继续到我卸任的时候。来自各大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代表团，由于其成员的崇高地位和真诚愿望，我总是十分尊敬地予以接待。但是，碰到一些从事消极抵抗的年轻人躺在我的汽车前面，事情就实在伤脑筋，因为我夫人十分讨厌这种恶作剧。所以一当她给我开汽车的时候，我真怕会出什么事故。幸亏她的意志总是占上风，得以顺利地渡过难关。

很多人确实是由于世界显然面临危险而感到恐惧，对此我是深为同情的。随着岁月的消逝，我们似乎也学会了象维苏威火山山坡的村民一样，跟危险生活在一起；或者，一场核战争必然招致的大规模毁灭，也许倒在某种程度上变成防止这种战争爆发的屏障。直到有那么一批青年男女开始组织一次从阿尔德马斯顿向伦敦的进军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安多么深重和广泛，以及它多么容易被人利用。

这段时期里，英国公众由于对核战争的威胁日益惶恐不安，似

乎已经看不清这样的事实：一旦核弹被有效地“禁止”，而西欧只剩下一支小小的军队来对付苏联的压倒优势的常规部队时，我们将处于怎样一种毫无希望的地位。因此这时我下了决心，只要当前的争论一过去，以及布尔加宁的信件所引起的笔战一结束，时机一旦比较成熟，就必须努力冲破铁幕，至少也要打开一个小缺口；目的298 一方面是为了争取一点真正的缓和，一方面也是为了平息一下国内的舆论。这尽管看起来有点象唐吉珂德式的幻想，还是需要尝试一下。这样的冒险不能毫无准备地仓卒从事。英国自己的核武器一定要经过试验，证明有效，对自己的核力量有了把握，而且我们也必须等待看俄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强与美国的亲密联盟，这种联盟虽然在百慕大已经部分地重建起来，但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必须取得我们的欧洲盟国的赞同，至少也要得到它们的同情。

如果听任反对党利用这种形势，危险是很大的。5月16日关于我们第一次热核爆炸的公报，没有引起反对党领袖的什么特别反应。现在我又需要宣布将在5月30日进行下一次试验。盖茨克尔因为受到刚从国外回来的安奈林·比万的鼓励，对这次试验采取比上次更剧烈的反对方针，简直是要我们马上去上俄国人的圈套。比万的插话情绪激动，甚至有点粗暴。

关于氢弹问题，一阵阵排炮向我射来，盖茨克尔先开始，接着是比万。这是比万头一次这样赤膊上阵。原先我们进行剧烈辩论时，他溜走了。我心里明白，他以为氢弹可以成为社会党的选举王牌，想把这场辩论发展成某种和平口号下的竞选运动。我真怕他也许想对了。<sup>①</sup>

因此，6月5日我给负责我们“舆论”工作的查尔斯·希尔(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一个备忘录：

最近一两天，我考虑了补选和舆论界离开我们的问题。现在流行

<sup>①</sup> 1957年6月4日。

的说法是：这表示中等阶级反对生活费用高涨和害怕房租法案。……

我怀疑……所有这些关于核弹的宣传是否确实流传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深广。这个问题和苏伊士问题加在一起，从我们手里夺走了那些具有模糊的自由主义和非党传统的选民。这部分选民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仍然代表着壁垒森严的两党之间的一块无人地带。

299

比万昨天晚上的插话使我十分震动——它比盖茨克尔的躲躲闪闪明确多了。他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动了不少脑筋。当我们正在下院辩论核弹问题时，他到印度去了，因此，直到现在，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他显然决定猛烈地反对核弹……而且，他比盖茨克尔诡诈；别的不说，盖茨克尔至少还有点……良心上的不安和出自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比较中间的立场。比万本质上与其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激进派，他根本不同情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老式的激进派，要是在五十年前，他一定是个自由工党分子——反教会，反土地所有主，反王权和反军国主义者。我相信，他一定意识到这一切而且认定核弹问题将是斗争的焦点。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具有许多便于鼓动员利用的特点，很容易打动母亲们、未来的母亲们、祖母们以及其他人的心理，而且怎样夸大其词和乱说一通都可以。

接着，我又采取另一个步骤，用心地给一个选区写了一封论据充足的信。这封信在地方报纸和全国性报纸上都发表了，对稳定舆论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我意识到我们在国内外的地位是危险的。在国内，人们正在日益起劲地鼓动反对核弹，集中地要求我们放弃已经计划好的为了成为核大国而绝对必需的一系列试验；在国外，我们这时正受到一次来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面的新打击。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 1954 年曾经建立一个由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法国和加拿大五大国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一直在进行无休止的谈判，3 月 18 日又在伦敦的兰开斯特大厦复会。俄国代表团的团长是瓦连金·佐林；哈罗德·史塔生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裁军事务特别助理”这样一个有点冠冕堂皇的头衔领导

300 着美国代表团。4月间美国和苏联两国的代表团都提出了裁减非核武器的建议，先裁减百分之十，然后再裁减百分之十五。美国随后又提出一个补充的计划，要求把这种裁减掉的武器储存在有国际监督的军需仓库里。与此同时，还就美苏两国分阶段裁减兵员的问题进行着详细的讨论。这些我们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主要是因为美国人似乎是以事先就许多政治问题（包括德国的统一问题）达成协议作为最后签订任何裁军条约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在阿尔及尔时和后来当外交大臣时的经验，我早就懂得“事先”这个用语的重大作用。）

史塔生满怀热情和抱负，急于作出一番戏剧性的伟大事业，这时出了一个大错。本来，英、法和加拿大的代表一直和史塔生密切合作进行工作，但是6月初史塔生事先没有和他们商量就独自提出一个关于核裁军的计划，而且同意会议把它作为美国的建议载入纪录。看来，连国务院本身是否了解或者批准了建议的细节也值得怀疑。他的有些建议确实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有一点，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却可能是致命的错误。核裁军问题本身分为两个问题，即试验问题和裂变物质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西方历来的建议包括：交换最近试验次数的情报，以便核查究竟有多少次试验能从远距离探测到，其次便是预先登记以后要进行的试验。这些我们都能接受，因为并不妨碍我们执行既定的试验计划。但是，在裂变物质问题上，我们的弱点就大得多了。使我们惊奇的是，史塔生的备忘录竟然建议一切大国在近期内结束裂变物质的生产。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断炊”（cut-off）计划。对我们来说，这将是致命的一着。它将迫使我们放弃核雄心。我是6月1日才知道这件事的。

史塔生先生（美国出席裁军小组的代表）提出了一组惊人的建议，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法国人——而且，看来也没有告诉国务院。除

了俄国人之外，他连副本都没有送给任何其他人！这是否就是美国对我们行将成为核大国所作的回答——在我们有足够的裂变物质库存以前 301 把我们出卖了？我的同事中就有人抱这种怀疑。<sup>①</sup>

不管史塔生的动机如何，他把这个文件送给俄国人而连副本也没有给自己的盟国，这种作法本身就很不妥当。

史塔生从美国回来时似乎并没有带什么指示。他一直在犹豫和拖延。因此，在他会见俄国人以前一定收到了一些什么指示。史塔生对莫克<sup>②</sup>说，（不知道是否确实）他原来并没有打算给俄国人什么文件或者备忘录，只是想根据一个文字材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俄国人。所以这个材料本来是非正式的，对美国政府并没有拘束力。但是当他口头给俄国代表读完备忘录以后，对方就要求文字的东西，他也就软弱地给了。<sup>③</sup>

因为这个备忘录是一份将近三十页的打字材料，而且用的是和条约条文相类的官方语言，所以上述解释不能取信于我。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几个大国没有坐到一块拟定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计划，这样，就使裁军小组得以自行其事，没有受到有关政府足够的监督。

在同一些大臣们和有关的主要官员商议后，我给总统去了一封私人电报，总统后来在回忆录里还引述过这封电报<sup>④</sup>。我表示了我的惊讶，认为史塔生采取这个行动显然是自作主张。

无论如何，这是文明世界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也是关乎我们海岛的自由和生存的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彼此在许多问题上一直是自由地交换意见的，所以我本来完全有理由期望你们在提出这些建议之前能够和我们研究一下它们可能造成的后果。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个文件准备交给俄国人而事先竟没有通知我们。如果我试图隐瞒我的这种心情，对你就不够坦率了。

---

① 1957年6月2日。

② 儒尔·莫克是法国裁军谈判代表。

③ 1957年6月3日。

④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为和平而奋斗》，第473页，1966年伦敦。



史塔生的这个行动特别恶劣的是，三天以前他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们全面汇报裁军问题时，竟然丝毫没有透露关于这个新建议的任何情况。我接着向总统说明这个建议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在史塔生所拟定的一整套复杂的建议里，有一点重大的新建议，就是要确定一个在近期内就禁止生产军事用途的裂变物质的日期。这样一个建议将

给我们和我们的欧洲朋友造成一些严重的困难。批评家们一定会挖苦说，到了这些建议规定的过程结束时，两个核大国将保持其原有地位，而联合王国却无从发展它目前正在开始争取的核威力，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则无异签字划押，不论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都永远被剥夺了用核武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

不过，我向总统保证说，我和他一样，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过去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当然，俄国人也可能全盘否定这个计划，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一定会这样做。

他们通常的习惯是，只要文件一到手，就象狗啃骨头一样仔细地咀嚼，不放过任何对他们有利之点。我认为，他们更大可能是对这个计划表示部分的支持。确实，从这个计划里他们可以得到不少好处，特别是因为这个计划大大放松了他们一直最讨厌的监测和监督的规定，使试验很容易就能逃避过去。

在电报的最后一段我提醒他说，我们曾经得到美国政府如下的保证，就是：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联合王国发展它所必需的核武器资源的工作，都不应该受到妨碍”。

6月3日，莫克来看我。他对史塔生的行动和我一样地担心和惊讶；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新的局势已经形成。一旦史塔生的建议公诸于世，而我们又没有提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建议，我们就无法和议会见面。我希望英法能共同拟定一个建议，而且最好是由英法加三国联名提出。正象我6月3日

对我们的裁军谈判代表说的，

我们准备冒一下风险，再等几天，看看史塔生的建议是否真的公布出来。很有可能是由俄国人发表，或者是在星期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上宣布，也可能由史塔生的朋友透露出来。如果确实发表了，那么尽管这个文件不算小组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全世界还是会把它看作美国的建议。那样，我认为我们就不能没有自己的建议。

困难在于，这时候法国没有一个政府。一次严重的危机导致摩勒的政府在5月21日倒台。摩勒是我的忠实的老朋友，我认为应该给他写一封亲笔信表示同情。至少还要经过三个星期才能组成一个政府。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出一个建议，将无法取得法国的支持，只能由英国单独提出，那样俄国人一定会认为西方盟国之间又产生了新的裂痕。

6月6日总统发来回电，用的是这样的词句：

亲爱的哈罗德：

我刚收到你6月3日的来电。你所叙述的情况至少可以说使我很失望。这件事情我们在华盛顿并不知道，也没有经过我们授权。史塔生州长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举行过几次会议来拟定一些我们的盟国会感到满意而我们又可以接受的原则，作为未来可能签订的协议的基础。我们原来预定，这些原则在未与你们、法国政府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裁军的某些可能作出的规定也十分关心）充分商讨以前，不打算作为表明美国立场的建议提交给俄国人。

如果事情并没有按这样的方式进行，而是在我们预定要进行的盟国磋商之前，俄国人便收到一个最低限度属于“非正式的备忘录”的文件的话，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304

请你相信，我一直认为百慕大会议上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是我们两国关系中最可贵的东西，我将尽我最大的力量来维护这种精神，并且按这种精神来行事。在收到你的信件以前，国务院和其他有关部门已经在研究这件事情，考虑可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而且，福斯特今天下

车就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完全晓得，只要苏联人从美国代表团团长手里拿到一纸文件，你们和我们的其他盟国，将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这种情况确实不容易补救，但是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热情问候您，

D. E.

福斯特·杜勒斯也打来了电话，为史塔生的事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他的道歉是比较诚恳的，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史塔生，而且对史塔生的半独立地位感到嫉妒。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该怎么办呢？直到这时候，我还只和少数几位与此特别有关的阁僚——巴特勒、塞尔温·劳埃德、霍姆勋爵和桑兹——商量过。这时埃德温·普洛登爵士<sup>①</sup>和一批专家正巧在美国，所以，我决定等他几天后回来再说。6月12日普洛登向我详细汇报了他访问的情况以及他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海军上将会谈的内容。虽然普洛登的汇报稍为解开了一点史塔生之谜，但是很明显，史塔生的轻率行动给英国造成了很严重的危险。这件事情附带地也使我有必要补充一下原来准备给布尔加宁的复信。俄国人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张牌。

象我完全预料到的，俄国人充分利用了史塔生幼稚的外交行动。他们现在建议暂时停止一切核试验，并且同意对停止试验进行监督。他们一点没有提到裂变物质或者核武器的生产问题。美国人一直是坚持把试验和生产连系在一起考虑的，俄国人这下子使美国人陷入了困境（附带也给我们造成一个政治上的难题，不过，却使我们免于致命的“断炊”）。<sup>②</sup>

现在，我总算给布尔加宁发去了复信。这封信当然是很多人

---

① 埃德温·普洛登爵士是当时的原子能管理局局长。

② 1957年6月15日。

起草的，而我的责任就是保证信件的内容不要有任何足以给我们的主要盟国造成麻烦的地方。不过，在这个前提下，我还是有可能强调我的主要论点，这个论点我在4月初就公开提出了，后来在许多场合里又反复强调过。例如4月3日在谢菲尔德讲演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不管我们多么期望裁军，不管我们将为此多么艰苦地工作，裁军必须是既包括新武器，即我们所称的非常规武器，也包括常规武器。如果我不十分坦率地指出这一点，我就没有尽到我的职责。

任何其他的方针，都会使欧洲和整个自由世界受到苏联权力的摆布。

在6月13日发出的给布尔加宁的回信中，我坚持问题的关键是同时就常规裁军和核裁军问题达成国际协议。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计划，任何协议都没有价值。历史已经证明：禁止使用某种特定武器的一纸协定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一个附有适当监督制度、既包括常规武器又包括核武器的范围更大的协议”。<sup>①</sup>我还补充说，我相信在政治紧张局势获得某种缓和以前，是无法实现任何实质性裁军的。布尔加宁先生抱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侵略性质，这并不是事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于苏联对东欧和中欧的侵略而建立的一个防御性组织。不过，尽管我采取了我认为不得不采取的强硬立场，我还是力图使用比较友好的语调，以便在适当时候可以导致我早有盘算的缓和。我复信的头几句话，就强调了笼罩着我们大家的危险。

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驱除战争的威胁。您我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过程。我们曾经亲眼看到这两次战争的恐怖情形。我们一定都希望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免遭第三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的悲剧。

<sup>①</sup> 《首相与布尔加宁先生书信集》，敕书第380号。

因为俄国人已经把布尔加宁给我的信发表了，所以，我认为我的复信也应该在莫斯科收到以后短时间内让公众看到。英国的报界是谅解的，他们认为这封回信温和而友好。但是复信延误很久，以致又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先是史塔生的建议，然后是佐林的建议。6月14日，佐林正式建议核试验一律推迟两年或三年，在全世界各地、包括俄国领土在内，设立监测哨，由一个国际机构进行监督。

阿登纳总理6月7日写来了一封长信，使情况在某些方面又复杂起来。他在信里主张德国的统一问题必须优先于任何实际的裁军，并且要求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当前的危险。这时候我们技术上的地位还是比较弱的。我们的问题是不要暴露我们的虚弱，而又要获得美国的帮助。“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三个给总统的电报稿，但是一封也没有发出”。<sup>①</sup>

6月18日哈罗德·史塔生和塞尔温·劳埃德应我的邀请来进午餐。

我对史塔生态度很强硬，我想，他也有点震动。不管怎么说，他同意了修改他给俄国人的文本，减少其中使我们为难的地方。关于暂停试验和“断炊”（停产裂变物质）的规定，如果实行得太早，对我们来说就是致命伤。<sup>②</sup>

我这时认为，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向内阁全体作一次详尽的报告。

我给我的同事们念了我和总统的来往文电，想给他们提供全部背景，以及使他们明瞭我们目前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前面是悬崖——暂停核试验，后面是漩涡——裂变物质的“断炊”。<sup>③</sup>

---

① 1957年6月17日。

② 1957年6月18日。

③ 1957年6月24日。

当然,公众并不了解这个“断炊”建议的危险,而那个禁止或者 307  
暂停核试验的计划看来对他们却很有吸引力。

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英联邦总理到达伦敦举行会议(6月26日至7月5日)的前夕,因此,我感到相当恼火,甚至愤怒。但是我又必须对我的美国同行掩饰这种情绪。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于我就他的温和的答复给他的回电,作了以下的记载:“首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解释,一场外交风波平息下去了。”<sup>①</sup>

俄国人关于推迟两年或三年进行核试验的建议当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对它实在不容易作出妥善的答复。但是7月2日,以四大国名义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件事在下院是7月3日宣布的。声明开头表示欢迎苏联承认有必要

建立目的在于监督和侦测核试验,配备有适当科学仪器、装备和设施的监测哨。这是我们四国代表团很久以前就提出并一直坚持的一项必要的条件。<sup>②</sup>

声明接着说,由于苏联接受这个原则,使得有可能考虑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办法,“作为第一阶段裁军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③</sup>这样一个第一阶段的协定应该包括有其他制止增加军备的规定。四大国建议指定一个专家小组着手拟定一个监测计划。几天之后,美国人又提出,我们应该建议有条件地先停止核试验十个月。7月11日,我们宣布英国将支持后面这个建议;法国和加拿大在我们之先已经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俄国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被逐出主席团。

俄国政府轰动一时的变故,使我们很难确定在裁军问题上应该怎 308  
么办。报章上对我们的建议反应相当好,而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加

<sup>①</sup> 艾森豪威尔前书,第473页。

<sup>②③</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7月3日。

拿大是团结的，这一事实也很好。当 F. 史塔生星期一提出这个建议时，俄国代表（佐林）态度十分拘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正在进行宫廷政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已经被贬谪（要是几年以前，他们一定会被枪决；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葛罗米柯的情况（他一直是莫洛托夫的人）还不清楚。布、赫的地位比以前更稳固了——在朱可夫指挥的军队的帮助下。总的说来，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对西方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但是，这更大可能是属于个人争权斗争，而不是政策上的冲突。<sup>①</sup>

我必须承认，我对莫洛托夫的失势颇为惋惜。我一直很怀念我们在维也纳、旧金山和日内瓦的会晤。我对他的才能也由衷地敬重。

7月下旬，布尔加宁又恢复了和我的通信，写来了一封颇为刻薄的信。他巧妙地躲过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而集中谈论俄国人显然认为宣传上最有利和最易收效的问题。俄国人的计划现在非常清楚了。所有大量的欧洲政治问题一律撇到一边。在裁军方面，关于裁减常规军备和非常规武器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苏联政府现在显然只是反复高唱一个主题，就是暂停核试验，而对裁军的所有其他问题或者政治难题的解决，统统不管。这是一个目的想在自由世界里争取最大限度支持的简单而有效的战术。但是，当7月月底下院辩论裁军问题时，我们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维护了我们的立场。

裁军问题的辩论进行得十分顺利。塞尔温·劳埃德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桑兹的发言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比万表现相当好，他的发言颇有政治家风度——因此也就比较枯燥呆板。<sup>②</sup>

这时候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关系，由于叙利亚的危机而变得十

---

① 1957年7月5日。

② 1957年7月26日。

分亲密。因此我很有把握地认定，杜勒斯在没有和我们充分磋商 309  
之前，不会在日内瓦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果然仿照了俄国不  
论是沙皇或共产党人都最拿手的传统做法，在7月中旬派了我的  
一位老朋友朱利叶斯·霍姆斯来监视史塔生州长。霍姆斯过去是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幕僚，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成员。

作为在阿尔及尔盟军总司令部时的老战友，他对我态度友好热情。  
我的印象里，对于和俄国人签订一项协议，他看起来不象史塔生那样有  
信心。<sup>①</sup>

杜勒斯在这个月的月底到达伦敦，公众认为这和裁军谈判有  
关，其实，他来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中东的局势。杜勒斯从来离不  
开空中。他来回飞行于各个危机地点，航程恐怕远达几十万英里。  
这对他的工作究竟有多大好处，倒很难说，可是却因此在美国流传  
了一个讽刺笑话，我是这时候才听说的：“据说，现在人们正在研制  
一种没有杜勒斯也能飞行的飞机，并且希望很快就能投入生  
产。”<sup>②</sup>杜勒斯明确地告诉外交大臣说，他现在想重新适当地控制  
日内瓦的谈判。终于在8月初，史塔生被授权提出一套经过西方  
四大国同意的所谓“一揽子”建议。这套建议包括：一旦就监督制  
度取得一致意见，便开始停止试验一年；如果到了第一年年底监测  
哨能建立起来进行工作，而且俄国人同意对核武器生产建立监督  
制度，便再停止试验一年。与此相联系，这些建议还规定要对常规  
军备作某种程度的裁减，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草拟一个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发射物的计划（这是总统特别热心的主张），最后，还规  
定要划分空中和地面监测区域。这些建议俄国人没有接受，苏联  
代表在8月底作了明确的表示。就在这时候，俄国人宣布试射第 310  
一颗洲际弹道导弹。因此，事情就搁起来了。9月初，裁军小组委

① 1957年7月15日。

② 1957年8月14日。



员会也休会了。

英国至少暂时还保留改进自己核试验的机会。我通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说，我们将在秋天进行另一次试验。正如我所预料的，孟席斯和霍兰两位总理都表现了合作态度。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表示准备以一切方式协助我们在澳大利亚进行试验。

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回答布尔加宁7月20日的来信。这封回信是8月26日写的，信里尽量客气有礼地谈到他那封信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不能不表示：他没有回答我上次给他的复信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使我有失望。

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我注意到你建议欧洲各国和美国应该“共同保证不向任何破坏欧洲和平的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有一个事实也许你忽略了：1954年10月23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政府在联署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1954年10月3日发表的宣言时，已经主动地、单方面地作出了上述保证。西方大国在1955年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提出的条约保证条款纲要的第二条中也承担了类似的不向任何侵略国提供援助的义务。<sup>①</sup>

至于对布尔加宁所宣称的指导苏联对中东事务的政策的原则是力求有助于保障持久和平这一点，我作了如下的回答：

311 我欢迎这点声明，不过我必须坦率地说，苏联政府的行动——特别是最近的行动——却表现了某种相反的情况。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然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通过联合国或其他途径来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和睦。

至于英苏贸易问题，我一方面说明英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安全有必要规定若干限制，一方面又指出可以自由地从联合王国向苏联出口的商品，范围是很广的。要扩大有利于我们双方的贸易，肯

<sup>①</sup> 《首相与布尔加宁先生书信集》，敕书第380号，第25页。

定是有可能的。我欢迎关于“文化交往”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对匈牙利起义的干涉,英国公众感到很大震惊,因此理所当然地对这种交往迟疑却步;不过,我希望政治局势能有所改善,逐渐使我们两国之间人员和情报的自由交换成为可能。我用下面的话结束我的回信:

请你不要以为我们对寻求改善关系的途径不如你们殷切。你是了解的,对英国人民来说,行动胜于言论。我十分高兴我们在贸易和文化往来上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我由衷地相信,只要双方都抱有愿望,对于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是会取得成果的。不过,如果我们真想达成谅解,就必须对这项工作抱有诚意和耐心。有时,与其用隐晦的词句把分歧掩盖起来,不如公开说出来为好。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协议的基础。这就是我在研究你的信件时心里最主要的信念。

虽然报界和公众对这些通信好象很感兴趣,我自己却希望这样的通信不要再继续下去,至少也要暂停一下。直到这时候,我们来往的信件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很自然地彼此并不信任。布尔加宁的长篇书信确实没有什么内容,其中说的大部分是我原来就知道或者根本就不相信的事情。在最近的将来,还难期待共产主义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根本分歧能获得最终的解决。就象俄国的一位伟大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所说的,“只有当调解成为不需要时,才有可能调解”。也许在若干年以后,由于俄国共产主义的演变,由于在西方世界占压倒优势的那种社会经济制度的逐渐发展,两大集团之间的鸿沟得以逐步缩小。回忆起夏天这几个月的各种事件,使我深深感到,无论是交换长篇大论的通信,还是日内瓦裁军小组委员会上几乎无休止的详细争论,都证明不是取得进展的真正途径。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虽然令人失望,毕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现在正考虑用什么方式来进行一次新的努力。显然,不论个人方面或外交方面,都还需要

进行更多的准备工作；同时，既要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也要有耐心。我内心的这些想法暂时还是潜藏着，但并不是完全置诸脑后，无所活动。

尽管俄国人在8月底粗暴地拒绝了西方大国提出的“一揽子”建议，但是整个裁军问题仍然预定秋季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进行辩论。公众十分担心核军备不断增长并担心这种核扩军可能掌握在某些不太负责任的国家手里。但是，即使是左翼舆论也认为俄国人对西方的计划不加考虑便加以拒绝的做法是错误的。10月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一个例证。几个月前还强烈反对英国制造氢弹的安奈林·比万，这时出人意外地发表了一篇热情的演说，为不久以前他谴责过的政策辩护。由于这一转变，他取得了主要工会领袖的支持。在政治这个小小领域内，他的转变之意味深长几乎和圣保罗皈教<sup>①</sup>不相上下，不过细节上不如后者那样充满戏剧性罢了。

《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比万变成贝文”的社论。比万派都对比万很气愤；很多选区里的普通党员一致投票反对他和他的政纲。但是，各个工会（不顾[弗兰克·]卡普斯的努力，他在执行委员会里落选）却一致投票赞成核弹！<sup>②</sup>

虽然我已经意识到舆论的这种变化，我还是希望在联合国里我们不致于连一个比较明确和“建设性”的计划也提不出来。外交大臣这时正在华盛顿与杜勒斯讨论我9月18日就广泛的裁军问题中的一个特定问题所拟的一份备忘录。我建议我们应该作出一

---

<sup>①</sup>宗教传说：圣保罗，原名扫罗，罗马公民，原先迫害基督徒甚烈，后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看见耶稣，就信基督教，成为该教第一个神学家和宣教师，其地位仅次于耶稣。见《新约》“使徒行传”。——译者

<sup>②</sup> 1957年10月4日。

个既切实可行又能吸引人的姿态：

314 首先，我们将保证进行核试验时……一定事先宣布，并向联合国或其他机构登记。第二，我们将保证在以后两年里，不论俄国人同意与否，我们都将单方面地限制自己的核爆炸。第三，我们对核爆炸的限制是指爆炸所造成的总辐射量等不超过一个规定的数字。

塞尔温·劳埃德和杜勒斯详细地讨论了这整个问题。由于他在纽约裁军辩论开始的前夕曾回过伦敦一个短时期，所以我有可能是从他那里得到详细的报告。与此同时，总统发来了一个电报，答应和斯特劳斯海军上将讨论一下我的主张。看起来他对计划颇感兴趣：

我们已经一同按照你所建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把我们的意见集中在一起，拟成一个经过补充的新的“一揽子”建议，也许就能够满足公众的想望。

俄国人在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接着又在11月3日发射了另一颗卫星，这消息在西方引起了复杂的感情。对于第一个消息，英国人出自他们固有的宽容大度，充分地称赞了这项奇妙的技术成就。美国人当然对俄国科学技术进步的这一惊人证据感到震惊。但是，第二次试验因为把一只小狗带到高空，却大大激动了英国人。

俄国人发射了另外一颗比较大的“卫星”（带着一只狗“小杜克”），在美国引起恐慌和沮丧。英国人民则报以他们特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小杜克”，而不是“火箭学”上这种新发展的可怕性质。今天晚上，大批抗议虐待小狗的信件和电报涌进唐宁街十号。<sup>①</sup>

315 10月9日，斯特劳斯海军上将前来伦敦看我，谈话结果，我第二天分别给杜勒斯和总统发了电报。除了我们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有关联合国会议上的策略的小问题以外，我们现在必须面对

<sup>①</sup> 1957年11月5日。

更重大的现实问题。10月10日给杜勒斯的简短电报写道：

俄国最近的政策声明里有一种不祥的自信和凶恶的调子，促使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我们共同防务的想法，我相信他一定会把电报给你看。

同日给总统的长篇电报里，我提出我们应该重新研究一下我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条战线上迎击俄国人挑战的能力如何。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已经十年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规划。自由世界各国应该把它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危险。西方国家只要能一致行动，就不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力量往往比较分散和浪费。美国必须出来领导；只要它带头，其他国家一定会跟上来。

自由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也许在军事上或者科学上，也许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如果这些力量能够指向共同的目的，就一定能办成一些在力量不协调的情况下难以办到的事情。

从英国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想恢复原子领域内的充分合作，就必须争取美国废除（1946年通过的）那个严重妨碍任何共同发展计划的麦克马洪法案。<sup>①</sup>倘若我们不得不在我们的美国朋友早已走过的道路上蹒跚前进，就必然造成金钱和精力的严重浪费。我们英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虽然也能够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尽管我已经决定要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目前我还不准备冒险这样做，暂时还是只一般地提一下为好。

总统立即回了电，对我的主张慷慨地表示欢迎。

如你所知，我长期以来一直坚决主张我们两国要有更密切的联系。316  
我认为，只有当自由世界的各国政府看到它们认为负责领导世界的那些

---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566页。

国家确实具有共同的信念、目的和原则，它们才愿意承担为维护自由制度所不可避免的重担和牺牲。我相信，所有不愿受共产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威胁的国家，都首先认定你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是它们所需要的领导。因此我认为，不仅我们两国的最高级官员要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紧密地站在一起，而且这种谅解和一致精神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扩展到两国人民之中，甚至扩展到我们可能达到的更大的范围。

几天以后我就接到再度到华盛顿去的外交大臣的来电，报告了他和福斯特·杜勒斯一次谈话的内容。他说，艾森豪威尔很希望亲自和我讨论一下所有这些问题，并且问我是不是能够找点什么借口到美国去一趟。使我特别高兴的是，杜勒斯提到，如果准备做点需要国会批准的事情，“手续”要在12月1日以前就开始办理，因此，我们的会谈应该尽早举行。这意思当然就是说，有可能废止麦克马洪法案。果然，几天以后塞尔温·劳埃德便报告说，杜勒斯已经相当肯定地说麦克马洪法案已经过时了。

外交大臣发来了大量电报（他到华盛顿陪伴女王去了）。福斯特·杜勒斯和总统希望我到美国去谈一下，不过最好事情安排得不引人注目，不造成震动。我作了回复，建议下星期二动身。不过我认为，事情这样突然，不管什么“掩护计划”（他们建议以接受学位或者讲学为名）都无法自圆其说。这点我也就实说了。<sup>①</sup>

317 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都完全同意我的决定。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到华盛顿将努力争取废除麦克马洪法案和组织真正的集体防务，而且更广泛的目的是争取比较自然地建立起一套机构，便于两国共同研究由于苏联的威胁而引起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制定一些方案把我们在英联邦、欧洲以至整个自由世界的朋友的力量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我认为应该发一封电报给阿登纳，邀请他在今年晚

---

<sup>①</sup> 1957年10月16日。

一些时候到伦敦来讨论一下整个局势，包括威胁着欧洲稳定的各种财政经济问题。阿登纳虽然完全理解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仍然不大相信我们有能力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阵线来对付俄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的领导软弱”，一方面也因为他对法国政治生活的混乱、政府的短命和不稳定感到担心。阿登纳尽管有着常胜的纪录，但总是有点悲观主义。

到这时候，伦敦和华盛顿的关系已经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一年以前，这种关系曾经到达低潮。不管原因何在，也不管责任在谁，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曾经严重动摇。因此，1956年底双方不仅存在着误解，而且都感到痛苦。1957年3月的百慕大会议在恢复相互信任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双方都不咎既往，不向后看。我记得丘吉尔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对于过去，即使它是无法忘记的也要宽恕。”

英国曾经在5月底决定取消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的特殊限制，开放的项目比对苏贸易要多。甚至这样一个行动，也没有在英美间引起任何新的破裂。塞尔温·劳埃德曾经事先把我们的意图告诉了杜勒斯，因此，总统在5月18日给了我一封电报，反对我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要求我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他的忧虑主要是由于国会的强烈情绪引起的。我在5月21日回复他说：

当然，我一直想和你完全协调一致地行动。但是，和中国做买卖这件事，已经成为我们议会里的麻烦事，情形与你在国会里碰到的几乎一样。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这件事不应该成什么大问题。你说，我们想要的东西，中国人一定会把着键门，一个一个项目地放行。事情很可能是这样，但是，生意人却不是这样考虑的。每一个商号和工厂都相信我们的做法可以扩大它们的销售量；而且，由于我们是靠出口为生的国家，这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对此，总统只作了一个温和的答复，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



在呼吁。我在5月29日的复信里,急于结束这件事情:

我想马上就回答与俄中进行贸易的问题。我十分高兴你能谅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特殊困难。就象你所体会到的,我们两国在这方面的商业利益是不相同的。我们是靠出口为生——而且是只依靠出口,所以我感到我们不能再继续实行对俄贸易和对华贸易之间现存的不同规定。我明天将就这个问题在议会发表一个声明。

我补充说,对俄禁运的项目是相当多的,达二百五十项;对华贸易因此仍然将是限制很严的。照我的看法,大部分国家将会认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步骤,而且事情也一定会证明确实是这样。我还说明,与其让我们的分歧继续存在下去从而毒化我们的关系,不如现在就把它解决了。我们目前还有着许多其他的重大问题需要共同解决。结果,这个使我十分担心的对华贸易问题,并没有被美国的政府或报界闹成什么重大问题,这主要应归功于总统施加了影响。国务院只是发表一个表示“遗憾”的声明。艾森豪威尔在6月3日写来的一封信件里,在最后一段以他一贯的公正态度写道:

虽然美国这里不论政治界或新闻界都对这件事有一些不满的意见,但是,我欣慰地看到,并没有出现本来有可能产生的那种狂热的反对浪潮。

319 因此,我是满怀着希望踏上这另一次旅途的。3月间总统到英国领土百慕大来和我会晤;这一次看来确实应该由我上华盛顿去。本来,在进行这样一种时间肯定比较短暂的会晤之前,最好是就将要讨论的问题事先达成某些协议。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认为还是先到那边听听美国人的建议为好。艾森豪威尔在他的邀请信里,用的词句也和我想的差不多:如果我们有可能会晤,我们就应该能够得出一些总的结论,根据这些结论,我们就可以给我们手下的人一些共同的指示。

同时我也有必要打电报给所有的英联邦国家，把即将举行的会谈以及预计要讨论的问题通知他们。我还安排让德国和法国的政府首脑也一般地了解我希望取得的成果是什么。因为我早就意识到，美英关系变得更密切，可能在我们的欧洲朋友中引起一些怀疑，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正在离开我们很多人都很珍惜的欧洲概念。我当时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如果处理得谨慎和恰当，英美的友谊和英国与欧洲的充分合作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矛盾。而且事实上，英国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所应该作出的贡献，除了与英联邦各国保持联系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美国取得深切的谅解。只有那种嫉妒心很强、目光短浅的人，才会用猜疑的眼光来看待这种传统关系。欧洲舆论界中气度比较宽宏的领袖们，都会欢迎英国对欧洲的强大和繁荣作出这种贡献。

这次会谈的时机，对我来说确实很凑巧，因为整个美国还浸沉在女王来访的欢乐中。女王由菲立普亲王陪同，参加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三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后，刚刚一个星期以前到达华盛顿。我们的大使哈罗德·卡奇亚“告诉我说，女王的访问在这里发生了很大影响，她已经永远把乔治三世埋葬了。”<sup>①</sup>当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时机了，因为不管在官方人士或非官方人士中，我都察觉到一种友好的、甚至是热情的态度。此外，“俄国人成功地发射了卫星，有点类似珍珠港事件。美国人的过分的自信心也被震动了。”<sup>②</sup>

我上午9点15分到达华盛顿，受到福斯特·杜勒斯和外交大臣的欢迎。英联邦各国的大使都到场，另外还有一批显要。

福斯特·杜勒斯很快就开始透露他正在争取实现的主张。他意识到美国不能单独站住脚，更不用说“单独前进”。我用来回答他的是描绘一幅美国和英国携手合作时大有作为的罗曼谛克式的景象……。但是，

①② 1957年10月23日。

我补充说，我们的团结不能为了统治世界，而是为了服务于世界。福斯特说这一点也正是总统内心的想法。问题是怎样去做。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午饭时候。<sup>①</sup>

在休息时间，我们的大使给我清楚地描述了政治局势，看来，目前的形势确实有利于实现我们的希望。

总统第一次受到严厉的抨击。杜勒斯遭受的攻击更厉害。人们说他的政策到处失败。政府人士意识到他们对苏伊士问题的态度是致命的错误，而且必然导致目前苏伊士这种形势。现在的气氛是几乎什么事情，不管是多么革命性的措施，都有可能彼此达成协议。

午宴后，我和杜勒斯进一步会谈，这一次双方都带了五六位“顾问”。

我们接下去谈了所有的问题——不过都是一掠而过。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会谈。外交大臣表现得很出色。不过，杜勒斯显得有点往回缩了。经过考虑，我认为他是因为参加会谈的人比较多，说话也就讲究分寸。我想，他对总统最后将采取什么方针并没有多大把握。<sup>②</sup>

下午7点我们到白宫去。在场的只有我们四个人——总统、杜勒斯、塞尔温·劳埃德和我。

321 晚宴以前主要是喝点酒，闲谈一些往事，诸如此类。总统身体看起来比在百慕大时好多了。他动作轻快，充满信心，似乎对健康比以前更有把握。他说了很多埋怨“政客”们和对他的抨击的话。（对他来说这还是初次经验。在此以前，他一直得到豁免。）<sup>③</sup>

晚宴以后真正的会谈开始了。

我感到杜勒斯很象在试探什么，所以就让他领路，看他准备谈什么。话题相当零碎。总统虽然原则上同意必须充分合作，但是好象并不想讨论实际措施。福斯特则照他自己那套，说话慢吞吞地，咬文嚼字。有一阵子我简直想应该开门见山说点实际事，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这样做。<sup>④</sup>

---

①②③④ 1957年10月23日。

也许是我不太公道了，我竟禁不住想起另外一位政治家对杜勒斯的评论——“他说话很慢，但是这样容易和他的思路合拍。”虽然一切都表现得很友好，但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

看来，我的话比较打动总统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在未来两三年内不能利用我们个人的亲密友情这个有利条件把这些事情办好，那末，我们的后任肯定更无法做到。

我回到大使馆后的确有点精疲力竭，因为我们经过一夜飞行以后马上接着就是一整天活动。我也感到有点沮丧。我渴望这次会谈能办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废除麦克马洪法案，另一件是重新推动西方的合作来反对苏联的侵略和渗透。对此，我们只能定下一个大致的原则，真正实现起来将既需要想象力，也需要耐心。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一般地接触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还根本没有提到。

塞尔温·劳埃德的看法比我乐观，诺尔曼·布鲁克则设法安慰我；但是，因为我心事重重，一夜没睡好。快到天亮时，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这手牌最好干脆让对方去打，我们什么要求也不要提，<sup>322</sup>看他们能给我们些什么。10点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里举行了“全体”会议，这是个陈设讲究、装饰华丽的大套间，大小和式样与我们唐宁街的那套会议室有点相似。“美国人很早就开始工作，因为我们到达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完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sup>①</sup>

我们全体人马都上阵，外交大臣，诺尔曼·布鲁克爵士，理查德·鲍威尔爵士（国防部常务次官），埃德蒙·普洛登爵士，还有外交部的帕特·迪安。美国方面，除了总统和福斯特·杜勒斯以外，陪同他们的有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还有艾伦·杜勒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斯特劳斯海军上将和国务院的道格拉斯·狄龙。两

<sup>①</sup> 1957年10月24日。

位大使约翰·海·惠特尼和哈罗德·卡奇亚爵士也在场。

总统致了简短的开幕词——词句很优美，内容也十分好。他走得很远——比我昨夜所敢期待的还要远。然后是我讲话——稍为“带点感情”，不过我想他们不致于不喜欢。（我没有准备稿子，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想，我的母亲要是能看到我作为英国的首相在美国内阁会议室里向美国总统亲自主持的会议发表演说，她该有多高兴啊！）福斯特接着讲话，讲得很好。然后是塞尔温·劳埃德发言——简短，明确而有力。之后，总统请艾伦·杜勒斯提出他对俄国目前军事实力和未来发展情况的估计。<sup>①</sup>

这时，总统拿出一份显然是由杜勒斯起草、并且经过在我们到达时刚结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要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研究武器协作，由理查德·鲍威尔爵士领导；另一个研究核协作，由普洛登和斯特劳斯负责。大家都同意了，并且通过了一份宣布组成这两个委员会的公报，立即送报界在当晚发表。

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的耳朵——这样迅速的进展，而且是公开宣布。

323 这些完了以后，总统宣布休会。我们大约 11 点半钟离开白宫。<sup>②</sup>

杜勒斯到大使馆来吃午饭。饭后我们又开始会谈。他拿出一份题为“关于共同目标的宣言”的文件草稿。“我大致过了一下目。在一堆冗长的废话里发现第三段上写着废除麦克马洪法案——好大的奖赏！”<sup>③</sup>美国人一旦下了决心，行动确实迅速。我放心多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在原子领域的工作了，不必浪费很大的力量便可以维持我们核大国的地位，不用光靠自己的力量慢吞吞地追赶我们的美国盟友早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不管怎么说，在未来十年里，英国在这个耗费巨大、技术复杂的武器科学发展领域内的问题，算是解决了。道路已经廓清了。午宴后，我上床休息，熟

---

①②③ 1957年10月24日。

睡了将近三个小时。

下午六点，我

在去白宫出席晚宴之前，到杜勒斯家去拜会了半个小时。他说，他现在和塞尔温相处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他还是希望多和我打交道，或者是直接往来，或者通过总统。看来他对这次会谈进行的方式颇为满意。下午7点到了白宫——晚宴前又是喝酒，谈话。仍然是全体会议时的同一套人马。另外又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在两个技术委员会以外）——由诺尔曼·布鲁克和利维·麦钱特负责。<sup>①</sup>快到晚宴时宣言的修改稿准备好了；稍后（宴会以后），两个技术委员会的报告也出来了，还有一个有关两国在所有领域内——政治、经济、宣传、外交政策等等——全面合作的报告。

我这时提出了我们如何避免其他国家、包括英联邦各国和我们的盟国、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猜疑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我们并不是想建立某种英美霸权。相反地，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用最好的方式动员各方面力量，并且和所有与我们具有相同意愿的国家分担任务。我将把我们会谈的情况详细地通知主要的英联邦国家。总统和我都将尽力向法国人和德国人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国家解释我们的目的。 324

接着，是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我们喝了大量的酒。美国人通常在宴会前总是用酒来补偿宴会后的冷饮。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彼此开了很多玩笑，都是关于那个宣言的。我建议题目叫“关于相互依存的宣言”。总统颇喜欢这个主意——但是经过考虑，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叫法有点太戏剧化。很凑巧，他和我都对草案提出了相类似的修改意见。不过所有实质性的东西全保留了下来。<sup>②</sup>

在这以前，我听说美国的顾问里有人对宣言的第三段、就是关于废除麦克马洪法案的那一段，有些不放心。

① 即利文斯通·麦钱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② 1957年10月24日。

但是，我深信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意见。这里顺便提一下，上午的全体会议上，总统说了一句使他手下的人颇为震惊的话。在提到麦克马洪法案时，他把它说成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对此他本人也感到惭愧”。<sup>①</sup>

第二次全体会议定在10月25日上午10点半举行。会议开始不到一会儿就很清楚，总统已经决定遵守他的诺言。宣言作了几处文字修改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常规武器合作和核武器合作的两个协定也通过并签了字。<sup>②</sup>另外，关于我们在海外方面的一些麻烦，总统又亲自对我承诺了一些义务，这些承诺我认为十分可贵。

令人高兴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现任秘书长斯巴克先生这时正巧在华盛顿，他是来安排下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他2点钟到白宫来详细讨论。斯巴克是我尊敬的一位老朋友，他这时候正好在这里，对我们说来实在是最幸运不过了。我们把公  
325 报给他看，并且特别请他注意其中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几段。斯巴克立即同意把12月的会议由外长级改为“政府首脑”级。对这个建议他很热心，特别是听到总统说如果接到邀请将亲自出席，他更为高兴。

在离开美国之前，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总统先生：

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不能不匆匆写几句话来表达对你的感谢。有机会与你和福斯特进行这样平静的非正式谈话，对我来说是十分可贵的。

虽然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彼此都认为很难安排这样一次会晤，可是现在看起来这次会谈并没有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震动。我希望这意味着我们以后将有可能再进行这种非正式的会晤。当然，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召开首脑级会议的计划实现而你又能在会议期间到英国来，我们

① 1957年10月24日。

② 1957年10月25日。宣言全文见本卷附录(三)。

就会有另一次机会来至少作个短暂的谈话。

不过，这并不是我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我想说而又感到难于表达的是最近这几天我——我想还有我的同事——所受到的极大的鼓舞。我们最高一级会谈的整个精神，看来已经一直贯彻到我们的所有同事和助手中去。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但是一想到我们正抱着这样坚强的信心努力在全世界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实在令人高兴。我十分赞赏你所阐述的那种思想，就是：我们两国一起工作，并不是为了统治别人，或者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为了服务于人。

你最真挚的朋友

哈罗德·麦克米伦

我给国务卿也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福斯特：

在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不能不写几行字来感谢你。我深知你的友谊和勇气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们曾经殷切盼望的这次会谈，已经证明十分成功。我感觉到存在着一种全新的思想，虽然我们碰到很多困难和麻烦，看来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正在着手完成一项宏伟的任务，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我们已经找到正确的途径。我和我的所有同事，都对你的智慧和远见怀着真诚的钦佩和感激的心情。如果任何时候对于工作的任何方面有任何你认为对我们有帮助的意见，希望你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出来。

我想当我们回顾这几天时，我们一定会感到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将不但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国，而且更重要的是相当地激动，因为，我们正 326  
在着手进行的确实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有上帝的保佑，我们可以期望我们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些真正牢靠的和富有成果的东西。

你永久的朋友

哈罗德

我把这次会谈的情况通知了英联邦各国的总理，并且把细节告诉了孟席斯和霍利约克。因为我们的核试验是在圣诞岛进行的，所以他们两人特别关心这次会谈。我那小小的工作班子在大



使馆人员的帮助下工作效率非常高,所以,所有必需的电报都在我们离开华盛顿以前就拟好并拍发出去了。在百慕大时,我就已经体会到在这样一种会谈里,不仅首相要能干和忠诚,而且需要有这样一批文官,能够专心致志地高速度完成任务。可是,自那时以来,多少存在着一种任意贬损这个“班子”领导成员的风气;尽管这种无知的做法很流行,凡是亲自了解到这些人员的品德的人,是绝不会赞同的。

我接着便到渥太华去,10月25日黄昏到达。迪芬贝克以他一向的热情好客的态度接待了我们。

在里多大厦下榻……使我十分兴奋。我1919年到过这里。多罗西和我就是1920年初在这里订婚的。我在离开以前给她去了个电报(可惜的是她没有和我一道来)。<sup>①</sup>

第二天,10月26日,

327

上午10点,双方(英国和加拿大)经过挑选的部长和官员举行会谈。我对华盛顿会谈的情况和我们的美国朋友的情绪和目标做了一番“陈列”。迪芬贝克……没有表现任何“嫉妒心情”,而且看来很赞同我从那样高的角度来看待这整个事情。

外交大臣对各种问题解答得很得体。11点30分,外交大臣和我到加拿大内阁会议室会见内阁全体成员,我们就华盛顿、贸易、中东等等问题进行了一般的讨论。会议在中午12点45分结束。<sup>②</sup>

我们渡河到哈尔市的国家俱乐部出席午宴。三十四年前我在政府大厦当副官时,礼拜六晚上经常到这里跳舞。我的老舞伴还有一些人在这儿,都结婚和老成多了。饭桌上大家发表短篇讲话,气氛很欢乐。

在议会复会以前,也就是有机会就华盛顿会谈作详细报告以前,还有两件事情要做。我需要向我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sup>①②</sup> 1957年10月26日。

的同行说明：因为争取废除麦克马洪法案十分重要，所以我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派人到圣诞岛观察即将举行的氢弹试验的要求，不过观察员必须在几天内就到达那里。由于我们事前没有派观察员的准备，所以安排这两个人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我希望加、澳新总理能了解我们不得不把唯一的两个观测点让给美国的原因。除了正式电报以外，我还给孟席斯加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

我希望你将谅解[我们的困难]。上钩的是一条很大的鱼，不过还没有拖上岸。我希望不要出什么问题。

剩下的就是向斯特劳斯海军上将致谢了，因为我实在感激他慷慨的帮助。举行这次会谈是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伦敦见面时他第一个提议的。

正是在你的鼓励下我才写信给总统，并且开始勾划出我们上星期所讨论的宏伟计划。我认为我们的心灵在华盛顿的总汇合之所以能最终采取了这样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应归功于你的关怀和同情。

自那以后，斯特劳斯一直是我的一位亲密而可敬的朋友。

首相在议会开幕式上致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还是 328  
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任务。

按照传统，我必须做长篇演说，把女王训词里所提到的问题，按大致顺序逐一加以发挥。这样往往使演词冗长沉闷——而我的演说尤其如此。<sup>①</sup>

不过，我还是做到了极其详尽地阐述总统和我“关于共同目标的宣言”里所一致同意的目标。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是喜欢“互相依存”的提法，因为这好象比较能够概括今天世界上的生活现实。有的时候人们对美国的真正立场是有所怀疑的。

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可以撇开欧洲，回复到孤立主义或者决定单干。对美国朋友的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我

<sup>①</sup> 1957年11月5日。

们也许羡慕过,但是我们并不嫉妒。在一个联盟里,即使它的成员有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如果他们不是多多少少承担着同等的风险,彼此就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

当然,在未来的若干年月里,美国注定比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地位要优越得多,注定相对地比较安全。但是,应用科学和技术工艺的成就已经多少改变了这种情况。坦白地说,即使象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它的人民现在也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能在没有盟邦的帮助下自力保障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说保障自己所拥护的理想……。美国的这种新情况,对我们大家说来,将有极其深远的意义。①

因此,我们在华盛顿取得了

第一,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自由世界再也经不起它的技术潜力和金钱财富的浪费,而应该寻找某种方法来使我们的力量真正合作起来;第二,总统完全接受他和我称之为互相依存主义的概念,而且,他和我一样地切望赋予这个概念以实际的内容。②

329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并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排他的英美联盟或伙伴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当时正在华盛顿,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所以我现在有可能宣布:12月份的会议将是各国政府首脑——当然也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会议。我承认,在华盛顿达成的各项协议,有两方面的人一直在攻击。这里的孤立主义者硬说我把英国出卖给华盛顿。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害怕这一点。我们所获得的将是我国科学家与技术工作者与美国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核领域内的合作。我们可以作出许多贡献。“在这种合作中,既然别人允许我们参加,我们就不能空着手去参加交换;但是,我认为我们也不会因此而亏损。”③当然,也有来自另外一方面——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的攻击。安奈林·比万没有出席这次辩论,但是,我提到他曾经把华

①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5日。

盛顿会谈形容为“毫无结果”。

他当然不是在帮助这些讨论取得成果……。我发现他10月18日在《论坛报》上写道……“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自己并不真心诚意地相信他对我所说的话，那他一定是个最高级的演员，要不我就是个最轻信的人。”这个二者择一的命题，我觉得有点勉强，因为，更可能的是两个判断都正确。<sup>①</sup>

我不由得对反对党领袖盖茨克尔感到同情，因为他的立场就比较谨慎。

当尊敬的弗莱德在国内时，情形还不错。例如，在布莱克顿，他是个改恶从善的人物。他对核威慑和核弹等等问题，说得很中肯。他已经戒掉从事蛊惑宣传这个恶习——这是种很容易令人陶醉的苦酒，他难得才沾上一滴。既然他已经到国外去，这里的人又故态复萌。<sup>②</sup>

不管怎么说，华盛顿和伦敦之间密切地合作，有一个好处已经显示出来。在纽约，我们的麻烦就不多了，因为联合国大会在11月14日通过一个决议，赞同西方大国原先提出的裁军建议。那个建议既把核裁军与监测制度联系起来，又把它和裁减常规军备联系起来。 33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巴黎会议定在12月中旬举行。我个人寄予很高的期望。

我愈是考虑“互相依存”这个提法（其实这只是从丘吉尔战后的演说内归纳出来的一个概念），我就愈感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2月会议的重要性。它将提供一个样板。主要的问题将是怎样落实措施。<sup>③</sup>

这时候，

最迫切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一个真正完善的议程。德国人对核武器畏缩不前，他们要的是常规军队。法国人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在把阿尔及利亚征服，或者从那里撤退，或者达成妥协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5日。

③ 1957年11月10日。

以前，他们是动弹不得的。斯巴克正按照正确的方针在努力工作，但是实际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比较好，就有可能和俄国人举行另一次会议。但是，暂时还早一些。我相信，我能够使总统接受一个想法，就是：这样的会议应该在我们两人还领导着各自国家的时候举行。<sup>①</sup>

我在日内瓦就考虑过的通过某种形式恢复与俄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的想法，一直没有放弃过。仍然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遗憾的是，阿登纳总理因病取消了对伦敦的访问，由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和豪尔斯坦代替他前来。我们举行了长时间有益的会谈，气氛很好。“但是，我们财政上的虚弱状态和‘驻军维持费’问题的阴影笼罩着一切事情。”<sup>②</sup>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预定的开幕日期以前，我有机会到巴黎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我发现，因为五个星期没有政府，法国人情绪有点紧张。新的总理费里克斯·盖耶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自信。此外，由于最近英国和美国运送了少量武器给突尼斯而引起的不愉快的争端，也使气氛阴郁起来。法国人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们担心现在给已经是个独立国家的突尼斯送去任何武器，都可能被用来支援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最近一届法国政府在倒台以前曾建议举行法突会谈，但是，因为法国长期组织不起政府，所以计划流产了。有一点很明显，如果突尼斯政府从西方得不到武器供应来维持国内安全，就一定会直接地或者通过埃及接受俄国出售的军火。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同意了美国的意见，认为最好还是给突尼斯供应少量武器，同时取得一项谅解，就是突尼斯不再接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武器。事情的前后情况法国政府是知道的。但是我想，我们在法国正处于紧张和不稳定的危急时刻这

---

① 1957年11月11日。

② 1957年12月4日。

样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看来，原来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宁可冒俄国人渗透的风险，也要使法国政府感到温暖。

法国的报刊当然正在把这样一件小事情闹成一个大问题。

出现了各色各样常见的对“忘恩负义的英国佬”的非难。我们和美国人被谴责为 1) 企图控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 把法国人从撒哈拉沙漠的石油开采业排挤出来；3) 不让法国成为一个核大国，等等，等等。但是我想，巴黎会议虽然开始时可能相当棘手，但总是能开好的。我挺喜欢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总理(盖耶)，我觉得他是个很有魄力、处事果断的人。<sup>①</sup>

当时我对法国的确实情况还不完全了解。政府的不断更迭，第四共和国的日趋虚弱，已经造成一种“恐惧和失望”的情绪。甚至未来的政制如何，也似乎难以确定。实际上戴高乐在六个月以后就重新掌权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举行前夕，情况已经有些改善；各国政府首脑的抵达巴黎，也引起了法国人对联盟的新的兴趣。不管怎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来和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友们协调一致地工作。

332

这个月的月初，由《每日镜报》带头掀起的一场关于驻英美国轰炸机携带有氢弹的慌乱，突然在英国发展起来。公众误以为美国轰炸机经常装载着没有任何防止偶然爆炸的安全装置的氢弹飞遍英国。

所有亲俄分子，所有的和平主义者和所有的感伤主义者(被一些聪明的政客煽动起来的)，都试图把这件事扩大成某种“一触即发”的战斗。<sup>②</sup>

但是报界责任心比较强的人还是认为我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这场风波，就象许多其他风波一样，似乎自己慢慢就平息下去。我感到有趣的是，布尔加宁在他的下一封信(12

<sup>①②</sup> 1957年12月1日。

月11日发来)里竟然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事件。

在动身去巴黎之前，我们必须就一系列新的核试验问题和圣诞岛未来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

我们从美国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如果麦克马洪法案被废除的话)，这一点还只是可能性而已。我们和美国政府的谈判所以取得这样迅速的进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是一个有核国家。我认为如果现在停止试验就等于快到终点时的“冲刺”。大臣们都同意我的意见。<sup>①</sup>

因此，我们一致决定继续执行1958年的核试验计划，并且按原状维持圣诞岛基地。

这时候，我接待了另外两位访客。英美联盟的一位真诚而忠实的朋友雷尼·马萨格里12月4日前来看我。

他对法国很悲观。他认为突尼斯武器事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而且还只是一个信号。法国已经回到一种自我批判和颓唐绝望的状态，表现为谁都对它感到厌倦(就象我在戴高乐时代所深切了解的情况一样)。<sup>②</sup>

12月12日，丘吉尔前来吃午饭。我们单独在一起。虽然我们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但是他似乎非常沉默。

333 他记忆力仍然非常好，特别是对他早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谈到他所忠实的父亲。<sup>③</sup>

11月25日全世界都听到了艾森豪威尔患病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的病正式名称叫“大脑闭锁症”，这个有点含糊的说法我们理解就是轻度中风。开始我还担心他不可能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这将是一个真正的灾难，因为很多事情要依

---

① 1957年12月6日。

② 1957年12月4日。

③ 1957年12月12日。

靠他亲自领导和他的个人威信。所以，当我收到他 12 月 4 日用欢快的语调写亲的一封亲笔信时，实在高兴得很。

敬爱的哈罗德：

我十天前的急病，已明显地有了迅速而稳定的恢复。最初的症候很轻，所以大夫没有把它列为“中风”。不过我确实曾经明显地有过“言语错乱”，而且部分地失去单只属于语言方面的记忆力。

身体的其他方面，倒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当天就有些恢复了。当我说话还比较慢，而且偶然有几个字发音错了，我就肯定，大夫对我的完全康复是十分乐观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打算参加月中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可能我将设法避免作长篇的公开演说，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没有必要削减我的其他正常活动。……

我相信第一次会议将在星期一中午举行。为了使我在横渡大西洋的旅行后有一个必要的休息时间，我准备在星期六中午左右到达巴黎。我不但可以利用这段空隙稍事休息和作些补充指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想到欧洲盟军总部去作一次短时间的访问，目的只是想看看我原来的司令部所在地的新面貌。再一次到那个地方去一定很有意思。

盼望着在巴黎和你见面。热烈问候你。

你永久的朋友

艾克

我 12 月 14 日一早就到达巴黎，在大使馆下榻。塞尔温·劳 334  
埃德和邓肯·桑兹与我同行。

福斯特·杜勒斯 11 点半到达，前来和我们一块吃午饭。他对这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看法似乎相当模糊，而且怀疑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这样“大吹大擂”。看来，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联欢会”。我们将接受美国的核火箭，给自己庆贺一番，再向山姆大叔欢呼几句，然后就完事回家。<sup>①</sup>

---

<sup>①</sup> 1957 年 12 月 14 日。



这次会议也可能收不到我们原先在华盛顿所预期的效果，这点我同意。一定会有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表现出犹豫、怀疑和软弱。在大家一致通过的公报里，这些都会有所反映。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只看作一场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就不应该泄气。说真的，我觉得杜勒斯主要担心的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健康。

总统准时在12月14日下午到达，“受到巴黎人民的盛大欢迎。他在敞篷汽车里站起来，向人群挥动双臂。他的风度使群众一片欢腾。”<sup>①</sup>当天晚上，

盖耶到大使馆来参加一次小型晚宴。他比我几个星期前到巴黎时好打交道得多了。我们就会议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亲密的谈话，并且一致同意应该认真地对待这次会议。我们不但要讨论军事问题，而且要讨论政治问题。这位法国总理对阿尔及利亚比以前热心多了（也温和多了）。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因为行政组织法已经在国民议会通过了。他希望本周内能通过预算——他将使这次表决成为一次信任投票。在那以后，除非外汇问题发生太大的困难，否则他就有几个月比较安稳的日子。<sup>②</sup>

12月15日星期天，阿登纳前来看我，我们单独进行了一次融洽的谈话。那个长期存在的“驻军维持费”问题，德国人总是答应做点事，但是没有什么实际表现。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我们的谈话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不过，我认为总理的情绪相当复杂。

335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的问题上，德国人是有保留的。他们不希望在西德部署中程导弹，但是又不想公开说出来，只是表示希望作出有军事上依据的决定，这实际上就是认为西德并不是适宜的驻地。我说，我认为如果这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决定的话，就应该有一点代价。俄国人作什么让步呢？

虽然总理的龙钟老态使我吃惊，但是看来，在任何意义上说，

---

①② 1957年12月15日。

他都仍然是他的政府和德意志的主人。不过，他似乎对未来很担心。

他很愿意看到西德与西方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其他途径。这就是他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欧洲军、六国共同市场计划、自由贸易区，总而言之，对一切可以使德国置身于文明国家行列的计划这样热心的缘故。但是，他深知他的人民（自从俾士麦以来）如何向往东方的梦境。他担心他死了以后，他的人民将会上钩——统一的、但却是中立的德国。有些人将是出自真诚的爱国主义而接受它——想求得统一。另外一些人却是向往中立主义的利益——想在两方面的斗争中坐收渔人之利。另外还有一些人只是对这一切斗争感到厌倦。所有这些想法，阿登纳都放在心里，没有多说——特别是对他的同事们。<sup>①</sup>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去拜望我的老朋友。我发现总统

正坐在美国大使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他看见我来很高兴。我们作了将近一小时的私人谈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叫做私人谈话的话：通向走廊的几扇大摺门大敞着，楼道里又有警察、保安人员、哈格蒂（新闻界）和其他人等来回巡游。不过总统好象不大理会他们，所以，我也决定听其自然。<sup>②</sup>

他告诉我好些他的病情。他说，他下了决心要到巴黎来。如果医生禁止，他就马上辞职。当然，杜勒斯表现出不安和悲观的原因就在这里。 336

然后，总统

谈到法国。他很想帮助他们，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好斗，所以很难办。我说，我认为他们比几个星期以前缓和多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们一直拥有的巨大实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需要他们起的重大作用。<sup>③</sup>

① 1957年12月15日。

②③ 1957年12月16日。

会议在中午正式开幕。正式讲话的是我的一位尊敬的老朋友，卢森堡的约瑟夫·贝克，还有秘书长斯巴克。总统也致了正式欢迎词。然后是午宴——一项重要而又占时间很长的活动项目。公开的全体会议在3点半开始。艾森豪威尔讲话，没有发生明显的困难，不过，他把下半部分的讲稿交给杜勒斯替他念。各人都作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例行讲话。整个说来，调子是好的；但是看来对会议应该怎样进行，谁也没有什么主意。因此在我的同行都发言以后，

我根据别人发言时我作的笔记，再加上事前准备好的一些段落，做了一个象下院辩论总结那样的发言。这样讲法，效果很惊人。大家都仔细地听，而且因为不象念现成讲稿那样单调，大家似乎都很欢迎。<sup>①</sup>

看来，在这样一种集会上，这种做法是很不寻常的。

我用以下的话结束我的发言：我想提两个实际的建议来代替结论——而且，我补充说，我手头本来有一个现成的漂亮的结论。第一，我们应该拟定一个议程——政治的和军事的——一个在星期二讨论，一个在星期三讨论。每天上午由外交部长讨论，下午或晚上由政府首脑讨论。第二，建议我们在这里逗留到星期四——如果我们到时能通过一个公报的话。<sup>②</sup>

这两个建议被一致通过了。我们希望这次会议作出的实际决定，主要是关于在联盟的各个西方国家部署美国中程导弹。当时337洲际弹道导弹还不是很完善，因此把主要的核威慑力量短射程防御性武器部署在前沿地带，是十分重要的。为了缓和一下这个决定的影响和使它更适合各国议会的口味，我们还主张向苏联政府提议召开另一次外长会议来“打破僵局”。这个计划12月17日星期二上午在外长会议上提出以后，当天下午又在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美国人不大喜欢这个计划，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

---

<sup>①②</sup> 1957年12月16日。

我在幕后和杜勒斯谈过这个计划。他表现得很通情达理。我告诉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盟国接受核武器的话，这个计划是很必要的。<sup>①</sup>

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巴特勒，并且补充说，这个观点已经得到法国人的支持，然后是加拿大人，最后，美国人也接受了。

第二天，12月18日，会议照同样的程序进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们在上午以及下午的上半段时间开会，政府首脑们到5点钟才开会。

一切都进行得很令人满意。斯堪的纳维亚人表现得相当好。他们同意联盟应该用火箭武装起来，但是他们不想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火箭。

德国人很不愿意承担义务。他们不大参加讨论。他们一直在观察事态进展如何。公报的起草将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争取到成立一个官员小组委员会来负责拟定草案。由于诺尔曼·布鲁克是小组成员之一，所以我挺有信心。<sup>②</sup>

在此同时，我也有必要对尼赫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的取消核试验的呼吁作出某种回答。不论我或者殖民地事务大臣，都不想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来搞外交。但是我想，最好还是给新德里一封安抚性的电报，提醒他这个问题在夏天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早已讨论过，当时英国已经把自己的立场说得很清楚。我还说，我十分盼望我不久到印度访问时能够和他讨论一下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12月19日上午11时，举行了全体大会，下午1点15分公报通过了。这时，我们松了一大口气彼此分手了，就象学期结束时的小学生一样。虽然为了取得协议公报不得不使用四平八稳的词

① 1957年12月17日。

② 1957年12月18日。

句，但是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比那些怀疑论者所理解的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结果就能符合于“相互依存”主义，当然使我很满意。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私下庆幸，如果没有我们提出实际建议，整个议事程序就难免要中断。

我们已经使美国对欧洲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形势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我们已经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放弃他们那自鸣清高的道德高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国家，不论原来赞成火箭与否，现在已经没有分歧——至少在伦理道德方面是如此。而且我想，对于最高司令部可能选定的火箭基地，实际上也不会有多大反对意见。<sup>①</sup>

在一些牵涉更广的问题上，

我们正着手使欧洲人摆脱他们的“马奇诺防线”变态心理，开始注意他们的两翼。苏伊士事件——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术上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被人们从战略上加以辩护的。<sup>②</sup>

此外，不论美国人或欧洲人，都充分意识到正处在新的危险威胁下的中东和近东的重要性。他们令人可喜地承认俄国的经济渗透和政治颠覆是比军事侵略还要严重的危险。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华盛顿会谈所引起的猜疑已经冰释。毫无疑问，在公报的表面上不大激动人心的词句背后，存在着一种对新的目标和实际措施的真正谅解。因此，我感到满意。“总的说来，这次会议是成功的。美国和法国的新闻界(昨天和我见面的那些人)对英国的领导表示了慷慨的赞许。”<sup>③</sup>

12月20日，下院举行了有关最近巴黎部长级会议的辩论。外交大臣和我在议会党团领袖的同意下，决定正式动议辩论休会。反对党看来是希望下院进行表决。休会动议的好处就是不致迫使反对党出来投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体伙伴一致通过了的决

---

①②③ 1957年12月19日。

定。虽然我们本来很容易拟定一个提案要求批准公报所列举的各项决定，但是我不愿意迫使工党采取明显的反对欧洲生存所依赖的防务体系的立场。

果然，幸亏我原先说服了美国人同意在公报里写上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进一步直接谈判这一条。只要俄国人拒绝我们的两个条件，即建立监测和监督制度以及同时裁减常规和非常规军备，裁军的前景看来就相当渺茫。英国的公众舆论对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十分担心。刮起了一阵反对在英国部署导弹的浪潮，所有的失败主义者都巧妙地加以利用。除了原来害怕轰炸机装载核弹以外，现在又加上害怕配备有导弹的地方会成为苏联袭击的目标。此外，我们有少数极右翼的议员，没有忘记1956年的事情，气还没有消。他们看来很不愿意伦敦与华盛顿和解；他们甚至主张导弹基地应该单独由我们来控制。

辩论在上午11点钟外交大臣讲话后开始。他的演说没有达到他的最高水平。不过，考虑到最近这些天里他忙于大量其他的工作，而且 340 准备的时间很短，这样的发言就算可以了。反正，他没出什么错，而且对俄国人采取了强硬的方针。比万接着发言，内容杂乱无章，间或有一点漂亮的句子——目的主要是尽量捣乱，同时又企图把反对党内有着根本分歧的各派团结起来；其中，有的是亲俄分子，有的是失败主义者，有的则自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贝文传统的忠实拥护者。乔治·布朗（他属于最后一派）尽其所能作了总结发言。我觉得他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sup>①</sup>

欣韦尔的发言最好。这是一篇很漂亮的演说，诚恳大胆，讲得又动听。在总结辩论时，我只是摆了几点显而易见但是又很有力的论据。比万曾经严词责备外交大臣只根据共产党的声明来描绘共产党的野心。在回答这一点时我指出：

---

<sup>①</sup> 1957年12月20日。

我认为,如果认为凡是说的和写的东西全都没有什么意义,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记得过去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希特勒先生写过一本很长而且很枯燥的书,很少人读过它;但是,如果当初我们读了这本书就好多了,因为他在书里说准备干的事情,后来果然都干了。<sup>①</sup>

确实,情况已经变化了;但是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美国提供了强大的军备。俄国人害怕的正是这些。

我把我们的立场总结成下面几句话:

因此,我们的政策确实是两方面的,而且,我认为它实质上又是很简单的。这就是,从军事观点说,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又随时准备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谈判,以求得一些切实可行的结果。<sup>②</sup>

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可以管它叫做“武器和谈判”。

341 我们的表决结果并不好(三十九票多数),有的人请病假(对方没有),有的人故意弃权(欣琴布鲁克勋爵和苏伊士集团的余党)。总的说来,费了很大力气,结果却使人扫兴。我(在巴黎)原来以为我们干得挺不错,可是回到国内却遭到冷遇!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实在令人丧气!<sup>③</sup>

接下去的两天,有的报纸大规模地鼓吹失败主义。

《每日快报》和《先驱报》、《纪事报》一道参加了这场宴猎狂欢。人们说我已经脱离了公众舆论,因为我还没有动身到莫斯科去探望赫鲁晓夫。所有这些都纯属张伯伦主义。雨伞<sup>④</sup>象大雨一样,倾盆而下。<sup>⑤</sup>

我的注意力需要转到另外很多难题上。同时,对这一年的外交努力,总起来说我还是满意的。月初,我所看到的是我们与美国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2月20日。

③ 1957年12月20日。

④ 张伯伦出门必带雨伞,因此雨伞成为他的象征,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⑤ 1957年12月21日。

的友谊破裂了，欧洲联盟几乎崩溃了，英联邦的许多地区弥漫着不满情绪和不稳定现象。现在，虽然还存在一些大问题，但是英联邦各国的领袖看来比较安心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巴黎会议，标志着西方世界的重建，而且表明西方世界决心用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方法来维护自由。我和阿登纳总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法国政府虽然经常更迭，而且受到多方面的压力，但是对我们还是采取合作的态度。因此，虽然还存在一些误解，旧日的联盟仍然很牢固。我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间，建立了一种以绝对坦率的态度为基础的密切的经常性通信联系。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任期内，而且事实上是到他逝世时为止，我们一直维持着这样的联系。



## 第十一章 钱和人

1957年1月4日，也就是我接任首相几天以前，当我对等待着我的命运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给内阁送了一份关于年初经济状况的备忘录。开始的几段谈的是当前的形势。苏伊士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次失败象蒙斯和敦刻尔克的撤退一样，变成一次战略胜利的前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现实处境，我们的国内外政策必须建立在我们实际财力的基础上。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通过刺激投资和生产以及增加出口来增强我们的财力。在海外，我们必须把力量用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然后，我对我们的形势作了概括的分析，提法就是近来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我们动用储备来应付苏伊士危机的做法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月复一月地使用它来维护那由于人们怀疑我们的财政金融能力而受到威胁的英镑汇率，因此，我们必须重建储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付新承担的义务，包括追加在希望取得英镑平衡的一些国家里的石油发展计划的费用。我们仍然起着世界银行家的作用。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争取每年国际收支的平均盈余达到三亿至三亿五千万英镑，而不是我们在1956年所能期望的最高额五千万英镑。因此，在考虑今年预算时，重要的是要避免“通货膨胀措施”。但是，预估数字却表明“线下”的亏损在继续增加，而“线上”的盈余却减少了。这个差额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用储蓄来弥补。目前，由于采取了新的措施，储蓄的情况一直很好。税收已经太高，以致妨碍了企业的发展和窒息了经营和储蓄的欲望（或者说，我们当时觉得是这样）。因此，必须争取对“线上”开支作某些节

约,不管这种做法怎样不受欢迎。至于“线下”的开支,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基本工业力量和生产率,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正受到来自欧洲,来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英联邦,来自苏联集团和来自美国的愈来愈严重的挑战,尤其需要这样做。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加公共的和私人的投资。但是,我们必须集中发展一些最有经济价值的工程项目,减少或者完全放弃那些效果很小的项目。在这方面需要着重努力的是:使基本建设投资额巨大的国有化工业能够尽量多依靠本身利润来投资。

在离开财政部以前,我又传阅了一份文件,就可以节约的一些开支项目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往常一样,大臣们对涉及自己部门的节约,总是表示反对;另外,有些人认为国防开支再事缩减就难以推行任何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所以也不赞成。

在其后的商讨中进行争论时,各种可能的补救办法都考虑到了。贬值;紧缩通货;冻结工资,或者至少为工资的增加规定一个低定额;以及,共同努力提高生产率,办法是缓和一下由于转业受技术上限制而造成的就业过剩现象和充分利用现有机器。人们开始对我们这个福利国家无限制地拨款维持现存的福利制度的能力表示怀疑,因为现行制度中捐款所占比例不大,而福利却不断增高。国民保险基金正在出现亏损,在保健卫生方面很快就需要有另外的更大笔的捐款来支持。增加在学儿童午餐和福利牛奶的收费额也可以达到节约的目的。

与此同时,除了已经宣布的铁路现代化计划的费用,其他国有化工业部门对资金的需求也开始惊人地提高。但是,如果我们对增加工资的要求一律采取过分僵硬的态度,将可能引起一系列罢工,给我国整个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

幸运的是,英镑所受的压力不久就开始缓和。新任的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已经有可能建议把银行利率从五点五厘降

低为五厘。

虽然石油供应削减了，工业发展仍然很顺利。昨天因为市场情况好转，以及银行大量进款——最近几周就有二亿英镑——我们把银行利率降低零点五厘。<sup>①</sup>

与此同时，

我们争取到内阁同意在民用预算数字中削减大约一千五百万英镑，提高“保健印花税率”增加的收入(估计)可达三千四百万英镑，使保健计划重新具有某种保险性质。<sup>②</sup>

这时候，我对新的防务计划早晚将得到内阁同事们的赞同十分有信心。但是，为了使读者对我在设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的同时所遇到的其他种种重大麻烦事情有个印象，我把当天的一段日记摘引一下：

各种各样其他的麻烦事都一涌而来——以色列与埃及，还有参议员卡博特·洛奇在联合国的荒谬行为(显然是几乎不受国务院的控制)。然后，又是运河。然后，又是石油……总而言之是问题一大堆。不过，大臣们都工作得很好，私人秘书处又给了我出色的帮助。我的新职务特别使人高兴的事是每周的觐见，通常是在星期二晚上。女王不仅风度优雅，而且对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地熟悉。比较不那么愉快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来访和来信。我试着想跟他谈宗教，但是他……总是把话题转到政治上来。<sup>③</sup>

2月19日财政大臣向下院报告了政府的节约情况，除了国民保健印花税从十个便士增加到一先令八便士外，还包括福利牛奶的价格提高到每一品脱四便士，学童午餐的价格从十便士提高到一先令。总节约额将是五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反对党的回答是要求解散议会，但是最后还是达成妥协，把不信任投票搁置起来。内  
345 阁的态度很坚决，除了其他措施之外，决定不顾必定会引起的不

①②③ 1957年2月8日。

满,继续提出房租法案,准备在下一年度解除对很多种房屋的租金限制,允许大幅度提高受限制的租金。

这时正面临着一场机器业严重罢工的威胁。劳工大臣麦克劳德以高度技巧处理了这次罢工。

这场可笑而又……扩及面很广的罢工,开始于布里格公司,扩大到福特公司,而且早晚可能会扩及半个机器业,但是,由于他的努力,看来已经平息了,至少暂时是制止了。如果这证明强硬的解决办法能够收效,它一定会大大提高政府的声誉。<sup>①</sup>

补选结果继续对我们不利,先是北路维森,然后是威尼兹伯雷。前一个地方的补选,我们失去一个保守党席位;后一个地方,工党原来的多数大大地增加了。不过,党在议会的力量还相当稳定,所以3月中进行的不信任投票,很轻易就否决掉了。博伊德-卡彭特用一篇出色的演说对辩论作了答辩。甚至《经济学家》杂志也禁不住出来喝采。我发现桑尼克罗夫特是一个很难得的搭档,立场坚定,办法又多。即使是那个通常分歧最大,需要在各部大臣间长期来回磋商的农产品价格补贴问题,也终于妥善地达成协议。

我决心不顾牛奶问题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这件事在技术上是错误的),争取能达成一个“一致方案”。但是我们碰到的其他困难实在太多了,所以在议会和全国我们都必须维持住一些朋友关系,必须使党在农业界保有牢固的基础。实际上,一千四百万镑这个数字(包括那几乎是可笑的牛奶增价0.25便士在内)也将被认为是一个强硬而不是软弱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连一百万英镑这样小的数目也争取不到一致协议,是很难令人理解的。<sup>②</sup>

在整个过程中,财政大臣表现十分坚决,又具有谅解精神。

我想他确实认为这个决定从政治大局上说是正确的。但是;由内

---

① 1957年2月25日。

② 1957年3月14日。

阁经过三次充分讨论后再集体地作出决定,对作为财政大臣的他是有好处的。①

346 3月份的工业形势实在暗淡。3月5日造船业雇主宣布他们将不提高工资,一场既包括这个行业、又包括机器业的罢工看来无法避免了。铁路业现在也参加进来了。因为我这时正准备动身到百慕大去,所以当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期。

看来,造船工会接受调停建议的希望不大。今天上午他们准备到劳工部去。但这显然是一场“神经战”。工会感到有把握的是:女王陛下政府一定会照以往的做法,在最后一分钟对雇主施加压力。老实说,我们现在正在为丘吉尔——蒙克顿政府的做法——劳工姑息政策和不断的通货膨胀付出代价。②

发电业也很有可能参加进来,很容易就会发展成类似总罢工那样的情况。3月15日下午我研究了所有的应急计划,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

应急组织的工作进行得不错;地区组织也重新活跃起来;我们有相当充足的军队(士兵、飞行员和水兵),不需要从德国调回任何军队。但是,这将是一场可怕的斗争。③

造船业罢工从3月15日开始。我动身去会晤总统之前,在3月19日与一些雇主领导人物进行了一次私人商谈,英国雇主联合会的科林·安德森爵士给我们帮助最大。大家普遍同意,我们应该设法按一个合理的数字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增加工资来解决铁路问题。大家向布赖恩·罗伯逊爵士保证说:

如果他这样做,大家不会认为他是背叛了私营企业的立场;相反地,这是尽快摆脱目前困境所必需的做法。④

同日,机器业各工会宣布罢工。象我前面已经说到的,在整个

---

① 1957年3月14日。

②③ 1957年3月15日。

④ 1957年3月19日。

百慕大会议过程中,巴特勒和我之间电报往返川流不息。最后,铁路工人按百分之五解决,到4月2日,造船业和机器业的罢工也平息了。“这太好了。又越过另外一个障碍——而且没作任何让步。”<sup>①</sup>

这些复杂的智斗,对我来说,还是新鲜而烦恼的经历。此外,<sup>347</sup>工业的形势仍在使人担心。

虽然人们非常顺利地回去工作了,但是在工业界里却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情绪。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情绪,是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煽动起来的。<sup>②</sup>

我和麦克劳德长时间地讨论了怎样克服这种情绪。我对说服职工大会敦促推迟增资要求或同意强制调停,是不抱多大希望的。正如我给麦克劳德的信里说的,看来

比较有希望的是在提高生产率的斗争中取得他们的合作;因为,生产率愈高,增加工资的要求愈少加以反对的理由。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既是保护性又是建设性的行动方针,就是:重新开展一次订立新的劳资宪章的运动,其中要规定如果要辞退工人,必须在一个月以前便通知他本人。

如果说这些问题中很多还没有得到解决,显得很迫切,那么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却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到桑尼克罗夫特提出他的第一个预算的时候,形势明显在改善;所以,他在财政部顾问的完全赞同下,已经可以提出一整套令人高兴的甚至是鼓舞人心的建议,内容是降低税收达一亿英镑,或者说全年度达一亿四千万英镑。即使这样,当年的盈余仍将大量增加。去年11月增收的每加仑一先令的汽油税取消了。那是在中东危机期间为了限制石油消费而增收的。我曾经强烈地主张现在

---

① 1957年4月2日。

② 1957年4月4日。

是稍为减轻个人所得累进税的时候了。1920年这种累进税扩大到对收入二千镑的人也征收，这个收入量包括的人数很多。到1957年，这个数字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一半还要多。现在，财政大臣可以稍为减轻这方面的税率了。同时，对多子女家庭所得税的减免率增加了，老年人的征收起限也提高了。对列入日常家庭用品的一批商品也降低了批发税。对制造新船的投资，减税率也从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最后，对在国外经营的公司也作了一个重大的税收让步。皇家所得税委员会上一年就已经建议这样做，我当时答应说只要实际情况允许就马上执行这个建议。那时和以后都一直有人在反对，认为这样让步的结果将会给国际收支平衡增加额外的压力。这个反对意见虽然表面上很有理由，却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国外投资愈多，在海外经营业务的公司愈是成功，从长远来说，将会使我们岛国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

预算日的前一天，我们照例开了内阁预算会议。

财政大臣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财政和货币情况，然后提出他的建议。大臣们都很满意。看看新闻界、下院、党内和公众将说些什么倒挺有意思。反对党当然一定会猛烈地攻击降低超额累进所得税。<sup>①</sup>

第二天，财政大臣向挤满人的下院提出预算。

这是一篇很出色的演说——写得好，讲得也漂亮。会议很顺利地按我们的计划进行。娱乐税作了细微的变动（舞台剧和体育不动；电影减了六百万英镑，由增加电视执照一英镑〔从三英镑增到四英镑〕来弥补），“放弃”的是一亿英镑，分为四等份——海外贸易公司减免二千五百万英镑，超额累进所得税降低二千五百万英镑，儿童补助增加二千五百万英镑，购物税降低二千五百万英镑。反对党看来有点不知所措，我们的人却很高兴。<sup>②</sup>

---

① 1957年4月8日。

② 1957年4月9日。

报章上对这个预算的反映整个说来很好,不过,当然有一些报纸攻击超额累进所得税上的让步,这一点自然很快就成为反对党在议会里的路线。哈罗德·威尔逊在议会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认为对收入巨大的财主作这样的让步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战斗并不是将军们赢得的。这个类比看来很不恰当,很容易地被驳倒了。上午预算宣布以后,我接见了《泰晤士报》编辑威廉·哈利爵士,“他看来对政府表示赞同,但是尽管这样,还是每天用最漂亮 349 的祖母般口气教训我们。”<sup>①</sup>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相对地有利的经济气氛很快就被冲淡了。5月底的一天,我收到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提醒我说局势似乎颇为危险。我作了如下的答复:

我们说我们的债务达到四十亿英镑,而资产只有八亿三千万英镑,指的当然是对外的经济状况。换一句话说,我们作为银行家,欠顾客的钱四倍于银行的流动资金。我常常怀疑这种银行业务是否值得经营,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办法停止它。如果我们把它结束了,我们对每个英镑只需要付五先令。

人们之所以放弃金边证券,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价值下跌而股票投机却有利可图。这一点甚至影响到大主教们。在牧师们心目中,买卖股票具有赌博的全部乐趣,却没有道德上的罪过。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统一公债有一种看法,认为购买那种不能取兑的公债是受骗了。我敢肯定,这种看法对我们的信用有很大的损害。看来不如给目前这种不能取兑的有息证券规定一个还本日期,那怕这个日期定得很远也有好处。

当然,我们开支太大了,我们必须继续压缩信贷,不过,我认为我们也必须是有选择地压缩。

然后我谈到所有的其他建议,其中有一些我接受了。

整个夏天,不安情绪不断在增长。5月底汉恩赛补缺选举中

<sup>①</sup> 1957年4月10日。



保守党的多数大幅度地下降，加上新的房租法案，使政治压力加重了。

昨天和今天的报纸评论都很坏。最近的补缺选举使他们动摇了。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每日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攻击我个人(这还是第一次)。《星期日泰晤士报》攻击党的机构。令人十分奇怪的是，英国人民怎么让政治新闻界里出现这样一批神经错乱的人。<sup>①</sup>

整个7月里，报界和其他评论家们都加大压力要求采取行动，但是和往常一样，总是弹起某种歇斯底里的调子。《泰晤士报》特别要求说应该使“货币制度能够支持更高的工资”，并呼吁政府争取相应的行动。甚至比弗布鲁克勋爵7月12日来和我单独进午餐时谈到这个问题，也好象反常地倾向于贬值。虽然他当面还是和平常一样，表示愿意帮助我，态度也很友好，但是我们的谈话大部分只是回忆往事。

7月经常是个不吉利的议会月，如果这时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再存在着财政困难的话，那么政府便发现自己所处境况特别伤脑筋。

总的说来，下院的形势不如几个星期以前好。……全国党内的情绪也不佳。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坚持到这届议会会期结束，不致发生什么灾难。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比六个月以前我所想的要强了。<sup>②</sup>

议员和低级大臣薪俸的增加，并没有能消除日益增长的批评。甚至反对党领袖的薪俸从每年二千五百英镑增加到三千七百五十英镑，除了在小圈子以内，也没有使人们感到满足。

7月20日我在贝德福特的足球场向大批群众发表演说。星期日的报纸很好地报道了这次演说，有助于稳定局势。我的主要目的是提醒人民，尽管当前情况显得很繁荣，但是存在着通货膨胀的

---

① 1957年6月2日。

② 1957年7月19日。

危险。正是在这篇演说里，我第一次说了当时虽然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评论、后来却变得声名很不好的一段话：

让我们坦白地说吧：我国的大部分人民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日子。你们到全国去转一转，到工业城市去一趟，到农场去一趟吧，你们一定会看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景象，这种情况我一生里还从来没见过，在我国历史上确实也是空前的。我们现在有些人开始担忧的倒是：“是不是好得令人难以相信是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是不是好得难以持续下去？”因为，在这一片繁荣中，有一个问题战后以来一直——351这样或那样地——使我们很伤脑筋，这就是物价不断在上涨。现在我们经常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不断扩展经济和维持充分就业的同时，使物价保持稳定？我们是否能控制住通货膨胀？这就是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

当时，“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日子”这句话并没有像在后来几年里那样被曲解，被断章取义地引用。贝德福特的演说还进一步提醒大家：

不管怎么说，我国的广大群众暂时还可以对付物价上涨的影响；但是，如果通货膨胀把我们挤出了世界市场，我们就不能继续摆脱这种影响了。因为，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们将回到失业的恶梦里。你们之中年纪比较大的人一定会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年青一点的人永远不致尝到那种味道。冒险放弃我们所已经取得的一切是多么愚蠢的事啊！

最后我又指出，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是经常使人焦虑的事情，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危机或者我国特有的现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能以过分刻板的态度来对待。

象世界上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这是一个如何求得平衡——如何适中——的问题。我第一次学到这一点还是在孩提时阅读《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时候。那时候我并不懂得它和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但是它正

说到点子上。

小毛毛虫说：“一面使你长高，另外一面又使你变矮。”爱丽斯问道：“什么东西的一面？什么东西的另一面？”小毛毛虫回答说：“蘑菇呗！”

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过分紧缩通货，就会把自己饿死。如果我们靠通货膨胀来养肥自己，越过了我们制度所能支持的程度，那我们一定会因为增长过分而吃苦头。

352 虽然从性格和喜爱来讲，我是个扩张主义者，但是我无法否定这样的论点，就是：在总的进展中，目前至少应该是一个暂时停顿的时候。我的内阁中有一些人责备我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太轻率了，但是很多人了解我的主要意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社会党人的说法的，他们现在正拍着胸膛出来说，经过六年的治理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现在应该让他们再有一次机会来兜售他们的老药方了。

我有一次听说：有个年青人参加入学考试落选了。他一共考了二十回，年年都失败。但是他泄气了吗？一点不！他开始当起补习教师来，登了广告说：“专门辅导考大学——有二十年经验。”我相信他一定干得很不错。后来他成了一位社会党领袖。

我虽然忧虑重重，但还是决定在目前这个时候外表上要表现得信心十足，甚至得意洋洋，其实呢，心里满不是这样。

第二周下院就通货膨胀进行了辩论。政府最近曾经提出过一个设立物价、生产率和收入专门委员会的计划，但是工会领导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财政大臣在辩论中明确指出，虽然有种种挫折，政府还是准备照计划进行。不久就任命了“三贤”为委员会的委员，就是科恩勋爵、哈罗德·豪伊特爵士和丹尼斯·罗伯逊爵士，一位是法官，一位是会计师，一位是经济学家。这个委员会充当了先驱，尝试采取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无泪克制”的办法。我们希望依靠自愿协议，而不必依靠法律和强制力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结

果在多数情况下都成功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公共汽车业爆发了一场罢工,只由合适的一级法院用一个温和的裁决就解决了。科文特花园商业区的工人也举行了一次罢工,影响并不大,一个月以后就复工了,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科文特花园的罢工可能快结束了。[法兰克·]卡普斯看来有点棘手,但还是为复工争取到一个微弱的多数。仲裁“条款”表明罢工者完全失败了。<sup>①</sup>

但是,7、8整整两个月,由于英镑所受压力增大,而且工业方面<sup>353</sup>的工资要求没有缓和的迹象,政府人士继续在长时间讨论。在这个关口上,我要求官员们研究一下工业争端的实际经济代价有多大,并且在我的阁僚中传阅了一份备忘录,表示下述的看法:除了一些关键的部门,如发电站、煤矿、铁路和码头之外,其他部门在目前这个时候增加工资,对经济的危害比停工还要大。这个调查延续了很长时间,是由很多个部的官员一道进行的。7月30日,我给阁僚们作了如下的总结:

我们必须设法纠正最近在公众和报章中颇有市场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政府为了国民经济的利益有责任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罢工。显然,政府对每次罢工的态度必须根据这一事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而不能象一般原则那样事先加以确定。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强调的是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不是生产停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在所有这些令人操心的事情中,我总算能够给桑尼克罗夫特一点安慰,虽然也许有点讽刺意味。向几届内阁提出的可以考虑节约的项目表中,总是列有削减向各种年龄的儿童免费分发的桔子汁这一项。人们不断地抨击核试验和散落物对全世界儿童的影响,我在这些攻击的困扰和烦恼中,高兴地发现一本医学杂志上登

<sup>①</sup> 1957年8月15日。

载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但是又显然很有权威性的观点,说桔子汁对健康有严重危害。因此,我给财政大臣送了一个条子:

你一定记得,我们曾经为桔子水问题一连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争论不休。现在我发现医生们说桔子水对儿童的健康危害很大,几乎比镉90还要厉害。无疑,你一定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到8月底,英镑受到的压力仍在增长,而且预计还要继续加大。黄金储备又开始几乎象往常一样流失。虽然有的观察家把这归咎于“一轮新的投机活动”,实际根本的原因是法国法郎的可能贬值以及盛传德国马克将重新定值。(经济历史确实经常在重复)资金开始迅速地流出伦敦,而且所有现在我们常见的一些现象都紧接着发生了。不过,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总流失量也没有达到二亿英镑。我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并不是太忧虑。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毕竟一直在上升,而且出口仍然活跃。使我担心的是生产显然无法按我们期待的百分率提高。社会购买力由于工资提高而超过了生产所能供应的程度,因此物价不可避免地上涨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必恐慌。

法郎的崩溃和马克的大幅度上涨,对我们的外汇说来意味着一个极不景气的月份——苏伊士事件以来最不好的一个月份。但是国际收支的实际情况是良好的,贸易平衡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下去。<sup>①</sup>

如果及时的话,采取相对比较轻微的补救措施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拖延得太晚,即使更猛烈的治疗方法也将无效。因此,我十分愿意同意某些经过详细讨论而后提出的补救措施。

对这种形势的分析判断是很清楚的。公众应该懂得,如果光增加工资而生产没有真正的提高,物价就必然上涨;也应该懂得,政府所能实行的直接控制,其程度比多数人所认为的要有限得多。

<sup>①</sup> 1957年9月4日。

在私营企业利润上升而且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时候，雇主正在互相竞争供不应求的劳力(特别是熟练劳力)，要制止他们提高工资率，是不容易的。在国营企业方面，很多工资和薪金是通过仲裁程序来确定的，不论政府或雇主都无从直接加以控制。政府当然可以，而且也确实正式和非正式地通知过公用事业、国有化工业和私营工业的雇主们说，生产没有增长而提高工资，对经济是有 355 害的。

在9月初举行的职工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欢呼通过了一项反对任何形式的工资限制的提案。这个提案是卡曾斯在他的演说里提出来的。不论是任何人提出任何限制工资的措施，他都反对。但是，有趣的是，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对这件事既没有提出劝告，也没有表示集体的意见，更不用说改变这个提案了……

既然通货膨胀的局面本身就造成劳力需求不断增长，那么，与工会进行正面对抗是没有用处的。要降低这种需求，只能靠减少流通中的通货。必须通过银行，用分配贷款或者直接监督贷款的办法来控制通货和信贷。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一般的政府开支、即“线上”开支，作合理的削减。

9月的头两个星期里，所有的有关机关之间来回进行争论。在我的老朋友罗伊·哈罗德的鼓励下，我仍然反对把紧缩通货作为一个永久的政策，甚至作为比较长期的政策也不同意。确实象哈罗德所主张的，经济在许多方面需要“振作起来”，而不是“减弱下去”，人们才会加班工作，生产才会提高。但是，短期性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

到9月的第三周，大臣们准备就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作出结论。我的一位亲密的老朋友米尔斯勋爵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建议，给了财政大臣和我以特殊的帮助。他是一生经营工业的人，既天然地倾向于扩张和发展，又从切身经验里培养起小心谨慎的性格。

9月对外汇来说显然将是个不利的月份，也许比8月份更要糟糕。因此，

356 财政部想首先把〔我们的计划〕重点放在对付英镑所受到的攻击上。我一直强烈地反对——结果反对成功了。英国人民等待的是对最关键问题的答案——怎样制止物价上涨和货币价值的降低？他们（也许）愿意接受一些对付这些问题的措施，但是他们是把我们的外汇危机（这点他们并不了解）看成好象是外国人搞的诈骗之类事情。<sup>①</sup>

经过正式的非正式的、政府内外的反复讨论，财政大臣草拟的声明里所提出的基本方针算是最后通过了。其中有的建议由于通过一些奇怪途径将造成新的麻烦。“英格兰银行想把银行利率提高二厘——这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从五厘提高到七厘）。”<sup>②</sup>经过许多争论，事情留给我和财政大臣来决定。我们第二天上午会了面。我很不喜欢提高银行利率，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在一份备忘录里就强烈反对过这个做法。

既然我们用直接控制的办法来减少通货总量（计划里就是这样规定的），就不需要使用间接控制法。把旧制度与新制度结合在一起是愚蠢的做法。我当财政大臣时，曾经被说服去使用银行利率这种正统的武器。但是那是因为当时我们并不能控制——以任何直接的方法——公共和私人投放资本的总量。既然我们现在使用数量控制的措施，那么银行高利率的目的是什么呢？一点用处也没有！不但不应该提高利率，而且应该降低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三个方面得到好处。我们会在外汇上得益，在预算上得益，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得益。

但是，经过多次讨论后，我终于屈服于压力。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所有他的顾问一样，都相信把银行利率令人注目地提高是对付储备流失的唯一办法。我争论说储备的情况已经好转，不再是真正的主要问题。问题在于国内经济状况，而国内经济病患是

---

①② 1957年9月17日。

不能通过用竞争性的银行利率来吸收国际游资的办法加以医治的。如果需要在国内紧缩通货，那还不如通过银行对贷款实行选择性控制为佳。

我深深后悔没有坚持我的主张。但是，考虑到财政大臣是肩负着这副重担的人，眼前这手牌无论如何应该允许他照他自己和他的顾问们的意见来打。不过，我把这次事件记在心里，并且决定不再无止境地屈服于压力。

9月19日正式公布了这些财政措施。除了以“英镑受到严重的投机压力”为理由大幅度地提高银行利率以外，公共投资和银行贷款都要减少，并且加紧“压缩信贷”。几天以后就宣布储备已经流失五亿五千万美元。9月20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所有的证券股票，从最硬挺的“蓝边”证券到“金边”证券，当然都迅速下跌。财政大臣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电视讲话。今天上午，秘密保守得很严，以致报界看来感到惶惑不解。总的说来，比较严肃的报纸给予充分的支持。《每日电讯报》最好；《泰晤士报》相当不错；《约克郡邮报》很好。有趣的是《每日镜报》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我想，反对党将会采取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渴望上任（而且无疑对下届大选很有信心），他们一定试图装出一副“政治家风度”。<sup>①</sup>

我的想法没有错，因为哈罗德·威尔逊发表了一个声明，支持提高银行利率，认为这是目的为了对付投机活动的短期措施，并且表示希望这个措施取得成效。此外，他当然又表示担心生产和就业会普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我们本来是否应该采取别的方针的问题，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讨论，甚至在我们自己中间，在拥护我们的人当中，也发生了争论。我们本来是否应该贬值？是否应该让英镑浮动？所有这些问题当时就讨论过，这时仍然还在讨论。有的人还比较了解情况，但多数人是并不了解情况。不管

<sup>①</sup> 1957年9月20日。



怎么说,我们已经作了决定,因此,重要的是大臣们和所有能够影响事态的人能坚持这个决定。所以,我给诺尔曼·布洛克发出下列指示:

我希望你把下列备忘录分送内阁成员:

致参加内阁和不参加内阁的所有大臣:

1) 政府已经作出维护英镑的决定。我们已采取的措施不论在国内和海外都得到好意的赞同。

358

2) 最重要的是不要对我们的决心散布任何怀疑。

3) 不管理论上对一个特定时期内的一个特定方针有什么争论,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因此,我相信,我们的队伍将不会表现任何的动摇情绪,或者听任我们有权施加影响的公职或非公职人员发表无聊的或愚蠢的意见。

4) 对可能采取什么其他政策的问题进行讨论,当然是一种吸引人的智力锻炼,但是现在肯定不是进行这种讨论的合适时候。

9月26日,我接到正在华盛顿的桑尼克罗夫特发来的一封令人鼓舞的电报。他报告说英镑得到了坚强有力的支持,但重要的是必须辟除所传将要贬值或使用其他非正统办法的谣言。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人们夸大其词地报道我们的决定。有的人硬说国营企业的投资已经完全停止。事实上,今后两年里,这一部分的投资每年都将达到大约十五亿英镑的水平。

与此同时,盖茨克尔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写信给我,要求提早重开议会来讨论财政经济形势。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写了一封信拒绝召开紧急会议。信中我说,我认为把我们的讨论放在形势进一步发展以后再举行将比较能获得成果。我还“客气地提醒他说,当然,在1931年英镑贬值时,倒确实需要举行[一次议会会议]。”<sup>①</sup> 报界接受了我们的决定。形势看来并非不利。

---

<sup>①</sup> 1957年9月24日。

虽然民意测验继续不利于我们，支持我们的人似乎逐渐减少，但是，却存在一股坚定的潜流。因为我们采取的立场是保卫英镑，只要政策证明是成功的，就可以期待公众舆论在适当时候会团结到我们这边来。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查尔斯·希尔是负责新闻事务的，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我在9月30日给他发去下列电报：

我认为团结舆论的方法之一是使人们关心保卫英镑的战斗。这场战斗在道义方面和实际方面都有它的意义。说它有道义方面的意义，是因为人们不应该不履行自己的债务，而说它有实际方面的意义，是因为不履行债务将使我们毁灭和失业。无疑，在党内方面，你可以和黑尔什姆勋爵及其他人商量一下怎样进行这件事最为妥善。如果通过中央新闻处召开一个有适当数量的〔舆论界〕人士参加的会来充分客观地说明保卫英镑的意义，我不知道是否合法。反对党是不大会反对这个做法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说英镑应该维持现有价值。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十天以后在布赖顿举行的保守党代表大会上，我的演说大部分是谈国防和外交，至于最近的经济政策，则由我的同僚们去作解释和表示支持。不过，我还是说了几句我认为是总结了我们的目的的话：

在国内，就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已经达到我国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我发现比万先生称人民是“受苦难和受蹂躏的工业大众”……

难道1951年以后竖立起来的六百万根电视天线他连一根也没看到吗？难道新增加的二百万辆汽车和摩托车他一辆都没有碰见过吗？

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修盖起来的大批房子，难道全都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吗？

让我们坦白地说吧，工资收入者和商人都发现工资和利润比物价增加得快多了。

承受重担的是领取养老金的人、退休人员 and 依靠固定收入或近乎固定收入为生的人……

对我国人民中这部分没有分享到普遍繁荣好处的人，我们显然负有责任，而我们是准备履行这个职责的。

360 内阁在 10 月 14 日开会时，桑尼克罗夫特告诉我说，虽然过去两个月黄金和美元储备下降到只剩六亿五千万英镑，这个数字等于 1954 年底水平的三分之二，但是，英镑现在已经开始稳定了。我们开始收进通货，而且外国舆论看来对我们决定保卫英镑的坚强决心感到满意。英联邦各国的财政部长本身对待英镑也采取了更加有利于我们和更为现实的态度。幸运的是，所谓科威特裂缝——这是一个消耗我们大量储备的漏洞——现在已经有效地堵塞住了。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感到，从长远来说，我们的经济管理不善比由于某些技术原因而造成的突然的、那怕是危急的储备波动更为危险，这些技术原因有如法郎的疲弱或者马克的硬挺。有些情况如果持续过久，可能威胁到战后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固定汇率制度。只要我们有把握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使用一点储备肯定是应该的。

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国有化工业或公用事业的工资要求。桑尼克罗夫特 10 月底在下院关于经济形势的辩论开始时曾经告诉议员们说，他已经通知交通委员会，政府 1958 年对铁路亏损的补贴，不能超过 1957 年；所有负责处理工资问题的人，包括从事调停工作的人员，都应该记住这一点。这个声明虽然被攻击为直接违反已有惯例，但是它和另外一件事，即卫生大臣 11 月 1 日拒绝批准惠特利董事会关于给办事人员增加工资百分之三的协议，被认为是政府态度认真的证据。

财政大臣在下院说过的一句话，近来被人作了新的解释。

英镑在国内的价值与英镑在国外的价值归根结底是一回事。人们变动其中一个价值，就必然影响到另外一个价值。<sup>①</sup>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 年 10 月 29 日。

这个看法，与后来一些高级权威向我们表示的对待贬值的比较进步的观点相比，不幸正好相反。他们说：“这当然不等于说，英国本土的英镑、你口袋里钱包里或存在银行里的英镑已经贬值了。”但是，我还是在考虑紧缩通货以外的其他办法，渴望找到一个代替的方案。可惜这项研讨工作虽然一直继续到我卸任时——甚至卸任以后，始终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我10月28日给财政大臣的备忘录便表达了我的这种不安和希望。 361

根据我上次给你的关于经济形势的备忘录，我们前些日子讨论了英镑区未来应该是怎样一种情况的问题。目前，它是依靠澳大利亚羊毛的高价格和伦敦的七厘银行利率这条纤弱的线来维系的。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确实必须就其中一些根本问题寻求一个答案。我们处理每一件事情都碰到这些问题，使我们在外交上、防务上和国内贸易方面的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也许我们只好听其自然，永远处于这种状况，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我正怀着很不安的心情瞻望着这届政府的最后六个月，因为这个国家的金钱将以与我们政权寿命的消逝同样的速度不断地流失。

这时候主要的困难出在增加工资上。

要在我们的坚定不移与他们的寻衅好斗之间保持平衡，将是很困难的。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使用的口气。如果工会领袖们认为存在削弱我们的机会，他们就会紧逼过来。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寻找机会来抱怨我们毫不让步。<sup>①</sup>

下院开会时，虽然我有很多事情需要汇报，主要是关于我最近到华盛顿的访问和即将到巴黎的访问，但是当然还是需要谈一下经济形势，不过，辩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担子留给我的阁僚们去挑就是了。我的讲话适可而止，但也不是心血来潮，随便应付几句。我们的总方针现在愈来愈明确了：对于政府自己的雇员，我们将接受仲裁决定，但是钱必须在专门拨款的范围内或者从政府的总开支

<sup>①</sup> 1957年10月31日。

中支付。在国有化工业中，我们将要求各管理局进行储蓄来平衡由于仲裁而增加的任何工资开支。他们不许自行增加工资。在私营工业中，我们是希望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制止不合理的工资要求。在11月5日的演说里，我试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我们的计划（这是一个奇特的日子，议会两院凑巧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召开联席会议）。增加的工资必须来自更高的生产率，而不是来自增发通货。

与此同时，形势并不令人沮丧。

“工资”问题正逐步缓和。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工会将干些什么。但是，显然没有人真正“存心寻衅”。<sup>①</sup>

第二天，……

我和五千名“董事”（董事协会）共进午餐，然后在“节日大厅”向他们发表演说。我离开讲稿说了10到15分钟。我想这正是他们所想听的话——反映当然相当好。这五千位董事原来就损失了百分之三十股值（金边证券和股票），现在又因为通货而付出百分之八。他们站起来欢呼，这当然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善意和谅解。<sup>②</sup>

到11月中，事情很清楚，就英镑和储备来说，我们已经渡过了主要的危机。

治疗很对英镑的症候，但是代价很高。工会表现也比较谨慎。但是运输业的要求蜂拥而来——公共汽车，铁路雇员和国营铁路工会等等。他们选择的时间对我说来再糟糕不过了——正巧我准备1月到澳大利亚去访问。<sup>③</sup>

但是，11月份里，我们拒绝了机器业工会领导人提出的一项每周工作不超过四十小时的要求，他们明智地接受了；运输和杂役

---

① 1957年11月6日。

② 1957年11月7日。

③ 1957年11月11日。

工会的领导人，在伦敦公共汽车雇员要求每周增加工资二十五先令遭到拒绝以后，也表现了类似的克制态度。同样，铁路方面的工资要求也没有逼人太甚。

到12月中旬，来年的民用预算数字已经准备好了。内阁从一开始就同意必须采取措施来限制政府的日常开支。但是，1958年363年初将需要一亿英镑的补充预算，而1958—59年度的民用预算数字比1957—58年度预算数字高二亿五千万英镑，或者说比1957—58年度结算数字高一亿五千万英镑。虽然储备情况现在正在改善，国民生产总值看来很有可能令人满意，政府本身的开支却不能不节约。因此，当看到数字后，我就知道不容易引导我的内阁同事们作出一致的决定。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到巴黎去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艾森豪威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路上我怀着阴郁的心情考虑着我们的情况。

农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床底下）的黄金比英格兰银行和女王陛下政府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还要多。法国政府和银行一无所有。法国的“富裕”阶层在瑞士的财富比在政府和银行的多一两倍，而且继续在向外输出资本。在我们这里，事情刚好相反。我们的银行和政府掌握有那么多钱，却在浪费！法国和英国，究竟是谁在实际上更为强大呢？<sup>①</sup>

这时，财政大臣当然主张削减民用预算数字。他希望把它维持在1957—58年度的水平上，这就需要减少一亿五千三百万英镑。这个问题现在变得迫切了，怎么办？

12月22日星期天晚上，我和财政大臣进行了一次有益的谈话。

他对1958—59年度民用预算数字大幅度提高很忧虑……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造成的——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少年人

<sup>①</sup> 1957年12月15日。

(在校午餐补助)和由于世界价格下降而自动增加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当然,这点对我们的国际收支来说是个收益,但对国库却是个损失)。财政大臣希望对福利制度的开支作某些削减——其程度我认为是我们政治上难以办到的。<sup>①</sup>

364 第二天,少数几位大臣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讨论,延续将近四个小时,部分时间是讨论党在未来的政策,但大部分是谈当前的财政问题。

财政大臣口气很坚决(而且有点辞职的意思)。其余的人剧烈反对他的主要建议,如取消对儿童的补助……(只补助第二个小孩)。我不带偏向地作了总结,但是特别强调需要在工资战线上取胜。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偏离原定的方针。<sup>②</sup>

财政大臣在民用预估数字中要求削减的一亿五千三百万英镑,大家希望有四千万英镑由财政部通过正常审查后节约下来。1958年1月1日我向阁僚们传阅了一份备忘录,支持上述第一个要求:

这一我们必须保证的总储蓄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积累。我认为这方面的节约可以包括放弃一些本来值得投建的新工程项目或公用事业的改进工程;还可以包括削减现有公用事业的开支。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显示出政府对自己的开支同样适用要求其他经济部门遵守的反通货膨胀纪律。

因此,我要求具体负责政府各部的所有大臣共同合作来完成这项准备工作。至于更大的节约数字,那还要经过长期艰苦的争论。不论哪一个党的政府,它的成员一定都经历过类似的艰苦协商。在这一个或那一个项目里挖掘节约数字,总是使人精疲力竭、心烦意乱的,因为同一个问题往往在一长串连续不断的——和重复的——会议上来回折腾。这种争论有时候能达成妥协,有时候

---

① 1957年12月22日。

② 1957年12月23日。

却出现僵局，甚至造成阁员以辞职相威胁、政府濒临瓦解的局面。但是在几周以后，很少有关大臣会回忆得起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引起了辞职，甚至引起了解散内阁。1894年导致第四届格拉斯通政 365 府下台和他本人从政治生活中最终引退的，其实是海军预算上一笔数量并不大的开支所产生的分歧。1909年那个伟大的自由党政府，也遇到过类似的危机，政府面临瓦解，问题也是出在海军预算上。当时的解决办法非常奇特，但却很有效：

最后，采取了一个奇怪而颇有特色的解决办法。海军部原来要求六艘船，理财的只给四艘，而最后我们达成妥协的数目是八艘。<sup>①</sup>

我毕竟无法去和这样一个关于和解的奇迹媲美，只能不厌其烦地寻求解决办法。

经过1月3日、4日和5日的连续讨论，事情逐渐清楚了。“财政大臣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竟要提出一个难以理喻而必须采取信任行动才能解决的要求。他对任何超出上一年度的开支，不论数目大小，都认为不可接受，把这作为一个信条，而不是作为政策来看待。他甚至不顾货币实际价值已经下降的事实，硬性要求预算数字等同于上年。不过，在这一点上他的同事们并没有过分计较。他们大方地承担义务，答应当前要尽一切可能来协助财政部。经过长时间讨论，节约的数字一致同意为一亿英镑。此外，桑兹答应在防务拨款中再节省五百万英镑。关于进一步节约的具体项目和数字，各种排队搭配的方案都考虑了；但是，经过再三的精打细算和作了一些很不得人心、甚至是愚蠢的削减以后，仍然缺少五千万英镑。财政大臣简直近乎顽固不化地坚持他的主张。这五千万英镑只能用其他办法额外节省下来，诸如暂缓提高军人基本俸给，取消对第二个儿女的家庭补助，以及削减其他一些社会福利开

<sup>①</sup> 温斯顿·斯·丘吉尔：《1911年至1944年的世界危机》，第37页。1923年伦敦。



支。但是，改善军人待遇是1957年的国防白皮书早就宣布了的，只是由于那年秋天财政状况紧张而推迟实施，如再度延缓既在政治上难以辩解，也妨碍自愿兵员早日到达一个适当的数目。取消第二个子女的家庭补助，将意味着取消保守党政府能够引以自豪的战后建立起来的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半额以上。如果国民保健服务基金中的捐款的比重再提高，这将是十二个月里的第三次了。福利牛奶的收费1957年4月1日起已经从每品脱一点五便士增加到四便士。如果规定在学儿童牛奶全部收费，将引起教师的不满。这些确实是很难克服的困难。

在这几次会议上，还有在别的一些会议上，我都提醒同事们说，这主要是个心理问题。英镑已经夺回1957年丧失的大部分阵地。第二步将是通过把政府开支保持在合理限度之内来重新恢复人们对国内行政机关的信心。这是我们任内一个成败攸关的问题。我们在头一年里，在恢复英国的地位方面，做出的成就比我们在开始时所希望的还要大。如果我们能够渡过当前这个困难时期，前景将更为乐观。

总的说来，我虽然认为财政大臣有权要求他的同事们表明他们决心支持他的整个政策，但是，如果通货紧缩的程度达到使经济停滞或者引起不必要的工业动荡的话，那是自取灭亡。在讨论过程中，桑尼克罗夫特一直反对这个看法，他争辩说：

1958—59年度的预算一定不能超过今年的开支（包括补充预算在内）。这样，我们政策的三个方面才完整一贯，合乎逻辑。基建投资和银行贷款已经保持在1957—58年的水平。政府的开支也应该做到这一点。这个原则听起来很不错，但实践起来却有很大困难。<sup>①</sup>

星期五的内阁会议开了四个小时，没有什么进展。有的阁员认为财政大臣的态度过分严格，甚至有些迂腐；要避免他们发脾气

---

<sup>①</sup> 1958年1月6日。

实在不容易。在短时间体会以后,我说,我们应该保证节约出尽可能接近财政大臣要求的数字,不过我不大相信能够得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学等式来。既然我们能够削减我们认为有把握的一亿英镑,那么,欠缺的数字已不及财政部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一。这样一个数目肯定不足以表示政府的决心减弱了,因为这大部分可以归因于一些政府所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学龄儿童的增加,或者领取养老金的人增多。但是,如果政府因为不能协同一致,无法解决一个细小的意见分歧而行动困难,从而放弃它一年以前开始的一项伟大事业,那么,这个政府将受到它的拥护者和世界舆论的同样谴责。星期五晚上到这里就体会了,附带有“一个谅解,就是星期天晚上将举行一次大臣级小型会议,然后星期一内阁再继续研究。”<sup>①</sup>

星期六,在家乡痛快地打了一天鸟以后,我回到唐宁街十号发表了一篇关于外交和防务的广播演说。虽然反映很好,但是看来奇怪的是,向这样大量听众谈这样重大的题目,却完全隐讳政府本身正面临着分裂。

1月5日星期天,

我上午10点半见到财政大臣,呼吁他——从私的角度和从公的角度——不要再威胁我们,劝他还是向内阁表示将和他的同事们共事下去,接受集体的意见。防务预算可以马上作结论(形势也需要这样做),至于民用预算还可以至少再继续讨论三个星期。这项工作在我出国期间可以继续进行,用电报和我联系并最后商定。他样子不很高兴,说他还没有最后下决心;但是我的印象是他已经下定决心,除非他的要求全部满足,否则就辞职。<sup>②</sup>

然后,我坐汽车到查特维尔,和丘吉尔共进午餐。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对桑尼克罗夫特很生气,答应充分支持我。他不大相信会发生辞职事件。(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事情 368

<sup>①②</sup> 1958年1月6日。

真是出奇地相似!)<sup>①</sup>

内阁在星期天晚上开会。财政大臣重复了他的要求，一定要从防务预算或其他预算，或者兼从两者中扣出五千万镑来补足一亿五千三百万英镑的数字。

邓肯·桑兹（确实经过难能的努力）本来已经把国防预算减到低于去年，其中包括削减额外俸给、津贴等三千五百万英镑以及发给强制退役的军官等人员的一次退役补助金二千万英镑。现在，他又答应再节约一千八百万英镑。<sup>②</sup>

但是，鉴于这样做有它技术上的困难，所以有效和可行的措施显然只有两个：或者是重新征收保健印花税，或者是大量削减儿童补助。

但是，新印花税（秋天才完成立法程序）要到2月才能开始征收；而取消对第二个子女的补助则将影响到三百万至三百五十万个家庭——对低收入的家庭来说，等于降低百分之十的工资——这对于我们即将面临的工资斗争也不是一个明智的对策。<sup>③</sup>

虽然许多大臣认为桑尼克罗夫特是受到财政部的大臣奈杰尔·伯奇和伊诺克·鲍威尔的怂恿，但是，还是相信桑尼克罗夫特不一定会强行辞职。

内阁在下午6点半开会，虽然争论不如以前剧烈，但是还是没有多大结果。大部分大臣都参加了讨论。我在8点半宣布休会，并且要求内阁成员在当晚10点半再次集会。

多罗西和我一道吃晚饭（她从伯奇格罗夫回来）。在场的还有巴特勒、麦克劳德和希思（主任督导员）。我们讨论了形势——由于财政大臣还敞开着大门，我们的估计很不一样。桑兹比较肯定，财政大臣显然要

---

① 1958年1月6日。伦道夫·丘吉尔勋爵1886年因为不同意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的拨款要求而出人意外地辞去财政大臣职务。

②③ 1958年1月6日。

“家庭补助”、“福利牛奶”等问题解决了才肯干下去。麦克劳德认为他是被鲍威尔弄糊涂了，受了后者的支配。巴特勒真正震惊的是他竟然这样不负责任，事先不经研究和准备便要求政府在几天之内对政策作重大的改变。我则仍然认为，如果我们能再作一点节约来挽回他的面子，他还是会的退却的(结果证明我错了)。 369

休会以后又举行了大约四十分钟会议，财政大臣当然也参加了。我总结了情况，然后内阁成员默默地分手。

大部分人认为我的讲话有可能避免危机(这篇讲话除了慷慨地为财政大臣说了一些好话以外，力图保持公平，不偏向任何一方)。

当天深夜，在考虑整个情况时，我逐渐明白

更大的危险在于内阁的完全分裂——财政部的几位大臣，国防部的几位大臣，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的几位大臣——所有的人都可能辞职(因为不同的原因)，那样，唯一的可能就是政府辞职，成立一个工党政府，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而在新的大选里，保守党由于政策不明和声誉不佳，将处于一种无望的甚至可笑的地步。必须以一切代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天，1月6日，是个多事之日，有些令人精疲力尽。我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动身去英联邦各国访问。因此我行动必须迅速。危机现在到达顶点了。

就我所知，事情是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几位大臣精心策划的。就我的判断，部里的其他官员并没有插手，也不赞成这样做。

上午10点半，我收到财政大臣的辞呈，同时送来伯奇(经济大臣)和伊诺克·鲍威尔(财务大臣)的信。没有附上表示个人抱歉的短筒。这是一个官腔十足、态度傲慢的文件，全文如下： 370

我写这封信请求你接受我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我的理由可以简短说明如下：

我不准备批准明年政府的日常开支超过今年将支出的总数的预算数字。

你预定1月7日出国，所以有必要现在就对这件事情作出原则性决定。显然，我的建议没有得到你或者一批同事们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掌握政府的开支水平是我作为财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辞职。

在去年夏天的英镑危机中，我们曾经对公共投资和银行贷款从货币方面施加限制。照我的看法，政府本身应该同样适用它要求他人遵守的财政纪律措施。

我认为，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有时需要采取某些政治上不得人心的方针。反正我是把限制政府的开支视为维护英镑、稳定物价和保持我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和地位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封信的说法如果不给以坚决的回驳，将对英镑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作者企图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内阁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反对通货膨胀。因此，我认为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的利益，不能只是简单地正式接受辞呈。就在当天，我写好并发出了一封详细的复信，目的是纠正任何错误的印象。

今天上午遗憾地收到你提请辞去财政大臣职务的信。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你和内阁其余成员之间存在的分歧本来很小，而你竟认为有必要采取这个步骤。

371 我们大家都决心执行的政策是制止通货膨胀和维持英镑的稳定。在这个政策里，限制政府的开支当然极其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把政策视为一个整体。

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限制通货的发行，另一个是顶住要求增加报酬、包括工资和薪俸的压力。你说明年的预算数字必须和今年开支的总数完全相等；如果对其他情况一概不加考虑，立即死板地照这个公式办理，坏处将比好处要大。因为，就象我们经过讨论而逐渐明确的，咬文嚼字地使用这个公式就必然要削减一些重大的福利费用，包括一些对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影响特别大的福利待遇——何况，这样说还没有把它对工业战线的影响和对负责限制工资的人员的工作的影响考虑在内。

这不是一个是否得人心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回避不受欢迎的措

施。这是一个判断正确与否的问题。

根据你来信的提法,我感到有必要把这样一点纪录在案,就是:这届政府就职以来的十二个月里,你在执行我们共同拟定的财政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得到内阁的充分支持。

就在几天以前,当预算数字提到我们面前时,内阁就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使政府的开支实际上与去年相同。原先我们见到的第一次提出来的数字,确实比去年高得多。但是,这些增加的数字中,很多是不可避免的,部分是因为在学儿童的人数增多了,中学和大学教育扩充了;部分也因为要维持数目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的生活。但是,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内阁终于把这个超过数字降低到比政府整个日常开支的百分之一还要小。此外,我们还同意在来年重新审查我们的政策以便为民用开支中某些项目规定更重大的控制措施,不过这只能作为一个长期问题来处理。

因此,我不能承认在内阁其他成员与你之间存在什么原则性的分歧。辞职总是一个难于作出的决定。依我看,只有因为原则问题提出辞职才是正确的。我还必须补充一句,就是:你在现在这个时候辞职将无助于、反而可能有害于维护我们大家一直在设法维护的那些利益。 372

我相信,去年我们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措施,正在开始结出果实。政府成员正在团结起来坚决把这些政策贯彻执行到底。因此,你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离开我们,我感到很遗憾。

财政部的经济大臣奈杰尔·伯奇和财务大臣伊诺克·鲍威尔也辞去了他们的职务。在我的正式复信里,我向他们提到了我给他们首长的详细复信。在给奈杰尔的信里,我加了这样几句话:

我不能接受你的信里所暗示的看法,即内阁成员之所以未能接受你们所建议的开支削减数字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选民的反应。这个政府已经证明了它是不怕不得人心的。

这两人虽然名义上是财政大臣的部属,但是,照我看来,他们通过他们强力的劝告和影响,要对导致财政大臣采取这个最后步骤负大部分责任。虽然我个人对他们的才能十分钦佩,但是我不

信任他们的判断,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时,采取了不适宜的狂热态度。尽管他们不见得真正准备殉道,但至少是不想规避这种事情,而且看来是在追求和欣赏殉道者这顶桂冠。

内阁 11 点钟开会的时候,我全文念了财政大臣的来信,并且告诉我的同事们说我打算作一个详细的答复,而且我希望是个有说服力的答复。由于多罗西和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去英联邦各国,所以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实在有点忙不过来。

373 内阁会议以后,我请现任农业大臣希斯科特·艾默里担任财政大臣。他相当犹豫,但还是接受了。到下午 6 点(我觐见女王的时候)这个职位就补上了;还有,黑尔调任农业大臣(从国防部);索姆斯调到国防部;杰克·西蒙任财政部财务大臣——没有任命经济大臣,不过,由莫德林(现任主计大臣)协办财政部的经济工作。这样,就只剩下几个较低级的职位需要补充。除了用一个钟头(3 点至 4 点)听取职工大会代表团关于氢弹的意见之外……我们还写好了给桑尼克罗夫特的复信。完成这样多的工作,要归功于大家给我的帮助。巴特勒一直工作很出色。主任督导员表现极好。弗雷迪·毕晓普工作迅速,效率很高。诺尔曼·布鲁克则一直是我得力的助手。我带着新大臣的名单去请女王批准——还有两封信的全文。女王表示完全赞同。

从皇宫回来以后,多罗西和我为英联邦各国的高级专员及其夫人举行了酒会。1 月 7 日

我们按照计划……从伦敦机场启程。我深信我遵循的方针是正确的。几乎全部内阁成员都来送行。显然,他们是以此来表示对我的敬意和忠诚。<sup>①</sup>

在接见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和报界记者时,我就英联邦之行发表了一个事先仔细准备好的简短声明。其中我提到我们在国内事务上“最近的某些困难”“使我有点不安”,但是,“我认为最好就是在解决了这些小小的国内困难后,马上把视野转到更广阔的英

<sup>①</sup> 1958 年 1 月 7 日。

联邦”。我意识到这似乎有点把这次危机缩小了，但是，有一个信念支持着我，就是：我们已经差不多渡过难关了。英镑对美元的比值已经达到 1956 年 5 月以来的最高点。财政部关于这一财政年度前九个月情况的报告表明，政府的开支只比上一年度稍多一点，而总收入却高速度地增加。包括煤炭工业在内的各工业部门，看来都在令人满意地向前发展，物价也比较稳定。说实在的，我已经在怀疑我们的通货是不是紧缩得过头了，因此，开始考虑在时机到来时最好用什么办法来放松一下紧缩通货的措施。

两个星期以后，在从新加坡飞往新西兰的途中，我仍然感到很乐观。

巴特勒、主任督导员和所有其他人看来事情办得都很不错。当然，党内也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和混乱。报界当然也充分利用这轰动一时的辞职事件。但是看了所接到的报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麻烦倒在于一般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位职责重大的大臣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情而辞职（正象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sup>①</sup> 374

这个估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幸运的是，我们个人之间并没有长期分裂。在我卸去首相职务之前，我很高兴能够把桑尼克罗夫特和鲍威尔两人都吸收到政府里来。

我还收到另外一个使我十分欣慰的电报。危机期间贸易大臣戴维·埃克尔斯正在国外，我把事情通知了他，他立即表示支持我。几天以后，他又补充说：“你一定愿意知道，你决定如期动身，给了美国银行家们以深刻的印象，使他们保持了对英镑的信心。”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毕竟相当折磨人，现在我终于象别的度假人一样，暂时把忧虑撇在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旅行的快乐。

---

<sup>①</sup> 1958 年 1 月 19 日。



## 第十二章 英联邦之行

虽然我曾经以各种不同身份出席过多次英联邦总理会议，但是1957年6月26日至7月5日举行的那一次是我荣幸地作为联合王国的首相负责主持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非常及时。以1956年年底发生的事件为顶点的中东麻烦，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联邦遇到的头一个重大危机，而且它是发生在旧体制正经历着急剧变化的时候。英国殖民者所建立和统治的各自治领，已经取得了它们的独立。除了大家称之为旧英联邦的几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之外，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最近又作为各自独立的国家参加进来。不论在非洲或亚洲，很快都会有另外一些地区将取得类似的法律地位。加纳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接纳进来的。

因此，英联邦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在一个转折时期中突然面临中东的冲突的。它们大致说来对我们这个老大国家的政策表示了令人欣慰的支持，或者说，最低限度也表示了谅解。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曾经带头试图说服纳赛尔接受某种合理的解决方案。在霍利约克之前担任新西兰总理的西德尼·霍兰，也表现得同样积极。加拿大通过它的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在联合国里起了重要和有益的作用。南非意识到运河的重要性，给了我们以一切必需的协助。印度和巴基斯坦尽管很自然地有所疑虑，但是还是表现出难能的同情态度。尼赫鲁和查希德·苏拉瓦底，不论对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决定是否明智抱什么样的看法，毕竟都没有出来责备我们。尽管如此，会议举行时，我却并非毫无顾虑的。不管怎么

说,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六个月,大家难免有些别的考虑。

除了正式讨论以外,我有机会与会议的大部分成员作私下谈话。6月28日上午的会议结束前,我需要对外交政策的一般性讨论作出总结,这时,我发现不同意见尽管不少,但是要真正把它们协调起来,也并不怎么困难。“为了使我们的真正朋友坚定不移,我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方针;而且我认为,尽管尼赫鲁并不[完全]同意,我这样做的结果也没有冒犯了印度。”<sup>①</sup>

举行了例行的大小宴会和文娱招待活动,高潮是女王的正式宴会。根据女王自己高兴地下达的指示,破例第一次在温莎宫举行宴会。这次英联邦元首对联邦各国领导人的欢迎,场面壮丽动人。我还很庆幸能够利用两个周末的机会,在伯奇格罗夫的私宅和首相别墅同许多位总理进行了谈话。

7月2日,

多罗西和我在星期二举行了一次大型晚宴——六十人。丘吉尔也出席了,确实为这晚的聚会增添了光彩。然后是一个招待会。在各次全体会议之间,我们生活在一连串大小宴会和招待会之中——还有私下会谈。最后这一项效果最显著。<sup>②</sup>

7月5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公报,困难比我原先预料的要小。实际上也没有人愿意多谈过去的事情,所有的国家想得更多的是未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前途。

整个星期每天上午和晚上都开会——而且总的说来颇为顺利。讨论一直很坦率。存在不少分歧意见——但是也有大量共同一致的看法。<sup>③</sup>

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新提出来的问题。英国的一些主要有关大臣比较详尽地提出了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区的

<sup>①</sup> 1957年6月28日。

<sup>②③</sup> 1957年7月4日。

问题。在考虑这个在某种程度上颇为惊人的新计划时，各国的总理和部长们都表现出“同情态度和通情达理——当然也有些疑虑。”<sup>①</sup>加拿大新总理迪芬贝克邀请英联邦各国的财政部长在12月到渥太华会面，“以便筹备一次英联邦财政经济会议”，这也许是会议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场纷扰了。迪芬贝克的党曾经多年在野，到最近一次选举才获胜重新执政，所以他是第一次参加总理会议。他是几乎在竞选后就马上到这里来的，因此，似乎

还没有从竞选的习惯中恢复过来。他为人善良，诚恳而坚决，但是恐怕对与英联邦各国如何相处，哪些事办得到，哪些事办不到，还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sup>②</sup>

（也许这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影响有某些关系。）有人怀疑这样做有希望过高而结果却落空的危险。孟席斯就以他惯常的直率态度提出了这个看法。

如果确实需要开这样一个经济会议，就必须事先进行大量专门准备工作才能收效。要是这样一个会被说成十分重要，结果却失败了，那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个看法当然很正确，但是，可怜的迪芬贝克先生开始时有些困惑不解，然后感到难过，最后干脆发起脾气来。）<sup>③</sup>

不过，终于没费很大功夫便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样一个提法：“加拿大总理邀请英联邦各国财政部长今年到渥太华（在参加国际银行会议以后）举行他们的例会。”当然，这个提法并不符合迪芬贝克先生原先的希望，不过他看来愉快多了，接受了这个妥协方案。事情过后，他热情地感谢我对他的帮助。<sup>④</sup>

378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对加纳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联合王国在执行其鼓励附属领土立宪发展的政策上取得进展的又一个实际证据”。至于国际关系，会议上出现过某些不

① 1957年7月4日。

②③④ 1957年7月5日。

同的观点,但是,在“态度和目的上有广泛的相同点”。公报还提到需要加强联合国,并且表示“对匈牙利的悲惨事件感到严重不安”。在经济问题上,首先提到需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并且重视推动各国内部和英镑区的经济发展,然后,按照前述商定的提法接受了加拿大总理关于秋天在渥太华举行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的建议。

虽然使用的只是适合这类宣言的官样词句,也已经足以向世界表明:最近中东事件给我们造成的创伤,已经令人满意地愈合了。平常不轻易表示嘉许的《泰晤士报》,7月6日也对会议的结果作了下述总结:

这次会议对麦克米伦先生本人,是一次成功。昨天人们对他的赞扬,无疑是出自真心的。苏伊士事件在某些方面造成的不信任的乌云,虽然早晚总会自行消散,但是,上星期却一下子全被刮跑了。

会议参加者分手以后,我深入地回顾了我所听到和学到的一切。从现在来预测,英联邦的前途将如何呢?在立宪方面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加入,标志着原来那个全是白人的英联邦已经结束。接下去将是这个殖民帝国的逐步解体,大大小小独立国家的数目将迅速增加,并陆续成为联邦的正式成员。这种情况不但将使这整个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而且也必然改变着联邦的部长级会议的条件和形式。在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参加以后,又增加了加纳。对克瓦米·恩克鲁玛先生作为加纳的首任总理加入我们的队伍表示欢迎,实际上成了我在会议开幕时的头一项职责。还有另外一些人正在会场入口外等待着。罗伊·韦伦斯基爵士被邀作为新近建立的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联邦的代表列席会议。我完全懂得,不论这类领土未来的命运如何,世界各个地区都将会会有大大小小的国家,包括幅员辽阔的尼日利亚,一直到小小的岛国塞浦路斯,早晚都将派遣它们的政府首脑前来

参加这类集会。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衍变，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革命性的衍变。古老的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秩序若干世代以来给地球上大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带来了利益无穷的秩序和良好政府，使当地人民得以和平地从事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现在这个帝国正被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新体制所代替。虽然这种承认其成员的主权的做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实行了<sup>①</sup>，但是，当英联邦成员还只限于那些英国血统的民族时，变化看来还是比较小的。现在，既然遍及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都出现了独立的国家，我们就将开始一项前所未有的新事业，一系列难以处理的新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过去旧的英联邦和帝国，曾经能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首先是在防务上维持一种强烈的向心力，现在却将开始出现一种同样强烈的离心力。此外，在一片独立的醉人气氛中，原来把旧的组织维系起来的共同忠于英王的那样一种神秘感，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加以保持，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促进这种发展是历届英国政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我就任首相的这段时期里，这种发展又加快了步伐，但是现在，这种缓慢流动、逐步变化的小溪已经汇合成一条湍急的河流，它的巨浪不久也可能冲决两旁的堤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找出一个统一的原则在人类可以各逞其能的情况下使英联邦成为一个真正的实体而不是虚有其名呢？我理所当然地对可能出现的危险要有所考虑。但是，我感到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引导这些各不相同的力量为一个共同的信念而斗争。

会议开幕前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前来探望我。“他心情十分愉快，而且风度富于魅力”。<sup>②</sup>他对能够作为第一个被接纳进这样独

<sup>①</sup> 参阅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 112 页。

<sup>②</sup> 1957 年 6 月 24 日。

特的政治家集会的非洲人，自然感到自豪，甚至是热情满怀。当然，他考虑的主要还是他本国的问题和需要，不过事后证明，他也很愿意充分参与讨论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

锡兰总理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由一位年迈而有经验的部长 M. W. H. 德·西尔瓦作代表。锡兰政府首脑不能亲自前来，肯定是因为他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的一些困难。德·西尔瓦向我说明了情况：“总理阁下正忙于语言问题的严重争端，防止其发展为内战。”<sup>①</sup>

同样，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正式会议上也赤裸裸地暴露出来。7月5日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尼赫鲁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

他看起来比较轻松了。他喜欢个别谈话，在这种场合里他谈起来比较随便，不那么拘谨。他又催促我在圣诞节后到印度去。<sup>②</sup>

正是在他的这次邀请以及孟席斯提出要我访问澳大利亚的同样迫切的邀请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可以在新年期间到英联邦各国去走一遭。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在国内麻烦如此之多的时候冒险出国去五六个星期，在英国的历任首相中将是破天荒第一个敢于这样做的。

午餐以后，尼赫鲁和我坐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这是一个可爱的夏日，算是英国最好的天气了，特别是因为这样的气候太少见，所以使人格外高兴。在这个有围墙的宁静的花园里，避开了街上车辆的嘈杂声，坐在一棵圣栎的树荫下，我们简直以为自己正在一所乡村牧师的宅院里，或者是在主教的恬静的管区中。

过不了一会，苏拉瓦底（巴基斯坦总理）也来了。因为他们两位这 381  
时候关系正很紧张，从来不打照面——在印度或者伦敦都是这样——这

① 1957年6月25日。

② 1957年7月5日。

可是有点风险。但是，谈话还是很顺利——延续有一个小时。<sup>①</sup>

不管怎么说，英联邦作为一个整体，也许能起点作用。尤其是这里，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首都，远离联合国狂热的走廊，我们总可以起点有益的作用。在这里举行的这种集会，也许是一个好机会，当然，不是说可以一争高下，而是可以做点斡旋调解的工作。

造成旧印度帝国的这两个继承国分裂的原因是两个重大争端。第一个是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剧烈斗争；同样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有关印度河水力资源的争议。这次会议不管成功与否，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开端，作为一种有成效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各联邦潜在的对英国的敬重，甚或可以说是热爱英国的心情，可能会起些好作用。

我只抱一个希望，就是他们能在印度河河水问题上达成某种解决办法，并且双方都同意接受国际银行的建议。只要这个问题得到澄清，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就比较容易了。<sup>②</sup>

第一个问题终于在1960年达成了协议，那年9月签订了印度河条约，第二年年初条约批准了。在第二个问题上，继续进行长期而激烈的争吵，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调解都遭到拒绝，后来命定地发展成一场两个英联邦成员国之间公开冲突的可怕灾难。尽管在战争发生之前双方都遵照文明国家的传统，严肃地表示自己真诚向往和平，但是，这件事情毕竟有力地提醒人们：在失去英国的统治以后，次大陆的团结业已瓦解。

不久，我就决定接受各国在会议上向我发出的邀请，而且决定旅行的范围，除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还包括巴基斯坦和新加坡。

382 就象我1月7日在伦敦机场说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听一听，看一看，学习学习，是去会晤许多老朋友和结识更多新朋友，并且

<sup>①②</sup> 1957年7月5日。

通过公开讲话和一系列非正式会谈来促进英联邦各国之间的合作与谅解。我还补充说：

这是一个性质相当独特的国家共同体，在当今纷乱的世界里，它也许应该起一种特殊的作用。它的多样性，使它具有一种别的更为紧密的联盟或组织所没有的权威。此外，我准备带去善意和友谊的信息。

在结束讲话时，我宣读了临上飞机才收到的一封激动人心的电报，它是“还在世的最伟大的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发来的。电文说：“在你踏上访问我们英联邦朋友的长途旅程时，我向你表示支持和最美好的祝愿。”

当时，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是我可以表达的，这就是：英联邦各国都维护我们大家所公认的指导社会政治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我在1月28日结束对新西兰的访问时发表的告别讲话中曾试图加以概括：

我们这个独特的联合，是以对人类自由最根本的一些原则和制度的共同信念为基础的。我们都崇尚忍让，相信我们议会民主制度中相互有予有得的原则。我们相信对每个人都要公平，我们相信良心抉择的自由，我们相信个人自由，相信在法律范围内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而且我们相信国家的目的就是使每个人能够生活在和平与自由之中。这些就是我们的国家制度赖以建立的原则。

必须承认，不久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原来以为在我国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议会政府制度在那些新近出现的国家里也能经受住困难和压力而保持下去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背弃议会制度的现象看成是这些国家在成长过程中的痛苦。同样地，这时英联邦中虽然有一个国家，就是印度，在东西方斗争中采取形式上的中立立场，拒绝参加世界各大地区都分别加入的各种军事联盟，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就是：英联邦中的所有“不结盟”国家将抵御共产主义国家（不论是俄国还



是中国)在这些国家中危险的推进。2月3日在悉尼的演说中,我就比较详细地谈到防务问题:

我们在全世界有一批地区性的防务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美澳新共同安全条约组织和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但是,我们所受到的威胁不完全是——甚至可以说主要并不是——军事上的。政治压力和经济渗透的危险甚至更为严重。因此,在这方面,自由世界的所有国际组织,都有它们各自应起的作用。这些组织中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英联邦,它以自由原则为基础,而我们的目的正是捍卫这个自由原则。请让我提醒你们一下……我们英联邦是怎样与这些国际组织联系起来的:我们当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加拿大和联合王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巴基斯坦和联合王国参加了巴格达条约。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和联合王国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美澳新条约组织的成员。加拿大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中派有观察员。最后还有,英联邦十个独立国家中有不下八个是科伦坡计划的成员。……如果我们把世界设想为一个大圆周,中心是我们的英联邦俱乐部,那么,我们就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负有一种这样的责任,就是保证我们所共同信守和珍惜并通过我们自己这个英联邦的联合加以发展的那些原则和理想能够从这个中心向外传播,扩展到处于外围的所有与英联邦中的个别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有联系的国家中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承认每一个政府都有权自由作出决定,因此,我2月5日在墨尔本宣布说:

我们中有的国家不愿意加入任何军事联盟……但是,我敢肯定,它们这样做绝不是因为同情共产主义学说,而是因为它们认为,任何军事集团或军事联盟,即使其目的在于防御,也都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尊重这种观点。

384 不管怎么说,我在整个旅行中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描绘出英联邦远大的前景,使英联邦中的新老国家都能在回顾过去时感到自

豪，同时又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我们夫妇现在已经踏上一个将会十分愉快和有趣的旅程。陪同我们前往的是一批出色的随员，包括往常的秘书班子诺尔曼·布鲁克爵士、莫利斯·詹姆斯（英联邦事务部次官）、哈罗德·伊万斯（公共关系首席顾问）和两名私人秘书尼尔·凯恩克罗斯和约翰·温德姆。我们一共飞行了一百二十小时，行程达三万三千英里，另外，在陆地上还旅行了一千五百英里。有四个夜晚在飞机上度过，其他三十四晚上在各国首都停留。我们在1958年1月7日动身，2月14日才回到国内。

我们首先在新德里着陆，在那里度过了安排得满满的四天。其中，专门用来和总理私下会谈的时间，当然过得很有意思。而且，尼赫鲁显然是想不仅在私人接待中表现出他的殷勤好客，而且在公开场合也显示出对我们的好感和热情。

他家里完全按照印度大住宅的式样布置，洋溢着传统的舒适感，这种式样是英国人也曾仿照的。这是过去英军总司令住的房子。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亲自操持，负责照顾我夫人，想方设法使她过得愉快和舒适。他们照英国规矩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每天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看来很适合唯一的另外一位客人的口味，他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政府首脑阿赫米德·苏加诺总统。我有一个印象，似乎尼赫鲁并不怎么喜欢这只从荷兰帝国的废墟里飞腾起来的鲜艳夺目的凤凰。他穿的那身奇装异服——带有小银星的蓝色丝绒制服，显然是兼采小方特勒罗伊勋爵和利勃莱斯两人的制服的特点设计的——与主人的简朴衣着恰成奇妙的对照。加上，他习惯于到处带着他那根象元帅棒似的手杖（吃饭时便把它放在餐具柜上）。我可以看出，这一切尼赫鲁都不怎么欣赏。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见到这位杰出的人物。他善于言谈，知道的事情很多。

尼赫鲁自始至终用最亲切隆重的礼节来接待我们。

385

我们就住在他家里——而不是住在从前作政府大厦用的总统府。这是很特殊的礼遇。我们有两个美好的晚上在一块进行平静的谈话，特别是最后那个晚上，……他出席了我们高级专员举行的宴会——这也是很少有的。他有三次和我同车来回——包括到达和离开当地的时候（这些都是最不寻常的）。①

在红堡举行的“市民欢迎会”，场面极为壮观。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好几万群众向我们热情地欢呼。这确实是访问中的最精采场面。古堡装饰得五彩缤纷，成千上万看上去很欢乐的人群向你鼓掌欢呼，怎能不使你感动。尼赫鲁致了盛情的欢迎词，我也放弃了原来准备好的稿子，致了一个即席答词。

在总督府度过的那个晚上，也令人神往。当韦维尔勋爵住在这幢房子的最后一段时期，我曾经访问过这里。② 现在我又以英国首相的身份回到这座曾经是英国统治下印度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宏伟的帝国宫来，的确是个奇遇。所有的礼节、仪式都按照旧日的那一套，使用的也是从前的那些带有手把和图案的磁制杯盘，墙上挂着历任总督的画像。我夫人的祖父兰斯多恩勋爵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在这里当过总督，这回她正好坐在她祖父画像的对面。警卫和仆役全都穿着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古老而独特的服装。

所有的排场一如往日。我们还当了在总督府花园举行的一次露天招待会的主宾——这个招待会也是古色古香的，有穿上华丽制服的旧总督卫队、喇叭手、军事幕僚，还有随从副官[都是全副武装]。③

有一个下午，我们到农村去参观了一些“印度村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上街跳舞、唱歌，对我的演说欢呼喝采”。④ 欢迎之热烈，使我们感到惊奇，连印度的部长们和他们的同事也有点料想不到；

① 1958年1月19日。

② 参阅本书第三卷《时来运转》，原书第245页。

③④ 1958年1月19日。

可是这肯定是出自真心的。“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欢迎的场面。这绝不可能是经过‘授意’的。”<sup>①</sup>

尼赫鲁在伦敦催促我到印度来时,曾经答应要很好地招待我一番,结果盛况甚至超过我的期待。就算那个无法回避的记者招待会,尽管也提出了一些难于作答的问题,但是特点还是十分友好,而且充满幽默气氛。和尼赫鲁的私人会谈是以一种回忆的情调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他在一篇公开讲演里,用了下列词句来总结我们的会谈:

诚然,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做到了互相了解,并且以一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问题。正是这种友好的态度是真正重要的,而英联邦这个组织之所以特别可贵,就在于它鼓励这样一种友好的联系。

除了这些涉及范围较广的会谈内容以外,我还记录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另外两件事情:

奇妙地集先进思想和旧式观念于一身的尼赫鲁,悲叹印度的美国化。他说他很不得人心,因为他不许电台尽是播送美国的跳舞音乐和哼吟歌曲,广播节目必须大部分是印度的传统音乐。<sup>②</sup>

另外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是:

在这次会谈中,他把他访问中国的情况告诉了我。他有一种自己的看法,认为中俄两国在精神上、甚至在传统上并不是朋友,一直有种种磨擦,所以早晚可能会分裂。<sup>③</sup>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多大的进展。尼赫鲁

说,和巴基斯坦没法打交道——他们的政府总是维持不了几个月,他们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什么协议也没人作主决定——他实际上对此根本不抱希望。我没有再追问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卷入人所共知的克

① 1958年1月19日。

②③ 1958年1月8日。

什米尔争端。<sup>①</sup>

387 当时我就认为尼赫鲁有些低估印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而产生的经济问题。他好象一心只相信“五年计划”，抱着一种在我看来没有多大根据的乐观态度。不过，这个计划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当然不难理解。

从尼赫鲁的话里我很清楚，五年计划之所以绝对必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执行几个五年计划是今天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必须具备的特点。他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工业上都面对着共产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印度无疑正在增大。他必须显示出一种和俄国人或者中国人一样良好的形象——也许是特别要与中国人媲美，因为中国的社会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印度。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大会党目前所处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建立了自治政府以后的爱尔兰党——不能光是靠领导过革命这一点点资本。同样，辉格党也不能无止境地靠对激进主义的恐惧而延续生命。五年计划是国民大会党向人民抛出的新的政治诱惑物的一部分。由于防止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们实现五年计划，并且鼓励美国人和德国人也这样做。五年计划如果遭到严重挫折，我们将不仅在商业上受损失，政治上也肯定对我们不利。<sup>②</sup>

我和包括莫拉基·德赛在内的印度几位经济方面的主要部长们进行了几次很能说明问题的会谈。此外，诺尔曼·布鲁克也和许多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会谈。这些会谈都很有成效，有助于弄清一些主要问题和明确援助的具体内容。

至于国际问题，大家都关心英国与俄国的关系以及我最近与布尔加宁的通信。布尔加宁12月份和1月份又给我来了两封长信，出现了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某种可能性，因此，需要再给他写封信。我这时认为，如果我本人建议前往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商讨一下这样一次会议的议程和程序，也许有可能取得某些进展。因

---

① 1958年1月11日。

② 1958年1月8日。

此，我起草了一个电报供内阁考虑。这个计划虽然一点没有获得国内阁僚们的赞同，但是却成为我在第二年实现的另一项计划的基础。对布尔加宁的来信，特别是我还没有作答的那最后两封信，印度人民似乎很感兴趣，这是从印度各界人士就这方面向我提出的问题之多可以看出来的。 388

我们的四天访问过得太快了，排满了丰富多采的活动，有些场合甚至使人十分激动。只能逗留这样短的时间，实在有点遗憾。尼赫鲁似乎对我们的离去从心里感到难过，他给我们的行囊装上了各种各样的礼物。

1月12日我们动身前往巴基斯坦。在飞机上，我记下了几点印象：

第一，印度独立十年以后的情况。整个国家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政府也是这样……他们在政治实践方面学会了不少东西。过去，他们多年处于反对党地位——除了通过争论或暴力，或者兼用两者来反对政府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干。现在，他们需要应付各种难于处理的问题了，象宗教冲突、语言纠纷、工会中的共产主义威胁、行政机关的贪污，等等，等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国家之所以总算还能治理下来，要归功于英国人。东印度公司的组织系统，以及后来的[印度文官制度]……建立起一整套政府机构；这套机构大体上保留了下来。

此外，因为印度文官系统中英国人所占的比重很小，原来就有一批经过高级训练的(印度籍)行政官，这批人现成地可以为国民大会党的政府服务。

法律制度，不论是民事或刑事，都承袭自英国统治时代。整个司法制度也是这样。军队是英国式的，而且以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保留着传统的团队编制。议会和“民主”制度跟我们相同——日常生活方式也大部分一样。既然斗争的惨痛日子已经过去，甚至国民大会党人也开始怀念起所有这些事物了。英国人采取的“转移权力”的方式，与法国人及荷兰人所采取的方式是个鲜明的对照。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尼赫鲁的无上权威。<sup>①</sup>

尼赫鲁确实支配着一切。虽然有许多困难威胁着他，但是对未来他似乎很有信心。不过，我认为他的思想相当枯燥单调。

389 他的演说(或者说是独白)是……开了好多遍的留声机唱片——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俄国新的共产主义和它反对战争，等等。但是，他是能干的，风度潇洒，很有教养，而且坚决果断——这些都是领袖人物的伟大品质。

我的第三个感觉是，英国人拥有强有力的地位——尤其是生意人。他们得人喜欢，很受信任。现在，他们为了作买卖，需要进行些竞争了，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坏处。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在旧政权下还要高，因为旧政权是由军队和文官掌握的。<sup>②</sup>

几天以后我到达新加坡时，收到我们驻德里的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一封来信。他这个观察家当然偏向我，但还是有他自己的识别力的。他用热情的词句，也许有点过甚其词地写道：

你和夫人对德里的访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你给尼赫鲁和他的内阁僚们以及所有和你见过面的各界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你的超凡品质，你的诚恳和友善，使各地聚集起来欢迎你的普通印度人深为感动。我原来就认为你的访问一定会产生重大效果，现在应该说，访问的非凡成果完全超过我原先的预料……

很多显要人物到这里访问，都只留下短暂的、一时的印象；人们原来以为你的访问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些年来德里接待过为数众多的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和其他人士，老百姓已经习惯于在他们到来时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在另外一批人前来时就把前一批人忘掉了。我回来以后高兴地了解到，你留下的印象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持久的。每天都有人向我和高级专员公署的同事们谈到你的访问，告诉我们说他们多么喜欢你和你夫人，多么欣赏你的演说和声明，以及这次访问对联合王国

---

①② 1958年1月19日。

政府与印度政府的关系将有多么重大的促进。

这些话不管是否完全真实，对我总是一种鼓励，对此，不仅在当时，而且现在我都十分感激。

卡拉奇没有象德里那样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来表达人民的心意，但是，就如整个旅行中其他一些事实所充分说明的，这种表面上的冷淡绝不意味着缺乏友好的感情。直接接触和个别谈话比在德里更为轻松随便。因为整个印度的官方社会，包括尼赫鲁在内，都是比较严肃和高度知识化的；在巴基斯坦，一切事情都没有那样认真和准确。我不由得想起，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到达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很有点象离开伦敦的汉姆斯达德选区或北牛津前往各郡县，情况自然有所区别。

1月12日星期天上午，总理马利克·费罗兹汗·努恩和他的主要阁员前来欢迎我们。在机场上举行了例行的仪式以后，我们乘车到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官邸。他以隆重的礼节接待我们。他和他那位出身波斯贵族的高雅庄重的夫人，都是很令人喜爱的主人。

旧印度帝国的两个部分，在许多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有一点就是：印度在尼赫鲁为首的国民大会党领导下政治局势比较稳定，而巴基斯坦的政府却变动频繁，立宪制度处于危险中，这一点总统并不向我隐讳。

巴基斯坦是贫穷的，政治上不稳定，处于宗教动乱之中（毛拉们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权力，实际上权力却很大），缺乏“政治管理”人才——不象印度那样有悠久的文官制度的传统，而且贪污盛行。<sup>①</sup>

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特别把总理努恩排除在最后一项批评之外。努恩曾经是英国统治下印度的一位杰出的文官，最近刚取代苏拉瓦底。

<sup>①</sup> 1958年1月19日。



局势中稳定的因素之一是军队。空军和海军也是可靠的。比较先进和富饶的东巴基斯坦，正在滑向共产主义——或者说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正统和严峻的旧穆斯林联盟受到毛拉们的支持，但是拥护的人愈来愈少。三军——特别是陆军——非常好。三个军种我都看了一下。军容整齐，军官们（特别是空军）年青而聪慧。<sup>①</sup>

这时候我当然还预料不到总统的事业竟然那样短暂，那么快就发生政变，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夺取了控制权，结束了议会制度。不过，当时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民主制度还缺乏坚实的基础，难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卡拉奇举行了通常的招待活动，有宴会，有讲话。在巴基斯坦，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坦率地大谈作为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成员国之一的巴基斯坦在防务上的作用，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强调巴基斯坦陆海空三军的英国传统以及英国与巴基斯坦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继续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当然，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所提问题水平之高，以及他们对英联邦和世界事务所表现的浓厚兴趣，给我印象很深。头两天还参观了航空表演，出席了在军官食堂举行的一次午宴，会见了联合王国商业界人士，还由海军总司令和一批海军高级军官陪同参观了海港。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到两位伟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列雅格特·阿里·汗的墓前献花圈，表达我的敬意。他们两位以各自的方式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真纳如果还在世，可能会作为这个国家的创建人而享有类似尼赫鲁那样的权威，把巴基斯坦团结起来。而列雅格特·阿里·汗要是能逃过刺客的子弹，也许正领导着这个国家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他肯定不会因为品德低劣而使立宪政府声名狼藉。

除了这些礼节性往来之外，我有不少时间与总统本人和总理

---

<sup>①</sup> 1958年1月19日。

努恩进行私人谈话。巴基斯坦与印度有一点显著的区别。在印度，想吸引它的领导人物来讨论印巴分歧是很困难的，连尼赫鲁也是这样；可是在巴基斯坦，不论总统或者部长们，似乎除了印巴争端之外很少考虑或谈论别的事情。当然，这一点正反映出巴基斯坦尖锐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因此，我们的会谈除了略为讨论了一下棉花进口和经济援助计划以外，全部时间几乎全 392 被克什米尔、印度河水和武器供应等问题占去了。在第一个问题上，总理看来对取得解决不抱多大的希望。他说：“强者和弱者之间直接谈判是什么协议也达不成的。”在印度河河水问题上，似乎取得最终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防务，巴基斯坦想要更多的武器，特别是坦克和轰炸机。我一方面答应考虑这些要求，一方面又指出，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和巴基斯坦只要愿意，都可以向联合王国的私人企业购买武器，而我们作为政府来说，则不愿意加剧军备竞赛。对此，努恩忧愁地回答说：“印度的意图不良。”亲眼看到巴基斯坦领导人的痛苦情形，实在令人难过。分治对次大陆的确是个可怕的打击。

我们这次短暂访问最具特色的是到西北边境的旅行。1月14日一早就动身，乘我们的英航飞机到白沙瓦，在晴朗的天空中欣赏了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色。上午11点钟坐汽车出发到开伯尔隘口，途中停下来观看第四骑兵旅的坦克表演。在部落地区的进口扎姆拉德堡，我们受到远道前来的许多部落头人的欢迎，并且接受了他们赠送的传统礼物绵羊（他们还送了我一杆本地制造的步枪）。然后，我们驰过开伯尔隘口，到达阿富汗边境。这确实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这里是历代经常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古战场。看到记载在那里的几乎所有曾经在这个伟大隘口上作过战受过苦的英国团队的名字，使我们心情特别激动。这的确是一个交织着悲剧和胜利的故事。对于那些熟悉我们伟大帝国的历史的人说

来,这隘口就象一块圣地。

我们在开伯尔步枪队的军官食堂里吃午饭。我高兴地看到自从1947年以来,这里的一切并没有改变——团队银器,已故英国军官的画像,甚至那个铜管乐队,都还在。

393 这里的一切和过去完全一样——开伯尔步枪队;勋章;团队司令部;马球比赛,甚至狩猎会。部落人民全都武装起来;一些全副武装的部落头人接受了我们的检阅。但是他们比过去守规矩多了,很多人的儿子进了白沙瓦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边境部落反对阿富汗阴谋的一种爱国主义表现。<sup>①</sup>

虽然我十分喜欢这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但是在离开的时候不由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表上它的地位似乎很强固,战斗部队身强力壮,军官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国家机构非常脆弱。总统当然还是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但是他对宪法原则的忠诚,似乎不但没有加强他的地位,反而使他受到束缚。就在几个月以后,由于事态恶化,伊斯坎德尔·米尔扎被迫让位给一个废除了宪法、靠戒严法来统治的后继者。沿袭下来的议会制度,在英联邦国家中还是第一次遭到这样的破坏。

2月16日上午八时半我们离开卡拉奇,下午两点半抵达卡通纳雅克航空港,受到锡兰总理斯·韦·里·迪·班达拉奈克和部长们的欢迎。我们这一长串五彩缤纷的车队从机场驶向城内,一路上穿过喜笑欢腾和热情洋溢的人群。我以前还很少见过这样欢乐的面孔。的确,这两天我们在锡兰就象王室巡幸似的。不管欢迎人群的动机如何,反正他们知道这一定是位很尊贵的客人,所以抓住机会微笑一下,热情地欢呼一番,其中许多人也许并不清楚来者究竟是谁,代表的是哪个国家。

多罗西和我,以及随行的部分人员,在总督奥利弗·古涅狄莱

---

<sup>①</sup> 1958年1月19日。

克爵士家中作客。

锡兰还没有宣布为共和国,因此仍然有一位总督。我们住得很舒适的那幢美丽和古色古香的房子(原先是荷兰人的),就是总督的官邸。欧洲人向他行鞠躬礼或弯膝礼——有些锡兰人也这样做。他的工作很出色。<sup>①</sup>

奥利弗爵士是位精明强干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锡兰的情况十分熟悉。虽然他的集团、或者说政党,已经失去优势,但他的影响仍然很大。他向我谈到现任总理怎样为他十分成功地把佛教僧侣们动员起来。但是,他认为自己正处于危险中,僧侣可能不久 394 又会转过来反对他。

锡兰最近刚遭受严重的水灾,原因是居民迄今用水所主要依靠的一些历史性的“蓄水池”暴涨,造成泛滥。幸亏皇家海空军及时大力给予帮助。此外,陆军部队也供应了药品和其他物资。我利用1月17日锡兰议会为我举行晚宴的机会,在演说里答应给他们进一步的援助,包括短期和长期的援助。这次活动是议会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的,因此,我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向主人们说话。在指出任何民主政府制度都必须以自由原则为基础以后,我补充了这样几句话:

我们大家一致接受的这些原则,现在正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受到挑战。这一点,你们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先生最近在谈到把英联邦各成员国联系在一起这一极其重要的传统纽带时,曾经作了很透彻的说明。

这天的下午和晚上,我和总理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世界事务,特别是对与俄国进行某种有成果的谈判是否可能的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还详细地谈了中国问题,告诉我说他和周恩来进行过多次私人谈话。照班达拉奈克的想法,这位中国领导人虽然强烈地不满“西方对中国的排斥”,但是,他不会以承认

<sup>①</sup> 1958年1月19日。

国民党人对福摩萨的占领为代价来换取联合国的席位。班达拉奈克对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十分担心。

他认为苏加诺由于没有坚决对付极端主义分子,结果使自己陷入了麻烦。意味深长的是,企图谋害他的竟然是些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很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比较温和的分子劝告苏加诺离开一个时期,这就是他目前出国旅行的真正原因。<sup>①</sup>

395 从总理所谈可以明显看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彼此互不欣赏。苏加诺不管怎么华而不实,但是个行动主义者;而班达拉奈克从根本上说却是个感情主义者——一位是武人,一位是文人。

当我们接下去谈经济问题时,

我告诉他说,他把海港和港口公司之类……“社会主义化”或者“国有化”,还不致于有多大害处;但是我要求他把橡胶园和茶园除外,因为这个海岛的经济完全取决于橡胶园和茶园的效率。(印度尼西亚经济目前出现的破坏现象和几乎完全崩溃的局面,对锡兰的政治家说来,是很好的一个教训。)<sup>②</sup>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我发现锡兰的政治结构潜伏着某种危机。

总理……[有点象]是当地的尼赫鲁——除了他是刚就任以及他与锡兰取得独立完全无关这两点不同之外,他显然是以尼赫鲁先生为楷模,穿戴就象一位站在讲坛上的英国天主教神甫,围着一块圣披肩,如此等等。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一个富翁的儿子;已经“西方化”了(当他在牛津大学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上学时,是牛津救济会的书记和司库);和什么人都交朋友;他本人既是保守派,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者,就象他的政府既有保守分子,又有社会主义派一样。<sup>③</sup>

现代英国式的正规政党制度在锡兰还没有发展起来。

奇怪得很,这里的政治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象十八世纪的辉格党政治。领导人物都有他们的“朋党”(就象十八世纪英国的贝德福德

---

① 1958年1月16日。

②③ 1958年1月19日。

派和罗金厄姆派),但是政府里……包括了观点极不相同的人。①

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各派都皆大欢喜,但是我可以看出,

(和东方的其他一切地方一样,)这里的危险在于:从我们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受人欢迎的、有教养的、自由主义的北牛津同学会的人物,面对着以俄国帝国主义的全部实力为后盾的共产主义势力,很可能会倒台。②

锡兰还存在另外一种复杂情况,就是存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 396 的有势力的僧侣集团。比起前一世纪强大的辉格党统治时期,又多了一种新的不稳定的因素。果然,不到两年以后,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班达拉奈克就被一个狂热的和尚刺杀身死。

第二天,总理用车接我们夫妇到康提去,在那里我们有机会参观了著名的佛牙寺。这座闻名的古老寺院,在作家笔下有过不少描述,直到现在显然还受到人们的景仰和崇敬。归途中参观的锡兰大学,和这寺院恰成鲜明的对照。这所大学授给我一个名誉学位,举行了一个完全牛津剑桥式的仪礼,穿上学士袍,披上学位垂巾,还戴上学士帽。

我们在锡兰的访问虽然为时短暂,却很愉快,而且看来颇为成功。我们带回了一种真挚的友情。

我们的下一站是新加坡,经过七小时飞行,在1月18日下午四点半到达那里。因为我们以后归国途中还要经过这里,所以这一次没有安排公开活动。这是个处理伦敦来的电报的好机会。这个处于独立前夕的半独立政府的首席部长林有福亲自到我住处一起进晚餐。“这个矮个子颇有才华,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能顶住受中国指导的共产主义势力。”③实际上也是,针对着他的压力正在上升。

---

①②③ 1958年1月19日。

在离开新加坡之前，我有幸出席了东南亚首席专员罗伯特·斯科特爵士召开的年度联席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联席会……

是一个有大使、总督、高级专员、陆军将领、海军上将、空军中将等等许多人参加的很有意思的会议，就在我们下榻的首席专员公署里举行。它是一个定期的集会。我的出席看来很受欢迎，而且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sup>①</sup>

397 罗伯特·斯科特是个能力非凡的人。他原来在印度工作，现在就要在外交部大展宏图。新加坡总督威廉·古德爵士显然是一位英明而有经验的行政长官。弗朗西斯·费斯廷将军（后来任帝国总参谋长）是个可信赖的人，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外交部的常务次官霍耶·米勒专程到这里参加会议。出席人员的优良品质和他们优异的工作成绩给我印象很深。不管怎么说，我能碰巧参加这样一次会议，实在很幸运，因为能了解到许多关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方面的东南亚防务的情况。

尽管这整个地区马上就要实现独立，但是出席的人对于用强大的驻军力量来维持联合王国的权力和威信的重要性，都没有任何怀疑；也没有人担心后继的政府会不欢迎我们这样做。相反地，在未来若干年内，象马来亚这样一些新兴的国家，如果能够指靠我们坚决的支持，将会更有信心。这时我们还根本没有考虑全部撤离的问题。这样的主张当时一定会被认为不可思议，是要不得的失败主义行动，而英国是绝不能变成一个失败主义者的。

我们在1月19日午饭后离开新加坡，中途在澳大利亚北部领土的达尔文港加油以后，直飞奥克兰，于1月20日下午四点钟才到达——这是一次长途劳顿的飞行。我不幸在新加坡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不过，由于药物对症，路上大部分时间都睡着了。虽然澳大利亚客气地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深夜到达达尔文港来迎接

<sup>①</sup> 1958年1月19日。

我，诺尔曼·布鲁克还是坚决不让我下床。在奥克兰，我们受到总理沃尔特·纳什和负责接待我们的内政国务秘书阿瑟·哈珀的欢迎。从东方热带的炎热气候和瑰丽风光中迅速转到新西兰温和的天气和熟悉的环境里，变化实在很大。看到前来欢迎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友善的面孔，就象到了家一样。

新西兰当局对我们旅行的安排，是设法让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走访南北两岛尽可能多的地方，会见尽可能多的人。剩下的时间便用来和总理作长时间谈话。我也可以偷点空处理一下不断从伦敦发来的大批有关内政外交的电报。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出国期间代理我的职务、负责主持内阁的“雷布”·巴特勒，善于分清主次，认真负责地把应该通知我的事都转了来，不管是为了马上采取行动，还是为了让我知道。 398

内阁不怎么赞同我准备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但是，他们也同意：我们在给布尔加宁的下一封复信里应该对“最高级会议”表示稍为积极的态度，条件是要有适当的准备工作。我认为，这样可以考验一下苏联的诚意。如果他们拒绝一切准备工作，那就表明他们的和平言论实际上只是为了宣传。甚至盖茨克尔也说过，如果真想做成点交易，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sup>①</sup>

新西兰在我们到达的两个个月前刚举行过大选。结果是工党以两个席位的多数重新当政。除了纳什以外，内阁成员都缺乏经验。他们也面临我们熟悉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面对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和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兑现自己的竞选诺言，其中包括降低税收和增加社会福利。

他们正处于暂时的经济困难中。过去几年羊毛和奶制品——还有肉类——价格很高的时候，他们大手大脚，拚命花钱买东西。现在，他们的英镑储备花光了，只好削减进口。但是，[高]价格总不可能无限期地

<sup>①</sup> 1958年1月24日。



维持下去，而且，即使是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下，农场主也还是干得挺不错。羊毛的价格看来正在回升(除开高级绵羊毛)，而且英国的市场依然吸收着他们出口的大批奶制品和肉类。<sup>①</sup>

纳什本人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个老式的激进派。他崇拜的是格拉斯通而不是马克思，有点“自负和健谈，不过还能干和忠诚。我发现他很容易相处”<sup>②</sup>。他很喜欢政治史，读的书不少。

我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他逝世时为止。他代表着上一世纪英国激进派的笃直的理想主义和由衷的虔诚的优良传统。对于追求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他是既坚定不移，又无所畏惧的。虽然他对外交政策深感兴趣，而且我们谈话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纵谈世界形势，但是比较认真地进行会谈时，主要的题目当然还是经济。关于建立欧洲工业品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没有过分引起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不安，甚至这个建议使渥太华协议需要进行某些修改，他们也不在意。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维护他们农产品的市场。

也许可以用我们新的“反倾销”立法来给他们一点帮助。他们抱怨的并不是我们英国产品，而是外国农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如他们所说的)在英国市场上销售。<sup>③</sup>

1月23日我出席了新西兰内阁的一次延续近两小时的会议。关于当前的经济困难，我向他们保证说，英国的出口商将会谅解新西兰暂时实行进口管制的必要性；除此以外，部长们主要感兴趣的是防务问题，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和马来亚的前途特别感到担心。我比较走运的是，总理把会议的一切都包办了，他的发言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用不着我多说话。晚上，我又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一直到天亮前才结束。所有这些聚会都很有益处，虽然内容

---

①②③ 1958年1月24日。

有些重复,却帮助我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很爱说,而且当他发现我这位首相愿意倾听他发挥他认为应该阐述的论点时,他就尽情地享受“这种既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又可以满足自己癖好的难得的乐趣”。

这次旅行的主要方针是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时间会见尽可能多的人,阐明我们的立场。“市民欢迎会”的热烈简直达到喧腾的程度。各行各业的人都表现非常友好和诚恳。在一个叫纳加卢亚瓦西亚<sup>400</sup>的地方举行的一次毛利族集会,以及对瓦伊腊基伊·基萨尔山谷的访问,又别有风味。这个山谷奇特的自然现象,使我们看了既感到兴趣,又几乎有点敬畏,主管的专家向我们解释了利用这里的水力资源发电的计划。我们在1月22日傍晚到达惠灵顿,在政府大厦下榻。“惠灵顿的主人科巴姆勋爵夫妇十分可亲,而且显然很受人民拥戴。他们的八个孩子也颇受人喜爱。”<sup>①</sup>

我收到国内发来的一封关于桑尼克罗夫特辞职以后经济问题辩论情况的电报,使我放心多了。辩论显然进行得很顺利,表决时我们得了六十二票的多数。

同时,内阁看来一直工作得不错,在“预算”问题上很忠诚协调。大家同意印花税增加八便士——但福利事业上不作削减。<sup>②</sup>

在达尼丁,我受到了按我的名望和身世并不为过的欢迎,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热情洋溢的苏格兰人。人们似乎发自肺腑地向我表示敬意,确实使人难忘。也许,最愉快的是从达尼丁驱车到克赖斯特彻奇的那一天。一路上每停一站都欣赏一番农村的秀丽风光和老百姓生活的生动景象。“在克赖斯特彻奇,我给商会讲了一次话——这是我新西兰之行中唯一的一次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演说。”<sup>③</sup>这次午宴本来是一次纯粹社交性活动,但是到

---

① 1958年1月24日。

②③ 1958年1月31日。

会的人还是尊敬而顺从地同意有必要请我作一次讲话。

我在公开演说里当然强调英国的私人投资在新西兰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说明了关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所依据的政策。我诚心诚意地承认英联邦各国需要发展它们各自和美国的牢固联系，指出这种联系与它们的英联邦成员国地位是完全相容的——事实上也就是毫不挑剔地接受了美澳新条约组织。但是，我也着重指出英国军事力量留在远东的意义。与此同时，我还敦促作为英联邦一个老成员国的新西兰的人民要认识到英联邦结构目前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应该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人民一起，对印度和其他一些英联邦新成员国将被引导去接受的在世界事务中起的作用有所理解并加以鼓励。

我们夫妇都十分喜欢这次对新西兰的访问。在走遍这个国家以后，我们感到，虽然它比任何国家离我们祖国都要远，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象英国。不但国家的性质本身可以这样说，而且人民的性格和传统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国家的所有岛屿充其量都只发展了一定数量的轻工业，在乘车经过乡村地区时，人们不难想象出英国在它的城市还没有毫无规则地发展起来、胡乱扩展的工业尚未占去大量美丽的土地以前，大概是个什么样子。象我们过去那样，这里的河流没有受污染，到处是鱼群。真的，世界上捕捞到的最好品种的鳟鱼，在这里是每一条小溪里都有，几个先令就买得到。南岛的山地使人想起苏格兰的景色，满坡是鹿群，这也许是有热心人有点不顾将来从外国引进来的。看来主要的区别只是，在苏格兰，捕鹿是有钱人的体育活动，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群岛上，人们却出钱请你射鹿。因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一年到头长着可以放牧大批牛羊的繁茂青草，也因为这群海岛远离世界主要的居民集中地区，高速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也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这里的人民虽然说不上狭隘，看来至少也是有点满足于比较静

止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个人都几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超越别人这样一种无情现象愈来愈占上风的世界里,这片可爱的海岛和它善良的乡民倒有点象现代生活沙漠里的一块绿洲。如果说那个时候新西兰人还不大愿意适应新的环境,而宁愿依靠母国双臂的保护,那么,他们照样在建设自己的未来,而并没有犯下在一个更为残酷的时代里曾经犯过的某些可怕的错误和罪过。 402

1月28日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克赖斯特彻奇,同日下午到堪培拉。前来迎接的有总理孟席斯、一批部长们和高级专员卡林顿勋爵。我们立即驱车到政府大厦,又受到总督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爵士和他夫人的接待。“总督显然很受人爱戴和尊敬。他是个坚强的人物。”<sup>①</sup>确实,一位总督得到人们这样真心的敬佩,还是很少见的。当然,他的辉煌战功和他曾经指挥过的澳大利亚军队对他的热爱,使他享有更高的威信。此外,他的朴实、睿智和威严也给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政府大厦举行的晚宴结束以后,一直到凌晨,国内发来的电报络绎不绝,使我们穷于应付。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这时正在安卡拉参加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的一次会议,我早就预料他会碰到不少困难。

美国人对我们草拟的给布尔加宁的复信,忽然变得很不高兴。他们好象并不理解我们国内的情绪——也许连他们自己国内的情绪也不清楚。他们现在又催逼我们对布尔加宁的最后一封来信作出完全否定的答复,为此甚至带点威胁口气。由于存在那样多得失攸关的问题(诸如财政援助,麦克马洪法案,等等),确实很难决定怎样处理这个局面。我现在正等待着塞尔温·劳埃德对形势的估计(他一直在和福斯特·杜勒斯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到达布里斯班时能够收到消息。<sup>②</sup>

---

①② 1958年1月31日。

现在变得这样宏伟的城市堪培拉，在 1958 年还只见诸规划。首都那个景色最美的大湖，那时候还只是一大片没有多少水、令人恶心的烂泥坑。那时当然也已经盖起一些建筑物，但是很多都是暂时性的。不过，也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堪培拉的建筑式样和城市设计不久将成为了不起的典范。我有幸在十年以后又有机会去访问了一次。虽然有许多建筑物和楼房还没有全部竣工，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所创造的值得称赞的奇迹。

我们的飞机因为加油，在悉尼航空港停留了一小时，在那里，我们经受了一次澳大利亚记者招待会的艰苦考验。以后还有一次在等待着我们呢。头两三天是些例行的礼节性活动，其中最重要的要算议会在 1 月 29 日举行的晚宴。孟席斯事先提醒我说，大家一定会希望我发表一篇比较重要的演说。不管怎么说，我的几段开场白看来颇受大家的欢迎。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新的经历，也是十分荣幸的事情。我自己当过三十五年议员，所以我懂得这是多么大的荣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议会两院休会期间竟然有这样多的议员远道赶来出席这次会议，而且据我所知，议会各党团并没有另发通知要求你们必须出席。要是议会党团发了通知，我也许会认为你们反正是恐怕自己党的票数减少了才前来的。我实在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给予我并通过我给予我们这个故国的荣誉。我当然不能自诩为第一个到澳大利亚来的苏格兰人，但是，我可以夸耀：就象你们的总理说的，我是第一个访问澳大利亚的在任英国首相。

接下去我谈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坚强纽带。

共同的民族起源，共同的信仰，以及我今天在参观你们这个城市的美丽的烈士纪念碑时沉痛地回忆起的我们的共同牺牲，构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物质方面，我补充说：

英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比任何国家的投资都大得多，而且实际上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这里的投资加起来还要多。英国的移民认定这里是个机会无穷无尽的地方因而前来开辟事业，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在对待比较重大的问题时，我们当然应该有相同的 404  
观点。

但是，就如一个家庭里的兄弟之间、夫妇之间或者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一样，虽然具有许多共同点，有时还是可能忘记我们彼此都有各自的特殊问题。既然我们两国地处世界的两端，…我们就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称之为远东的地方，对于你们来说就是近北；而在你们方面，也不能忘记英国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不但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这是我这一辈子通过两次悲惨的经验亲自弄清楚的；因此，我们还得记住，我们在欧洲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如果予以忽视，我们就难免于灾难。

鉴于败坏我们这个母国的名声现在似乎成了颇为时髦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也谈谈英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些成就，并且举出我们在许多领域里取得进展的事实。有人曾经提醒我说，有许多澳大利亚人不但怀疑西方国家是否有能力继续有效地领导世界，而且对英国本身和它在世界各种会议上的地位也感到担心。因此，我在这方面也设法作了一些使他们安心的保证，看来颇有说服力，也为他们所接受。

除了这个议会晚宴外，还举行了各种欢迎会、招待会。比较特殊的一次活动是参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那里我受到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校长布鲁斯勋爵的欢迎，并且接受了他授予的一个名誉学位。

在政治方面，我在首都的访问收获最大的是与总理的长时间的个别谈话以及与内阁的两次会谈。

鲍勃·孟席斯是这里非常突出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政治

舞台。有一个上午我和内阁成员们在一起，我设法给他们概述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各种问题。<sup>①</sup>

我们的会谈除了讨论即将在渥太华举行的英联邦经济会议以外，主要涉及两个问题——防务和关于欧洲统一的新建议。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虽然不得不费力地应付孟席斯和他的所有部长们的盘问，但是，我作出的保证毕竟使澳大利亚内阁感到满意。在我离开以前举行的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孟席斯以他惯常的豁达度量表示说：在我们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上，他都十分满意，而且和我意见完全一致。

根据孟席斯的建议，我在议会大厦与反对党领袖赫伯特·伊瓦特博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伊瓦特是澳大利亚政治界一位杰出的、事实上又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人物。他很有才华，但是，在我看来又有点不大可靠。他使我想起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来，这两个人确实很相似。伊瓦特是一位无愧于他的声誉的律师，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不时迸发出天赋的才智。但是，在谈话以后，我禁不住向孟席斯说，我认为他的主要政敌是这样一个人，他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尽管在拥护工党的人当中罗马天主教徒占有很大数量，甚至过了半数，而伊瓦特，却仍然能在与教士们和教会领导的剧烈争吵中取得胜利。这个裂痕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因此，我有好些年一直很羡慕我的澳大利亚同行在这方面的好运气。

1月31日，星期五，我们飞往布里斯班，在那里，受到昆士兰州行政长官阿伦·曼斯菲尔德爵士夫妇以及首席部长弗朗西斯·尼克林的欢迎。

布里斯班市十分热情——举行了一个壮观的“市民欢迎会”，还有其他等等。新任首席部长（这是二十年或者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的政府变

---

<sup>①</sup> 1958年1月31日。

动)是位自由党人。①

使我高兴的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有幸应布赖德尔夫妇的邀请在班雅克苏加乡间休息,在那里除了参加一次“烤肉宴”和其他愉快的娱乐外,我们还看到一些农村风光。

从布里斯班我们飞到悉尼,受到新南威尔士州首席部长约翰·约瑟夫·卡希尔的欢迎。又是一次午宴,一次晚宴,加上演说。我们很幸运地住在位于海军部对面紧靠悉尼港的基里比里宾馆——这是联邦政府所属的宾馆。这里除了风光秀丽之外,特别动人的是可以看到一条条大船就象在花园墙根下不到几尺远的海面上通过。“这宾馆十分舒适(是一栋按英国摄政时代式样修盖的旧房子)。气候可爱——天气是热,但不厉害。”②我们的主人安排很周到,多罗西和我只带一两个随员单独住在这边。第二天上午,我们坐着小艇,泛游这个也许是最美丽的海港。悉尼景色的奇妙,居民的活跃勤奋,实在使初次来访的人为之惊叹。

在市政厅举行的集会上和在市议会举行的晚宴上,我的演说都比较详细地谈到防务和俄国的问题。凡是我所到的地方,人们都对东西方关系表现出你意想不到的兴趣。2月3日我在上述第一个集会上说了这样的话:

根据最近十年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意识到东方和西方之间、受共产主义奴役的人们与相信自由社会的人之间的对抗,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我们进行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什么野心和私利,而是从事自卫,使我们能够在自由世界里保持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且我相信,由于人们高度地珍惜自由,所以,这个事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

最后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随着教育在目前仍处于共产主义桎梏下的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他们中有更多的人终于会懂得我们这个竞

---

① 1958 2月3日。

② 1958 2月4日。



争性制度所依据的人类的准则……如果这种情况终于发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将开始丧失它的号召力。但是，这里不容许我们打如意算盘。这种转变，如果真的来临，也不会是若干年内的事情，在我们这一生里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我们能够不时地在这儿或那儿缓和一下紧张局势，但是，思想意识上的严重斗争和冲突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并肩战斗”——持久地和坚定地——并且坚持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自由世界所有正在享受这种幸福的人充分维护这种生活方式。

407 从悉尼我们飞往墨尔本，到达那里的时间是下午，受到维多利亚州首席部长亨利·博尔特的欢迎。从机场到政府大厦的长途路程中，街上好象挤满了人，人们不断从屋里走出来。我因为有这样多人聚集起来观看我们经过，感到很高兴，所以向首席部长说，他们动员这样多人出来，实在太客气了。他出于礼貌没有给我做解释。还是约翰·温德姆事后使我明白过来。不错，其中有的人确实是出来欢迎英国首相的，但是人群那么拥挤的原因，经他一说要简单得多，也更合道理了。当时，酒类专卖法还很严格，所有的啤酒馆下午6点钟就停止营业。我们到达城里的时候，正巧碰上打烊，大批顾客从啤酒馆里涌出来。

在政府大厦迎接我们的是达拉斯爵士和他夫人布鲁克斯。达拉斯爵士任职已经不只一届，对当地事务十分熟悉。举行了各种例行的招待活动——维多利亚州首席部长请吃饭；会见军方高级将领，接着是联邦国防部长菲立普·麦克布赖德爵士举行招待会；正式拜会市长；最后是英国高级专员卡林顿勋爵在著名的墨尔本俱乐部举行了一次有大批社会名流出席的晚宴。接着，又举行了一个有大批宾客参加的市民欢迎会。在这些集会上当然又得多次讲话——主题还是一样，不过改变一下说法。在2月5日的国宴上，我有机会说了一段和我自己的处境有关的话，看来很得听众的

欣赏。

顺便说几句别的：我今天晚上到这里来的路上，想起了墨尔本勋爵，他是一位多么杰出的人物啊！你们这座在英联邦中仅次于伦敦的大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又是一位使人增添勇气的人物。第一，他并不想当首相；第二，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会当首相；第三，大家都一致认为，即使他真的当上首相，顶多也不过维持几个月。但是，结果他却当了好些年的首相。

市政厅的欢迎会过后，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和激动的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情。所有的客人和大批市民在门外等着我走出来。这天晚上天气比较热，但不是闷热，人群喜笑欢腾。显然我还得再说几句才能离开，当然只能是即席演说了；由于我碰上运气，事实证明说得果然合乎人们的心意。我因为感动得很，说的全是心里话。这晚的群众场面，好象成了几个星期来欢迎活动的最高潮。在这样一种场合下，你简直就象生就一副好口才。由于这次讲话根本不在原定活动日程之内，所以，当时好象没有什么人作纪录，后来报上也没作什么报道。我的随员们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用讲稿就演说，他们理所当然地替我担心）。 408

2月8日一清早我们就动身到霍巴特。凡是访问过塔斯马尼亚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美丽和迷人的海岛。礼节并不很严谨。中午和首席部长罗伯特·科斯格罗夫共进午餐，接着是在政府大厦举行欢迎会。我高兴地发现总督罗纳德·克罗斯原来是我在下院的老同事。星期天是休息日，除了到礼拜堂诵经以外，没有其他的安排。我在国内就经常去诵经，所以也不成什么负担。第二天上午是跟霍巴特的市长和一些社会名流一块度过，下午就回堪培拉去，2月10日晚上到达。

在塔斯马尼亚度过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以后，回到了堪培拉，大家似乎都认为澳大利亚之行十分成功。

原来今天是我六十四岁的生辰！<sup>①</sup>

我开始感到离开伦敦这样久有些不方便了，很多问题都等着解决。外交部已经拟好一封给布尔加宁复信的新草稿，我倾向于同意，不过，还得正试提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征求意见。

409

这封信应该既不放弃我们的立场，又要解除美国人的忧虑（实际上，美国人既然已经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他们的脾气总该好一点了）。我经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个新草稿和我原来的稿子很接近。我没有就最高级会议的日期提什么具体的建议，但是我确实提议应该马上开始“筹备工作”（由外交部长或者其他外交官员进行都可以）。<sup>②</sup>

主要内容已经确定下来，我也就放心了。我回到堪培拉的那天，复信就发出并且公布了。“给布尔加宁的复信发表了，报章的反映看来还不错。”<sup>③</sup>与此同时，国内形势虽然存在一些麻烦，但是并不完全令人泄气。

我们似乎在下院赢得了很大的多数——六十二票，六十四票，六十九票。但是，可惜全国的情况并不如此。我们将丧失罗奇代尔，而且我担心，票数会减少得很多。自由党在所有这些补缺选举中的干扰，使人十分恼火。<sup>④</sup>

现在，我愈来愈急于回国了。

第二次访问堪培拉的当晚，卡林顿勋爵在家里为我举行了晚宴，这是一次和新老朋友难得的聚会。第二天的上下午，孟席斯和我进行了最后两次会谈，接着又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晚上，在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后，我们出发到新加坡去。

2月12日上午我们到达新加坡。我和首席部长林有福又作了进一步的会谈，然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

① 1958年2月10日。

② 1958年2月3日。

③④ 1958年2月10日。

新加坡挺有意思。现任政府（林有福领导的）是温和和通情达理的。但是，由于“左派”或“半共产主义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所以存在着一种捉摸不定和惶惶不安的气氛。我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将履行我们作出的赋予“内部独立”的诺言。但是，我也在公开声明里指出，我们希望任何新加坡政府都能履行自己一方的义务。<sup>①</sup>

由于我上次只是作为过路鸟途经新加坡，所以我就利用这一次机会作比较正式的访问。天气特别热，因此所有的礼节性活动都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我们首先到市政厅去，受到市长的接待，在贵宾留名簿签了名，并且参加市议会议员的茶会。由于左翼在市政选举中获胜，所以情况稍为紧张；连市长是否愿意接待我也有点疑问。但是，一切都很顺利，大家不论政治观点如何，看来都很高兴和我们见面。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坐着汽车观光城里挤满了人的街道。这一天的活动正式结束了整个访问。

在回国途中，我觉得不管这次访问未来会有什么结果，至少可以说下这番功夫是值得的。

无疑，这次出访就与我所访问的几个英联邦国家的关系来说，是个很大的成功——成绩比我和所有的顾问们预料的要大得多。我拿不准的是国内是否有什么消极的反映。国内的人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抱着非常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

但是，我的忧虑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但我们访问过的几个国家的报纸，而且英国的报纸都好意地充分肯定这次旅行的成就。我回到国内才知道，在我们出访期间，报上一直大量登载这方面的消息，用了很多篇幅刊登有关这次访问的通讯报道和照片。

我们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我夫人在整个访问过程中给予我的出色帮助。在所有的国家里，她都需要参加特别为她安排的一

<sup>①</sup> 1958年2月13日。

些适宜的活动；凭借着个人的特殊天赋，她总是很快就吸引住人们的心灵。当然，在不很熟悉的人面前，她不免比较矜持，甚至有点羞怯；但是人们对她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使她深受感动。至于在熟悉的人里，特别是在国内苏塞克斯、斯托克顿和布朗利等地，以及在所有他经常接触的人当中，她一直就很受爱戴和尊敬。这一次几乎象王室巡幸似的出访，对她来说还是第一回，这倒使她潜藏着411 的待人宽厚善良的性格特点完全显现出来了。在这以前，她的那种易于被人理解和喜爱的非凡魅力，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起作用，现在却找到充分发挥这种魅力的机会了。她对人的兴趣比对事物的兴趣更大。她使每个人都意识到她的一言一行都出自真挚的感情，而不是应付场面，故意造作。因此，凡是见过她的人，不论年纪大小，也不论身份高低，都很喜欢她。她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归途，因为，尽管她十分谦虚，还是意识到自己取得了成功。

同样的道理，批评家们说，我的权力和威信似乎也提高了。我确实感觉有一种新的热情和新的信心在鼓舞着我。说真的，一些平日只乐于用批评甚至讽刺的武器来对待我的报纸，现在也好象开始在奉承了。要不是为了尊重英国的民主传统，我也许会对他们不屑一顾，根本置之不理。用艾伦·布雷克的不朽名句来说，普通老百姓具有“惊人的遗忘力”。在我出国期间，他们确实已经忘记了应该在选举上酬答一下我的操劳。因此，对我来说，并不需要象一个东方君主那样，找一个奴才跟随着不时提醒我命运的多变和人生难免一死。因为，英国的补缺选举就完全可以代替这个办法。

在出国将近六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在中午左右回到了伦敦机场。

“雷布”（掌玺大臣）、阿历克·霍姆和另外一两位大臣在[机场]迎接我。

罗奇代尔的补缺选举(星期三举行)的结果是个很大的震动，我们得票数

目下跌(从二万六千五百十八票下降到九千八百二十七票),比自由党还要落后(他们得票一万七千)。英国广播公司和工业电视台的记者当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政府将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一场战役里的个别事件,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胜负。<sup>①</sup>

回到国内一看,情况很好,不过有另外一些“局部的小困难”。

我和雷布同车回伦敦;他在唐宁街十号和我呆了一个钟头;然后是主任督导员;然后是外交大臣。都是一样的问题——全是重要的,全是不好解决的!<sup>②</sup>

虽然我很快又要陷入每日的繁忙事务中,但是我还是再三回 412  
顾这次出访的情况。就象一家报纸并非出自恶意地说的:“不管麦克米伦可能给英联邦做了些什么事,反正英联邦肯定已经给麦克米伦做了点事。”这当然促使我认真地考虑一下从这次时间匆促的旅行中应该吸取些什么教训。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是,通过英联邦这条纽带维系起来的所有国家的未来,不仅必须依靠正式的关系,而且要依靠个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故国的领导人,不仅应该利用快速的新型交通工具与新出现的国家的当政者保持经常的接触,而且同样要注意与一些老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维持最密切的合作。未来的总督,只要我们还保有选择的权力,就必须让最有地位和才能的人来担任。我已经看到两个突出的例子,说明总督的作用多么大。斯利姆元帅是英国所能派出的最受澳大利亚人敬佩的代表;我们所挑选的科巴姆勋爵,也是对新西兰人民最有吸引力的人物。不过,由我们来任命的总督,可能会为数愈来愈少,因此我们需要依靠的是高级专员。在选择这个职务的人选时,就如外交部挑选驻外使节一样,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一定要挑选最适于“为女王事业效劳”的人。任命高级专员或大使时,首

<sup>①②</sup> 1958年2月14日。

先必须仔细衡量这个人的优缺点，甚至要考虑到驻在国的政府对这个人的看法如何。在考虑人选时不应该着眼级别和资历。不容许凭资历而滥竽充数。

我们派到印度的马尔柯姆·麦克唐纳，是一位最有实践经验的外交家，他对亚洲和东方由衷地热爱，而且很了解情况。在新西兰，乔治·马拉比的和藪可亲，很适合他那个职务。至于说他不管合适与否在什么场合都老是戴着他那顶圆顶礼帽，看来反而使他得到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在澳大利亚，这时的高级专员——卡林顿勋爵——恐怕是我们历来派出的最卓越的一位了。他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一直受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的爱戴。

不过，个人的品德虽然十分重要，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它毕竟不能改变正在开始的巨大变化。1958年当时，从旧殖民帝国向新的英联邦的转变，除了加纳之外，还只限于亚洲。但是那时就很明显，这个进程很快也将在非洲和地中海开始。换句话说，我们不久将碰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或者是允许殖民帝国的其余部分也追随同样的潮流，或者是设法用武力来维护旧的体制。如果我们采取前一种方针，而且看来也比较肯定会采取这一方针，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希望在这样一个既有领土很小的也有次大陆那样幅员广阔的种类纷繁、数目众多的国家组成的集团里，维持真正的团结呢？当然，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使英联邦中属于英国血统的旧有成员国关心亚洲和非洲那些新加入英联邦的国家；但是，提供经济援助和政治领导这一主要任务必然会落在英国的肩上。无论如何是谈不上后退的，我们只能怀着信心和希望往前走下去。

在向我的内阁同事们汇报这次访问的情况时，我所能提供的总的说来是一幅令人欢欣鼓舞的图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看到一些有力的证据，说明那里的人是真正忠于女王和英国的。

这两个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愿望，就是：移民应该主要是英国人——所谓“石榴红”<sup>①</sup>的叫法，虽然有时是在开玩笑，但是也是一种表达内心喜爱的亲切称呼；而且，英国资本应该尽可能支持它们的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对接纳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新国家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做法有些疑虑；确实，他们对英联邦的这种新发展还缺乏应有的兴趣。因此英国有责任沟通这些旧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至于我所访问的几个亚洲国家，我向内阁汇报说，我很欣赏那里舆论界领袖对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与英国关系的价值所表示的中肯意见。不管议会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里将来实行的结果如何，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英联邦国家毕竟仍然在共同信守英联邦原则和决心维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414

因此，这个独特的国家联盟在整个世界的斗争中有它应起的重大作用。英联邦内外的急剧变化正在向富于想象力的政治家们提出挑战。这样一幅如此众多的在人种和信仰上各不相同的国家相互合作的宏伟景象，对于今天的青年说来，难道不是和对过去的若干代人一样，具有巨大的——也许是不同的——吸引力吗？这些就是不久以前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在我心中很自然地鼓舞和培植起来的乐观情绪。虽然也有不少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仍然是合乎今天的需要和机会的。

---

<sup>①</sup> 原文为 Pommy，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对新的英国移民的别称。因英国人肤色与当地入稍有不同，以石榴作比喻。这里作者是故意美化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的关系。——译者



## 第十三章 银行贴现率“泄密”奇案

政治生活的戏剧象钟摆一样，在悲剧与喜剧之间来回摇摆不定。人们所关注的恰恰就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然而，使观众普遍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戏剧却常常演成了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甚至成了一出吵吵嚷嚷的闹剧。

最能说明上述情况的一个离奇例子就是1957年底发生的“银行贴现率泄密奇案”。在这个案子中，哈罗德·威尔逊扮演了福尔摩斯的角色，他的烟斗使他的扮相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好象是蹑手蹑脚地搜索着猎物。这位现代侦探有一位崇拜者，一位有点勉强的华生作他的助手，这就是休·盖茨克尔。案子开头看来大有侦破的希望，但结果却以这位大侦探的失败而告终。这也许是由于运输大厦<sup>①</sup>的分析技能与贝克大街<sup>②</sup>相比还无法匹敌，尽管在想像力上不相上下。

事情是从任命黑尔什姆勋爵接替奥利弗·普尔为保守党主席之际开始的。1957年夏，党内事务和公众舆论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迫使我不得不严肃考虑我们的前途问题。在议会里我们的力量不断地壮大，几乎得到了巩固。但在全国范围内，我们还很薄弱，而且处于分裂状态。在我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换党的主席，使情况发生剧烈的变化，以取得伍尔顿勋爵1945年我们灾难性选举后所取得的那样的成效。黑尔什姆看来是最理想的人选。

① 工党办公大楼。——译者

② 福尔摩斯所居住的街名。——译者

我和普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磋商。他完全同意这个想法。奥利弗·普尔在下院任过多年的议员，现在伦敦财界任要职。他不但是党的忠诚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也是党内受到尊敬的组织者。1955年伍尔顿勋爵辞职以后，他由艾登任命担任保守党的主席。公而忘私是他特有的美德。正是他首先建议，在二年内或更早举行大选前这一阶段，党的组织需要一位得力能干的领导人。普尔自己说，他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其他各地，他不习惯于在许多听众面前出头露面。他认为他更适合于在某个复杂的机构里做一些日常性管理工作。因此他不仅欣然同意这种变化，而且还答应将全力支持黑尔什姆的工作。8月27日，

我……提名昆廷·黑尔什姆担任保守党主席（兼任枢密大臣和上院副领袖）。他诚恳地表示他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工作。不过他答应认真考虑一下。<sup>①</sup>

8月29日，我这样记载道：黑尔什姆

说，如能劝奥利弗·普尔留下协助他的话，他将愿意接受这项工作。这正合我的心意。当天晚些时候，我会见了普尔。他爽快地答应留下，担任党的副主席。他将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而黑尔什姆负责政治领导和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sup>②</sup>

8月30日我正式致函黑尔什姆。内容如下：

今晚我和奥利弗·普尔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谈话。他以特有的忠诚和责任感欣然同意留下，并表示竭尽全力协助你的工作。他已作好一切准备，担任党的副主席的工作。这个职位我是有权任命的（这不是一项新的职务，而是过去一直就有的）。他认为他可以在组织方面配合你。我个人认为，你和他将会合作得很好。现在，我们都乐意显示出一种集体的精神，而这种集体精神必将给公众以深刻的印象。

黑尔什姆的新职要求把他从教育部调出。教育部的工作将由经验

<sup>①</sup> 1957年8月27日。

<sup>②</sup> 1957年8月29日。

417 丰富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家杰弗里·劳埃德接替。这些职务上的变动是在9月17日公布的。谁知这出小戏刚结束，一场新的惊险剧接着又开幕了，而且连续上演了整个冬天。

9月19日财政大臣发表了旨在支持英镑价值、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虽然大部分措施并未出人意料之外，但银行贴现率提高百分之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没有先例的话，也是罕见的。说实在的，我也是在公布前一天才最后被说服同意这项措施的。贴现率大幅度的提高当然使公众舆论颇为震惊。这是在桑尼克罗夫特预料之中的。威尔逊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从总的方面对这些建议表示了一般性的，但还有点保留的支持。几天以后，即9月24日，我被告知说，他给财政部财务大臣伊诺克·鲍威尔写了一封信（财政大臣当时正在华盛顿）。威尔逊在信中称，在新的银行贴现率问世前，有迹象表明消息被泄露出去了，因此必须进行紧急调查。我当时的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一场新的风波。据称，政府准备提高银行贴现率的意图事先被“泄露”。我是星期三上午才同意这项建议的，而星期三晚上（在证券交易所关闭以后）的交易额又很小，所以我认为泄密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哈罗德·威尔逊给财务大臣写信要求进行正式的、或者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由于财政大臣不在家，伊诺克·鲍威尔找我商讨怎样进行答复威尔逊。银行总裁和证券交易所主席对我们准备拒绝威尔逊的要求都表示满意。因此，我受权财务大臣作出回答，并立即发表（正如威尔逊所做的一样）。答复信在下院休息室向议员作了宣布，应反良好（公布决定时还附带作了背景说明）。①

自然，我打电报和财政大臣进行了联系。他欣然同意我作出的决定。

418 威尔逊当即再次表示抗议，并说在下次议会开会时他将提出此事进

① 1957年9月26日。

行辩论。毫无疑问，明天报上将出现一些麻烦。财政大臣曾经会见过几家报纸的编辑（如《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和他们谈到过一般性政策（如压缩投资；限制信贷基础等等）。这是事实。但他绝不会提及银行贴现率的问题。<sup>①</sup>

不出我所料，威尔逊的侦探天性大发，几乎到了难以控制的兴奋状态。无论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否认，都无法摆脱他闻到的嗅迹。在10月4日给鲍威尔的信中，他重提过去的指控，说“我得到的初步证据说明消息是从一位政界人士那里透露出来的”。<sup>②</sup>看来他已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大肆渲染一番，以哗众取宠。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

他把他的信录音后于下午六点作了广播。经和诺曼·布鲁克、毕晓普和保守党议会领袖磋商后，我准备了给威尔逊的答复信（财务大臣已外出），并在九点前送到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社。我拒绝了威尔逊提出的根据道听途说的谣言进行无的放矢的调查的要求。我接着说，既然他已提出了具体的指控，并且还确有证据，那么，如他愿意将证据交给我，我将把它转交给大法官，并征求他的意见，以决定如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sup>③</sup>

为此，10月7日，

在内阁开会前，哈罗德·威尔逊先生在詹姆士·格里菲思（休·盖茨克尔的副手）陪同下前来拜访。和我在一起的有大法官。看来他们有点心虚，但还是说了一件事。他们说一个x先生（他是我“提拔”的）和一个y先生（这个人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之间有过一次谈话。y先生曾声称他完全了解关于银行贴现率的决定。从中我猜出x先生一定是个文职官员或是主教，y先生一定是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sup>④</sup>

威尔逊要求有一位法官进行初步的调查，而不是我早先提出的

① 1957年9月26日。

② 《1957年年鉴》，第57页。

③ 1957年10月4日。

④ 1957年10月7日。

由大法官基尔穆尔勋爵进行调查。然而我坚持我的意见。不过  
419 10月9日,福尔摩斯和华生,也就是威尔逊和盖茨克尔,却去会见了大法官。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退让的表现。

他们还是不愿透露x先生是谁。而大法官坚持要他们说出x的身份。最后,他们同意先去会见x先生,看他本人是否愿意向大法官讲明情况。<sup>①</sup>

这件事情就这样搁置起来,直到10月10日我们准备出发到布赖顿参加保守党大会前,都没有什么动静。

在这同时,对于总的政治形势,我不抱任何幻想:

今后二年内将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测——即使我们这届政府能坚持到那时的话。我们的情况总的来说一天不如一天。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对工党有利呢?盖茨克尔正在试图吸引中间派选民。那他会不会因此失去左派的支持呢?(氢弹问题也许是真正的考验。)我认为他可能会取得成功。不过他在战术上已犯了一个错误,他过早地集合了他的队伍。如果我能推迟这场斗争,他们很有可能重新争吵起来。我所面临的问题当然是大同小异。如果我们不能把党的传统力量引导到我们这一边来——如小业主,中产阶级等——那么我们获胜的希望就很渺茫。而且我们还至少需要三百万张工会的选票。我们也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sup>②</sup>

不过大会还是做了大量工作,以增强保守党的信心。黑尔什姆勋爵担任新职后的首次露面就使大会取得了难以忘怀的成绩。早在10月5日他就发表了一篇震动全国的精彩的广播讲话,在大会上他以一个情绪高涨的“拉拉队队长”的身份出现,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激起了高昂的热情。他不害怕那些新颖的宣传手段。无疑,他成了大会的英雄。每天一早,在布赖顿的海滩上,他还穿着游泳衣时就被人围着采访照相——这种情景本身就

① 1957年10月9日。

② 1957年10月5日。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有名的铃声唤起了全体代表的激情，成了全国复兴的象征。连《年鉴》的编辑也感到无比激动，以至在记述会议事件时，也禁不住用不寻常的浪漫笔调描述党的这位新任主席：<sup>420</sup>

他不知疲倦，坚韧不拔，善于交际，鼓动性强，而且惹人喜欢。看来他完全沉浸在四千代表之中。而这也正是四千名代表喜欢他的地方。<sup>①</sup>

黑尔什姆在会上如此成功，他的闭幕演说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一些报纸和评论家都认为这位新任主席使首相相形见绌。我当然没有任何责难的情绪。但以他特有的敏感性，黑尔什姆给我写了一封信，对他在会上的言行作了解释。这封信错过了我给他的一封感谢信。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哈罗德：

我们应该说布赖顿大会是比较成功的。代表们来时垂头丧气，走时士气大振。

但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就是报界有过分夸张描写我的倾向。这纯粹是夸大宣传。请不要误解，认为首相所作的具有政治家风度、严肃认真的演讲因党主席钟鸣般的离奇言论而有所伤害。人们喜欢不同身份的人发挥符合他自己身份的作用。你的表现是符合一个首相身份的。代表们对你表示满意。但我也希望他们对党的主席抱有好感，因为他们使他们在离开会场时感到欢欣鼓舞和由衷的高兴。顺便提一句，星期四我发给他们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章，希望他们能够读一读。

我曾想，我在海滩身穿游泳衣的照片就足够解除任何人的错误想法，认为我另有企图。但我还是写信给你，是想再次说明你从不怀疑的以下二点：（1）你得到我无条件的忠诚和支持；（2）我还不致于象我看上去那样的愚蠢。请允许我用古怪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反对党一定会怒不可遏，而我们的支持者却是一片欢笑声。你定将会赢得严肃的人们<sup>421</sup>

---

<sup>①</sup> 《1957年年鉴》，第53页。

的选票。

您的

昆廷·黑尔什姆

保守党大会结束前，我就听说，基尔穆尔已经就威尔逊的指控开始了调查。

对这件事他没有给我讲什么，只说他需要几天才能完成。这真是成了很头痛的事了，使许多人不能专心致志地工作。我希望事情有个满意的结局。<sup>①</sup>

10月18日基尔穆尔作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虽然调查已解脱了所有有关方面人士，我也坚决反对正式的进行审查，但是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却很难决定”。<sup>②</sup>和我的几位同僚们磋商以后，我决定通知盖茨克尔，事情就到此了结了。反对党领袖当即发表了声明，说大法官的调查不能代替“司法人员独立进行的调查”。<sup>③</sup>同时他还扩大事态，宣布说他和他的朋友们

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在那个星期三下午，伦敦财界和报界的一些人确已知道财政大臣要在那周星期四早上宣布一项重大声明，要“采取压缩政策”，要进一步实行信贷紧缩。<sup>④</sup>

对此我没有进行答复。10月22日我离开伦敦前往华盛顿和渥太华访问，直到10月27日才回来。三个星期又过去了，事情似乎已告一段落，这事实际上早该了结了。但在10月31日我注意到，“据《每日先驱报》报道，威尔逊还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要就‘银行贴现率泄密’提出质询。他以为他搞到了一些使我们丢脸的东西。”<sup>⑤</sup>

---

① 1957年10月12日。

② 1957年10月18日。

③④ 《1957年年鉴》，第57页。

⑤ 1957年10月31日。

根据惯例，财政大臣认为有必要就政府准备采取的主要限制性措施，给有关部门吹吹风。这一点我当然是清楚的。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曾会见过英国工业联合会董事长和一些著名记者。他也把类似的情况通报给奥利弗·普尔，以便让他作好必要的准备，更好地解释和维护政府的政策。他还授权给劳工大臣，让他去会见职工大会和英国雇主联盟的代表。同样，电力大臣向发电总局、煤气委员会和煤炭委员会的主席传达了政府的计划。在这些会见或传达过程中，谁也没有提过关于提高银行贴现率的决定。尽管这些会见完全是合法的，对于从国内外获得最大可能的支持来说，也认为是可取的，不过我还是感到，这些会见很可能会造成偏见。所以11月12日在议会当莱斯利·普卢默爵士提出质询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莱斯利·普卢默爵士是一位工党议员，他和比弗布鲁克报系关系极其密切。他的介入当然是根据《每日快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精神而来的。在补充质询过程中，普卢默和威尔逊都直接点了奥利弗·普尔的名字。威尔逊还竟然以蔑视的口气提到普尔在“伦敦财界的巨额利益”。<sup>①</sup>我那次没有出席议会会议。不过桑尼克罗夫特正确地拒绝回答他曾会见过那些人的质询。他只是提到大法官已作过调查了。这天晚上，我收到一份报告，详细叙述了那天在下院发生的一切。

我原来所担忧的现在全应验了。风波发生在质询时间。欺骗甚至腐败这样一些几乎是直言不讳的指控一个个地向财政大臣和普尔先生袭来。（普尔还是第一次被点名。）<sup>②</sup>

第二天我接到普尔的一封信，要求正式进行调查。他竟然这样被下院里的言论搞得威信扫地，而却没有答辩的机会，这简直是无法容忍。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12日。

② 1957年11月12日。



经慎重考虑后,我认为我们应成立司法调查组,对所谓的“银行贴现率泄密”进行调查。虽然没有人向我和大法官提出初步的证据,但现在发生了对一些杰出人物声誉的诋毁。奥利弗·普尔已写信给我,“强烈要求”进行调查。桑尼克罗夫特抱有同感。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和我在一起进行磋商的主要同僚们都支持我的决定。<sup>①</sup>

因此,我在11月13日宣布了根据特别法庭法成立调查组的决定。

在向下院宣布此项决定时,我首先说明,财政大臣拒绝回答在宣布银行贴现率前一天会见那些人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泄露政府在公布政策前经常进行的秘密讨论的内容是违反先例的,对处理公共事务也是有害的。<sup>②</sup>

但现在想起来,鉴于对他答辩所作的解释,有关会见事项倒是应该告诉他们为好。尽管我反复地斩钉截铁地保证说,在这些会见中,财政大臣和其他任何大臣都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提高银行贴现率的意图,我还是提供了财政大臣同他的同僚们在那天所会见人的名单。当然,所有这些都交给了大法官,他也得出了我已宣布的结论。我继续说:

424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泄露消息的任何新的证据。但在昨天补充质询过程中,有人对我的正直的议员同僚财政大臣的尊严,对奥利弗·普尔先生的人格和诚实,进行诽谤——至少是影射。这种诋毁是严重的。我的正直的议员同僚以及普尔先生都向我强烈指出,他们要求有个机会驳斥这种诽谤。

普尔先生已无法在下院为他自己辩护了,因此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为此进行调查。根据当前出现的事态,我决定现在采取行动已是时候。<sup>③</sup>

在回答问题时,我坚持说:

① 1957年11月13日。

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13日。

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对两位有身份的人的尊严所作的攻击。我认为他们要求给予机会，以驳斥对他们的攻击，完全是合理的。在前一阶段，这种攻击还只是一种闲聊。<sup>①</sup>

第二天，在建议成立司法调查组的动议时，我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以前拒绝这个建议而现在又改变了我的决定的原因。

我认为，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先例来决定问题是合乎情理的，特别是一切都处于道听途说或是偏见占上风的时候，但一旦有人对政府成员或政府外个人的声誉进行诋毁后，事态就发生了变化。议会特权是下院的宝贵权利，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个特权起源于行政领导和议会之间相互关系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时期。这个特权应成为自由的靠山，它不应用来作为维护诽谤的手段。<sup>②</sup>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对导致我提出动议的事态表示遗憾，我认为下院将赞同这一点，即政府自始至终一直是根据惯例和礼仪行事的。政府的最后决定“是因为有些东西打破了惯例，破坏了礼仪——践踏了一些人的权利，一些处于高位的人受到了指名攻击，因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sup>③</sup> 虽然反对党装模作样地批评了我所采取的强烈态度，但议会内外的政府支持者和报界以及全国 425 反应都很好。

特别法庭随即成立，由帕克·贾斯蒂斯法官主持，王室法律顾问爱德华·米尔纳·霍兰和杰弗里·维尔担任副手。法庭从12月2日开始工作，到12月20日结束听证会。法庭涉及的面极其广泛，听取了非常详细的证词。所有有可能事先搞到情报或甚至是隐隐约约听说过谣传的人，都向法庭提供了在提高银行贴现率之前有关金边股票的大大小的每一宗交易的情况。虽然我深信法庭所掌握的证据会否定威尔逊制造的案子，相信他制造的案子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13日。

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7年11月14日。

将受到嘲弄,但我担心有些问题将会随之而产生,如对英国银行董事会兼职成员的地位以及可能引起的利益冲突问题。我相信任何无中生有捏造的问题将统统被排除,大臣们以及银行总裁和其他人的个人名誉将得到彻底恢复。我敢保证,反对党原先的目的虽然受挫,但他们很可能在这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上孤注一掷。因此我于12月28日给巴特勒和桑尼克罗夫特送了一份备忘录,提请他们注意银行董事们的问题,并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同时,我也强烈希望不能让威尔逊甚至是盖茨克尔轻易溜掉。在1月21日当银行贴现率报告最后宣布时,并宣布一切控告被证明纯属捏造和虚构时,我情不自禁地从堪培拉向巴特勒发了一封鼓励的信。

我看到了伦敦报纸对帕克报告的评论。他的报告得到报界的好评。在个人声誉受到攻击之前我坚持拒绝成立特别法庭的决定现在看来受到普遍的支持。就是在银行兼职董事的地位问题上,看来也不会有要求及早进行变动的压力。《泰晤士报》首次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辩论中应该采取坚定的立场,目的就是要表明反对党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策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可以鼓舞我们自己人的斗志。哈罗德·威尔逊搞的那一套必须当众揭穿……。盖茨克尔压根儿就不该向他屈服。由于事情真相已大白,因此,我认为,就是在银行兼职董事的地位问题上,也没有必要仓促变动。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拉德克利夫委员会作为检查整顿制度的一部分加以考虑。

426

特别法庭对在人格尊严上受到公开或影射攻击的每一个人,都查得一清二楚,证明他们没有任何不端行为。奥利弗·普尔是这项事件中主要被攻击对象。有关他的问题,法庭是这么说: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满意地指出,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说明普尔先生把银行贴现率的变动或其他限制性财政措施泄露给他参与经营的公司中任何有关人员,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为了私利利用了这样的情

报。①

法庭总的结论是这样的：

从上述情况，我们毫不犹豫地得出一致的结论，所谓提高银行贴现率的情报无端透露给一些人的说法，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②

法庭不但对所有被牵连的人是否有不端行为作了全面彻底的澄清，而且报告自始至终表示了对财政大臣的赞赏。

我们了解到有关大臣是在什么时机，什么场合下透露有关限制财经措施的。我们还发现，在每种情况下，听取人都把这视为机密情报，没有人利用此情报以谋取私利。……这样的透露是否恰当是议会才能决定的事。但财政大臣考虑到严重的财政形势，考虑到他即将访问华盛顿的紧迫性，在他的阁僚们的赞同下，决定向报界代表、保守党中央办公厅以及工业界代表事前解释计划中财政限制措施的性质，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和赞赏。③ 427

这类性质的公开调查还很少做到如此完全彻底地否定所作的控告。反对党领袖毫无证据，或根据道听途说，甚至是恶意中伤，坚持成立一个庞大的调查机构，对国家和个人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严重危及了伦敦金融制度在国内外的声誉。大量的捏造和影射实际上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当我们审查这种不牢靠的根据时，我们把耸人听闻的情节剧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闹剧。现在，盖茨克尔、威尔逊、大法官和我知道的这两个神秘人物 x 和 y 的身份终于在惊得目瞪口呆的公众面前亮相了。下面就是学识渊博的法官和他的同事们叙述的事情真相：

1957年9月25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八分从沃金到滑铁卢的火车上，一位文职官员 J. L. 庞弗里先生和他的表妹，当时是保守党中央办公厅新

---

① 银行贴现率泄密案件特别法庭调查报告，敕书 350 号，第 83 段（皇家文书局，1958 年 1 月）。

② 同上，第 115 段。

③ 同上，第 116 段。

闻部工作的查塔韦小姐有过一次谈话。就是这次谈话导致了哈罗德·威尔逊先生在1957年10月9日向大法官递交的备忘录中的下述声明：

一位担任重要公职的人，他的人格，他的智力和责任心可以由一些知名人士包括艾德礼勋爵来担保。他将声明，9月25日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们在9月11日宣布措施之前就知道了“银行贴现率这件事”。这位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他们随时等候着警察的到来！他随即向他的一位朋友作了报告。他的这位朋友把此事告诉了盖茨克尔。盖茨克尔和我已和那个人取得了联系。以我在附加说明的信中已提出的那些担保，他愿意用口头证明补充他的声明，并愿意回答大法官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和此事有关的，我们还发现下列事实：

查塔韦小姐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她只是从9月16日才开始被雇为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的。她是一位见习员，在16、17、18、19日的职责只是搞一些简单的秘书工作，如打印给新闻报刊发布的声明，准备信封并把信件装入信封等。她和庞弗里先生的谈话是在拥挤的车厢里进行的。他们谈了些家常和查塔韦小姐新的工作。庞弗里先生的年龄比查塔韦小姐大一倍还多。他承认他对她新的工作开过玩笑。他的意思是说，她一定能够提供许多内幕消息，特别是给她任电视评论员的哥哥。她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那当然啦，当然有许多。”她接着就开玩笑地说，办公厅随时等着警察来调查“银行贴现率这件事”。我们认为查塔韦小姐是在庞弗里先生开玩笑，是在开玩笑的情况下谈及此事的。至于庞弗里先生是怎样会认真对待查塔韦小姐的话的，那就难于搞清了。总之，我们满意地指出，查塔韦小姐事先不知道提高银行贴现率这件事。<sup>①</sup>

另一个向大法官汇报的证据也是靠不住的。它也是根据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来。

1957年9月20日，星期五，上午九点半左右，在怀德福特车站，住房和地方政府部里的一位官员L. 古德曼先生，和劳工部首席新闻官麦金托

---

<sup>①</sup> 银行贴现率泄密案件特别法庭调查报告，敕书350号，第97—98段。

什先生有过一次谈话。《雷诺新闻》的记者洛夫特斯先生无意中偷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因为这次事件，才有哈罗德·威尔逊先生给大法官的备忘录中以下一段话：

我还接到报告说，有人无意中听到了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和政府某部的一位首席新闻官（不是财政部的）之间的一次谈话。这个消息当然是第二手的。有人可以为他作担保，但他不一定愿意站出来公开作证。在这次谈话中，那位首席新闻官肯定地说，他事前就知道即将提高银行贴现率。他的话受到那位财政部官员的批评，指出他不该知道这样事情。

《雷诺新闻》也为此在9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说：

昨晚有消息说，财政部不止一个官员在宣布二十四小时之前就已知道内阁的决定——这些官员不是高级官员。

许多白厅官员感到非常吃惊，有人竟然事前就得到了消息。<sup>①</sup>

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一位官员事先知道政府决定，这本身看来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法庭毫不犹豫地认为古德曼先生的印象肯定出于“误会”。

我们认为麦金托什先生的意思只是说他在事先得到的是有关财政限制措施的消息，但他却用了“银行贴现率”这个不严谨不准确的词语。他的用意并不是要宣称他事前了解银行贴现率提高这件事。而且我们惊奇地发现，麦金托什先生当时就意识到他的话竟使古德曼先生大吃一惊，因此当古德曼先生以为麦金托什所说的是指事先掌握了银行贴现率提高的消息时，麦金托什先生感到不悦，并且立即纠正了那种错误的印象。<sup>②</sup>

在总结这个事件时，特别法庭宣布说：

---

① 银行贴现率泄密案件特别法庭调查报告，敕书350号，第99段（皇家文书局，1958年1月）。

② 同上，第100段。

总之，我们满意地指出麦金托什先生事前对提高银行贴现率是一无所知的。<sup>①</sup>

430 就这样，仅仅出于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女士在车厢里的一次谈话，她在保守党中央办公厅工作距离关键的一天还不到一周，仅仅出于两位低级官员之间的一次可笑的闲聊，一桩银行贴现率泄密大案被搞得越来越离奇，就像气球一样膨胀到可怕的地步。最后由于法庭的精心关怀和积极努力，还化费了大量的公款，造成了许多个人的烦恼，这个气球鼓胀似的案子终于彻底被戳破了。真是一个令人笑死的恶作剧。

这个案子结束后，在下院辩论时，我正在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如果威尔逊表示一下歉意，并向有关人士表示适当的道歉，说明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么这件事的结局本可以比开始更要令人愉快些。可是他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相反，在巴特勒作了强烈谴责“政治上的诽谤手段”发言以后，威尔逊却提出与这个主要问题根本无关的修正案来回答巴特勒的发言。辩论自始至终一直进行得非常激烈，非常动感情。反对党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们不但投票赞成他们的修正案，而且投票否决一项感谢特别法庭所付出的劳动的提案。

“银行贴现率特大丑闻”其结果证明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而已。

---

<sup>①</sup> 银行贴现率泄密案件特别法庭调查报告，敕书 350 号，第 100 段（皇家文书局，1958 年 1 月）。

## 第十四章 向欧洲求爱

431

艾登政府由于首相疾病缠身而过早地下台了，但在争取同西欧各国经济合作的漫长斗争中，这届政府至少是完满结束了一个重要阶段。通过有关官员们一年多忠心耿耿的工作以及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我本人之间的紧密配合，而这种配合又保证了贸易部与财政部之间的全面合作，英国政府才得以在1956年10月初顺利地制定了它自己的方案，并把它交给有关各方。<sup>①</sup>这个方案——著名的G方案——不仅获得内阁的同意，还得到下院党内同僚的默许，虽然还不能说是热情支持。我们建议西欧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组织一个联盟，它将确保成立所有货物，而不单是食品的自由贸易区。鉴于人们对前一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西欧六国会谈成果还有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方案很可能被证明是可以接受的现实的妥协方案。冬季事态的发展，尽管后来证明是伤痕累累，我仍是充满希望。1957年1月我担任首相时，我盼望着近期法英之间的紧密友好合作将使我们两国不仅在外交、军事领域里互相同情、互相支持，而且也能在经济上成为这样密切的伙伴关系。

我们首先集中全副精力组织新政府，处理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善后事务。完成这些紧迫任务以后，初步的迹象看来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和巴黎的关系亲密无间。塞尔温·劳埃德于1月18日从罗马报告说，意大利政府表示满意，他们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sup>432</sup>当然我们的方案是否行得通，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欧洲经济合作

<sup>①</sup> 见本卷原书77页。



组织各成员国的态度。2月初，这个组织认为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是可行的。尽管对农业应不应该包括进去还存在分歧，但把农业排除在外而产生的技术性问题，看来不是不可逾越的。

1957年2月7日，英国政府提交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并以白皮书形式予以公布。这份备忘录重申了我们的观点，认为欧洲建立工业自由贸易区是可行的，并建议，在墨西拿六国即将圆满结束会谈的基础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为建立工业自由贸易区举行正式谈判。我们指出，如果英国从英联邦国家进口农产品时只享受适用于欧洲的优惠条件的话，那么我们从英国在英联邦内的特殊利益或特殊义务出发，就无法接受那种条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业自由贸易区上进行充分的合作。我们深信六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将乐意采取同样的政策。我们争辩说，建立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区将会由于扩大专业化，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引进新型先进技术设备而提高工业效率。这样就会加强西欧经济力量，有了这种巩固的地位，我们就可进而开始减少或消除外界对进口的限制。因此，建立这样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区和最近达成协议的旨在建立更广泛的多国贸易和支付方式之间不存在什么矛盾。这次正式的公开声明在欧洲受到墨西拿六国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其他国家的热烈欢迎。这些国家将都是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就是法国人也没有表现出后来出现的敌视情绪。他们对拟议中的  
433 共同市场条约中涉及的义务和困难甚至比别人更感忧虑。不久前卸任的大使勒内·马西格利告诉我说，摩勒是非常友好的。在他看来，他的政府“还将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赶紧执行欧洲联合的计划”。<sup>①</sup>

理事会在2月开会时，我们的想法受到普遍赞赏，各成员国很快同意立即开始会谈。不过我希望这个任务不应只限于由一般官

<sup>①</sup> 1957年2月8日。

员来进行。因此我向桑尼克罗夫特建议，应成立一个部长理事会以代表对这项计划感兴趣的各国政府。这个理事会应经常不断地督促官员们的工作，以防止把工作慢吞吞无边无际地拖下去。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还认为，在联合王国内部，我们也应成立一个由工业家、工会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组成的非官方委员会；以便我们能不时地和他们磋商。这一点也得到大家赞同。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有财政大臣这样一位对欧洲联合热心的支持者。他在贸易部的继任者大卫·埃克利斯，是出身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位老同事。他把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热情奔放的精神，全部投入了这个事业。

英国报界在这个问题上总的来说持赞成态度。

就《快报》一家例外。它要求立即进行大选，并对我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恐怕这只是一场漫长运动的开端。一切都是由于欧洲自由贸易政策而造成的。比弗布鲁克勋爵对此抱有刻骨仇恨。<sup>①</sup>

2月20日我在一次工业家参加的会议上讲了话。这些工业家对我们奉行的政策表示很满意。但3月初去巴黎时，我感到不快。法国运用他们传统的手法，在和共同市场集团商谈的最后阶段，他们成功地为法兰西殖民帝国取得了最惠条件。由于自己得到了满足，因此他们对别人的要求就不那么同情了。

巴黎会谈虽然主要集中在我们提出的在欧洲大量裁减武装部队的建议上，对此，摩勒和皮诺都极其仇视，但一转到协商经济问题<sup>434</sup>时，他们就变得比较冷静，气氛变得缓和了。

法国人想要的都得到了，但他们却把我们推到了困境。如果不是为了商讨我国在欧洲的武装部队的话，我一定要反击法国人的做法，揭穿他们在共同市场谈判的最后阶段、特别是把法兰西殖民帝国包括进去的

---

<sup>①</sup> 1957年2月17日。

做法。这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的，它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sup>①</sup>

3月25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后，墨西拿六国终于签订了著名的《罗马条约》。这项条约在经有关各国议会批准以后将从翌年即1958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个历史性事件无论好坏必将证明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罗马条约终于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得以诞生。共同体设置了各种复杂的行政司法机构。它把过去查理曼帝国的领土基本上组成了一个整体。扩大法国势力和权威的大好时机是没有逃过法国新统治者的眼光的。这位新的统治者肯定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出现。不过从表面上看，共同市场各国还是愿意继续进行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在4月15日写给我的朋友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的信中，就他要召开一次公众大会以支持我的观点的主张，我感到有必要表示我自己的忧虑。

任何有关我国谈判进展的预言都只能是猜测性的。而在巴黎进行的关于共同市场与自由贸易区结合的正式会谈，我认为有可能到3月底将进入死胡同。为了取得我们预想的成功，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或者我可能不得不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和其他各国的部长们取得联系。但在6月中旬以前我们看来无法实现这一点。

435 在4月18日给我的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我再次表明了我的疑虑：

我主要担心的，也是我们必须极力避免的一点是，共同市场成立了，而自由贸易区却永远没有下文。……我当然要尽到我最大的努力。

在这个阶段，我一直把有关问题详细通报给我的阁僚们。5月2日，我提醒他们说，事态在恶化。我不久就要访问波恩，准备和阿登纳坦率地谈谈建立海关一体化的政治含义。这个意图排除了联合王国早就提出的建立类似海关一体化的工业自由贸易区的

---

<sup>①</sup> 1957年3月9日。

建议。这必将导致欧洲一切重大方针政策的垮台，并最后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现有防御体系的崩溃。通过和阿登纳总理会晤以及桑尼克罗夫特和法国几位部长的会谈，我们得到保证说，一俟罗马条约正式被批准后，他们就和我们立即恢复会谈，讨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虽都表示了同情，但看来都要坚持拖延战术。这个拖延战术部分是反应了他们对各国议会能否批准罗马条约所产生的忧心忡忡的心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互相还在猜疑。德国人自己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和无比的优越感，但还老害怕被法国高超的外交手腕所“压倒”。法国外交对胜利与失败也是灵敏而多变的。

尽管他们争辩说，在罗马条约正式批准以前，一切只能维护原状，但我还是在6月初向外交部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内容如下：

我们应该在章程问题上向前迈进一步，比如说，我们必须说明，在有限的决定范围内，如实现自由贸易区问题，我们将接受一个部长理事会和多数票的决定。我没有把握的是这一步应怎么走。现在的方针仍是，在批准罗马条约之前只能听其自然。这种计划的危险是(1)法国人可能不批准罗马条约；(2)等到六国批准了条约后，他们很可能一下把自由贸易区问题抛到九霄云外，把我们置于孤立无援的狼狈境地。不过，我对第一个危险却并不感到太担心，因为事情真是那样发生的话，就可以像在欧洲防御集团成立后所做的一样，我们出来圆场，收拾残局。 436

我还认为欧洲经济合作联盟应该是能支持我们的。这个联盟虽是非官方组织，但受到欧洲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尊重，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我向我朋友里斯·威廉斯夫人发出呼吁，希望她能帮助我们。这位夫人总是精力充沛，听到我的呼吁后，她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在英联邦会议上，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对欧洲联合问题进行了

多次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讨论。英联邦各国的总理以及部长们总的来说持同情态度。根据我们的提议，英联邦各国的农业利益将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就是最激烈反对我们的比弗布鲁克报系也不会使我担忧。而且，我和这个报系的业主的个人关系从来没有受到过影响。比弗布鲁克热衷于论战，但他对那些过去，即使是遥远的过去为他干过事的人，有一种强烈的忠诚心。

英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呢？经过反复考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财政大臣桑尼克罗夫特。

我觉得要求欧洲联合的呼声虽以经济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出自于许多欧洲国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更紧密的政治联盟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虽然从经济联合上我们受到某种限制，但我们应向欧洲表明我们是赞成更紧密的政治联盟的观点的。下列各点必须优先进行考虑：

1. 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以后，我在一次广播讲话里就曾经说过，我们很可能会赞成把欧洲自由贸易区问题留给一个欧洲管理委员会来处理。这个委员会也可称之为“超国家”机构。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

437

2.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坐等到11月。尽早提出一些较高的并有着政治含义的倡议，看来是必需的。

3. 为此，有必要任命一位能在这件事上代表我国利益的特别大臣，由他协调有关各部的活动，并取得这些部门的协助（这些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外交部和贸易部）。

4. 我们不应被六国行动所吓唬住。如果他们敢采取任何歧视我国利益的手段，如果他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的话，我们完全有能力起来反击他们。从经济上来说，和英联邦和其他朋友，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我们不要狭小的共同市场也完全可以自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我们还掌握着一些政治军事武器。

上述情况归结到一点就是，在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使扩大的自由贸易区成为比狭小的六国共同市场具有更强大的吸

引力。我们要么带头扩大他们的计划，要么反对这一计划，如果他们不愿跟我们合作的话。

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都一致同意我关于任命一位特别大臣来主管这方面谈判的想法。7月22日我把详细的备忘录交给财政大臣，进一步阐述了我的设想。

这位特别大臣应负责收集材料，指导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我，外交大臣，贸易大臣和你组成的大臣小组负责汇报工作。殖民和英联邦大臣也应包括在这个组内，由他们参与讨论一些重大的决定，但他们不一定参加日常性商讨……。

这位大臣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从现在起，到重要谈判开始这一段时间里，必须前往欧洲各国进行访问。到六国以及十一国里走一走将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说，紧紧抓住十一国同争取六国是同样重要的。因此他肩负着类似圣保罗的使命：他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要兼顾之。

这里我想谈谈这位使徒式的人物谁最合适……我提议〔雷金纳德·〕莫德林……

当然莫德林继续担任主计大臣，但同时担负这些特殊的任务。另一 438  
想法是，我不太想任命一位主管欧洲事务的国务大臣。

桑尼克罗夫特欣然同意我选择的对象，要和莫德林密切合作的几位大臣也完全同意我的建议。为谨慎起见，在采取行动之前我又和巴特勒进行了磋商。作为内政大臣，虽然他对部际之间的事不感兴趣，但我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让他心中有数，这完全是应该的。而且，在那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下院和党内动向和看法的问题上，我感到他的意见总是很有价值的。巴特勒有着一种特殊的才能，能嗅出埋伏在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特别是在共同市场这个问题上，党内总的说来还不是很热心的，因此他的意见就更为可贵。

任命莫德林是在8月7日公布的，大家对此反应很好。《泰晤士报》称莫德林为“政府内一位出色的年富力强的”人物”。对他乐

意接受一项艰苦繁重、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任务，我的确是深表感激的。当然，在1957年夏天的几个月里，我们还无法预见到那旷日持久、毫无生气的谈判注定要在1958年底突然地几乎是毫无道理地告吹。莫德林接任后立即开始了他的工作。工作中不管出现多么令人失望的情况，也不管有多少障碍，他总是勇往直前，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杰出的能力抓住要害，同时又是那样不动声色沉着工作。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1957年秋末，事情越来越清楚。如果联合王国在食品问题上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关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肯定就要失败。其他欧洲国家坚持认为，对英国工业品最终免税进入他们的市场作为交换条件，他们的农产品应享有比现在更优惠的条件进入我国市场。欧洲国家不赞成食品自由贸易，而主张采用市场管理制。我们要么在食品问题上全面承担义务，要么通过谈判，在进口具体农产品上让步。我们还可以提出在我国市场上不要不合理地增加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数量。

439 然而，六国在要求我国在食品上达成协议方面，他们感兴趣的看来主要不在于他们要向联合王国市场出口廉价食品，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根据最低限度的价格把我们和他们自己的市场管理制统一起来。因此，英国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不一定就损害英国国内的农业利益。

莫德林极其简明扼要地向内阁全体会议介绍了上述形势，然后进行了讨论。事实表明，半个月前我把他吸收为内阁正式成员的决定是明智的。

莫德林深信，罗马条约六个签字国能够给我们相当大的支持，对此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将肯定同意我的方案。意大利虽然不急于把它还薄弱的经济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中去，但它出于政治原因，也被这个设想所吸引。法国政府虽然因为

被国内许多矛盾搞得焦头烂额,但出于同样的政治原因,它还算是友好的。当然,法国人无疑还会重复使用过去用过的策略,这种策略在签订罗马条约的谈判中使他们获得大大有利于法国工业的重大让步。就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其他成员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瑞士,葡萄牙和奥地利都同意我们的方案。丹麦在农产品出口上有它特殊的问题。除非它能在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区就食品贸易得到满意的让步,它也许会被迫申请加入六国集团。土耳其和希腊至少在原则上持赞同态度。爱尔兰和冰岛的态度也差不多,不过他们将肯定希望推迟作为成员国的日子,也就是想推迟承担成员国的义务。

关于英国农业,我们的方案是要把食品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摆脱出来。不过,我们至少应就食品问题继续进行协商,讨论欧洲合作的可取方法。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还有关于原材料来源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有当六国企图对原材料征收高额海关税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困难。还深入讨论了在英联邦国家和我国农产品上能否以长期协定的方式使用大宗买卖的技术的可能性问题。(长期议定书的方式是六国集团执行其政策的一种形式。)我坚持我们应特别注意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方面,并要力争自由贸易区机构应享有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这些经济问题还必须提高到重要政策的水平。我们的目的是,从自由世界的共同立场出发,为反对共产主义和分裂破坏活动,而巩固全欧洲的政治经济实力。

10月16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发表声明,决心创立欧洲自由贸易区,并成立西欧各国部长理事会负责进行谈判。莫德林被选为该理事会主席。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集团——的正式章程是在1958年1月1日诞生的,但在这阶段,更大范围的会谈并没有破裂的迹象。



1958年初我在英联邦各国访问时，曾化了很大一部分时间，通过私下的方式，以及通过记者招待会、发表演讲等公开场合，分别向所访各国部长们和公众阐述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们的反应是好的。在同时，莫德林巧妙而耐心地处理着有关事务。到了3月初，事情越来越明朗了，困难的症结不是农业问题，关键在于共同体内部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农业机构上，对此，六国集团他们自己也是犹豫不决。由于对自己的意图模模糊糊，因此，他们也就很难强烈反对英国提出的有关合作的建议。在以后几年里，共同体经过艰苦的努力才算形成了一个一致的基础，同意控制他们各国的农业。这个基础又成了以后谈判的一个主要障碍。但在1958<sup>441</sup>年这个问题还不太严重。不过，由于农业问题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法国人从根本原则方针上反对自由贸易区的立场逐渐明显了。

和莫德林和塞尔温·劳埃德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讨论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问题。法国人非常难对付。<sup>①</sup>

在法国人反对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两个惧怕的地方。第一点出于法国工业家与日俱增的忧虑。他们害怕，除了遭到德国竞争的沉重压力外，他们还将不得不面临英国货自由进入的压力。由于他们意识到法国工业相对来说效率不高，因而惧怕即将面临的双重危险，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强烈反对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另一点反对的理由不同于此。法国的联邦派对我们的欧洲运动中的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有很大影响，他们更关心的是同西欧的政治统一，而经济统一次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极力希望自由贸易区尽管包括两部分——六国和十一国（当时流行的说法）——但它应成为一种公共机构的基础，联合欧洲的理想能从其中得到培养和发展。

大家一致同意莫德林的建议，把7月定为作出决定的最后期

---

<sup>①</sup> 1958年2月21日。

限——至少在总的条款上要达成协议。六国内部降低关税预定于1959年1月1日开始实行。如果在共同市场和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同时实行削减关税的话，至少需要六个月才能解决技术上安排的问题。

3月初，法国人提出自由贸易区的两点修改意见。这两点是英国根本无法接受的。一点是，共同市场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必须根据单项工业对工业相互对应的原则来制定；需求量紧迫的工业部门应等到竞争条件“缓和”时才进入自由贸易区。法国建议的另一主要内容是，海外英联邦国家享受的优惠关税应扩大到一定定额的欧洲大陆的货物。

3月17日莫德林来向我报告这场谈判游戏的情况：

442

看来法国人是下了决心要破坏这场谈判了——这部分原因当然是出于虚弱，但主要还是出于嫉妒和恶意。法国政府还是友好的——但正如在突尼斯事件中，它成了右翼的俘虏。<sup>①</sup>

由于美国对北非事务的干涉，现在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我尽了最大努力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前所述，我只同意向突尼斯提供少量的甚至只是象征性的武器。但是加亚尔先生政府的反对派乘机利用了这次不满情绪。我警告过杜勒斯，如果神经质的法国人被惹怒以后，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借口破坏欧洲自由贸易区的顺利进展。事态证明我们这种忧虑完全是有道理的。加亚尔先生政府于4月16日辞职了。在新政府成立前，法国出现了一段漫长痛苦的阶段。

4月16日阿登纳对伦敦作了一次访问。

女王在温泽设宴招待。多罗西和我也应邀出席。德国人显得特别高兴。这位高龄的总理坐在两位女主人之间，和她们逗笑取乐。<sup>②</sup>

---

① 1958年3月17日。

② 1958年4月16日。

我们的会谈进行了三天,前两天主要讨论俄国的政策,最高级会谈和其他一些问题。第三天上午,即4月18日上午,我们讨论了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问题。德国人对法国政府下台,忧心如焚,另外许多人则认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即将倒台。阿登纳答应给法国人做做工作,从中帮助我们。我相信他的这种直爽的表现是诚恳的。整个访问使他感到高兴,特别是受到女王的接见。访问结束时他在德国使馆兴致勃勃地举行了宴会。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予以谅解了,如果不是忘记的话。

阿登纳对他的访问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这当然有助于消除法国人一直在他耳边灌输的毒素。<sup>①</sup>

443 法国的政治危机一直拖着,迟迟不能得到解决。一直到5月14日皮埃尔·弗林姆兰才开始组织政府。5月15日

英国有关大臣开会(几乎半数以上的内阁成员),听取莫德林关于欧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最新情况介绍。法国国内的动乱(他们一连六个星期左右没有政府了,而现在又面临着政权危机)使谈判进展缓慢。我们将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问题是应该作出多大的让步。莫德林非常简单明瞭地介绍了情况,大家普遍赞成他的看法。<sup>②</sup>

弗林姆兰就任总理前一天,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要求成立一个以戴高乐为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法国国内一下子又翻腾起来了,政局还是动荡不安。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将军们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这是否就意味着巴黎要发生政变呢,真使人捉摸不定。弗林姆兰先生正在组织政府。无疑,由于惧怕军方,政治家们将会联合起来。<sup>③</sup>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发生的得到大批中间和右翼公民支持的动荡,其目的就是要让戴高乐执政,以恢

---

① 1958年4月19日。

② 1958年5月15日。

③ 1958年5月14日。

复在阿尔及利亚的秩序，誓死捍卫法兰西帝国的这块值得骄傲的殖民地。戴高乐将军自己都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戴高乐发表了一个态度暧昧的声明，他这个声明却吓得法国政治家惊惶失措。戴高乐使用的是他惯用的高傲而高深莫测的语言。

法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谁也无法预言这是意味着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呢还是第四共和国的新生。<sup>①</sup>

不过法国总理没有马上屈服。他是一位个性刚直、意志顽强的人。

法国情况还是捉摸不定。看来弗林姆兰拒不向将军们屈服——至 444  
少暂时是这样。<sup>②</sup>

四天以后，我这样记道：

法国政局还是个不解之谜。弗林姆兰看来在顽强抵抗。不过戴高乐已占领了重要战略要地。<sup>③</sup>

5月24日在阿尔及利亚起义的伞兵部队在科西嘉登陆，事情很明显，戴高乐获胜并在巴黎“接管政权”已指日可待了。5月28日弗林姆兰辞职，戴高乐应总统的邀请开始组织政府。6月1日他获得法国议会绝大多数议员对他的信任票。法国宪法史上的这出长剧从此揭开了新的一幕。

我一直通过正式的电报或非官方途径向英联邦各国报告情况，使他们充分掌握西欧部长理事会谈判的进展情况。在广泛的基础上走向欧洲统一的任何实际步骤，现在完全取决于法国一家了。由于巴黎的政变，所有经过精心准备的、细致而耐心的讨论，很可能要前功尽弃。六国欧洲共同体或更大范围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将取决于法国这位新统治者的变幻莫测的决定。我自己不得不

① 1958年5月16日。

② 1958年5月17日。

③ 1958年5月21日。

承认前景不妙。在战争年代里我和戴高乐曾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深知，他对罗斯福，甚至对丘吉尔几乎有着切齿之恨，对英国充满着嫉妒，对法国过去光辉灿烂的历史感到自豪，而对1940年法国不光采的陷落深感耻辱。要摆脱他对法国在欧洲所处地位的怀旧感情，使他正视在一个已事过境迁、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上诞生的新型的联合欧洲确是很困难的。我所能希望的只是想在他生命中极其关键的时刻利用我和他的一段老关系。<sup>①</sup>

因此，我向这位新总理发了如下一封电报：

值此您受命担任“法国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谨向您表示热烈的和良好的祝愿。

当您还在担任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并领导法国走向胜利时，我们就建立了友谊。现在能够重叙战时建立起来的友谊，这对我是个极大的荣幸。

想起战时的日日夜夜，想到把我们两国连系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共同的利益，我期望在今后的共同事业中和您一起合作。

他以他素有的谦恭有礼的语言给我发了一封回电。

您在友好的信中所表达的良好祝愿深深地感动了我。您的祝愿完全符合我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心愿。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为了世界的自由而共同战斗。对于我们个人在战争期间的合作，我有着最幸福的回忆。

我知道有许多事情要我们一起来完成。我期待着这样的合作。

我想我还是给他再写一封信为好，其主要目的是告诉他我即将对美国的访问。我深知，他对美国抱有宿怨，为慎重起见，我还是直接把我的计划告诉他，这比他间接听到要好得多。

您在组织政府的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迅速给我回信，并说了这么多美好的话，我深为感动。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组织政府那样神速，并已掌握了各种应有的权力。

---

<sup>①</sup> 见《战争风暴》第8章至16章。

我知道在最近的将来，您要忙于制定政策、特别是制定北非政策。而我呢，正如您所知道的，将于星期五去美国和加拿大呆一周。这次主要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问，前往我外祖父学习过的一个大学接受学位。当然我将和美国总统和杜勒斯举行几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和加拿大人作几次正式的会谈。 446

如果不是考虑到您暂时要集中精力考虑您自己的问题，以及没有我早就安排的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我一定会建议我们及早会晤的。我一向认为个人之间的接触是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代替的，这是真正坦率讨论问题、避免误解或曲解的唯一方式。我希望当我们两人稍微清闲一点时能会晤一次，如果可能的话，就定在6月底或7月初。到时，我就有可能向您介绍一下我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时所获得的印象，并商讨一些我们以及西欧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国际问题——诸如我们和苏联的关系，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裁军，欧洲安全，中东和近东问题，世界经济形势以及联合王国和欧洲的关系等等。

同时，我冒昧预祝您的阿尔及利亚之行获得成功。我期望您的访问将为圆满解决北非问题打下基础。这个问题如能得到解决，您就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西方联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西方联盟的利益和非洲以及亚洲的和平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以深切的同情密切注视着您为缓和北非形势而作的每一个努力。我们认为解决北非问题必须考虑法国在那个地区一直所起的领导作用，并尊重法国在那里的特殊责任和利益。

6月7日我赴美国和加拿大访问，一直到6月14日才回来。6月29日我应戴高乐的邀请，满怀希望，当然不能说充满信心，去巴黎访问。外交大臣和我同行。表面上一切都非常友好，征兆也 447  
不错。我在日记里记录了那两天访问的印象。

到达奥利时我们受到戴高乐将军的迎接。欢迎我们的还有仪仗队、乐队和一大群法国人。将军——我已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显得和蔼可亲……我用法语作了简短的讲话（这一点使他高兴）。陪同他欢迎我的有顾夫·德姆维尔（外交部长）、（路易）约克斯（外交部官员），还有

[让·]肖韦尔大使。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日下午，从奥利到巴黎，沿路大批法国人出来欢迎。他们显得很轻松，气氛非常友好。……我从来没有见过法国人群这样友好地欢呼过（上次我在巴黎时，我们受到的接待是很冷淡的。那时正值可怜有加亚尔先生任总理的时候，我们又向突尼斯提供了武器）。

起初我还以为所有这一切是根据命令事先组织好的——再一想是为将军安排的。后者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他却不在我们的车队行列之中。我的确认为这是人民充满希望的表现。此刻，人人都信心十足，认为将军的政策将会成功，虽然谁也不清楚他要实行什么政策——不过那没关系，反正他的政策深得人心。<sup>①</sup>

我们驱车前往我国使馆。大使格拉德温·杰布爵士向我生动地介绍了巴黎近来的事态和形势。然后我们

前往马蒂格诺。宴会前我们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双方都只有二人参加（包括顾问共四、五人）。会谈时部分用法语，部分用英语，需要时当场进行同声传译。会谈后举行了宴会——宴会虽然简单，但吃得非常好。宴会后，戴高乐带我到花园散步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又开始会谈。他简单扼要生动形象地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情况，还谈了他自己的希望和困难。他脑子里一直在考虑的有两个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和法国宪法修改问题。晚上11点我们离开。

6月30日。根据安排，外交大臣将在十点会见顾夫·德姆维尔。我在十一点单独会见戴高乐将军。中午我们举行了全体人员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谈……

448

会谈的主要内容有：（1）俄国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途问题——法国渴望加入核俱乐部问题——核试验问题等等；（2）中东问题——特别是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和北非问题——远东问题；（3）欧洲各组织问题：六国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区等。<sup>②</sup>

---

① 1958年6月29日。

② 1958年6月29日—30日。

回想起上次在阿尔及尔和将军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见对我来说是深有感触的：

看到他现在的心情真使我有点吃惊。他当然是苍老了不少，长得胖多了。他眼睛不好，戴着深度花镜。他不再像以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了（实际上他已戒了烟）。他态度沉静，和蔼，慈祥可亲，但从他现在的外表可以看出，我敢断定他和以前一样倔强。我向他强调指出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告诉他如果按照现在法国的态度，其政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他对此显然不感兴趣，也没有被打动。我决定离开他时给他留下一封信，把此决定告诉他……戴高乐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军人一样，是很不注意“后勤学”的。（这是法国大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主要原因。1940年法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财政或经济上的垮台。戴高乐是知道这一点的。）他现在认为，如果信心能得到恢复，那么法国是会富裕的。（情况也确是如此）……我对欧洲自由贸易区感到忧心忡忡，因为皮奈先生（戴高乐已任命他为财政部长）对这位法国“恩主”完全是唯命是从的。关于法国新宪法问题……戴高乐说公民投票将于9月30日或10月1日举行。没有人（包括戴高乐本人和摩勒）清楚新宪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即这部宪法将有可能把解散议会权交给总理，也可能给总统更大的权力，以保持政府更大的稳定性。许多人认为戴高乐本人将进入爱丽舍宫。

戴高乐对我说，所有法国公民都将参加公民投票——包括阿尔及利亚人。到时，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将要当选，一部分由单独选举名单中选出，另一部分由共同的选举名单中选出。当他们被正式选出后，他就和 449 他们打交道。然后他将向他们提出统一，或自治，或任何其他可行方案。他要这些议员自己来选择一种方案。如果他们愿意统一，眼前法国将作出巨大牺牲，但从长远看，撒哈拉的潜在财富将使法国有可能承担统一的重任。<sup>①</sup>

在离开使馆以前，我写了一封信，对自由贸易区问题用最强烈

---

① 1958年6月30日。



的语气陈述了我的论点：

我感到我必须强调指出在欧洲自由贸易区这件事上出现的一些极其严重的问题。谈判已进行了很长时间了。根据法国政府的要求，我们暂时中断了会谈，以等待罗马条约的签订。当谈判在10月重开后，法国政府却提出了保留意见，几个月以后，它答应提出反建议。而这些反建议至今还没有送交十七国委员会。事实上，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我当然理解法国前政府的困难之处，不过我殷切希望这种举棋不定的阶段即将结束，现在应是破釜沉舟的时刻了。事情已越来越紧迫，因为除非在7月份谈判有所进展，否则就没有希望在1959年1月1日罗马条约生效时建立一个与此相适应的自由贸易区。7月份不能达成协议，其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如果法国需要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我深信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不过我不相信零敲碎打的方法能奏效。总之，据我所知，您所提到的两个难题，农业问题已不构成真正的障碍，法国海外殖民地看来也不大可能受到任何损害。相反，我国海外领地却要遭受一些损失。不过，我期望您支持的是总的原则性协议。这样，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才能继续下去。

450 我所真正关心的不光是财经和商业问题。我深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变换组织，大不列颠王国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如果一切通向欧洲全面合作的进展没有一个结果，事情就难办了。对于欧洲合作我个人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将再次使欧洲分裂。

和您一样，我是不迷恋于制订复杂的章程的。我认为自由贸易区可以在不丧失它的效能的情况下较简单地组织起来，我希望这是符合您的总的想法的。

一句话，真正使我担忧的是，我不理解人们为何把经济组合和政治组合分开这一点。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欧洲已是可悲的分裂着，我渴望能避免进一步的分裂。

我这样坦率地向您陈述我的想法，希望您不要介意。尽管我了解到您对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问题非常焦急，但这个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过失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7月4日晚,莫德林前来见我。他刚从巴黎回来。

关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皮奈态度对立。顾夫·德姆维尔紧跟戴高乐的决定。我担心一切努力都将因法国人的我行我素而化为泡影。<sup>①</sup>

第二天我收到戴高乐的回信。内容仍是模棱两可,使人捉摸不定。

感谢您6月30日给我的信。我认真地研究了信的内容。对于我们之间的会谈,回忆起来我还感到愉快。在这次会谈中,我们两国政府在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澄清。我曾经对您说过——在这里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法国根本不反对而是赞成扩大欧洲经济合作,大不列颠王国参加这种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所考虑的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和你的想法是很接近的。但问题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既可达到我们期待的目的,又不破坏法国经济和财政的平衡。我的政府认为这种平衡就重要性来说是压倒一切的。我想这是您所不难理解的。同时还要考虑到那种方式不致和欧洲共同市场六个成员国之间的现有协议相冲突。451  
你们和我們都要努力做到深思熟虑,还要有一点毅力。请您放心,我将根据我们会谈中体现出的亲密友好的精神亲自处理这件事。

我即刻写了回信,催促他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在西欧部长理事会上提出的建议。

接到您7月5日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来信,我感到很高兴。对您亲自过问这件事我表示很感激。在目前,这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大陆经济的繁荣以及它的政治统一都要取决于这个问题是否能圆满解决。

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您赞同扩大欧洲经济合作范围,因此我们目标一致。当然,我理解贵国政府很自然关注的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我认为当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正如您所主张的,要以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才能,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为此,莫德林先生以

---

<sup>①</sup> 1958年7月4日。

西欧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散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完全符合您在来函中所阐述的精神。我希望它将使贵国政府有机会把谈判从总的方面向前推进一步。如果这样可行的话，那么具体的谈判就可以继续下去，专家们同时可订出一个使人满意的详细计划来。

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这样坦率地阐述我的想法，您不会介意。不过我想，我们之间诚恳坦率地交换意见对解决我们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是极其有益的。

然而，法国在协商委员会上仍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没有考虑采取果断行动，以完全中断谈判。但英联邦经济会议即将在蒙特利尔召开。从全面考虑，在这个会议开幕前夕暂时中止谈判看来是可取的。

为慎重起见，我把事态发展以私人名义函告阿登纳。同时我还向他谈了我和戴高乐会谈的情况。

452 关于自由贸易区问题，我发现将军仍把它看作为经济问题，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政治含义。不过他向我保证说，他将亲自过问这件事。我以最大的努力向他反复强调了这事的重要性。我发现我们会谈的成果已初步显示出来。我认为将军主要考虑并担心的仍然是法国在自由贸易区里经济上是否受到危害的问题，尽管一般说来，一个扩大的欧洲，经济合作区计划对他是可以接受的。

几天以后，即8月4日，阿登纳给我回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

关于自由贸易区问题，莫德林理事会前几天会议成果表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而且使各方都感到满意，总之前景大有好转。毫无疑问，这种进展应归功于您和戴高乐将军的会谈。

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英联邦经济会议开了大约十天左右，从我们欧洲会谈的角度上看，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有关的决议指出：

我们坚信，一个向外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将不仅仅是重新开辟贸易渠道的问题，而且必将促进贸易的扩大。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将有利于世界经济

的发展。

10月8日，根据阿登纳的提议，我对波恩进行了一次访问，希望能得到德国人更多积极的帮助。我和我的小小的随行班子于那天上午抵达瓦恩机场。在使馆和克里斯托弗爵士和斯蒂尔夫人共进午餐后，我正式拜会了特奥多尔·豪斯总统。我们的会谈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一直延续到七点左右。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大部分时间都在场。会谈大部分集中讨论由于戴高乐总理突然采取的行动而出现的形势。我当时的日记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晚餐前后我们讨论的最严肃的问题是戴高乐将军以私人名义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本人发出的关于现今自由世界防御组织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这份备忘录是在几周前私下秘密地交给我们的），<sup>453</sup> 将军提出了改革的想法。他正确地批评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说这个组织不顾侧翼，很可能成为一种欧洲马其诺防线。但是他又提议在英美法三驾马车领导下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作为这个组织的欧洲分支。〔自由〕世界的其他部分也类似这样组织起来。将军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使法国以“即将出现的核大国身份”和英美共享一种特殊的地位。

美国总统和我都严格保守秘密。但是将军却给斯巴克送去了一份抄件——以个人的名义——他还允许德国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阅读这份备忘录。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政府没有得到备忘录的抄件，但他们对其内容还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当然表示极其愤怒。在访问波恩前我了解这一切情况，而且我知道我和阿登纳会晤时，自己将被置于难堪的境地，因此我征求戴高乐的意见，询问他我应该怎么处理备忘录的问题。他回答说，我当然可以和阿登纳就他的（戴高乐的）想法进行一般性的讨论。（看来他还没意识到他的行动所引起的反响。）

我注意到总理非常不安。在下午，由于各方官员都在场，他一直克制着自己——宴会后，在小范围内，他毫不掩饰他对此事所感到的厌恶和忿忿不平。他一直对戴高乐很信任。仅在几周前，他们还在一起进行

了推心置腹的会谈。那时戴高乐还显得很忠诚坦率。但突然间，他却给德国以及总理的法德友谊等政策当头猛击一棒。我当然尽力劝他不要太激动。我和戴高乐相处几乎比哪个人都要长。他对待朋友是会那样不给面子的，粗暴无礼，而且简直是莫名其妙。这完全是出于他的神秘主义与自我主义。但我想，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没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引起真正的麻烦之前，处理好这件事最好的办法是让将军再搞一个备忘录，把伤人的部分删掉后，在北约组织里进行散发讨论。美国总统和我还得考虑怎样处理戴高乐提出的关于成立英美法“董事会”的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告诉他，因为世界上不存在英美“董事会”，所以就谈不上法国参加的问题。当然，美国和联合王国是有着特殊关系的——这种关系的形成是和历史、语言、上次大战、丘吉尔—罗斯福以及现在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友谊有关。但我们从来没有试图把这种特殊关系用一种机构固定下来。今后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

宴会前，阿登纳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问安东尼·朗博德，我是否将给阿登纳一份这个备忘录的抄件。我认为我应该讲信用。和阿登纳怎么说，我曾打电报给戴高乐，并和他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不能超出这封信和达成协议的精神。所以在宴会后会谈一开始我就直截了当地向阿登纳谈清了这个问题。我想他是理解并体谅我的顾虑的。而且，阿登纳还可能要给我写“私人”信件。如果我同意把戴高乐私人备忘录的抄件交给阿登纳，那么总理给我写信时也就不会对我有什么信任了。当然，戴高乐的一个大的过失是他把备忘录的抄件给了斯巴克。不过，（正如我告诉总理的）这是愚蠢无知的表现。<sup>①</sup>

尽管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日程表带来一个分心的插曲，但宴会还是在欢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总理是位品酒大专家。他拿出各种莱茵白葡萄酒，每一种他都要我品尝一杯，同时还不断给我介绍各种酒的不同特点。<sup>②</sup>

---

①② 1958年10月8日。

第二天 10 点,我们又进行了会谈,到十一时半,我们已讨论了各方面的问题,并就公报的内容很快达成了协议。

在一次小范围的会晤中,阿登纳给我看了给斯巴克一封信的草本——信的措辞非常谨慎小心,特别是讲到我的时候——信中说,一切都将泄露于众,因此,要求斯巴克和戴高乐进行协商,把现在的事态调整一下,使其成为合情合理——调整的方法也可以是及早再散发一个备忘录,但这个备忘录不能含有伤害人的地方。总理一直感到很伤心,很气愤。<sup>①</sup>

我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阿登纳在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帮我们一把。鉴于越来越亲密的法德睦邻关系,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阿登纳在他的官员们的怂恿下对我们的方案采取不太友好的态度。但我们这次会晤肯定起了作用——戴高乐的出乎意外的行动也帮了忙。不过,假如自由贸易区谈判毫无成效,我们被六国经济联盟排除在外,甚至我们的利益被他们所损害,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考虑相应的对策。对欧洲我们是否置之不理呢,还是做工作把受到罗马条约排斥的其他欧洲国家组织起来呢?对于这些我一直在反复推敲考虑。我在给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备忘录里,陈述了我的这些想法。

与此同时,我的忧虑有增无减。

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前景看来很暗淡。法国决心把联合王国排除在外。戴高乐力图取得欧洲霸权地位。如果他能在阿尔及利亚获得和平,并能保住撒哈拉油田,那他很可能成功。<sup>②</sup>

10 月 31 日我召开主要有关大臣会议。

莫德林在处理整个事务过程中,一直非常巧妙,非常耐心,他认为法国不久将宣布他们的真正意图。目前他们只是消耗时间。就是其他五国(参加罗马条约签字的其他五个伙伴)也对法国人不讲信用、玩弄花招

<sup>①</sup> 1958 年 10 月 9 日。

<sup>②</sup> 1958 年 10 月 26 日。

感到震惊和愤怒。我们必须等到 11 月底。到时如果法国人还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就中断谈判。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以及其他国家（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瑞士，丹麦和奥地利）在政治或经济方面能够或者说应该采取什么行动。<sup>①</sup>

11 月 3 日阿登纳给我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个人认为欧洲共同市场委员会可以比过去更有作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将尽力支持他们，使谈判获得圆满成功。

顾夫·德姆维尔于 11 月 6 日前来拜访我。我们的会晤没有任何积极成果。之后，我决定向将军再发一封信。

456

对我们在自由贸易区问题的谈判的目前处境，我深为不安。我们一向充分理解法国有它自己的特殊困难的经济问题。我们理解并敬佩法国通过罗马条约所作的各种努力，并在经济联合上获得一定的成功。这种成绩将为欧洲的政治稳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如果只是罗马条约一家的话，那将容易在欧洲内部各国引起分裂，而不能成为联合的纽带。假如其他西欧国家的工业不断被六国市场所排挤，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发生经济抗衡和政治对峙呢？

我们认为，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不出这个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的宗旨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我们承认由此而引起的在工业国里某些个别工业部门所产生的损失应给予特殊的照顾。在这些限度内，我们确实认为自由贸易区将为西欧十七国进行高度的贸易自由提供条件，同时又不致形成完全是为了排外的保护性集团。近两年来我们进行谈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相信参加谈判的其他国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然而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在过去几个月里，特别是贵国外交部长对我国访问以后，我发现法国竟然另有打算。顾夫先生不仅坚持说法国无

---

<sup>①</sup> 1958 年 10 月 31 日。

法接受欧洲自由贸易的方式(尽管我们都愿意考虑保护性措施),而且还说这样一种自由贸易方式必将破坏共同市场的目标。如果你们真是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们所进行的一直是同床异梦式的谈判,不出两个月,一场经济分裂将会发生,现今的谈判是无法挽救这场分裂的。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坦率地说,完全是因为法国行动的指导思想和她的伙伴国的思想互不吻合的结果。就是在六国中,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就从其政治角度上来说也是普遍受到欢迎的。这一点已不是个秘密。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热心为欧洲的事业而奋斗,把它置于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没有人比我更加努力想方设法使英国能同欧洲越来越靠近。457 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我认为——这是世界上几乎是一致接受的办法——就是成立自由贸易区。顾名思义,自由贸易区其含义是一目了然的。

我恳请您不要把这一问题看成是个技术问题。希望您能从它最广泛的政治方面深入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确已处于一种危机之中。从长远来看,这种危机包含着对欧洲具有灾难性的种子。从短期来看,1月1日起,政治上产生的后果将会严重起来。如果在这之前我们还不采取任何措施,以避免在欧洲两部分之间形成屏障,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令我担忧。

因为是老朋友了,所以我和您这样坦率。我相信您是会谅解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是多么高兴地听到我国大使昨天和您会晤的报告,他报告说您很有可能在明年初前来我国进行访问,是吗?

遗憾的是,我的这种呼吁毫无成效。11月14日法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

建立一个英国所希望的自由贸易区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在共同市场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在十七国周围对外不设立任何关税屏障,在经济与社会方面不作任何调整。

戴高乐的信虽然不像法国政府官方声明那样蛮横,但却仍是闪烁其辞,令人失望:



您11月7日的来信再次清楚地向我说明既要全面重视罗马条约的实施问题,还要全面重视罗马条约的实施给共同市场六国和西欧其他十一国之间贸易所带来的问题。

您在来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您所说的关于可能成为两个集团会谈中根本目标不一致的误会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双方在长期谈判中提出的各种主张——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各方宣布的意图以及所用的程序和机构无法取得实际结果。而我倾向于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所要考虑的就是实际结果。

这些实际结果显然不能包括根据十一国提出的条件成立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存在的本身,它对各成员国要求承担的义务,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法国的经济情况,和建议成立的自由贸易区是不相容的。但我相信,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以逐步放宽共同市场和西欧十一国之间的贸易。

在我看来,我们还不妨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谢谢您的好意,您把您的忧虑告诉了我。我想我也有责任转告您,我的政府将随时作好准备和贵国政府取得联系,首先研究各种现实的可能性。这里当然应该被理解为,我们必须和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联系后方能采取行动。

虽然我认为我们不妨马上进行会谈——如果您觉得有必要这样做的话,不过我还是认为会谈不应仓促开始。仓促从事将有损害会谈的危险。1月1日起共同市场将正式开始,这是对的。但正如您所知道的,条约的生效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在现有贸易方式上发生深刻的变化。

如果您同意我的想法的话,我们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向您保证,就我们来说,为了欧洲的稳定,为了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们诚恳希望在这件大事上最终能达成一致的协议。

我在回信时极力压着火,也不把话说绝:

昨天阅读了苏斯戴尔先生的声明后,<sup>①</sup>接到您的来信,我表示感谢。

旷日持久的谈判已经中断。对由此引起的形势特别是对西欧的影

<sup>①</sup> 雅克·苏斯戴尔是1958年7月—1959年1月法国情报部长。

响，我毫不掩饰我心中的忧虑。欧洲与世界的紧张局势不断在加剧。我迫切感到必须寻找一个解决办法。我和我的同僚们正在认真研究目前存在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

对法国总理建议在法国1月选举后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我的同僚们同意：

目前正确的策略应是稍等一段时间，让别的国家对法国人施加一些压力。第一关将是1月1日。如果法国人对我国与其他十一国采取歧视行动，恐怕这就表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垮台。不过，他们还是很容易想出办法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他们可以宣布一些贸易例外条款，对五国和十一国都不降低关税。（在限额上也如此。）他们或许把特许权扩大到全欧洲。<sup>①</sup>

因此，莫德林就当时形势向下院发表了一个温和的声明。包括反对党在内的所有议员对此反应良好。

我还是认为在法国选举和对法国人施加压力之前，暂不进行谈判。如果到了1月，还不见有任何建议，如果十一国确实受到歧视，那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应召开紧急会议。法国人一直在打马虎眼，敷衍搪塞，消耗时间。现在他们（通过苏斯戴尔）说了真话，欧洲最好还是考虑并深思其前途。<sup>②</sup>

旷日持久无一所获的第一阶段谈判就到此结束了。实际上，一直到1959年10月我国大选后，我们才实现了另一个计划，另一个不太雄心勃勃的计划。

---

①② 1958年11月17日。

## 第十五章 两个世界

1957年圣诞节前几天，一方面我正全力以赴处理国内财政问题，当时财政部大臣们差一点集体辞职，同时我还忙着准备对英联邦进行一次艰苦的旅行，挤出时间考虑其他一些紧迫的问题。我在给保守党议会党团领袖的备忘录中概括了以下几个问题：

我对党内对外交政策上的误解感到万分忧虑。

这里主要存在三个麻烦问题：第一，在许多支持我们的人中存在着反美情绪。这种情绪当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达到了顶峰，至今还没有消失。这部分是出于真正的不安心理，而另外一部分原因恐怕是法国人所患的那种恶疾在英国的表现，只是法国人的病患得更厉害而已。这种病的症状就是眼睛往后看，只盯着十九世纪，而不肯向前看……。

这种孤立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反对欧洲的。这当然正合比弗布鲁克及其追随者的胃口。这样，我们就即将陷入这样一种处境，五千万英国人民在物质条件上无法与新生的巨人相匹敌，他们将既不能向欧洲靠拢，又不能与美国接近。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策略。

第三个问题与其说在党内有，还不如说在全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对待氢弹，对待美国轰炸机基地的看法，以及由于反对俄国，反对俄国人狡猾的和平宣传等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引起的疲惫情绪和焦急心理。

我想我应在出发之前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发表一个严肃的声明。1月7日前我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讲台吗？也许能作出某种安排。或者我可以作一次郑重其事的广播讲话。

461 因此，1958年1月4日在等待财政大臣作出最后决定之际，利用保守党政治广播的机会，我发表了和平问题的演说：

我们为争取和平而开展的工作，其进展完全由我们和俄国人相处得

如何而定。但是对俄国的政策还存在着一个问号。他们经常甜言蜜语，新年那一天，他们就对我们说了许多公正友好的话。这些尊重和友谊的表示确是真诚的吗？还是给我们说一些他们以为我们要听的话，而其目的却是为了动摇我们的决心？到底哪一种是真的，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任何政府都必须承担起高度的责任心，在一切都是捉摸不定的情况下，根据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关于销毁核武器、原子弹和氢弹的建议已反复多次被提出。假设我们达成了一项销毁和防止制造这类武器的协议——由于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这将是吸引人的，这会节省我们许多钱财和精力。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签订了这样一项协议，我们在俄国常规武器强大的优势兵力压力面前，在他们强大的军队、大炮、坦克、飞机、军舰和潜水艇的压力面前，我们是否就等于失去了自卫能力呢？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我们是否就要为丧失核威慑力量而感到后悔莫及呢？因为任何敌人，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多么强大，但在核武器面前，他也得三思而行。

接着我说了一段使一部分听众感到惊讶的话。但听众总的反应还是很好的。在这段话里我谈到了核武器的危害以及核武器的益处。这种论点今天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新鲜的：

说也奇怪，知道一场世界性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现在反而倒能制止侵略者。氢武器是一种保护性武器，这是因为，在一场核战争中，哪一方也无法获胜。可靠的防御就在于我们要具有摧毁他人的能力。这当然是一种可怕的想法，我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让我们对氢弹的憎恶剥夺使我们免受攻击的最可靠的保证，也就是和平的最好保障。

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今天也可能还没有过时。不过在那时还有必要提醒英国听众，这个道理是怎么得来的。 462

1945年，上次大战结束以后，我们都希望能过持久和平和长久友谊的生活。通过这次战争，我们看到并敬佩我们俄国盟友所显示出的英勇顽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虽然在对待生活与自由的态度上我们与他们截然不同，但我们深信我们是能够和睦相处的。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当

时想到“和平共处”这个用语，我们一定会使用它的。和平共处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意思。可是，唉，我们的希望不久就破灭了。苏联先是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然后把东欧的大部分国家置于它自己的控制之下，最后抢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从而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到今天，北约组织已有十年了。这十五个国家的联盟是我们经历了惨痛的侵略后，决心制止侵略而组织起来的。现在看来，我们成立北约组织的这个目的已达到了。

所以，如果我们处于对峙局面，那并不是件坏事。因为这至少意味着世界冲突的可能性变小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

接着，我谈到美国作出的贡献，并为之进行了辩护。

美国所做的一切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如果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一致，而且我们双方都很明白，那对我们双方只会有好处。假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和美国就有类似这种合作的话，我们也可能不会再遭受第二次大战了。1947年以后的历届政府，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欢迎和美国盟友合作。比如在1948年，美国轰炸机进驻英国就是根据当时首相艾德礼签订的协议而进行的。后来丘吉尔先生重申了这个协定。美国是来共同保卫自由世界的——他们是我们联合防御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他们的基地不能用于战争——战争性行动——除非经过我们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有否决权，他们也有否决权。早期的美国轰炸机上装载着原子弹，现在这些飞机装着氢弹……。没有英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发布的经过慎重考虑的军事命令，这些武器都将一律禁止使用。在从我国基地起飞的飞机上投掷这些武器的问题上，我们有绝对的否决权——这是毋庸置疑的。

463

就未来而言，维护世界和平只有两条途径。这两者之间互相并不矛盾，而是互相一致，互为补充的。

首先就是要维护我们盟国的实力。有些人会寻机揭旧伤疤，在我们之间拨弄是非，挑起嫉妒猜疑情绪。这些人完全有亏于他们自己这一代人。

第二条途径同样也是重要的。

这就是谈判的方法，调解的方法。不要被迄今为止的一些失利把我们搞得灰溜溜的。我们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应用这种方法。我们准备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争取在裁减军备、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俄国人达成一定的协议。

我还谈到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在前一年提出的裁军计划，并对计划的失败感到遗憾。然后，我宣布，我们不应就此罢休，而应坚持为之而奋斗。接着我提出一项建议。这项建议在我看来虽然无碍大局，但不久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我们首先要签订一项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过去就是这样做的。

它不会有什么害处，相反，有可能得到好处。

我还敦促就核武器试验、制造、使用以及储存数量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应该规定，常规武器也要相应进行裁减。我补充说：

各种形式武器的裁军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局势，而不能因此加剧恐慌。要做到这样，每一个计划中的协议必须有一条必不可少的条件，协议必须规定在所有有关的国家要有有效的检查监督和措施。就我们这方面而言，我们将同意让检查人员进入我们各国的一切地方，但检查人员在苏联集团里执行他们的任务同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

没有任何人比英国政府更加努力和俄国达成协议了。比如

464

我本人曾两次参加和俄国人举行的高级会谈，一次是政府首脑会谈，另一次是外交部长一级的会谈。我一直在注视着裁军会议的工作。尽管我们无法达成协议，但我们没有悲观失望，所以在上次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上，我们就非常明确地宣布，我们乐意并抱着迫切的心情重作努力，以打破僵局。至于是通过联合国还是通过小范围会晤方式来达成协议，我个人并不太计较。但不管哪一种方式，或通过外交途径，或二者兼而用之，其目的首先是扫清一直争论不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那些绊脚石，这样才有可能为政府首脑级会议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华盛顿和伦敦频繁交换信件，商讨怎样回答布尔加宁于1957年12月发出的最新照会。布尔加宁的照会重弹了俄国

人的老调，怀疑西方有侵略意图，再次要求禁止核试验。<sup>①</sup>我向美国总统提议，我们应根据非军事区共同制订一项互相脱离的政策。这个相互脱离的建议是在1955年最高级会议上由艾登提出来的，现在由波兰人在“腊帕基方案”中又作了详细阐述。相互脱离接触的协议必须要有有效的检查方法；但正如艾登一再催促的那样，这个问题先在小范围区域内进行试验，然后才有可能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去。艾森豪威尔在给我的回信中，给了我一份给苏联答复信的全文，准备全面阐述西方总的立场。同时他对我在广播讲话中提到的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表示忧虑。

我有一个更加实际更加紧迫的想法：英国政府只有在美国修正了麦克马洪法后，允许我们共享原子能知识的情况下才能同意  
465 取消核试验。总统坦率地告诉我，他不能保证国会能允许把核情报向联合王国完全敞开。不过他答应尽他最大努力，并说他对成功抱有很大的希望。修正的法案将使总统有权自行判断向谁提供情报。总统认为，向他们的英国盟友提供核情报是有利于美国自身防卫的。我得知这些情况后才的确松了一口气。

我在德里时，尼赫鲁发表了一篇演说，热烈欢迎我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这个想法竟被传到如此广泛的地步，真是没有想到。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争取对我的计划获得普遍的赞同。然而，由于盟国首都之间互相来往的大量信件着重商讨更广泛更重要的问题，因此我的这个计划就退居到了第二位。

1月9日我们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讨论怎样答复布尔加宁第一封来信时，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十九个国家的，但其抄件都交给了联合国各成员国。信虽然满篇都是诡诈，

---

<sup>①</sup> 《首相与布尔加宁先生书信集，1957年12月11日至1958年2月8日》，敕书第381号（皇家文书局，1958年2月）。

但文章却写得很出色。布尔加宁把苏联爱好和平的态度和西方一天天加强核军备相对比。他建议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停止核试验,取缔核武器以及腊帕基方案中提出的成立非军事区等事项。

第一封答复信还未发出,总统却于1月12日出乎意料地单独采取了行动,自己一个人写信给布尔加宁。他在信中说,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初步交换意见,只要有“足够的希望促进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事业”,他就原则上接受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建议。他还加了另一条重要条件——我们各国外长在各国首脑会议可望获得成功之前,对一些重大的问题必须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并有所进展。

我于1月14日向布尔加宁发出了对他第一封信的复信。信的要点如下:如果苏联政府对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确具有诚意的话,他们是否同意让专家们立即开始工作,商讨有关监督检查的技术性细节?我接着说,除了研究波兰建议外,我们还要讨论举行高级会议,商讨怎样答复他们的第二封来信。因为我们正在对英联邦各国访问,因此电报在我的小小的工作班子和白厅的庞大机构之间穿梭般地来去。我认为复信的第一稿太冷淡,不太容易被富于忧虑的公众所接受。我们不能给人以一种磨磨蹭蹭不愿前进的印象。因此我从新加坡把怎样回信的内容打电报给外交大臣。这封回信有可能激起公众的热情,迫使俄国人接触要害问题。美国人是否赞同,法国人、德国人和北约组织总的是什么态度,我心中无数。但我想还是这样来回答:

我必须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宣传的目的——这是我的希望,而是为了取得某些现实的成果,那么现在这种办法是不会使我们取得任何进展的。所以我提出以下建议:大家应一致同意要有某些领导人在某种级别上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乐意在我们双方方便的时候前来莫斯科就以下两点进行协商:”



(1) 进行进一步讨论的议事日程。

(2) 进一步讨论的程序。

如果我们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我当然把它推荐给我们的盟国以及和我国紧密合作的各国政府中的朋友和同事们。我提出这项建议，衷心希望它有可能至少扫除第一个障碍。我在接到你的回信前将暂不发表这封信。我殷切地期待着能接到你赞同的回信。

在给外交大臣这封信稿时，我对他说，六个星期左右之内不可能举行会晤，因此我们应和盟国制订出一个议事日程和程序来。我补充说：

总要有人在某一天出来打破这种长期僵持的局面。我们为什么不争取这个功劳呢？如果最后达不成协议（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至少也可以说，为了加强我们的抵御力量，我们是尽到了道义和理智上的努力。但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也不管我怎么答复，我们应和盟国协商，拟订出一个议事日程和程序来。自从巴黎会议以来我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对于塞尔温·劳埃德的回答，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我的同僚们并不同意我的计划，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的盟国或国内的支持者都不会接受这个计划的。

467 1月22日赫鲁晓夫在明斯克发表了一篇威胁性的演说。我继续和内阁商讨回信草稿，直到1月24日这个草稿才获得通过。我接受内阁对我的计划的否决，但我声明说，尽管我在目前乐意放弃我的建议，我还是认为采取类似我这样一种主动行动是必要的。整整一年以后，我的计划才得以付诸实现。

与此同时，塞尔温·劳埃德和杜勒斯在巴格达条约成员国安卡拉开会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杜勒斯明确地说，他和总统都不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议，除非有证据表明这样的会议是会有成果的。所抱希望注定要遭到破灭那总是危险的。不成功的会晤将是一场灾难。即使发表一项一致同意的公报，但如果公报里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只是老生常谈那一套，那是得不到什么收获的。而

且，自由世界公众的警惕性也很有可能被丧失。苏联正在玩弄这种危险的新花招，向我们的各盟国政府同时发出信件，然后对其回信进行仔细研究并充分利用各盟国之间的分歧之点。我的答复经各盟国传阅后，到2月10日才最后发出和公开。2月1日布尔加宁写信给美国总统，一口拒绝了外长会议的建议。2月5日哈马舍尔德出面建议在联合国组织内部进行私下会谈。我对布尔加宁第二封信的复信草稿，在经过这些来回协商后，就是力图争取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之间找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2月8日的信稿内容如下：

我在回答您12月11日的来信中，答应要另写一信，答复您1月8日的来信。和我的同僚们深入细致的磋商后，我现在才有可能进行答复。

我将乐意出席一次首脑会议，但我认为首脑会议前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应该告诉您，正如我公开说过的一样，事先必须充分做好基本的准备工作，否则这样的会议将毫无成效。在准备工作期间，与会者对会议的性质和程序须明显地具有广泛的一致意见，并对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取得实际进展抱有真诚的愿望，必须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的可靠希望。不这样，会议就将一无所获，这样事情只能变得更糟，不会更好。我还清楚记得1955年7月和10月在日内瓦会晤的情景。回顾过去那些会谈，我更加深信那时所以成效甚微，一个原因就是首脑会晤前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制订议事日程时，当然不仅必须考虑您在来信中提出的建议，还要考虑其他有关国家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月12日给您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我是完全赞同这些建议的。尽管您对这些建议已作过评论，但在准备政府首脑会议的议事日程时，这些建议必须得到进一步认真的考虑。

北约组织成员国在12月巴黎会议上曾提出建议，认为应首先举行外长会议，争取打破裁军会谈僵局。这次外长会议可以扩大范围，可以

作为政府首脑会议的预备会。这样,我们就可期望各国政府首脑能够集中精力,讨论解决具体问题。为取得一些眼前迫切需要的进展,因此我建议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外长会议。为便利起见,这次会议是否应包括 1955 年日内瓦会议代表有关的各国政府的外长参加。但这不妨碍政府首脑会议的最终组成。我是在得知您不赞成召开外长会议的情况下向您提出这项建议的。不过我还是坚信,作为开端,这是最好的办法。

469 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外交途径秘密交换意见来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我认为,第一个办法将更有利于促成政府首脑会议的召开。我们可以就这两个办法中的一个达成一致协议,当然我们不能擅自代表别的政府说话。

如果这些建议都能被有关各国政府所接受,外长会议或外交磋商的细节性安排最好由这些国家驻莫斯科的代表立即进行。

如果我们能同意这种方式,我们之间的了解将会更深入一步。但我们必须开始就承认,我们之间还有相当宽的鸿沟要弥合。无视或缩小这个事实是不现实的,从长远看这对我们所要达成的目的是有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的理由。

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殷切期望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我所期待的是不要把人民的满怀希望变成大失所望。尽管我们在处理我们之间存在的重大问题上方式不同,但无可置疑的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维护和平的事业。我认为双方应承认对方抱有这种同样的关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有可能举行一次有益的会议并取得积极成果的。<sup>①</sup>

这个文件受到报刊和公众的欢迎。《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都表示祝贺。《曼彻斯特卫报》用以下一段话总括了当时的形势:

没有论战性言论——看来这就是麦克米伦先生给布尔加宁元帅的第二封回信中给他自己所定的原则。但愿他的这种榜样影响他人。公开函件中宣传方面的东西越少,各国政府首脑坚持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

---

<sup>①</sup> 《首相与布尔加宁先生书信集》,敕书第 381 号,第 26—28 页。

越大，那么进展的希望就将越大。麦克米伦先生正在果断地——正确地——致力于安排会谈的事务。

《每日快报》也很友好。

470

他的新的答复信表明他愿意考虑俄国人的观点，但又完全忠于他的美国盟友们。英国作为调解人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这将给全世界及早显示一个更为美好的和平前景。

第二天，杜勒斯作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声明他并不认为外长会议是最高级会议的一个必要的预备会，当然更不是绝对必要的一个条件。他坚持的只是应有充分的外交准备工作。按照国务卿的惯常做法，这项声明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也没有向他们的盟国事先打招呼。不过我还是衷心欢迎他的声明。

2月15日，我收到总统给我的一封有益的长信。他在信中说，他对我们处理布尔加宁信件的方式表示完全满意。在信的末尾一段，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最高级会议打下一个最良好的基础。和苏联人举行外交级的初步会谈可马上开始，以作为决定应在那些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一步。我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工作，直到这次确实大有作为的最高级会议的召开。

2月19日，下院就外交事务开始两天的辩论。在回答为什么会谈进展如此缓慢的批评时，我反复说明，除非最高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否则它实际上只能起危害作用。这一点是清楚的。因此一丝不苟地做好准备工作就是非常重要的。冒着被指责为轻率行动的危险，我向议会和全国说明了毫无准备的会议将引起的困难和危害。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对于那些赞同召开最高级会议的人，我愿意把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描述给下院全体听一听。那次我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参 471  
加会议的四国，每国都有四、五个重要人物代表他们的国家坐在前排，还有二十或三十甚至更多的专家们坐在他们的后排，协助他们的工作。会

议在老式的国际联盟大楼一间大厅里举行。桌子大概有三、四张台球桌并列放在一起那么大。桌上都安装着我们熟知的麦克风、话筒和翻译设备等装置。另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各行各业的观察家。他们坐在大厅后座一圈的位置上。

事实上，与会国代表没有开过协商会议。他们各自讲了一通，一个个轮着发言，轮流由一方担任会议的主席。这些发言名义上是秘密的，但是每次会议刚一结束，发言的全文就通过某种神秘的途径传到了汇集在日内瓦的三、四千名记者的手里。当然，会议期间有不少愉快的照相，还组织了多次令人满意的宴会。说实在的，只是在招待会上才算进行了一些磋商，但这一般都是双边性的，因此在互相探讨会议的想法上还是有局限性。我记得只有一次我们确实是移到了一间小会议室，进行一次我所喜欢的那种会谈。这次会谈——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为了打破程序上出现的一个具体的僵局。<sup>①</sup>

这个有关著名日内瓦会议的梗概或者说简介，不管怎么离奇，但我的听众却听得津津有味。

接着，盖茨克尔发表了一篇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说。对他的演说大家普遍感到满意。但有一部分工党成员不怎么欢迎他的讲话。他们是支持单方面放弃核试验和制造核武器的人民运动的。盖茨克尔的反应说明，我决心在演讲中采取“温和态度，并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平衡”是有道理的。<sup>②</sup>第二天，安奈林·比万作了发言。《年鉴》作者对此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批评。这篇

冗长乏味、语无伦次的演说表明他优柔寡断，或者说他在他分裂的党内到底支持哪一派上还举棋不定。<sup>③</sup>

比万力图为他 1957 年在布赖顿召开的工党大会上所作的演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2月19日。全文见《时来运转》原文第615—617页。

② 1958年2月19日。

③ 《1958年年鉴》，第7页。

说辩解。这是他的大错所在。他在那次演说中宣称外交大臣不应“赤身露体地”参加谈判。“赤身露体”一般认为是指“失去核大国”的意思。他唯一想解释的是，他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想说明“我们不能置我们的盟国、义务和朋友于不顾而单独和别国进行谈判，使英国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毫无朋友的境地。”<sup>①</sup>这种不值一驳的遁词使有经验的听众感到既是不可思议，又愤慨不满。

外交大臣接着发言。他仅仅作了他事先准备好的比较正式的演讲。要是碰到一个头脑敏捷的具有雄辩口才的议员的话，比万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了。

情况对他(塞尔温)非常有利，而且他的机会也很好，但却全部丢失了。他的工作是那么的出色，我简直想不出还有谁比他更胜任这项工作。但他在下院却变得——一时的——不知所措起来了。<sup>②</sup>

因此，我决定在第二天由我来作一次“总结”发言，而不是由外交部的一位次官来作。

我只讲了二十分钟。我讲话时整个下院鸦雀无声，结束时我们这一边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获得了六十六票的多数。可怜的塞尔温感到非常苦恼。我极力对他进行安慰。他真是个忠诚老实的人。<sup>③</sup>

我原先希望辩论将顺利进行，不会发生分组投票表决。但反对派坚持要提出一项修正案。因此我问心无愧地利用我的机会强调指出反对党领袖正式发表的观点与工党运动在选区中所宣传的观点有本质的区别。

在报刊和保守党意志不坚定的议员中出现了一片要求撤换塞尔温·劳埃德的愚蠢呼声。 473

今天早晨我同外交大臣进行了一次谈话。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他辞职。有二家报纸例外。《每日电讯报》的表现令人敬佩，《泰晤士报》持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2月20日。

②③ 1953年2月20日。

冷静稳重态度，对此不予置评。这家报纸刊登的主要文章都是关于比赛、教育或其他消息，单单不登有关重大问题的文章。<sup>①</sup>

第二天我这样记道：

新闻界目前对塞尔温的“炮轰”完全是不公正的。他们都在推测谁是他的接班人。所有这一切都是：(1)不怀好意；(2)企图把政府拉下马。他们的目标是索尔兹伯里，桑尼克罗夫特，塞尔温·劳埃德——还把眼光盯在所有补缺选举上，其高潮将是对罗奇代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我将屈服于压力。<sup>②</sup>

对一位能干、忠诚的大臣进行的最不公正的攻击，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抵制。2月21日晚，在电视采访过程中，一位新的节目采访人员(后来因此闻名)向我提出了一个有点挑衅性的问题，我借此回答说：

我认为塞尔温·劳埃德先生是一位很称职的外交大臣，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如果我认为他不是这样一位外交大臣的话，我早就采取措施了。现在在压力面前，我更不想作任何变动。如果那样做了，我认为是很不明智的，也是违反我对忠诚理解的原则的。<sup>③</sup>

但是，我很难使我的同僚感到宽慰。

我和塞尔温·劳埃德一起渡过了困难的二至三天。他觉得，他的地位由于他(1)在下院中的失利而大大削弱，(2)也被对他的攻击而削弱，因此他对政府已没有什么用处了。他给我写了一封辞职信。我想他是一位很敏感的人，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官迷”的指责。但我确实不能再让人辞职了——虽然有其理由。塞尔温是诚心诚意的，而且也很友好。不过他在精神上肯定地受到很大的打击……。经过多次谈话以及我给他正式写了一封信后，事情总算过去了——至少暂时过去了。塞尔温同意留下继续担任外交大臣工作。<sup>④</sup>

① 1958年2月21日。

② 1958年2月22日。

③ 《1958年年鉴》，第8页。

④ 1958年2月26日。

评论家甚至历史学家，总是低估担任高级职务的大臣们在身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压力。这些大臣们必须得经历一系列困难的危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们常常忘了当代政府经常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面对最复杂最使人劳累的问题，忍受来自下院反对党不断提出的批评，还要遭受自己党内那些神经不健全的人的指摘，以及来自新闻界反复无常、有时是傲慢的评论，现在又要忍受来自电台和电视台的批评。幸运的是，这场危机通过友好交换信件而总算过去了。<sup>①</sup>

英美关于在英国设置中程弹道导弹的协议现已公开发表，没有引起什么敌视性评论。幸运的是我们坚持写进一条重要的条款，明确规定只有两国政府共同决定才能发射导弹。这一条款写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这确实是个运气。因为不出一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麻烦事。这一事件是由美国空军的一位上校的夸夸其谈引起的。他声称，他将——显然是说在他手中——“一手控制”在联合王国的火箭和火箭基地。

今天上午，人们被一个叫津克上校的谈话搞得“乱成了一团”。这位美国空军“银鹰上校”<sup>②</sup>声称他即将接管在英国的火箭和火箭基地的军事指挥权。这个谈话是和(1)上星期一公布的协议，(2)和我们在星期一向议会报告的和在昨天辩论中谈到的，都是直接矛盾的。因此津克上校犯了一个不该犯的大过错！<sup>③</sup>

乍看起来这个名字未必真实，因为它更像个国际组织或联合国一个机构的名称。但不久一切都核对清楚了，包括这位惹事生非的武士所发表的吓人的谈话。幸好我国驻华盛顿使馆起来应付了这件事。

我在八点半(华盛顿时间晨二时半)读到报上的有关短讯。中午(华 475

① 见附录 4。

② 美国上校军官肩章的银鹰标志。——译者

③ 1958年2月27日。



盛顿时间早上六点)我们向使馆打了电话。国务院于伦敦时间下午三点半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半正式辟了谣。这个辟谣声明于下午三点三刻在杰弗里·德弗雷塔斯发言时向下院作了宣布。我向英国驻美大使发了祝贺信。美国这个国家常常因为它各级军官的愚蠢行动而受到危害。<sup>①</sup>

我在日记里还加了一段推测性的话：“这件事如果是针对他们国家的话，美国人的反应将会截然不同。”<sup>②</sup>

在以后几个月里，最高级会议问题的讨论一直不断地在进行。2月28日，苏联政府同意在一定条件下举行外长会议，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但这些条件却又是否定了外长会议的必要性。因为外长们将只允许讨论“技术性问题，而不谈实质问题”。这就是说，他们只能协商会议地点、时间和人员的组成，而不能讨论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最高级会议将被宣传幽灵所笼罩，将成为争论不休的场所。北约组织各国开始进行协商。3月4日，我邀请我的老朋友、现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的斯巴克先生进行会谈。他当时正巧在伦敦。

我向他转达了我国和华盛顿之间的来往信件。和我一样，他对这件事到底怎么进行才好，感到焦虑不安。事实上，北约组织各成员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法国人对氢弹并不感到惧怕。他们认为俄国人不会使用氢弹，只要美国人保持他们的基地，俄国人就不敢发动进攻；意大利人压根儿就不想参加“最高级会谈”，因为他们即将举行大选，基督教民主党人必须把共产主义当成可憎恶的东西，共产党人是不可接触的。比、荷、卢三国随大流；联合王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赞成最高级会谈，希望会谈能产生一些积极的成果；美国公众坚决反对谈判；加拿大持中立态度。<sup>③</sup>

476

我的同僚们总的来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美国人仅仅回答

---

①② 1958年2月27日。

③ 1958年3月4日。

说,各国外长除了讨论怎样组织最高级会议外,还必须讨论一些实质性问题。这种不痛不痒的交换信件又被一个奇怪的插曲所打断:

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疲劳烦人的夜晚。下院会议开到很晚,差不多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半夜后晨报的第一版开始到达。《每日先驱报》刊登了一条内容详细的文章——头条新闻——说邓肯·桑兹(国防大臣)将根据我的指示前往莫斯科,绕过华盛顿和北约联盟直接和莫斯科交涉,单独和他们达成一项协议。这当然是苏联使馆交给《每日先驱报》的。他们上当受骗了。不巧,桑兹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在广播讲话以后就回家睡觉。打电话和派人去叫门都无法把他或他的管家叫醒。一直到星期五早上我们才把情况搞清。

3月7日,议会党团领袖,桑兹,哈罗德·埃文斯和霍耶·米勒(外交部官员)于十点前来讨论桑兹事件。事情看来是这样引起的:在我出国旅行期间,桑兹接到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信——其他大臣也经常收到类似的邀请。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都是不接受邀请的,直到最近才有变化。经和外交大臣商量,他“原则上接受了邀请”,但没有确定时间,或者说,也不一定会考虑访问的时间。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起草了一份声明,发给了报界,希望这份声明能把这个事件“刹住”。但这件事却弄得我们几乎一整夜没有合眼,真是烦人。<sup>①</sup>

这虽是一个小小的风暴,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在乘着纸船航行啊。

与此同时,北约组织会议已圆满结束。各成员国对我们和美国人处理最高级会议上的做法表示满意。他们当然不愿别人在后面催促得太急。尽管他们的地理位置更处于危险地带,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感情上并没有像我们一样陷入核恶梦之中。当然,拖一拖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一旦签订了协议,规定停止核试验,或“切断”基本原料的供应,我们必须明确得到废除麦克马洪法以后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我们和法国人一直在紧密磋商。他们极

<sup>①</sup> 1958年3月6—7日。

477 力避免卷入纯粹是俄—美之间的争论中去。3月,皮诺,杜勒斯和劳埃德前往马尼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经协商,他们同意开始新的谈判,虽然各人的热情程度有所不同。这些会谈,如果可能的话,应推动召开外长会议乃至最后召开最高级会议。

塞尔温·劳埃德回到伦敦后,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他最近和杜勒斯会谈的情况。

在最高级会议问题上,总统起很少的甚至可以说不起什么作用——一切都由福斯特·杜勒斯来决定。他很想帮助我们,如果那样做不危害他所认为的西方总体利益的话。对我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只有三、四段话——提出的想法,他现在还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在声明中提出了西方在最高级会议应采取的立场。这个立场定将为各国人民所理解,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sup>①</sup>

因此,我于3月17日向总统发了一封信,希望能影响美国的态度。

塞尔温·劳埃德刚刚回国。他向我汇报了福斯特和他在马尼拉举行广泛会谈的情况。尽管会议很紧张,但对各国外长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们在没有多少公众注意的情况下进行密切磋商……。

让皮诺出席这样的会议是很有益的。他在以往二、三年中懂得了不少东西。他这个人本质上是温和的,讲道理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尽可能让法国人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俩都清楚,他们是很敏感的,也是很难引导的。

478 现在谈谈最高级会议。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形势还是好的,但我们一定要比俄国人走前一步,不要陷入他们设的圈套。我相信您和福斯特都意识到俄国人有甩手不干的危险,并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演讲使我感到他正在策划这种圈套,或至少是在为退却作掩护。另一方面,他也许会在议事日程上进行讨价还价……。我所期望的是我们应该尽快提出一项建设性的建议,把包袱摔给俄国人,并使大家理解我们的做法。塞尔温在给福斯特的回信中将提出一项我们制订的

<sup>①</sup> 1958年3月16日。

阐述西方立场的建议声明。声明内容以下几点至关重要：如果有较大的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就必须召开一次会议，哪怕是有限的会议也行；要在主要问题上进行彻底的讨论。不管是否能达成协议，这样的会议也是必要的。我个人认为，目前最好让大使们开始这项工作，当他们取得一些进展时就召开外长会议。外长会议是我们在北约组织开会时首先提出的建议，俄国人原先拒绝现在又似乎愿意接受这项建议，所以我以为我们千万不能在这上面退却。俄国人同意举行外长会议毕竟是一种退让。他们原先拒绝这样的会议，我推测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福斯特的对手。当然我完全同意最好是首先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意见。这样我们就能完成重要的工作，同时维持我们的原有立场。自然，我们应该使大家清楚，无论是大使们的第一步的准备工作，还是以后外长们的工作，都不应作出实质性的决定或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他们必须做的就是准备两方面的议事日程。第一，我们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议题，不管这些议题是多么的次要；第二，一个名符其实的最高级会议必将讨论的重要议题。我想，尽快发表这项声明将是关系重大的，因为我们一旦确定了立场，在将来各级谈判中我们就有东西可以遵循了。我们还要在北约组织内讨论这项声明，估计这将在一周内就可结束。

当时人们对核威胁感到忧心忡忡，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现在很难想起这种情绪是怎么席卷全国的。公众中比较极端的过于激动的成员组织了压力集团，在有点讹诈性的“禁止核武器”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这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混淆不清的。有些人认为这就是要我们放弃建立核威慑力量的努力。另外一些人显然认为俄国和美国也会响应这种要求的。苏联政府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惧怕心理，因为他们很清楚，任何只涉及核武器的裁军协议就使他们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479

布尔加宁又发了一封振振有词的长信，其目的主要是想欺骗意志薄弱的同胞，而不是为了采取一项真诚的行动。<sup>①</sup>他重申了他

<sup>①</sup> 《关于最高级会谈和苏联的通讯录》，敕书第423号（皇家文书局，1958年5月）。

的建议，即外长们应立即开始工作，但他们只能担任他说的“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在最高级会议上，德国的统一问题也不应作为讨论的项目。这是东西德两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别的国家无关。但在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和撤除在国外的军事基地上，可以取得一些进展。他还宣布说，他的政府对西方国家的诚意表示怀疑，特别是在英美最近达成的关于中程导弹的协议以后。

由于外交大臣随同女王在荷兰进行国事访问，我向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急电，让他转告杜勒斯，告诉他我迫切感到和布尔加宁这种漫无边际的通讯应该停止了。除非我们随时小心谨慎，否则更加大量的信件将向我们投来，将给国内和整个欧洲造成新的混乱。我们必须发表一个声明，阐述西方立场。但必须提醒杜勒斯，

我们不能以北约组织的身份说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所以重要，原因有二。首先，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责任大大超出于北约组织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两国的核弹不仅仅为了保护欧洲，而且还要保护中东和东方。其次，我们不应以北约组织的代表身份出现，否则，其结果将不是一次最高级会谈，而是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之间的一次会议。

我还担心苏联政府可能抢先采取行动，单方面宣布停止核试验。我国对停止核试验的态度是错综复杂的，因为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废除麦克马洪法的提案。3月27日，我们听到布尔加宁辞职和赫鲁晓夫接任总理的消息。赫鲁晓夫通过漫长的时间，玩弄阴谋诡计实现了他的野心。尽管我们当时对此了解甚少，但很显然，我们不得和一位掌握了具有总统权力的人打交道，虽然他的权力还不一定超过列宁和斯大林。高兴的是，西方外交界乘这一时机迅速采取了行动。3月29日我向赫鲁晓夫拍发了代表英美法三国声明的全文。声明短小精悍。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就不必把精力放在那些冗长的公开来往信件上，就可立即

着手进行认真的准备工作。声明信这样写道：

1. 目前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作出严肃认真的努力，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和稳定，必须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协议。根据这种情况，如果最高级会议能就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提供机会，又能成为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一个有效手段，那么这样的最高级会议是可取的。

2. 显然，最高级会议要在这些情况下得到召开，做好准备工作是很必要的。

3. 准备工作可通过外交渠道交换意见开始，然后进行各国外长会议。

4. 准备工作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各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分歧的原则立场，并确定提交政府首脑考虑的题目。准备工作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作出什么决定，而是通过一般性讨论提出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

5. 各国外长在圆满完成了准备工作以后，就可在最高级会议的时间、地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最高级会议的组成问题。

6.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这样的程序，我们建议4月下旬在莫斯科开始通过外交代表进行交换意见。<sup>①</sup>

正如我所预测的那样，我们的声明刚好赶在他们的前头。3月 481  
31日——我们的声明发出两天以后——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的决定，并要求其他国家也照此办理。我在日记里记录了那个周末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

1. 葛罗米柯宣布了苏联政府单方面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决定。（他们刚刚结束了一系列大型的逐步升级的核试验，因此他们这种声明只是欺骗普通老百姓的一种宣传花招。当然这对《每日镜报》编辑一类的人，对激进分子和一般的社会主义者，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2. 经过几周的反复争辩，美国政府和北约组织的其他各国政府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就最高级会议向俄国作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事实上我在几周前就已草拟了这份文件，并打电报给了在马尼拉的外交

<sup>①</sup> 《关于最高级会谈和苏联的通讯录》，敕书第423号（皇家文书局，1958年）。

大臣。那时，杜勒斯根本就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经过耐心的说服，他改变了看法——变得正是时候。（从总统的信看来，他一直是很灵活的，但他在最后总是听杜勒斯的。）然后，我们得争取北约组织的支持。

写出这封信的要旨是再容易不过了——只要在我们的文本上修正一二处就可。但接着来的问题是，谁把这封声明信递交给莫斯科？为这件事，北约组织的代表又争论了几天。意大利、土耳其、希腊和比利时都要参加进来。对意大利来说，由于大选的关系，这件事对它事关重大。通过来回不断的电报电话，最后达成了协议，决定由日内瓦会议参加国——联合王国，法国，美国——负责递交，并同意，不能因此影响其他各国外长或政府首脑参加会议。

葛罗米柯是在星期一下午发表演说的。盟国声明是同日下午递交并于当天下午五点发表的。（六点新闻时间广播。）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关于最高级会议的照会抵消了俄国关于核试验决定的宣传影响。自然，我得向内阁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争取他们赞成我将在下院所采取的态度——在核试验上，我们要坚定不移。<sup>①</sup>

482 每周两次我得到议会回答质询，虽然还不能说是考问。其内容都是关于原子放射性尘埃、核试验和通向最高级会议过程中的问题。由于要准备回答议员提出的书面问题以及可能临时提出的问题，我还每二周一次会见具有专门知识的科学家。他们认真耐心地给我辅导高深莫测的原子能神秘理论。可惜我对这些高能物质所具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古罗马卢克莱修的水平上。不过，我发现，靠背诵——或者伊顿公学里所说的“背书”——我还记住不少，使我顺利对付有关专门知识的质询的各个回合。而当这种苦难一过，一切又忘个精光，下次又得从头开始，这个过程总是反复的进行。对法官们来说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除了法律以外可以什么也不懂——尽管最普通的东西，他们还是享有名望，自己也感到心安理得；但大臣们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要求什么都懂才行。

<sup>①</sup> 1958年4月1日。

这次，正如我所预料的，俄国新发表的声明受到工党左派的热烈欢迎。这些人中，有些是真心实意的和平主义者，而另外一些则是公认的“同路人”。在这种形势下，我总是看看欣韦尔是否在场，如果他在的话，我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把这件事交给这位感情激动而爱国的人物，由他去进行恰当的驳斥。盖茨克尔尽力保持中立。虽然他感到必须批评政府丢失自己的机会，但他是非常小心谨慎，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他是不会因苏联建议中显而易见的虚伪性而受骗的。俄国人不顾普遍裁军所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刚刚结束一系列大规模的“肮脏”试验，而现在又提出停止一切核试验。

质询顺利过去了。因为工党力图要掩盖它在整个防御问题上的深刻内部分裂，他们曾提了一个折衷方案——“在最高级会议前停止一切核试验”，所以，表面上他们处于很有利的地位。但我坚定地维护我们的立场，并得到下院的普遍支持。所有爱国的工党成员都已看透了俄国人所搞的宣传把戏。他们在一周中连续进行了三次百万吨级的核试验，然后却提出停止一切核试验。<sup>①</sup>

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考虑一些能使事态前进进一步的办法。<sup>483</sup>如果我们无法在裁军上取得进展，是否能在贸易上有所前进呢？我总是想，对所谓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贸易上所作的限制是有点扩大了。因此我向外交大臣询问：

和俄国的贸易情况怎样？您认为什么时候对美国人采取强硬路线合适？我推测，这要等到麦克马洪法的修正案通过以后。我认为废除这些限制可能是我们从最高级会议取得的成果之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此准备好充分的理由。我认为美国总统和杜勒斯确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所担心的只是国会。但让对中国的禁运商品项目和对俄国禁运的项目一致起来，我们感到压力集团多少是不怎么积极的。

同一天，即4月1日，哈马舍尔德和我们共进晚餐。他从莫斯

---

<sup>①</sup> 1958年4月1日。



科回来路经这里。

哈马舍尔德是位和蔼可亲、很讨人喜欢的人。但他说话总是非常含糊不清，所以他的讲话很难理解……。赫鲁晓夫现在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无人敢提出异议。他对他自己和俄国的力量信心十足。他是决不会妥协的。我们一定要举行最高级会谈，但我们无法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最多也许在核试验上取得一些进展——就是说，如果我们准备停止试验的话。在大部分武器和科学发展上——特别是在“空间科学”上，俄国人都走在西方的前面。这样，哈马舍尔德——（也顺便证实了我们情报机构掌握的情报。）<sup>①</sup>

赫鲁晓夫立即采取了行动。4月4日，我收到他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又是呼吁又是恐吓，真是荒谬绝伦。这是精心策划后而写成的一封信，其目的是为了吓唬胆小鬼，引诱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知道（他写道），英国各界人士对继续进行原子和氢武器试验感到焦急。仅就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一点来说，他们认识到一场原子弹战争对大不列颠王国将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他接着指出核试验对健康的危害。

484 在和平时期用于试验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原子弹和氢武器爆炸正在危害着和平的、虔诚而完全无辜的各国居民。由九千二百三十五名科学家签署的呼吁书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科学家来自四十四个国家，包括英国和苏联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今年1月，这份呼吁书已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这份呼吁说，每进行一次核试验就在世界各地增加大量的放射性散落尘埃，严重危害着世界人民的健康，威胁着后代子孙的正常发展。在谈了达成一致协议的艰难以后，他的信接着就大谈苏联政府的崇高意图。

为全面停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开创实际的一步，为把人类从一场毁灭性的原子大战的威胁中拯救出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决定在苏联境内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试验。

---

<sup>①</sup> 1958年4月1日。

然后是一段正式的声明。

遵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的这项决定，苏联政府“决定从1958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一切原子和氢武器试验”。

当然还有一条附加条款。如果别的国家拒绝响应苏联的决定，苏联将“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考虑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不再承担已作出的义务”。

相当大一部分工党成员全盘接受俄国的这一新的行动，有的是诚心诚意地接受，而另一些则是出于政治原因。甚至盖茨克尔都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国内存在着广泛的愿望，希望我们作出现实的反应，表明我们乐意停止核试验。比万更是直截了当。他说：“首相为什么不能用一点道义上的勇气采取行动，接受这一呼吁？”回答当然很简单：

我比其他任何尊敬的议员同僚们更迫切希望获得进展，但同时我急切希望这要通过适当的谈判，适当地停止试验，并有成效，不危及我国自身的安全。至于说道义勇气，下院应该作出判断。<sup>①</sup> 485

公众舆论虽然感到焦急，但仍坚定不移。就是最易激动的批评家也认为在向苏联建议作出正式回答之前英国政府必须和它的盟国进行磋商。这所以必要是因为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在最近的将来都有核试验的计划。所以，我们的政策必须完全协调一致。任何有关停止或取消核试验的问题，甚至是中断原料供应，我都必须要得到总统的新的保证，保证“对我们照顾到底”。

我国驻华盛顿大使哈罗德·卡奇亚报告说，杜勒斯对和俄国谈判是否有积极成果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新的姿态纯粹是一种宣传。他不相信俄国人在最高级会议上准备达成任何协议。因此，他不肯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作任何让步。艾森豪威尔于4月8日对赫鲁晓夫作了回答，再次建议，由专家讨论制订一个可行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4月1日。

的视察制度,以监督停止核试验情况。几天以后,即在4月21日,我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苏联政府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议,但会议只能讨论最高级会议的时间、地点和组成问题。虽然这并不表明有什么新的进展,但西方国家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接着就是一场几乎是拜占庭式的复杂的争论,争论葛罗米柯是单独接见还是集体接见大使的问题。

4月16日,正在伦敦的阿登纳说,“对付俄国人并揭穿他们最好的办法是把‘有监督的裁军——常规的和非常规武器裁军’作为我们的主要目的”。<sup>①</sup>

4月21日我再次给赫鲁晓夫打电报,强烈敦促他同意举行专家会议。

486 自从4月4日您给我写了关于核试验的信以来,莫斯科谈判已经开始。我希望谈判能为最高级会议铺平道路。很遗憾,在程序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我深信举行外长会议将很快作出满意安排,然后就可召开政府首脑会议。在我看来核试验问题应和其他裁军问题一起,作为会议讨论的题目之一。在这一方面,任何可行的协议当然要取决于一个一致达成协议的视察和监督制度。所以我想我们是否现在就抓紧实现已提出的建议,就是技术专家应该开会拟订一套这种制度所必须的一些措施。

但我的电报还没有到达他那里,他就再次重申反对召开专家会议。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谈判令人讨厌地僵在那里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在伦敦、华盛顿和巴黎之间协调我们的行动。

昨天和今天打了不少电话。俄国人又提出建议,进行大使会议,为最高级会议作准备。他们想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加进来。对这个想法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危害;但美国和法国却是不会愿意接受这一点的。<sup>②</sup>

---

① 1958年4月17日。

② 1958年4月27日。

这个建议最后被拒绝了。总统再次重申召开专家会议的建议，由他们讨论有效监督核试验的可能性。4月25日，利用在阿伯特纪念堂召开报春花联合会大会的机会，我深入地阐述了我国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根据的理由，借此稳住公众舆论。另外，我还揭露了工党在防御问题上所采取的骑墙态度。我认为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

在这次争论过程中，我感到工党的立场是混乱不堪的。看来它关心维护党内团结胜于关心保护大不列颠王国的防御利益。对于那些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并表示尊重。他们认为基督教的责任要求他们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任何形式的自我防御都是错误的。 487

我说尊重他们的观点，但不是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不认为这些观点有可能成为我国任何一届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但社会主义者这部分人不是从宗教道德这个意义上来反对核武器的，他们对待核武器问题上总的态度是暧昧的，软弱的。大多数人现在也说英国应该拥有原子弹，而且不应单方面放弃它。我同意这一点。但如果我以前听了他的话，那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原子弹了——或者说我们有一颗没有试验过也不知是否有效的原子弹。

去年这个时候，在进行第一批试验之前，当时我们还没有一颗真正的原子弹，工党全党在盖茨克尔带领下对我提出责难，指责我继续试验核武器，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运动，阻止核试验进行。各个方面都对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我施加压力的许多人是真心实意、思想高尚的人们，我深为他们的思想所感动。有些人却并不那么正派。如果我当时屈服于这些压力的话，盖茨克尔先生目前的政策肯定要比现在更愚蠢。现在他说了，英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并利用它在最高级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甚至比万也说，我们手中没有原子弹，那我们只能赤身露体去参加会议——虽然后来他一直想用好的意思来为他这个一念之差辩解。

去年反对党提议对我们投不信任票。我想冒昧在这里重复一下我

在议会回答问题时说的话——“我们就是要依靠核威慑力量——当然是要恰到好处。我们准备推迟核试验——但不是推迟很久。我们要求其他大国也同意取消一切核试验。如果他们一旦同意这样做，那么他们手中就有经过充分试验过的原子弹，而我们却只有一个根本没有经过试验的炸弹。所以，我们的防御理所当然地要依赖于美国的核力量。但同时，还是那些尊敬的议员同僚们，他们又对我说，接受美国的火箭，不管是送给我们的还是卖给我们的，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在我们能制造自己的弹头之前，弹头是由美国控制的。幸运的是，下院拒绝了一项摇摆不定的政策。”

然而，盖茨克尔看来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作为工党的领袖，他还是正式地反对英国进行核试验。

我提到在这场曲折的争论中出现的最新变化。

俄国人在刚刚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试验以后，却要求我们取消核试验，没有任何检查监督的可靠协议，并孤立于其他裁军措施之外。这好像在足球赛中一样，一队踢进二球后，要求对方停止比赛。盖茨克尔先生说，我至少应该在最高级会议前停止核试验。如果这样做目的是希望赫鲁晓夫讲理智，或者说为了避免刺伤他的敏感天性，这是很不现实的，而且简直是异想天开。当然，那不是盖茨克尔先生的真正意图。他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并不感兴趣，他更为关心的还是比万先生的感情。表面上他在他党内暂时总算维持了团结一致的局面。他和比万并肩地坐在下院的前座。不过，在那个位置上他们看来并不很愉快，但事实就是这样——盖茨克尔先生无论怎么说还是暂时把比万先生控制住了，他才表现很乖。

盖茨克尔先生极力把自己标榜为一个负责任的，是可以把我们伟大民族的防御任务交托给他的政治家。但我必须说明，他目前发起的旨在结束我国所要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的运动，决不是政治家的风度。这完全是机会主义。他的做法是为了掩盖反对党内部的分裂，而绝不是为了加强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基础。

4月29日，我接到报告说，英国在前一天进行的氢弹试验获

得圆满成功。这条新闻立即向全世界作了公布。我预料到这将在下院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事实上盖茨克尔的抗议是徒劳无效、混乱不堪的。当然许多事情还有风险。

美国人开始考虑在某种条件下停止进行核试验。我国上周进行的试验获得成功,并把下次试验日期提前到9月1日。那就完成了一系列 489 的试验。不过我们还是要依赖麦克马洪法的修正案。①

5月9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

俄国人提出了一项试探性的建议,建议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对侦察核试验的实际可能性进行调查研究,并作出报告。这一点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因为我们差不多在一年前就提出了,并从此一直坚持这项建议。②

事态越来越明朗。英国政府,特别是英国人民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召开最高级会议,是希望能达成一项为我们能接受又不致危害我国利益的普遍裁军协议。目前事态有进展,英国政府准备起带头作用。他们当然无意设置任何障碍。然而,就核试验来说,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进行核试验是不能公布于众的。5月29日,我在主要有关大臣会议上向他们解释了这种情况:

我国上次(几周前)进行的试验很成功。而预定在9月完成的一系列试验对我们来说又是绝对重要的。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只需进行二次。但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在要试验的新的特殊装置系统上发生毛病,那我们就要进行二次以上的试验。(至迟)我们必须在10月31日之前完成一切工作,并可能要提前。在下列两种压力面前我们能否顶得住:(1)目前公众和政治压力;(2)别的压力。在联合国报告了对健康影响以后,这种扩大了的压力是很可能的。这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试验,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可靠的武器,

---

① 1958年5月1日。

② 1958年5月17日。

或者说没有能抵消敌人的一种武器。后一点确是性命攸关的一点。但是,(在麦克马洪法修改前,在美国达成新的协议之前)我们还不能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有关麦克马洪法修改的消息还是令人鼓舞的。修改提案已过了委员会这一阶段。在国会休会前必须有三十天考虑酝酿这个提案,因此及时缔结一项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将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一切都押在这上面!如果我国能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顶用的协议,我们就不一定再需要进行核试验了——即使只有这一系列试验,我们也能处于更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而一旦和美国达成可以依靠的协议,那我们秋季要举行的试验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没有这些协议,我们秋季的试验对英国的安全和强盛就是极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试验继续下去。<sup>①</sup>

与此同时,阿登纳在最高级会议的原则立场上也在发生变化。这显然是内部压力的结果。5月23日他写信给我说:

看来要成功召开最高级会议确是困难重重。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克服这些困难。如果我们任凭苏联来宣传下列有影响观点,那我认为是很危险的。他们会宣传说,是他们在最高领导层努力争取举行会谈,至少是进行扫清障碍的会谈,而这样的会谈所以未能实现完全是西方造成的。在我们努力实现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有效的监督裁军也就是实现政治上缓和时,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苏联的宣传占了上风,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最终至少能取得可以接受的部分成果的可能性。我也发现苏联在原则上表示了某种共同的出发点,作为一个开端愿意参加谈判,研究怎样建立监督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试验的制度问题。

5月31日,在伦敦、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经过多次电话联系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向葛罗米柯递交了西方建议。这些建议概括了最高级会议议事日程上要讨论的总的题目以及每项下面的“小题目”。赫鲁晓夫隔了六个星期都没有作答复。

同时,我为再次访问美国开始作准备。我将在印第安纳州格

---

<sup>①</sup> 1958年5月29日。

林卡斯尔的德帕尔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我还将访问华盛顿。我迫切希望会谈不应只局限在眼前西方所面临的政治和裁军问题上。<sup>491</sup>这些崇高的愿望毕竟还得取决于未来的行动，而且很可能被证明是幻想。但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面临着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更严重的话，至少也是更为迫切。在英国，我们被迫用限制性手段保护我们的英镑储备，加强国际收支。这些限制性手段虽然不算过分，但我是很不喜欢的。其他国家也处在类似的困境之中。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工商业衰退，并采取了一项小心谨慎甚至是紧缩通货的金融政策。

美国人对贸易和流通问题采取了相当狭隘的，当然还不能说是落后保守的态度。为了把美国人的思想从这种态度中解脱出来，我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阐述了我的想法。除了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其他一些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我认为是极端重要的。第一个是怎样组织经济援助，特别是提供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问题，负责监督经援的分配，使这些国家事先作好计划，以免造成浪费，并鼓励这些国家把我们的援助用于和平的目的和合法的防御目的。

另一个是怎样保证提供足够的财政信贷，促进贸易的稳定发展。如果自由世界因为未能给财政机构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而使生产力停滞不前，这将是一个悲剧。工作与生产是抵御共产主义颠覆的最好防御手段。自然，英镑体系是现今世界信贷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在维护世界贸易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我们应该有能力担负起应尽的义务，帮助解决国际流通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愈来愈大的储备对英镑区其他国家将起着缓冲的作用，这样，那些国家就不致于被卷入世界贸易的衰退中去。但如果美国财政部继续执行所谓保守的政策，这一切都将无济于事。世界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总需得到满



足才行。

我当时还没有向总统提出确切的建议。但我本能地感到，即  
492 将来临的时期，反共斗争将逐渐移向经济领域。只要我们维护盟国  
团结，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发动一场热战。但冷  
战将在各个方面加剧起来。世界贸易的衰退对西方的稳定将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

我的这些想法结果是石沉大海。不过，后来我和艾森豪威尔  
的继任者又阐述了这些想法。

我不但向英联邦各国政府首脑，而且还向阿登纳和戴高乐通  
报了我即将对华盛顿的访问。6月7日，我开始了这次新的旅程。  
在出发前，我收到了蒙哥马利给我的很有特色的一封信。蒙哥马  
利当时正担任北约组织最高副司令官。他的信叙述了他最近对美  
国的访问以及他和杜勒斯会谈的情况。他曾对国务卿说，他

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很不一致。美国在欧洲和西方大国一致合作，但在  
中东、远东和非洲又反对他们。

不知是否由于这位陆军元帅的批评，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杜勒斯  
在政策上即将有个显著的变化。

应总统的殷切邀请，多罗西同我一同前往访问，后来证明她的  
同行对我们这一小批随行朋友们来说是个鼓舞，并起了很大的作  
用。诺曼·布鲁克和以往一样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他博得大家  
的信赖和爱戴。秘书和打字员班子照常由弗雷迪尔·毕晓普和菲  
利普·德朱利塔率领。

我们一行于上午十点左右抵达华盛顿。福斯特·杜勒斯在机场迎  
接我们。迎接我们的还有哈罗德·卡奇亚和他的夫人。我们刚到达，就  
立即开始了工作——为了准备议事日程等，要有许多工作要做。埃德温·  
普洛登爵士到达华盛顿，就麦克马洪法修改后怎样制定协议进行谈判  
……。因为国会预定在8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末就要休会，这项工作是

非常紧迫的。①

第二天是星期日。印第安纳格林卡斯尔的仪式如果不是因我这次访问,也是我访问的一个借口,因此,哈罗德·卡奇亚和我还有毕晓普,德朱利塔,离开了华盛顿的不列颠使馆,于下午一点左右到达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493

到机场欢迎我们的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州长、市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明星报》和其他几家报纸的业主〔尤金·C·〕普利亚姆先生。我们乘车从机场直抵大学校长〔罗素·J·〕亨伯特在格林卡斯尔的住所。在通往校长住所的三、四十英里的路上,两旁都挤满了人群,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村子里的街道上许多小旗上写着“欢迎麦克”,或写着“欢迎回老家”。这的确是感人肺腑的场面。那天不巧有点风,否则天气也非常好,不太炎热——只有80°左右。在校长亨伯特的住所,德帕尔大学的全体教员都聚集在那里。最后,大约在三点三刻左右,我们乘坐一辆敞篷车前往体育馆。街上到处是人群。在体育馆里坐了六千——七千人。在奏了国歌等仪式后,“授学位典礼”开始。它给四百名“毕业”的青年男女授与各种学位,有些授与文学硕士,还给一些杰出的高材生授与博士学位。最后在五点半我的学位授与仪式准时开始,并向差不多全国各地作了电视联播。(据说至少有二千万人可以看到这个电视节目——也可能有四、五千万人!)教务长宣读了荣誉状后,亨伯特博士把我介绍给大会并向我授与学位。我的演说从五点三十五分开始,但必须在五点五十九分结束。我们对演讲词曾经过反复推敲,还要考虑到它的长度。演说准时在五点五十九分结束。当地听众对此反应非常热烈。当然,一切都要看更广泛的听众的反应——即演讲的对象,全体美国人民的反应。②

演说的主题是各国相互依存的问题。普利亚姆先生邀请了约三十位客人同我共进晚餐。

来宾主要是当地和邻近地区报纸的“出版家”和编辑人员。〔威廉·D·〕马克斯韦尔先生——他是著名的麦考密克上校的继任者——也在

① 1958年6月7日。

② 1958年6月8日。

场，代表《芝加哥论坛报》。堪萨斯州也有足够的代表。这里很好地集合了那些制造和反应美国中西部舆论的著名报界人士。晚餐后他们向我提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久的问题。我必须说对旧日的“孤立主义的”中西部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惊讶。而且一旦作了变化，他们就稳住，不再轻易变动，因为那里人们的思想是很固定的。普利亚姆先生给了我一张镶得非常美的我母亲的像片（一张很老式的像片）。这张像片也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这当然是友好的姿态。<sup>①</sup>

6月9日下午，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们。卡奇亚大使，诺曼·布鲁克和毕晓普也和我在一起。帕特·迪安，埃德温·普洛登和康·奥尼尔也出席陪同了一段时间。会见自始至终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直到下午六点才结束。

除了讨论其他事情外，总统和我草签了一项关于共同监督使用核弹或核弹头的协议。就美国在英国的基地来说，这个正式的协议替代了得到艾德礼和丘吉尔肯定的松散协定。我们还商谈了另一项协议（临时形式）。一旦麦克马洪法修改案通过后，这项协议将提交给国会（必须有三十天让议员考虑辩论的时间）。这项议案现在很有希望在7月1日前获得国会通过。因为这届国会预定开到8月第一周，因此我们很可能还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项协议。当然时间非常紧迫。如果我们在今夏无法获得这项原子协议，那只能等到翌年2月。这一切对我们核试验决策都将有重大影响。<sup>②</sup>

艾森豪威尔看上去身体很健康，不过他告诉我说时间一长就感到疲倦。但他每天都很早就开始工作了。他总是在上午七点三刻开始办公。

美国人看来很高兴。我想他们感到公众舆论比几周前更支持他们了。而这种形势使他们对苏政策变得更僵硬起来，特别是关于最高级会谈。<sup>③</sup>

---

① 1958年6月8日。

②③ 1958年6月9日。

第二天，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乘直升飞机去巴尔的摩，于十点三刻到达。

我们乘敞篷车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园。学位授与仪式正在进行，但对毕业生的授学位仪式已结束。总统和我受到大学校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艾克的弟弟)的欢迎。 495

在这次仪式上，艾克和我都被授与名誉博士的学位。在授学位仪式结束后，我们几个人发表了演说。艾森豪威尔兄弟俩对我说了许多美好的话。我的讲话比在德帕尔大学发表的要短——只有十五分钟左右——但两次演讲总的主题没有变。尽管英国财政部感到焦灼不安，我想我还是继续大力“兜售”这一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和军事上的相互依存一样必要。”<sup>①</sup>

和大使商量后，我还谈到一点关于最高级会议的问题。这段内容如下：

我们必须维护盟国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可靠保障——但我们还是可以逐步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即使不能一步成功。对此，我还没有丧失信心。

自然，我也不相信通过一次最高级会议，或任何别的什么会议，通过五、六个人就能在四天里把两种思想之间如此巨大的鸿沟填补起来。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时机成熟，意志坚定，这些领导人很可能首先在这儿取得一些进展，然后又在那儿取得一些成功，最后我们就可打破僵局，进入谈判。只要双方都愿意，那么他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愿意的。所以我们两国都认为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上首先开始进行有监督的裁军是行得通的。这里监督是关键。一旦双方同意在这方面进行探讨，那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开端。我们就为树立信心开了头，而信心就意味着和平。

在我们接受和欢迎这些一点一滴的进展的同时，我们必须立场坚定。任何别的什么东西都将是一种背叛。

---

<sup>①</sup> 1958年6月10日。

我们飞回华盛顿。在国会山,我和参议员 T. F. 格林共进午餐。那里还有不少著名的参议员,包括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参议员亚历山大·怀利。午餐后,他们陪同我来到参议院。参院  
496 刚因不满法定人数而宣布休会。当参议员都回来后,他们让我向这个庄严的立法机构发表演说。这就难住了我,因为我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要我讲话。但我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有次向我讲过,当上一名美国参议员就意味着登上了人类理想和幸运的最高峰。我的话使他们感到高兴。

下午三点,我们到国务院进行新一轮会谈。这轮会谈是讨论军事领域以外的相互依存关系——那就是经济和宣传领域。〔罗伯特·B·〕安德森先生(美国财政部长)很有趣。他态度和蔼可亲,说话简练扼要,但没有什么鼓动性。他接替了乔治·汉弗莱,(恐怕)他也继承了汉弗莱的因循守旧的思想。不过,他将无法应付时代的变化。美国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我的观点。就是一度强烈反英的孤立主义的中西部,现在也在改变看法。我们和安德森以及他的助手作了一次很好的会谈,其间杜格·狄龙倒很帮忙。然后我们和艾伦·杜勒斯以及他的助手进行会谈。我们在英美如何共同搞好宣传和反颠覆的合作上取得了一些进展。<sup>①</sup>

晚上我接见了英联邦各国的大使,然后到白宫吃了晚餐。这是一次男人的晚餐。

6月11日,我在国务院和杜勒斯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进行通常的午餐和对新闻俱乐部发表一通讲话以后,我便前往白宫。

在这里我们会谈了一小时——参加会谈的只有总统、杜勒斯、卡奇亚和我四个人。杜勒斯对未来提出了一些高瞻远瞩的想法。对未来我们的确还要做一些工作,还得有一次会议来讨论。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想为自由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制度。他和总统都感到,尽管我们都知道团结和谅解的含义,我们还应努力创造一些确切具体的东西来,留

---

<sup>①</sup> 1958年6月10日。

给我们的接班人。①

唉！这些理想在谈话中提出来容易，但实践起来谈何容易。除了其他的困难外，我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戴高乐在前进路上设置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他的狭隘思想和怀旧美梦。

结束了这次有益的可以说是鼓舞人心的访问后，我们离开美 497  
国前往加拿大，黄昏前抵达机场。在举行了通常的仪式后，我们驱车前往政府宾馆。

多罗西自从 1920 年我们订婚时离开以来一直没有回到过渥太华。她和文森特·梅西(总督)一起吃了饭。布鲁克，我和迪芬贝克以及他的一些主要部长，一起共进晚餐。②

第二天的安排如下：

九点一刻至十点一刻和总理以及他的一些同僚们进行会谈。十点半，电视访问。十一点至下午一点，向加拿大全体内阁成员发表讲话。气氛极其友好，会谈非常有益。和总督单独共进午餐后，我回到议会大厦。然后又和各部的部长们进行会谈，一直到下午七点。最后加拿大政府在乡村俱乐部为我和多罗西举行宴会。迪芬贝克总理作了简短的非正式讲话，我也讲了话——真是紧张的一天！③

13 日上午，加拿大下院举行欢迎我的仪式。众参两院的全体议员都出席了，因此议会大厅挤得满满的。

参议院议长作了简单的开场发言，然后总理讲话。我讲了二十五分钟。我的演说部分是用法语讲的。他们的反应都很好。这个发言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因此，我的确认为这不失为一篇精采的演说。④

中午我们和高级专员萨维尔·加纳爵士在恩克利福共进午餐。

这里曾经是约翰·麦克唐纳爵士的住所。现在是联合王国高级专员的住宅。它位于渥太华河岸，就在政府宾馆下方不远的地方。⑤

---

①② 1958 年 6 月 11 日。

③ 1958 年 6 月 12 日。

④⑤ 1958 年 6 月 13 日。

下午五点，我们离开加拿大。迪芬贝克总理

对我们一直非常热情周到。在离开政府宾馆之前，我给正在魁北克的前总理打了电话。圣劳伦特对我这样关心他感到很高兴。<sup>①</sup>

498 回国后我向内阁汇报了访问华盛顿所取得的成果。我肯定地对我的阁僚们说，总统重申了在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英美密切合作的传统做法，如果还不能说是原则的话。这不但包括了军事而且还包括了经济问题。至于正式关系，法国早已进入“常务委员会”，<sup>②</sup>因此，和法国和德国的磋商应该经常友好地进行。关于最高级会议和停止核试验问题，很大程度还要取决于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专家会议。他们将讨论成立监督检查系统的技术问题。如果我们在成立这样一个系统上有所进展，就值得我们努力，提出停止核试验。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非常规武器，裁军都取决于监督这个核心问题。

至于中东问题，美国人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将马上制订政策，支持我们的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同时对纳赛尔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但是冷淡的态度。但六个星期以后，美国突然采取了一项激烈的干涉行动。我们对此都感到大吃一惊。

在世界货币和流通问题上，我必须承认，我的各种努力都被婉言谢绝了。很清楚，美国政府不想采取行动制住衰退，他们也不准备放弃因循守旧的财政政策。我费了那么多心血而培育的种子，最多仍只处于休眠状态，至少暂时是这样。

我向下院发表了一项简单的声明，并向英联邦各国总理和阿登纳送了一份详细报告。6月底，对戴高乐进行了一次短时间的访问。<sup>③</sup>这次访问使我有机会向他叙述我在华盛顿了解到的情况。

---

① 1958年6月13日。

② 设在华盛顿的美、英、法军官委员会。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向此委员会负责。

③ 见本卷原书447页。

从加拿大回国后,我发现赫鲁晓夫已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打了十一张大页纸。除去空洞无物的话,其主要论点如下:

消除世界紧张局势是如此之简单——大家都停止核试验,放弃使用核武器,在欧洲成立无核区,不再在试探性预备会谈上扯皮,直接坐下来进行首脑会议。既然西方拒绝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这是否就意味着西方根本就不想进行会谈呢? 499

我在7月初的回信中,我认为有必要尽量客气地指出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还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您的方式只是简单地为了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而我们是想通过谈判解决使我们分裂的一些分歧问题。我们所以要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是因为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有效的手段,使会谈取得进展。

在现阶段我们还无法对任何会议的议事日程达成协议。葛罗米柯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也没有作出答复。

在这个问题上一再拒绝考虑任何达成协议的妥协办法就只能给人一种印象,您关心的不是最高级会议是否取得成功,而只关心要求举行这样的会议。我还必须指出,这种印象还出自于你们这样的行动,即你们事先不经过和我们商量,就擅自公布我们的秘密交换的信件。

同时,我还感到,取得某些进展也许还是可能的。所以我在信的结尾说:

虽然您的来信使我感到泄气,但我还无意放弃进行谈判的希望。我们当然不能放松努力。我诚恳地期待您作出努力,以互让的精神接受我们提出的程序上的建议,或者向我们提出您别的某种建议。

尽管出现了这些使人扫兴的信件,侦察核爆炸的八国专家会议还是于7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我还开始考虑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俄国、美国和英国可首先达成某种协议,从翌年1月1日起的两年内停止核试验,同时允许法国人进行他们的试验,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法国人比其他三国都开始得晚。但这个方案和其他许多方案一样,甚至被考虑的余地 500



都没有。

7月2日，我获悉总统已经签署了废除麦克马洪法的消息。这个根本的障碍总算扫除了。原子能双边协议将在8月4日国会批准后就正式生效。互相交换尖端的绝密情报将从那时开始，双方必须绝对毫无保留地执行这个协议。美国科学家迫切希望能了解我国在某些技术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我当然很高兴能在这些问题上对他们给以直接的支持。在这个令人高兴的时刻，总统和我互相发了祝贺电。

亲爱的哈罗德：

昨天，我愉快地签署了原子能法修正案，使其成为法律。今天上午，我很荣幸能授权国务卿签署我们两国政府达成的双边协定。这是两国代表胜利谈判的结果。我们已立即把协定送交国会批准。

谨致热烈问候

您的

艾克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两国间的原子能协定现已签订。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对您的感激，感谢您自始至终在这项权利上给我们的帮助。使我特别感激不尽的是您理解我们在拟定绪言时碰到的困难。我在上周电报中已和您谈过这些困难。我深信国会将能批准协定生效。

这个协定必将成为在伙伴关系上影响深远的象征。这是我们两国都期望的自由世界各国应有的合作关系。

谨致热烈的问候

您的

哈罗德·麦克米伦

501 几个月来，伦敦与波恩之间一直在争论着支援费用这个令人烦恼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表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美国人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直采取帮助和同情

的态度。最后，总算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根据协议，在1958年，德国将捐助一千二百万英镑，并另外提前预付二千二百五十万英镑作为德国战后分期贷款债务的一部分。这笔债务原定将于1962—64年到期。另外，德国将把五千万英镑存入英国银行作为防御设备提前支付的款项。在1959—60和1960—61年里，德国政府将每年捐助一千二百万英镑。经德国同意，在1959年，英国部队将从五万五千人减少到四万五千人。夏末，这项协议为北约组织各盟国所接受。

在1958年上半年，从英国公众舆论来说，对外交事务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核试验问题以及召开一个新的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上，即三个西方大国，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和苏联政府的首脑会议。但正当这些谈判正在继续进行时，7月中，我们的注意力再次突然转向中东。

## 第十六章 天方夜谭续编

在中东,1958年一开始就不祥。1月,在安卡拉召开了巴格达条约组织部长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很鼓舞人心的,这倒不是因为美国人提供了一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在会议期间传来了有关新的威胁性行动的消息。2月1日,埃及和叙利亚宣布组成联邦,取名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件事证明是一段混乱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时期的信号。西方大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1月底,也门政府要求我们撤回代办,这就说明了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普遍动荡不安的局面。他们这样做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但是那些随同也门王太子穆罕默德·巴德尔访问欧洲和远东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他与共产党国家的轻率往来已经导致1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一个五年协定,同时,发表了一项言词骄横的声明,在声明中王太子参与和周恩来共同谴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已几乎成为说教式的词句。随之是与莫斯科的调情。然而,也门政府犯下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恐怕还是3月8日发表的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决定。在此后的年月里,他们将为这一愚蠢行动付出巨大的代价。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作用是加强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亲密合作。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部分成功。2月14日,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正式宣布两国组成阿拉伯联邦。

伊拉克的老练的政治家努里于2月中旬来到伦敦。再次见到  
503 这位忠实的贵友我十分高兴,但这次我感到他激动的情绪不同寻常。

他今天将返回伊拉克并准备再次出任总理。为使叙利亚脱离埃及，他考虑了许多计划——其中有些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危险的，比如他要我们促使科威特君主在某种形式上参加伊拉克—约旦联盟。我们考虑的是既要阻拦努里执行注定要失败的无法实现的危险计划，又不能给他泼冷水，或损伤他抵抗埃及或俄国的意志。美国人(据努里说)已答应给他援助，但他的说法与美国人自己告诉我们的不十分相符。不过，我们将澄清这件事。<sup>①</sup>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即叙利亚人如果得到纳赛尔的鼓动，有可能准备用切断输油的方式给他的邻邦伊拉克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在3月初要财政大臣制订一项计划，要求至少能确保减少部分损失。

努里告诉迈克尔·赖特爵士(英国驻巴格达大使)，鉴于这种情况，他想适当借一部分贷款。他说借款可能在五百万至二千万英镑之间。您是否能紧急研究一下，能否向伊拉克人表明，假若叙利亚人采取行动造成伊拉克石油收入进一步亏损，伊拉克石油公司愿意进一步提供援助。您如能这样处理，我将十分感谢。这次贷款将把1957—58年签订类似贷款的最高额二千万英镑未使用的差额部分补足。当然，我们必须首先与伊拉克石油公司进行磋商。为取得他们的同意，我们首先必须答应女王陛下政府将相应地向公司作出保证。

我希望，这一措施是在输油管不会再被切断的情况下采取的。我认为我们的援助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走运，我们就根本不必化费这笔钱。

努里的另一个计划在我看来并不恰当。他急于希望我们放弃 504 在科威特的地位，给科威特完全独立，这样允许它成为伊拉克—约旦联盟中的新成员。外交大臣向我汇报了他就这个问题和国王以及努里的讨论情况。外交大臣对这个计划是否明智表示怀疑。我与他也有同感。科威特人毕竟还是有可能被拉入埃及，而不是

<sup>①</sup> 1958年2月17日。

伊拉克。他们对伊拉克怀有种种嫉妒心理，而正是这一点才导致了后来发生的危险局面。我们并不反对结成某种友好性质的联合，伊拉克建议的联盟显然是使伊拉克和约旦两国的手伸入科威特的巨大财库以丰富他们自己的收入。劳埃德坦率地向努里指出，在宣布科威特独立而同时又命令它加入伊拉克—约旦联盟这两个概念之间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保持我们对科威特以及波斯湾其他酋长国的保护将肯定更为明智。同时，我们能够做到的，也是已经做的就是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和资金，并且说服美国人也能提供慷慨的援助。

麻烦在另一个地区开始出现。亚丁是英国势力关键的前哨阵地。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居住在那里的极其复杂的混杂种族，亚丁也是不断产生麻烦的发源地。4月间，亚丁保护地的边境村庄和部族要塞连续遭到小规模进攻，4月27日进攻达到高潮，有一千余名部族叛乱分子进攻阿萨里尔。我们已授权亚丁政府下令逮捕搞掉著名的吉佛里兄弟，他们是重要的政治鼓动者，主要在拉赫杰保护国活动。幸运的是，在事态发展到高潮前我就听到了这件麻烦事。

我们……不得不在亚丁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保护地的一个苏丹看来要投向纳赛尔。我们即将授权总督采取强烈行动，并已派出增兵。<sup>①</sup>

505 糟糕的是，只抓到了两兄弟中的一个，其余的人后来都逃往支持他们的老本营。<sup>②</sup>

7月初形势继续恶化。因此总督被召回伦敦与殖民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商量，后者对东方民族抱有强烈的同情心，他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

① 1958年4月15日。

② 指埃及。——译者

上午九点一刻会见殖民部国务大臣、亚丁总督鲁斯(威廉爵士)和其他官员。在拉赫杰(亚丁最大的保护地之一)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年轻的苏丹已经投靠了纳赛尔……而且他的一些人已进入也门。必须把他废黜掉。其他的苏丹们和酋长看来还忠诚。①

这一行动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最大的苏丹国之一的拉赫杰的苏丹不但拒绝与总督合作，以控制吉佛里兄弟的活动，而且还默许他的国民军司令于6月25日带领一大部军队并携带一万英镑叛逃到也门。出于殖民地政府一向宽大为怀的政策，我们并没有要监禁苏丹。后来他自己也去了开罗。保护地的其他苏丹主动要求来到伦敦，一则是向我们表明他们的忠心，同时也是为了讨论成立保护地联邦的可能性问题。

同时，一股动荡不安的浪潮开始席卷黎巴嫩。黎巴嫩一直是地中海东部诸国中最为发达最文明的一个国家。在5月的头几周内，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亲西方派与泛阿拉伯派之间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迄今为止，这两个宗教团体之间一直稳固地保持着平衡。卡米勒·夏蒙总统是一名马龙派的基督教徒。他的总理萨米尔斯·苏赫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但是总统和外交部长查理斯·哈比卜·马立克公开的亲西方政策正受到许多穆斯林分子特别是泛阿拉伯主义积极分子的猛烈攻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对共和国中较为激进的派别起着搅乱人心的作用。那里流传着大量的、认为是有根有据的种种说法，说埃及有时通过边境、有时经过 506 海上，向这个国家渗透，同时输入武器和资金。他们还公开地招募游击队。到5月中旬，全国已处于混乱状态。输油管被一些破坏分子切断，虽然已迅速修复，但谁也无法预见下一步无政府状态会带来什么后果。

夏蒙总统在绝望中询问英美政府是否准备在接到他的呼吁后

① 1958年7月6日。

二十四小时内提供军事援助。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认为黎巴嫩将丧失独立，国家将消亡，并被迫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纳赛尔正在那里从内部发起一场运动反对夏蒙总统和他的政权。这一运动部分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部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性质的。俄国的武器正从叙利亚输入，目的是迫使黎巴嫩加入埃及—叙利亚联邦。换句话说，这是在模仿奥地利—苏台德的德国人。波兰（这次是伊拉克）将是下一个完蛋。<sup>①</sup>

这样，我们再次面临纳赛尔对整个中东安定的侵略威胁。由于我们失去了苏伊士运河这块地盘，由于1956年底发生的军事干涉，从军事观点看，我们现在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在过去的两年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了。

幸运的是，自从苏伊士事件以来，美国人也学会了不少东西。百慕大和华盛顿之行正开始显示出成果。<sup>②</sup>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充分认识到国内外出现的危险的情况下，

内阁同意我们与美国一道向夏蒙总统作出保证，如果他要求的军事援助只是为了维护黎巴嫩的独立，我们将乐意提供这种援助。<sup>③</sup>

507 我记得唐宁街生活压力的一例，即正当我和同僚们商讨这一危险和困难的决定时，布赖恩·罗伯逊送来的信打断了我们的讨论。信中说，铁路工人威胁要进行罢工，局势现已到了关键时刻。他还要求授权提出一项能促使解决问题的适度的建议。这当然是个短短的插曲，但只是在这过后，我们才又可能回到讨论当时发生的主要问题上来，准备必要的信件。

有一些防务问题急待解决。与通常一样，盟国之间一开始总有点混乱。

为黎巴嫩制定的军事计划中还存在一个故障，因为正在这里的美国

---

①②③ 1958年5月13日。

海军上将（他将负责这次行动）还没有接到指示。我给哈罗德·卡奇亚（他正在华盛顿）打电话，尽力（在公开电话线上尽最大可能地）让他把事情顺利进行下去。当天晚些时候我听说这件事已得到解决。当然，我们将同意由一名美国司令官指挥远征军，因为我们希望只提供少量兵力。但是我们的军队——可能通过空运——必须一起到达。<sup>①</sup>

同一天，我把有关对黎巴嫩威胁的全部情况以及英—美因此而即将采取的行动通告英联邦各国总理。总统和我还是希望，我们支持黎巴嫩的许诺将使夏蒙把局势缓和下来。

来自黎巴嫩的消息有所好转。我们的保证似乎给黎巴嫩政府增添了新的信心。但是，形势仍然很微妙。军队是否忠诚还没有把握。<sup>②</sup>

到16日，我的情绪高涨起来。国内铁路罢工已经得到解决，而且黎巴嫩已稳住。我们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以备黎巴嫩发出求援的要求。<sup>③</sup>

虽然我们集结的部队数目不大，但我高兴地得知一切准备都已就绪。不幸的是，5月17日下午塞尔温·劳埃德给我打电话说，

计划中的英—美对黎巴嫩的军事援助的消息在华盛顿泄露出去了！看来杜勒斯与参议院领袖进行过秘密谈话。他们中的某一个肯定讲了508出去，消息登在早晨的《华盛顿邮报》上！我们决定立即通知外交部所有“发言人”以及武装部门绝口不谈此事。我们正询问华盛顿，杜勒斯打算怎么说。但我知道，星期一下院里准会出现一场风波。<sup>④</sup>

出乎意料之外，我曾担心会爆炸一颗具有毁灭性危险的定时炸弹，看来只是颗哑弹。

下院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昨天我们预料会闹出一场风波来。……关于黎巴嫩问题，虽然美国泄了密，但并未引起麻烦。大家似乎都知道我们和美国人对于夏蒙总统作了某种保证，而且军队准备开往该地。但由于

①② 1958年5月14日。

③ 1958年5月16日。

④ 1958年5月17日。



某种原因,连工党的极左派也没有提出抗议。<sup>①</sup>

几天之后,即5月22日黎巴嫩政府向安理会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注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黎巴嫩事务的严重干涉。6月11日,安理会授权向黎巴嫩派遣一观察小组。

6月初我在华盛顿时,我们自然充分地讨论了这一严重形势,我特别敦促美国人向约旦和伊拉克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当时约旦和伊拉克的“阿拉伯联邦”刚刚举行过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这个问题在6月10日达成了协议。我们援助的份额为四百万美元,美国人将承担大得多的份额。不过,一个月后导致伊拉克发生悲剧的可绝不是因为资金上的困难。

大约与此同时,埃及人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与美国驻开罗大使黑尔联系。这是杜勒斯自己在华盛顿告诉我的。这似乎意味着可以达成某种妥协。夏蒙在任职期满前可继续担任总统,但连任是不行了。弗阿德·谢哈伯将军应立即担任总理。他是否忠诚还很值得怀疑,而且普遍认为他是直接反对总统的。纳赛尔自然极力否认埃及提供过任何援助,但是他答应如果妥协一旦达成,他将利用他的影响促成黎巴嫩境内结束暴乱和战斗。我们和美国人都感到谢哈伯没有全力以赴地对付暴动。而且,如果他现在出任总理,那么夏蒙的地位就可能成问题。可是,纳赛尔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甚清楚。他是害怕英—美干涉吗?俄国人是否已向他提出警告,要他不惜一切避免引起这种干涉?当我见到总统时,他表示美国政府不愿在这事件中充当纳赛尔的“走卒”。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国政府指示其驻贝鲁特大使坦率地向夏蒙说明发生的一切情况,但大使必须强调指出,他并不是建议夏蒙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同时,还要清楚地让夏蒙明白,美国已作出的保证仍然有效。

---

<sup>①</sup> 1958年5月20日。

6月19日，

盖茨克尔、比万和格里菲斯来见我和外交大臣（他们自己提出的要求），讨论黎巴嫩局势。比万比其他两位更直爽一些。我拒绝作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干涉的保证。（他们也确实认为，这样的公开保证对纳赛尔及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是个重要的鼓励。）不管怎样，联合国秘书长现已在[中东]，我们必须等待他回到纽约后再说。<sup>①</sup>

在我6月30日访问巴黎时，我和戴高乐就中东问题，特别是黎巴嫩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看来很友好又富有同情心。不过我清楚，他对北非的关心胜过对中东的关心。

在后来的几周内，虽未发生特别事件，但形势却越来越恶化。哈马舍尔德巡视了中东各国首都，他似乎肯定了由厄瓜多尔、挪威、印度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的观点，认为渗透的规模被夸大了。<sup>510</sup>但是这份有点书生气的报告无法解决实际上已爆发内战的这一局面。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动乱都被7月14日在巴格达发生的重大事件所压倒

7月14日，星期一凌晨，塞尔温·劳埃德打电话给我，说巴格达发生了革命政变，情况不详，但恐怕国王、王太子和努里已经被谋杀。回到伦敦，我发现消息仍不多。“有人说王太子还健在，并在战斗，努里已逃走。”<sup>②</sup>可是，当我们收到详细报告时，情况已大白，悲剧已经造成。伊拉克其他各地似乎平静。次日，外交大臣告诉议会，伊拉克石油公司报告说，基尔库克和巴士拉平安无事，没有人企图干涉我们在哈巴尼亚的空军和其他军事设施。首都这次意外突然的起义是由两个旅发起的，他们在前往另一个营地的途中，因政府疏忽允许他们穿过巴格达，这是违反通常惯例的。我们早已知道军队中不满分子酝酿着革命的阴谋，但我们的大使和伊拉

<sup>①</sup> 1958年6月19日。

<sup>②</sup> 1958年7月14日。

克政府都没有特别感到惊慌。国王和他的叔父都确信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他们甚至计划第二天动身前往土耳其访问。

发动政变的这股部队到处乱砍乱杀。国王、王太子和王室其他成员都被残酷杀害。后来我们听说努里曾化装出逃，但第二天被抓了回来。他不但也遇了难，而且还受到极其残忍的对待。他的赤身尸体被拖着经过街道，供最下层的暴徒们取乐。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王朝曾如此全心全意地，如此英勇地为本国人民服务。

511 我们还得到报告说，我们的使馆受到暴徒们的袭击，一名英国官员被杀，大使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不撤到附近一家旅馆避难。这些消息弄得我们束手无策。他们一举摧毁了历届英国政府建立起来的整个安全制度。正是这个制度使伊拉克人民大大受益，它还得到各种财力、技术和经验上的慷慨援助。令人痛心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伊拉克政府比任何其他阿拉伯政府都努力奋斗，他们从本国石油和从外来的财政援助中精打细算地投入国内建设。这些财力没有被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所浪费，而是用于改善多数人的生活条件。

7月14日晚间当内阁开会时，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我们听说的都是些谣传，但是可悲的是，这些谣传不太可能被证明是些夸大其词的东西。我在内阁开会前会晤了盖次克尔，告诉他我所掌握的情况。我并没有向他掩饰黎巴嫩事态发展的可能倾向。我们听说夏蒙总统已通知我国大使，他将要求美国和联合王国在二十四小时内实现他们所作出的将进行干预的保证，他要求我们沿叙利亚边境采取军事行动。看来美国人打算积极响应这一呼吁，并准备“单干”。这与十八个月前的形势相比真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如果说1957年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比1956年的美国政府的态

度有了显著的变化，那么，1958年这个主义的阐明就不仅仅是在言词上而是在行动中也有了变化，一个公开认错的举动——一次忏悔性的行动——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当然，仍能控制联合国的美国人有能力武装自己，至少可以得到联合国各种机构的一点点默许。况且，由于他们的行动是响应黎巴嫩合法首脑的呼吁而采取的，因此，根据国际法惯例，他们的行动可能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除去这些有利的一面，美国的新政策很难与该政府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大发作相一致起来。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必须全盘考虑这样的行动对整个中东地区将产生什么后果。把黎巴嫩孤立起来的看法是不行的。

对于美国将执行什么政策，普遍的感觉是没有把握。如果美国人开 512  
进黎巴嫩并安心地呆在那里或不久又撤出而由联合国军队替代，那将是极其糟糕的。他们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在经济上承担一切恶果——如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海湾地区。我们的英镑石油将枯竭，而我们能从美国得到什么真正的保证呢？

会晤盖茨克尔后，我在下院将我的同僚们召集在一起。

内阁会议于八点三刻结束——大家精神状态倒不错，当然有些忧虑。开会期间，美国来电向我们表示，他们准备应夏蒙的要求派兵在黎巴嫩登陆。<sup>①</sup>

晚十点三刻，我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电话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那时还没有发展能保护这类谈话的装置，因此从实际后果考虑，人们可以猜想电话可能被敌对的或友好的监听者偷听。

不久，情况表明美国人已做出决定，舰队正接近贝鲁特。我说：“你想在我身上搞个苏伊士事件。”听了这话总统笑了起来。在一条公开的电话线上简直无法继续进行我们的谈话。不过我想，我已表明了我们对美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并能善始善终。然后，我用恰当的词句草拟了一封电报，早上二点左右发了出去。

<sup>①</sup> 1958年7月14日。

在电报中，一方面我同意应夏蒙总统的要求对黎巴嫩进行干预，这由于伊拉克事件显得尤其必要，而且总统可以把这个行动解释为对一个小国独立的支持。另一方面，我还尽量详细阐述我力图在电话中讲清楚的观点。在的黎波里各种石油设施不能立即得到保护，它们很可能被摧毁。通过叙利亚的输油管肯定会被切断。

513 整个地区其他石油设施也可能遭到袭击，这些都会给国际公司，特别是依靠英镑石油的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不过，我和我的同僚们都作好承担风险的一切准备，如果这是反映我们正视问题的决心的一部分的话。我们还决心保护约旦和黎巴嫩全面渡过危机。如果发生上述情况，我们将在自己的议会中、整个英联邦和联合国内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关于黎巴嫩，由于总统曾表示，我们最好保存自己部队的实力，我们认为这样做比较恰当，因为别的地区肯定会需要我们的部队。

正当内阁开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侯赛因的来电，他说他决心保持其地位，但他还没有提出正式要求，只是要求将我们的意图通知他。当我正起草给总统的信时，我听说国王已要求美国和英国保证立即对他进行援助，如果他认为这对维护约旦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是必要的话。因此，我又于凌晨发出一封电报，我知道总统将在吃早饭时收到这封电报。在电报中，我再一次向他强调，如果只对黎巴嫩采取行动，这对我们比对美国人有更大的危险。我敢肯定，不久我们将收到侯赛因国王的最后呼吁；的确，在两个地方同时采取行动总比让形势自由发展为好。我反复说明了自己的顾虑，约旦的形势可能迅速恶化，以至任何有希望的行动都无济于事。第二天上午，即7月15日，内阁开会时，我们得知美国政府已决定使用第六舰队，在没有英国的援助下在贝鲁特登陆。同时，他们通知安理会，要求成立联合国紧急部队，在适当的时候，美国部队将把责任移交给联合国紧急部队。我也不得不告诉我的同僚们，总统和

杜勒斯两人都没有真正充分考虑约旦的形势。总统也没有就侯赛因国王是否应正式提出美英军事援助一事给我任何答复。伊拉克 514 方面的消息仍很混乱,但看起来暴动只局限于巴格达,不知努里是否已逃走。我们已警告海湾地区的各首脑,让他们保持警惕。总之,形势令人焦虑不安。杜勒斯好象准备后退。如果我们在中东先是被推出来,而后又被抛弃,那是最糟糕不过的。假如我们响应了侯赛因国王的呼吁,情况就会如此,我们会发现美国军队已离开黎巴嫩,由某个毫无实权、人力有限的联合国小组接替。

我们确切知道的全部情况是,联合国安理会已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举行会议,美政府要求安理会作出保护黎巴嫩的安排。苏联政府反对,并提出建议,要求美国人撤出他们的军队。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形势真是乱成一团,甚至使人有些恐惧。艾森豪威尔还没有直接答复我的电报。杜勒斯好象仍然举棋不定。在约旦问题上,他对干涉能否达到目的表示某些怀疑。干涉行动会不会害了侯赛因而不是加强他的地位?所以,在7月15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向英联邦各国总理发出警告性和解释性的电报,并在议会公开声明我们对美国行动的道义上的支持。在下院开会之前我会见了盖茨克尔,以便告诉他这一情况。

外交大臣在质询后发表了声明。反对党中群情激昂,特别是反对党的后座议员。但我认为他们中许多人虽不满意,也没有什么主见。我们这方面很讲道理,也很克制。决定明天再次辩论。<sup>①</sup>

塞尔温·劳埃德仅仅声明说美国军队应夏蒙总统的要求于该日下午在贝鲁特登陆。他接着说:

女王陛下政府在目前的危机中一直与美国政府密切磋商。事前,美国政府将其意图通知了女王陛下政府。政府相信,在这种不稳定的形势 515 下,美国的行动对黎巴嫩的独立和完整是必要的。这一行动得到女王陛

<sup>①</sup> 1958年7月15日。

下政府的全力支持。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全文刊登了总统的声明。② 声明强调了对黎巴嫩独立存在的威胁，对巴格达发生的革命行动与残忍的暗杀表示遗憾；在谈到联合国的作用时，声明说，一旦安理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而采取行动，美国便立即停止已采取的行动。这一切从法律观点看都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肯定有利于缓和国内局势。但是，声明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根据联合国宪章，如果约旦提出要求，我们同样有义务帮助它。如果美国新政策决心真正贯彻到底，并不满足于合法的好听言词，那么，我们就能结束实际上的孤立状态。华盛顿方面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外交大臣是否能尽速来美与总统和国务卿商讨局势呢？

第二天，即7月16日是个又长又令人振奋的日子。

除了其他一些事情外，我们安排了让塞尔温·劳埃德赴华盛顿与杜勒斯讨论整个形势。美国发来的电报更使人鼓舞。我相信美国人理解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由塞尔温赴美坦率讨论美国人怎样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问题是很合适的。他将带领〔威廉爵士〕狄克森（军队总参谋长）于今晚动身——在辩论结束前就出发。③

上午，内阁开会通过了这一计划以及在下院讨论的总方针。

516 辩论一开始，塞尔温作了一篇精彩的发言——简短、客观，表达得一清二楚。他的发言收到良好的效果。下一个是比万所作的软弱无力的发言。盖茨克尔为反对党作结束发言。我为政府方面作总结发言。没有举行投票。总的气氛虽然紧张但与苏伊士事件时不同。反对党除了说我们只能对美国“干预”给予道义支持外，他们没有再就决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是明智的做法。当然，他们不断地想得到英国不使用兵力的许诺，但我回避了或者说有意避开了这点。④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7月15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7月15日，第1021—1022栏。

③④ 1958年7月16日。

反对党在他们应推行什么路线上似乎存在一些难处。

看上去“影子内阁”和工党内对投票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盖茨克尔(他显然是想痛改前非,让人忘掉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表现)似乎战胜了比万。所以没有举行投票。我认为,下院各界对我的总结发言反应很好。我极力十分客观地辩论这个问题,同时使温度保持在最低度。<sup>①</sup>

但是,当辩论结束时,一天的工作,更确切地说一夜的工作刚刚开始。

我走进议长后面我自己的房间,一直坐在边座上的多罗西将在那里等我一起回家吃晚饭。这时,弗雷德·毕晓普

交给我一份发自安曼的电报——电报刚刚送到——电文是用手写的,还未打出来。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封。一封是国王通过我国大使拍来的;第二封是个进一步的请求,来自哈希姆家族里几乎最后一位幸存者,<sup>②</sup>内容更强烈和急迫。

现在刚过晚上十点钟,但我立即决定召开内阁会议,邀请三军大臣和参谋长们出席。在十一点左右全体到齐。

在我的下院房间里召开了一次十分出色——而且可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内阁会议。我想我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和掌玺大臣(巴特勒)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们在政治上、外交上和英联邦、联合国里及中东的困难。参谋人员介绍了我们所能做的事——真是少得可怜。从塞浦路斯空运两个营的伞兵部队,以便守住飞机场,并援助国王。但在军事上——正如我反复告诫大臣们的——是一次没有交通运输线的远征;如果以色列同意我们飞越其领空,就只有通过空运供给;没有海军基地;没有真正的目的和前途——因为我们不能入侵伊拉克——而且,如果我们想那样做,也不能通过安曼。<sup>③</sup>

在历时三小时的讨论中,我与杜勒斯通了两次电话,我请他坦率地

---

①②③ 1958年7月16日。



谈谈他的看法,我们是否应该响应国王的请求。

杜勒斯认为此举有点草率,但值得赞赏。他无法答应派兵,但答应给我们道义上和后勤方面的支援。<sup>①</sup>

在长时间的讨论过程中,我一直没有作过任何引导,好让每个大臣在不受我影响下轮流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下定决心,如果进行这一冒险,并一旦证明是失败的话,不致于出现某些内阁大臣,包括内阁以外的三军大臣被蒙在鼓里的情况。“如最近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讨论有关黎巴嫩问题——我让检察总长曼宁厄姆—布勒一起参加”。<sup>②</sup>从军事观点看,参谋长们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我询问了他们许多问题,以便检查核实各种困难。由于外交大臣不在场,外交部由一名副大臣和常务次官代表出席。后者

似乎相当肯定我们将很快获得以色列的准许。……〔他〕已见过大使。这里只是个形式问题。<sup>③</sup>

大家在讨论中权衡了各种利弊。赞成马上干涉的认为,如果安曼机场落入暴动分子之手,我们就会失去有效干涉的机会,侯赛因国王抵抗的决心就会严重受到损害,约旦完全有可能落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势力范围,我们在整个地区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518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那么,这一形势造成的长远政治困难将大于眼前的困难。但是,拖延也不可能使我们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

法律上是成问题的。我们完全有权支持一个要求我们援助的盟友。另一方面,我们能派到约旦去的部队只能是一支人数少装备简单的部队。除非美国支持我们,至少能给我们提供重型武器和装备,否则,我们的抵达不但远远不能加强国王的地位,反而会挑起敌对情绪,把我们自己搞垮。

现在已是凌晨二点半,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我要求休息十分钟,然后与巴特勒和诺尔曼·布鲁克进入另一房间。

<sup>①②③</sup> 1958年7月16日。

我们一致认为，内阁决心采取这样有点“堂吉诃德式的侠义”行动，而且，如果明早发现国王像伊拉克王族一样遇害了，我们将不会饶恕自己的。况且，我们如无动于衷，阿拉伯世界（还有海湾地区等）所受的震动很可能比我们对失去伊拉克朋友时作出的反应更强烈。<sup>①</sup>

回到我们开会的房间后，我概括总结了各种利弊。从长远看，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可取的；很难设想这样的行动除了稳定约旦的现存政权和暂时不使阿拉伯共和国吞并约旦外还能起其他任何作用。这个行动将在国内造成尖锐的对立。另一方面，不响应约旦的呼吁，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吞并约旦将严重地削弱我们的政治地位。较老的英联邦国家，包括加拿大，很可能支持采取行动；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巴格达条约国家也会这样做。但我们和印度、锡兰、加纳和马来亚的关系将会紧张起来。如果我们干下去，我们必须采取美国在黎巴嫩相类似的行动，事后我们应立即报告安理会，并提出，一经采取有效措施，保卫约旦的完整和独立，我们的部队就立即撤出。

在第二次电话谈话中，我告诉杜勒斯我们倾向于采取行动。<sup>519</sup>他答应，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美国将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在联合国给予完全的支持。他答应，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将在他的权力范围内给予后勤方面的支持。他再次说明，在与国会领袖商榷之前，不可能考虑进行军事行动。

我把和杜勒斯电话谈论内容向内阁作了报告，并重复说，这一举动虽是堂吉诃德式的侠义行动，但也是一项光荣的行动。我们还全面考虑了这一行动将在国内引起的政治风险。军事行动结局如何，谁也无法预料，有可能给国家和政府带来严重的后果。

然后，我在屋里走了一圈。大家一致赞成“干”。所以我说，“就这样决定”。内阁在三时左右散会。<sup>②</sup>

<sup>①②</sup> 1958年7月16日。

还有不少事情有待我们去做。

英联邦事务部,外交部,三军参谋长都必须立即行动,处理随之而来的大量工作——有些需要磋商讨论,有些需要通报情况,有些是行政事务工作。诺尔曼·布鲁克担当协调工作的任务。实际上,那晚他彻夜没睡。当我肯定一切需要做的都已落实后,我于三点半左右上床睡觉。<sup>①</sup>

次日发生的事在我的日记里有最详细的记述。

天哪,有一件事没有顾及——或者说只是一带而过,一切都想当然。这个错误——我深信,如果外交大臣不去华盛顿的话,这个错误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几乎导致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导致我们全部政策的完蛋和政府的垮台。

早上八时我被叫醒,并被告知说,我们已经开始从塞浦路斯空运,飞越以色列上空,但却没有征得以色列政府的同意。一些机械(还有二百名士兵)已进入安曼。后来部队又奉命停止行动,有些机械不得不返回到原地。十点左右盖茨克尔还要来见我——幸好他自己推迟到一点来。我们一直在打电话(可怜的诺尔曼·布鲁克足足花了三个小时也没有打通电话)。我们还打了电报,结果也没有回音,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消息发回来。

520

十一时内阁开会。我只向他们讲了一部分困难情况,然后留下拉布照料事务性工作。此外,我们给英联邦各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电报都已拍发(当时我们以为——外交部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现在一切都得停下来,或者收回,或者暂停,或者要作解释。

我向下院该说什么呢?至迟到三点半,我必须公布事实。但事实又是什么呢?似乎无人知晓。我在自己的书房里等待了一个上午。我强使自己处理其他工作,压住那令人的烦恼,坐立不安。我们除了知道以色列政府正在开会外,其余什么也不清楚。布鲁克(他认为都是他的过错)急得几乎落泪,毕晓普以及其他常务秘书们都极表友善和同情。

盖茨克尔于一点到达——只有他一个人。我刚要开始向他介绍安曼政局以及我们掌握的关于开罗对约旦的阴谋计划时,有人给我一张小

---

<sup>①</sup> 1958年7月16日。

纸条，上面写着：“以色列政府已同意。”<sup>①</sup>

我向戴维·本·古里安发出的紧急呼吁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向以色列人明确说明，我们的干涉行动得到美国人的全力支持。由于以色列的生活和经济几乎全要依靠美国，所以也许就是这一点才扭转了局面。我们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向盖茨克尔介绍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尽量显得镇定自若)，并且问他怎样处理这件事。我建议他和他的两位朋友(格利菲斯和比万)也许可在二点三刻再来，商讨在议会里如何处理这件事。对此，我们取得了一致。<sup>②</sup>

我利用午餐休息时间起草了我的声明。保守党议会党团领袖以及爱德华·希思曾向我提出过一个明智的建议，说我们应自己提出在晚上七点休会。

这样可根据议会议事规则避开“动议案”，让全体反对党议员起立支持——我们应该避免的这一戏剧性姿态。当盖茨克尔及其朋友到达后，我提出了我的建议。只作一个简单的声明，不给许多附加说明；晚上七时进行辩论。这个议程被他们所接受。这样，我的任务就是在三点三刻发表声明，给一刻钟的附加说明时间；晚上七点由我作开场发言，九点三刻作总结。<sup>③</sup>

我感到宽慰的是，

主要是碰运气，而不是因为处理得当，结果相当满意——从议会角度。盖茨克尔表现很不错，很有克制，他理解了我的意思。比万由于完全失去了下院的支持，也由于他已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声誉，因此，他原定三十五分钟的讲话结果只讲了二十分钟就坐下了。昨天，反对党决定不举行投票表决——在美国干涉黎巴嫩问题上——但今天却很不明智地决定要投票。九点五十八分，我讲的最后两句话是：“我问自己：如果昨天投票反对美国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今天投票反对英国倒就是正确的呢？”<sup>④</sup>

---

①②③④ 1958年7月17日。

最后一句话就是非保守党议员也感到满意。然而，

这是我在整个危机期间允许自己干的唯一带有“党派性”的事情。但这句话将沿用下去。在分组表决时，我们获得了六十二票的多数——自由党反对我们；一些工党议员（重要的有乔治·布朗）弃权。当我走出下院——经过钟的下面——走进议员休息厅时，全体保守党议员（以及一些工党议员）起立向我致意。<sup>①</sup>

当我回到十号首相府时，等着我的是更多的电报，更多的麻烦和更多的会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感到下院的气氛还是很好的。没有苏伊士运河事件时存在的深仇积怨。我努力（而且我认为是成功地）使他们感到，我们不得已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何等的困难，而且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在国内，我认为将会产生一种形势严重感，但我同时希望全国会出现团结一致的气氛。<sup>②</sup>

第二天，从华盛顿方面来的消息还算令人满意。我们在约旦不太可能得到实际帮助，除非真正的战斗打响以后。但是我们派出驻守飞机场的两营兵力完全有希望能维持国王的权力，制止暴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在策划和酝酿这样的暴动，企图在约旦内部制造混乱，推翻约旦政权。我们的两个营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抵达了，他们的任务是守住机场，保护国王和政府，保卫安曼的主要政府设施。如有必要，还可能增派两营步兵。我们这支部队没有重武器，但我们希望，用英国装甲车武装起来的约旦军队是顶事的。

下一个任务是以我的名义向重要的英联邦国家领导人以及我们主要的欧洲盟友发电报，详细解释我们和美国的行动。尼赫鲁已经来电，表示了他的忧虑，害怕事态会发展成战争。对此，我只能用安慰的话予以答复。无论是英联邦还是在欧洲，所有公开声明

---

<sup>①②</sup> 1958年7月17日。

似乎都表现谅解和赞同我们的立场。

与此同时,在别的地区也出现了骚乱的危险。苏丹政府讯问,如果他们遭受埃及人的攻击,我们是否能派兵帮助。土耳其人一向坚持认为,他们准备对伊拉克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必要时包括采取军事行动。这些都必须要安定下来。在苏丹,主要危险似乎是国内暴动,而不是外部入侵。

在伊拉克恢复旧政权已绝对不可能。旧政权的主要代表都已惨遭杀害。英国人在伊拉克承担着各种义务,军事的和贸易的两方面皆有。那里的皇家空军部队是中东战略防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否能维持其地位还值得怀疑。但它确是在冒着很大的风险。我们在伊拉克还有巨大的石油利益,这必须受到保护。现在所希望的就是与新政府尽可能地和睦合作。这在当时看来并非没有可能。但是,在大臣和参谋长会议上还有许多事有待解决,这些会议简直开个没完。

海湾地区极不稳定——但我们对巴林和科威特已订好了计划,以防 523 万一。不过,处境仍是进退两难。我们是否现在就进入呢?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侵略”。那么我们是否就等待?这样我们就又可能会太迟而坐失时机。

盛产石油的科威特对英国以及对欧洲的经济生活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国家的君主是个捉摸不定的人物。现他正在大马士革“度假”。他还回来吗?他曾会见过纳赛尔。他是否已卖身投靠了纳赛尔了呢?谁也不清楚。我们在科威特没有一兵一卒,机场有丢失的危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路来才能进去。我们能否让这位君主现在就要求我们进驻一营兵力或一艘军舰呢?这些难题都提出来了,但都没有得到解决。<sup>①</sup>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安全理事会进行了多次公开的和私下的

---

<sup>①</sup> 1958年7月18日。

讨论,各国提出了不少建议,但这些建议都遭到拒绝。日本建议秘书长组织一支联合国部队,让英美部队撤出。但俄国人否决了这项提案。在辩论过程中,英国代表明确表示,我们乐意和秘书长一起探讨某种形式的联合国行动。

7月19日晚,赫鲁晓夫先生建议立即就中东形势举行最高级会谈。这种有点惊慌失措的行动,要求三天之内召开一次会议,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混乱。

《镜报》、《先驱报》等昏头昏脑地大叫立即接受赫鲁晓夫的威胁性要求,在星期二开会!①

7月下旬的最后几天,各国首都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商讨举行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议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赫鲁晓夫认为印度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

7月21日,我收到本·古里安发来的怒气冲冲的抱怨电,说飞越以色列领空的许诺被滥用了。

524

我给他作了一个“和缓的答复”。事实是,以色列的一个极端主义组织认为,应让约旦乘早“完蛋”为好,这样,他们就可以抢占直到西岸的所有领土。另外一些人则或被苏联人所吓倒,或是同情他们。我正努力争取获得美国的后勤支援——为约旦和我们的部队提供石油援助。②

同时我坚决主张从亚喀巴开辟出一条海上通道,并从亚喀巴到安曼开辟一条交通运输线。这项工作应立即开始进行。因为尽管以色列人只是在抗议,而且也没有阻止空运,但是,没有一条充分的供应线,我估计约旦很快就会支持不了。月底前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很显然,我们还得需要一个营的兵力——一部分用来加强我们在安曼的阵地,部分是为了能够给亚喀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运输线。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当然是很勉强的,因为我很不赞成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

---

①② 1958年7月21日。

到各地。而在怎样运输这支部队上又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到半夜还没有解决。争论中心是通过海运还是通过空运。最后，我们同意要求本·古里安允许我们“飞越他们的上空”，给他们的理由是，把这营兵力派出是为了开辟新的交通运输线（这一点正是他赞成的）。我们在约旦的地位很不安全，随时会有被摧垮的可能。但愿上帝保佑，我们能避免这一场灾难。当然，我们的小股部队是无力对付一场真正的冲突的——比如说，约旦陆军抛弃国王以后引起的冲突。我们驻在那里的部队其唯一用途就是保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同时又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它有被吃掉的危险。我不认为一群暴徒就能吃掉它。但是，如果约旦装甲师倒向纳赛尔，我们就很难解救我们这支部队。在联合国部队接替他们以前，我们将一直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sup>①</sup>

俄国人对以色列开始施加强大的压力。

俄国人向以色列递交了一份照会，抗议英美两国侵犯以色列领空（俄国人还向意大利递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出于对俄国人的害怕，更重要的是想迫使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作出某种形式的“保证”，以色列命令我们立即停止空运。以色列内阁预定今天上午开会，讨论对苏联的答复。525 我们和华盛顿以及特拉维夫的电话电报通宵不断。我们必须达到两个目的：（1）如果可能的话，继续进行空运；（2）在宣传上不能让苏联政府从中收渔翁之利。局势极其困难，极其危险。安曼局势就够糟的了，现在又岔出了这个特拉维夫难题。<sup>②</sup>

我一直在和刚刚回国的外交大臣讨论形势。8月3日，我们开始收到回电。情况表明我们的一切联系其成效很不令人满意。

（一）以色列坚持今晚必须停止空运。美国人已同意，我们看来也非同意不可。（二）美国人并不希望我们的巡洋舰从塞浦路斯装运着部队前往亚喀巴，这样军舰就得经过苏伊士运河。他们要求我们派遣一艘商船。但从下列情况看，消息到比以前要好：

（1）以色列看来在一二天内还不会对俄国人的照会作出答复。

---

① 1958年8月1日。

② 1958年8月2日。



(2) 美国正强烈敦促以色列人拒绝俄国人的照会。

(3) 在安曼，我们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原料供应，甚至更多。只要我们能利用并发展亚喀巴，这条新交通运输线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另外一方面，如有可能，我们必须恢复空运，以运输伤病人员。这是我们以后一定要催促以色列答应我们的一个要求。最后，我们决定从亚丁抽出一营兵力开往约旦，这就可避免在苏伊士运河引起的麻烦。<sup>①</sup>

8月8日，当我听到我们步兵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安全到达亚喀巴时，更重要的是，当我听到美国的“全球霸王号”航空母舰正从塞浦路斯通过直线向安曼运送原料时，我才算是放下了一桩心事。我应该补充指出的是，在这焦急不安的日子里，以色列驻伦敦大使一直是很合作和谅解的。

在这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对赫鲁晓夫建议召开最高级会议作出一致的答复。7月22日，我向我的同僚们解释了

526

杜勒斯向外交大臣提出的方案。就让召开一次所谓的最高级会议吧——但必须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或根据第二十八条精神来召开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议（幸好昨天在下院时，阿瑟·亨德森提请我注意了那一条款）。这一条款规定安理会特别会议可以由政府首脑参加。

另外，当然还可以举行非正式会议，就是一种“附属性质”的私下最高级会议，这样的会议可以避开公众的耳目。<sup>②</sup>

看来大家都一致同意这个方案，因此，我要求立即会见盖茨克尔，建议外交大臣在早已约定的外交事务辩论会开始时发言，概述一下我们的方案。他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一点。

外交大臣又作了一个精采的演说。接着，比万发言，一篇不着边际的、调和性的、没有恶意的演说——这是从上周《观察家》里的一篇文章中抄来的。外交事务辩论平静地开到十点结束。没有发生分组投票表

① 1958年8月3日。

② 1958年7月22日。

决。<sup>①</sup>

第二天，我得知赫鲁晓夫已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在安理会举行最高级会谈，但“印度和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必须参加”。我同意这个意见，并提议在纽约的常任代表应开始为这次会议作准备，就邀请谁，何时召开等达成协议。我尽了我最大努力让戴高乐充分了解情况，劝说他同意我们的意见。我还向阿登纳拍了详细的电报。

昨天整整一天，我一直在给法国人做艰苦的工作(毫无结果)。他们自己向莫斯科作了答复，采取了和我国和美国人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他们根本就不喜欢安理会这个概念，也不想去纽约。他们希望的就是俄国人原先提出的计划，即日内瓦五国首脑会议(包括印度)。就是这样一次会议，他们也并不很热心，也是不慌不忙的样子，说“要经过充分稳妥的准备后”才能召开。另一方面，美国和联合王国(他们在黎巴嫩和约旦还驻扎着部队)不希望再拖下去，迫切期望立即制订出解决黎巴嫩和约旦问题的某种近期解决办法。<sup>②</sup>

而我却渴望能尽快召开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议。

这个最高级会议将附属于或者和安理会并行召开。这是在联合国通过 527 一个“不被否决”的方案的唯一希望。我们谁也不知道要提出什么建议，但我对黎巴嫩实行“奥地利式”的解决办法很感兴趣。俄国人如果害怕战争就会赞成这个办法。现在对我们极其有利的一面是美国在黎巴嫩驻扎着一万一千人的陆军。我们绝不能让美国的这支部队因为要响应联合国的某种耍滑头的姿态而撤出那个国家。虽然福斯特在他的顾问班子面前不好说什么，但我相信他是下定了决心，决心千方百计地继续留在黎巴嫩，直到那里结束了混乱局面，出现了正常的局势。我强调指出必须制订一个能考虑阿拉伯愿望的长远方针。纳赛尔已无法用亲善或金钱争取过来了。不过我怀疑他是否就真是死心塌地地倒向俄国人。<sup>③</sup>

① 1958年7月22日。

②③ 1958年7月27日。

戴高乐将军明确提议五个大国应于8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最高级会议。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将充分利用戴高乐与我们和美国的答复之间所存在的分歧。

尽管我在星期六花了一整天给法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戴高乐还是坚持向俄国人作出完全不同于我们和美国的答复。他一口吞下了俄国人的诱饵，完全进了他们的圈套，接受了日内瓦五国首脑会议的建议。他这样做，部分是反映了他对联合国的反感，但主要还是因为他急待召开一次欧洲会议，在那里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法国（在德国不在的情况下）成为欧洲大陆公认的领袖。<sup>①</sup>

阿登纳总理对戴高乐所采取的态度表示震惊。他倾向于认为戴高乐准备和俄国人单独签订协议。但我还是尽力做工作消除他的疑虑。阿登纳对盟国单独和俄国人谈判总是非常敏感的，除非他事先得到详细的通告。他所以这样敏感，因为他反对西方国家承认东德，承认东德为一个符合宪法的国家。在给阿登纳的回信中，我声明

528 有人认为将军可能想单独和苏联达成某种协议，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有证据使我相信这一点。而且，我本能地感到这是不可能的。

但也许这位高龄的总理比我更敏锐。戴高乐还没有亮出他的真实意图。我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越来越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留恋法国过去的地位。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懂得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历史不会倒转，生活的原料是丰富多采的，它决不需要过时的外装。”

与此同时，福斯特·杜勒斯与巴格达条约国的部长前来伦敦召开全会。除伊拉克缺席外，其他各成员国都来了。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我作了短短的公开讲话，对伊拉克国王和王太子以及努里表示敬意。之后，7月28日一整天，我们进行秘密

<sup>①</sup> 1958年7月27日。

会议。

会议讨论了以下几项：(1)中东一般形势；(2)巴格达条约的前途；(3)伊拉克前途。总的来说，大家的情绪都是饱满的。而福斯特·杜勒斯在下午开始时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经和华盛顿以及总统通话磋商后，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和现有成员国分别单独达成协议，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巴格达条约一个正式成员国。根据国会最近通过的法案，总统有权不必通过签订条约就可这样做（只有参议院才能缔结条约）。这个声明的宣布自然成了这次会议真正激动人心的高潮，不然的话，会议将会被失败和悲剧的乌云所笼罩。<sup>①</sup>

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陆军准将看来已确立了某种秩序。巴格达条约成员国一致决定现在承认新政权是合适的。我当然不能反对他们的决定。

至于伊拉克，大家都要求承认“新政府”。穆斯林国家将带头，我们随后跟上。

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前途由于美国的加入而得到加强。由于伊拉克发生政变，巴格达条约前途如何，还不能作出定论。我们不会开除他们。529我们将等待他们自己在条约到期后自动离去（预先六个月前通知他们就有权这样做），或者宣布退出（不要预先通知）。我们这样做看来比较明智。<sup>②</sup>

赫鲁晓夫自然见机立即采取行动。7月28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他在信中咄咄逼人，横蛮无礼地攻击总统和美国。他宣称他赞成法国的意见，在联合国外召开最高级会议。福斯特·杜勒斯当时正在伦敦。我和外交大臣和他进行了讨论，就怎样复信在原则上很快达成协议。

我们将坚持在安理会的名义下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时举行“非正式”会谈。我们希望在纽约开会，但也可以去日内瓦。和总统通话以后，我们确定了这一点。在福斯特乘飞机离开前，我们收听到俄国人的复信

---

①② 1958年7月28日。

(我们在讨论时他们广播了这封复信), 这一点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①

我们准备对俄国人最近一次照会作出回答。不过, 北约组织各国对我们的回答感到担忧。他们

对西方大国之间的分裂深感不安。我在给斯派克的特别电报中向他作了解释。因为议会明天就要通过休会的动议, 因此, 我不能把答复信推迟到(星期四)三点半以后。②

我们的答复是按照和杜勒斯谈妥的精神而写的。我们建议8月12日在安理会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特别会议。至于地点, 只要一致同意,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两点三刻我通知盖茨克尔来我办公室。我让他看了我给赫鲁晓夫先生的复信(我在三点半向下院宣读了此信)。他看来很满意。我还让他看了电视转播的议会开会时我发表的声明。对此他也表示同意。我的回信(我宣读了全文)受到下院各方人士的热烈欢迎, 电视上反应也不错。③

在杜勒斯离开前, 我交给他如下一份照会:

530

我非常高兴能在伦敦见到您, 并和您就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会谈。这些问题虽然仍是堆积如山, 但一想到我们能同舟共济, 就感到鼓舞。

几天前, 在阅读帕默斯顿勋爵传记时, 我发现他在1853年写的一段话。这是他给一位同事的便信中的一段。

俄国政府的策略和实践历来如此, 如果那一国政府熟视无睹或缺乏坚定的意志, 它就拚命加速推行它的蚕食政策, 而且是贪得无厌的。但如果它遭到迎头痛击, 它总是立即停止并马上缩回, 然后等待有利时机, 准备向它的蚕食对象再次扑去。在推行这种策略时, 俄国政府手中的弓上总是系着两种不同的弦——一方面, 在彼得堡和伦敦用甜言蜜语, 发表诚恳的声明; 但另一方面, 他们的代表在各自的活动场所却进行着赤

---

① 1958年7月28日。

② 1958年7月30日。

③ 1958年7月31日。

裸裸的侵略活动。如果侵略局部成功，彼得堡政府就把它看成随手拣来的既成事实，从此不愿体面撤出。如果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失败了，俄国政府就拒绝为他们承担责任，并马上把他们召回，然后捧出过去说过的温柔好听的言词作证，说明这些人员的行动是违反了俄国政府的指示。

一百年来俄国的策略并没有多大变化。

赫鲁晓夫必将继续分裂西方大国，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巴格达条约成员国曾强烈敦促我承认卡塞姆将军领导的伊拉克新政府。事情很明显，对伊拉克新政府的承认显然消除了赫鲁晓夫担心的认为土耳其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害怕心理。8月3日，他结束了在北京对毛泽东的访问。无疑，他受到中国人的压力，所以采取了一个突然的几乎是惊人的后退行动。他完全回到了他原先要求召开最高级会议的立场。估计，他当时的亲密朋友中国人强烈反对让印度参加任何这样一次高级会议，因此，他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半夜时外交大臣打来电话，告诉我华盛顿准备接受他的建议，总统将发表一项声明(杜勒斯正在巴西)。在联合国“动议登记册”上，美国早已就黎巴嫩问题向联合国作了呼吁，因此我说，如果把动议(和俄国人相比，这个动议将优先得到考虑)修改成将约旦包括进去，我们就赞成。<sup>①</sup>在接受俄国人这个建议时，我不禁提醒赫鲁晓夫注意他在历次建议中所作的反复无常的变化，而我们是如何根据一致的条件欣然同意他所建议的会议。我的这封电报后来公开发表了，其内容如下：

7月31日，我建议8月12日在纽约或日内瓦或其他大家一致同意的地点召开会议。我曾说过，到时我肯定出席，也希望您也能到会。

遗憾的是，您在8月5日的来信中却收回了您在7月23日来信中明确提出的建议。在7月23日信中，您同意各国政府首脑参加安理会召开的特别会议。请允许我提醒您自己的话：“为了维护和平而必须采取

---

<sup>①</sup> 1958年8月5日。

一些紧急措施,苏联政府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政府首脑级会议的形式是不会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即由政府首脑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您还说:“我们满意地得知,您,首相先生,乐意前往纽约参加由政府首脑出席的安理会特别会议。苏联方面将由部长会议主席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但您现在却又建议召开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这当然是美国早在7月18日就提出过的,可是,这项由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一致同意的提议却由于您的反对而未能实现。您认为政府首脑应在有限的范围内讨论问题。

532

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对女王陛下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还是以为,通过安理会特别会议,我们可以在中东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特别是,这样的会议可以使各国首脑既能进行辩论,又能进行谈判。

关于扩大的“最高级”会议,我们从今年1月以来一直在就此交换意见,我无法理解您在来信中最后一段话,您说您在等待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事情恰恰相反,正是我在等待着您回答我7月1日的信。我在那封信里提醒您,我们早在5月31日之前就提出了建议,可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回音。当时我们就提议解决由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谈判内容而造成的困难。我一直明确表示,只要具备为各方所接受的条件,我总是期待这次会议的召开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在远东沿海岛屿那边发生的新的危机也在影响着赫鲁晓夫的决定。8月10日他给我写了一封冗长累赘的五页长信,除了力图为他自己立场上的变化辩护外,没有什么新内容。

我于8月6日离开英国,一直到8月12日才回来。由于塞浦路斯局势的缘故,这些访问是很必要的。8月13日,联合国大会开幕。大会辩论了许多谁也不能接受的决议。但在8月21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出人意料之外的阿拉伯决议案。这是塞尔温·劳埃德所获得的一项巨大胜利,是他艰苦卓绝的外交努力的结果。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作出“符合实际的安排,在黎巴嫩和约旦问

题上，大力协助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决议要求他在执行任务时，必须牢记阿拉伯各国一再保证的尊重各国政府制度的诺言，以及联合国成员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的义务。这正是美国和我们所盼望的。由于黎巴嫩局势，甚至约旦局势，都在稳定下来，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迫切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在局势好转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接过去，好让我们的部队在他们完成任务后完全撤出来。这最后一项决议，无论如何总使阿拉伯各国政府承担起互不干涉内政的义务，使我们有可能在年底前结束我们的军事干预。但是，中东局势仍然动荡不定，令人不安的谣传时时向我们传来。比如在伊拉克，我在9月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拉希德·阿里（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回国是一个不好的兆头”。<sup>①</sup>幸运的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策划的阴谋被发觉后镇压下去了，他们中许多人被捕。黎巴嫩形势在哈马舍尔德9月访问后也日趋好转。10月15日，联合政府顺利诞生。至于约旦，福斯特·杜勒斯在外交大臣一再催促下，最后同意大规模地增加美援。

533

我想我们的部队可以从约旦撤出，除不采用大规模长久留驻的办法外，我们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支持约旦，使约旦政权继续生存下去。<sup>②</sup>

黎巴嫩新任总统谢哈布总统被迫任命拉希德·卡拉米为总理。他过去是反对党领袖，夏蒙总统的朋友。由于这项任命，美国决定撤出部队。到10月25日，撤军工作已完成。同时，我们也决定撤军，到11月2日全部从约旦撤出。这个行动的第一阶段总算是完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1月初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虽遭批评，说总统对我们两国的共同行动的长远影响的想法过于乐观，但它确是反映了我们两国重新树立起来的合作精神，

① 1958年9月1日。

② 1958年10月9日。



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英国部队在约旦,美国部队在黎巴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认为贵国和我国有理由为在这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深感满意。

534

我们的部队应黎巴嫩和约旦政府的要求,在当地政府的密切友好合作下,没有放一枪一炮,和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他们镇压了由外界操纵的侵略颠覆势力,维护了这两个小国的独立。我们的行动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小国表明,不管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我们将信守诺言,并有勇气履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义务。不管将来黎巴嫩和约旦政局如何发展,我们这次行动的影响将永久存在。我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个贡献。如果我们不那样做,那么小国坚定反击侵略势力的决心就定将遭到严重损害,归根结底,这也就严重危及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地位。

我们还应感到称心满意的是,在这次行动中,我们两国政府表现了充分的谅解和高度的合作精神。当然,我们都曾尽力促进这种精神,使其得到健康的生气勃勃的发展,而在困难的形势下,我们感到这种精神又得到充分有效的体现,这怎么不令人高兴!

我一直就想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个人是多么大的快慰!

在给总统的感谢信中,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面前还将出现各种困难和麻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贵国和我国继续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一致,正如我们以往几个月里所做的一样,我深信,我们就可以顺利对付任何不测事件。

英美在黎巴嫩和约旦的干预的眼前效果还算满意。事实上,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虽受其邻国的各种压力,包括纳赛尔经常的捣乱活动,但它们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内部稳定长达十年之久。黎巴嫩一向所具有的强烈的妥协精神使它的人民和政府在这期间有效地抵御了俄国的渗透,也抵制了狂热的泛阿拉伯主义的诱惑。就是在约旦,国王侯赛因在1967年前也一直完整地保持着他的地位;但

535

1967年以后，他不幸也被无法抵御的埃及沙文主义的压力卷了过去，被拖入和以色列的一场毁灭性战争。到头来他却被纳赛尔所抛弃和出卖，还丧失了半壁江山。

伊拉克形势急剧恶化。到1959年春，伊拉克政府迅速倒向俄国和共产主义。对这种形势甚至连纳赛尔也开始感到惊慌。1959年3月，他的代理人发动了一次反共亲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暴动，但却彻底失败了。

伊拉克纳赛尔式的暴动失败了。这意味着现政权将越来越赤化。而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很不好——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sup>①</sup>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土耳其、波斯和巴基斯坦分别签订正式防御协定，这样，1958年7月宣布的美国政策上的变化现已见诸行动。然而，伊拉克形势还在继续恶化，看来要阻止这个国家落入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者之手，除了直接军事干涉外别无他法。就在这时，伊拉克正式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还废除了和英国签订的各项军事协定。到5月31日，皇家空军最后一支部队撤离著名的哈巴尼亚基地。伊拉克还和东德、波兰、中国和俄国签订了文化科学协定。连沙特国王也感到惊慌起来。他通过非官方的中间人给我写了一封情绪激昂的呼吁书，要求英美进行武装干涉。我在回信时只告诉他，英国和沙特阿拉伯首先应恢复两国在苏伊士事件时中断的外交关系，这将有助于两国互相磋商。关于伊拉克石油，普遍认为，伊拉克政府还不会强行把石油设施收归国有。他们将很可能继续从石油公司那里榨取更多的钱财。

昨晚我和米尔斯勋爵共进晚餐。他才华横溢，虽然对伊拉克局势感到担忧，但对革命政府是否真要彻底破坏伊拉克石油公司表示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只是想从公司里榨取更多的金钱罢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 536

5月初，人们感到，如果共产主义对伊拉克越是加强压力，他

① 1959年3月11日。

们的政府就越有可能要倒台。因为到时中东反共国家就将出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将要作出反应,很有可能在伊拉克,但更有可能的是在伊朗作出反应。这些忧虑将继续存在,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美国也不想伊拉克重演前年在黎巴嫩和约旦发生的干涉事件。但形势一直僵在那里,没有爆发一场险恶的危机。同时,科威特君主极其恐慌,唯恐来自伊拉克的侵略。所以在5月,他要求得到肯定的保证,即一旦出现侵略威胁时,我们能保证提供援助。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我们明白,一旦爆发危急事件,美国朋友肯定会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支持,还可能提供某种实际的援助,以保护西方在海湾地区的利益。而且,只要我们守住亚丁这个关键地位,即红海口的直布罗陀海峡,我们就能控制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局势。后来事情的结局表明,由于干预也门政治,主要失败者乃是纳赛尔和他倒霉的军队。

虽然我们作了种种努力,力图共同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以维护西方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和威信,但每次危机出现时,我总无法说服总统和国务卿尽他们最大可能提供援助。这样,尽管我们和美国人一起相当出色地协调行动,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危急问题,但我们一直未能就制订一项中东问题的长远政策达成协议。虽然塞尔温·劳埃德极力劝说杜勒斯,但奇怪的是,他连研究这个问题也不肯答应。由于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所执行的政策,我们已丧失了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权威和力量。总统和我当然不会就这样甘心接受这样的损失。不过,美国对中东的关注变得越来越变化无常,变得摇摆不定起来了。这无疑是因为他们对太平洋地区出现的危险越来越表示关切。对西部各州的人民来说,远东发生的新动向所构成的威胁自然要大大超过原是土耳其帝国疆土上的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所构成的危险。美国人民已被红色中国搞得心惊胆颤,手足无措。

## 第十七章 中国之谜

538

很久之前，最早的科学历史学家就曾提请人们注意战争的根由与近因之间的不同之处。如果说这一差异在古代是确实存在，并适用于较单纯的争吵或夺权之争，那么它对于组织严密的高度文明社会特有的那种明争暗斗更为适宜。在我们的历史上，一些人物和地点，在其成为一个突然和危险事件之前，常常是很难为人知晓的。在我的青年时代，由传统性的妒忌和历史性的反感与仇视引起的民族和帝国的对立，情况就是这样。在当今使世界分裂的尖锐的意识形态矛盾中，情况尤其如此。

赫鲁晓夫突然放弃他建议召开的首脑会议，在联大支持一项谴责英美侵略约旦和黎巴嫩的提议；事隔几天，在远东，一个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形势出现了危险的新发展。1954年11月，中国共产党政府曾威胁要进攻大陈、金门、马祖诸岛上蒋介石的国民党人，这可能是入侵福摩萨的前奏。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有必要予以回击，声明福摩萨和澎湖列岛将抵御进攻。随后，周恩来于1955年1月声明，中国决心“解放”福摩萨，但严重的事件并未发生。相反，美国政府决定协助国民党军队撤出有争议的岛屿之一大陈岛，仅保留两座岛屿。这两个岛虽然在心理上具有一些意义，但并没有重要的军事价值。<sup>①</sup>

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激动。但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这两个所谓“沿海”岛屿炮击的决定突然使全世界感到震惊。这一措施被认为是全面进攻和摧毁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的第一

<sup>①</sup> 参看《时来运转》原书第550—551页。

步。美、英两国的公众惊恐万分，此后的几周内，马祖和金门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就象我儿童时代的法肖达<sup>①</sup>和少年时代的阿加迪尔<sup>②</sup>一样。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为世界怨恨的战火的爆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征候。经过几个月的焦急不安后，原本可能狂暴爆发的火山逐渐停止了活动，慢慢地熄灭下去，恢复了正常，只是偶然喷射出一些灰和烟，但这不再是毁灭性的，而只是间或冲动一下。正如我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那不勒斯湾目睹维苏威斯火山的喷发和宁息一样，这些来自遥远的中国沿海，在对世界和平带来战争爆发的威胁后，也同样平息下去了。与此同时，我们面前有着许许多多的麻烦需要解决。

华盛顿及全体美国人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在大多数外国观察者看来是紧张而又不自然的。对美国生活和历史只有浮浅认识的人们难以理解每个家庭所产生的情感。尽管在菲律宾和巴拿马出现了一些事件，美国人庆幸自己由于击败了乔治三世的军队而幸免陷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邪恶，然而，美国人和与之决裂的人同出一个种族，继承同一传统，他们热情地吸收了构成白人生活与义务的较高尚的品质，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向不发达世界输送教师、医生和建立医院。为了这一目标，美国人选择了中国，因为他们被排除在非洲和印度之外。多年来，美国人  
540 把帮助和教化中国人，当然，还有与他们进行贸易，视为己任。他们的大学、学校、图书馆、卫生和技术机构，特别是他们的传教团遍及全中国。这些钱不是来自政府的资金，甚至不是来自那些用日益高涨的仁慈溪流注入美国慈善事业之江河的富有捐献者。中国境内的美国事业主要是用大小城市中普通百姓的积蓄和捐款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的，大小教堂提供捐款，教徒们怀着深厚、赤诚的

---

① 苏丹南部一地名，英、法军曾在此交战。——译者

② 摩洛哥一地名。——译者

感情献出他们的赠品。英国人可以为随着一队队军队在被征服的印度或非洲领地上进行的文明化工作感到骄傲，但是对中国无须使用暴力或通过权威，它将投入美国友好、慈善的怀抱。

对于中国生活及政策现实的这个简单却又真诚的看法是由美国领导人一手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到在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罗斯福总统把自己搞得有点令人讨厌了。1943年，中国的代表威风凛凛地被请参加开罗会议，在那里，他们来得最早，离去最晚。总统执意要把当时大部分控制在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手中的中国提高到世界大国的地位。他坚持让中国领导人了解西方盟国的一切机密，并暗中参与西方盟国的一切计划。战争结束后，他们又保持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地位，在安理会占据一个永久席位。在美国的引导之下，并无疑为美国的贸易和慈善事业提供大量的机会，中国就这样进入战时主要盟国之列——俄、美、法、英——这些国家将形成二十世纪的神圣同盟，保卫和平，并在感恩戴德、万众欢呼的战后全世界促进人类繁荣。这个近似天真的计划由于苏维埃俄国的缘故而破产，这时，美国政府及其人民万分惊讶，大失所望。但是他们很快适应了形势，待惊魂稍定后，他们第一个站出来采取行动，重新审议他们过去政策中的 541 错误。可是，当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彻底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并将其赶出大陆，这不仅对于那些关心战略和军事力量的美国人而且对全体美国人，包括最高层和最低层的家庭在内，都是个沉痛的打击。对中国，为了它的人民，美国人长期来将一角、一元收集起来的钱投入大小教堂里的布袋和捐款盘内；对中国，为了它灾难深重的亿万人民的利益，美国人多年来作出了巨大牺牲；对中国，为了它，美国人从全国各州、各城镇派出了传教士、教师和医生；对中国，美国人为了它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对它的期望又是这么大，这个中国却以令人伤心的蔑视，调转头来反对美国人。这对美国

的骄傲真是当头一棒。

美国历届政府忠实地反映了美国舆论的态度。美国官方没有承认“赤色”中国的政府，甚至不承认它事实上的存在，至今仍认为是不合法的。直到最近，英国承认一个外国政府不是基于对一种外交证书的尊重，而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它的外交使团的目的仅仅在于“完成女王的使命”，保护或发展女王臣民的利益。基于这一考虑，艾德礼早在1950年1月就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数月之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和人民首当其冲。这不由自主地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于是，美国人不仅拒绝承认北京或他们称之为北平的政府，而且还坚持主张蒋介石的流亡国民政府占据安理会及联大中的中国席位。

为数五十万左右的国民党军队，渡过了福摩萨海峡，在美丽的福摩萨或台湾岛上安居下来。在这里，蒋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筑了坚强的堡垒，并几乎建成了一个王朝。美国人全力以赴地帮助他，并以各种大量慷慨的外援，使他及其军队得到当地人的承认。

美国的一些盟友不满意美国的态度，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可说是幼稚的，因为没有人真心认为，如果大陆中国不分崩离析，发生内战，福摩萨为数甚少的军队会有能力征服大陆。与此同时，美国人却顽强坚持，并且总的说来颇为成功地说服其西方盟友拒绝与中国进行贸易，或者将其贸易加以限制，取消著名的“对中国贸易项目名单”上的全部项目。这一争端成为不断摩擦的根源。虽然自由世界的多数国家接受拒绝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政策，但他们不满意华盛顿的压力，华府强迫他们保证几乎所有商品都应属于这些伸缩性很强的范围。我同意控制武器的供应，同时，我一再表示，促使共产党人垮台的上策是使他们尽可能地富起来，那时，他们将陷入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使其力量削弱的各种弊病中。不知为什么，我的美国朋友认为这一道理不能接受。

许多人同样讨厌美国人所持的固执态度，他们差不多仍控制着联合国的投票，他们坚持要让蒋介石的代表出席安理会，而实际上，蒋介石仅仅对一个岛屿实行着军事统治，包括他的流亡的军队在内总人口还不到一千万。下院的反对党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感到英联邦的一些总理，特别是新西兰的纳什对此反应很强烈。这年早些时候在我访问期间，他曾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详细地向我解释他想要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原因。同时，他非常不想得罪美国政府。我不得不告诉他，虽然我们基于正确的传统承认了中国，但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益处。由于我们在承认他们之后没有支持他们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要求，事实上我们是吃了亏的。我也不得不向锡兰的班达拉奈克承认，我不认为共产党政府会接受在英国受到广泛支持的妥协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共产党中国代表大陆，国民党代表福摩萨。周恩来几乎肯定地认为这是伤害加侮辱。锡兰总理最近与共产党领导人会谈以后，似乎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千方百计地否决把中国席位移交给共产党中国的多次提案，能够毫不困难地在联合国取得支持。 543

同时，美国人坚守保护蒋介石不受大陆任何进攻的诺言，1954—1955年冬他们再次重申这一保证。当然他们的目的在于利用福摩萨以及被称之为澎湖列岛一连串岛屿建成一道屏障，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向前推进。艾森豪威尔的保证里是否包括中国沿海的这三座岛屿，这点并不十分清楚。可喜的是，其中一个岛上的军队已经撤退，还剩下两个未撤。国民党领导人利用他们那支小小的军队尽最大的努力加强马祖和金门的防守。看来他们决心竭尽全力保卫这两座岛，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树立一面自由的旗帜，还是为给国务院施加压力的方便手段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沉寂近三年之后突然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时，华盛顿和伦敦一片惊慌。当时我们仍陷在



黎巴嫩和约旦的纠纷之中，即将面临由赫鲁晓夫最近的行动引起的联大的一场大辩论。我于8月27日闻得此讯，那是在刚刚与三、四位有关的同僚就塞浦路斯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天之后。

现在，新的麻烦正在远东扩大。中国人正威胁进攻1955年我们经常听说的著名“沿海”岛屿。这把美国人——同时也把我们自己——置于困境。如果美国人抛弃中国国民党人，那将沉重打击他们的威望，并可能危及其对澎湖列岛和福摩萨的控制。倘若他们仍用常规武器帮助中国国民党人抵抗侵犯（金门岛与厦门仅几英里之隔），他们可能失败。倘若他们用核武器攻击中国的飞机场，那等于火上浇油，局势将愈来愈严重。我们同样地进退维谷。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中国人（共产党人）无可争辩地拥有这些岛屿（我们将这些岛和福摩萨等加以区别，显然是以正确的法律基础为依据的）。艾登于1955年阐述了 this 观点，丘吉尔也是这样看这个问题——（他私下写给总统的信很强烈）。但是，如果我们抛弃美国人——我指的是道义上，他们确实不需要积极的支持——这将对于我奋力重建和加强的友谊与联盟是个重大的打击。如果我们支持他们，那末，远东、印度和中东的亚非集团的反响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在国内，议会和公众对于改变我们三年前的公开立场的任何做法将进行尖锐的批评。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sup>①</sup>

自然，赫鲁晓夫最近的北京之行以及随后的政策变化，实在高深莫测。

据有些人说，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在最近的北京之行中安排的（或者得到他的同意的）。由于共产党集团在中东的主动有失去的趋势，这一计划的目的似乎是要在远东重新获得主动。同时，由于英、美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一致而且坚定，因此想在这些糟糕的“沿海”岛屿问题上在英美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另一种观点认为，俄国人根本就不赞成这种做法，并十分担心这一举动会导致战争。核战争将毁灭俄国，但据说中国人曾温和地提醒他们说，核战争不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灾害，可能会有两、三亿人死亡，但那可以忍受并能得到迅速恢复。这些是专家们的不

<sup>①</sup> 1958年8月28日。

同解释。<sup>①</sup>

当炮击开始时，国务卿杜勒斯正在外地休假，我认为最好等他回来以后再把信送给他或总统。在对尼赫鲁的紧急呼吁的答复中，我只能说，在我们焦急不安地注视着远东形势的时候，很难说这件事有多少是对和平的真正威胁，又有多少是讹诈。9月3日，<sup>545</sup>我考虑直接与总统联系较为妥善。

我知道您将于明日与福斯特讨论远东出现的新问题。自我出任首相以来的两年中，您和我经历了许多烦恼，您知道我对我们在一起共同对付困难感到多么欣慰。虽然，我们过去在考虑沿海岛屿的法律地位与实际控制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最最关心的是我们两国不应产生或表现出意见分歧。当然，中国人可能是利用海岛进行讹诈，正如他们在香港问题上新的宣传攻势可能只是空谈而已一样。同时，我感到，我应尽力在一旦有什么情况，或有什么最坏的事情发生，引导这里的舆论。因此，如果能收到您或福斯特的信，告之你们的想法，那我将十分感谢。

与此同时，杜勒斯即将在他的事业中显示他最出色的“边缘政策”艺术，他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大意是如果需要，总统将毫不犹豫地执行1955年1月的国会联合决议的条款，这些条款授权美国援助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人，如果总统认为这一援助对保障福摩萨的防务是必要的话。这样，一场双方互相威胁和讹诈的游戏开始了，这场游戏将持续整个9月和10月，大大地妨碍了我议会休会的机会。从纯技术观点出发，可能值得将这个插曲作为军事外交危险游戏的小演习来加以研究。虽然，有时很令人焦急，但我心里总是觉得，总统不会允许这一危机导致核战争。

在杜勒斯讲话的当天，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领海权扩大到十二英里。在这方面他们只是赶时髦，因为其他一些国家已开始按这个方式扩大他们的权力了，尽管通常是出于更令人尊重的理由，<sup>546</sup>

<sup>①</sup> 1958年8月29日。

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渔场，而不是威胁邻邦。我们和美国立即拒绝承认中国的这一要求，不算金门和马祖在内，这一要求将使得香港也难于防守了。

9月5日，我接到杜勒斯的回信。他告诉我他在新港见到了总统，这封信是在与总统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去华盛顿的途中由他口授的。我们的大臣胡德勋爵一收到信后，便能够与杜勒斯进行一些会谈。胡德评论说，这些沿海岛屿实际上是随时可能失去的东西。他问道，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人士如此看重它们。杜勒斯回答说，国民党人把这些岛看作大陆在它们控制下的唯一部分。1955年的上次危机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W·雷德福上将，和国务院的沃尔特·罗伯逊妄图说服蒋介石放弃这些岛屿，但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杜勒斯想知道这些小岛是否可能非军事化，但他承认双方接受这一局面的希望颇为渺小。

福斯特·杜勒斯(在总统的要求下，并且几乎是以总统的名义)发来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信中表明，总统和政府希望通过福摩萨和这些岛屿的一条强硬路线，制止侵犯的威胁。但是侵犯行动可能变为封锁，这是北京今天宣布的十二英里领海权的目的。如果国民党中国人不能自己对付这次封锁，那么美国将给予帮助。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中、美直接的相互攻击。但是，“赤色”中国可能要从空中进攻金门岛等。在这种情况下(至今他们还没有进行轰炸——只是炮击)美国只能以袭击“赤色”中国的飞机场和大陆进行回击。为了取得成效，这种袭击可能使用核武器(千吨级爆炸力的)。这有可能导致俄国人参战。这样我们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这一切都在信中用……简洁而又有克制的语言作了清楚的说明。<sup>①</sup>

虽然此信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但我感到有些沮丧。

547

我的同僚已经离开——还有几位今天早上动身。外交大臣(我十分依赖他的判断力)正在度过他理所应当享受的假期。诺尔曼·布鲁克爵

---

<sup>①</sup> 1958年9月5日。

士也在外地。<sup>①</sup>

杜勒斯的信粗略综述如上，信中有些段落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是特别有趣的。他声明，他的顾问们一致认为

假设金门失守，不管通过交战还是投降，那都将严重地影响福摩萨现政府的权威和军事力量；由于该岛将经受颠覆与军事行动，结果可能产生一个主张与共产党中国联合的政府；假设此种情况发生，将大大地破坏反共阵线，包括日本、大韩民国、泰国和越南；东南亚的其他政府，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都将统统可能置于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有着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将可能陷入中苏的轨道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在战略上被孤立起来。

这段话形式上有些夸张，它是我们见到的“多米诺”理论<sup>②</sup>的第一个声明。过去我不曾知道，但现在我听说金门岛驻有八万国民党精锐部队，美国人正从后勤方面帮助他们

提供装备，并在金门三英里之内的公海上护航。他们的大炮埋得很牢固，摧毁这些工事将很费劲，特别是不从空中轰炸的话。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还没有使用自己的空军基地轰炸沿海岛屿，也许是想避免使这些基地遭到报复行动。

杜勒斯怀疑在必要时进行的干涉如不使用原子武器是否能奏效；

我希望只是空中小爆炸，而没有放射性尘埃。当然，这是令人不愉快的 548  
前景，但这样的前景我们是必须勇于正视的。

他最后说，局势固然似乎严重，但现在的情况是：“虽然采取强烈的行动要担风险，但按兵不动的危险则比这更为严重。”

这封信使我处于困境。

昨夜，我没有和同僚们商量（无人可商量），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寄给福斯特和总统。我尽量客观地阐述联合王国以及英联邦各国公

---

① 1958年9月5日。

② “多米诺”理论假定一个国家被共产主义控制，其他国家也会很快倒向共产主义，正如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排列在一起的骨牌一样，第一块牌倒下，一排牌都会倒下去。——译者

众的观点。这些国家的公众都不会完全支持美国的立场。我们如何能做出(1)一个更好的姿态,(2)做出一个可能使俄中两国人就此止步的姿态呢?表面上,第一个姿态与第二个姿态是相矛盾的。如果共产党人真正认为美国会因为这些沿海岛屿而参加战争——并且如果他们相信联合王国以及其他国家会支持美国——战争就不会发生。因为,俄国人反正不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不想打。但是,如果我们的舆论和议会(谢天谢地,我们的议会正在休会)显示出一丝犹豫和软弱,那么共产党人会觉得美国人没有胆量“单干”(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将是错误的)。所以很可能发生对岛屿的入侵。如果美国干下去,就会爆发世界大战。如果美国人屈服,整个远东的反共战线就会崩溃(东南亚条约组织等)。这将影响中东,最后影响欧洲。这将成为另一个慕尼黑。

这就是我们进退两难之处。我向美国人摆出我唯一的观点。但是否行得通,我也不知道。这一想法是杜勒斯对胡德勋爵的一番话中引起的。内容如下:我们是否能使美国的所有朋友都

第一,谴责任何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第二,至少在联合国内外采取行动之前,支持将执行这一路线的美国以及其他任何人。

第三,建议使岛屿非军事化——也许在一段时期内大陆上的一个地区也非军事化。

这些作法将

第一,用坚持“不使用武力”继续向共产党人施加压力。这是避免战争的最佳良机。

549 第二,在我们的各个国家,并在联合国里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开”宣传场所,帮助我们做到上述一点。<sup>①</sup>

有关英国舆论问题,我向杜勒斯尽量简明地重复了我的难处:

说到这个国家,正如我第一封信中提醒您的那样,舆论是不易控制的。1955年的记录表明,我们曾说过福摩萨和沿海岛屿是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的。丘吉尔曾说,“为蒋介石保存这些岛屿而打仗,在英国是说

---

① 1958年9月6日。

不过去的。”当然，这是在给总统的私人信中说的，但却代表了普通百姓的自然反应。

第二天，即9月6日，周恩来采取了行动，宣布一定要解放中国的全部领土。然而，他又对此加以节制，要求继续中、美两国的直接谈判。从1955年到1957年，非正式谈判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对我上封信的复信中提到这一新的情况，并表示由于周恩来的建议，眼前的危机至少暂时会变得稍为和缓一些。他还说：“我们刚刚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愿意恢复大使级谈判。”事实上，一周后大使级谈判继续进行。

这封短信主要是感谢我的建议，对此他作了极其认真的考虑。但是，总统指出，他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蒋的脾性。虽然他依赖着美国的支持，但他一点也不好对付。任何让他放弃一尺防线的主张都会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确实，他的拒绝这样坚决，这意味着如果采取了强制力量无视他的反对，那么他控制下的福摩萨就将不再抱友好态度了。

幸运的是，完全由于假日的气氛，英国的公众仍相对地保持镇静。

英国的报界相当镇定。外交部提出了经我同意的公式。

550

女王陛下政府与美国政府同样地关注任何使用武力强行改变领土的企图。

看来，这是目前最好的措词了。<sup>①</sup>

尼赫鲁发来一封友好的长信，答复我给他的一封简单的警告信。信中，他指出，根据他的观点，不仅沿海岛屿应立即归还中国的人民政府，而且从长远观点看，福摩萨也应归还给他们。在第一个问题上，他提醒我注意我的前任丘吉尔和艾登的态度。虽然此信无助于解决我的困境，但我读到这封信感到高兴，因为信写得友

<sup>①</sup> 1958年9月6日。

好、亲切，它表现出他的谦和优雅的风度。其中的一段值得重温：

收到您的来信我总是很高兴，从信中了解到您对一天天压在我们身上的当前一些大事的看法。是的，我没有被这些大事所压倒，尽管有时有些烦恼，但我的身体仍很健康。大约在本月中旬，我打算访问不丹，该国大概是仅有的几个难以到达的国家之一。这次旅行将要在我们东北边境的高山艰苦跋涉五天，通过三个海拔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关口。这样，仅往返路程就需要十二天，此外，我将在不丹停留四至五天。

孤独地呆在伦敦，内心焦急。即使我不能一览喜马拉雅山迷人的景色，至少我总可以在此时节涉足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或松鸡出没的禁猎区。

现在该轮到赫鲁晓夫拿一手了。9月7日他给艾森豪威尔一信，扬言苏联将根据1950年中苏友好条约支持中国，并要求美国军队从福摩萨以及邻近地区撤出。很难对此举动的重要性做出估价。

551 现在赫鲁晓夫先生对美国人——或其他人——发出警告了。对此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我怀疑，如果他所说是认真的话，是否真的想打起来。<sup>①</sup>

两天之后，加拿大总理很自然地参加了进来。他表示对正在发展的局势感到相当惊慌，并认为加拿大的公众对美国政策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也许在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并不一定会给美国带来公开的难堪。他尤其想知道我的观点以及我将采取的行动。我只能笼统地予以答复，并把我们的公开立场通知他及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总理。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对美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宣布共产党人炮击岛屿是一种侵略行为。美国政府不会向武力屈服，但愿意在任何时候进行谈判；9月12日，他以类似的措词复信给赫鲁晓夫。

---

<sup>①</sup> 1958年9月9日。

当东西方大国之间进行着恫吓和胁迫时，我却不得不在舰队街遭遇一次较小的事件。这是由9月10日我亲爱的老友伦道夫·丘吉尔<sup>①</sup>对我的访问而引起的。他正在去法国南部的途中，顺便找我聊一聊。他在我这里时，我们一般地谈了中国问题，结果，他在《旗帜晚报》上写了篇文章，11日登出。不幸的是，它

在“麦克支持艾克”的标题下，给人们制造了他与我进行一次权威性谈话的印象。其他各报大为兴奋。对此有必要在十号首相官邸发表一则声明，指出伦道夫·丘吉尔无权发表我对远东问题的观点。糟糕的是，他的文章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将给予美国军事支持。这当然是荒唐的。他们并不需要这个。但是他们确实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尽管关于岛屿有种种复杂的情况）我打算给予他们这方面的支持。<sup>②</sup>

在回答中，伦道夫恰当地指出他并没有直接引用我的原话，他的文章只是他自己对形势的理解。我对伦道夫一直是倾心的，从他的青年时期起直到他过早地死亡为止，一贯如此。有时他给我带来一点焦虑，但这从来未损害过我们之间深厚真挚的友谊。然而，这一次我恼火了：

丘吉尔的文章以及首相官邸的声明引起了一场喧嚣。他真够让人心烦的。实际上，他是在星期三下午来看望我的，从我这儿捎一个口信给温斯顿（有关他的金婚纪念），还给我看丘吉尔家族（以及许多大艺术家）送给温斯顿和克莱米的那本绝妙的“玫瑰集”。我们只是随便扯到远东和塞浦路斯问题，他走后竟写了一篇“专题报道”——没有提到他与我的谈话。本来这篇文章不会出什么问题。倒霉的是，编辑问他是否见到我，伦道夫回答说是，这样文章看起来便成了一篇访问记。《镜报》和《每日先驱报》咄咄逼人，其他各报也大做文章，但似乎还算“谅解”。他们都了解他们的伦道夫！然而，为此我却十分不安，因为这是我出任首相以来

---

① 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译者

② 1958年9月11日。



第一次“出洋相”，况且这根本是不必要的。<sup>①</sup>

幸运的是，外交大臣已经假满返回了，我有了一个比较得力的人进行商量：

外交大臣上午十一时到达，我们定下了答复总统昨夜演说的声明——声明写得相当好。我们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但表明，我们不提供“军事”支持（考虑到香港问题，即便是这点也不能做得太过分）。<sup>②</sup>

我很明白，我们自己可能要求美国提供积极的援助。

比国内麻烦更严重的是我国驻华盛顿大使上封电报中透露的情况。这是很清楚的，

553 政府（包括总统和福斯特·杜勒斯）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能强迫他们麻烦的盟友中国国民党人顺从自己的愿望到何种程度。而且也不了解军事形势，不知道蒋军是否能在封锁岛屿的惩罚性炮击中坚持下去。塞尔温·劳埃德明晚离开纽约。<sup>③</sup>

听到1957年中止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华沙再度开始，我想我可以休息几天了，便乘坐夜车到苏格兰北部。我打算住在凯思内斯老朋友处。多罗西应该已经到达那里。与通常一样，我们安排妥了通讯联系，安排了一位私人秘书和特殊电话线。现在我希望短休一下。

我到达伯里艾德勒的当晚，盖茨克尔送来一封信，这封信在上午十时左右送到十号，询问关于远东的政策以及英国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我们要求你们讲明，即使美国参与了保卫金门的战争，英国也不愿介入。”他接下去写道：“舆论完全反对为了金门而战。”信以命令口吻结束：“我希望你准备……前往华盛顿并将（这些观点）告知总统。”

这封信有点像家庭女教师的口气，这是在工党“影子内阁”开会后写的。菲利浦（德·朱利艾塔）和约翰·温德姆负责唐宁街十号的事务，他

---

①② 1958年9月12日。

③ 1958年9月14日。

们干得很好,信的内容是快开午饭时用电话告诉我的。①

因为我已听说盖茨克尔很可能要与他的同事们开会并有可能写信给我,所以在离开伦敦之前我已拟订了复信的草稿。信稿通过保密器用电话告诉我,晚十时许,信稿经大法官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爵士略加修改后便予以通过,并准备好发出。外交大臣已经动身前往纽约。

盖茨克尔坚持立即公布他的信,这种做法相当卑劣。实际上他把信 554  
在送到十号前就已经送给报界了。但是我们及时地把回信送到报界,只是没赶上第一版排印。这件事显然给舰队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一封实际上是在英国的最北端收到的信,而于当晚八至十时之间便写完复信,这个速度是够快的。

约翰·温德姆坚持把我们的信亲手送到汉普斯台德交给休·盖茨克尔,让他不能按时就寝,然后各报毫不留情地通宵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做进一步的答复。②

我的部下确实忠诚可靠、智谋多端。

9月19日,赫鲁晓夫给美国政府的信言词如此无理,乃至遭到华盛顿的拒绝。白宫的声明既坚决又严肃:

这封信充满了不真实的诬告,语言污秽而又放肆,竟至进行人身攻击,包括令人不能接受的威胁。所有这一切,根据国际惯例此信我们无法接受。③

形势似乎处于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然而,不论在我们的报上或公众中,都没有引起任何惊恐。

9月21日,我得到塞尔温·劳埃德的报告全文,他当时已抵达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

外交大臣与杜勒斯进行了长谈……美国人看来通情达理,但他们不晓得在远东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供应情况有所好转——看上去,可

①② 1958年9月16日。

③ 《1958年年鉴》,第201页。

以用坦克登陆艇和水陆两栖坦克维持岛屿。所以，最后的结局可能象柏林的形势一样——这次用水陆两栖器械代替空运。<sup>①</sup>

但是他给我信件中的最重要的一封是一个短笺，描写了他私访纽波特与总统的单独会晤。

555 总统告诉塞尔温·劳埃德，他反对在限制性行动中使用原子武器，哪怕是战术性原子武器。<sup>②</sup>

我感到宽慰，但并不感到惊奇。

这时孟席斯送来一些有用的建议，其中建议我们成立一专门国际委员会以考虑沿海岛屿的问题，不是作为纯法律问题而是作为国际政治问题给予考虑。如果决议不为蒋所接受，西方可以有秩序地撤回他们的支持。可惜的是，这一计划，不论其优点如何，却低估了将军的顽固性以及美国人不冒整个“屏障”战略之崩溃的危险就将放弃蒋的可能性。

9月30日，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似乎杜勒斯从边缘上退回了几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将一大部分军队，包括精锐部队驻扎在沿海岛上是很愚蠢的。他还暗示，如果能有“可靠的”停火，美国可能敦促减少驻军。10月1日，总统继而向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个含糊其词的声明。作为一个军人，他认为把兵力布署在这些岛上不是一件好事。“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岛就领土而言对福摩萨并不是关键性的，”但是，他重复说，根本的问题是“在武力面前不要退缩”。<sup>③</sup>当我读到这些言论时，我已度完假期返回伦敦。连我也觉得这些话意思不清。

福斯特·杜勒斯发表过一、两次声明，建议在马祖、金门问题上妥协；但蒋的反应很强烈。很清楚，他可以相当彻底地讹诈美国人。<sup>④</sup>

---

①② 1958年9月21日。

③ 《1958年年鉴》，第202页。

④ 1958年10月4日。

在答复孟席斯时，我解释说外交大臣已在纽约向葛罗米柯建议，苏联政府应真正尽力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但是，很难设想通过一个国际法庭——甚至是国际委员会——让大国做出有效的裁判。马祖和金门事件只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在此同时，中国人对印度人暗示(大概是为了传递信息)如果在岛屿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忘掉福摩萨。这一表示加上华沙谈判的恢复，似乎给人有暂时解决的希望，而且东、西两方都不会太丢面子。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争端从未解决，只是像焰火晚会上的最后一枚礼花一样，带着嘶嘶的响声熄灭了。 556

10月6日，彭德怀元帅温和地宣布，炮击金门将停止一周，国民党可以运进需要的物资，条件是这些物资没有美国护航舰的保护。这次奇怪的停火实际上延续了两周。而后在10月20日，炮击继续，元帅声称美国的护航舰来到这些岛上。但是，五天之后，由于美国船只入侵的说法不能肯定，元帅作出了一项决定，甚至使英国人的调解才能也为之逊色。他于10月25日宣布只在每月的单日炮击(有如在路边的一侧停车一样)。这一奇异的事态一直继续到年底。这样，1958年夏秋期间的一场来势凶猛的熊熊大火，在继续闪烁燃烧了六个月之后终于熄灭了。到1959年3月时，福摩萨海峡又恢复了宁静。

当时我正在华盛顿访问，曾记录如下：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对沿海岛屿作出任何重大行动。但他们承认，在说服蒋撤出岛屿甚至大幅度削减驻军人数的努力中，完全失败了。<sup>①</sup>

这样，至少对我来说，这一奇怪的插曲就此收场。我现在仍然在想，究竟应从这一事件中总结出什么教益。

---

<sup>①</sup> 1959年3月22日。

## 第十八章 一次探索的航行

1958年8月，尽管——或者说，也许正因为——当时我正全神贯注于中东和远东两处紧张局势可能产生的危险，我的思想开始再次转向以俄国和美国为中心的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可能出现某些缓和的远景上，这两大集团正在世界各个地区日甚一日地对抗着。

在对雅典、安卡拉和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显然是毫无成果的访问之后，我于8月12日回到国内。我发现国内情况令人宽慰，尽管我们有许多困难，但是绝没有使人感到泄气。在我出国期间，报刊对我一直是友好的。几天以后，有一家报纸谈到

一次对保守党和对首相十分有利的民意测验。根据这次测验来看，我们现在有可能赢得一次选举了。所以每个人都在推测秋季有可能进行选举。

每当这些民意测验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十足，而当测验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就往往认为它们没有多大价值。事实是，大不列颠的——特别是伦敦的和英格兰的——民主是变化无常的。<sup>①</sup>

回国后一两天，我读到我国驻莫斯科大使帕特里克·赖利爵士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急件，它使我想起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个人性格问题。他的突然执掌最高权力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事实，但是应当如何来解释这个事实呢？8月13日，我写信给赖利说：

我确信，在指出赫鲁晓夫最危险的特点——自大狂这点上，你是正

<sup>①</sup> 1958年8月19日。

确的。不能说自大狂是发动革命或在革命初期领导革命的那些不义之徒都有的特点。我可以想像，列宁、斯大林等人是些无情的冷血动物；但是自大狂之所以使人害怕，因为这种病的患者可能干出很蠢的事来，以致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本能地感到，这正是处于纷乱复杂状态的世界的最大危险所在。赫鲁晓夫会不会做出希特勒做过的蠢事来呢？

历史可以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很好的答案：赫鲁晓夫性格中的这种倾向随着他权力的增大而不断发展，终于在四年后的古巴危机中表现出来。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讨论中东问题的“紧急”最高级会议，这曾用各种不同方式建议过。

有一件事引起我的兴趣。当然，你写那信时，还存在着在纽约或日内瓦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可能性。现在最高级会议已被蒙上一片乌云，但是我倒很愿意知道，你认为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的论战以及同我的论战是使他捞到了好处呢还是使他吃了亏。他们在俄国发表了我的答辩吗？我尽力把我的答辩写得简短明了，你看这样做对吗？东方人容易认为除非你写出一大篇，否则你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为了将来有用，我很愿意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转到最近的局势，我问他：

第三，那个真正的最高级会议怎么办？我指的是我们已经缓慢地爬了很久而未爬到的那次最高级会议。依你看来，我们应不应当提出新的倡议，什么时候提出？

我的信最后一段提到我考虑已久的一个计划，对这一计划我三思后得出一个谨慎的想法，即想亲自到俄国作一次访问。对此，我的同僚们一直不热心，我们的盟国似乎也不会有更多的谅解。然而我对局势的持续恶化感到不安，急于想采取主动。

现在，对于任何一个有志气的政治家——执政的或者在野的——来说，都认为访问莫斯科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形

下,再来回想十二年前流行的那种紧张气氛是很困难的了。那时,  
559 正当英国在世界上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  
威信还没有低落的时候,一个英国首相的访问不仅是一种礼尚  
往来的行动,而且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几乎是会轰动一时的大事。  
因此,我坦率地向这位大使——从阿尔及尔时期起就是我的一个  
老朋友、老同僚——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回访问  
题。如果筹备最高级会议的谈判完全失败,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想  
主动提出我在春季往访。对此你有什么想法?他们会不会简单地把这  
看作是一次屈服?

正如我所料,大使对我头三个问题的答复写得极好,也富有说  
服力。第四个问题却直到第二年年年初才进行详细讨论和作出决  
定。在这段时间里,如果说不是在政治方面,那么在贸易方面至少  
获得了某些进展。8月14日,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国家一起宣布对苏联集团和共产党中国在较大范围内放宽贸  
易。范围极广的原料和工业品禁运项目表,本来一直是贸易的重  
大障碍,这时得到很大的修改。只有少数项目仍然保留,而这些项  
目可以真正从技术上说明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与此同时,美国  
也相应地宣布了对苏联集团各国裁减禁运项目。但是,美国对中  
国、北朝鲜和北越仍然保持全面禁运。

8月16日:

外交大臣从纽约打来一个电报说,福斯特·杜勒斯现在心里盘算  
着,鉴于有可能签订一个可行的监督协定,我们应当放弃核试验。这个  
问题现在被法国的主张弄得复杂化了。我发了一封含蓄的复信,我们明  
天需要再发一封内容更详细的信去。<sup>①</sup>

可是,接着来的一封信说,杜勒斯私下在与塞尔温·劳埃德一

---

① 1958年8月16日。

起吃饭时说的话原来只是自言自语,随便谈谈,他当时还没有同华盛顿方面的任何人商量过。看来,他设想从某个日期起停止九个至十二个月的核试验,包括或者不包括地下核试验再看协商而定。开始停止试验的日期当然要同我们商量决定,以便保证我们下一批试验能够照常进行。在写信给劳埃德的时候,我说明白我必须得到内阁的批准,而在假期中这不可能很快做到。此外我提出,既然联合国大会在9月16日以前不会召开,因此我看不用急于立即发表声明。至于哪个日期,我需要同专家们商量一下,看看我们下一批试验需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还不很清楚为什么地下核试验可以不包括在内,是否因为美国想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还是因为地下核试验无害?然后还有“小型”试验的问题,日内瓦会谈表明,这些小型试验是任何现有的装置无法侦察出来的。我们将从美国朋友那里不断得到情报,对此我们只好感到完全满意。我们的专家要到麦克马洪法修改之后的8月27日才开始在华盛顿进行重要会谈。在我们看到这些对话进行的情况之前,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有一项坚定的政策。我又增加了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需要保护法国的立场:

这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和美国人出卖了他们。尤其在处理同戴高乐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考虑应当做些什么。因为这里边的关系颇为重大,牵涉到欧洲经济结构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必须决定,他们准备做些什么事来帮助法国,考虑法国的原子计划必须达到什么阶段,才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帮助。他们是否进行一次爆炸就够了?不包括小型核试验在内的条款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法国可以进行几次小型试验而不会在道义上陷于孤立。

我想最好现在就宣布我们下一次的试验。8月18日我们宣布了。我希望我那些含蓄的信件至少会给我们带来少许喘息的时间。但是可惜我想错了。



我正盼望有一个安静的晚上，然后明天早上到波尔顿大教堂去。但是今晚（大约十点半）劳埃德打来两个电报，提出了几个最严重的问题。美国人（以总统为首，看来他决心显示他的力量）想宣布从10月1日起废止（或者停止）核试验。美国人太着急了，他们甚至来不及考虑这个决定（一）对我们的原子计划，（二）对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明天我必须放弃我的旅行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拟就可能给美国人答复的一份初稿。<sup>①</sup>

于是，第二天安排了一次官员们的会议来讨论复信草稿。参加讨论复信草稿的有和往常一样沉着并能提供有益意见的诺曼·布鲁克爵士、外交部的聪明而果断的帕特里克·迪安爵士、国防部办法多的理查德·鲍威尔爵士、还有原子能委员会的很有才能和果敢的埃德温·普洛登爵士和其他一两位官员。外交大臣在华盛顿，其他有关的大臣们照例都在休假。

同时总统另外一封私人信，答应给我们提供“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全部情报（如果我们同意在他们提出的声明的基础上停止试验的话）。我告诉我的顾问们，我想应当分别回答这封信，而且我还要直截了当地问问六万四千美元的问题。“法律会许可美国给我们提供关于核弹‘弱点’和制造百万吨级小型原子弹的情报吗？”另一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炸弹就可能完全被“取消”。如果我们不久能为导弹制造自己的弹头，不论导弹本身是美国的（像雷神导弹）或者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么第二个问题也是同等重要的。给总统的答复除了这个重大问题——如果美国人能对此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当然就不需要搞进一步的试验了——还有政治方面普遍反对美国人仓促从事的意见。拿一件事情来说，法国人绝不会原谅另一个他们将称之为“出卖”的举动。<sup>②</sup>

经过充分讨论以后，我给总统发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只谈英

① 1958年8月19日。

② 1958年8月20日。

国的立场。如果要我们心安理得地放弃试验，那么我们务须得到保证，我们将在一切重要问题方面，首先在我前面已经具体提出的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情报。在总的方面，我感到对日内瓦专家们即将作出的报告必须有所反应，在我们早就提出的采取切实可行的侦察和监督措施的要求至少部分实现以前，我们不应当放弃试验。而且，由于美国的一系列试验在10月中旬以前不会结束，那么把西方任何倡议与联合国大会开幕联系起来，比与专家们的报告相联系要聪明些。外交大臣在纽约时，曾煞费苦心地向杜勒斯说明我们认为这牌应当怎样打才最好。但是，总统在他的一封信里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我们现在正遇上在我们看来一个不可坐失良机的时刻。”此外，赛尔温·劳埃德的报告说，他在联合国同法国的部长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看来他们毫不在意，因为不论别人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法国都无意放弃试验。很自然，正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就别想再去度假了。无论如何，这个季度我是不会去打扰那些松鸡的了。

下午和晚上伦敦活动频繁。美国总统发来一封十分肯定的复信，保证他本人和他的政府把我们所需要的核武器方面的一切情报全部告诉我们，并且声明法律许可他这样做。我同意了为我草拟就的复信，但是我把我们的答复分两封信发出：一封是关于原子方面的保证的，另一封是关于总的问题的。我希望关于美国核诺言的那封信要写得简短而自我克制。既然对其他大多数问题的意见看来会取得一致——法国不反对——于是我同意英国支持美国的行动。现在美国人已不提要绝对地放弃试验，除非俄国人同意谈判监督体制。美国由于我们的建议已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了。依我们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可以信赖美国的诺言。这个诺言代替了麦克马洪修正案中〔至今〕所规定的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双边”协定。这样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和大量金钱。①

563

既然杜勒斯重新起草了他的建议，同意我们搞完计划中的试

① 1958年8月21日。

验，并且向我保证，如果对监督体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美国人不会觉得自己无权恢复试验，所以对他提出的计划我表示了谨慎的赞同。但是，我说得很明白，我关心的不仅是保护英国的核计划，而且还急于从日内瓦专家们的讨论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我不希望俄国为停止核试验一点代价也不付就滑过去了，也不想放弃我们都希望让他们接受的某种国际监督——而这是普遍裁军，不论常规的或是非常规的，取得任何进展的重要条件。

在8月21日给总统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强调了这些政治上的考虑。

特别有两个因素在我看来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我认为，要是我们没有能使俄国人接受国际监督体制而作出暂停试验的让步，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第二，我对戴高乐的反应深为担心。在这两点上，今天你的来信都再次对我提出了保证。关于第一点，我认为福斯特的新草案有了很大的改进。虽然，甚至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俄国人会不会接受一种真正的国际监督体制。如果他们的方针是每个国家为在本国领土上的监督站提供人员，那么我们便达不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希望我们都对此密切注意。关于第二点，如果我能知道戴高乐本人在想些什么，我会感到更加高兴。但是，使我宽慰的是我知道无论如何顾夫[德姆维尔]好像相当平静地对待这件事。我想我必须正好在公告宣布以前给将军写一封私人信谈谈这个问题。或许你会考虑你是否也能这样做。

第二天一早，我听说总统和杜勒斯接受了我们五条修改意见中的四条，两人看来对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感到非常高兴。总统和杜勒斯，还有英国的外交大臣，都接见了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给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都发出了信件，8月22日美国和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措辞相同的正式声明。声明对专家们讨论侦察核爆炸会议的胜利结束表示欢迎，指出下一项工作就是解决有关组织、安排和建立一个监督组织

的具体问题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声明宣布美英准备在10月31日开始谈判在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停止核试验的协定，并希望这项谈判将促进关于裁军措施的谈判。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宣布，从谈判开始之日起，美英准备停止试验一年，如果过去曾进行过核武器试验的苏联和其他各国政府在此期间不恢复试验的话。如果在建立和使用监督体制方面和在确定和实行裁军措施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这种自动限制将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以一年为期地继续延长下去。除此以外，声明表明英国政府将尽快地结束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试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后来宣布，当前的美国试验计划将于10月31日告一段落。次日我记下了：

我们关于核试验的声明得到了报刊相当好的反应，甚至包括《曼彻斯特卫报》在内。今天进行了我们圣诞岛试验中的第一次试验——一次小型的千吨级“扣扳机”的爆炸。百万吨级试验定于9月8日前后进行。是否再继续试验，现在成了问题。原则上，我们可以信赖美国最近的谅解。实际上，最好我们也能从这次试验中得到应有的知识。<sup>①</sup>

以上我相当详尽地描写了这段插曲，因为它强调了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亲密关系，强调了总统和国务卿两位都愿意具体答复我们的意见，并愿意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把我们当作完全平等的伙伴来对待。这段插曲还表明了我们切望照顾法国的敏感性。在回顾这些年份的时候，这种关系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们有时候对华盛顿不断改变的政策和捉摸不定的计划感到有些不耐烦，但是，我们的伙伴并不仅仅是把他们的计划和决定通知我们，而是在最初阶段就充分信任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感到满意了。这种密切的合作和同志感很容易在我们的许多会议上表现出来。但是我很高兴地感到，即使我们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谈话，我们也能通过我们的代表和私人信件保持一种同样充分

<sup>①</sup> 1958年8月23日。

的有成果的对话。

这种精神并不只限于白宫或者国务院。8月下半月举行的英美核科学家之间的会谈也表明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我特别高兴地听到,出乎我们朋友的意料之外,他们发现专家们提供情报并不是完全单方面的。在我国专家小组主要成员回国的时候,我和他们谈了一次话。

会见了刚从美国回来的原子专家。他们同美国科学家的会谈进行得很好。会谈时出现了两个重要情况:(一)美国人在10月底以前还要进行十次千吨级试验,他们不希望我们在他们之前停止试验;(二)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工艺同我们的美国朋友进展相仿,甚至比他们更进步些。他们本来以为交流情报将会是有往无来的。他们切望我们完成一系列的试验,特别是最后的百万吨级试验,因为他们对它的性能感到新奇和很大的兴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将使最后一系列试验成为互相补充的,而不是竞争性的——这样,在议会中也易于为之进行辩护。<sup>①</sup>

我们英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能够用同美国比起来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经费和力量,获得如此显著的进展,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我想应当写  
566 一封信给爱德温·普洛登爵士。信是这样写的:

我同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威廉·彭尼爵士以及威廉·库克爵士作了一次关于他们上星期在华盛顿讨论情况的十分有趣的交谈。我对他们所获得的成果有深刻的印象。很清楚,美国人了解到我们已经知道了多少以后大吃一惊,而这是说服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们给我们的情报要比他们原来打算给我们的更多。我希望这种讨论仅仅是一系列讨论的第一次,在这些讨论中英美在这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密切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确已经逐步说服美国人把这个事业看作是一项联合计划的话——在这个事业中我们有权被认为在基础知识方面是一个平等的伙伴——那是因为我们按照双边协定已经开始快步起跑

---

<sup>①</sup> 1958年9月1日。

之故。在这方面的功劳应归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小组。他们使我们独自在这错综复杂的核武器发展事业中达到了同美国实际上并驾齐驱的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为此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完全有理由感到骄傲。

在我们会见时，我竭力向科学家们表达了这些看法，而且我希望能 在适当时机向公众发表这些看法。但是，不管有没有机会，我希望你知道——如果你能够的话，还请告诉你的部员们——政府对华盛顿会谈的结果正如你自己一样感到满意。我们十分清楚，国家应当多么感谢你领导下的那些忠诚工作的人，他们使我们在这场关系重大的赛跑中紧紧地跟上了。

原子试验的问题继续占去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舆论似乎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满意。在此期间，英美商谈继续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取得进展。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这问题上美国谈判代表约翰·A·麦科恩确实是很明白事理的）是在民用情报的交流方面。

虽然我们相信并且充分发表科技情报，但是除了在军事方面外（像总统同意的），我们不愿意交流工业设计的蓝图。自然，这对我们是一件 567 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方面我们领先很多。<sup>①</sup>

8月30日苏联政府送交英国和美国政府一份照会，宣布他们同意会谈在10月31日开始。同日，日内瓦专家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其最重要之点是认为敦促建立“一个可行的和有效的监督体制”在技术上是办得到的。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完全同意专家们的结论。所有这一切看来大有希望；因为专家们的报告清楚表明，如果俄国人真的接受一种适宜的监督体制，那么我们就有把握取得真正的进展。

关于日内瓦的工作，我想总统可能会对彭尼给我的报告感兴趣，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

① 1958年11月6日。

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专家会议，显然是一个杰出的成就。赫鲁晓夫愿意同我们在10月31日开始实质性的会谈来讨论这个问题，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我感到所以取得这个成就，应当大部分归功于由詹姆斯·B·菲斯克博士率领的你们的科学家们。在他的领导下，整个西方小组工作得既协调又有成效。我想菲斯克对付俄国人的方法应当受到称赞。人们告诉我说，那些俄国人在技术和政治问题方面都很精通和有主见。威廉·彭尼爵士认为菲斯克的成绩很大。如果确是这样，希望你能转达我个人对他的谢意。

我还感到应当写信给丘吉尔，他一直密切关心着这些事情。麦克马洪法把英国排斥在外的做法曾经使他非常恼火，他不断地敦促修改这一法案。于是，我在9月13日写信给他：

568 在英美合作问题上，我们同美国人在最高级政治谈判上和技术方面已达成了十分令人满意的协议，听到这一消息一定会使你高兴。事情的结果甚至比一年前在华盛顿首次提出修改麦克马洪法的建议时我所希望的要好得多。这是我国科学家的巨大胜利。美国人现在看清了，我们在一个短得多的时间里，用比较少的财力物力干了如此多的事情。就我们科学家的天才来说，我们决不是一个二等伙伴。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你始终坚持并最终作出制造氢弹的决定是正确的。

9月30日，俄国人恢复了他们的试验，摆出的理由是，他们试验的次数从他们3月份最后一次试验起，应与英美所进行的次数相等，所以他们有权继续试验。所有这些，包括10月27日在联合国的俄国代表团声明说俄国政府将拒绝任何停止核试验一年的建议在内，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忧虑，因为一切事情都决定于日内瓦的会谈。但是当我听到美国现在要采取的方针时，我是比较担心的。看来，美国代表团将受命不要满足于双方停止一年试验，即使第一年的停止试验是以不仅在监督措施方面而且在一般裁军措施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为条件的。我认为，英国舆论将会接受第一

个规定——即有效的监督体制，而把第二个要求看作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人在氢弹试验问题上突然惊人地改变了政策。8月份太软，10月份他们却太硬了。<sup>①</sup>

坚持第二个要求——即必须在裁减常规武器方面取得进展——看来不仅是失策，而且是不必要的。在10月31日召开的三国讨论停止核武器试验的会议上，这种看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在首次会议上，俄国代表就宣布他们拟好了一个条约草案，规定立即并永久停止核试验。如果英国和美国同意并且签署这样一个条约，那么就可以按照专家们建议的方针仔细拟订一个建立监督体制的计划。当然，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二者必须同时进行。 569

然而，谈判和讨论仍然在日内瓦继续进行，虽然由于讨论预防“突然袭击”的十国会议开幕，使谈判稍微受到了一些干扰。双方代表团之间的文件交换一直没有间断过，到年底当会议休会的时候，在提出的条约草案中一致通过了四条，但是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尚有待解决。关于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与废止核试验之间的联系问题，幸亏没有提出来。对第一个问题能否取得一致意见尚且有怀疑，就使得提出第二个问题更不足取了。关于侦察和监督，公众舆论显然有利于我们一边，因此让一些节外生枝的、附加的问题来扰乱是很愚蠢的。俄国人至少对此已经作出某些让步，因为当会议重新召开时，将要讨论监督的问题。因此，我在1959年1月1日给总统发了一封信，极力主张我们应当取消废止核试验与普遍裁军直接联系的条件。虽然我们知道，美国人认为普遍裁军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现在再坚持下去，我就觉得是错误的了。由于这个问题不但是一个真正重大的问题，而且我知道在国内还

---

<sup>①</sup> 1958年10月18日。



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我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详细表述了我的论点：

570

日内瓦会议在僵持四个星期之后出现了一点进展。会议现在能够讨论监督问题，并且坐下来起草条约了。但是不管俄国人说了什么，他们仍然在设法避免在他们的领土上设立有效的监督体制。他们机灵地自称为让步，使草案头四条取得了一致意见，就用这个来掩饰他们的立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适宜的监督组织，这些条文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俄国人现在的立场比较容易欺骗人，使全世界相信是，我们在坚持停止试验必须以真正裁军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为条件，因而阻碍了达成协议。

我们应当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我想答案是：我们现在应当不再与真正的裁军联系起来提，因为这种联系是一个空洞的公式，不可能精确地予以说明。这样做的话，我们会会有很多好处，而且在我看来，不会失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全世界将会看清楚，如果俄国人拒绝签署一项有监督地停止试验的协议，那就说明他们不愿意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接受一个真正的监督体制，尽管他们在前些时候的日内瓦专家会议上假惺惺地接受了建议。

另一方面，如果取消我们的条件，我们迫使俄国人不得不在有监督地停止试验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加实质性的收获。我们能在苏联建立适当的监督体制。我想我们所有的顾问都会承认这件事的重要性。这肯定会使俄国人今后难以拒绝对其他裁军形式的监督体制。实际上，这保留了我們已取消的条件中所包含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坚持这个条件而失去了取得有监督地停止试验的机会，核国家的数目可能会惊人地增加，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总之，我想，采用我主张的方针，我们会得到一切而万无一失。如果我们两国政府作出这个决定，我认为对于世界舆论，或许同样对于日内瓦谈判都会产生有利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宣布我们的决定。这最好等会议进行到我们有可能从俄国人得到相应让步的时候由我们在日内瓦的两国代表提出。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全世界表明，

为了达成协议我们正在作出多大的让步。

总统1月13日的复信实质上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他认为对我们立场的改变作任何过分的声张都是不明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

虽然根据最近的进展情况来看,我认为俄国人在目前的谈判中会接受一种有效的监督组织这个前景并不光明。我同意,如果我们取消作 571 为一个争执点的把裁军联系起来的问题,我们在公众面前的地位会好得多,因为俄国人可能利用把裁军联系起来的问题作为烟幕,来逃避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或借此逃避监督。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正当专家们在一种轻松的、可以说多少有些学究式的气氛中,在日内瓦继续进行他们的争论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唱出一个冷酷现实的调子。

11月10日,他公开要求盟国军队撤出西柏林。在这个声明发表前几天,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把最近阿登纳和戴高乐的会晤比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1934年的那次会见。11月20日,俄国驻波恩大使拜访了总理,无情地通知他俄国政府打算“结束柏林的占领状态”。第二天,我收到阿登纳的一封私人信,他在信里表示了深切的忧虑。显然,他同安德烈·斯米尔诺夫大使的谈话,使他大为震惊,他认为这次谈话是“表示苏联决心把柏林问题当作对自由世界政策的一次考验”。他接着提出了一个迫切的要求:

请允许我要求你考虑,你是否能运用英国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向莫斯科陈述你的看法,使苏联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决定的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你是否能努力阻止苏联实现这个目的。

他对值此日内瓦讨论还正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之际,苏联政府竟会采取这种粗暴行动的做法表示惊奇以后,提出了一个动人的呼吁以结束全信:

亲爱的麦克米伦先生,给你写这封信是出于事态的发展令人严重不安,其后果非我们所能逆料。我感到不仅对德国人民负有责任,我们 572

大家还对全世界各国人民负有责任。凡是有可能阻止苏联在最后一小时推下将导致一场灾难性雪崩的石块之事，我们都应当一件不漏地去做。

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俄国的正式照会，我觉得很难不答应总理的请求。因此，我在11月22日直接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信：

我给你发出这封私人信件，是想告诉你最近你关于柏林的声明对我引起的焦虑。我应当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这些声明很难同你以前许多愿意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表示相符。英国政府决心维护它在柏林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具有充分根据的。我相信你也知道，这也是我们盟国的立场。眼下日内瓦正在进行讨论，我仍然深切期望讨论核试验的政治性会议以及讨论预防突然袭击措施的技术性会议，将会取得良好的结果。我不能设想，在此改进我们关系的时刻，还有什么别的事比你的声明所预示的那种行动更能有意地加剧紧张局势了。因此我希望，在决定开始这种行动之前，你能认真地考虑我的话。

我也给美国和法国政府发出了信件，说明我所以没有正式同盟国商谈就行动，是为了赫鲁晓夫能在俄国采取任何正式行动之前就收到我的信。

终于在11月27日，有关各国政府都收到了苏联的正式照会。在照会里俄国政府提请三个西方国家注意，苏联认为关于柏林的现有安排在法律上全部无效。与此同时，它准备同这些政府在建立一个“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基础上谈判西柏林的问题。文件还宣布苏联政府“在六个月内无意改变从西柏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用交通运输的现有手续”。

573 每当两国之间或者两个国家集团之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之际，每个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大的或小的行动，都会由双方的专家们象用显微镜那样仔细予以观察和分析，试图找出最简单和最公开的声明后面所隐藏着的、要费一番周折才能看出的动机。在民族冲突的历史上情况一直是如此。但是，在这几年里，当界线不仅

仅是根据两组竞争者之间正常的地理、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来划分，而且还根据一种对于生活和政治组织的根本概念更为决定性的相反看法来划分的时候，这种活动就变得有点过分了。在自由世界的高级官员中，尤其是在华盛顿，出现了一批“克里姆林宫专家”，他们尽力从最细微末节的形迹中推断出最深奥的结论来。在俄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无疑也有那么一批人力图解剖那些可能会影响自由世界各国政府的奇怪和捉摸不定的动机。

最近的局势虽然严重，至少还给我们一些思索的时间。但是，所有这些新的威胁都和原有的困难交织在一起，而最近这一次威胁只不过是错综复杂、岌岌可危的局面中一个新的转折点。

收到俄国的照会以后，我在11月28日给外交大臣送去了一份备忘录：

**柏林问题**，事实上是为期六个月的最后通牒。我们将无法避免进行谈判。怎么去进行呢？是否一定会导致讨论统一德国的前途和讨论可能提出的“解除条约的计划”呢？

#### **试验和突然袭击**

日内瓦的这些谈判大约会无限期地拖下去。如果我们能取得美国人的同意根本放弃那种联系，那么从宣传的观点来看，我们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怀疑是否能较快地达成任何协议。

#### **欧洲自由贸易**

你无疑一定看了今天早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好文章。如果还没有，请你看一看。事情很清楚，德国已经真正全面倒向了法国。

我认为我们不能分开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个奇怪的瓜德利尔舞<sup>①</sup>中，大国之间的组合经常在变化。在第一轮中，有俄国和三个占领国家 574 得益最多，而德国则最感兴趣。第二轮法国出去了，德国也出去了。第三轮美国好像不感兴趣，德国和法国结成了一个非神圣同盟来反对英国。我们必须全盘地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是英国人民要做的事……

<sup>①</sup> 一种旧式的由四对舞伴组成的方块舞。——译者

至于俄国，赫鲁晓夫也许真的在准备一次没有中国参加的最高级会议。那样的话，由我带头建议开这样的会肯定不是一个坏的策略。

在这个时候，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伦敦证明是很有帮助的。虽然我从来不曾相信他对美国总统或国务卿能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塞尔温·劳埃德和我两个人仍不怕麻烦去听他的似乎明智和克制的看法。

12月4日举行的外交事务辩论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整个下院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对俄国的行动感到愤慨，虽然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赞成设法用谈判来找到某种解决的办法。

外交事务辩论进行得不错。外交大臣以他坚定、明确、简短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比万辞藻华丽，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到讲话末尾他重新提起武装德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工党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分歧。<sup>①</sup>

赫鲁晓夫由苏联驻伦敦大使正式递交我一封很长的私人复信。他证明他的行动是正当的，理由是一国政府有权对危险局势提出警告。

苏联政府建议结束柏林占领制度的最后残迹，其主要目的正如政府照会中已说明的，是要消除一种危险的，我应当坦率地说，一种极端危险的磨擦和紧张局势的根源，它使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并且在整个欧洲造成一种不正常的气氛。苏联政府对西柏林采取相应的步骤以及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是由于考虑到人为地和非法地维持占领制度的西柏林局势，在某种情况下可能给欧洲——或许不仅仅是欧洲的和平事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接着，他对我们在柏林的权利提出异议，而我们从来就主张这些权利并不来自波茨坦协定，而来自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赫鲁晓夫专门发表了一长段精明的议论来证明由于波茨坦协定的破裂，事实上已取消了这些权利。他接着就柏林对双方的军事价值

<sup>①</sup> 1958年12月4日。

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话：

如果谁现实主义地看待事物，就像政治家们不得不总是这样做的那样，那么他必须承认结束柏林四国分占状态，既不会使大不列颠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也不会使大不列颠的其他重要利益蒙受损失。如果今天还有谁对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持吹毛求疵态度，或者还谈柏林西部的军事和战略价值的话，这只能使那些多少懂得一旦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现代军事技术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概念和军事行动性质的人，付之一笑。我们想，首相先生，你大概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吧。

由此他推论说：

即令大不列颠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结束柏林四国分占状态以后必须放弃某些东西，所放弃的也只可能是西方国家在利用西柏林进行“冷战”和指挥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活动方面所享有的值得怀疑的好处。

接着是一个明确的声明，也可以说是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威胁：

为了使苏联关于柏林的建议完全明白无误，我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如果苏联政府照会所提到的六个月的期限没有用来达成一项合适的协议，那么自不待言，苏联将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协定的方法来实现它所提出的措施；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苏联放弃自己维持占领状态的责职。 576

在这长达六页的文件的最后两页中，赫鲁晓夫又恢复了他的甜言蜜语；如果说不是花言巧语的话：

与此有关的，我们不禁回想起我们同你，首相先生，以及你的前任安东尼·艾登爵士 1956 年春在伦敦的会晤，我们回想起那次坦率而有益地就苏联和大不列颠之间关系以及许多国际关系问题所作的意见交换。我们曾经期望苏联政府代表团对大不列颠的访问将对恢复我们两国的友谊打下良好的基础，将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停止“冷战”作出贡献。

然后他对英苏贸易的现状表示遗憾。而且，大不列颠几乎是

唯一的迄今为止与苏联尚无文化、科学或技术合作的重要国家。  
最后他宣布：

我们真诚地期望，所有明显影响英国政府对苏联态度的偏见将会让位于一种更为有利的友好态度，以解决在苏联和大不列颠之间建立互相谅解和合作这一问题。苏联政府相信，两国恢复友谊不仅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物质的利益，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而且还能对解决重要国际问题带来有利的影响，从而促进和平事业。

当我还在捉摸这封信的深奥含意的时候，苏联政府在12月13日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有国家就即将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送来一份有点奇怪的宣言。他们在使用现在熟知的措辞重申他们观点的同时，又一次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应当把这看作是宣传呢，还是一项严肃的建议呢？研究俄国心理学的专家们再一次发表了他们各式各样的、但是表述得极好的看法。

12月余下的时间都用于一个联盟进行内部协商所需的各种准备工作，把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一个联盟。这种迟延并不会影响一个磐石般的大国，如果它的盟国只是些卫星国，或者甚至是附庸国。虽然如此，这些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召开了外长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西欧议会会议，到12月31日，英、法、美政府的复信送达莫斯科。这些信件措辞相似，明白表示关于柏林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三个西方国家不但有权利留下，而且也对二百万西柏林人负有责任，必须留在市内。因而，他们希望苏联政府履行它的义务，特别是履行1949年6月20日的协定，提供从西德至柏林的畅行无阻的通道。同时，照会声明，西方政府准备在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的更广泛的谈判中，讨论柏林问题。

塞尔温·劳埃德在下院极好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想保卫我们在柏林的权利以及觉得苏联建议不能接受

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谋求同苏联讨论整个德国问题……我们准备同苏联从各方面来讨论这件事。<sup>①</sup>

这一年就以这个危险的但还说不上是灾难性的调子告终。

塞尔温·劳埃德在圣诞节假日里动了一次小手术。这就是说,我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以外,还必须同时掌管外交部。虽然塞浦路斯的谈判快到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我对谈判的成功并不是不抱希望的。因此,我主要担心的事情集中在俄国的宣言或者说它的最后通牒上面。我感到西方盟国必须坚持他们进入柏林的权利, 578 同时也必须避免使苏联除了屈服或战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的余地。而且以六个月为期的警告也很难说是最后通牒,如果按照一般意义去理解这个词的话。在法律或公道方面,我们无权阻止俄国象我们承认联邦共和国那样承认东德。一切事情以柏林为转移。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权利交给东德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地位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柏林“危机”正在临近,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政策。巴黎宣言只是用纸盖住了裂痕。我们真的准备在柏林问题上打一场战争吗?如果是真的话,我们怎样打手里的牌才能使俄国确信我们是当真的,并且准备举行一次严肃的会议呢。我确信(虽然美国人一直不大同意)我们不应当虚张声势。如果这样做,就会被俄国人看穿,使我们下不了台。

因此,我不能确定我们能否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人或者东德人是批准运货单呢,还是把火车票轧个洞,拿来当作开战理由书就此同我们宣战?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民用和军需供应能否运到柏林的问题。<sup>②</sup>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更危险的局势。如果在俄国人单方面地交出职权以后,公路或铁路通道被俄国人或者被德意志民主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12月4日。

<sup>②</sup> 1959年1月5日。



共和国切断,那么我们就得回到1948年封锁时期的处境。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或者需要恢复十年前顺利实行过的空运,或者采取从地面上强行通过的措施。

圣诞节前,我收到阿登纳一封很长的呼吁信。

579

德国人民和我本人深切感谢英国政府对苏联的要求所作毫不含糊的“不”字的回答。我相信,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公报也应当消除俄国人对三个西方国家在柏林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所抱的一切怀疑。如果苏联政府或者柏林人民能在公报里面觉察出任何态度软化的迹象,那么我认为这样一个错误可能严重危害世界和平。我们毕竟从经验中知道,每当苏联遇到有力的抵抗,他们无不退却,我深信柏林的情形也是如此。如果对柏林市自由负责的几个大国采取一种干脆和毫不含糊的态度,俄国人不会作出任何危害和平的事情。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从经验中还知道,当法律地位很明确的时候表现出最细微的态度软化,都会使苏联人得寸进尺。

他正确地指出了十年来形势方面一个重大而且多少有些不祥的变化:

西柏林现在的形势同1948年封锁时期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由于美国的帮助和联邦共和国不断的支援,这个城市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1948年柏林的公民还都差不多同样的贫穷,看不出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生活水平有什么差别,但是,今天柏林居民中有些阶层又有一些东西可以丧失了,他们一定害怕他们将失去以劳动换来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个人自由。

为此,他宣布:

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看到,空运已不能维持西柏林的生活水平大致不变。最后——而这是很重要的,在那次封锁期间没有一个人能离开柏林,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

阿登纳欣然同意到一定时候必须同苏联政府不仅就柏林问题,而且就整个德国问题进行谈判。在适当的时候,经过充分的准

备后,这种谈判是必要的。

但是我认为,在要求一定期限内解决问题的压力下来开始这种谈判,是不明智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起跑点可以想像得到是最糟不过的了。把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这种要求同全德问题混淆起来的任何做法,都会导致西方走向限制柏林自由、或是在全德问题上作某种变相的投降。因为,不可设想在六个月内能为德国问题即使是找出一个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基本提纲。 580

虽然如此,我认为俄国的战略是强迫我们或者承认东德政府,或者由于我们自己拒绝同他们打交道而象过去一样把我们自己封锁起来。

杜勒斯来了一封信说明同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的一次会谈,米高扬在会谈中似乎稍稍有点后退。在给杜勒斯的复信中,我说:

我仍然并不认为俄国打算在六个月完了的时候强行封锁。他们打算让我们在封锁我们自己或者同作为他们继承者或代理人的东德打交道之间作出选择。但是他们现在好像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的照会在西方世界看来好像威胁着立即要封锁一样。

我还认为,在制定各种可能的计划以对付俄国同东德单独缔结条约以后可能产生的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根据现实,而不是根据形式。我向杜勒斯指出,俄国人已经恫吓说,如果我们进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就要支持它。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俄国人一定会注意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行使他们所有的职权,包括俄国人可能声称移交的那些职权在内。

正当我国大使哈罗德·卡奇亚——他似乎得到国务卿的完全信任——干练地协助华盛顿与伦敦之间友好地交换着意见的时候,我国驻波恩大使回伦敦了。

基特·斯蒂尔……来谈了一次话……阿登纳总理情况很不好,正在很快地衰老下去。他们其余的人(勃兰塔诺以及其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或者不愿意去寻找任何新的办法。在一个时候,阿登纳强烈地亲 581

法,亲戴高乐;但是在另一个时候,他又非常的吹毛求疵。看来,他仍然很喜欢我!

关于柏林问题等等,他(以官方身份)赞成绝对的强硬态度和一条牢固的反对苏俄的战线。暗中他却悲哀绝望地说俄国与西方象两列特别快车,正各自向着迎面猛撞的方向驶去。<sup>①</sup>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在1月10日采取了一个新的行动。他们在致三个西方国家的一个照会中建议召开一个包括讨论柏林问题的和平会议。在这个照会里,没有提到时间的限制。这似乎证实了米高扬在美国时的暗示。由此看来,苏联好象毕竟还开着谈判的大门。但是,这个照会再一次坚持:

谁也不能阻碍苏联政府放弃它为了柏林、为了柏林同西德之间的交通而担负的职能,同时谁也不能阻碍苏联政府通过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协定,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sup>②</sup>

与这个照会一起,苏联政府还送来了一个和约草案。这实际上是主张德国按现存的两个国家宣告正式分裂。这样就使所有的盟国不用等到成立一个全德政府,就可与这两个德国签订条约。盟国应当尽力在两个德国之间促成协议,而两个德国则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来达到统一。在重新统一以前,这两个德国必须放弃他们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军队只许用来维持秩序和地方自卫。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是具有某种吸引力,但是由于外国军队均需从两个德国撤出,又缺少任何真正的裁军或安全制度,因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将获得巨大的军事利益。他们一声令下,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开进大批军队。而且,582 如果西德一旦解除武装和中立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差不多将削弱到零。

---

① 1959年1月16日。

② <1959年年鉴>第136页。

俄国的照会构思得很巧妙,无疑需要谨慎地、如果可能的话给予正面的答复。这样一封复信,要在词句上取得一致意见,肯定是一桩要化几个星期才能办好的事。复信确是到2月16日才发出的。这一次,复信是简短和积极的。在说明苏联建议不能接受的同时,盟国的照会呼吁召开有德国顾问出席的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的每个方面和每种关系。

在这期间,我开始仔细考虑对付局势的方法,当时的局势是很可能月复一月地随着各种外交照会和新方针的交换而拖下去,直到最后发生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决定给华盛顿发电报,说明我的焦虑和想作出某些进展的愿望。首先,我想去华盛顿同杜勒斯和总统举行会谈。最近两年来这种方式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鉴于法国的妒忌和德国的猜疑,这样做可能太危险。因此看来我最好还得订一个比较复杂的计划。

长时间来一直有一个去莫斯科的邀请未予实现。当然邀请也许不再有效了,但是试试看还是值得的。若是那样的话,我将(和外交大臣一起)去莫斯科,然后到波恩和巴黎,最后到华盛顿。<sup>①</sup>

1月20日,在外交部充分讨论以后,起草和一致通过了给杜勒斯的一封必要的电报。

卡奇亚将于明日去见杜勒斯,我们应于星期四上午收到复信。一些人认为美国人会强烈表示愤懑;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将会默许。<sup>②</sup>

现在下院已经复会,议会关于柏林和俄国的质询源源不断而来。盖茨克尔和比万两人当然对我施加了很大压力,他们显然已转而相信“解除条约”和德国中立化的主张。鉴于议会临近结束,工党政府有可能上台,我尽力打击他们的信心,因为我担心任何软

583

---

① 1959年1月18日。

② 1959年1月20日。

弱只能助长俄国的顽固做法。

这时华盛顿来了复信。总统和杜勒斯自然地指出，在西方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以前，我到莫斯科去是要冒某些风险的，但是他们还是抱同情的态度，而且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美国复信来了，写得非常友好。他们说，事实上他们对我完全信任，我想怎样做最好，就可以怎样做。<sup>①</sup>

同日，我和外交大臣、财政大臣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大臣开了一个会，会上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外交大臣当然是从头到底参与我的机密的。在这次会议和取得了阁僚们的同意以后，赶紧打电报给帕特里克·赖利，问他如果我提起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1956年访问时所发的邀请，我的建议是否会受到欢迎。如果遭到拒绝，肯定会使人狼狈的。大使在复信中表示，他有责任指出，有这种危险。俄国人肯定会从他们认为英国舆论正处在选举前夕这个背景上来看待这次访问，并且肯定会力图从中捞取他们所能捞到的一切好处。他表示，我和美国总统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他怀疑俄国人想在华盛顿和伦敦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希望能否成功。他们比较可能的做法是试图利用机会孤立阿登纳和西德政府，把他们说成是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障碍。因此，他认为不仅美国人，而且法国人，尤其是德国人都应当公开赞成这次访问。还有，去波恩、巴黎和华盛顿的访问，也应与去莫斯科的访问同时宣布。他接着说，试图捞取一张请柬的做法是不行的，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在后来的一封信里，赖利表示他希望这次访问不要匆忙从事。这次访问的性质应当同俄国政治家访问英国的那次一样。虽然这应当主要是一次国事访问，但是还要为我和我的随行人员提供机会看看其他几个俄国城市，看看俄国农村和人民的一些情况。

<sup>①</sup> 1959年1月22日。

接到了这个意见以后,我又经过许久的思考,同外交大臣和其他几位主要阁僚进行了讨论,我决定去冒这个风险。于是,给大使发出了指令。赖利在1月24日拜访了安德烈·葛罗米柯,提出我去访问一周或十天的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将于2月20日左右启程。有几天不见答复。1月29日大使给我一封信,他说这个建议也许使苏联政府大吃一惊,而且可能打乱了他们自己的计划。他想不大可能一口拒绝,但是他们可能正在考虑这次访问对他们是否有好处。他问我是否要他去催问一下。对此我马上回答说:“不必,一切听其自然,我们一定不要显得太着急才好。”

但是,到1月31日,我开始焦虑起来了:

杜勒斯将于星期二来,星期三中午走。我们应当作好准备,这将是一次很重要的讨论。我们可以诈骗俄国人——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诈骗我们自己。

法国总理(米歇尔·德勃雷)3月初来。我同意给赖利(在莫斯科)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对那些尚未答复我建议的俄国人(无疑正忙于他们的代表大会和接待所有的来宾)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不应当跟在他们后面跑,但是我们也决不让他们长期拖延而侮辱我们。①

2月2日,复信来了。

午饭以后,我听说俄国外交官拜访了外交部并送来了俄国的复信。我的一切顾虑都消除了。他们同意了访问的日期、访问的时间以及公报585的措辞。公报将于星期四下午三时半发表。这使我大大地松了口气,因为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几乎把脖子都伸出去了。如果他们一口拒绝(这是可能泄漏出去的)的话,会使我们威信扫地,狼狈不堪。②

现在,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起来。美国人真正会有些什么想法呢?法国人会说什么或者做些什么呢?阿登纳会怎么反应呢?访问最后会成功吗?访问能够至少有助于开

---

① 1959年1月31日。

② 1959年2月2日。

个头并导致逐步缓和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吗？首先，它将有助于解决由赫鲁晓夫最后通牒所引起的迫切问题吗？或者这次访问会证明是灾难性的吗？这确实是一件危险的工作。我应当避免谈判柏林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因为我无权替我的盟国说话，他们也没有一个一致的计划。这次访问可能真正是一次大探险；它也可能是一次很有趣的事。但是在我能出发以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立即给阿登纳、德勃雷（现在是法国总理）和大英联邦各国总理写了信。我在2月2日给阿登纳（我知道他可能悲哀地甚至惊讶地看待我这个决定）的信中提到，直到现在我并不认为重新提起对安东尼·艾登发出为时已久的邀请是切合时宜的。但是现在我看，在莫斯科进行个人接触可能会有好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些他们真正的意图，那肯定会有帮助，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一无所知。

因此我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去摸一摸苏联领导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将表明我并不是来谈判的。我不会想单独谈判，诚然我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在西方盟国能够决定他们在任何会议上对俄国人采取的方针以前，还得过一些时间。如果我能在多少看透他们的动机方面带回一点有用的东西，事实上这可能对我们大家在决定方针时有某些帮助。

586 我还感到，我的访问在对待西方舆论方面可能会有助于达到一个有用的目的。一个坚定的政策需要得到充分的和衷心的支持。

如果要使我们的舆论态度坚决，（它当然也一定能够这样，）而且，如果要舆论接受军事准备的措施——这种措施说不定我们很快就得着手去采取，而且我们也不可能隐瞒——那么我们就必须表明我们是乐意同俄国人谈判的，而且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合理的。联合王国的人民随时准备作出牺牲和承担风险，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这是必要的话。但是，除非他们确信他们的领导人已经作了一切努力去达成谅解和协议，

否则他们是不愿意被置于这种境地的。

我又说，我的访问带有探索的性质。我希望在我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能尽快地同他讨论访问的结果。我也提出了访问巴黎和华盛顿的打算。

由于外交大臣正在巴黎，他能够同顾夫·德姆维尔作一次个人谈话，并把我的信件直接转交德勃雷。他给了我一封不置可否、然而却友好的复信。我写信给德勃雷请他通知戴高乐，是由于我的新计划需要推迟德勃雷访问伦敦的日期。2月3日，我国驻巴黎大使格拉德温·杰布报告说，法国非常平静地对待这件事，而顾夫·德姆维尔的唯一评论是，如果我的访问能够劝说俄国人收回他们的最后通牒，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大英联邦各国总理都送来了赞成和鼓励的信件。

波恩来的消息并不太令人满意。西德总理开头倾向于把我这次访问看作纯粹是一种赢得选举的策略。当大使愤慨地予以否认以后，他说这是他能从访问中看出的唯一有用的一点。据大使描述，这次会见是很不愉快的，但在会见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出阿登纳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国采取什么路线的影响，尤其是受美国反应的影响。然而在他给我的复信中，阿登纳只强调了不能正式承认东德这一点的重要性。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他保持着毕生最强烈和最不可动摇的观点。 587

2月4日杜勒斯抵达伦敦。他在下午九时来到唐宁街，他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我有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果然，十天以后在华盛顿宣布，他动了一次氩气手术，发现癌症复发。虽然他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决心不放弃他的高职位，但是看到这个一度很结实的身子被这样一种可怕的疾病摧垮，真是一桩悲惨的事情。

他不能在外面用餐。他必须吃些奇怪的食物然后歇着消化它们。



但是珍妮特来参加多罗西在唐宁街十号为夫人们举行的晚宴。外交大臣和我一起吃了三明治,在十号等着他到来。①

会议开始前,我单独和杜勒斯谈了几句话。杜勒斯由利维·麦钱特(副国务卿)和美国大使约克·惠特尼陪同,我则由霍耶·米勒、朗博尔德和毕晓普陪同。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以后,我们很快谈到了柏林。

这时,福斯特自言自语地谈了谈他的想法。他的谈话给人的印象是他完全放弃了五角大楼的计划,放弃了由大量坦克护送一个师或更多的部队和炮兵突破和占领公路和铁路沿线区域的主张。他提出了一个谨慎得多和不那么壮观的“探测”办法,打算随后在联合国施加政治压力或使用其他的办法。②

虽然国务卿已经在我们简短的预备性谈话中告诉了我这个意见,但我非常担心

他当着他的美国同僚们的面再次向我陈述这个看法。因为他必须在波恩根据同样的方针说话。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放弃我们在柏林的地位或者不再采取“强硬”的观点。但是,这意味着在我们必须对俄国人表现出有一条坚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不能欺骗我们自己。首先,我们不应再滑到1914年的处境——由动员不知不觉地陷入战争。我认为对情况的这种解释是很高明的。福斯特·杜勒斯知道,这种见解是同墨菲和五角大楼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说的话恰恰相反的,他们几乎骂我们软弱和失败主义——也许还骂我们是卖国贼,就因为我们没有不加思索地轻信他们的军事计划。我猜想是总统压倒的那班军人。确实,在我们单独一起的时候,杜勒斯几乎等于告诉了我这样的事。③

柏林问题自然而然引起了范围更广泛的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

我说出了不同的几种意见——实际上是试试美国人。我们可以建议不分国别地“逐渐减少驻军”。我们也可以作更加大胆的设想——俄

---

①②③ 1959年2月4日。

国军队撤离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代价是……。

使我惊奇的是福斯特·杜勒斯并没有意外地吃惊。他好象准备讨论新的意见。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因而必须协调政府和参议院的不同观点。<sup>①</sup>

次日中午，杜勒斯和其他美国人又来了。在选择我们计划的时机方面，我们很快取得了协议，虽然我们在外长会议举行时将说些什么还没有任何精确的草案。使我吃惊的是主要工作完了以后，杜勒斯开始比较笼统地谈到一些事情。他谈了一件使人感兴趣的事。

他用一种插曲的方式谈起，但是仍然非常明确——“不能排除在5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总统要来参加。”福斯特·杜勒斯认为同俄国人开的会议肯定要化四个至五个星期。我想他的意见是，如果可以取得进展，那么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星期来作为首脑会议。看来他也喜欢我的意见，即开一个多少是持续的和永久性的会议——长期休会，又复会讨论新的工作。部长们可以随时出席，官员们(大使等)在各种委员会内工作，然后向部长们报告。这样一种会议，或者叫代表大会，本身就能“缓和紧张局势”。<sup>②</sup>

当杜勒斯离开以后，我觉得很难过。尽管我们跟这个怪人发生过种种麻烦和困难，我对他还是逐渐产生了感情和尊敬。在他去世前我又见过他一次，但是我感到他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了。

同一天下午，在下院质询以后，我发表了一次讲话。我先提到1956年苏联给艾登发来的邀请，然后接着说：

最近国际事态的发展使我感到现在这个时候进行访问将是有价值的。因而几天以前女王陛下驻莫斯科大使按照我的指令向苏联政府提出建议，我将在2月21日去苏联作一次为期一周或十天的访问，由我的尊敬的和学识渊博的朋友外交大臣阁下陪同。我很高兴告诉下院，2月

① 1959年2月4日。

② 1959年2月5日。

2日,就是上星期一,苏联驻伦敦的代办通知我们,他的政府欢迎这个建议。我们已通知了我们的朋友和盟国。

当然,我们正在同我们的盟国密切商谈如何最妥当地处理我们目前在欧洲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都是一致行动的。我尊敬的和学识渊博的朋友和我并不是代表西方去莫斯科进行谈判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与苏联领导人的对话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观点,也使我们比较容易地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这样,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才能更好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个人接触本身并不解决国际问题,但有时也可能对解决国际问题作出贡献。

当然,这次访问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我们希望讨论许多问题,诸如贸易、情报和文化关系等等。我还盼望去看看苏联和苏联人民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主要的目的将是试图消除误会,以及为更好的谅解打下某些基础。

590

今日下午伦敦和莫斯科同时发表了协商一致的公报,宣布即将进行访问。<sup>①</sup>

补充发言很短。虽然已经走漏了一些消息,但是下院好象颇为惊异。

我想,盖茨克尔和他的一派有点迷惑了。对于我们的首创精神,他们不知道是赞扬好,还是斥责好。<sup>②</sup>

最后一个问题是科特布利吉和埃厄德里的工党议员琼·曼夫人提出来的。她说:

作为一个后座议员,我能谢谢首相、祝他一路顺风、并且问问他大选的日期吗?

首相:夫人阁下,你的头两件事当然可以,但是第三件不可以。<sup>③</sup>

那天晚上,法国大使让·肖韦尔来访。

他带来法国总理一封友好的信。看来我最好在3月10日去巴黎。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9年2月5日。

② 1959年2月5日。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9年2月5日。

这样可以有机会看到戴高乐总统，而且戴高乐好像也会欢迎这样做。<sup>①</sup>

第二天，2月6日：

报刊对我要访问俄国的反应是良好的。左翼报刊想掩盖它的懊恼——可是做到这一点还不太容易。报刊对我在议会和在接待厅里所作的提示领会得很好。“一次侦察而不是一次谈判”。这样避免引起希望后又变为失望的危险。<sup>②</sup>

不幸，后来我听说我用的“侦察”一字在译成俄文之后，含有暗示间谍活动的不良意义。后来，帕特里克·赖利很快地在自己的声明中用了“一次探索的航行”这样的字眼。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引起任何敏感。虽然以后的几天几乎都花在塞浦路斯谈判的结束阶段上面，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文件要准备，有大量个人档案材料要准备和熟记。安全是许多麻烦问题中的一个。在现在这种时候，取得“情报”的方法是如此发达，因此即使在我们自己的 591 大使馆里，也需要采取最高度的保卫措施。当我到了莫斯科时，我就得体验在这种奇特环境下生活的全部含义。

在我们开始旅行前的几天里，英国的和美国的报刊，其实是全世界的报刊，都对我们这次艰巨的创举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无论哪个西方国家都没有一个执政的首相或政府首脑自战争结束以来访问过苏联。尽管有某些疑虑，普遍是赞成的。不过，特别在我们的盟国中间，显然有些心神不安，怕我会走过了头，去做本来没有想做的事情。虽然如此，由于冷战的紧张感和核弹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所以任何突破猜疑云团的尝试都普遍受到欢迎。

闲话栏的作家对于我们这些人将穿些什么衣服前往很感兴趣。很幸运，我仍然能够借到我岳父的那件皮大衣，在1940年的芬兰冬季战争中我曾经穿过它。我还炫耀地戴了一顶那时候买的白

① 1959年2月5日。

② 1959年2月6日。

帽子。① 我不知道这是芬兰特有的一种头饰，现在拿出来或许不是最得体的。但是后来当有人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俄国人无疑有着一部很完备的关于我个人的档案材料，包括这顶帽子的插曲在内。

陪同我访问的有我的两个私人秘书，弗雷迪·毕晓普和菲利普·德·朱鲁塔，以及我在议会的私人秘书托尼·巴伯。内阁秘书诺曼·布鲁克以及我们无人可比的公共关系官员哈罗德·埃文斯，也和我同去。塞尔温·劳埃德作为外交大臣也有类似的一些随行人员，除了两个私人秘书以外，还有帕特里克·迪安爵士，F. R. H. 默里（一位研究俄国问题的出色学者），康·欧念儒，安东尼·朗博尔德和包括贸易部在内的其他各部的代表。我们在2月21日从伦敦机场启程，3月3日晚上回国。

592 在出发之前，我的妻子和我收到了一大堆祝贺的信件，其中许多来自不认识的朋友们。最近我在重温给她的一些信件时，发现有一封信很有趣也很感人。

请你不要让我们的首相在俄国到外面去猎熊，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他遇到了意外事故——叫我们在英国和美国怎么办。

我接受了这位夫人的劝告。有一次当赫鲁晓夫先生邀请一些人去猎熊或猎麋鹿的时候，我推辞了。这主要是因为我考虑到国内可能把这样一次远征看成是我以不太庄重的方式消磨时间。但是，这并不妨碍赫鲁晓夫在几个星期以后送我一个制成标本的长着漂亮双角的大鹿头，它差不多压倒家里狩猎室中的一切。

在出国以前，我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封信，表示希望日内瓦讨论核试验的会议仍能最后达成协议。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监督和控制。

完全的监督，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实际上则是完

---

① 见本书第二卷《战争风暴》，原书第29页。

全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监督体制，使得一个可能的违犯者必须冒一定程度的风险，就是说他不能违反协议而又不被侦查出来，那么我们就足以证明我们承担所包含的种种不利和风险是有理由的了。

我想去莫斯科证实我一个早已就有的印象，即俄国人仍然愿意缔结协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除了担心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还担心花在核计划上的费用日益增长。当然，应当反对他们在实行监督体制的关键性问题上，特别是在关于派遣监察小组方面行使否决权的要求。但是我希望，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作出让步。无论如何，我答应在否决权问题上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

我们在当地时间下午3时到达莫斯科，受到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苏联政府其他成员的欢迎。有照例的仪仗队，也照例发表了演说。赫鲁晓夫确实弹起了友好的调子，包括这种使人产生好感的说法：

苏联是一个和平的国家。苏联人民正在为实现建设共产主义新生活 593  
的伟大纲领而奋斗。他们再也不要再有战争来打断他们和平的创造性劳动，他们对此极为关切。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是以努力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为基础的。我们必将继续遵循这个方针。

我们很高兴欢迎外国来的贵宾。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以及世界的和平事业，我们准备与他们举行有益的会谈。

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将殷勤和友好地接待他们。先生们，欢迎你们！

在我的答词中，我指出这是和平时期一个英国首相对苏联的首次访问，然后我继续说：

我的访问有三个目的。首先，外交大臣和我想答谢总理先生你在1956年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世事的变化使我们未能及早进行回访。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来接受你们

的款待。

其次，我们希望看看苏联人民、苏联工业和苏联农业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不是我的第一次访问；差不多在三十年以前，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光者曾经到过这里。我十分愿意看见苏联今天情况不同于那时，几乎与英国今日不同于狄更斯所描绘的当时情景一样。我们英国人为你们生产的巨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感到高兴，而我渴望亲自来看看这些。为此，我们特别感谢在安排我们访问方面所表现的关怀。我很高兴将看到列宁格勒这个英雄城市以及在重建基辅方面所进行的巨大工作。

594

第三，我们很愿意我们的访问有助于苏联更广泛地了解英国今日的生活状况以及我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为了达到最后这个目的，我们希望同你，总理先生，以及苏联政府的其他成员举行几次严肃的讨论。我并不是来就某个特定题目进行谈判的，但我真心希望在我们一起举行的会谈中，我们至少会对我们双方的观点取得更好的了解。也许，我们的访问在这方面可能有助于减轻某些目前使全世界不安心的忧虑。至少这是我的目的。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一起达到这个目的。

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正式拜访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充满历史回忆以及神秘、阴暗往事的克里姆林宫。在这以后，我们出席了在那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皇宫的一个华丽大厅中举行的盛大晚宴。用过通常的俄国晚餐以后（对我们英国人口味来说，晚餐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先上的那些菜和同时喝的一杯一杯伏特加酒），赫鲁晓夫站起来发表了一个显然没有准备、当然没有讲稿的演说。他说到从我上次访问俄国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事件，当时我们是反对共同敌人的两个盟国，然后他继续说下去：

不幸，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战后紧张起来了。现在不是去争论这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凑在一起讨论和决定应当做些什么事来融解这结成“冷战”的冰块。

580

如果我们成功了，改善整个国际气候的许多障碍，解决重要国际问题的许多障碍，都将消失。这些障碍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争端。

各国人民盼望政府作出新的努力，克服不让男子和妇女致力于和平劳动而不用害怕战争的各种障碍。

在我们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了。不用说，人类已经进入它历史上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时期。解决这个问题，毫无例外地对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

他继续愉快地回忆三年前他对英国的访问：

不能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几年来一直未受损害，其间有过一些 595  
云片，甚至密布过暴风雨前夕的乌云。在我们的关系中还有过某些霜冻时期，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寒冷气候。现在，很多人谈到“解冻”，这象征着较为活泼的接触和谈判的愿望。我们把你的访问看作是这个“解冻”的结果，而今天——你到达的日子——大自然真正在解冻。

他接着说，苏联政府一向赞成政治家之间举行会议和接触：这是他们现在的立场。为此，他欢迎我们的访问。

我们也欢迎你们到我国来观光的愿望。说得温和一些，许多西方人用一种不客观的方式描写苏联。我们很高兴给你和你的同僚广泛的机会去看看我们的国家和见见我国的人民。正如谚语所说：“百闻不如一见”。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赫鲁晓夫喜欢用谚语。当我后来比较了解他的时候，我感到其中一些准是他自己临时瞎编的。在我的答词中，我先感谢他的殷勤招待，并提到俄国的巨大变化和上一代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然后我冒昧地试图消除俄国人的另一个错觉。我在机场时提到了狄更斯，是想对俄国普遍存在的认为《奥利佛·特维斯特》一书中所描绘的情况在我国至今未变的这种错觉，提出异议。现在我想坦率地说一说对“帝国主义”一词的误用。



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也看到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它不再是目前的一个现实。我们继承了一个我们父辈建立起来的帝国，但是由于他们管理的方法，我们至今能够把帝国变成一个联邦。当然英国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地图上红的东西全是美丽的（这是俄国人的一种双关语，红的和美丽的基本上是同义词），但从不列颠帝国最初建成起，流行的概念是托管。十九世纪相当早的时候，伟大的不列颠改革家和历史学家麦考莱就着手奠定印度教育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培养了一批人，使我们能及时把权力移交给他们。托管这个概念现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相信对联邦的概念是普遍感兴趣的。诚然，在1957年10月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宣言中，我看到你们自己也用了我们“联邦”这个词的俄文译语。所以，希望你们原谅我，今晚谈了一些关于这个概念的话。

把联邦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宪法关系，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似乎是很脆弱的。确实，正式的关系是很微弱的。但是，总理先生，我们英国人是讲究实际的民族。我们相信，一群朋友能彼此团结一致，只要他们愿意，并不需要正式的协定，而再多的条约也不能维系一个联盟，如果盟友们的心里没有它的话。英联邦薄弱的正式关系正象征着一种真实的集体感。联邦的各个国家彼此友爱合作，因为他们对个人的权利有共同的信仰，对法治有共同的信仰。这表现在对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各持己见的自由的信仰上。英联邦的成员国是很不相同的，它们肤色不同，宗教不同，历史不同，地理位置不同。但是，他们维护他们的结合，因为他们知道在英联邦里各个国家基本上信仰相同的理想，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国家的现象。英联邦组织发展得相当快，它现在正在迅速壮大。大战以来，已有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马来亚和加纳自愿加入这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家庭。它的大门仍然敞开着，我们希望最近几年里能欢迎新的成员，其中第一个可能是尼日利亚，它即将于1961年获得独立。西印度联邦和其他地区也不会落在后面很久的。

我接着又说：

正如你认为沙皇政府将莫斯科公国扩大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方法带

来了良好的后果，我们认为我们的附属国也无须为它们同英国联系而感到遗憾。597 这些附属国还不能在现代世界上自立，我们的政策就是去帮助他们自立。主要的事实是：我们决心履行我们在取得这些附属国的统治权的同时所承担的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义务。只要这些地方的居民为行使独立权利作好了准备，我们就逐步允许他们一一独立。过早地允许独立，只能助长无政府状态。

结尾我提到了裁军：

在这叫做冷战的紧张局势中，两个集团用愈来愈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互相对抗着。冷战局势存在至今已有十年以上时间，其间只有断断续续和短暂的解冻。我全心全意盼望这种竞争能够停止。这并不是我们害怕蓄意的侵略行动，我想你们也并不害怕。在当今的情况下，大国间的这种侵略至少是一种自杀性的蠢事。同时，我们也决不可能闭目无视由于估计错误和混乱而引起战争的危险。出现这种战争，那才真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的任务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奠定某种信任或缔结条约的基础，或者用其他某种办法来减小危险的程度。

全世界的报刊，包括俄国的报刊，都相当详细地报道了所有这些演说。普遍的看法是冷战已经明显地解冻。莫斯科来了许多外国记者。俄国报刊显然是得到上级指示，鼓励这样一种看法：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应当成为建立友好关系的障碍；这种话现在可以自由地说了。甚至我决定不去打麋鹿，也被用来说明要集中精力于严肃的讨论上。

直到次日，2月22日星期日，才开始干正事。在克里姆林宫晚宴以后，我们驱车到塞苗诺夫斯科耶苏联政府的别墅去，在那里过的夜。星期日早上，一部分时间花在各种文娱活动上，例如坐三驾598 马车，射击白粘土制的鸽子和坐在柳条编的大篮子里滑下山去。人们告诉我说，看到赫鲁晓夫和我紧紧挤在一个圆的篮子里滑下山来，篮子还不时地旋转着这情景，有的人感到高兴，有的人则感

到惊讶。在专家们看来,这标志着高度的亲密。赫鲁晓夫太太、葛罗米柯太太以及赖利夫人都出席了午宴,随后举行了音乐会。

上午和午餐以后都有机会进行真正的讨论,几乎所有这些时间都被赫鲁晓夫用来谈论东德和柏林问题了。他极为认真地把所有的论点重新说了一遍,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如此,他能这样坦率地说话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很清楚,俄国政府决心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他争辩说,他赞成把西柏林建成一个自由城市。我回答说,在我看来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德国可以统一起来,以柏林作为首都。第二,如果德国的分裂一定要包括柏林,为什么不能东柏林归东德,西柏林归西德呢?第三,作为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可以考虑使整个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只单独建议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是根据什么逻辑呢?在德国重新统一以前,以上三个办法都必然是暂时性的,但所有这几个办法在我看来,至少同苏联政府提出的同样合理。关于我们在西柏林的权利是从德国投降而来的这个观点,赫鲁晓夫在答辩时认为同东德缔结和约将取消这些权利。他问,西方国家为什么坚持延长战争状态?这次讨论平心静气,没有动感情,至少在这方面是有益的,并且全部记录使我们得到了一幅赫鲁晓夫脑子里想些什么的全景。

所有这些是在上午第一次会议上发生的。晚上,会谈全部时间都谈裁军,而且实在是谈得非常详细,谈得很久。我看很有希望。根据我保存的记录,会谈最后交换意见的情况如下:

599

外交大臣说,裁军应当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过程。

赫鲁晓夫先生说,是的,我们应当努力达成协议。

外交大臣提出,计划首先应当是结束试验,然后是控制用来制造武器的可裂变物质,这样才会产生信心。

赫鲁晓夫先生说,他喜欢这种态度。

外交大臣说,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可以在一定地区里,有控制地限制

所有军备。

赫鲁晓夫先生说，苏联准备在这方面作出相当的贡献。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应尽量解除武装力量。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得越远，解除武装的地区越大，哪个地区的检查越彻底，就越好。

首相说，需要研究检查的技术，或者说艺术。如果我们小规模地开个头，我们就会逐步学会怎样做。然后，就能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赫鲁晓夫先生说，他想如果首相和他能够把他们自己锁在一间屋子里来设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肯定会取得成果。

然后又谈了谈关于可能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的事。

在这个奇怪而又令人愉快的星期天，排满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从严肃的虽然非正式的讨论直到各种为我们安排的文娱活动。在这以后，2月23日星期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议。我们在一间狭长的房间里会谈，这房间显然位于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正中。赫鲁晓夫坐在桌子顶端（这张桌子和其他家俱一样，是很朴素的抛光木器），我坐在他的右侧，我的同僚们依次靠着我坐。葛罗米柯、米高扬和其他人坐在他的左侧。会谈涉及的问题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气氛不如昨天那么轻松。由于上一天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德国问题，赫鲁晓夫一开始就说他只想补充一点。苏联政府已将和约草案送发联合王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这个草案是根据波茨坦协定拟就的。但是，或许草案的某些条款 600 还可以通过谈判予以修改。例如草案提出德国的两个部分应当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或许可以找到另外的解决办法；在苏联这一方面也将不反对在一个时期内西德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东德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在这个开场白以后，塞尔温·劳埃德建议我们应该把已经说过的话记录下来，转而讨论裁军问题。随后进行了长久的、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结论但决非令人沮丧的讨论。在详细回顾近些年来裁军历史的过程中，赫鲁晓

夫声言苏联是第一个生产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他还说唯一明智的做法是接受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但至少在校军政策方面达成共同的协议。为此，他想最好举行一次政府首脑会议来拟定原则，给外长们下指示，然后“把他们锁起来，给他们有限的面包和水，叫他们达成协议”。我答复说，我对赫鲁晓夫讲的话感到很大的兴趣，尤其是最后那个建议。葛罗米柯说，这就剩下一个实际问题没有解决了——给多少面包和水？赫鲁晓夫立即宣称他和我可以毫不困难地解决这件事。在我的答复中有一段比较严肃的话，我说，我们都见过两次战争，如果第一次战争几乎可说是由于犯错误而发生的，那么第二次就是由坏人阴谋策划制造的。我们都同意必须采取措施来避免第三次悲剧。直到如今，有两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联合国里长久而费力地唇枪舌剑并没有带来很多进展。现在提出了举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的建议。但是，尽管我出于本性对总理或首相们极端尊重，而且赫鲁晓夫和我两人同属于这个行业，我也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在五六天的会议里处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用另外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呢？科学家们已经在日内瓦进行工作。我们能不能就停止试验问题迅速取得协议，同时在检查问题上找出一些合理的折衷办法呢？诚然，这不可能导致裁军，但这将是一个开端。然后，我们能不能推动科学家们从监督核试验进一步研究在欧洲一些地区——不管

601 大的或小的——建立一种限制、检查和控制常规或非常规武器的体制呢？赫鲁晓夫并不十分同意，因为他认为科学家往往和政治家一样有偏见。的确，在日内瓦讨论突然袭击的会议上，一个西方的代表已开始询问苏联导弹的技术细节。随后的讨论进行得多少有点散漫，我从中有点怀疑赫鲁晓夫试图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虽然如此，会议在很友好的调子中结束了，而且使我们在分手之前，的确能够在贸易和所谓“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一些

相当实际的会谈。

我们单独在大使馆进午餐，因而我能发出几份电报给伦敦的同僚和我们的主要盟友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阿登纳。我认为，把我的初步印象告诉他们明智的。同时我接到总统一封并不完全令人泄气的回信。原来我曾建议，如果能在核试验方面达成协议，则监督问题可折衷解决。在紧迫的德国问题上，我必须向我所有的朋友报告，赫鲁晓夫并不喜欢我们在2月16日照会中提出的召开外长会议的建议。在他看来，我们力图把苏联政府拉进一个没完没了的谈判，因为我们把那些显然能及早解决的问题同其他那些比较遥远的问题混淆起来了。我把总的印象相当详细地告诉了总统，内容如下：

由于赫鲁晓夫昨天一整天在乡间和我谈话的情况，我脑子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虽然俄国人拥有巨大的新势力和新财富，他们仍然被一种不安全感所困扰。旧时萦绕于心的被包围感，现在还没有消除。像一个突然发了财的穷人一样，他们感到在新的处境下很不自在，他们对邻居抱恨在心，神经过敏。每当赫鲁晓夫提到德国人，就使人感到他对他们的憎恨和不信任。

我相信这种忧虑的心情和他们对西方政策的误解一样真实。赫鲁 602  
晓夫说到西方过去所犯的错误的以及西方蓄意引起对俄国的恶意的时  
候，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他说我们对斯大林死后的局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我们指望他们国内的困难能使我们榨取他们的让步。我们甚至想俄国  
会出现“自由主义”。我们企图强加于人，遵循遏制、倒退和解放的口号  
行事。从苏联是榨取不出这种让步的。他并不指责我们真正想要战争，  
但是说我们制造了一种战争气氛。

下午，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大学建筑物是一幢很高的摩天楼，大量地装饰着高塔楼、尖顶、角楼、拱门和巨大的雕塑像。虽然不能说具有古典美，它确实给人深刻的印象。校长伊凡·G·彼得罗夫斯基欢迎了我们。我在对欢迎辞致答词时说，

由于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很多东西，我相信我们将会安排学生们的互相访问。我也表示了能在俄国流通更多英国书籍的愿望。“除了狄更斯还有其他作家，就象除了托尔斯泰还有其他作家一样。”他们赠我一部莫斯科大学校史两卷集和挂在墙上的一个小纪念板。我赠给图书馆一套四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附有插图的关于牛津城的书作为回礼。当学生们集合在大厅里欢迎我的时候，讲师、记者和官员们也都出席了，真是济济一堂。特别在我提到大学的几个伟大人物如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和其他人的作品已为英国人所熟知的时候，学生们给了我热烈而甚至是竭诚的鼓掌欢迎。与此同时，我也提到一些较新的俄国作家，他们现在也逐渐闻名于我们中间。我们两人访问归来时都受到很大的鼓舞。而且，莫斯科的人们开始知道我们了，人群对我们很友好。

至此，访问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没有发表任何正式公报，  
603 全世界的报刊都有一个正确的印象，认为会谈虽然只是一般性的，却是在一种十分顺利的气氛中进行的。而且，那些了解俄国政府做法的新闻记者们，由于赫鲁晓夫决心对他的英国客人表示的不平常的赞扬而大为惊异。他那华而不实的性格使他在所有公共场合都要表现出几乎是过分的友谊。他重复他的宣言，说东方和西方能够合作和应当合作。在2月23日晚上，在英国大使馆专门为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举行的晚宴上，他又特别明显地表示了这种友好的感情。我向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祝酒时，在提到战争时代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和丘吉尔以后，又说到

你在组织支援军队的工作方面，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所起的光辉作用。这次以那个城市命名的战役的确是大战中最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你一定为你在这次胜利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感到骄傲。

赫鲁晓夫对他战争年代的功劳特别感到骄傲，我对赫鲁晓夫

的这种恭维,使他受用得几乎象匹克威克<sup>①</sup>那样眉开眼笑起来。我用同样的调子继续说:

当我们想起我们之间曾是亲密同志的那些日子,我也是感到悲伤的一个。想要假装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关系还和面对共同危险时一样,是没有用处的。当然,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两国真正受到生死攸关的极大威胁。毫不奇怪,我们联合一致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但是当我考虑世界现状的时候,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我们今天连一点重大的共同利益都没有了。共同的利益是和平。让我们为了和平联合起来吧。

在赫鲁晓夫的答词中,他先恭维了我一番,然后接着说:

在和你们的讨论中,我们欣赏的是你的坦率,而且你不仅了解你们国家和你们一方面的利益,还对我国和我们一方面的利益有所了解。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因为抱这种态度就比较容易找到可以满足两个国家和两方面的合理解决办法。

接着他说了下面一段话,我们认为十分重要。

604

正像你一样,对于战后没有能够维持那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产生的那种合作和友谊精神,我们也很遗憾。

我们明白,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到现在,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情况已经大大改变,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妨碍在两国人民之间、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决定于该国人民的意愿。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就象我们承认太阳每天早上升起一样。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事实出发: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和同一个太阳的温暖。

就在这次宴会上,赫鲁晓夫提议为女王和王室的健康干杯。在晚间,我代表英国政府赠给赫鲁晓夫一个美丽的乔治一世时期的

---

<sup>①</sup> 匹克威克是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为人宽厚憨直。——译者



胡桃木书柜和几只银烛台。除此之外，还赠给赫鲁晓夫太太一套银茶具和一套磁餐具。在我们访问结束的时候，他回赠我几样贵重的礼品，其中有一支俄国制的猎枪和一个精巧的金质和孔雀石做的盒子。此外，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还看到其他一些重要的友好表示。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出席文娱活动的次数是空前的，而且精力充沛。他们耽得很晚，看来都很高兴。他们为这次访问花了大量时间，而且人们已经知道赫鲁晓夫本人将与葛罗米柯、米高扬以及其他重要部长们一起，陪同我前往基辅和列宁格勒。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厚意。此外，我的公开演说都立即由俄国通讯社发表，登在俄国报刊的显著地位。因此，头三天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令人满意。

第二天，2月24日，外交大臣和我一早就到杜布纳的原子能研究所去。葛罗米柯和福罗尔·科兹洛夫陪我们一起前往。所长  
605 向我们说明了在这个研究所任职的三百名科学家主要从事的工作。自然，对于给我看的東西，我懂得很少，但是在国内访问一个类似的研究所，情况也会是同样的。新闻记者也被允许参加这次活动，俄国报刊和全世界的报刊都登载了全部参观经过。所长告诉我的情况中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点是，这里近半数的科学家来自从阿尔巴尼亚直至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回来之后，我们发现正当我们在离莫斯科一百二十英里地方忙着参观的时候，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重要而乍看起来完全出人意料的公开演说。下午我们的官员才拿到了一份副本，演说全文已由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表面上他作这次公开演说是他参加竞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看来大选正在那时进行。但是在一个这种竞争纯粹是形式的国家里，这次演说的性质很难被认为是仅仅为了国内需要脱口而出之言。虽然在提及我们的访问时措词是友好的，有几段还强调了建立俄国和英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愿望，但

是这个事前我们毫无所知的突如其来和出乎意料的演说——或者宣言——的总的效果在当时情况下是可悲的。赫鲁晓夫一开始就指责西方国家提出召开讨论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而其中却不包括德国邻国和德国侵略的受害者捷克和波兰的外长。他接着说：

西方想诱骗我们进入外交谈判，进入迷宫，苏联对此有多年的经验——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泥潭……如果大国举行有充分权力的政府首脑会议，情况可能好一些……

他用严厉的字眼批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无情地攻击阿登纳。苏联眼中的最大敌人之一是阿登纳博士。赫鲁晓夫时常对阿登纳说，“你的政策与基督教教义是矛盾的，你应当好好反省反省。”在对埃及和伊拉克说了些友好的话——“俄国将永远站在为自由而奋斗反对压迫的人们一边”——以后，他转而猛烈攻击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答应为同苏联建立良好关系而努力，“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他的幕后活动。我们知道这些秘密……真是什么都知道。”伊朗国王已经同美国签订或者正打算签订一项条约。“条约全文已经拟好。我们掌握了条约的全文。”他在演说的末尾攻击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别的地方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说这是一个骗局，资本主义仍然是由贫穷和大批人失业支配的一种制度。他的讲话中唯一使人吃惊的地方是他建议同英国立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这个出人意料、傲慢无礼的攻击，特别是直接针对我们的盟国的攻击的报告全文送到大使馆时，塞尔温·劳埃德和我正在那里休息。英国和外国报刊的记者们激动地走来走去。但是，不管我们的感觉怎样，必须不受干扰地执行我们的访问计划。

下午七点半，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正式招待会，主人是大使，邀请了很多客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政府的所有重要成员再次出席了——这是极大的敬意。他们耽了很长时间，而且明显地开怀畅饮，象小学生似地互相说些一般的俏皮话，开些有点过分的玩

笑。他们和塞尔温·劳埃德长久地用开玩笑的口吻讨论苏格兰威士忌和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都有些什么优缺点。米高扬和塞尔温·劳埃德之间比较严肃地争论着“平等”的问题。这是公开进行的，而讨论的气氛很融洽，但是赫鲁晓夫却偏要插嘴干预他们的讨论，似乎颇为喜欢人们对他的善意嘲弄，同一大群各国新闻记者随便地说着话。这些记者中有的是工党议员，当时充任记者，其中之一是埃姆里斯·休斯。晚上的时间很长，房间里热得受不了，我一度感到头晕。但是经过二十分钟的休息以后，我又回到了扰攘的人群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和赫鲁晓夫在一间小房间里谈了几分钟的话，但是他和我都没有提到那篇演说。我知道到明天这个演说将会登满报纸，并且吸引西方世界的注意。

607 招待会以后，塞尔温·劳埃德和我驱车来到离莫斯科几英里以外苏联政府专门供我们使用的别墅。这是一所可爱的普通俄国式的桦木房子——大部分是抛光木，抛光地板，还有朴素而十分舒适的椅子。我很疲劳，离开英国时得的感冒到这时还没有完全好。这个晚上就用来睡觉，早上再考虑问题。

但是要思考就得仔细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讨论，甚至要有辩论。外交大臣和我在2月25日星期三早上的处境不利，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还没有从英国或外国报刊上得到对于赫鲁晓夫演说的反应。哈罗德·埃文斯靠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彼得·霍普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充分了解记者们已经发出的消息。虽然我们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能设想得出新闻的标题。我们也没有来自任何一国首都的任何正式消息。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主动性和凭我们自己的本能来行动。讨论当然不可能在宾馆，或者说在别墅中进行，尽管这所别墅看来是很漂亮的。俗话说隔墙有耳，包围我们的这些木制墙壁和我们四周的漂亮家俱决不会缺少现代外交的那些重要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在外面雪地里研究问

题,并且按照人们的劝告,尽可能远远地离开花园里的树木,因为在树丛里据信也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将于十二时半来与我们共进午餐,然后举行讨论——这将是一次重要的讨论会。所以在我们吃了一顿用鱼子酱代替柑桔酱的丰盛早餐以后,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就走到我们那小小庄园的空地上去。你想象一下,两个中年的——且不说上了年纪的政治家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甚且还穿着讨厌的可是又不能不穿的橡胶套鞋,同他们的顾问一起沉重地走来走去,长久地和认真地——低声地——讨论着一种即使不是立即有危险,也随时可变成荒谬可笑的形势。由于只有很少的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我们显然必须“靠耳朵来比赛”。作出了这个谨慎而有些空洞的决定以后,我们赶快便回到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去。 608

赫鲁晓夫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他不善于掩饰他的感情。许多高职位的俄国人循规蹈矩得近乎笨拙了。这些正统的官僚几乎不让他们自己轻松一下,而在他们的首长面前毫不流露感情。但是赫鲁晓夫滔滔不绝,不能控制自己,很有口才,好象是从一个不同的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其余的人,除少数外,全是办公室的雇员,就人们能看到的,是些点头先生。米高扬是经历了许多动乱时期以后的唯一幸免者,他曾经是个孟什维克,然后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斯大林的追随者,在斯大林死后是那短暂的政府内阁成员,现在看来又很受赫鲁晓夫的器重。他是一个狡狴的东方型人,无论在伦敦、纽约或莫斯科他都能飞黄腾达。但是,赫鲁晓夫尽管他有着各种错误和粗鲁行为,但仍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性急的、有时令人无法忍受的但并不是不可爱的性格外向的人。我很想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今天来我们这里吃午饭,他将是什么心情。我没有等多久。当他享受着我们将作为名义上的主人为客人准备的佳馐美味的时候,我在他脸上能看出一种狡狴而又

吸引人的神情，就象一个顽童在做错事的时候被抓后，自知该受责备，但还是想厚着脸皮顶过去。午餐以后，我们不是在会议桌旁而是在搬到炉火旁的靠椅上坐下的时候，我感到他透过雪茄烟的薄雾和浓烈的酒味给我递了一个眼色。啊，原来如此，他对选民发表的演说也是这样十分顽皮的，但却很有趣。

陪同赫鲁晓夫一起来的，与往常一样有葛罗米柯、米高扬和他们的驻伦敦大使马立克。陪同外交大臣和我的有诺曼·布鲁克爵士和帕特里克·迪安爵士。象往常一样，由出色的俄国翻译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担任口译。此外，我们有一位令人钦佩的俄语学者默里。我们相信俄国译员，但是我们还是带着自己的人来校正任何误译或错误。在早些时候举行的会议上，这还不那么重要，但是我决定现在或者任何以后的其他会谈中，不能再允许出现误解。

我开头谢谢他在我们会谈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这是对我和  
609 我的同僚很大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为了每一方都不能了解对方的观点，不能找出官方文件表面下的真实东西而感到不愉快。在最近的几天里，我们至少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事情。举例来说，我们无拘束地讨论了检查核试验的问题。我很了解，俄国人害怕任何需要进入彼此领土的监督机构可能被利用来达到收集情报的目的。在这方面我有一些新的计划，将在下一天的正式会议上提出。但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柏林、德国和欧洲安全的问题。这些就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昨天的演说中宣布的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可以有益地讨论的那些问题。确实，他相当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自然，就发表的时间和内容来说，这个演说是重要的。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演说在联合王国或者在我们的盟国中间或者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会起什么影响。现在我很愿意用直到现在一直鼓舞着我们两人的同样坦率精神来讨论局势。关于会议的可能性问题，我只能谈我个人的看法。时间、地点和什么级别等细

节必须由各有关政府来安排。我现在不想讨论这样一个会议应当是政府首脑会议呢，还是外长会议呢，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但是我强烈地感到，在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这段时间里，双方都应坐下来象我们最近几天内做的那样，作些切合实际的讨论，不能让事情陷入他所谓的“危险局势”中去。在这样一次会议上应当至少就主要的原则达成协议，然后下决心努力就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谈判，赫鲁晓夫说得对，这些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我并不同意他演说中的许多东西，但是我同意需要进行谈判，除掉败坏国际局势的东西。关于我们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讲这么多。至于实质方面，我们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苏联政府最近对柏林采取的新行动，局势的前景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个开场白以后，我说得更加谨慎和严肃，用的都是经过我 610 和同僚们及顾问们一致同意的字眼。我的责任是表明英国政府将支持他们的西方盟国，并与他们合作。由于我担心事态正在往不良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认为应当不要让苏联政府有一点怀疑。尽管攻击盟国的领导人，也不能使英国和她的盟国分裂。我承认，赫鲁晓夫坚持了苏联的立场。英国政府和他的盟国也同样坚持他们的立场。除非我诚挚和忠实行事，对联合王国的朋友和盟国表现忠诚，否则我在促进和平方面就起不了作用。如果我采取另外一种做法，赫鲁晓夫也不会尊敬我。

尽管词句有些笨拙，但是赫鲁晓夫的演说，其中有着使人听了高兴的东西，也有粗暴的东西——一方面建议与英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又威胁恫吓——其动机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使英国和它的盟国分离开来，所以我认为必须发表这一比较正式的宣言。我知道不管结局怎样，我一定要表明这个立场。我继续说，赫鲁晓夫在他演说中提及的虽然都是一些重大问题，却都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从外国领土上撤走军队，各方的

军队部署，裁军，限制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和控制核试验。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真正极端重要的问题。我感到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而且可以及时地得到解决。但在两三天里，即使政府首脑在一起会晤，也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双方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按照一个共同的谈判程序去讨论，就有可能解决几个问题，而且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我说到这里就开始用我和同僚们在别墅的结冰的院子里讨论以后我小心地背下来的一些字眼来说话：

611 我有责任着重指出两点。我希望赫鲁晓夫先生仔细地把它们记下来。第一点是德国的局势非常危险，它能发展成为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悲惨的某种结局。第二点是通过明智和合作的努力，这种结局一定是能够避免的。

接着停顿了一下，这时葛罗米柯和米高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又看看他们的主子。讨论一直继续到五点钟以后。

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恼火了。在他答复的最初阶段，他还耐着性子。他开始说我不必为自己开场白的冗长致歉意，他自己也应当为他前一天所作的冗长演说向我道歉，这篇演说我认为有必要记录下来并且我已经作了答复。他将同样诚恳地说话。但是由于感到自己所处的逻辑上的软弱地位，他开始表露出某些暴躁。他假装不懂西方希望俄国政府干什么。他提出了关于德国的某些建议，而我们一个也没有提过。我们上次2月16日的一个照会根本不是对他的照会的答复——除了提到了日期以外，彼此没有任何关联。他简直弄不懂西方为什么要维持对德国的战争状态，也弄不懂我们为什么希望保持柏林局势的危险性。是因为我们想保持从当前的军事停战状态转到真正战争状态的可能性吗？我们是不是在武装西德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利用他们呢？在他看来事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除了说局势危险以外没有提别的论据。那根

本不算一个论据。苏联政府从来赞成谈判,他一再的这样说过。事实是西方在威吓苏联政府,同时力图在威吓的掩盖下保持一种战争状态。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开始表现出,或许是假装出真正发怒了。我永远也不能确定在这次或者别次同他谈判的会议上他这种发脾气有多少是真的。不管怎么说,现在他开始直言不讳地谴责我们要战争、准备战争以及选择我们的战争时机。苏联政府提出“自由城市”的建议,他并得不到一点好处。我们说这不能接受;我们可能认为苏联政府会作出让步。但是什么让步呢——领土上的,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他希望签订一个和约,从而稳定目前的地位。如果有人误解了他的立场他很遗憾,那不是他的过错。照这样说了很多以后,结束时他作了一个与我的声明相应的声明。 612

俄国政府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任何其他准备参加的国家缔结和约。不管西方政府是否同意,他们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如果西方希望维持战争状态,责任在他们。历史将谴责他们。责任和过失将是属于他们的。

他很严肃的说了这话以后,接着又说,苏联政府准备在任何时候进行谈判。正如他很清楚地知道,一再责备盟国希望“保持战争状态”,正是在占领和划分柏林以后所产生的复杂局势下俄国人乐于使用的陈词滥调。具有不寻常的讽刺意义的是,正是由于名义上的战争状态或者无论如何由于和整个德国没有缔结和约,这才始终维护着西柏林的自由。实行俄国的计划定将使西柏林人民投降,并且最后被吸收进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去。

在塞尔温·劳埃德和葛罗米柯起着主导作用的长久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两个有趣的问题。外交大臣指出,维持我们在西柏林的驻军对我们没有军事上的好处,相反,它们多少是一种不利条件。他问葛罗米柯为什么柏林现状使苏联政府如此忧虑。葛罗米柯提到了我们在西柏林的间谍机构,他说为数有一百多个。赫鲁晓



夫激动地插话说,西柏林是在苏联盟国领土上的一个西方基地。维持在东柏林的俄国部队对苏联没有好处。间谍活动固然重要,但它不是一个致命问题。外交大臣然后指出下列事实,即赫鲁晓夫先生自己承认西方的立场有较大的灵活性。那么为什么又提出一个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计划,威胁说必须接受这个计划,不然就会发生战争呢? 613 赫鲁晓夫生气地插嘴说,他从没有讲过任何以战争相威胁的话。塞尔温·劳埃德于是指出在他自己的演说里,他曾经宣布过,任何侵犯东德领土完整的行为都要引起战争。对此赫鲁晓夫颇为生气地回答说,在和约缔结以后,情形肯定是那样。意见交换得不很令人满意,到最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问我一个问题。从军事观点来看,西柏林没有重要性,如果这是句真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持我们的占领军呢? 我回答说有两个理由。苏联打算同东德签订和约以消除西方的权利,西方政府强烈地反对这一点,苏联政府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第二,我们对柏林居民负有责任。这点是联合王国两个政党都接受的。我关心的是要找到一个能维护我们的权利同时又能使我们继续实行我们所负责任的解决办法。如果苏联政府说并没有发出最后通牒,这当然是很好的,可以讨论各种可能性。但是无论哪一边试图向对方施加压力,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而且必须找到一个对双方都体面的解决办法。

在这以后,辩论就开始恶化了。赫鲁晓夫有些生气地宣布,我们根本忽视他关于“自由城市”的建议。不论怎样,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的政府与德国一方签订和约的决心,如果它不能与双方签订和约的话。他说,不管怎么说,西方国家毕竟已经不顾苏联政府的权利,而与日本签订了和约。显然,西方想帮助阿登纳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要指出,如果在签订和约以后,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任何侵犯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而且咎在西方。西方继

续说“给我们通道”，为此他们力图维持占领状态，也就是说维持战争状态。如果签订了和约，显然作为投降结果的一切协定和占领都将结束。正当考虑同打败的敌人签订和约问题的时候，与打败的敌人合作，又欢迎那个敌人做盟友，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阿登纳博士起着消极的影响，他只能起阻碍签订协议的作用。

614

发了这一通脾气以后，赫鲁晓夫提到了伊朗国王。很清楚，由于他自己的阴谋失败，他是多么失望。“我们对桑兹先生和国王的谈话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可以给你一份完整的记录。”然后，他问我有没有读到美国海军部长最近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说到摧毁苏联需要多少分钟。所有这些好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我尽力使讨论告一段落。只剩下由我扼要地说明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都赞成谈判，但不赞成在压力下的谈判。我们忠诚地站在我们的盟国一边，但是根据我本人对戴高乐将军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两人的了解，我确信我们的盟国会象我们自己一样准备在合理的条件下进行谈判。重要的是这种谈判的精神。

现在，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安和发怒了，他不理睬米高扬和葛罗米柯想约束他的企图。他最后说的话是重要的。苏联政府建议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这里的居民将摆脱一切危险。苏联政府准备以一切必要的保证来维持这种安排。在西方的答复中，他们谈到维持通道的权利和占领状态，这只意味着维持战争状态。西方谈到保卫三百万人民，而这些人实际上不需要谁来保卫。但是，当他们谈到战争的时候，真正涉及的却是数亿人民的生死问题。

会议的结尾却标志着恢复到和好和清醒。茶、伏特加和其他饮料随意地喝。赫鲁晓夫愉快地对我说，他非常希望当天晚上在大剧院看到我和我的朋友们。我肯定将观赏那场芭蕾舞演出。

大剧院里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盛大演出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剧院挤满了据说是莫斯科的“文化界名流”。当我走

进第一层楼座正中的特别包厢的时候，人们高声和热情地欢呼起来。赫鲁晓夫向我打了个手势，然后自己也热烈地鼓掌欢迎。我们又握了握手。演出休息中间，款待了我们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休息以后和演出结束时，赫鲁晓夫又重复作出友好的表示，这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演到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们从特别包厢移到舞台旁边赫鲁晓夫和其他重要部长专用的政府包厢里。后来人们告诉我，以前从来没有请一个外国政府贵宾用过这个包厢。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早在赫鲁晓夫演说后的冷淡和我们下午会谈以前安排好了的。可是我的主人这样努力献殷勤，显然他还没有决定下步怎么走。

演出以后，外交大臣和我以及我们的随员回到大使馆，那里有特殊的防护设施，我们可以比较秘密地一起商谈。虽然到现在为止有关赫鲁晓夫演说在我国或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影响我们还几无所知，但他晚上的态度使我感到宽慰。看来，他乐意接受我下午说过的意见，与往常一样表露出心情愉快的样子。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种幻想的破灭。

2月26日上午，安排了另一次正式会议，仍然在我们上次会晤过的同一房间里举行。陪同我的有默里和德·朱鲁塔，两人都能说俄语。另外还有外交大臣和大使。俄国人派出了他们通常的班子，赫鲁晓夫、米高扬、葛罗米柯、马立克和一个翻译。我在会议开始时，提到了以前几次会议上提及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现在可以作进一步讨论。首先是“文化关系”，我请外交大臣报告他与葛罗米柯会谈这方面的情况。这一项目讨论得很顺利，赫鲁晓夫说他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接受。这将为这方面的合作开个头。然后，非常切实地、认真地对贸易作了有益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希望双方增加贸易并更好地安排贷款。我们还提出派一个由一位大臣率领的英国代表团来仔细研究整个问题。赫鲁晓夫热烈地欢迎

这个建议。在同样愉快的气氛中，还讨论了莫斯科和伦敦之间的 616  
互惠航线问题。在这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谈到国际形势。在这过程中，他慢慢地进入一种感情很激动的状态，很难说是真是假。他开始作长篇的激烈演说，指摘英国在中东的政策，同时攻击安东尼·艾登爵士，说英国政府发动了苏伊士运河的战争，这已经可耻地结束了。现在苏联政府在柏林方面受到威胁。他必须非常认真地告诉我，苏联政府打算把这事进行到底。同两个德国缔结和约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阿登纳毫无疑问会拒绝，而英国政府将会追随他。如果我们不愿意签订条约，苏联政府将“不顾结束战争状态会引起的一切后果”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协定。他越来越激动地说下去：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反对这个和约，他的政府将全力以赴地“挫败侵略者”。他问这次会晤是否与1939年英法代表团到俄国来讨论制止希特勒侵略的会晤有相似之处。代表团耽了一个月，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战争爆发了。如果那种情况重演的话，责任在于我们。他渴望和平和友谊；他愿意马上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他敢肯定英国人民欢迎这样做。他很抱歉，今天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且心情比我们昨天会晤时还坏，是我昨天说的话造成了这个局面。他在结束他那长篇激烈演说的时候，用拳头捶着桌子说道，“我就说这些！”

我感谢他如此坦率的谈话。关于苏伊士运河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这些在我看来与我们今天的目的毫不相关。我认为昨天说那些话是我的责任。赫鲁晓夫的讲话中间，有些矛盾他本人已经注意到。他想缔结一个德国和约作为对和平的贡献，并说已经导致了一个危险的局势。如果赫鲁晓夫想像的这种局势真的存在，我们当然必须试图用谈判来处理它。我 617  
所要做的是使谈判能够开始然后保证其成功。这也必然是所有看到面临危险的政治家的目的。当然我回国后才能有更多机会和我

的盟国协力合作，促使和平解决我们讨论过的问题。

赫鲁晓夫于是责怪英国政府“策划肃清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要和平；我们和我们的盟国看来要战争。我今天说的话“和昨天的恫吓是不一致的”。谁恫吓苏联政府，他就要承担沉重的责任。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这时候，赫鲁晓夫好像犹豫不定是再发一通脾气呢还是就此罢休。我对他说的话表示了一下谢意，并且接着说我们应当在3月2日的正式会议上再见，主要目的是准备公报，或许由外长们来讨论草案更好些。赫鲁晓夫讽刺地说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公报的基础是狭小的，我回答说我们的同僚的思想都很开阔并富有想像力。这时候赫鲁晓夫好象拿定了主意，在说了些简短而令人不快的插话以后，又回到苏伊士、出售武器、俄国的敌人上去，还一般地攻击塞尔温·劳埃德是个有危险“想像力”的人。我竭力耐着性子，仅仅说我和赫鲁晓夫很友好，所以不回答他那些话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能够接受这些话。我想最好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用开玩笑的口气来对待问题。赫鲁晓夫回答时郑重其事地说，“开大炮可不是开玩笑，在苏伊士运河已经真的开了炮了。”然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提出了他的抗议。接着是短暂的冷场，谁也没有开口。然后赫鲁晓夫站起来，象他平常那样告辞。我想会晤结束了。但他又突然说他知道我和我的朋友要到基辅去。他是想陪我去的，但是他必须去补一颗牙齿，他想最好马  
618 上去补，因为在他这个年纪的人是不会再长新牙的，而没有牙齿，一个总理就没有用了。他很抱歉这将使他住在基辅的女儿以及那个城市里的朋友们感到失望。我说，由于这次旅行不能同他愉快地作伴，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我希望他的牙齿很快就能弄好，我简直不能设想他没有牙齿。对此，赫鲁晓夫又说目前他的牙齿还好好的，他希望它们一直保持坚固和锋利。他将依靠科学技术的帮助。会议在这种有点古怪的调子中结束，外交大臣和我就退

席了。

这样开始了历史上最怪诞不经的外交插曲之一——即著名的牙齿的故事。我们回到大使馆，认真讨论了我们将采取的方针。赫鲁晓夫、米高扬、葛罗米柯——苏联政府的三位主要成员——本来计划陪我们前往基辅和列宁格勒旅行，这当然是一种殊荣。已经这样宣布过，而且当作例外的礼遇受到广泛的欢迎。2月26日的报刊已经觉察到赫鲁晓夫选举演说引起的冷淡。就我们所知，关于下午会议的情况几乎还没有泄露出去，虽然法国的评论员已经以毫不掩饰的高兴心情提到我受到的羞辱。要是人们知道这个牙齿的故事以及我们旅行计划变化的时候，情况一定会变得紧张起来。而且，总统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我们所能得到的报告来看，是相当强硬的。他宣称他认为没有希望能成功地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那么我们应遵循什么方针呢？一个计划是叫来我们的彗星式飞机，然后在受辱不屈的心情下回国。这并不十分引起我的兴趣。这一类的姿态乍看起来好象给人深刻的印象甚至会博得同情和支持。但是由于我的整个目的是要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和为最高级会议奠定基础，所以这看来是一个愚蠢和眼光短浅的反应。外交大臣和我两人都认为，最好是继续象我结束最后一次会晤那样保持冷静。让我们去基辅和列宁格勒，过得快快活活，观观光，一方面静待事态的发展。当牙齿的故事传开以后，我们将在盟国中间立即遭到批评，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尊严和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行动。因此，我们在午饭以后起飞，不是由苏联政府的主要人物，而是由愉快的马立克先生和外交部的两位次长陪同。就公众批评而言，第一个反应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几乎每一张报纸的第一版都塞满了“赫先生冷落首相，破坏了会谈”，“会谈因具体需要而结束”，“牙痛的侮辱”以及类似的标题。《新闻记事报》称我这次旅行是一次“极大的失败”。赫鲁晓夫本来要和我们同去旅

行的那天下午，不管他有没有去看牙科医生，反正接待了伊拉克的一个代表团，这个消息一传出，赫鲁晓夫的无礼行径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朋友们的慰问比敌人的批评还不好受。我继续经常地给三大西方盟国的首脑发出电报，也收到了回电，对赫鲁晓夫的无礼行为有的表示了真正的惊讶，有的表示假的吃惊。艾森豪威尔把“最近这一次有意的恶劣行径看作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侮辱”。我特别对阿登纳表明，当我听到对他的议论时，我表示了愤怒。我决心忠诚地支持我的朋友。我们还必须给国内的内阁同僚们尽可能多的消息，并把我们对局势的最好估计告诉他们。普遍认为，赫鲁晓夫立场的突然改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或许认识到2月24日的演说过分了，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他想以典型的俄国方式归咎于我。他也可能是对我决心支持我的朋友，拒绝详细地谈判德国问题而真正失望了。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最好是让帕特·迪安和彼得·霍普留在莫斯科，尽力引导报刊。哈罗德·埃文斯则将和我一起去基辅，他可以同那些决定和我们一起旅行的记者谈话。

620 伦敦和巴黎继续不断打来电报。在我出国期间主持内阁的巴特勒，代表我的同僚发来一封最热诚的支持信：

舆论注意到你主人的公开演说所造成的困难，同时也注意到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强硬调子。不过大家仍然强烈希望不管受到什么挫折，你都应当继续探索——确实，大家相信只有你能够这样做。

他还报告说，报刊和国会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坚决持同情态度的。

格拉德温·杰布从巴黎寄来一份和戴高乐将军谈话的报告。将军在谈话时说到，赫鲁晓夫在这次对话期间所作的演说是粗暴的。虽然他觉得情况是严重的，但仍然并不认为赫鲁晓夫准备把

事情推到进行战争的地步。我在答谢将军来信时说,我仍然相信,由于在我们访问中增长了见识,“我们都更加明白,我们作为盟友该采取何种共同的态度,来对付今天和明天大家所面临的困难。”

在基辅我们受到了例行的仪仗队和相当客气的接待。外交部副部长华西里·库兹涅佐夫是一位最有趣的同伴和令人愉快的主人。虽然他力图掩饰他的感情,但是显而易见对已发生的裂痕感到焦虑和失望。我们正式拜访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后,去谢甫琴柯剧院观看了《森林之歌》的演出。第二天很漫长,但是很有趣。开头我们乘车到一个农场,受到那里人们极为热情的欢迎。我穿着乡间衣服与两位动人的挤奶姑娘手挽着手一起照了相。关于农业制度方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与农场的土地面积相比,从事劳动的人数太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为之骄傲的机械化仍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总得利用人数众多的老百姓。现在天气比较温和了,几乎象春天一样。虽然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从各种意义上说,气氛是冰冷的,但是在这里,却象记者们注意到的,大不相同。大堆人群聚集在周围,似乎很感 621  
兴趣。

从农场回来以后,我们用上午剩下的时间参观了乌克兰经济成就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和许多展览会一样,除了宣传说教以外,令人感到疲劳。我们必须接受热心宣传共产主义胜利的讲解员所作的冗长解释和一大堆统计数字。驻伦敦的大使马立克是一个相当可爱和有文化的人,他尽力不让我们听过多的宣传。然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到了俄国生活的某些迷人的侧影。下午我们在基辅作了一次观光旅行。基辅虽然在战时受到可怕的破坏,但仍然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美丽的城市。他们还让我们参观了圣苏菲亚大教堂和其他一些宏伟的建筑。

晚上我们出席了一次宴会。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N. T. 卡尔



钦柯和我两人在宴会上都讲了话。我们刚接到了一份米高扬对罗斯托夫选民的选举演说的报告。虽然他对我倡议开始谈判和提出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建议表示敬意,但是接着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显然反映了赫鲁晓夫的愤怒心情:

在讨论与德国缔结和约和柏林问题的过程中,英国首相——可能是在对英国盟国所负责任的影响下——选择了一条强硬的路线<sup>①</sup>。

我在晚宴上自然没有提及在莫斯科发生的痛苦事件,只是尽量说些建设性的甚至表示信心的话。多少有点出乎意料,赫鲁晓夫的女儿和她的丈夫一起出席了晚宴。不清楚这是受命于她可怕的父亲呢,还是出于她自己抑制不住的好奇心。附带提一下,除了一位妇女部长以外,她是唯一出席宴会的妇女。我很快修改了我的讲话稿,提到了她的光临。

第二天正当我们要启程到列宁格勒去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来  
622 了一封电报,是赫鲁晓夫本人拍来的。他表示希望我们在基辅过得快乐以后,说他肯定我一定会高兴地知道他的牙齿好多了。牙科医生用了一种极好的、新式的英国钻子!第二天2月28日,在致告别辞和检阅仪仗队以后,我们出发去列宁格勒。下午一时到达列宁格勒,受到了米高扬和葛罗米柯两人的欢迎。看来他们决心抛开一切争论,向我们显示最大可能的礼貌。这两位主要部长的行动当然被全世界报刊看作是一种和解行为,俄国报刊也同样反映出了气氛的突然改变。当牙齿的故事普遍流传时,这一戏剧性的转变自然要被重视的:

很难弄明白为什么俄国人这样做。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为了保持和西方盟国协调一致,我必须——在某些节骨眼上——在柏林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单方面行动的后果方面采取“强硬”方针。虽然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赫鲁晓夫的公开演说(特别是它的谩骂性质)使

<sup>①</sup> 米高扬,引自《曼彻斯特卫报》,1959年2月28日。

得我可以这样做,但仅仅是在回答的时候这样做。他发怒了,或者他假装发怒,然后他认识到错了。

最简单的解释可能(常常是这样)是正确的解释。他老早准备好了这次宴会演说——一种布莱克普尔式<sup>①</sup>的演说。他不知道演说怎么能算侮辱了我。他试图以对我的抗议生气的形式来掩盖他的错误。他看到他行事愚蠢而冲动,于是又来赔罪。<sup>②</sup>

在列宁格勒,我们下午视察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晚上在基洛夫剧院欣赏了芭蕾舞剧“宝石花”的精采演出。第二天,3月1日,在米高扬陪同下,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坐车绕列宁格勒兜了一圈,看了看这个奇妙城市——北方威尼斯——的主要特征。此外,他还陪我们去一个百货商店和一个投票站。当米高扬投票而且开玩笑地叫我也投一票的时候,投票站里充满了吵吵嚷嚷的欢笑。我说,我当然要投政府候选人一票。于是给了我一张选票做纪念 623 品。下午,米高扬领我们去隐士博物馆参观那些珍奇的收藏品,我们只恨时间太短了。

除了所有这些礼节性活动之外(其中有些做法好象是为了竭力充分表示和解似的),这两天还是外交大臣和葛罗米柯进行长谈的好机会。塞尔温·劳埃德明确地说,我个人赞成召开最高级会议,而且我也相信在合理的情况下美国人和法国人是会接受的。但是问题的主要之点还在于俄国人对这样一次会议的看法。他们好象仍然希望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我本人讨论两三天就可以做完那些实际的工作。这看来是很不现实的,我们决心通过外交途径或者最好是四国外长会议来做好准备工作。除了这个方式问题以外,塞尔温·劳埃德还以平静而有效的方式向葛罗米柯明确而稳妥地叙述了我们对困难的看法。一向谨慎而现在对我

① 布莱克普尔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曾受诬告。——译者

② 1959年3月4日。

们表示友好的葛罗米柯在谈到其他事情时说过，“英国不能躲在美国人后面，只要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说的话是有份量的。”

在我们离开列宁格勒以前，我们收到了苏联政府即将递交法国、美国和中国的一份照会的稿本。他们是在3月2日正式递交这个照会的，它是对我们上次2月16日那个照会的答复。在一篇很长的序言后面，提出了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建议。这个会议将讨论欧洲安全、裁军、双方撤军和在欧洲建立无核区、四国裁减军队、禁止核武器以及停止核试验等等。除了四大国以外，还应当邀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讨论德国问题时，亦应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所有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如果西方  
624 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开最高级会议，他们同意召开一次外长会议。当然，我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戴高乐两人以及阿登纳博士指出，这表示了真正的让步。它不仅迎合了我们的要求，而且实际上代替了5月27日该满期的最后通牒。因此，我向他们提出请求，我们应当对这些建议表示同情，虽然其中一些细节可能是不能接受的，但总的应当积极而不是消极地予以答复。我尤其恳请艾森豪威尔总统叮嘱国务院和任何官方发言人“不要作出任何仓促或者过于敌对的反应”。

我们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斯米尔诺夫共同出席了一次正式晚宴，宾主频频干杯。我在晚宴上呼吁要平心静气地谈判；然后我们乘夜车去莫斯科。在车站又作了一次讲话，检阅了仪仗队。我们于3月2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四十分到达莫斯科。我们在大使馆过了一个安静的上午，主要阅读电报和各国报刊的提要。下午外交大臣和我到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进一步会谈。这次赫鲁晓夫仍由米高扬和葛罗米柯以及马立克陪同。帕特里克·赖利和诺曼·布鲁克和我们同去。这是那次著名的争

吵以后我们的第一次会议。赫鲁晓夫一开始有几分天真地叫我相信他牙齿里真的掉下来一块填充料，而这使他不能陪我一道去基辅。他还重新赞扬了一遍英国的钻子。我回答说，赫鲁晓夫发到基辅给我的电报使我深受感动，他在电报里说，如果英国能够与苏联达成谅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和更可靠的朋友了。我希望我们的讨论已经在奠定这样一种友谊方面作出贡献。

然后我们转入正题。虽然各个问题的确包含着困难，但是整个讨论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关于德国问题，赫鲁晓夫说得相当明确，俄国人真正希望的是要我们认可东德的存在及其现存的边界。他说他对法律上的承认不感兴趣。如果我们不情愿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也许可以找到我们能在事实上承认这些边界的办法。他还说西德不需  
625  
要从法律上承认东德。关于柏林问题，他说5月27日这个日期没有特别的意义。它也可以是6月27日或者8月27日，或者我们喜欢的任何一个日期。他重新保证，如果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他将与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一起拟出关于充分保证通道的条文。

我提出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应当由谈判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在会谈中已经在许多观点上取得一致，现在可以据而争取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解决了其中几个问题，讨论其他问题起来就会容易得多。赫鲁晓夫赞成这个办法。

赫鲁晓夫亲自提出了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没有详细讨论苏联的草案，但是我说在谈判那些紧迫问题的最后或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之间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方针考虑一个联合宣言——同意在一切争论问题上双方应按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条文行事；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试图单方面地损害对方的权利、义务或重大利益；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同意解决争端应通过谈判而不诉诸武力。赫鲁晓夫说他认为提

出的这些原则是吸引人的，但是应当提及联合王国土地上外国基地的使用权问题。我十分明确地表明，我们不能考虑任何破坏西方盟国的事情，正像我不希望赫鲁晓夫接受任何会破坏华沙条约国的事情一样。

至于下一步，我指出要在至多以四天或五天为期的最高级会议上就主要问题达成协议，是有种种困难的。我提议我们可以把最高级会议和外长会议或其他谈判者会议结合起来，这样先有一个议事程序以后，才最有希望得出结果。赫鲁晓夫说他完全同意。他并不想不惜一切代价召开最高级会议。如果一次最高级会议失败了，这比不开会还要糟。他也欣赏不时召开最高级会议的主意，但不应当把最高级会议看作是消防队一样，只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才开这种会。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又转到同德国和柏林签订和约问题上去。他说他并不试图对任何人施加压力，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只是要求把地位固定下来，并使之得到公认。

我们离开会场的时候感到现在是完全解冻了。确实，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出席了接着举行的一次仪式。他们出格地强调了这种变化。这次盛大的集会邀请了莫斯科所有的重要人物，包括各国的外交使团和报界代表。集会在克里姆林宫著名的与沙皇时代没有什么两样的圆柱大厅里举行，大厅四周的墙上闪烁着巨大吊灯的光芒。赫鲁晓夫在会上心情愉快，得意洋洋。他按照他往常的计划对所有的人发表一连串简短的讲话。他宣称，我已为达成缓和冷战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当然人民期待更多的东西，期待一种能使鲜花为我们两国人民幸福而盛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半因为会场上人太多、频频饮酒以及仪表堂堂的军乐队演奏从古典乐曲到世界大战时士兵唱的歌曲等不同的音乐，一半也因为举行

了两小时紧张的会议，这一天确实使我感到精疲力尽。但是这还没有完。集会结束之前，还要发表正式演说和致答辞。在致答辞时，我冒昧地详细提到了我建议的联合宣言，因为我想看到我们会谈的成果。

最后我们回去休息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满意。不论我们全部努力的最终结果怎样，至少俄国人接受了召开外长会议的意见，同时实际上撤销了柏林问题上的最后通牒。

但是在这一天结束以前，还有一件艰巨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就是相当令人惊异地允许我可以不经任何检查删节地作一次电视广播。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特权，代表了一个非常实质性的让步，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白白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孜孜不倦地用心准备了这次演说。我很运气有约翰·摩根这样一位优秀的翻译，他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一个杰出的俄国通。我们决定不作逐句翻译，而是逐段翻译。这样做确实增强了讲话的效果。一般来说，不值得去回顾已成明日黄花的讲话或广播演说，但是把这个在这样不寻常情况下，在这样激动人心、波动很大的访问的末尾所作的讲话记录在这里，也许是值得的。 627

让我首先表示我是多么高兴来到莫斯科，并且有这个机会在你们家里和你们说话。我希望我能用俄语向你们说话，但是我怕我不能这样做。所以我必须有个翻译来帮忙。

我还要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和我访问莫斯科。正如你们知道的，包括赫鲁晓夫先生在内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曾于1956年访问了英国。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看了我们的国家。我很遗憾过了这样久我们才能作这次回访。我们也有一句谚语叫“晚来总比不来好”，我希望你们会认为这句话正适用于我们这次访问。

这不是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作为一个普通的未担任公职的公民，我

于1929年来过这里，并且在你们的国家游历了好几个星期。在那个时候，你们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你们国家的人民当时过的生活是艰难的。看到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多么令人惊奇。你们已开始看到你们为了发展你们国家所作努力的成果。苏联现在是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国。诚然我们英国的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比你们多一倍。但是我们迅速扩大我们基础工业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仍然能够而且一定要增加生产总值，但是我国居民工业化程度已经高达我们所能期望的地步。我们小小的岛屿仅仅是莫斯科州的五倍，但居住了五千二百万人口。除了煤和一些铁矿以外，我们的天然资源很少。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双手的本领、靠我们额头流的汗水、靠我们思想的独创性来生活。我们总得设法赚足够的钱来买我们所需的食物和原料——这些我们还必须从海外运来。

因此，世界上一些伟大的基本发明创造是从我们的小岛上开始的，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需要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发明就有雷达、喷气机和盘尼西林，三十多年以前英国就首先看到了播送的电视影片。在原子时代的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正在领先开拓利用原子能为人类需要服务的事业。1956年我们有幸请赫鲁晓夫先生参观了在哈尔威的我国原子能科学家的工作。也是在1956年，我们开放了卡尔德霍尔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我们在乔特利尔本克的巨大无线电望远镜为你们那了不起的人造卫星的运行提供了宝贵的消息。英国工业极为生气勃勃。我们出口的纺织机器、农业拖拉机、自行车和摩托车比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要多。我们的汽车每年出口达五十万辆以上，年产量超过一百万辆。我们的航空设计师建造了第一架涡轮螺旋桨式客机，现在有四百架运行在全球航线上。我们的农业大概是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差不多每九公顷可耕地就有一架拖拉机。英国还保持着世界水陆交通的最高速度。

除此以外，我们在消费方面也有许多成就。举例来说，大战结束以后，我们已建造了三百多万幢新的永久性住房。其中大多数在城外的都是每家一幢的单独住宅，另有一个花园。几乎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一辆汽车，此外，还有一百五十万辆摩托车。1939年以来，我国大学生的数

字增长了一倍。我们对五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实行了免费全日制教育。事实上，英国的生活水准是欧洲最高的。我公正地认为，我们对所有这些成就感到骄傲，但是我引用这些数字并不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这些数字更说明了由于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我国国民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一个靠贸易为生的国家。这是你们了解我们对各种事务态度的一个关键。一个靠贸易为生的国家是需要和平的。它也需要别国的人民富裕昌盛。它需要和平是因为只有在和平时期才能够往来自如地进行贸易；它需要别国人民富裕昌盛是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够找到产品的好市场。

这就是我们欢迎在经济方面竞赛的理由。我们相信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提高生活水平和向贫穷开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福音书上说，人不能只靠面包生活。我们认为人还有精神方面的目的。每个人都有发展他个性的自由。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国家是为人而存在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岛上，对于政治哲学我们想得很多，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逐渐建立了我们的制度。当然，结果还不是完美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制度很好地兼顾了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要求。因为井井有条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把秩序和自由结合起来的问题。

你们可能觉得我们的制度很奇怪，怎么会让我们战时的伟大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正好在为国立功以后就被赶下台了。我本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就曾在国会选举中当选过十次候选人；有几次我赢了，有几次我输了。在我赢的时候，我自己想这个制度很好，在我输的时候，或许我有我的疑问。然而我们的制度仍然运行得很好，而且适合我们的需要。

英国的制度本质上是弹性的。它的根本原则是自由的无记名选举，有讨论和争辩的自由，在政治事务中让步和宽容以及行政和司法的绝对分离。这种制度已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区，虽然在各地有所变化。过去习惯称作大英帝国，即现在的英联邦，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布满全球的所有种族、所有宗教的人民的自由联合组织。这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它的成员国身份并没有成文的规章。它是对如何组织人类事务有着共同



信念的人们的一个联合组织。参加这个英联邦联合组织的国家正在增加。大战以来，已有五个国家参加进来，我们期望其他几个国家也将参加。我们并不企图把我们的制度强加于任何人，然而我们自己对它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相信它在世界上是一个真正的贡献。

你们可能会问，如果英国的政策是这样爱好和平，又是这样的明智，那么为什么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比现在更好些呢。说起来原因比较复杂，这要归咎于各种误解或错误。但是我设想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我们对生活和政治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男女，我肯定我们的共同点比许多人所承认的来得多。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我们两国和政府之间建立起信任。我们怎样来做呢？我想提出三项办法：

首先，我们应当各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进行干扰现状而使对方蒙受不利的活动，因为这种活动，用你们总理的话来说，会产生危险的局势。第二，让我们承认每方都需要具体的保证，光说是不够的，做了才算数。第三，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开个头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在一件事上达成协议以后，就会在另一件事上达成协议。第一步是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缘故。

我还提倡另外一个实际步骤。象我们这样的代表团的访问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普通老百姓成千次地互相访问彼此的国家。没有比这更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我们两国之间的游览旅行正在增多，让它增加得更多吧。我们从来没有对前往我国观光的苏联旅行者拒发过签证。我国人民也一定会来访问你们。在世界目前的情况下，大国间的军事冲突不会给哪个国家带来胜利，都只会是所有国家的灾难。同样的，在政治方面要企图获得全部胜利也会产生灾难。所以，让我们耐心地互相谅解地共同合作吧。

很难知道有多少俄国人听了广播讲话，或者它起了什么作用。但是俄国报刊，英国大多数报纸和许多外国报纸，都刊载了这篇讲话。

第二天早上，塞尔温·劳埃德和葛罗米柯会谈解决写公报的

问题。无论如何，这公报比通常这种文件写得更有内容，甚至也更为坦率。在提到我们无拘束地交换了各种观点和意见以及举行了 631 多次讨论以后，赫鲁晓夫和我宣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最终禁止核武器和将原子能仅仅用于和平目的。同时，我们强调缔结一个“在国际检查和监督的有效体制条件下”停止核试验协定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协定“会缓和紧张局势，消除对健康和生命可能的危险”。在柏林问题上我们并没有掩饰存在的困难：

总理和首相充分地交换了他们本国政府对德国问题的看法，这包括同德国缔结和约以及柏林问题。他们未能在问题的法律和政治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维护和巩固欧洲及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而应当从速解决这些问题。

公报还提到我们已讨论过的单纯的英苏间的问题。公报满意地指出贸易已经有了增进，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我们一致同意由联合王国一位大臣率领一行人调查进一步发展贸易的可能性。我们还宣布我们一致同意扩大在文化方面如书刊、报纸、电影等等的交流规模。英国枢密院将来莫斯科讨论两国文化、教育、技术和科学交流的计划。

当然，主要的好处和真正主要的实际结果，在于推迟了——如果不是解决了——柏林危机，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外长会议的安排最终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

最后，访问结束了。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在记者之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后，就赴机场。赫鲁晓夫在这里又一次做出各种引人瞩目的姿态。机场上有军乐队、仪仗队、演说和其他等等。在讲话的开头，他含糊地提到了早先的一些困难： 632

我想请我们的贵宾和所有在这里的人，特别是请那些记录实况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们注意，今天明亮的太阳又放出了它的光芒。在我们会谈的整个过程中，太阳都和我们在一起，它现在还在努力帮助我们

融解近年来在我们两国关系之间形成的冰块。

在他提到我们的会谈以及发表出来的会谈结果以后，他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

人们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作为政府首脑的我们。我们应当做到力所能及的每件事情，以阻止战争，提供正常和和平的条件，从而证明人民的信任和希望是对的。

我首先为外交大臣和我所受到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对专为我们举行的激动人心的隆重仪式和文娱演出表示赞赏，然后我感谢他同我们举行了坦率的会谈，使“我们在回到英国以后能更好地处理那些决定人类前途的问题”。

这真是令人极度疲劳的十一天。我现在必需着手做解释工作，特别是向我们的盟国解释，同时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在家度过了回国后的第一个晚上，趁对这些事件记忆犹新，记下了我得到的几个印象：

首先，我们十天的访问从早到晚简直安排得满满的。三次盛大的晚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次，基辅一次，列宁格勒一次。两次盛大的欢迎会——在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一次，克里姆林宫一次。三次芭蕾舞剧——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各有特色，都很精彩。连续几小时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葛罗米柯作非正式和相当轻松的会谈。然后连续数小时的正式会议，每方都有较多的官员参加。午宴以及在三个城市游览参观一些特殊的地方，我们参观了大学、集体农庄、造船厂、工厂等等。

633

第二个印象——压倒一切的印象——是一种奇异的经历：周围全是朋友和顾问（外交大臣，诺曼·布鲁克爵士；帕特里克·迪安爵士；安东尼·朗博尔德爵士；毕晓普；德·朱鲁塔；大使帕特里克·赖利爵士和他的属员），但是（除非极其谨慎小心）却不能和他们交谈。这是因为你不能在让你使用的住所——不管在城市或乡村——里说话。每个房间都“装有电线”。你不能在汽车或者火车里谈话，甚至也不能在房子外边谈话，如果外边是有围墙的一小块地方或是一个花园的话。你说的话

总是有被窃听去的危险。在英国大使馆里，尽管不断地搜索，但是由于现代化的方法是那么巧妙，现代化的器械是那么出人意料，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仆人和其他人等，安全仍几乎是无保障的。这种情况使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并且感到很不愉快。在这儿耽久了的人要不是对此漠不关心，就是变得急躁和神经质。（我个人认为一位大使任期不应超过两年至三年。）

第三个印象是比较一般的。食品和饮料的消费量是惊人的。食品（鱼子酱、熏鲑鱼和餐前美味冷盘一类东西除外）并不好。除了高加索来的一些相当好的白酒以外，饮料低劣（伏特加不在此列，它非常好）。苏联的白兰地酒简直象毒药。

第四个印象是所有的人民都十分亲切和十分友好。我和许多人说了话——街上的，工厂里的，我们吃饭的地方外面的，任我们使用的“住所”外面的。随着访问的进行以及我和他们的谈话，情况到处传开，聚合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态度可亲和可爱的。

一些群众显然为和平与战争担忧。宣传是很可怕的。俄国的每一个人好象真正相信美国人，大概还有英国人，已经决心来一次“突然袭击”——一个“晴天霹雳”。每个人都担心地问我们是不是要维护和平。他们对苏联在全世界的一切挑衅活动全然无知。

第五个印象——所有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个，是赫鲁晓夫先生是俄国的绝对统治者，他完全控制着局势。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不稳定时期已经过去了。“董事会”的尝试没有存在多久。第一执政官拿了权。

634

赫鲁晓夫先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感情冲动，对他自己的尊严很敏感，但对别人的感情却反应迟钝，辩论时很灵敏，从来不漏过或者随便放过一个论点；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和由他支配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俗不可耐，但是在他单纯时、在忘了“自吹自擂”的时候，还能有点尊严；残酷无情，但是又很易动感情——赫鲁晓夫是彼得大帝和比弗布鲁克伯爵的某种混合物。不管怎样，他是头头，除了开最高级会议，其他的会议都成不了什么事。不论是同米高扬也好（一个机敏的阿美尼亚人，对赫鲁晓夫卑躬屈节），或是同葛罗米柯也好（外交部长，怕赫鲁晓夫），都不可能真正谈判什么重要问题……

我们预计到从英国打电报来以及在国外指导事务的困难（这在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无论如何总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由于可怕的间谍制度会造成译密电码和把电报译成密电码或者进行商谈等等方面的困难。

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对我们招待得很好，给我们安排的所有不同的住所和别墅都尽可能布置得舒适。食物和饮料简直丰富得过了头<sup>①</sup>。

也许只是在有关赫鲁晓夫无可争辩的至高权威方面，我今天想对我的评价作些修改。他没有斯大林的力量，因为他避免或者不能倚赖斯大林的主要武器——恐怖手段。

在3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

外交大臣和我报告了我们在俄国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我们建议要做的事。我们还要去访问巴黎、波恩、渥太华和华盛顿。我们希望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相信（尽管讲了那么些大话）不是为了解决供应柏林的权利问题，而是为了坚持只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警察或海关官员颁发必要的许可证，盟国会进行战争。但是我们（不列颠）不能再陷入我们在慕尼黑（1938年）曾经陷入的境地。我不愿做张伯伦先生……对西方来说，最糟的事莫过于说大话以后又丢脸地屈服。

635

我怕会出现这种后果，除非西方首脑们在完全诚挚的情况下一起讨论，而不是只想推委责任。<sup>②</sup>

开完内阁会议，我和女王共进午餐，告诉她关于我们奇异经历的一些事。下午我在下院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对苏联最近致西方政府的照会表示欢迎。应当通过谈判而不是在胁迫情况下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这是很重要的。盖茨克尔接着发言，表现得极为豁达和热诚。他不希望“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倡议造成任何阻碍”。所有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而且表明反对党是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我的支持者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所有的保守党员由

---

①② 1959年3月4日。

温斯顿·丘吉尔领头,在我进入会场时都站起来欢呼。”<sup>①</sup>

苏联政府3月1日(3月2日递交)对盟国2月16日那个照会的复件中的建议,由于是我们访问俄国的最重要成果,所以是个不能放过的很重要的机会。俄国人又提出召开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但是他们宣称,如果西方没有准备好开最高级会议,那么他们也愿意先举行一次外长会议。很容易也很诱人的是,在抓住第二个建议的同时忽略了第一个建议,那是很自然的。卡奇亚已经预先告诉过我美国的态度正在强硬起来。大使知道我最近几个星期内不会去华盛顿,因而他想明智的做法是相当详细地给总统送一封信去,因为“美国方面的想法似乎正趋向更强硬的态度”。法国和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谈话的时候,也有相似的心情。我已经给赫鲁晓夫打了电报感谢他对我的殷勤招待;给联邦各国总理送了一份全面的报告。我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里收到一封友好的私人信件,我也已经写去了一封相宜的复信。现在我必须给华盛顿送去一份较长的说明,坚持我的看法。

以后几天,多罗西和我是在贝尔法斯特度过的——很久以前 636 就约好了。我们在3月6日安排的日程是十分紧张热烈的,第二天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在哈兰和沃尔夫造船厂,“工人们为我举行了我在英格兰或苏格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热诚的欢迎大会。”<sup>②</sup>

一直到3月8日星期日,我们到了首相别墅,我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工作上。华盛顿来了一封信,并附来美国政府对俄国照会的答复草案。复信中建议于5月11日在日内瓦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日期定得很好,但是复件的口气根本不合我心意。完全忽略了最高级会议。

① 1959年3月4日。

② 1959年3月6日。

在首相别墅集合了許多人。外交大臣和他的主要顧問都來了。

我們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最後擬出了致華盛頓、巴黎和波恩的電報稿。我試圖讓盟國對蘇聯最近的照會作出真正熱心的答复，而不是一般性的模稜兩可的復信。我相當自信，除了赫魯曉夫以外，我們與別的人都不能進行有效的談判。因此，我們應當直接提議召開最高級會議。我希望這會開得越早越好，但最好是在7月底或8月初。這樣大概可以取得使赫魯曉夫在此以前不能採取危險或挑釁行動的效果。這也可以迫使盟國把它們的思想集中在主要問題上——在德國和柏林問題上作一次可以接受的妥協。<sup>①</sup>

於是，我們在致華盛頓草擬的復電中，明確地說明了我們認為涉及德國局勢的問題非常嚴重，只有政府首腦會議才能作出重要和最後的決定，因此召開最高級會議非常必要。同時，我們也準備同意召開一次外長會議，如果把它顯然看作是一個預備會議而不是代替首腦會議的話。

第二天，外交大臣和我啟程赴巴黎。這裡，德勃雷總理在馬提嫩為我們舉行了一次富麗堂皇的午宴以後，我們充分地進行了會談，直到晚上六時。隨後，我們在英國大使館進晚餐。

法國在德國問題上真心完全同意我們的觀點。但是他們假意把我們說成是軟弱的，是失敗主義者，而他們是“主張強硬”的。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打動阿登納總理，然後好讓他在對待歐洲經濟問題上支持法國的保護貿易主義的態度。因此，特別在晚餐以後我的談話很多是集中在談現在就應採取的具體措施上面……動員預備兵，組織民防隊，增加駐德國的部隊，從柏林撤退兒童等等。這可使他們大吃一驚，簡直把他們吓壞了。<sup>②</sup>

第二天，3月10日，我們在上午十一時半去愛麗舍宮，在我單

---

① 1959年3月8日。

② 1959年3月9日。

独和将军作了简短谈话以后，他邀请正和塞尔温·劳埃德闲谈的德勃雷和顾夫·德姆维尔一起来参加。和往常一样，会议开得有点像独角戏：

戴高乐使他班子里的人大为狼狈，他直截了当地认为，欧洲不可能因为由谁来签署沿着高速公路或铁路去西柏林的护照问题——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军士还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士来签署——而发生一场核战争。在他看来，真正的封锁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唯一理由。我问他是否把这意思告诉了阿登纳，他说没有。这一定会使阿登纳沮丧。戴高乐也认为应让俄国人不断地去揣测。

关于两个德国问题，戴高乐还说不通过战争便不可能重新统一，而法国和英国不能打这样一场战争。但是，为了给德国人民一些安慰，应当经常保持“重新统一”这个观念。这是“隧道尽头有亮光”的意思，关于这，人们已经说过许多了。这是德国人的事，必须让他们经常保持这种观念。与此同时，两个德国之间应当在经济、供应和文化事务方面进行实际的合作。应当坚持杜勒斯所谓“邦联”的做法。我又问，他把这些也和阿登纳谈过吗？他说：“没有”。很清楚，法国人……希望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去向他提出这种意见。<sup>①</sup>

我又问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曾经来 638 看过我，他对法国人公开蔑视他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的义务，包括撤走他们的舰队，不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的做法表示苦恼。他请求我向将军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满意的结果。当我正噤着提出问题的時候，他用一个漂亮的手势把我的问题推开了。我们然后又转到战争危险的问题上。“战争”，他说：“别再提了”。“我不怕打仗——人家不给我原子弹！”<sup>②</sup>

当我们谈到给俄国人的复信和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这些比较更迫切的问题的时候，

德勃雷和顾夫·德姆维尔多少同意我们的意见。戴高乐对于规定

<sup>①②</sup> 1959年3月10日。



一个明确的日期颇为犹豫。<sup>①</sup>

从巴黎回来以后，在启程赴波恩之前，我召开了一次全体内阁大臣的会议。正要走进内阁会议厅的时候，我收到澳大利亚总理鲍勃·孟席斯寄来的一封很有特色的电信：

哈罗德，我认为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是老脑筋，所以觉得你给大不列颠挣回了她在西方世界中应该享有的智慧和精神上的领导地位。R. G. 孟席斯。

夸奖太甚，但是十分令人鼓舞。

过不久，我又同样高兴地收到一个老朋友来的信。信上日期写的是4月1日，但是我还是认为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开玩笑：

亲爱的哈罗德：

我收到代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参加羊毛局的尤恩·沃特曼先生的一封信，他说到你最近去俄国旅行时把英国料子赠送给俄国主人的事。这个做法使沃特曼先生和他的羊毛局的同事非常高兴，他们把你的礼物说成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件推销工作”。

639 我相信这个国家的许多羊毛制造商也将感谢你，因为你可以从大不列颠生产的东西中挑选很多礼物，而你选中了羊毛产品。

谨致

亲切问候。

您忠诚的

鲍勃

我很容易地说服了我的同僚们接受我的看法：美国复文草案多少有点勉强。他们同样高兴地知道法国人虽然想把怨恨分摊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们同意我们对柏林实际局势的看法。“坚定而不说大话吓唬人”应当作为西方盟国的座右铭。在我启程以前，我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封长信，叙述我访问巴黎的印象。

3月12日，外交大臣和我一早启程赴波恩。在机场我们受到

---

<sup>①</sup> 1959年3月10日。

总理和他的外交大臣冯·勃兰登纳的欢迎。下午三时开始会谈，一直谈了三个钟头：

我们谈话的前半部分，由外交大臣详细地叙述在俄国的情况……然后，他们报告了一两年前总理去俄国六天的情况。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叙述他对俄国的总的看法以及对西欧未来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相当悲观。德国人在“解除义务”方面对我们发动了一场进攻，他们好像认为我们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俄国人这样做。我们辩解说，“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地区限制驻军和进行检查”才是避免“解除义务”的唯一途径，而我们也认为“解除义务”是很危险的。花了一个钟头或更多一些时间进行相当热烈的讨论，来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这些怀疑。总理理解问题很迟钝，并且似乎心里还有怨气。我对他相当厉害，这还起了些作用。冯·勃兰登纳和他的同僚事后告诉塞尔温·劳埃德，他们完全满意。总理完全搞错了，这次会谈很有好处。<sup>①</sup>

第二天早上，从十时一刻到十二时半，我和阿登纳举行了一次私人谈话。

虽然这次谈话十分冗长散漫，但是非常有益。我想我已使他同意 640 我对最高级会议的看法。同时，收到一些电报，表明：（1）美国人反对我们，（2）法国人变了卦——他们又取消了戴高乐和其他人多少已经同意了的事。<sup>②</sup>

当总理和我作相当一般性谈话的时候，其他的人进行着更为认真的讨论。下午在全体会议上，我们说服德国人同意我们对程序的看法，即定出外长会议的日期以外，也还要定出最高级会议的日期。他们也同意试着去说服法国人。

我们在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德国时间）离开波恩，刚过六时（伦敦时间）到达伦敦。我们立即决定给华盛顿打一个坚定的电报，坚持我们的观点。在巴黎已经成立一个盟国的工作小组起草对俄国

① 1959年3月12日。

② 1959年3月13日。

照会的联合答复。因此，我们指示我们的代表，

除了按照我们的方针，不接受对俄国照会的其他复文草案。这也就是说暂时完全陷入僵局，但是使德国人这样完全同意是一件大事。因为（如果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又转回去的话）他们对美国人会有很大的影响。<sup>①</sup>

我在日记上记着：

阿登纳博士在我们离开以后，似乎向广播电台和新闻记者说了关于我和我们这次访问的很多好话。这是令人鼓舞的。<sup>②</sup>

虽然德国人像法国人那样好像稍稍让了一点步，而且美国人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在我看到总统以前，不可能有代表三个西方政府的复文。在这时候，我必须把我的思想转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现代的内阁大臣或部长，特别是首相或总理，都有那么多要办的急务，担负着那么多方面的责任。在我去美国之前的一天，大部分时间花在听取和回答下院关于三年前苏伊士地区军事行动的热烈辩论上。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我们最后与埃及政府达成了  
641 财政协定，必须取得国会的批准。

财政大臣首先作了枯燥无味但是内容充实的讲话，说明条款。盖茨克尔接着发表了使人佩服的演说，攻击整个苏伊士事件，最后要求对我进行弹劾（这是唯一的错误。这太有点像通俗闹剧的味道了）。这是我听过他所作的最好演说中的一次。<sup>③</sup>

在这以后，在稀稀落落的下院里，讨论进行得缓慢而单调。

很奇怪，虽然两党都有议会领袖或组织秘书发出的紧急命令，而且是投不信任票，我们还比对方多得了七十票<sup>④</sup>。<sup>⑤</sup>

3月18日凌晨二时，塞尔温·劳埃德和我以及我们通常的随

---

①② 1959年3月14日。

③ 1959年3月16日。

④ 这个时候我们在下院的正常多数大约只有五十票。

⑤ 1959年3月16日。

员，乘彗星式飞机离开伦敦机场，于上午七时半（加拿大时间）到达渥太华。我们受到总理约翰·迪芬贝克的欢迎，然后与他一起驱车到政府大厦。

加拿大人由于外交部长西德尼·史密斯的突然去世承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他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是一个令人愉快而有才能的人——被迪芬贝克突然拉入政界的一位大学教授……他还只刚开始发挥他的才能。

我们昨天下午（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曾询问加拿大人是否要取消或者推迟这次访问。但是他们坚决反对这样做。

我在机场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自然提到了这个不幸事件。<sup>①</sup>

又一次来到里多大厦是很令人高兴的。我们卧室正好安排在古老的椭圆形房间里，四十多年前多罗西和她的姊妹曾把这房间用作起居室。总督文森特·梅西如他往常那样殷勤地接待了我。

他比上次见面时老多了。但是，他像以前一样举止文雅、有教养和可爱。<sup>②</sup>

我很高兴，这次我们颠倒了往常的做法，在去华盛顿之前先到 642 了渥太华。加拿大人肯定为这种做法而高兴。

从上午十时到中午，我们和总理举行会谈。与总理一起的只有下院的保守党领袖霍华德·格林。

我让外交大臣作大部分的发言。总理提出不少聪明的问题。他和他的部长们非常同情我们的观点，在如何处理柏林和德国问题方面完全和我们意见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我们的信任（从英联邦总理会议以来，迪芬贝克个人和我一直非常友好），或者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强烈怀疑——现在已达到实际厌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地步。<sup>③</sup>

中午，我们两人出席了加拿大内阁全体会议。

我陈述了欧洲局势等问题，以及我们对俄国的印象。他们看来对我们的做法感到很高兴。<sup>④</sup>

---

①②③④ 1959年3月18日。

与迪芬贝克共进午餐后,我们被带领到下院的旁听席,当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引人注目的场面。

总理向大家说,我们已来到旁听席,于是掌声雷动。我们站起来,鞠躬。

我们听了总理关于西德尼·史密斯去世的讲话。迈克·皮尔逊(作为反对党领袖)接着讲了话,然后是一个社会党议员讲话。这些都按照最好的议会传统进行得非常好。<sup>①</sup>

这一天其余时间都用来和部长们作进一步的会谈,双方官员也进一步会谈许多英加之间的问题。接着驻加拿大高级专员举行了招待会,在政府大厦举行了晚宴。考虑到我们很早要起程,晚宴是小型和非正式的,这使我很高兴。

次日,3月19日中午我们到达华盛顿,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副国务卿克里斯·赫脱以及我在阿尔及尔时期的两位老朋友罗伯特·墨菲和弗雷德里克·莱因哈特的欢迎。英国大使也在那里,  
643 当我们一到大使馆,他就把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

福斯特最近访问欧洲以后,卡奇亚还没有见过他。他径直到医院里去了,到现在还在那里。(附带提一下,总统在午餐前来了个电话,表示欢迎我,并且提议我们可在明天到医院去看福斯特。)

参议员富布赖特(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主席)和参议员艾肯(共和党)下午五时来,耽了一个钟头。他们两位的观点好像都很稳健和明智。<sup>②</sup>

白宫举行了晚宴,我很高兴又见到了福斯特·杜勒斯夫人。

珍妮特还和以前一样高兴——但是很自然的,她看上去已精疲力竭。

福斯特的病情似乎仍然难定。他又接受了一次新的使他非常吃力的治疗,在“阻止”癌扩散方面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除了总统隔日去看他以外,没有人去见他。他还在看文件和电报摘要,打电话到国务院。

---

① 1959年3月18日。

② 1959年3月19日。

他仍然是国务卿……这种情形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引起了很大混乱。

珍妮特·杜勒斯希望（福斯特）辞职。她告诉我她想带他离开华盛顿——去南方——耽一阵子。她很清醒地感到他不会活很久了，所以想使他余下的时光过得尽可能快乐些。但是我担心他对快乐的理解就是继续工作，所以他抓住工作不放。总统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他信任和尊重他——也不愿要他辞职。<sup>①</sup>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到白宫，受到总统一贯的友好欢迎。然后出现了一个颇带悲剧性的场面，最好用我的日记里的话来加以描述：

外交大臣和我去白宫。总统欢迎了我们，然后我们和他一起到沃尔特·里德医院。福斯特穿着晨衣坐着，他虽然由于长期生病而非常瘦，但是说起话来却很自信和精力充沛。但是这次比往常更像他的个人 644 独白，他的观点比我们上次谈话时显然更加不可改变。这是一个奇怪的场面。在“医院套间”起居室里，总统坐在一张沙发上，外交大臣和我坐在矮扶手椅上……福斯特坐在一只高得多、硬得多的椅子上，谈论共产主义、德国、柏林等等。他几乎反对一切。他强烈反对最高级会议的想法，他也不喜欢四国外长会议。他认为我们能在柏林“顶住”，而俄国人也奈何我们不得。除非俄国人挑战，否则是不会有战争的。

总统什么也没说。我说了很少几句话，可是我后来很懊悔，因为我根本不当和一个垂死的人去争论。福斯特见到我们显得不那么友善或不真正高兴了。他曾特别提出要见我，当我们告别的时候，他把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他的两只手里很久。这极好地表现了勇气和忠诚。但是我感到他的病使他的思想更加僵硬，死抱住固定的概念不放。我也为总统感到难受。<sup>②</sup>

我们在中午十二时半离开医院，然后驱车到一个海军设施，那里有几架直升飞机等候着我们。

我们在空中飞行约三十五至四十分钟，大概在下午一时半到达戴

① 1959年3月19日。

② 1959年3月20日。

维营(罗斯福的“香格里拉<sup>①</sup>)”。总统在餐前必需休息一会,所以大约到了二时十五分才用午餐。<sup>②</sup>

总统的心情极好,显然他很高兴能逃出白宫。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点,海拔一千八百公尺,周围都是森林,能俯视一个远远的山峦重叠的宽广山谷。有一座主要的平房或者叫做本加罗——一个大的“太阳厅”——内有一间可供十至十二人用餐的房间。我的卧室,总统、赫脱和塞尔温·劳埃德的卧室都在这座主要的建筑物内——非常简单,但非常舒适。其他同来的人都住在戴维营四周分散的小屋里——有的有一间卧室,有的则有两间。我们带去了布鲁克、卡奇亚、霍耶·米勒和毕晓普作为戴维营会议的常任成员。其他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直升飞机接来此地,事后回华盛顿。<sup>③</sup>

645

我们在下午三时开始会谈,断断续续一直到晚餐时才散会。

今天一整天都在草拟给苏联最近一个照会的复文,琢磨对外长会议和最高级会议怎样提法。有时候我们争论相当激烈,——说真的,就在晚餐前我冒火了,我说我要送去一份单独的照会,我们必须“同意有分歧”。总统也活跃起来了。最后,我说双方最好各自拟出草稿,尽可能地迎合对方的观点,然后我们可以“躺在上面睡一觉”,第二天达成最终结论。大家同意这么办。

事实上,总统——任其自主的话——是很通情达理的,愿意帮助人。他特别想帮助我。下午,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带我单独坐他的车去他的盖茨堡农场兜了一圈,很友好亲切。他随便地谈到福斯特,再过几个星期就必然可以决定能否抑制他的癌症。他认为他大概不大可能支持下去。但是他能指定什么人呢?赫脱很好——但是在他自己和杜勒斯生病以后,再叫一个只能用拐棍撑着走路的人来是明智的吗?福斯特从医院打电话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墨菲和利比·麦钱特都坚持国务院的观点。赫脱本人还比较能适应新的条件。他也是一个真正可爱的人。由于长期(二十多年)在政界,他比国务院的官员们更注意群众

① 世外桃源或秘密基地。——译者

②③ 1959年3月20日。

的情绪。<sup>①</sup>

整个会谈期间，美国驻伦敦大使约克·惠特尼特别对我们有帮助。他对总统好像有相当大的影响。晚餐以后，复文草稿的大问题就搁在一边了。

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叫做《伟大的国家》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这是一部“西部”片，演了三个钟头，真是百般无聊！<sup>②</sup>

国内电报开始来了，有时令人烦恼，有时令人宽慰。这次消息 646  
很好：

失业辩论显然是麦克劳德的一次胜利。比万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中自己出了丑。哈罗和贝尔法斯特两地的补缺选举进行得不错。所有的报纸花很多篇幅议论提前选举。<sup>③</sup>

第二天早上，总统和我经过大约半小时的讨论以后，彼此同意了一个互相妥协的复文草稿。

双方起得都很早，交换对彼此草稿的意见。整个精神是很好的，而且真正是合作的。麦钱特对我们很有帮助，而且我感到总统已经告诉他下边的人尽可能采纳我们的意见。所以，我想在我喜欢的许多词句和段落中间，接受一些我不大喜欢的字眼，还是明智的做法。<sup>④</sup>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接受了我们对于外长会议目的所下的定义：

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取得积极的协议，无论如何要缩小各自观点之间的分歧，以及为夏天晚些时候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准备好供考虑的建设性的提议。

我们不得不接受总统提出的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公式，大意是说“一旦外长会议的发展情况保证能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政府首脑将乐于参加。我们把这份必要的电报寄给了法国和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尽管我心里有些担心，但没有一个

①②③ 1959年3月20日。

④ 1959年3月21日。



国家提出任何异议。按照在戴维营商定的词句，3月25日在莫斯科递交了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的联合照会。照会事实上建议外  
647 长们应当在5月11日在日内瓦开始他们的会议，同时应当提到安排一次最高级会议。3月30日，收到苏联表示同意的来文。这样，莫斯科访问的初步成果告一段落。我们现在必须等着瞧会议将有什么结果。

我们在戴维营讨论了最高级会议以后，又继续对德国和柏林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我的日记上有摘要：

在封锁发生时对柏林采取紧急措施的计划。美国国防部的人们好像比他们在几个月和几个星期以前现实多了。现在我不怕他们会采取任何危险的行动（除非某些将军变得难以约束）……我们长久地辩论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非委任人员代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员签署护照，直至拒绝我们军需品通过等不同的情况下应当怎样正确处理。大家最后好像认识到西柏林二百二十五万居民借以生活和生存的民用运输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重要。由于目前还没有一个字提到要停止民用运输，我们应当小心不要采取行动——在有关我们的军事运输方面——以免导致普遍封锁。果真那样的话，真正是我们自己封锁了柏林。

后来转而讨论关于“在一致同意的地区限制和检查军事力量”的想法。总统（不顾他的军事顾问们差不多异口同声的反对）相当喜欢这个想法。他很明白如果我们要抵制危险的拉派基计划和所谓的“解除义务”，我们必须提出些建设性的东西。总统感到我们应该搞出一些大的和富有想像力的建议来，而不能常常被迫单纯表示否定的态度。内森·特文宁将军听了这话似被刺痛了。<sup>①</sup>

需要讨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复杂的问题，是停止或限制核试验。在我去莫斯科以前，我和总统就已着手研究在监督体制方面作出让步而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但是进展甚为缓慢，到3月10日由于苏联代表仍然坚持在检查小组问题上使用否决权，总统告诉

---

<sup>①</sup> 1959年3月21日。

我，他认为只要表示西方不愿再让步，这是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时机。我在3月13日的一封信里接受了这个主意，但是我考虑到应 648  
同时宣布日内瓦会议复会的日期。总统也同意了。因而，我们在戴维营的时候，长时间地讨论了会议前途的问题。

虽然没有作最后结论，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能让这次会议失败。如果会议破裂，最好让它在俄国人对监督问题不肯让步的问题上破裂。即使那样的话，也许还可能就突出的分歧意见发表一个一致同意的声明，然后希望在最高级会议上予以解决。

我问他如果俄国人在监督问题上并不固执己见怎么办，总统说我们就签订至少三或四年的协议（关于大气层的试验），可是地下试验暂且悬着。他知道他的顾问将会大吃一惊，他和福斯特两人都认为政治上的好处将超过技术上的害处。我很高兴听到这个看法。<sup>①</sup>

3月22日星期日，总统和我到邻近一个村子的教堂去，他在那里的礼拜仪式中诵读了圣经。在这时候我们的顾问一般地讨论了中东和远东的问题。

我们回来以后，就开始讨论中东问题，对于我们能一起做什么，或者不能一起做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对付的危险，大半取得了一致意见。美国人并不想把我们使劲推向纳赛尔的怀抱，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对伊拉克很担心。<sup>②</sup>

在这一天，我们还很好地讨论了经济问题。在我们这方面，

我们相当有力地一一就关税、限制进口量和取消合同方面的事诉说了我们的不满。情况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所有“有关电气的”合同都将被取消。

总统和赫脱都正式宣布他们是相信“自由贸易”的。但是，他们对他们的困难也说得娓娓动听。国会是对立的；流行着游说议员和互相吹捧的风气；共和党与民主党一样不好控制，而民主党员（不管他们说了些什 649

---

①② 1959年3月22日。

么)又与共和党员一样是保护贸易主义者。这对我们的抗议真是一个可悲的答复。这是我们会谈过程中总统第一次真正受窘。但是,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希望这次讨论会有帮助。①

我们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继续对华盛顿施加压力,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是,他们取消了对于某些大型电气器材的禁止进口令。过去他们在花费很多钱赢得合同以后,往往任意借口国家安全而实行这种禁令。

我们于下午四时坐车离开戴维营。总统在车上

广泛地谈论了世界的未来。他确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虽然粗鲁,说话不够文雅,但是他有一些很不平常的思想。②

他谈到的主题是需要使自由世界的国家“制度化”。英国和英联邦、欧洲和美国,都应当设法去发展抵抗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更加准确的方法。

他相当详细地发挥了这个主题——可以将货币、关税和其他一切政策都统一起来,我们的力量合起来就会更大——比我们分散的力量大三四倍或者还多,而在分散的情况下,不管我们如何紧密合作,都不行。因为我们目前的合作过多地依靠个人的因素,像我们之间的友谊一样。③

在回去的路上,

我们去福斯特·杜勒斯家看望了他(他刚离开医院一两天,要回去作进一步观察)。他看来比星期五那天好多了——几乎换了一个人。他的谈话明智多了,对戴维营所作出的决定好像也没有什么反感。毫无疑问,星期五那天他那种不妥协态度是他的身体软弱和以前那些极不好受的日子造成的。④

650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杜勒斯。他于4月15日辞职,5月24日去世。尽管有许多缺点,他具有一种伟大的特色——他是一个

①②③ 1959年3月22日。

④ 1959年3月23日

奇怪的、基本上孤独的人。

第二天下午，在通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后，我们与道格拉斯·狄龙和罗伯特·安德森举行了虽然坦率而始终友好的会谈。

我们满意地与狄龙公司谈了一次美国的关税保护主义，特别是限制羊毛进口量以及对待同我国所订电气机械合同的不体面的做法。困难在于他们虽然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面对着在这些问题上控制着美国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毫无办法。<sup>①</sup>

在白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一份我们一致同意了的讨论和决定的记录上签字，然后向他们道别。下午五时，我会见英联邦各国大使达一个钟头，向他们叙述了我们自2月20日以来的访问情况。下午六时，副总统尼克松举行宴会，到会的有许多重要的参议员和国会领袖，包括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

他们使我们度过了极度疲劳的一个多小时——这是一种很有益的锻炼，因为这些都是真正支配国会的人物。<sup>②</sup>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家。因我决定访问莫斯科而产生的这一连串的冒险旅行现在结束了。我们只能满怀希望等待事态的发展。在此期间，在外长会议以前与俄国人又发生了些小的冲突，这在我看来是会议的不祥预兆。

我象通常那样向英联邦各国总理、戴高乐和阿登纳报告了在华盛顿发生的情况。德国总理在他的复信中表示担心，生怕西方国家还不够坚定。其中一段就流露着这样的心情：

我真诚地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西方的自由人民在与赫鲁晓夫讨论的时候能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我从德国国社党时期所得到的经验中知道，在谈判进行中，独裁者是怎样强硬地坚持他的立场，他可以根本不理睬对舆论的任何影响和本国议会的意见。在国社党统治期间，我懂得了在自由人民中间要激励起一种团结的精神以对付独裁者希特勒是一桩多么艰巨的工作。我最诚挚地希望我们都能吸取历史教训，把分

<sup>①②</sup> 1959年3月23日。

歧意见丢掉,把使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事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我也向下院作了通常的报告,会开得很不错。4月2日至4日在华盛顿召开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十周年。

华盛顿打来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电报并不很好。德国人的举止十分粗鲁和愚蠢,法国人和他们一起攻击英国的“失败主义”。这与德国的部长、官员们、冯·勃兰登纳、叔本堡等人以及顾夫·德姆维尔和约克斯先生他们的真正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德国人害怕阿登纳……法国人也同样害怕戴高乐。德国在财政上和在经济政策方面——特别是对法国的“保护贸易主义”进行帮助,而法国也愿意从政治上支持阿登纳作为报答。美国人群龙无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都离开华盛顿去南方——前者去度“高尔夫球假日”,后者恐怕不久人世)。<sup>①</sup>

日内瓦会议休会后就要复会了。不幸的是自从一年前专家们的报告出来以后,科学方面的看法有了改变。现在人们相信,比以前估计大得多的地下试验不再发生是可能的。但是总统急着想复会以前采取一些行动,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交换了许多信件以后,决定了一个政策。美国重新表示,如果俄国能不坚持在一切监督措施方面使用否决权,并在实行控制方面不是一点也不让步的话,美国打算签订一个包括一切试验形式在内的综合性协定。如果俄国不愿意或不能在这基础上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准备接受一个有限的协定,禁止在离地面五万公尺以下的高空进行大气层试验。没有周密的监督,这个协定也可以付诸实施,毕竟这些试验对人类健康是最为有害的。与此同时,对如何有效监督五万公尺以上的或地下的试验,应当继续进行研究。

很不幸,俄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赞成。真的,赫鲁晓夫现在开始妄图破坏西方国家的团结。他寄给我一封长达九大页打得密

<sup>①</sup> 1959年4月4日。

密麻麻的信，是4月14日签发的。信的大部分都是用来有点过分地赞扬我去俄国和访问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所作的努力，同时表达了能很快安排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希望。但是这信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攻击美国的侵略性和“他们的军事首脑们所作的愚蠢的煽动性声明”。这封草拟得很巧妙同时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信，使我有点为难。在简单地致谢以后，我提醒赫鲁晓夫我们还在等待对我们几天前送去的关于至少实行有限禁止试验的建议的答复。我还告诉俄国大使说，虽然我把这封信看作是一封私人信，但是我要把信中对召开外长会议的建议以及对可能召开的最高级会议的看法部分，告诉我的法国、美国和德国同僚。我这样做是为了向我们的盟国明白地指出，赫鲁晓夫显然想在英国和她的朋友中间打进一个楔子，他真正害怕美国的力量，急着想开最高级会议。紧接着这封信，赫鲁晓夫就欧洲的导弹基地向美国和德国提出了抗议。在最后答复我们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的建议时，他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有限禁止的建议，理由是它“没有解决军备竞赛问题”。与此同时，他接受了我于莫斯科谈话时提出的建议，即关于就地调查可疑现象的次数，双方可以限于每年三至四次。经过考虑，我们盟国不能接受这个建议。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都正确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试图在外长会议召开以前在我们之间引起麻烦。 653

在谒见女王的时候，我相当详细地提到了赫鲁晓夫的私人信。4月21日访问温莎以后，我给女王写了如下的信：

鉴于陛下对赫鲁晓夫给我的私人信件表示了这样大的兴趣，我将准备一个副本送呈。我认为这封信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信里提出的建议，而在于信的语气、性质以及这次通信的方式。这信和他间或寄来的平常的争论信件很不相同，那种信差不多在收信者拿到手以前就已经被他发表了出去。我认为这封信有几分诚意。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和苏联政府——其实就是赫鲁晓夫总理——在谈判方面取得进展，那么从心

理学的观点看来,研究一下这封信是值得的。

因此,在给赫鲁晓夫写复信的时候,我想聪明的做法是用同样的语气,尽我所能地写得长一些,因为给这么一封冗长的信件只写一个简短的答复似乎是很不礼貌的。于是我一开始就向赫鲁晓夫保证,不管所有国家的军方人员偶然作出什么愚蠢的声明,但就我个人所了解,美国的领导正在急切地为和平而努力: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熟识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十七年左右了。我也认识他的大多数重要顾问和朋友。我绝对相信美国政府并没有你担心的那种意图,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人,他们根本反对在世界上造成这一切惨祸。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第二,他们相当了解苏联的军事力量而不会低估它的。因此,这样一种政策除了是错误的以外,也是愚蠢的,因为谁也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一次核战争结束时每个国家会遭受多大程度的损害。我真正希望你消除思想中认为美国人有任何这种意图的疑虑。我相信哪怕你仅仅回忆一下在日内瓦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次短促的会晤,你就会相信我的话的。

我在提到3月份我们签订的那些英苏协议以及商务大臣即将访问莫斯科以后,主张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最好方法是,那怕缓慢地,但要扎扎实实不停地讨论可能引起麻烦的问题,而且试图一个一个地去处理它们。赫鲁晓夫在他的长信里重新提出了英国和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想法。对此,我说,

重新建立国际信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坚定和耐心地讨论把我们分开的那些问题,用这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希望,在解决了我们的几个分歧意见之后,将为我们寻求更广泛的一致意见建立信心。

签订正式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能代替这种消除误解和解决分歧的过程。条约本身不能提供我们需要的国际信任。尽管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不得不正式宣称放弃侵略,遵守宪章的各项条款,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之间产生的恐惧和疑虑。因而在我看来,互不

侵犯条约不能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它应当是我们为达到更好的国际谅解而正在作出的努力的顶点。但是我真诚希望，如果那些努力成功的话，我们可能如愿以偿地签订一个世界所有大国都能参加的正式的多边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正如我在莫斯科告诉过你的，我愿按照我在莫斯科提出的方针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声明，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有益的话。

在这令人焦虑的时候，反对党是体谅的，没有逼着要太多的情报。4月27日举行外交事务辩论，但我认为不必去参加。比万明确宣称，如果工党再度执政，他们将立即停止一切原子弹和氢弹试验，这使他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更为混乱。辩论“很平静地结束了——外交大臣发表了一篇极好的演说，调子虽低，然而却是实事求是的。”<sup>①</sup>

这次同赫鲁晓夫私人通信的事有点使人们担心。戴高乐很平静地只把它当作是要花招。阿登纳比较忧虑，他在4月30日来信：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和赫鲁晓夫进行书信往来是一个坏主意。这很可能会给苏联独裁者造成一个印象，认为他确实能成功地在西方阵线中打进一个楔子。

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我的诚实，现在他经常给我寄来有关他自己许多问题的机密信件。可是，鉴于和总统的长期友谊和密切关系，我想应该把赫鲁晓夫和我自己私人信件的原文包在一起，通过英国大使给总统送去。我请他阅后还我。除了外交大臣以外，别的人都没有看过这些信。正如我告诉卡奇亚的，我甚至没有向内阁提起过。我想保守这个秘密是件好事，“因为我想保持这条线路可能有用——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可能有用，虽然这不一定能获得成功。”

---

<sup>①</sup> 1959年4月27日。



5月7日，美国驻伦敦大使把总统下面的一封复信交给了我：

感谢你5月5日寄来头等机密文件和你的信。我是完全按照你说的那样处理的；我没有留任何抄件。现在我把两份附件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经由英国大使馆送还给你。

你最近对赫鲁晓夫来信所作的提要，已经使我对整个文件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了解；但是，你努力要确保你和我个人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尽可能保持密切关系，对于你的这种关心，我确实铭感在心。

656 我还想说，我完全同意你的复信。信写得彬彬有礼，但是不够坚定。

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世界长期斗争中的这个阶段，就以这样捉摸不定、甚至忧心忡忡的调子结束了。很多事情将决定于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我很清楚，俄国人将回避任何真正的谈判，而仅仅想把它当作一个准备会议，来定下他们所希望召开的最高级会议的程序和日期。同样可能的是，除非外长会议取得合理的进展，总统不会同意召开最高级会议。我感到我定会被逼处于这两难的境地。同时，我们必须等着瞧事态的发展。走向最高级会议的道路看来真是又曲折又多险。

## 第十九章 塞浦路斯纠纷

657

塞浦路斯问题早在我任外交大臣的短时期内就曾使我花过那么多徒劳无功的心血，<sup>①</sup>到了我刚一任首相，它就又以一种令人苦恼的形式卷土重来——当时决定解除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塞舌尔群岛的监禁，造成了我的同僚和老友索尔兹伯里勋爵辞职。<sup>②</sup>虽然政府渡过了索尔兹伯里勋爵事件的冲击，但到1957年春，我们又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入一个苦恼而且有时是很危险的历程，注定不再用上两年工夫是解决不了的。

1955年夏季在伦敦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举行的会谈<sup>③</sup>至少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塞浦路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殖民地”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争端。土耳其政府的立场是比较简单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急于要保护岛上土耳其族居民的利益，同时也承认那些人只占人口中的少数。因此，任何有关自治政府的计划都必须包括对他们的保护条款在内。如果这些能得到保证的话，或许能劝说他们同意以自治政府来代替分治。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允许塞浦路斯成为对他们自身安全的威胁的解决方法。不错，土耳其已经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希腊结盟，然而，鉴于塞岛的地理位置濒临土耳其海岸，控制着乃至威胁着它的主要港口，所以绝不能允许它落到一个政治上可能敌对的国家手里。自从1944年以来，土耳其人就一直注视着共产党在希腊夺权的历次企

658

① 见《时来运转》原书第660页以下。

② 见本卷原书228—230页。

③ 见《时来运转》原书第660页。

图。他们唯恐共产党重新抬头，所以强烈反对塞浦路斯并入希腊联合体。

希腊政府的立场就要复杂得多了。没有任何一个忠诚的希腊人能把塞浦路斯看作是什么其它的东西，而只能是希腊尚未收复的最后一块国土。然而历届希腊政府都真诚地关怀他们和土耳其的关系，并且担心损坏和解的成果，那是经过整整一代的努力才缓慢而又痛苦地取得的。所以，希腊人真诚地希望和平解决。但是除了独裁时期而外，要使任何希腊政府忽视在希腊和在塞浦路斯本身所进行的民族统一运动及其对“意诺西斯”——即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的要求所激发起来的那种情绪，那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端困难的，哪怕政府试图控制那种情绪也罢。使得希腊政府的立场进一步复杂化的，还有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活动和由那位深得许多希腊爱国者钦佩的格里瓦斯将军所领导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位主教和这位游击队领袖都是经常使人担忧和焦虑的原因。由于有这些互相矛盾的压力，任何希腊政府的谈判能力就只能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显然是“意诺西斯”运动的倡导人，但他的立场也由于他本人的利益以及教会的利益而复杂化了。作为大主教，他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在土耳其占领之下希腊权利与利益的宗教保护人的那一悠久传统。可是，如果塞浦路斯马上并入希腊，却会使他在多方面陷入窘境。因为在塞浦路斯，教会既有精神方面的又有物质方面的利益。物质方面的利益很可能由于与希腊合并而有失掉的危险，因为在希腊，无论在地位方面还是在财产方面，教会已经被历届政府，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改造而养成一种伊拉斯塔斯派<sup>①</sup>的传统。同时，塞浦路斯希腊族革命组织内左派与共产主义分子势力的增长，也使他感到焦虑。虽然作为一位

<sup>①</sup> 伊拉斯塔斯，十六世纪瑞士神学家，主张由国家支配宗教。——译注

教士来说,大主教不能不为恐怖主义的行动悲叹,但作为一位政治家来说,他却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有效地加以制止。马卡里奥斯是“自决权”以及继而与希腊合并的公开拥护者;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引导他接受与“独立”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自治”。659

至于人民本身,虽然政治家和煽动家都以他们的名义那么信心百倍地提出各自的主张,但他们要了解事实真相却是十分困难的。塞浦路斯的生活水准确实要比任何希腊岛屿都高。有意义的是,在移居别处的相当大量的希族塞浦路斯人之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激于爱国心而移居希腊。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宁愿参加在联合王国(特别是在伦敦)已经十分兴旺的塞浦路斯人社会。<sup>①</sup>

在这种形势下,1957年春我的思想转向另一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可敬的甚至是《圣经》般的权威性。现在能不能把当初所罗门在类似的困境之下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提出来,作为摆脱我们困难的一种可接受的出路呢?或者说,这种措施的威胁性能不能给争夺者们带来一种现实感呢?如果分治能成为一种实际的答案,那么我们只需关怀无论是就保护我们在中东的利益来说还是就支援北约组织的右翼来说都是如此必要的那些军事基地和设备的前途就够了。于是,我和国防大臣讨论过之后,就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在诺曼·布鲁克爵士的主持之下来对基地的全部问题做一次新的探讨:究竟塞浦路斯是由希腊人与土耳其人分治呢,还是要真正独立而只在军事区域内保留英国的实际控制权呢。

大主教于4月17日回到雅典,但没有准许他进入塞浦路斯。究竟他在雅典还是在尼科西亚更加令人讨厌,这很难说。同时,在雅典和在安卡拉压力都在有增无已。土耳其政府本身现在已经提

---

<sup>①</sup> 1956年有三千六百八十七名希族塞浦路斯人移居英国和英联邦,仅有六十七名移居希腊。(《英国议会议事录》,书面答复第128辑,1957年4月10日。)

出分治。议会里的辩论马上就非进行不可了，但我们仍然还没有明确的或是肯定的计划。虽然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把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划分成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并且具有通常的边界纠纷以及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利；然而不管多么地不情愿，我在自己的心里却开始感到，“恐怕分治将要成为唯一的出路了。”<sup>①</sup>

可是，7月的第一个星期，大臣们和其他一些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好不容易地搞出了一项新方案：

下午四时举行塞浦路斯会议。出席者有巴特勒，塞尔温·劳埃德，伦诺克斯-博伊德，桑兹偕同空军元帅迪克森；还有诺曼·布鲁克，霍耶·米勒（外交部），陆军元帅约翰·哈丁爵士（总督）。我们一直谈到八点，然后进餐。下午十时，我发表了一篇关于联邦会议的广播和电视演说。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塞浦路斯问题。这确实是我所能回忆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几乎对每一种可能的方针都有反对意见。尽管恐怖主义运动暂时平静下来，但哈丁认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下届联合国大会之后会重新把它发动起来的。在任何情况下，今后几年中要守住这个岛屿，都得使我们动用超乎我们所能提供的兵力。（如果是工党碰到这个问题，他们不管怎样都会放弃这个岛屿的。）要是我们把它交给希腊，那么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就会发生一场战争。如果我们搞“分治”，那就是自认失败——这也许就意味着岛上的内战，继之以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全面战争。我们确实只不过是为我们自己、为了巴格达条约以及中东和波斯湾的总防务而需要空军基地罢了。我们捉摸出一项新计划——它在夜深里看来似乎很不错，但恐怕到了明早就未必那么美好了。<sup>②</sup>

这个新计划规定了英国军事飞地的界限，在这种地方将保留英国的全部主权，而岛上其余部分则由共享主权的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共同管理。这三个国家将通过一位指定的总督共同负

---

① 1957年5月31日。

② 1957年7月7日。

责外事和某些保留事项。如果三国在总督人选上意见不一致，那么他将由北约组织理事会缺席任命。在有关内政问题方面，则将根据拉德克利夫勋爵报告<sup>①</sup>中提出的总路线建立责任政府，采用三重主权或三方统治的办法。将由两个议院（希腊、土耳其各一）<sup>661</sup>处理自治体的事务。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由总督处理，并由双方议院各自选出希腊人四名、土耳其人两名组成六人委员会予以协助。

大体轮廓在以后的几天里拟定，7月10日我写道：

今天的大事是开了一次漫长的——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塞浦路斯防务委员会的会议。参谋长们从纯粹军事观点出发，似乎对这项新计划非常高兴。<sup>②</sup>

次日，又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内阁会议，讨论由我和殖民部与国防部密切磋商后所提出的文件。

我（或者不如说诺曼·布鲁克爵士）[把它]提了出来。（他拟稿，我仅仅是改定。）我并没有企图得出决定。大家对我所提出的两点进行了极好的讨论：（1）这是一个好的计划吗？（2）如果是好的，那么应该在什么时候并怎样付诸实施呢？<sup>③</sup>

我们当时正接近

[议会]会期的尾声——这往往是最危险的几周。在苏伊士问题上我已经十分严厉地考验过党，现在我不愿再用“塞浦路斯问题大出卖”而引起惊慌。而且还有“裁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已经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且显然正在集中精力搞“禁止核试验”（这是流行的呼声），而这跟常规武器或进一步的核裁军毫无关系。再者，还有关于“经济形势”的新的人心动荡——币值猛跌，最近煤炭、煤气、电力、运输等费用上涨，群情惶惶。……此外，我们还有电话窃听、议员的薪金等等问题，

① 见本卷原书第224页。

② 1957年7月10日。

③ 1957年7月11日。

还有给予从埃及逃出的英国难民赔偿这样一个难办的问题。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不到议会闭会之后，我是并不急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执行一项新政策的。<sup>①</sup>

7月16日

662 内阁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就我们应该遵循的政策(关于三重主权的概念)达成了广泛的协议。但最困难的还在于：(a)制定，(b)提出，(c)完成。<sup>②</sup>

继内阁会议之后，靠了我自己班子的协助，我得以在7月26日拟定并分发一份关于执行这些决定的详细方案。首先，我们必须组织一次有关各国的会议。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取得美国政府以及身为北约组织秘书长的斯派克先生的支持。我愿意表明：尽管我们并不拘于某种特殊的解决方案，愿意考虑各种抉择，但是，任何可接受的方案都必须允许联合王国政府保留其最低限度的主要军事设施于英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必须保护塞岛不受共产党的渗透，而且必须保证和平与安宁。

起初，前景似乎是很有希望的。福斯特·杜勒斯这时正访问英国，已经准备给予充分的支持，并且斯派克也像往常一样地帮忙。但是到了8月9日，

希腊人拒绝了我们建议召开会议的试探(或者说非正式的邀请)。我们决定不把这一拒绝当作是答复而重新发出邀请，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重要的是，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应该在每一步都掌握有某种东西使我们能处于一种良好的地位。我们的真正困难在于使希腊人来参加能让我们的计划得以展开的任何一种会议。我已经提示外交大臣，我们可以利用北约组织。这一来，我设想，土耳其人是会反对的。<sup>③</sup>

---

① 1957年7月11日。

② 1957年7月16日。

③ 1957年8月9日。

正如我所担心的，我们驻安卡拉大使詹姆斯·鲍克爵士立即打报告来说，凡是希腊人可能接受的东西，土耳其人同意的希望都是微乎其微的。

确实，在这个考验人的夏末是很难采取一种不偏不倚公允的观点的。这个小小岛屿的事情竟然把许多重要国家都卷入一片纷乱，把北约组织的伟大联盟置于险境，并造成联合国里的一场激烈争辩；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局势依然好像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力要把三个或者更多的球一举投入它们的正确位置而总是落空的那样；或许两个已经落到定位上，而第三个却马上又跑了出来。凡是土耳其可能同意的，希腊就会反对；凡是希腊可能要求的，土耳其就会阻挠；凡是马卡里奥斯可能倾向于接受的，格里瓦斯将军领导下的塞浦路斯希腊族革命组织就会拒绝。英国的兴趣只在于维持塞浦路斯岛上的和平，维持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和平，确保对东地中海防务和对抵抗共产党侵略是如此之重要的基地，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兴趣。可是，在我们本国的议会里、在联合国的走廊上，以及在全世界被称为“进步的”思想界中，英国却被讥骂成倚仗它的军事强权在推行一种陈腐的殖民主义，并且运用一位高级军事总督作为它的工具。 663

8月2日，在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的防务委员会会议之后，我发觉，不管是由于我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由于疲惫，下午两点三十分的内阁会议是非常之难于掌握的：

人人在这个确实可怕的年度（1956年7月—1957年8月）行将结束之际都是那么地精疲力尽，以至于内阁开始争执，并且几乎吵了起来。于是我把他们都遣散了。<sup>①</sup>

与此同时，

报界也很可怕——它一天不如一天。有一种受虐狂缠住了他们，

---

<sup>①</sup> 1957年8月2日。



那简直要发疯。没有一件事是对的；人人都错了。①

我觉得这条记载反映出了我自己的身心憔悴。那实实在在是坎坷艰辛的十二个月。纳赛尔于1956年7月底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现在到了1957年8月份，对于经历了那些艰险岁月的风浪而挺了过来的人们来说，感到有点焦灼不安恐怕是情有可原的吧。可是我当时却以更深一层的思想自慰。至于报界的攻击，

我觉得这反映了我们人民生活极其高度的舒适和幸福。当局势确实困难的时候，就连报纸也是不会抱怨什么的啊。②

664 如果说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一桩令人满意的事，即由于美国的帮助我们得以阻止希腊人在联合国里纠集足够的票数来通过一项要求自治的决议，那么到了秋季，我却必须面临一个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1955年，陆军元帅约翰·哈丁爵士在首相艾登的迫切要求和殖民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的极力敦促之下，出于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同意继续担任他那悠久而功勋卓著的公职，暂不退休。他任总督期间，曾经极大地改进了安全机构。尽管以英国公众或英国军队所能容忍的方式不可能彻底制止恐怖主义运动，但形势还是比以往控制得好得多。凡是为他服务过的人，约翰爵士都能获得他们对他本人的深刻忠诚。此外，在谈判中他表现出既有技巧又富于同情心，并以他的正直和真诚给一切有关的人，哪怕是最难对付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大主教是称赞他的。然而他感到（并且我也只能同意他的看法），在新的形势下，就我们所试图推行的新政策而言，无论我们的计划最终可能采取什么形式，他当前的任务是已经完成了。他的退休于10月中旬宣布，次月初回国。10月17日我写给他一封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

①② 1957年8月9日。

我不能允许不让您本人得知我的感受，就发出有关您即将离开塞浦路斯的公告。您担任塞浦路斯总督期间，始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杰出典范。1955年当我的前任请求您担任这个工作时，您那么欣然地抛开了安享退休生活之福的那种非常可以理解的愿望，这使我们大家都非常钦佩。我不能想像还有什么人承担比这更加艰巨的任命，我也不能设想还有什么人能以更卓著的功绩来完成这项工作。

在您的全部任职期间，塞浦路斯始终是激烈的政治与国际争论的中心。这使得您的工作倍加艰辛，但您却以那样的勇气、公正和巧妙把握着您的航程，以至我毫不怀疑，人们将长久地满怀自豪来怀念您的总督任期，哪怕是那些不同意我们政策的人。 665

哈丁夫人那么高尚地分担了您的重任，对此我们大家都满心钦佩。现在，我衷心祝愿您们两位都能充分享受您那姗姗来迟的退休生活。在向您致以我良好的祝愿时，我希望我能向您表达出国家对您的伟大功绩所怀感激之情于万一。

在和殖民大臣以及其他人士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把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交给殖民部的一个成员，此人声誉卓著，普遍地被认为是部里的第一流人物——休·富特爵士。他在很多岗位上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最成功的行政官和谈判家。自从我第一次遇见他起直到这场纠纷结束为止，在我和他的全部接触中我都发现他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忠诚不渝。当然，我也察觉到 he 像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一样，从他那克伦威尔派的祖先那里继承下了过激的见解。但是，我终于相信了这种名声可能会促进而不是拖延对塞浦路斯问题某种解决方法的探讨。他的夫人又可爱又能干。正如我的一位幕僚所说的，“富特夫妇在那个可爱岛屿的山地上一定将干得很漂亮，而且会‘带给它喜讯，并宣布和平’。”

1958年1月6日，休·富特爵士出席了一次内阁全体会议。这不是个很吉利的时刻，因为已如前述，这次会议恰值财政大臣辞职，而且后来证明，这成为了政治术语所谓“一场头等的内阁危

机”。<sup>①</sup>在向大会介绍休·富特爵士之前，我确实是不得不先宣读桑尼克罗夫特先生的信件。在打发了这段公事之后，我就安排休爵士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着手讨论整个局势，包括

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新计划……我对它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我并不认为希腊人也好还是土耳其人也好会认真实行的；不管是在地方上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但是，听听休·富特爵士的意见，对我们会是有帮助的。<sup>②</sup>

666 1958年的头几个月里，大使们之间的非正式谈判表明，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都不大对我们的新计划感兴趣。他们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显示了这两个政府要坚持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的坚强决心。希腊人是不会同意任何放弃“意诺西斯”的作法的；土耳其人则怀着同样的激情不肯取消分治的要求。于是就提出了某些试探性的建议，那就是允许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双方都在岛上拥有军事基地的办法或许能有所裨益，尽管很难看出何以加进了更多的纠纷因素居然可能维持和平。

当时出现了许多起希腊居民和土耳其居民之间的严重冲突，以及反对英国人的恐怖活动。外交大臣于2月初访问雅典后报告说，希腊人可能准备接受建立土耳其基地的主张，如果从此永远排除分治的话；但是他们同样要求应该采纳“意诺西斯”原则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们同意把我们的计划视为一项临时建议，以七年为期，在此期间该岛的国际地位不予改变。我们希望，这样把我们的方案从一种最终的解决办法改为一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之后，能够应付敌对双方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反对意见。

同时，美国人确实是尽了他们的努力，既用外交压力又用辩论

---

① 见本卷原书366页以下。

② 1958年1月7日。

来支持我们。在5月6日于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组织外长会议上,外交大臣对希、土双方都再一次做了工作,但毫无结果。杜勒斯当时也将出席哥本哈根会议,为了获得他的全力支持,在外交大臣临行前,我交给了他如下的备忘录: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三方统治体的计划继续搞下去的话,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它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对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东西,而且我们的的确确相信它。因此,我希望当你同杜勒斯谈到它的时候,你务必使他知道,我本人准备冒极大的风险,并作出我所能作的全部努力,来说服我国人民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使大家相信这是一个好计划,甚至是一个高尚的计划——是西方国家在大得多的危险面前能够怎样消除他们之间的老分歧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一点说服了美国人,那么去说服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背后增加很大的份量。但是我认为杜勒斯不会这样做,除非他确知我们确实有意把这当作我们的计划而认真加以实行。我也认为这个计划很可能适合总统的胃口。它将非常符合他所提倡和实行的那种精神——盟国合作。 667

我的同事们坚决主张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我们的提议迄今还仅仅是件秘密讨论的事。但这样一个时刻必将很快地到来,那时如果不能以这种方式取得更多的进展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公诸于世,以期把争论的各方带到一个更理智的立场上去。

尽管有着黎巴嫩危机和铁路罢工等分心之事,我还是于5月11日星期日在契克斯首相官邸召集了一次会议,以期在细节问题上达成一致。出席的有塞尔温·劳埃德,伦诺克斯-博伊德(殖民大臣),休·富特爵士(他是专程为这次会议回国的),诺曼·布鲁克爵士和其他一些官员。会议开了一整天。虽然下午六点钟我必须从契克斯去伦敦同几位有关铁路纠纷的大臣开会,但在这一天里我们还是取得了确实的进展:

总督是十分有帮助的,我深为他的热情所感动。经过几个小时的

讨论后，拟出了一份新草案，其中包括：(a)富特总督关于内部自治政府的计划；(b)我们原定关于“三方统治体”的外部解决计划。<sup>①</sup>

议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始终是非常之有耐心，并没有向我们施加压力。事实上，自从上次辩论至今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年了。毫无疑问，这部分地也是由于有那么多的其它麻烦问题占据了他们注意力的缘故。所以，当殖民大臣于5月19日做了保密声明，说明由于各有关政府尚在进行秘密磋商，所以政府新提议的详情还不能公布于众。下院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解释。

668 最后，6月5日我们训令驻安卡拉和雅典的大使于6月10日把我们所提议的计划全文送交土耳其和希腊政府。6月7日，我启程去华盛顿；当我在那里时，由于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骚乱有增无已，我收到一封电报提示我应该要求美国政府运用它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来约束骚乱的支持者。但是，两族间的冲突却继续扩大。不过，总督是坚定的，他完全掌握着局势。

对我们正式通知的第一个反应来自土耳其总理阿南·曼德列斯。它令人失望。总理声称，除了分治而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减轻土耳其人的恐惧，虽然分治本身是土耳其方面的一大牺牲。他竟不顾在以往的商谈中他曾以我们的原计划不是临时性的为理由而加以反对这一事实，现在却说它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除非塞浦路斯的国际地位得到最后肯定，此外没有任何计划……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获得成功的结果。”

6月21日希腊人提出答复时，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态度。他们现在反对土耳其在争端中扮演任何角色，理由是根据洛桑条约土耳其已经放弃了全部权利。这似乎是一个离奇的论据，因为就在同一个条约里，希腊同样地接受了英国合并

---

<sup>①</sup> 1958年5月11日。

该岛。<sup>①</sup>

6月16日的北约组织理事会对我们的努力表示欢迎，除了希、土两方代表自然要保留他们的立场而外，一致加以赞扬。因而我从华盛顿回来不久，在同盖茨克尔及他的几位同事谈了话之后，就在6月19日以在议会中声明的形式正式提出了英国政府的建议。虽然最终的协议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并且幸而也是更为持久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尤其是我们推行这一方案的决心——除非能另有其他更满意的计划为人同意——所产生的动力，乃是九个月之后达成协议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回顾一下那个公认为是一项建设性的而又富于想像力的政策的各项条文，该是很有趣味的。

我申明，我们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达成一项为塞浦路斯岛上的两族并为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都能接受的安排，而以确保英国的基地与设备的安全为条件。然后我说，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是带头摆脱目前的僵局。我继续说：

下面就是这一伙伴计划的大纲。

塞浦路斯不仅应享有与联合王国因而与英联邦相同的种种利益，而且还应享有与希腊和土耳其相同的种种利益。

既然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政府都在塞浦路斯具有利害关系，女王陛下政府将欢迎其他两国政府的合作和参与，共同努力促成该岛的和平、进步与繁荣。

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将被邀请各指派一名代表来与总督合作执行这一政策。

该岛将采用代议政府制，各族在各自区域性的事务方面实行自治。

为了满足希族和土族塞浦路斯人要求被承认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愿望，女王陛下政府将欢迎一项赋予他们以希腊国籍和土耳其国籍的安排，同时使他们得以保留英国国籍。

<sup>①</sup> 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规定英国合并塞浦路斯。——译者

为了保障在必要的稳定气氛之下充分实现并执行本计划中的伙伴关系新原则所需的时间,该岛的国际地位在七年之内将保持不变。

代议政府制和区域性自治将与两族的代表并与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的代表协商制订。

新宪法的根本条款为:

(a) 两族将各有其自己的议会,议会对区域性事务具有最高立法权。

670

(b)除区域性事务与内部治安外,对内行政权将由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由总督主持,包括希、土两国政府代表及议会所选出的六名阁员,其中希族塞浦路斯人四名,土族塞浦路斯人两名。

(c) 总督与希、土两国政府代表协商后行使职权时具有保留权,以确保两族的利益获得保障。

(d) 外事、防务及岛内治安将作为特别保留事项,由总督与希、土两国政府代表协商后执行。

(e) 希、土两国政府代表有权要求将他们认为有歧视性的任何立法留交给一个公正的法庭加以审议。<sup>①</sup>

我以如下的话作为结束:

假如这项政策的全部好处都得以实现,那么显然,暴力行动就一定会停止。为此,女王陛下政府准备继续采取步骤放宽“紧急状态条例”,进而最终结束紧急状态。这一过程将包括使目前在“紧急状态条例”之下被驱逐出本岛的塞浦路斯人重返家园。

以这些原则和建议为基础的政策,将赋予该岛人民以一种极为有利并极有保障的地位。通过代议机构,他们将对该岛内部事务的管理行使主权,并且每一地区内的居民都将管理其自己区域性的事务。当岛上的人民享受这些利益时,随着塞浦路斯成为三个盟国政府之间合作的象征,而不再是冲突的根源,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切实合作也将得到保持和加强。<sup>②</sup>

6月26日举行了一次充分的辩论。由于有大量的其它问题吸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8年6月19日。

引议员们和阁员们的注意——公共汽车的长期罢工刚告结束，铁路罢工正难分难解，中东危机正方兴未艾——下院觉得难以在一时之间考虑许多事情，所以无心进行激烈的争论。殖民大臣发表了一篇极可赞美的演说，语调和态度都无懈可击，他还一反常态，对盖茨克尔和他同事们的容忍态度作了应有的表扬。 671

辩论塞浦路斯问题。在这方面进行得很不错，这部分地应归功于休·富特爵士和反对党领袖们的努力。工党的“影子内阁”在内部进行了许多辩论之后，决定不搞表决。但今天早上把它提交给全党时，却出现了很多争辩。最后，大多数人同意不进行投票。

卡拉汉继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之后发言，他以极高明的技巧完成了他的任务。比万抢在我前头发言，但他显然是那么不喜欢讲理和谦逊，乃至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觉得好笑。事实上，反对党的决定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必定会使希腊人相信，即使工党在下次英国大选中获胜，他们也不会更加接近实现“意诺西斯”的。比万还特别表明，他们说的“自决”一词并不是指把多数人的统治强加于少数人。<sup>①</sup>

议会的辩论往往是对任何海外危机的发展起不了什么影响的。但是这一次却可以说，盖茨克尔所加于他的工党的那条坚定的爱国路线是有现实价值的。使竞争双方认识到，谁也别想从反对党方面会比从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点在此后几个月内起了深刻而富有成果的作用。

尽管希腊首相和土耳其总理的反应全都令人失望，但这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7月1日，我在给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的信中写道：

总的说来，我认为我们的塞浦路斯计划已经获得了一个比我当初设想的更好的开端。使我感到宽慰的是，希腊和土耳其双方都是一上来就反对。假如是一方接受而另一方拒绝的话，那就极端难办了。即使他们最终还是不接受，我也希望能逐步把他们拖到某种默认的状态，那时

---

① 1958年6月26日。



候或许和平会降临到这个岛上吧。

672 不幸的是，两族之间的战斗这时即将达到顶点。为了防止类似内战的事件发生，总督毅然决然下令逮捕了一千多名希族和土族的嫌疑分子。与此同时，我要求希腊首相和土耳其总理向他们各自的塞岛居民发出停止暴力行动的呼吁；对这一要求，双方都及时同意了。随后进行了大量的外交谈判，我从其中得出的结论是，雅典和安卡拉双方都越来越急于并且准备考虑某种调解办法。土耳其人这时已趋向于接受，甚至希腊人主要地也是在关心双方政府均应向总督委员会指派代表这一提议。如果有一位土耳其代表以这种资格正式进行活动，这在希腊人看来是对土耳其利益的承认，那是违反希腊人如此长期以来所依据的法律和宪法基础的。

7月底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会议给了我们一个与曼德列斯和外长法丁·佐卢秘密商谈的机会。7月29日，他们在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那位极其精明的努里·伯吉的陪同下，前来拜访我。我们的客人

从花园门进来，大约三小时以后又从这里离去。这是一次奇特的会谈。结果等于是这样：土耳其现在全盘接受英国的塞浦路斯计划。土耳其政府（几个星期以前，它还在塞浦路斯并在土耳其煽动骚乱反对这个计划）现在却认为它是一个公正的、荣誉的、富有政治家风度而又权衡周到的计划！但是——而要害也就在这一点——它必须就是“这一计划、这一计划的全部，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仅仅是这一计划。”它制定得那么美妙——土耳其人说——以至于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动和修改也会破坏它的平衡并损害它的匀称。（这样说的目的当然是十分肯定，希腊人——他们要求作某些重要的修改——一定会拒绝这个计划。）如果我们英国方面负责不加修改地执行这个计划，那么土耳其人愿意合作，愿意取消暴力行动的，是会放弃他们的其他一切要求——分治、军事基地等等的。

我当时由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陪同。我们对他们这种表示倒很诧异，这就需要他们用长篇大论来解释了。我说，我们觉得土耳其人现在

认为我们的计划是一个好计划,对此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打算继续推行, 673  
并愿依靠他们的帮助。①

我早就表示过我愿意去雅典和安卡拉,假如这有助于取得协议的话。正如曼德列斯所知道的,我在焦急地等待着他和希腊首相的正式邀请。

当我了解到土耳其接受本计划的条件是使计划实质上不得加以改变时,我就必须保留商讨的权利,甚至是接受希腊修改意见的权利了。那时我会把修改意见提交土耳其人的。②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冗长而混乱的讨论。

土耳其人试图束缚我们的手脚,径直推行这项计划而不和雅典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最后准备好一份简短的文件,概括了这次讨论——留待明天详细地加以审查。③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奇特的发展。

今天早上,土耳其人显然又搞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我们外交部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它企图把我们拴住,在确定的时间和阶段内“执行此项计划”;总之,是要把一项“君子协定”变成一纸律师文书。我们提出了一项简单得多的反建议。土耳其人本来打算在下午两点半钟启程,遂又留下来要求再次和我见面。我同意了,于是他们在下午九点半钟到来。但是这一次,我让他们从前门进来。既然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他们除了来告别之外还做了些什么,这就保证了这次会见合理地短促。考虑了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之后,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惊异——以及某种程度的愤懑。曼德列斯事实上是个挺正派的人,他颇有点自惭自愧。佐卢……已经回国去了。我重申我对协定的看法之后,会议就宣告结束。我说明,假如(事实上确有可能)我以后不得不要求他们考虑某些修改(以迎合希腊人)的话,那么我就并不坚持要他们一定接受英国的计划。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他们都有绝对而光荣的自由。最后我说,我认为最好还是丢掉准备把我们的君子协定纳入某种法律形式 674

①②③ 1958年7月29日。

的一切企图——君子协定就是君子协定。土耳其人确实别无其他选择余地，[只好]接受了——这一点他们做得是够漂亮的。<sup>①</sup>

同时，来自岛上的消息仍然令人沮丧。又有两名英国军人在8月3日遇害，其中一名是皇家陆军后勤总部的上校。次日

我得到塞浦路斯希腊族革命组织“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决定宣布停战至8月10日的消息。到那时候——如果受到挑衅的话——还会再采取恐怖行动。看来这一点很难解释。我们必须等待总督的意见。<sup>②</sup>

总督的建议是很明确的。

继前几天的逮捕之后，目前正在进行一次庞大的行动——使用了两千名或者更多的部队。预料有很多最恶劣的恐怖分子都在包围圈内。毫无疑问，格里瓦斯和内圈人物将会继续逃脱——像以往那样。但是即使继续这一行动会构成“挑衅”的话，我们也必须冒这个风险。停止这一行动就是放弃全部权力。总督和他的全体顾问都采取这种看法。（外交大臣和珀恩勋爵——他在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缺席时代理殖民大臣——也都同意。）<sup>③</sup>

很难确定格里瓦斯这一姿态的理由何在。人们

认为这或许是罗网确实正在向他们收缩，否则就是（更有可能）[他们觉得]最近的暴行确实已经开始失掉世界舆论的同情——尤其是在首相和总理……发出呼吁之后。<sup>④</sup>

8月6日晚，我获悉希腊首相和土耳其总理都已同意我所提议的访问。因而我就在次日离开伦敦。我们乘一架皇家空军的慧星式运输指挥机于下午起飞，当天6时光景抵达雅典，受到希腊首相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以及大使罗杰·艾伦爵士的迎接。和我同来的有外交部的阿尔奇·罗斯和尤金·梅尔维尔，还有弗雷迪·

---

① 1958年7月30日。

② 1958年8月4日。

③④ 1958年8月5日。

毕晓普。我也带来了休·富特爵士，他在这次奇异的海外旅行中自始至终都是最有帮助的。我们驱车前往英国大使馆。

大使馆已经重新粉刷过，那些弹痕——以前累累皆是——也已清除。675 不然的话，自1944—45年围困<sup>①</sup>的日子以来它简直就没多大变化。那些非常的场面我记得是多么清晰啊！前排房屋撤离一空；有谁胆敢闯进花园就要受到狙击手的射击；1944年圣诞节前夕的午夜圣餐；宣布丘吉尔和艾登定于圣诞节那天到达的电报（那是刚行完礼的时候交给我们的）；在烛光底下和共产党人毫无结果的会谈；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勋爵）的庄严肃穆；大使（雷克斯·利珀爵士）的学者风度；以及那些岁月里的全部悲喜剧。<sup>②</sup>

我的朋友斯派克在7月31日就提醒我说，土耳其人在总督委员会里的席位对于希腊人是块绊脚石。他已经和两国在北约组织的代表有过几次会晤，并且深信这是希腊人确实要加以反对的要点之所在，还的确是唯一的要点。随后这番话就得到了证实。

第一次会谈在8月8日上午10时30分举行。希腊首相和外交大臣伊万杰罗斯·艾弗茹夫带着一两名官员，还有希腊驻伦敦的大使，他是和我们一行一道来的。

上午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我一开始就为和平和七年期限问题大声疾呼。我声称，鉴于世界政局，尤其是中东的局势，这一点就更为必要。伙伴关系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希腊首相作了相当详尽的答复，坦率地反对跟土耳其人搞伙伴关系，认为他们本质上是野蛮人（他没有真正这样讲，但蕴含了这一点）。我挂起了“伙伴关系”，另提出“合作”。讨论（经过翻译，所以颇为缓慢）继续到下午1点。在结束时，我使他们同意。有两条原则是可取的：（1）结束暴力行动；（2）七年为期的临时解决办法，但不妨碍最终解决办法。我们同意下午6时再次会晤，着手详尽讨论英国的计划。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有了一些进展。因

<sup>①</sup> 见本书第二卷《战争风暴》第22章。

<sup>②</sup> 1958年8月7日。

为如果全盘否定一个计划的话,那么还要逐点加以审查就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了。<sup>①</sup>

676 当我们再次见面时,气氛好像确乎有所改善。

希腊首相仿佛更沉着了,并且响应了我所尝试的办法——一种坚决与友好相结合的办法。看来希腊人除了他们不喜欢把伙伴关系当作一个原则之外(因为这样等于在法理上承认土耳其人在岛上的“存在”),还有这样四点主张:(1)委员会中的四比二是不公平的。他们按人口有资格四比一。(2)不要联合议会。(3)他们不喜欢双重国籍的建议。(4)他们讨厌委员会中的双方政府代表。他们所反对的是否是政府代表以任何资格在岛上出现,则不太清楚。我们并未强求加以澄清。

虽然希腊人佯装对于这四点反对理由同样重视,但我们很快就看明白,他们实际上对于政府代表这一点要比对其它各点更敏感得多。当然,由于同样的道理,土耳其人也把这一点看作是一——我坚信是这样——生死攸关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打算放弃[要求一块土耳其的]基地和区域分治。充分讨论过后,我们大约于晚8时休会。<sup>②</sup>

第二天早晨,很显然希腊人的态度强硬化了。因之,我对于他们没有接受或者至少是默认我们的方案,表示了失望。我提醒他们,

两年前,他们曾拒绝拉德克利夫计划;现在他们却由衷地希望自己当初不曾那样做。土耳其人接受了拉德克利夫勋爵的宪法,它本来至今还有效——只有一个单一的立法会议。如果希腊拒不接受这次的新计划,或者用暴力和恐怖行动来使它无法施行,那么结局就必然是分治的最坏形式——区域分治,土耳其拥有基地,等等。我觉得,希腊政府并没有提到世界大局的高度来看问题,并且正在干着违背他们自己真正利益的事。我不能理解这一点,这是和他们不相称的。我也不以为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会使他们博得全世界的同情。这一切都使我很难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一个阁员,我曾经目睹战争期间希腊人所表现的某些英雄

---

①② 1958年8月8日。

气概,并且也曾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过他们的反共斗争,那是在1944—45年间,(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共产党本来会把他们推翻的。英国人民对希腊人民的感情仍然像以往一样强烈。但是自从战争以来我们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已经看到旧帝国随着一种新的概念而消失了。独立已经完成了;相互依赖必须取代它的地位。现代希腊应该树立一个榜样而不应该落后。<sup>①</sup>

谈到这当口,正如多少是我所希望和预料的,卡拉曼利斯变得非常激动。

他们憎恨土耳其人;他们和土耳其人已经打了五百年的仗;随时随地只要他们能够,他们就要为了希腊的自由对土耳其人作战。他们决不能受土耳其人的侮辱,让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雄心壮志保有否决权是奇耻大辱。<sup>②</sup>

很快就明显看出,卡拉曼利斯从胸中倾吐了这一切之后,心境好得多了;于是我们平心静气地讨论那四点直到午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深感不能信任的实际上只是有关政府代表的那一点,这使我感到鼓舞;其他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处理。

会议之后,“我们(包括希腊人)都到英国大使馆进餐,那里的气氛非常友好。”<sup>③</sup>我很喜欢卡拉曼利斯和艾弗茹夫这两个人,尤其是前者,他是一个真实而诚恳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所能做的全部事情了,对于在安卡拉必须取得怎样的成就,心里也有底了。因为我们要到下午四点半钟才启程,所以我无法谢绝出去观光。

首先,我到了雅典的卫城(大概我永远不会再见到它了),然后去国家博物馆。这里有迈锡尼新出土的古文物——各式各样的金饰器等等,非常精美。还有两件青铜制品——每一件都是出类拔萃的——一尊壮丽的宙斯像(也可能是海神普赛顿),状似投掷雷电或三叉戟,这是一座神采奕奕的须发蓬松的人像,姿态优美。它是属于全盛时期的。还有一

①②③ 1958年8月9日。

座非常吸引人的青铜少年骑士像(属于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非常具有自然主义的风格,十分可爱。他仿佛是天马行空一般。①

我们动身时,卡拉曼利斯和艾弗茹夫两人都显得十分亲切友好。我在飞机上记下了我的印象:

678

很难形成一个十分确切的印象,但明确的是:政府害怕马卡里奥斯,害怕国会,还害怕上次(5月份)选举中共产党选票的增多——这部分地是由于俄国人关于“英帝国主义在塞浦路斯”的宣传所致。所以,政府显然不能“接受”这个计划。但我并不是来签署一项条约甚至是一项协定的。可是希腊政府能“默认”这个计划吗?或者至少是在这一计划本身所固有的范围之内进行合作吗?马卡里奥斯或许会坚持以暴力来反对这个计划的——除非是他被重返这个岛的前景吸引住了。最大的绊脚石当然是政府代表问题。但这一点土耳其人却不能放弃,这对于他们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②

在雅典,尽管人民事实上并无敌意,看上去却是沉默和冷淡的;但我深信,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得到新生的悠久的英希友谊是根深蒂固的。当我们抵达土耳其机场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的主人们

已经……决定要把他们对我的欢迎和雅典对我的欢迎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军乐队,仪仗队,大批知名人士,还有大量欢呼的群众。③

机场距首都二十英里。曼德列斯总理和我同车。

在安卡拉,人们都涌上街头欢迎我们——时而是抑制着的欢呼声,更多的时候则是鼓掌……我们的大使吉姆·鲍克认为……政府所希望的一次友好欢迎显然已经过去了。然而,敌视性的示威却是很容易搞起来的。他认为在这次众多人数的出动中——其中包括中产阶级的店主和商人——或许有着一种真正友好的因素在内。④

安卡拉的英国大使馆恰好座落在俯瞰全城的一座小山上,海拔约三千英尺。这是一座精美的建筑。可惜的是大使本人——是一

---

①②③④ 1958年8月9日。

位和我一起<sup>679</sup>在阿尔及尔服役过的老朋友——已经关闭了大使馆，因为他在任职四年之后就要离任了。于是我们就住到政府宾馆里，那里很舒适，但是当然没有任何安全可言。因此我把全部空余时间都消磨在离我只有几百码远的大使馆图书馆里。

在宾馆里举行了一次工作宴会，出席的包括

我们伦敦的一行人，加上大使和迈克尔·斯图尔特(参赞)，对方是曼德列斯和佐卢，还有他们的四、五位官员。没有把伯奇从伦敦带来参加这次访问。

宴会之后，

我向总理解释了在雅典的情况。希腊政府明确地接受了两大原则——不再搞恐怖行动和同意七年为期的临时解决办法。这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对原计划的某些方面提出一些看法，我对此也作了解释。土耳其人采取了非常僵硬的立场，并且竟假装惊讶，为什么经过伦敦密谈之后，我们还要讨论什么修改。在伦敦他们已经向我们说过，这个计划设想得好，规划得好，均衡完美。任何一个词如经改动都将造成灾难。这就使我提出质问，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土耳其政府还要在土耳其全国到处鼓动成千上万的人搞自发性的骚动来反对它？土耳其人……对这一反驳一点也不感到为难。于是围绕着我们在伦敦所谈过的话展开了一场冗长的争辩。我说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们打算遵循在下院辩论中并在白皮书中所概括的政策。但这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毫无疑问他是记得的——我才拒绝草签一份(由他的官员搞出来的)其中引用了“不得修改”这一概念的会谈记录。土耳其人……依然对我们计划的那种完美无瑕的和谐称赞不已。总之，他们要的是“法案，整个的法案，不要别的而只要这个法案。”继续争论了一阵之后，决定休会至明天上午。<sup>①</sup>

这种态度虽然并不全然出乎意料之外，却比我所预计的要来得更加粗暴；但是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坚持下去。因而第二天，即8月

<sup>①</sup> 1958年8月9日。



10日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再度会谈。但是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土耳其人继续赞扬现有计划的完美,简直天衣无缝,拒绝考虑任何修改。谈到中午,根据我的提议休会。

与总统共进午餐——在场的就是原来的全班人。是件相当沉重的事。鱼子酱和伏特加酒,十足的俄式气氛。<sup>①</sup>

下午四点半钟重新开会。我利用会前休息时间和我的顾问们进行了讨论。

我告诉土耳其人,我们打算奉行我们的政策,我们希望执行政策的形式——随着每一阶段的发展——将是他们能够予以合作的。确实再没有什么更多要讲的了。<sup>②</sup>

土耳其人同意结束这次几乎还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谈。随后,在友好的气氛中讨论了中东和其它一些问题。虽然佐卢一再有些作难,曼德列斯却始终是彬彬有礼的。在此后的一年里,我仍要碰到这些人并且要和他们密切地一道工作的。同时我觉得虽然我们未能获得任何让步,但我们已经给主人造成了某些印象。土耳其人很像英国人,是轻易不流露出他们的感情的。

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包括同样那批人,气氛显得比较轻松。

我们于中午12时飞离安卡拉机场。再一次在夹道欢呼声中驱车穿过这座城市,再一次在机场上安排着军乐队和仪仗队。临行前我会见了英联邦国家的大使们或代办们,同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曼德列斯和佐卢到机场上为我送行。样样都极为友好——但我再一次感到这一切颇具俄国味道。在那些满面笑容和友好姿态的背后,你看不出有多少真情实意。曼德列斯的确要比佐卢文明得多。也可能是我弄错了,也可能是这一切都仅仅反映出他们仍然恪守颇为原始的思想方式。每一件东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根本没有像是灰这样的颜色。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如果你是朋友,那么你就一定得摧毁你朋友的敌人。只要

---

<sup>①②</sup> 1958年8月10日。

你能够而你又不这样做,你就是敌人。①

我们直飞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机场,大约下午1时到达,即驱车去政府大厦。 681

关于我来塞浦路斯的计划,只通知了极少数的人——那是出于安全起见——尽管在我们离开伦敦之前,我已决定这样做了。我在雅典时一见到总督,就立即告诉了他。举行了规模很大的宴会——所有高级军政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们都来了——共有四十一五十人之多。我的到来也并没有通知他们。他们都以为宴会是为了欢迎总督归来。当我在宴会之前步入聚集着的人群中间时,全场大为惊异——我认为那是一种满意和高兴的感觉。我很高兴见到那里的士气看来颇为高昂。②

宴会后,我向与会的人们讲了几句话,表达英国政府和国内的每一个人对那些在塞浦路斯服务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夫人和家属的感谢之忧。我也表示我们对总督完全信任。

下午,我们分乘两架直升飞机起飞——总督和我乘一架,弗雷迪·毕晓普和菲利普·德·朱鲁塔乘另一架。我们飞过位于尼科西亚南面的山岗,飞过埃庇斯科皮,到达主要基地所在的阿克罗提里。空军元帅、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连同一位外交部的代表一道组成的中东委员会已经得到通知,于是我们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由空军元帅(休伯特·帕奇爵士)主持。讨论了约旦局势的各种可能发展之后,我们决定给三军参谋长们发出信号,使我明天早上在伦敦就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会谈之后,我视察了……空军基地,同一些官员交谈,并同大家一起进餐。我们还乘车(一辆吉普车)转了一下眷属区。大家很快就认出了我,每个人看来都很高兴见到我。士气显然是高昂的。③

### 我们重新乘直升飞机

到利马索尔地区的一个叫做莱萨的村庄,降落在教堂外面的广场上。这里正在进行军事活动。警戒部队(包括近卫步兵第一团的第三营

①②③ 1958年8月11日。

和一连皇家苏格兰火枪手)几天以前已经布防在村庄的周围,并且仍然在驻守着。居民被限制在家里,仅在规定的时间内为了规定的目的才许可外出。对每家住户和对教堂的搜查,发现了大批武器,包括二、三十颗炸弹。一大堆干草(那是贮藏库)由于什么原因爆炸了,部队大为开心。六名危险分子被捕。<sup>①</sup>

第三营由 P. C. 布里顿上校统率——他是查尔斯·布里顿准将之子,老布里顿 1915 年在卢斯同我一起在第四营呆过。

官长、军士和士兵们服装整洁,容光焕发。有一连人为我的缘故在教室里进行了检阅(他们是预备队,并未实际参加警戒),我向他们讲了几句话。我感到这一切都极其动人,说话时简直无法自持,因为这一切唤起了那么多的回忆。<sup>②</sup>

我们仍乘直升飞机返回尼科西亚,到反恐怖组织的总部呆了一个小时,听取了陆军上将和警察厅长的简要汇报。

肯德鲁上将(道格拉斯爵士,他是一位有着优异战功的优秀指挥官——荣获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三枚殊勋勋章等等)在这个不讨好的岗位上工作了将近三年之后,就要离任了。<sup>③</sup>

在这以后,我们会见了两位市长。尼科西亚市市长德维斯是一位颇为吸引人的人物,他一口气谈了四十分钟。

他叙述了自从英国占领以来的历史,并且振振有词地反对我们政策的曲折变化。其余的便是痛骂土耳其人、警方和富特本人(说他不过是个骗子而已)。<sup>④</sup>

基里尼亚市市长迪米特里戴斯则保持着难以理解的缄默。

然后我们见了土耳其族的领袖们——[法齐尔]库楚克博士(他和德维斯刚好相反——因为他简直说不出话来,要说也只是用土耳其语并且沙哑着嗓子嘟哝)和他的副手[劳夫]登克塔什先生——这是一位异常能干、口若悬河的律师。他们说的几乎是希腊人所说过的一切,但用的却是另一种迂回的方式。最有趣的事就是他们抨击了英国的新计划——

①②③④ 1958年8月11日。

因此,安卡拉显然还没有下达支持这个计划的话。<sup>①</sup>

晚9点半,我们在花园里进餐——与休·富特爵士和夫人,还有他们全家及同僚共进一次恬静的晚餐。能有这样一位明智而又忠诚的公仆提供意见,真是莫大的安慰。

夜里11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电视演说。从11点半起我们起草电报:(1)草拟英国政府声明;(2)草拟发往雅典的电报;(3)发往安卡拉的电报。这些电报的前提是我们决定执行这一计划,但做了几处修改以迎合希腊人,一处修改以迎合土耳其人。但实际上这是要在伦敦加以解决的那部分工作。而今晚我们这一切工作的目标则是要把这几份电报立即发往雅典和安卡拉,听取大使们的意见。由于这件事占用的时间比我们原来预定的更长,所以我们让飞机耽搁了半个小时。最后,我们在当地时间午夜2时左右启程。<sup>②</sup>

次日,8月12日,是光荣的12日。中午,防务委员会开会处理约旦局势问题。我请当时在伦敦的那些阁员们于三点钟到达。

约有八位阁员出席,包括大法官、财政大臣、贸易大臣、希尔博士、运输大臣、霍姆勋爵——其他是各部次官,包括[戴维]奥姆斯比·戈尔(外交部)和珀恩勋爵(殖民地部)。<sup>③</sup>

议事程序冗长繁多。当这完毕之后,我做了关于此次出访的报告,看来大家对我所提出的方针是赞同的——那就是,毫不踌躇地推行这一计划。将要做一项重要的修改——那会使希腊人高兴而使土耳其人不高兴。根据这一计划任命的两位政府代表,一个希腊人,一个土耳其人,事实上将不成其为总督委员会的成员。在其它方面,则他们的职能仍将保持不变。换句话说,他们将是不对政府法案直接负责的代表。这一点取得意见一致之后,便发出了必要的电报。但是除非英国政府无条件投降,否则这一方针乃至任何其他方针都很可能引起暴力和恐怖行为的重新抬头;这一

①② 1958年8月11日。

③ 1958年8月12日。

点是确实的。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其词。在五年之中,驻塞浦路斯的英军遭受了九十名死亡,这就是一次事实上的战役所造成的可悲的但并非瓦解性的结果。我们所一致同意的这些改动很顺利地就在如下的信里发出,我当时认为把这封信交给作为反对党领袖的盖茨克尔乃是明智的:

假如你在伦敦的话,我就会请求你今天能惠临和我见面,但是我为你高兴,你正在意大利度假。

我访问雅典和安卡拉之行,使我能够就我们的塞浦路斯计划与两国政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并不指望任何三方协定之类的东西,更不指望一纸条约;我所能希望的最多也只是默许以及或许在实践上的某种支持。尽管有这么些困难,我却认为存在着某些机会。在我的访问中,我的确发现有一种友好的并比我所预料为多的谅解气氛。无论如何,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相信进一步的广泛会谈,无论是与各有关政府进行还是在北约组织的内部进行,都将使我们从目前已达到的局势倒退而不是改进,我们的责任是现在就以我们认为最好而又最公正的方式来行动。因此,我建议及时为明天下午六时的新闻节目和星期六的报纸发表一项声明。作为自6月份以来我们所学到的东西的结果,我们已经对6月所公布的总政策做了某些修改和扩充。整个说来,就希腊的观点而言,这些都是确切的改进;而我认为土耳其人无论是多么不情愿,最终还是可能接受它们的。你将会看到,某些改动,特别是有关未来可能联合选出一个组织的那个说法,大体上就是依据贵方在议会辩论中所提出的论点写的。我们还决定以大使的性质来看待希、土两国的代表,因而他们将不是总督委员会中的成员。目前我们暂时撤销双重国籍的建议,因为这会引起非常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并且我设想也还得需要在我们这里通过立法程序才行。

最近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还说不上;但是在各种不可避免的最初反应之后做出改进,对此我不是不抱希望。当然,如果得到国内广泛的普遍支持,将会增加成功的前景。

总督——我每次看到他都越发增加我对他的赞赏——这次陪同我访问了雅典和安卡拉，我还和他一起在塞浦路斯呆了一天。我认为可以说，他是完全同意我们所决定采取的方针的。

我并不预期这封信在明天声明公布之前会送到你手中，因此我现在把致比万和格里菲思的信件的抄件送上，我想这是你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我致电斯派克，把那些改动通知了他。塞尔温·劳埃德正在华盛顿，他可以向杜勒斯详尽地解释局势。于是在8月15日就向报界发布了一项声明。英国报界满怀好感地接受了这一计划，甚至在知道它遭到希腊政府的拒绝之后，还是支持不惜一切代价来执行这一计划的那种大胆而富于政治家风度的决定。

同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从雅典也发出了一项多少带有矛盾心理的声明：“塞浦路斯人民将不会接受任何独断的单方面的决定，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准备维护他们的自决权，并争取他们的自由。”这话既可解释为要独立，又可以解释为要“意诺西斯”。

为了向总督通情报，我在8月18日对局势做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目前在全世界以及在我们的盟国之间都享有一种很好的道义地位。英国的报界，包括左翼报纸，都持同情态度。普遍的看法是，我们采取了一种正当合理的方针。

马卡里奥斯所发表那篇敌对性的声明，我自己并不感到惊讶，如果希腊人的声明也是一篇坏东西的话，我也不会过分沮丧。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要悄悄地继续执行我们的方针，并发动我们所能运用的其它影响。我确信美国人将会是非常肯帮忙的，而且我认为北约组织各国已经非常讨厌希腊政府毫不妥协的态度，正如有一个时期他们对土耳其的立场持批判的态度一样。我不相信希腊人在联合国里会有多大的表演。所以，还是让我们表现得冷静些吧。我晓得呆在伦敦说这种话是轻而易举的，我充分体谅你的全部困难，尤其从上星期和你一起出访时我对这些困难所得到的[有限]理解中，使我更加感到如此。然而，我确信这是正确的态度。

尽管希、土两国政府都还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确切感到会发生什么事,至少是在现阶段。

土耳其人是会支持这个计划的,尽管所加入的那些重要改动有助于(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但希腊人将要反对这个塞浦路斯计划,主要是由于软弱和内部分歧。他们心里一定明白,我们已经走出很远的一段路去迎合他们了。现在恐怖活动是否将大规模重新开始,没有人知道。有些人觉得,大主教乃至格里瓦斯对于世界舆论是敏感的,并且会担忧这样做在新形势之下将有什么结果。<sup>①</sup>

8月19日,希腊大使来见我。

他很叫人喜欢,却闷闷不乐。因为他明显地感到他的政府的做法既软弱而又愚蠢。我提到了四点——仅仅这四点——那是首相在雅典批评这个计划时提出的。第一点——即委员会中四比二的多数——显然是无关紧要的。至于其它三点——即,未来的全体性人民议会问题,共同国籍问题,以及总督委员会里有两国政府的代表出席问题——我已经完全地或者部分地迎合希腊政府的愿望了。大使开朗了一些并把这记了下来。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要说的。然而他确曾补充说,也许现在马卡里奥斯返回塞浦路斯是唯一的出路。他十分坦率地说,大主教待在雅典使得政府的地位非常为难。

[然后]是土耳其大使——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谈到他的政府正在“研究我的通知”(很清楚,他们要等着瞧希腊人)。<sup>②</sup>

687 外交大臣这时正在纽约处理联合国中的黎巴嫩—约旦局势的纠纷,但我们仍一直是把每一步发展都充分通知了他。我的预料得到了证实。希腊政府在8月19日晚上拒绝了 this 计划,而一个星期之后,土耳其人却表示接受:

希腊政府处于巨大的困境,我们驻雅典的大使发来了阴郁的电报。他说希腊人将以脱离北约组织相威胁——或许是不不得不脱离。否则,目前的政府将会倒台而被一个“中立主义”性质的政府所取代。我倒很怀

---

① 1958年8月16日。

② 1958年8月19日。

疑这一点。同时，塞浦路斯希腊族革命组织“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发出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威胁——好象是要鼓动对英国计划进行政治抵制，而不象要重新采取恐怖行动。马卡里奥斯即将去联合国——参加大会。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能取得很大进展。<sup>①</sup>

整个9月份，函件和建议从各方涌来。斯派克这时提议，当他主持召开北约组织会议时，暂停我们的计划。月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原则上都同意了这一建议。然而，我的同事们却正确地感到既然是接受了这次会议，我们决不能拖延开始执行计划的时间。土耳其人已经同意这一方案中关于他们的代表的问题：

塞浦路斯计划在执行中；这一次土耳其做得很有节制，很有头脑。他们没有从外部派遣一位大使去当他们的代表，而是指派了一名已经是身在岛上的总领事当代表。这在北约组织内部起了好影响，而斯派克仍然在力图寻找某种妥协办法。可是，我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推延”这一计划的实施了。假如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永远失掉土耳其人，内战就会开始。同时，暴行有增无已。有两名妇女，是军人的妻子，昨天遭到枪击，其中一个人生命垂危。这当然是要激怒部队的。<sup>②</sup>

尽管恐怖行动时时继续着，然而还是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对可疑分子的大规模围捕，逮捕了约近一千人。最后

希腊人拒绝了拟议中的塞浦路斯会议。整个这些星期以来，尽管 688——或许是因为——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对于每一点都已同意，希腊人一直不干。正是马卡里奥斯把可怜的卡拉曼利斯、艾弗茹夫和他们一伙人逼到那种荒谬的立场上去。但我并没有放弃希望。<sup>③</sup>

议会开会时，对于缺乏进展自然会有某些批评和失望情绪，但那主要地也只限于尽管我们已经同意了种种让步却仍未能安排一次北约组织会议这一点上。

---

① 1958年8月23日。

② 1958年10月4日。

③ 1958年10月25日。



显而易见，希腊人为了他们在会议上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心慌意乱——或许甚至是羞愧。我们的白皮书已经发表，那确实是做了结论。希腊人现在……[的做法]相当绝望，因为他们明白所有北约组织的国家都已从它们在北约组织理事会的代表那里知道了事实真相。<sup>①</sup>

11月10日，由于恐怖主义行动加剧，我们决定凡空军基地和北约空军机构中雇用的希族塞浦路斯人必须全部解雇。立刻就有近八千名英国志愿人员响应号召前往填补空缺。与此同时，反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也不断地获得可观的成绩。

在联合国里，由于我们朋友们的帮助，我们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因为联合国大会一致表示，深信“所有各有关方面将做出不断努力以达成一项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解决办法”。直到年底，局势没有发生变化。

当一名英军的妻子卡特利甫夫人被害之后，就出现了关于军队行为的种种说法；12月7日，一些反对党人要求进行调查。

今天在下院的质询之后，我对塞浦路斯问题做了一篇很长的声明。声明谈到了关于不适当地使用我们部队的武力的那种说法，也谈到了政治形势。声明得到下院各方面的好评，反对党也没有什么话可说。<sup>②</sup>

689 艾森豪威尔在一份很长而又非常同情的电文里，对这个问题补充了如下几句令人宽慰的话：

我很钦佩您对最近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毫不气馁，决心继续为解决这一艰巨的问题而努力。就我们来说，我们始终准备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恰如其分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致以热烈的问候

艾克

我也和总督保持着频繁的通信，看来他对所受到的支援感到满意：

在这里紧密地和我一道工作的人们都对你的来电深为感激；至于我

---

① 1958年11月2日。

② 1958年12月10日。

个人,则还要向你致以最忠诚的敬意。

但是恰好在圣诞节前出现了一种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发展,其中可以找到最终解决的种子。12月在北约组织部长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希腊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询问我们的外交大臣,英国政府对于他们之间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寻求一项协定是否认为有利,在这一协定中联合王国将拥有基地的全部主权,而土希双方居民则在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之内享有某种限度的自主权;他们还询问,我们是否高兴土耳其外长与希腊外交大臣之间继续他们的秘密谈判。总的计划是,应该由他们双方之间讨论有关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办法的内政方面;到了他们认为已经取得充分进展之后再举行一轮三方讨论会,既考虑他们在有关内政方面的讨论结果,也讨论诸如条约、保证之类的对外问题。

虽然在北约组织大会以后,我和希腊首相及土耳其总理之间早就进行了友好的通信联系,但这样一种发展却令人鼓舞,正如它是出人意外一样。以往寻求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法的一切,都要碰到希土不和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再者,尽管看来很明显,任何细节至今还都不曾确定下来,而只不过是交换了非常一般性的意见,然而如果他们能够一道为某种解决办法搞出一个意见一致的基础来,那就会为我们开辟大不相同、更有希望的前景。因而经过 690 再三考虑之后,塞尔温·劳埃德和我决定我们方面不加干涉而任凭事态发展下去;我们告诉两位外长说,女王陛下政府欢迎他们的新创议,并祝愿他们完全成功。

至于如何执行我们自己的计划,这时却面临着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正如我当时向杜勒斯解释的:

我们去年6月和8月间所宣布的对塞浦路斯的内部安排必须赶在任何新协议的前面稳步地进行下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停滞不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不前进,就有滑回去,丧失去年夏天以来所获得的立足

点的危险。我们那个进步计划的稳步前进，看来在促使希、土双方改进态度方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某些进一步的措施就该在目前这个阶段采取了……另外还有为准备土耳其议会的选举名单和选举区域制订法案的问题。如果当前的谈判毫无成效，我们就必须准备履行我们让土耳其人在本年内举行选举的义务；在公布选举法到选举本身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段时间差距。因此我们决定，选举法应当于1月15日公布。可是，当我们听说两位外长这个周末将在巴黎再次会晤时，我们就决定应该延期公布选举法，以便巴黎会谈能在尽可能良好的气氛中举行。除非会谈显示出某些真正进展的标志，否则我们就没有道理拖延一个星期左右或更长时间。必须记住，几个月来在某些城镇里各个土耳其市议会实际上已经在行使职权了，整个局势需要正规化。至于选举名单，很难设想除了在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去规定，希腊和土耳其双方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协议。

大约同时也收到了“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的一项停火建议，条件是一切反对他们的行动均须停止。我立刻把我的意见写成备忘录送交殖民大臣：

691 我相信目前这一提议是“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软弱的标志，尽管它的自信相反；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一提议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伦诺克斯—博伊德于12月31日来见我。

我准备好给总督的一项指示，殖民大臣表示接受。指示说，不要说我们叫他不放松对抵抗组织的压力，特别是不要与恐怖分子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或讨论。哪怕目前的会谈确实将导致一种（政府之间的）“解决办法”，更其可能的是“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会继续搞下去——就象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那样。至于执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认为总督对目前的案子进行减刑是做得正确的。<sup>①</sup>

新年静悄悄地开始了。

塞浦路斯是相对平静的，但似乎很少有希—土进一步对话的消息。

---

<sup>①</sup> 1958年12月31日。

佐卢在土耳其受到很大压力。他现在被指控为抛弃了“分治”的神圣目标。同样地，艾弗茹夫也被指控为抛弃了“意诺西斯”。这样——由于一种奇怪的逻辑，两个人就必然地趋向于妥协。<sup>①</sup>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前途，现在变成了极端迫切的问题。整个秋天都在反复辩论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结论。一方面，有人主张他在塞浦路斯要比在雅典少引起些麻烦。况且如果他回去，他就可能屈服于塞浦路斯岛上希族人不断增长的压力，他们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渴望看到结束紧急状态。同时，他又是塞浦路斯希腊人所能接受的唯一发言人。可是另一方面，他是反对我们的建议的，而我们已经充分表明，如若没有其他协议，我们就准备实行我们的建议。2月4日下午，我和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谈了一次：

我们让马卡里奥斯回塞浦路斯吗？我现在倒宁愿让他回去；但我同意等待下次土希会谈的结果。我们相信这次会谈将于下星期在苏黎世举行，两国的首相和外长都将参加。<sup>②</sup> 692

我们还讨论了是否应该参与秘密会谈，在什么阶段参加，是我们自己参加呢，还是由斯派克来协助。总督这时自然是焦灼的，我发去电报安慰他：

你和我自然都在不安地等待着苏黎世会谈。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这次会谈。但他们是在一种大为改善了的气氛中举行会谈的，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事实里得到安慰。

我永远钦佩你的坚定毅力和对我们的两手政策——一手持圣经，一手持宝剑——的忠诚支持。

一俟我们得知苏黎世会谈的结果，我们一定一起磋商。同时，我觉

---

① 1959年1月5日。

② 1959年2月4日。

得不能不向你发出这封短电。

致以良好的祝愿

哈罗德·麦克米伦

对这封电报，他发回了一封极其慷慨出色的复电。

阁下，感谢你拍来这样好心的一封电报，这是一个骑士党致一个圆颅党的最好心的电报。

2月10日，

深夜，外交大臣来电话说，他预期佐卢先生和艾弗茹夫先生将提议明天(11日)来访伦敦。这就变得非常有趣了。怕只怕他们可能合在一起要求我们给予非我们所能让步的东西。但我们却无非只是需要我们的那些“直布罗陀”而已。<sup>①</sup>

接着，出乎我们的一切期望之外，2月11日发表了土耳其-希腊联合公报，声称两国政府已达成一项妥协解决办法，将与英国取得协议。我的同僚们听取了有关这一新发展的汇报之后，

授权外交大臣根据如下的谅解继续进行谈判：

693

- (1) 我们的“基地”应处于英国主权管辖之下。
- (2) 其它据点，例如雷达站，应永远为我们所有。
- (3) 充分的设施——港口、公路等等。
- (4) 对尼科西亚机场的特殊安排。

许多别的问题还都有待解决——但这却是个开端。外交大臣在质询之后〔向下院〕做了一项简短的声明，反映很好。<sup>②</sup>

在英国，普遍地感觉到宽慰。尽管我们的部队那么英勇，最沉痛的事莫过于在这种行动中死难者家属的痛苦了。战争及其全部的悲剧有其自身的尊严和荣誉；然而，对于那些在大街上遭枪杀或在商店里被谋害的英国军人和他们的妻子来说，战争却只带来了无法忍受的悲痛而并没有其相应的光荣感。

---

① 1959年2月10日。

② 1959年2月12日。

整个报界都不错——唯有比弗布鲁克报系把这叫作“出卖”，并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激烈的抨击——大标题、社论和漫画，反对我和外交大臣。<sup>①</sup>

此后的几天似乎像是一场电影而不像是现实生活。

2月13日。上午11时内阁开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两小时。全体阁员都同意主要的方针。外交大臣认为在获得我们军事上所要求的东  
西这方面，我们将没有困难。如果真的实现了，那简直象是一个奇迹。曼德列斯（土耳其总理）写给我一封很漂亮的信，他把希腊人的灵活态度归功于我的坚定！

塞浦路斯计划在顺利进行。我们正在准备我方文件，或许可能在星期一由三国草签。那时，我们将有马卡里奥斯和库楚克代表希族的和土族的塞浦路斯人。假如一切顺利，希腊首相和土耳其总理将于星期二抵达，我们将于星期三再次签字。佐卢，而尤其是艾弗茹夫，都渴望和他们的首相、总理同来……

有关“基地”的占有权仍有某些疑问，我依然担心马卡里奥斯可能对这一点〔作难〕。我们等着瞧吧。

2月15日。……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和休·富特爵士……来了。我们作了一次很好的谈话，研究了各种文件。形势是这样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已经同意了苏黎世协定。协定涉及该岛的政府、各种宪法方面的安排，等等——包括通过创设“副总统”这一职务而“楔入”土耳其的否决权。但它还有待我们提出我们的要求。这些要求我们现在正在写成书面文件。希腊和土耳其外长都说，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愿望的一切”。希腊〔外交大臣〕还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已经“同意了一切”……。

2月16日。上午，当外交大臣会晤佐卢和艾弗茹夫时，我试图就我们的文件取得一致意见。国防大臣（十分正当地）表现得相当刻板……。

2月17日。塞浦路斯问题成败未卜。各个政府似乎都很坚决。大主教“提出保留意见”。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会谈。我期待希腊首相和

<sup>①</sup> 1959年2月12日。

土耳其总理今天到达。”<sup>①</sup>

2月17日傍晚，我谒见女王并得以向她全面陈述了事情进展的情况，她以她通常的那种同情和理解态度听取了这些。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从事于访问俄国的准备工作，所以没有能更及时地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这一新发展仍然悬而未决，外交大臣和我就不能出国了。

正当我离开王宫时，我听到曼德列斯先生及其一行的飞机在加特威克外面坠毁的可怕消息。据信有十或十二个人丧生，但土耳其总理本人据说安然无恙，虽然受到严重震荡。

曼德列斯是来参加塞浦路斯问题会议的，并预定出席我在唐宁街十号举行的宴会。经过大量的讨论和磋商之后，终于作出安排，晚宴推迟至晚9时举行，并只有希腊人出席。土耳其人（包括佐卢）都进了伦敦医院（曼德列斯就送在这里）和其他的医院。

695 由于这场悲剧事件，宴会自然是颇为阴郁的。但我和卡拉曼利斯及艾弗茹夫两人却进行了很好的谈话。虽然他们已经取得大主教对苏黎世协议的同意，并劝告他说我们应当保有我们基地的主权，但希腊人显然〔是急于〕……卡拉曼利斯先生大胆地谈到他会给大主教施加压力的，而我也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在我看来，卡拉曼利斯好像比去年夏天我在雅典见到他时更有信心得多。艾弗茹夫呢，我认为难以捉摸，比较圆滑。

大约晚间10点30分，卡拉曼利斯先生和我去伦敦医院问候曼德列斯，并向他致意。当然，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但是我们看到了佐卢外长和其他的人。我想我们这次探视是受到欢迎的。<sup>②</sup>

第二天，2月18日，虽然会议没有正式举行，但三位外长见了面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这时，大主教好像是非常不肯妥协。下午5时，我听说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都“腻了”，想要回家！

---

① 1959年2月13—17日。

② 1959年2月17日。

然而，塞尔温·劳埃德——他以极其高超的手腕在处理这一切——在下午七时开成了一次全体会议（但首相和总理没有参加）。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政府再一次对塞浦路斯计划表示同意。库楚克先生（土族塞浦路斯人）也同意了。大主教（据塞尔温报告说，他好像是心神不安，毫无主见）申述了他的反对意见，全部都集中在苏黎世协议上——也就是说，集中在塞浦路斯的希-土宪法上，等等。他并没有提到伦敦宣言——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英国的条件。

由于报界一直广泛地报道大主教反对我们保留对基地的主权，又由于这对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听说他事实上并没有采取这条路线。

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斗争中，我们将在国内受到很大的压力——来自工党的，来自自由党的，来自鲑鱼般的整个报界。……倘若我们坚持主权而反对租借，我们就会被指责为破坏者。倘若我们退让，我们就会使党遭到一场议会危机。

塞尔温·劳埃德鉴于事态发展的这种方式，鉴于艾弗茹夫和佐卢始终是那么强硬——在晚上9点15分宣布休会。他告诉大主教说，苏黎世-伦敦协议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这次会议（事实上也是全世界）696所想要知道的就是，身为希族塞浦路斯人领袖的大主教究竟是要说“是”还是说“否”——究竟是开辟和平的道路还是封锁它。让他想一想——明天早晨再作答复。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了。

我在晚上十时去外交大臣的公寓，从他那里听说了全部的经过。殖民大臣和富特也在场。

我们讨论了我们的计划——如果大主教说“否”，怎么样；如果他说“是”，又怎么样。如果说“否”，我们就要召开各国（联合王国、希腊、土耳其）代表的全体会议……重申我们的计划以及我们的信念，即当这个计划被人理解时就一定会为人接受的。（艾弗茹夫说过：即使现在他说“否”一个星期之内他就会说“是”的。）因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机构以便采取必要的步骤，就像他要说“是”那样。

坐到相当晚，归来是一大“箱”各式各样的问题。

2月19日。不平凡的一天。殖民大臣上午9点钟来电话（紧接着



是外交大臣)回答是：“是”。塞浦路斯协议因此就定下来了。<sup>①</sup>

协议的主要条款规定：塞浦路斯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须保留英国对基地地区的主权以及为保证有效地使用这些军事基地所必要的一切权利，这些均由希腊、土耳其以及新共和国加以保证。总统应为希腊人，副总统应为土耳其人。希腊语和土耳其语同为官方语言。共和国将有它自己的国旗，但两族居民在节假日有权自由悬挂希腊国旗或土耳其国旗，并加上新的塞浦路斯国徽。总统和副总统将由部长会议协助工作，包括希腊代表七名与土耳其代表三名。立法权赋予由普选选出任期五年的众议院。在这个议会中，希腊人应占百分之七十，土耳其人应占百分之三十。此外，每一族应各有其自己的族议会，处理其自身权限以内的事务，诸如宗教、教育、文化问题以及有关个人身份的事务。为此目的每个族议会都可以向本族的成员征税。文官应为希腊人占百分之七十，土耳其人占百分之三十。有关同族或异族成员之间的民事纠纷，也做了其它各种安排。

三点半在兰开斯特大厦召开这次会谈的全体会议：

我们拟出了我们的计划——先签字，后讲话。（我们一定得确保主教不再提出任何意见或再得寸进尺。）我担任主席。英国代表团坐在用桌子排成的长方形的一边，希腊和土耳其的政府代表团坐在对面，我的右边是大主教（有两名助理），我的左边是库楚克博士（也有两名助理）。

我宣布开会，并请外交大臣（他坐在我右手边）宣读声明。他很简短地宣读了，以今天早上大主教表示接受计划的文件作为结束。因此，外交大臣可以报告说，现在每个人都表示同意了。<sup>②</sup>

只要进行一个仪式——那就是在各项协定和宣言下签字，对此我提请会议注意。

我说：“当签字仪式完成之后，我打算讲几句话——不用说，各代表

① 1959年2月18—19日。

② 1959年2月19日。

团团长也都希望讲几句。”我补充说，“有一份文件要由两位首相和一位总理签字，我愿提议卡拉曼利斯先生和我在这个会议之后到医院去（假如土耳其总理康复到足以接待我们的话），并且大家一起在他的房间里签署这份文件。”当全部签字都已平安完毕之后，我发表了很短的讲话，其他人也随着讲了话。<sup>①</sup>

然后我们走到客厅里进茶点和谈话。

我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进行了十分有意思的谈话，我是头一次见到他。他同我想像中的一点也不一样。我曾想像他是个魁梧的人——像达曼思金诺斯大主教那样。一点都不是，他最多不过五英尺八英寸左右……有一双好手，灵巧而富有艺术性。我应该说他很可爱、精细、明智，但并不坚强。恐怕这可以解释他的游疑不定吧。<sup>②</sup>

吃喝过后，卡拉曼利斯和我同车前往伦敦医院。

698

我们被带到房间里，里面挤进了一大堆人，包括外交部的一名信使带着一个精美的银墨水瓶！我们都签了字，和曼德列斯总理略谈了几句之后，就退出来了。曼德列斯看来很好，而且非常高兴，——他也该很高兴了。

希腊人也很愉快——尽管他们认识到他们并没有做成最好的交易。他们本可以接受拉德克利夫计划或者麦克米伦计划而做得更好一些。但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那是大量的——如像大使和其他的一些人，都为英-希之间的长期纷争已成过去，我们以前的友谊又可以重新开始而高兴。<sup>③</sup>

夜深时我去下院，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我们就我们谈判的成功结束做了简短的声明。向下院说明详情以后，我又补充说：

我把这个协定视为理智与合作的一个胜利。其中没有任何一方是遭受挫败的。对大家都是一个胜利。由于拔除了怨恨与分裂的根源，这个协定将使我们、我们的盟友以及塞浦路斯人民能够集中力量一起为和

①②③ 1959年2月19日。

平与自由而工作。①

盖茨克尔代表反对党作答复时，禁不住说了几句讥讽话，我也有些气愤地做了答复。这场小小的交锋是有帮助的，因为保守党对于放弃我们在该岛的条约权利自然会有某些疑问。

盖茨克尔错误地做了一种讥嘲（而不是豁达大度）的回答——我就抨击了他。这在我们党是非常开心的，大家狂热地欢呼起来。②

在答复来自保守党席位上和工党席位上的进一步的问题时，我试图总结这个协定的真正作用：

699 如果任何一种解决方案要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案，就得各方都做出牺牲。“意诺西斯”的主张已经被放弃了，这是个很大的牺牲；分治的主张已经被放弃了，这又是个很大的牺牲。除了对我们的军事需要是必要的那些基地的主权以及使它们能起作用的各种必要的权利和便利而外，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主权。因此，如果我们把这叫做牺牲的话，这就是所有各方的牺牲。③

关于塞浦路斯是否要成为英联邦的一员的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出来。我指出，这个问题部分地取决于新共和国，部分地取决于联邦的其他各成员国。所有这些势必仍然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我很高兴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主持一次选举塞浦路斯并欢迎大主教成为我们团体中的一个成员的英联邦总理会议。

还应该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其他朋友们的诚挚的贺电，以及向各联邦政府发出的正式通知。我特别感激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写给我的一封信件：

你昨天就我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努力谬加赞扬，我非常感谢。没有你本人的耐心和手腕，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达成的。根据我和他们所有的人的谈话来看，最清楚不过的就是，你总是设法赋予希腊首相和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9年2月19日。

② 1959年2月19日。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59年2月19日。

土耳其总理以对我们的信心以及对他们自己的信心，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一起达成这些协议。你已经重建了欧洲的协调。

完全像预料的那样，仍然有不少的困难需要克服；尽管这些困难可能是非常麻烦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希腊的还是土耳其的政治家们都不会食言。卡拉曼利斯在一个团结稳定的政府里为他的国家很好地服务了多年，他是个真正正直的人，而艾弗茹夫在尊重协议的文字和精神这两方面也同样是值得信赖的。这一点对土耳其的政治家们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这些人在性格上确实是大不相同的。佐卢是粗鲁、强硬、有时粗暴，但时而流露出一丝幽默，时而又似乎以他提出自己的论据时的那种粗野和顽固把成功的机会推到了危险的地步。然而，他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曼德列斯——我认为他的祖先一定有某些希腊血统——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在讨论中态度灵活，有点风度潇洒，当局势看起来无望时，往往会力挽狂澜。此后不到三年，我惊悉佐卢和曼德列斯竟在国家紧急时期中惨遭杀害。他们都像犯人一样被处绞刑。这种可怕的行为对土耳其的所有朋友们都来得像是一声霹雳，而对于我来得特别强烈，因为我曾和他们有过亲密的交往。而且，保持对卸任的首相给予养老金而不是给予处决的这一传统，对于我还有着切身利益关系呢。

到2月底之前，对于释放塞浦路斯拘留营里的囚犯和特赦“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恐怖分子，都已做好了各种安排。已经准许格里瓦斯将军安全返回希腊。流放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命令也已经撤销了。到了3月底，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三国议会都已正式批准了这一协定，尽管在夏末和秋初在有关各方之间还出现了许多小难题，而其最后的解决又需要耐心和果断。然而，到了我第一次首相任期结束以及1959年10月大选的时候，塞浦路斯问题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解决了。可是，简短地结束一下这

段故事或许还是适宜的吧。

本来提议最后移交权力应于协议签署后一年之内进行。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事需要有待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同意的了；可是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进行的一场冗长而厌人的谈判却拖了整个1960年的上半年。因此，独立的日期也就随着这些乏味的、几乎是拜占庭式的争论而月复一月地向后推延，这些争论先是于1960年1月在伦敦圆桌会议上进行，此后整个春天加上夏初则在塞浦路斯进行。主要的争执是关于基地区域的大小和对它们的基本需求采取何种保护措施。但是，既然我深信只有我们获得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的善意，基地才能真正起作用，所以我就准备面对漫长的谈判。还有其他的一些差不多同样含混的问题。在这场拖得异常长久的辩论中，有一次外交部的专家们发现岛上有两个少数集团，他们的困境应该博得我们的同情。这在我看来似乎太超出我们的义务之外了，于是我就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外交大臣。“有关马龙教派和亚美尼亚教派的这一切都打算干什么呢？还是不要让我们为了几个一钱不值的异端教徒弄坏了整个这艘船吧。”

1960年2月初，我派去了当时的殖民部次官朱利安·艾默里。他和马斯喀特苏丹王打交道时的那种谈判手腕以及耐性与决心的非凡结合，我是早有领教的。我告诉他说，他将面对着一个决心要把我们的主权基地缩小到最低限度的精明的谈判家。可是他有着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即大主教要求尽可能快地独立。如果大主教刹车不动，我们的答复就将月复一月地拖延独立日期。艾默里证明了自己具有像他的主教对手一样强韧的耐性。到1960年7月1日终于达成了一项全面协定，8月16日正式移交权力，同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就任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 第二十章 繁荣还是衰退

702

我既然要关心国外的、联邦的和殖民地的事务，又必须经常出国访问，这就需要为此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心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得一切有关方面的谅解。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首相出国必须获得君主的特别允许。而且，他还必须获得他的同僚的谅解和通力合作。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我有三位忠实的大臣给予得力帮助，这就是塞尔温·劳埃德（外交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联邦事务大臣）。最后提到的那位大臣，那时是霍姆勋爵，在上院当议员，对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曾给予极大的支持。和一般人的想法相反，除了在一个政党刚刚取得胜利而对它充分信任的头几天之外，上院对一个右派政府甚至比对一个左派政府往往更爱找麻烦。当那些年老的或退职的大臣以及退休的下院议员当了上院议员而聚集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加上他们的失望情绪，有时是非常难以对付的。人要么发号施令，要么服从命令，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一条因人类天性不完善而产生的规律，因此要平息保守党人掀起的风波，比起应付自由党和工党更为频繁的批评风潮来，还得需要更高的手腕。在索尔兹伯里勋爵辞职后的特殊情况下，亚历克·霍姆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他得到了黑尔什姆勋爵的有力帮助。

可是，国内问题是一个经常令人焦虑的问题。要克服重重困难，我不仅需要依靠我的主要同僚，而且还要依靠内阁全体成员的帮助。在对外事务上，这个内阁，象我向来参加的其他内阁一样，是愿意听从首相和负直接责任的大臣们的建议的。但是，在国内

703

事务上，所有的大臣都感到他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表达有时是很详尽的意见。而且，由于他们或者都不知情或者都一样知情，他们的意见都是具有同样的分量的。

还有，我必须写下这届政府的第二号人物“雷布”巴特勒对我的帮助。他一个人担任三个重要的职位：掌玺大臣，内政大臣和下院领袖。人们普遍地承认他是我的副手。当我不在国内时，由他主持内阁工作。我向国内发信都是发给他的，如果他认为合适，由他转告我们的同僚。他虽然比我小八岁，但有更丰富的行政经验，在战前政府中任过官职。丘吉尔曾亲自选拔他去整顿上届艾德礼政府给他们留下的财政经济烂摊子。他在内阁会议上总是坐在我的旁边，在其他同僚发表意见之后，我最后常常问他有什么意见。如果说他的建议有时在提法上有点暧昧难懂的话，但总是思想深刻的。

我常常出国，巴特勒和议会领袖爱德华·希思一起主持下院。他的丰富经验在这个政治机构里也是很有价值的，在涉及他曾长期主持过的研究部时尤其如此。

除他之外，在桑尼克罗夫特辞职后，我其次还依靠财政大臣德里·希思科特·艾默里的帮助。他在困难的时刻接任财政部，凭他的智慧、好脾气加上通情达理的作风，很快就在下院树立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地位。他获得了工党议员的好感，因为他对他们总是彬彬有礼，使他们感到他这种礼貌真正是出自他的和蔼可亲的基督徒品质。我们曾经担心，围绕着桑尼克罗夫特辞职的争论会使随时都不很稳定的政府倒台。我曾充分准备，我们总得遇到通常出现的一切麻烦，我们将遇到桑尼克罗夫特、伊诺克·鲍威尔和奈杰尔·伯奇这三个人的联合力量的激烈反对。可是事实上，他们的第一次袭击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有点象拼凑起来的三剑客执行着“以进为退”的异常计划。

贸易大臣戴维·埃克尔斯凭他的机敏而杰出的头脑，曾在经济问题上给予艾默里以极大的帮助。我们的内阁会议也由于雷吉·莫德林、伊恩·麦克劳德和接替艾默里担任农业大臣的约翰·黑尔的参加而大为加强。住房大臣亨利·布鲁克的稳妥的工作和明智的建议是值得信赖的。国防大臣邓肯·桑兹的才干总是靠得住的，有时是杰出的。至于我的老朋友米尔斯勋爵，我更是随时听取他的意见。这些人，加上大法官基尔穆尔勋爵（那时他正处在毕生中精力最旺盛和工作效率最高的时期），组成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使我特别高兴的是，我把老朋友欧内斯特·马普尔斯请回到了政府中来。

即使是随便阅读的读者也会感到，这一卷书的大部分是谈论世界和联合王国的事情的。共产主义者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欧洲和北约组织的特殊问题；英美联盟的加强；中东和远东危机的不断出现；俄罗斯之谜；西欧的分裂——所有这些占着我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因为这些事情吸引了我的大部分思想和行动。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完全了解我之所以这样专心于对外事务原因的。在这个时期里，尽管英国受过创伤，有着种种弱点，但仍然是一个有影响的强大国家，深受它的伙伴和盟国的尊敬，为它的敌人所害怕，在全世界的重大战略地点上都部署了强大而组织良好的军事力量。决定对新兴的殖民地国家给予我们曾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那种独立，并不一定招致英国的威望或力量的削弱。至于其后不久所发生的变化，究竟是难以避免的还是措施失当所致，那就不是由我来评判了。我所写的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经历的事情。

在这个进步的世纪里，“国内问题”基本上是经济问题。在维多利亚时期，我们的前辈可以在议会里就重大政治问题进行比武式的论争，而不必十分考虑到那些令人为难的和不光彩的困难；而  
705  
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曼彻斯特学派长期统



治的日子里,确立了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原则,政府对社会或经济问题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全国的思想可以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第一,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第二,科学对宗教的预期的影响。第二个问题被认为是格拉德斯通先生的特殊工作领域。

现在经济学已取代了一百年以前神学所占据的地位。经济学界的分歧代替了神学界的分歧。每一所大学,不论新建的还是原有的,都培养出大量的经济学家,而这些人又是由过去曾经以圣俸和圣职供养教士的那些机构来维持的。在各个互相冲突的派别中,比较有成就的信徒,可以称之为经济教会的正规教士,靠学院基金来维持。其余的可以比作教区牧师,他们出现在日报、周刊和月刊上,出现在各个银行和其他企业团体所出版的刊物上,出现在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通讯器材上,他们“激烈地发表着他们的不同意见”。不要认为目前经济学界比以往各个时期的神学界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事实上,愤恨的感情如此之甚,以致在各个学派内部宗派信徒往往比非信徒更令人厌恶。但是,由于大臣们和公众容易被空谈家们的大量著作所迷惑,所以现在他们的权威不可否认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我很高兴地同许多专业的和业余的经济学家有着亲密的友谊。我向来特别喜欢那些热烈宣扬自己信条的人。因为,一个热烈的人,即使有时是错误的,但毕竟绝不是消沉的。然而,实际的政治家却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力图走一条中间道路。

在1956年和1957年期间,我准备接受和听从我们最有经验的顾问们的诊断和建议。这些顾问不仅包括英格兰银行和各个交换银行,还包括财政部的专业经济顾问以及通过各种新闻机构发表评论的许多经济评论员。他们似乎一致认为,用当时流行的术语来说,国家经济情况是“过分的热而需要冷却”,或者“过分扩张而需要松弛”。换句话说,应当采取一种和缓的、但意义重大的紧

缩措施,或者叫做消除膨胀的措施。无论如何,症状是容易看得出来的,也是历届政府一向据以判断情况的准则。这些症状就是:英镑对美元比值的下降,这可能会达到挤兑外汇那样的疲软程度;批发和零售价格的不适当上升以及出口贸易的减少和相应地在国际收支中出现赤字;就业过多,空缺(即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超过人员供应。(最后说到的这个征象有些复杂情况,因为即使在全国失业比率很低的时候,也可能在某些地区同时出现讨厌的高比率。)如果人们普遍地认识和承认这些症状,则他们也会认识和同意应该采取哪些适当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包括减少政府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的开支;增加银行贴现率并采取其他措施,如限制分期付款的购买,以减少需求;由财政当局控制公开市场的买卖以吸收购买力;实行严厉的税制,最后还要采取断然措施来抵抗加在所谓“工资战线”上的压力。

当然,在我这里所描述的那个时候,社会的弊病以及所提出的治疗方法,与后来所发生的严重祸害相比,还算是性质极其温和的;同样地,那时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是相当克制的,同其后几年所采取的大胆果断的办法大不相同。百分之七的银行贴现率在当时看来是消除膨胀的惊人信号,几个月也忍受不了。至于实行大规模的国际借款,不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这种想法也同我们的温和平凡的设想相去甚远。要煞车或者减速,那时的目的不论多么不成熟,也不过是为了在人群拥挤、遍地陷坑的危险道路上安全通过罢了。

当时认为在实行上述措施时,最关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止生产企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资有不适当的增长,以致超过了提高后的生产率所允许的限度。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1957年的夏季,成立了关于物价、生产率和收入的委员会,即所谓“三贤人”。这个机构或者可以说是好几年以后由一位工党首相建立的全国物价和收

人委员会的先驱。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的目的是企图依靠这些被认为公正的人的权威来推行政策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派都要尽量降低这些人的影响或者对他们的调查结果提出质问。盖茨克尔甚至以讥讽的口吻来攻击“三贤人”的报告。他说：“他们提出的不是科学的报告，而是一篇政治论文。我们不需要一位法官、一位会计员和一位前经济学家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sup>①</sup>一个专业经济学家称另一个专业经济学家为“前经济学家”，未免有点刻薄。科恩的报告的确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给予了全面的支持，并且对当时悬而未决的工资要求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当时人们反对仲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仲裁者可能受到科恩勋爵及其同僚的观点的不适当的影响。

在“三贤人”之后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指示灯”的政策。如果工资提高的比率大体上同生产量增长的比率为相适应，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放心；根据这种看法，我们的专家顾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把工资和薪俸提高百分之二，而不超过这个限度，应该为物价的稳定所允许。因此他们认为，基本工资一般应订立百分之二的“指示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订为百分之三。当然，对于特殊的情况，尤其是对于鼓励性的奖金则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个规定也多少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只是到落实时违犯规定的多而遵守规定的少。

我在1956年心里就想到，并在1957年真心诚意地认为，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审慎的消除膨胀的措施。我之所以没有对桑尼克罗夫特的辞职过分焦虑，其原因之一就是我感到（与其说出于理性毋宁说出于本能），当时的形势行将发生变化。毕竟到了1958年初，英镑币值稳站高峰已有八个多月之久了。在1月份，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元，而失业人数的比例虽然只

<sup>①</sup> 《1958年年鉴》，第10—11页。

占百分之一·点八,但失业总数却增加了六万人。这确实使激烈主张紧缩的人感到满意。财政大臣的报告在最初的九个月中也是令人放心的。政府的开支只比前一年的开支稍为多一些,而财政收入却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长。看来国际收支可能有所改善,虽然在外表上还有必要在各个领域推行普遍的限制原则,而提防发生变化也同样是明智的。

早在1958年,我就开始听到美国“经济衰退”的说法。这种衰退是美国共和党政府在乔治·汉弗莱的有力推动下,放弃了实行多年的他们称之为民主党大手大脚的开支政策而决心恢复正统的经济政策之后出现的。这件事的后果对我们说来可能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我们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到会的有财政大臣,掌玺大臣,莫德林以及财政部官员,包括刚从华盛顿回来的莱斯利·罗恩和罗伯特·霍尔教授。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会议。因为很明显,美国人还不知道怎样对付他们自己的“萧条”,更谈不到对付行将到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了。我真希望我能够使美国政府相信:如果我们听任自由世界陷于贸易崩溃和大规模失业之中,那么就是氢弹也挽救不了它。<sup>①</sup>

这时,我开始敦促新任财政大臣必须做好计划来应付情况的变化。我们也许立刻需要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业,给国家经济注入更多的资金而不是挤出更多的资金。但我们仍然必须谨慎从事。我们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所能期望于德国的支持款项,充其量是四千七百万镑,而不是过去我们所希望的六千三百万镑。今年国家保险基金要出现的赤字,将是二千三百万镑,而不是一千四百万镑。(对于后一个数字,过去我们曾大胆地增加印花税八辨士而对付过去了。)

于是我开始对财政部内我的不愉快的同僚反复说明自由世界

---

<sup>①</sup> 1958年2月27日。

没有充分的流动性。在2月28日,我写道:

709

当然,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去了解我们实际处境的严峻现实和美国的情况。然而,情况同样是令人悲哀的,因为我们认为可以在自由世界中制定一个稳健的经济扩充计划——而且是可以付诸实行的计划——只要我们同意在国际上建立适当的财政机构就行了。

毕竟,黄金只是一种象征,而通货则是一种手段。全部资源摆在我们面前,有原料、劳动力和技能,需求也是明摆着的,这些都是事实。自由世界应该能够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进行工作,而且是开足马力地工作。我们的失败确实在于组织不起来。

与此同时,有一位老朋友罗伊·哈罗德,是个顽强的经济扩展主义者,他警告我说,在前头是衰退的危险而不是繁荣。他的预言,我很少发现是不灵的,虽然他往往是处在预卜经济凶吉那种不愉快的地位。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他说,情况也许是这样:在国际上,后退或衰退是主要的危险,但在国内还是不要过早地放弃阵地,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不要在工资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如果需要再度膨胀的话,那么最好还是用货币方法来进行,而不要大幅度放宽政府基金开支的限制。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由艾默里建议提出的大致平稳的预算案获得了普遍的同意。我在3月14日对预算案的详细讨论有如下的记载:

下午七点钟,我请财政大臣和掌玺大臣(巴特勒)来共进晚餐并进行商谈。我们对经济情况和现在应采取的办法进行了几小时的讨论。财政大臣认为,“繁荣”或“膨胀”仍然存在,巴特勒和我则有所怀疑。<sup>①</sup>

然而,对于当前的需要,我们之间倒没有什么分歧。

我们一致认为要设法在目前我们面临的工资战役上(公共汽车和铁路方面)获胜。但是,只要这些事情一成过去,我们就必须再度实行扩展主义的政策。<sup>②</sup>

---

①② 1958年3月14日。

银行贴现率从百分之七减为百分之六之后几天，预付了一些垫款。两个月以后，5月22日，又降到百分之五点五。然而，当一些新的想法，甚至包括恢复英镑浮动比值的设想，在我的坚持下，在财政部内部以及同重要的银行家之间一直进行着广泛的讨论的时候，主要的决定还是没有更动。我们必须首先守住工资战线。在取得一些显著的成功之后，我们也许可以稳妥地作某些变动，暂停或撤销推行已久的限制措施。 710

在运输行业方面，这种考验就出现了。3月25日，伦敦公共汽车工人拒绝企业法庭的裁决，这个法庭曾在2月初经汽车工人同意而受理他们所提出的申诉。差不多与此同时，铁路法庭提出了否定的裁决书，这种办法是有法定资格的铁路工会在铁路国有化时曾表示同意的合乎宪法的诉讼程序。

几乎可以肯定，铁路、汽车、码头和公路运输业的罢工将要发生。现在，在我们许许多多困难之上又增加了这个困难。铁路法庭将在一个星期后提出它的裁决书。不管怎么裁决（工资增加百分之三或者一点也不增加），工会是不会接受的。<sup>①</sup>

裁决书是在4月10日由约翰·福斯特爵士发出的。他建议根本不增加铁路工人的工资，理由是“没有可供使用的资金”。出席委员会的工会代表（当然不是铁路工人）并非毫无理由地提议作微小的增加（比方说，增加百分之三），以便同去年以来生活费用的增长相适应。

可是，约翰·福斯特爵士却把责任断然推给政府，说是（1）铁路工人的工资同其他国有企业和一些私有企业比较起来是属于“低”的；（2）既然运输委员会破了产，而英国政府（银行界）事实上又已经拒绝贷款，因此他除了提出“零”的裁决之外，别无其他办法。<sup>②</sup>

---

① 1958年4月3日。

② 1958年4月10日。

我同我的主要同僚商讨,看来主要的问题似乎是:

711 (1) 在工资比率同平均收入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以搬运工人为例,基本工资比率为7·7·0镑——平均收入为9·9·6镑。(2) 英国政府给铁路企业拨出五千万或六千万镑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拨出一亿五千万镑以上来弥补资本项目的赤字。(3)处在危机中的并不只是铁路工人的工资。在全部工业中不知我们是否还要对付别的工资螺旋形升降。①

在那时,我非常希望,政府虽然是坚定的,但不应该看起来似乎是顽固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向工会“挑战”,但有些人……希望这样做。我们必须向工会呼吁,并主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倡议。②

这时我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很多,所以十分希望避免铁路工人罢工。

如果铁路工人真的罢起工来,则损失将是严重的。因为,如果罢工持续下去,现时的亲善感将会消失,而仇恨心将会出现。中等阶级那么愤怒,以致自由主义的精神将会助长阶级斗争。③

于是,我给大家传阅一个文件,说

女王陛下政府可以在适当时采取“主动措施”。这个措施事实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加快资本运转的时间表,资方和工人都可能赞同“以效率促进经济”——不实行限制政策,封闭支线和容纳额外劳动力。④

给我们添加麻烦的是,4月21日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卡车司机举行罢工,不久就扩展到整个市场,其后还遍及各个码头。于是我们就有了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将要来临的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将要来临的铁路工人罢工,以及已经开始的码头工人罢工。在我看来,使铁路畅通无阻是十分重要的。我同公众一样,对铁路工人感到

---

①② 1958年4月10日。

③④ 1958年4月11日。

同情。国有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所有的梦想已经化为乌有。英国运输业委员会主席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将军为了完成他的任务进行了崇高的奋斗，但这个任务在当时却不是任何个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我取得了罗伯逊和劳工大臣伊恩·麦克劳德的同意，向有关方面发出了进行共同商讨的邀请。

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和陪同他的一些主要官员〔西德尼〕格林先生 712 (全国铁路工会)，〔艾伯特〕霍尔沃思先生(机车司机和消防工人联合会)和〔威廉〕韦伯先生(铁路公司书记)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应我在上星期五发出的邀请，于三时四十五分来到唐宁街十号。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多些。布赖恩爵士简短地给我们介绍了代表团；然后三个工会的秘书分别发言；然后是布赖恩爵士以运输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并且争辩说，如果铁路公司不是发生经济困难而政府又没有拒绝把贷款增加到二亿五千万镑以上来应付当前急需的话，那么，仲裁法庭本来是会答应这项要求的。委员会主席说，他现在不能付给更多的工资，因此他接受仲裁法庭的裁决。然而，他认为，如果政府重新考虑他们对现代化计划的态度，并且还在别的一些方面来给予帮助，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善的。我于是提出政府的立场（我说的话大体上是根据前一天晚上各个主要有关大臣在会议上取得同意的一项纪要）。我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同心协力，通力合作。委员会应该着手大力加紧研究刷新经济这个问题，应该拟定详细的计划，这当然包括关闭一些铁路线和车站以及采取别的一些相当激烈的措施。必须节约人力。工会应该同意容纳额外劳动力和废除一切尚存的限制性措施等等。如果是这样做了，则政府自会（作为一个迫切性的问题）考虑加快进行现代化的任何计划。

我说完这番话之后，工会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但调子却十分友好和合理。大家喝了许多威士忌酒。

最后，他们同意第二天下午同罗伯逊会晤，讨论各人的发言，尤其是考虑政府的建议。

于是达成了一项公报——公报的各项是在会议前由政府官员拟定



的,只有很少几处需要修改。到此为止,一切都还顺利。①

4月28日,伦敦运输业执行委员会向公共汽车司机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但立刻就被拒绝了。

713 我同伊恩·麦克劳德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一致同意他就伦敦汽车工人工资问题给卡曾斯的答复中所提出的条件。现在看来罢工已是不可避免了。这可能是有好处的。②

5月5日,公共汽车工人开始罢工。看来,布赖恩爵士正在同铁路工会举行的谈判可能也要破裂了。

议会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保守党议员正焦急地等待着,看看我们采取什么办法……[有些人]……准备向我们扑过来。”③然而使我更担心的却是关于工业和实际方面的事情:

要使人民吃饱穿暖,精神饱满,并不是很快就容易办到的,除非他们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这样看来,铁路工人一定已经拒绝了人人都认为公平合理的建议了。④

总的经济形势正在改善,储备也不断有所增加。但是,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这个争议同时在两个方面被利用了。有些人说,罢工会破坏我们的信用。另一些人则宣称,从长远看来,向“膨胀的需求”让步将更为有害。幸而在这个时候,反对党决定提出一项针对政府尤其是针对劳工大臣的谴责议案,说是政府没有对公共汽车工人的争议进行干预。

[艾尔弗雷德]罗本斯首先发言,内容很有力,讲得也很好。麦克劳德进行答辩。他发言时没有拿讲稿,在下院不拿讲稿发言本来是可以大大提高效果的。但我本人直到最后他快说完之时,才听出了这篇发言的不寻常处。他在结束时说了短短的一段话,表达了他对盖茨克尔的嘲笑和蔑视,这简直就是一片谩骂。盖茨克尔在下午九时发言,接着就是我

---

① 1958年4月22日。

② 1958年4月29日。

③④ 1958年5月6日。

发言。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多数——六十七票。我们的党看来情绪很好，虽然每个人到现在还有些担心。<sup>①</sup>

公共汽车工人不像铁路工人那么有道理。他们曾同意进行仲裁，并且至少对方曾向他们表示过可以增加一些工资。他们虽然可以给公众带来不便，但却不能对经济给予严重的伤害。的确，如果采取一种不讲原则的态度，那么，最合我们心意的，就是在不危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不再纠缠下去。我一方面准备面对伦敦甚至各省的汽车工人的罢工，另一方面我为了促使铁路方面达成协议，决定作出某种让步。5月6日星期天的下午，我从首相别墅回到伦敦，同主要有关大臣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这时，罗伯逊已提议在10月份对“工资作一些提高”，在7月份进行“检查”。这当然是阻止不了罢工的。 714

固然有些大臣和党内许多人都想“摊牌”，但我认为他们并不了解事情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即使我们获胜(这是不可靠的)，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sup>②</sup>

财政部现在似乎特别倾向于正統的理论，而有些大臣也以婆罗门式的忠诚对这种理论顶礼膜拜。这种理论认为，除非从经济节约措施中省出钱来，否则绝不应该提高工资。由于这种理论似乎获得了普遍的支持，因此我认为最好就用这个理论作为协议的基础。已取得同意的节约数字已经达到每年约一千万镑。

如果我们每年能节约出一千二百五十万镑，那就很有理由付出一些。(一千万镑等于工资的百分之三。)换句话说，如果储蓄的总数增加四分之一，那么预先挪用三个月就算正当的了。我终于使大臣们接受这个意见(巴特勒十分支持，麦克劳德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就必须等待明天的内阁会议了。<sup>③</sup>

工业谈判的做法可以降低到或上升到这种近乎拜占庭式的狡

---

① 1958年5月8日。

②③ 1958年5月11日。

滑,但这却是空谈家们,尤其是经济报刊似乎十分喜爱的语言。无论如何,如果不能堵塞河流,至少也可以力图使它改道。有些大臣很勉强地同意我的建议,他们只是出于忠诚才同意的。

但我坚信我是正确的。公众的同情(总的说来)是在铁路工人方面。生活费用的数字(由于土豆和西红柿涨价)将在5月23日提高两个点,谁又知道高等法院法官莫里斯会给煤矿工人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要面临一次罢工,而对这次罢工,我们又只能依靠志愿工人和公众的充分同情才能加以制止,那我们就必须采取高姿态了。<sup>①</sup>

715 在这些纠纷中,劳工大臣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他在名义上是一位不偏不倚的调解者,努力使双方达成协议。这件事确实有点滑稽,因为其中一方是国营企业,而政府既是国营企业的东家,又是银行家。这确实是国有化所产生的难以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一次名义上只讨论塞浦路斯前途的内阁会议上,

罗伯逊将军打电话给我说,他已提议在7月份增加工资百分之三(或者更正确地说,从6月30日起),并且对铁路工人的工资进行研究,但他不认为铁路工人在6月1日前或者再早一些时候会表示接受。他们也可能要求增加百分之四。经过讨论,我们同意坚持我们的建议(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罗伯逊将军的建议),不管有什么后果。<sup>②</sup>

第二天,保守党议会领袖警告我说,保守党议员议论纷纷,恐怕会有麻烦,但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惊恐。从工会方面传来的消息更使人振奋。

我们听说铁路工会已决定考虑要怎么办。这至少是一个好现象。在当天早些时候,我们又听说职员工会大概会表示接受——火车司机和消防工人联合会也会接受。全国铁路工会则以十七票对五票通过决议,反对接受我们的办法……于是共产党人提出罢工的动议,表决的结果是十一票对十一票。<sup>③</sup>

---

① 1958年5月12日。

② 1958年5月13日。

③ 1958年5月14日。

我是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时我们正在讨论对约旦和黎巴嫩的军事计划。最后，当罗伯逊拒绝作出更多的让步之后，全国铁路工人，火车司机和消防工人联合会以及运输业职员协会就决定接受百分之三的建议，这是内阁原先表示同意的条件。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就可以准备应付公共汽车工人罢工和伦敦码头的部分混乱情况了。

虽然后座议员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些批评，但这已不能使我感到焦虑了。

保守党对铁路方面的解决办法大发牢骚。但是只要他们走到他们的选民那里去，他们就会发现人们对铁路工人是同情的。<sup>①</sup>

《泰晤士报》当然对这个问题又再度发起攻击，它发表了一篇极其尖锐的社论。我不禁感到，鉴于他们在工资战线上的种种言论，这种做法是相当不老实的。 716

雇主们已提议增加百分之五(生活费用)，再加上百分之六点五(改善费用)，同时，由于伦敦印刷协会提出更多的要求，《泰晤士报》很可能(和其他报业一起)准备让步。但主编却鲁莽地写出了一篇题为“价格”的文章来评论铁路工资协议。《经济学家》却感到比较惭愧，它的非难也缓和些了。<sup>②</sup>

几天之后，以百分之三为基础，同地下铁路职工达成了协议。公共汽车工人的罢工还在继续着，但公众似乎对罢工者比对政府更为不满。不管怎样，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在这个时刻决定降低银行贴现率。这一行动证明政府深信，国外人士一定会认为铁路工资协议是合理的和稳固的。

在这个时候，人们可以看出，既然运输业工会未能使铁路方面参与他们的斗争，现在他们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因此就

① 1958年5月15日。

② 1958年5月16日。

## 可能会

撤出六千名驾驶汽油输送车的司机，(从而)使全部公路运输陷于瘫痪……[还有可能]使发电站陷于停顿状态。<sup>①</sup>

正在这个时候，职工大会代表团主动要求来看我。随同他们一起来的有两位秘书，即文森特·图森和乔治·伍德科克。

讨论是很友好的，但却没有什么结果。很明显，(1)职工大会希望避免全国大罢工——甚至不希望罢工有任何扩大；(2)他们一直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害怕卡曾斯——一半因为他的规模（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会员），一半因为他的性格；(3)他们极其希望卡曾斯会得到帮助而摆脱他自己所造成的窘境，如果英国政府或运输部能够这样做的话……。

我向他们申明：(1)我们要维持主要的公用事业——汽油，电灯等；(2)我们并不想摊牌。我们希望获得公平的解决。

717

我把汽车工人的争议，企业法院的协议，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提出的在某些方面比裁决书有所改进的建议等等，全部都给他们讲了。卡曾斯对所有这些究竟是怎样对待的呢？

我把我亲自处理铁路问题的经过全都告诉了他们。工会领导人对我的帮助使协议成为可能，这一协议是一切不走极端的人都赞同的。<sup>②</sup>

讨论的结果，我们达成了一项新闻公报和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他们的要求和我的答复。我曾建议，弗兰克·卡曾斯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应该立即举行会谈，以寻求能够达成公平协议的基础。职工大会的成员对卡曾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正如我所预料的，谈判决裂了，原因是没有立刻给裁决书所没有包括的工人增加工资。

现在各种建议都提出来了；然而不论哈罗德·沃金森(运输大臣)还是麦克劳德(劳工大臣)都认为，现在卡曾斯可能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来分担撤销罢工或进一步扩大罢工的责任。

---

① 1958年5月28日。

② 1958年5月30日。

我感到几天之内无论如何是会获得解决的。但我们决不能走错一步。除非绝对必需，绝不出动军队。<sup>①</sup>

6月3日，代表团决定继续罢工。究竟罢工会扩大到什么程度，那时还不清楚。

这时在伦敦码头出现了恶劣的形势，那里有一半人已经罢工（非正式地），支持史密斯菲尔德的肉类搬运工人。<sup>②</sup>

第二天，

我在十时接见职工大会代表团。我极力要求他们不要扩大罢工，不要支持卡曾斯。我表明我不会也不愿意要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越出我在星期五所提出的原则，我仍然认为这个原则是商讨公平解决的基础。<sup>③</sup>

现在很明显，这是意志力的斗争。虽然我在私下的场合都以 718  
礼貌和谅解的态度来对待职工大会的代表，但在公开的场合我们还是采取了坚决的行动。我们对于卡曾斯威胁要撤出汽油分销处工人以及对于职工大会要进行干涉的唯一公开答复，就是取消一些部队的周末休假和提出这样的声明：如果对社会极关重要的公用事业受到威胁，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

6月4日是一个关键日期。职工大会断然反对扩大罢工，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而且有时是很激烈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以我提出的原则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6月7日我要到华盛顿去，但是在我启程之前，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沉着应付，罢工就会慢慢停止，这对工业界进一步的平静很有好处。

当我不在国内时，内阁讨论了在各个码头使用军队的问题，因为，据报告，卡曾斯说过，只要汽车工人罢工没有获得解决，码头或史密斯菲尔德的斗争就不会结束。但其后的消息表明，史密斯菲尔德的罢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码头工人的同情罢工，也可能很快

① 1958年6月1日。

② 1958年6月3日。

③ 1958年6月4日。

就会停止。

我在6月14日回到伦敦。虽然汽车场的大多数工人(他们的领导人已断然把责任放在他们肩上)投票主张继续进行罢工,但“这个英国人当他被击败他还不知道,这一活生生的事实,”<sup>①</sup>的确使我逐渐对他们的顽强性感到一种真正的、虽然有点不愿意的钦佩。6月19日,公共汽车工人的罢工显然将近结束,消息似乎已传到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因为现在银行贴现率又进一步减为百分之五了。在一个月之内,在工业相当混乱的时期中,两次降低贴现率,使我越发感到谨慎地改变政策的时机确实到来了。现在事情急转直下。6月20日公共汽车工人的罢工肯定已经过去了。人们取得了有益的教训,即使在国家垄断企业内,也可以施加巨大的压力,因为施加压力的结果之一,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公用事业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十。在6月份的头十天,码头工人的罢工和史密斯菲尔德的罢工也开始逐渐停止。到6月底,反对运输业工会领导人所采取的  
719 的狂妄政策的斗争,获得了有益的、痛苦比较少的胜利。尽管有些人进行吹毛求疵的批评,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认为,我们总的来说已牢固地守住了工资战线。

从政治的角度看来,公共汽车工人罢工显然是一个转折点。直到那时,虽然我坚信政府在下院确实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并且取得了道义上的优越地位,但在全国却没有出现同样的进展。1958年2月,罗奇代尔选区的补缺选举证实了我的忧虑。在那次选举中,保守党的票数惊人地大大减少了。虽然选举学是一门比较新的艺术,但我们并不需要高等数学的运算就能观察到。在这次奇异的选举中,虽然工党的票数稍为减少了一些,但保守党选票的很大一部分,一万六千票或一万七千票,却转移到自由党去了。当然,那里的自由党候选人具有代表英国政治生活中未来新力量的有利

<sup>①</sup> 《1958年年鉴》,第28页。

条件。《年鉴》的实事求是的作者对此作了如下的描写：

毫无疑问，在三个候选人中，以自由党候选人的风度最好；这位卢多维克·肯尼迪先生简直是一位电视明星（他的崇拜者称他为“卢多”），而他的妻子也许比他更加惹人注目，她是芭蕾舞演员和电影演员莫伊拉·希勒小姐。<sup>①</sup>

这位作者指出，罗奇代尔向来就是迎合时尚的。一个世纪以前，它发现约翰·布赖特是曼彻斯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的最满意的代表。其后它曾经是一位地位不亚于格雷亚·菲尔兹小姐的艺术家的出生地。虽然这一次新的一对很难说达到了这么高的高度，但这确实不是其他政党所能做到的。还有，自由主义的复兴还不至于限于罗奇代尔选区。

1958年春季，我毫不怀疑，尽管我们在1956年事件之后还勇敢地力图破浪前进，但我们却依然不断地落后。在4月4日的保守党大会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

善良的听众，热烈的欢迎。他们是勇敢的，但他们似乎感到潮流对我们不利。这个潮流将越来越有力地向前涌进呢，还是将在两年之内转变方向呢？不久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是否走到全国人民中去进行大选，这样也许对国家更有好处——这恐怕要招致失败，但不见得是十分严重的失败。在目前，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必要的或可取的。<sup>②</sup>

通常，从大堆来信中总是有许许多多的建议的。在我的经验里，内阁会议很少讨论政治形势的问题。大臣们应付种种当前问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我早就成立了一个由一些选定的大臣组成的党的“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以保守党的研究部为基础的，由迈克尔·弗雷泽掌管其事。这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机构，用以部署选举的政策和计划以及提出对当前问题的建议。

① 《1958年年鉴》，第5页。

② 1958年3月4日。



3月27日,托林顿选区的补缺选举有一些小小的进展:

我们在托林顿的补缺选举中因二百票之差而失败了。实际上这比我们的预料还多二千到三千票。而且在最后几天里,我们的候选人肯定是逐渐得势的。但只差那么几张票而告失败,实在令人恼火。我担心阿斯奎斯(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和她的儿子)的胜利将鼓励其他地方的自由党人。<sup>①</sup>

毫无疑问,自由党的复兴是由于人们对两个较大的政党感到有点失望所致。而且,每一次短暂的风波——例如最后的房租法令撤销了特别使富裕阶级受到影响的房租管制条例引起了人们的激烈反对;又如人们十分担心政府握有抵制工会要求的权力——都使一切抱不满情绪的人跑到自由党那里去。同时,房租管制的部分解除,是一切公正的评论员在原则上所极力主张的,但事实上却难以推行,不巧这件事却成为丢掉克文格罗夫选区补缺选举中721 沃尔特·埃利奥特代表格拉斯哥的议席的原因。他的妻子凯瑟琳进行了光辉的斗争,但由于许多一般原都可能投保守党票的选民临时弃权而归于失败。使我高兴的是,我终于有一天能够推荐这位杰出的政界人物为终身贵族。

6月14日,我从美国和加拿大访问归来,听到了在同一天举行的五个重要地区的补缺选举的结果。有三个保守党议席以多数选票得以保持住,自由党并没有取得象罗奇代尔或托林顿那样的成功。

这些情况确实对我们大为有利——这是最近几个月来的巨大变化。<sup>②</sup>

到7月初,我清楚地看到,政治的和经济的潮流已经转变方向了。

---

① 1958年3月28日。

② 1958年6月14日。

有些评论员好心地认为我们的政治局面的改善，一部分是由于我同埃德·默罗和查尔斯·科林伍德安排的在5月24日举行的一次电视广播。在那时，政治领导人在电视节目中出现并不象现在那样几乎是天天都有的，也许由于当时是少有的事而显得重要了。不管怎样，这次多亏得两位美国来访问记者妥善安排的讨论，似乎对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我之坚决捍卫我国的伟大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也许使我的许多听众大为满意，因为这同他们灵魂最深处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人也许更为正确地认为，这次局势的转变是开始于公共汽车工人罢工的失败以及要发动起来支持这次罢工的同情罢工的瓦解。

8月中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以及几天以后《每日快报》的民意测验，似乎明确地表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于是，所有的报纸都开始议论最近举行大选的可能性。

虽然这种做法有其吸引力，但我在本能上则是不赞成的。我感到人民会认为这不是光明正大而是要手段。我们这次能够转危为安是基于人们对我们的品格有一定的信任。<sup>①</sup>

投机活动到处出现，确实越来越使人伤脑筋，也许使工业和贸易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我在9月12日采取了非常行动，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在行将到来的冬天不会举行大选。我还说，这个公开声明“将解除反对党的痛苦”。

11月份接着举行的补缺选举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但如我预料的，到1959年1月，形势就不那么有利了。可是在3月份，我们的命运似乎又有些好转，而报纸也开始预料不久就会举行大选了。

这时，财政大臣提出了建议，要废除对银行借贷总额的限制和放松对提高资本和信贷的控制。1955年开始的所谓信用紧缩就

---

<sup>①</sup> 1958年8月23日。

这样宣告结束了。讨论的问题很快就转到政府的开支究竟应该按什么比率增加的问题。希思科特·艾默里提议每年增加百分之五——约七千五百万镑。他解释说，为了应付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需要，其中不仅包括偿还债务，还包括英联邦发展的需要，在收支差额中有四亿五千万镑的剩余是必需的。到7月底，大家同意在有失业威胁的地区集中采取某些膨胀措施。英格兰银行总裁看到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善而大为鼓舞，于是他建议立即考虑早些把英镑的两种比率，即官价的和汇兑的比率统一起来。

这样就把全部英镑市场集中在伦敦，而不是任令汇兑市场多少有点永久性地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去。这就是有着全部含义的真正的“自由兑换”。<sup>①</sup>

虽然最后的决定是推迟了，但事实上是要在该年年底之前作出决定。723 “三贤人”在8月25日发表了第二个报告，指出工资并没有像去年同时期那样上升，并且物价更为稳定。到10月份，由于面临着失业率上升的阴影，到冬天很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因而内阁中普遍的看法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政府的投资。这个问题向来而且今后总是在不冒新的膨胀危险的条件下如何刺激经济的问题。

失业人数从百分之一点九上升到百分之二点二，使工党分子有了进行批评的好机会。失业的“阴影”是我们的真正危险。固然，就算达到百分之三（到冬天将会达到这个数字），也仍然在盖茨克尔关于“充分就业”的著名定义的范围之内。但这还是要加以警惕的。我正在等候财政大臣回国，等候下星期举行内阁会议，讨论当前的“经济”情况和我们应采取的作进一步刺激（如果需要的话）的步骤。我们必须提防不要再来一次通货膨胀。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太大的紧缩。（关于这方面的事，罗伊·哈罗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备忘录。）<sup>②</sup>

在整个秋季，内阁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为了准备迅速行动，曾

---

① 1958年8月6日。

② 1958年10月9日。

请各个有关部门准备好提出的计划，目的是看看在目前它们为进一步投资究竟能够提供多少现实的可能性，如果情况许可或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的话。在议会召开之前，内阁在10月24日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内阁决定由我向财政大臣提出有关“膨胀”措施的建议。财政大臣对此表示接受，这正合我的心意。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因为党的全部命运是取决于我们：

- (1) 是否应该采取再膨胀措施
- (2) 能否及时采取再膨胀措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走得太远，我们能否顶得住另一次膨胀危险呢？(2) 就是说，如果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把繁荣停下来，那么要停止衰退又需要多少时候呢？这将是一件成败难卜的事情——象滑铁卢战役一样。<sup>①</sup>

尽管我们对经济动态进行了精密的计算，做得十分细致，也有了改进，但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一定有点幼稚。此外，尽管美国总统 724 作出保证，我还是担心美国会出现衰退，这将在我们昌盛的国土上投下它的黑影。

为了给进一步的生产开支留有余地，我们不断作出努力来使政府的开支有所节余。由于一切有关大臣的通力合作，我们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正在这个时候，我到英格兰西部和中部地区作短期的旅行，即所谓“会见人民”的旅行，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发现我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显然有所改善。但我并不因此就忘乎所以。一切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必要时提出一幅和谐均称的图画，表明我们在国内事务方面正不断改善，我们的国际声誉也正不断提高。

10月28日议会的开幕照例是令人难忘的。而且，从女王离

---

<sup>①</sup> 1958年10月24日。

开皇宫起,全部仪式都有电视广播,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有各种仪式(女王的蒞临等),都是从来人们不曾见过的——除了加袍礼之外,应有尽有。我可以肯定,效果是很好的。在这些仪式中,全部议会历史都显得极其神圣严肃。对我国的古代和悠久延绵的历史的回忆,绝不会对人民有什么害处。(有各种各样的新见闻——至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新的,例如,皇冠上面的十字架中的绿宝石,原来是属于撒克逊王忏悔者爱德华的,红宝石则是亨利五世在阿赞库<sup>①</sup>用过的。)<sup>②</sup>

虽然这次议会大会很可能是解散前的最后一次,但是各位议员的情绪却异常克制。甚至在前几个星期举行的传统会议,也没有在党内外引起多大的激动。盖茨克尔巧妙地 and 勇敢地为他的中间道路立场辩护。比万似乎已失去了他的热情。卡曾斯尽管善于词令并掌握着一百万以上的选票,但他却不能取得议席。工党大会, 725 用《年鉴》的话来说,已变得“谦恭有礼”。保守党大会则比较有战斗性,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叫做“帝国忠臣联盟”的组织的活动所致。尽管有些纷乱,一般情绪还是沉着而有信心的。对议会答辩的辩论也是平和的。近海岛屿的危机已经过去,<sup>③</sup>核试验的问题有待于另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政府的计划包括一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执行新的养老金计划的法案。其他的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不会特别引起争论。反对党要求为他们的修正案答辩的问题,是“失业”问题;他们还担心到秋季失业会有很大增加。

我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将是有生命力的,并且(部分地)为大众所欢迎的。唯一的阴影仍然是——“失业”。<sup>④</sup>

我开始对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增加压力。结果在11月20日,

---

① 在法国北部,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军于1415年在此击败法军。——译者

② 1958年10月28日。

③ 参阅本卷第17章。——译者

④ 1958年10月28日。

银行贴现率减为百分之四；事实上，此后一年之久这个数字一直没有改变。在圣诞节前不久，艾默里和巴特勒来找我，对预算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我们希望在不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把税收减少二亿镑。我们现在准备大胆向前迈步，这一步是我们过去一直不敢走的，这就是把官价的和兑换的英镑比率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在现代的专门意义上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说，实行非居民持有的英镑（而不是资本汇兑）的自由兑换。

在 12 月 12 日的大臣会议上

大家在原则上同意实行，但时间的选择则由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在下星期到巴黎时确定。我们相信，法兰西银行正在说服法国政府实行贬值和改为自由兑换。换句话说，我们因为强盛而想做的事，正是他们因为软弱而想做的事。但是，使我疑惑的是，法国也许想要阴谋把责任推给我们，从而使大家对我们不满。<sup>①</sup>

他们回国后，我们同意断然实行。12 月 27 日，正式公布决定。我一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被认为是促进欧洲统一的一大步，<sup>726</sup>幸好这件事的安排是

同其他一切欧洲国家（包括法国）一起进行的，而且同时（在一切国家中）实行“自由兑换”，而在法国则实行法郎“贬值”。这将刊登在明天（星期日）的报纸上，当然也在星期一的报纸上——那时我们将会知道《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以及一般报纸的评论。法国人，至少在官方是完全赞成的。当然，时间的决定是考虑到他们的利益的。<sup>②</sup>

有点出乎意外，报纸表示完全赞同。

甚至《每日先驱报》也只是刊登了盖茨克尔的批评而不作任何评论。无论如何，对于这些决定的“欧洲”性质，国内以及大多数法国报纸是充分了解的。<sup>③</sup>

---

① 1958 年 12 月 12 日。

② 1958 年 12 月 27 日。

③ 1958 年 12 月 29 日。

附带的结果是，把储备说成是“包含有黄金和可兑换的货币”而不是“黄金和美元”。我们的决定使这年的国际收支有四亿五千五百万英镑的剩余，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直到现在，我对财政大臣一直只限于发出一系列备忘录。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他在我的连珠炮似的催促之下还是保持镇定自若。在圣诞节想了几天之后，我开始感到还需要做一些事情。

各大臣举行会议讨论经济形势问题。“膨胀”措施有所进展——但财政大臣（在财政部的催促之下）还是无动于衷。他仍然担心出现另一次膨胀性的繁荣。六个多月以来，我所担心的却是相反的情况——行将到来的衰退。幸而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减低银行贴现率，结束信贷紧缩，废除对分期付款购买的限制，并且（在我的巨大压力下）给公共事业投资计划增加五千万英镑。但我仍然不能说这样做就够了。<sup>①</sup>

同一天，我和多罗西到整个东北部进行访问，对那个地方我们很久以来就是十分熟悉的。

727

天气很冷，遍地都是雪——但却是晴天，我们在斯托克顿受到十分感动人的接待，各地人民都很友善。这确实是很不平常的。当然，所有这些对于行将到来的选举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管怎样，人民对我们并无恶意——恰恰相反，却有着深厚的友谊。多罗西精神饱满，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每天在车上十到十二小时，到最后疲倦不堪。但我们过得十分高兴，这使我们能够完成这次巨大的计划——访问，视察工厂，午餐和晚宴，接见，访问市长以及其他等等。在纽卡斯尔，我发表了长篇演说（四十分钟），这与其说是给听众讲的，不如说是给报界讲的！但我所担心的是这个地区的重工业的前途——最近的前途。定货簿都是薄薄的。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膨胀”措施，如果我们要避免失业人数的严重增加的话。<sup>②</sup>

我回来后，劳工大臣麦克劳德证明我这种忧虑是有根据的。

---

① 1959年1月12日。

② 1959年1月16日。

1月份的数字(星期一统计的)将表明总数有八万六千人即百分之二点八的增加。这将引起议会极大的骚动,甚至会使某些人大为震惊。当然,恶劣的气候会产生某种结果——特别是对于建筑工人等等——但我还是感到有点不妙。<sup>①</sup>

我现在要写一篇短文,把我的想法写出来。我

同米尔斯勋爵共进晚餐,一起讨论了这篇经济论文。大致说来,我不同意财政部官方认为危险在于繁荣。我认为(米尔斯勋爵也表示同意)危险在于严重的衰退。我的计划是:(1)立刻把公共事业项目上的基金开支再提出五千万镑投入经济事业中去。这只能在五六个月之后才开始见效。这将是以前已经拨出的五千万镑的补充。(2)把预算日期从4月7日提前到3月17日,以便尽快获得我们希望预算带来的刺激。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但我必须尽力使这两项计划,至少是其中的一项能够实现。<sup>②</sup>

1月22日事情有了一些进展。

下午六时十五分到八时十五分,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掌玺大臣、劳工大臣、动力大臣、议会党团领袖举行会议,对我的经济计划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但没有获致任何结论。在开始讨论之前,我把我的对俄和对美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赞成在外交事务上采取主动;我希望他们也同情我在国内战线上采取主动的愿望。掌玺大臣完全支持我,米尔斯勋爵也完全支持我。财政大臣一方面保留他的决定——或者说保留他的最后决定,另一方面作出了使我相当失望的分析。他(和财政部)相信自动恢复的理论。但我并不相信。<sup>③</sup>

五天之后,我写道:

表决(年金法案)之后,我们举行了我们(已休会的)就业委员会会议。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支持我关于实行进一步“膨胀”的要求。但财政大臣小心翼翼,生怕有危险。我想,财政部给他出的主意就象它对前任所有财政大臣出的主意一样不好。英格兰银行肯定是十分胆小和“正

① 1959年1月16日。

② 1959年1月19日。

③ 1959年1月22日。



统”的。我对罗伊·哈罗德更加信任了。①

2月3日我同这些大臣又举行会议。

我们断然决定反对提前预算日期，而赞成再增加三千万镑左右膨胀的政府开支，用在资本项目上。我对此甚为满意。②

首相的任务那么多，我只好引用我的日记中下一页的一段话：

我们在马斯喀特的作战似乎极为成功。一支人数不多但有高度训练的军队（近卫骑兵团等）已占领那个山头，现在那里已有可能进入一个暂时平静的时期。③

但英国政府里的制高点却不那么容易攻克。

2月11日，消息公布说，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六万人。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够不够呢？

729 晚上，罗伊·哈罗德来访。他仍然对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提出批评（我认为他做得对）。他们执迷于把短期借款改换为固定利息的长期借款，以致当信贷基础应当扩大的时候他们还继续加以缩小。他们本应利用“公开市场”买卖来创造更多的通货——通过买入证券而不是卖出证券。我正想写一篇文章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罗伊·哈罗德对我将有很大的帮助。④

2月17日，当塞浦路斯的前途安危未定的时候，

我继续写我那篇讨论“金融”的文章，我想彻底抨击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罗伊·哈罗德交给我一篇关于“公开市场买卖”的文章。正如[英格兰银行过去一向]迷信金本位一样，[现在它]又迷信把短期借款改换为固定利息的长期借款。所以当[它]应当买入证券的时候，却把证券卖出去——我至少是这样看的（支持我的人有罗伊·哈罗德和其他人，包

① 1959年1月27日。

② 1959年2月3日。

③ 1959年2月4日。

④ 1959年2月11日。

括蒙克顿勋爵和中部地区银行)。<sup>①</sup>

几个星期后,在我从俄国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同

希思科特·艾默里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1)金融政策和(2)预算。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对于(1)还是坚持己见。虽然他们还没有在公开市场买入证券(他们本应买入),但他们已不再卖出了,最近甚至买入了一些。对于(2),刺激性预算的前景显然是美好的。<sup>②</sup>

的确,当我们讨论到财政大臣的最后的预算计划时,他显示了一副坚决的扩展主义的姿态。我知道他具有正直的性格,如果不能使他信服,他绝不会被任何议论所动摇,因此我非常满意于他决定把全年的税收减少约三亿六千万镑,这说明了他也认为我们的地位是坚强的。

预算案简单而动人。所得税在过去若干年以来一直是八先令六辨士,现减去九辨士,每低一级的税率都减少六辨士。三种较高的购物税率减少六分之一,每一品脱啤酒减了两个辨士。改进了战后债务的加速偿还办法,把未偿还的款项的利息增加百分之二点五。恢复投资津贴,对新建工厂和设备给予百分之二十的津贴,此外还增加百分之十的创业津贴。对投资津贴和创业津贴的制度也加以全面的改革。预算案获得了全国人民和报纸舆论的热烈拥护。提出反对的唯一呼声就是——为什么对领养老金的老人什么也不给? 730

实际上,我们对待我国这个阶层是特别优厚的——正如今天《泰晤士报》社论有力地说明的一样。<sup>③</sup>

其后,在6月中旬,

约翰·博伊德-卡彭特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是要用募集国家援助金

① 1959年2月17日。

② 1959年3月4日。

③ 1959年4月9日。

的办法来为贫穷的老人再筹得三千二百万镑。反对党大为吃惊。<sup>①</sup>

失业有所增加——但增加不太多；银行贴现率适中，比较低，但又不太低；英镑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既不遭受衰退所带来的痛苦，也不受繁荣所带来的悠闲舒适之害，而享受着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抱着从前术士寻求点金石的全部热情来追求的那种幸福生活呢？我们能否处在平衡的状态中呢？无论如何，我们现在似乎已处在安全的地位，可以考虑和决定我们在何时以及用何种方法来应付“诉诸凯撒”了。

---

<sup>①</sup> 1959年6月15日。

## 第二十一章 最后阶段

731

不要认为，在这最后的两年中各部大臣的工作都完全集中在这些财政经济问题上。在1957—1958年和1958—1959年的两届议会会议期间，都采取了一些重要的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其中最激烈的措施也许就是在1958年2月提出上院终身议员的议案。我十分感谢巴特勒和基尔穆尔对这个措施给予帮助。反对党的一些议员当然是根本不会接受这个议案的。他们在原则上不愿意有一个第二院；他们害怕一个经过改革的上议院会成为对他们的目的的一个更大的障碍。这个议案也不完全合乎我的一些保守党朋友的口味，他们认为对世袭制度的任何侵犯都是危险的。1958年4月2日，三读在众议院通过了。我立刻找盖茨克尔，问他是否愿意为提交女王陛下核准的第一张名单给我推荐几个人。

我问及终身议员的问题。他有点为难——他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分歧了。<sup>①</sup>

然而，当这个法案在上院通过并获得女王批准之后，我又去找他。

他说，工党对终身议员提出了许多非议——又说，他们绝不会理睬这件事，等等，等等。——他……推荐了五六个人！<sup>②</sup>

第一张封爵名单在7月24日公布，其中包括十个男的和四个女的，因为该法案是以男女平等的概念作为基础的。在妇女名单中，有雷文斯代尔夫人的名字。她自己生来就是女贵族，但是她这

732

<sup>①</sup> 1958年4月2日。

<sup>②</sup> 1958年7月1日。

的情况,中央办公厅认为现在解散议会可能会使我们在下院获得十三票的多数。<sup>①</sup>

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预算案将会有有什么结果?有人建议6月11日为夏季选举的投票日期,我们如何能受得了?而最后,到10月里我们的情况会不会更加好些?

所有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联系欧洲的危机来加以考虑。如果形势恶化,或者,如果在8月份的危急形势中召开最高级会议的话,那么,英国各部大臣在其任职的最后时期又会有有什么权威呢。(我们[实际上]到10月份就无以为继了。)对于英国各部大臣来说,不管是我们的或工党的人,刚刚当权或者再度当权是否会好些呢?但是假定工党获胜,情况又 745 如何呢?这对盟国会会有什么影响呢?

假定谁都不能获胜——在6、7月份出现某种僵局和制度上及政治上的危机,事情又将如何呢?我不作为政党领袖而作为女王的首相,应当做些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sup>②</sup>

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到4月18日我就作出决定。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最需要考虑的一点似乎是,对于一个在四年多以前选出的议会来说,10月份是正常的大选日期,几乎完全合乎惯例。如果在夏季突然提出举行选举,由于人们没有预料到,就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诡计。这是选民最讨厌不过的。

重大的决定已经作出——不提早举行选举,而是继续进行我们在国内的工作。<sup>③</sup>

4月22日,我应1922年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在萨沃伊饭店举行的午宴。这次集会实际上包括全部保守党议员。

我同议会党团领袖进行讨论之后,决定利用这个“私人的”集会来透露今年不会举行春季选举,也许1960年才举行!<sup>④</sup>

---

①② 1959年4月3日。

③ 1959年4月18日。

④ 1959年4月22日。

不出我的所料,这个声明在报纸上详细报道了。第二天晚上,我在普雷斯顿的一次盛大集会上又说了一遍。现在我正在兰开夏进行四天的访问,这是

一次长途的旅行……比起其他两次“会见人民”的旅行来,受到了更好的[接待]……我发表了六七次演说——即席演说。我们在兰开夏访问了许多城市,包括奥德姆、罗奇代尔、伯里、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我的妻子多罗西和我同行。这次旅行确实是一次非常使人振奋的事情。我们看见大群大群的人——大街上挤满了人群在等候着——的确,几乎连一次“喝倒彩”的也没有。<sup>①</sup>

746 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而且证实了我们推行棉织品议案是做对了,我们以适当的和有步骤的方法来完成我们在这届议会开始时所宣布的立法工作,也是做对了。现在我的心情十分舒畅。

我对兰开夏的访问,越想越高兴。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有礼和友好的人民全都会投保守党的票。但我认为这种礼貌以及没有什么怨恨的表示总是好现象。这同1945年甚或1950年时的情绪是大不相同的。<sup>②</sup>

现在我们必须一方面为大选作准备(到6月底“指导委员会”就准备好竞选宣言的初稿),另一方面举行日常的内阁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包括禁止淫书法案乃至美元自由化等问题。

除了非洲出现麻烦之外,国内平静无事。生活费用是稳定的;民意测验表明情况不断有所改善,甚至印刷工人的罢工及其一切讨厌的牵连也没有引起公众的过分关心。失业数字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九,虽然在威尔斯、苏格兰和兰开夏都还有个别地区有失业现象,但这显然不是实行普遍的膨胀措施所能解决的,因为这样有可能

---

① 1959年4月24日。

② 1959年4月25日。

重新出现通货膨胀，对我国国际收支和英镑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用另外的办法来医治这个弊病。我认为我们可以制定出一个很好的政策，在选举的时候提出来，如果我们当选的话，在选举之后加以推行……我对同僚们的充沛精力感到又惊讶又高兴。我们现在日益接近不能有所作为的时刻（正与可以进行大量计划工作相反），直到选举过了以后。<sup>①</sup>

7月底，印刷工人的罢工获得了解决——这是一次长时期的和令人生气的争执，对一切有关方面都是一种损失。

我不愿意在6月举行选举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我想到女王的安适问题。她到加拿大进行一次长途跋涉的旅行，在将近6月底当圣·劳伦斯航线正式通航时出发。从各方面来看，在6月举行选举一定是很不方便的。女王这次长途跋涉的旅行很使我担心。当8月7日公布她怀孕的时候，我和公众一起欢庆，想到她已平安回国，十分高兴。 747

8月22日，我给女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可能在短期内要求她批准解散议会。由于巧妙的安排，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关于金融信贷制度的报告适时地在8月中提了出来，供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在假日浏览。除了这个报告的发表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就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我国访问。他这次出国访问是他进行一次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因为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白宫去作客。他为这件事情作准备，很想先去见见阿登纳和戴高乐。本来我们之间的个人接触如此密切，他没有必要访问联合王国。不过，我感到，而他也同样感到，如果他对曾在两次重大战役中把军队的指挥权委托给他的这个国家不访问一下，恐怕会被人认为对英国有点不够重视。于是他作出了安排，将以五天的时间访问英国，包括在巴尔莫勒尔和女王及王室家属度

<sup>①</sup> 1959年7月9日。

过愉快的假日。他在8月27日下午六时四十五分准时到达伦敦机场。我们一起乘坐一辆敞篷轿车开往美国大使馆。

十七英里的路程,车子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沿路人群拥挤,情绪热烈。<sup>①</sup>

这是信任和善意的明显表示。从另一个观点看来,这也是非常动人的。汽车慢慢地开动。马路上和大街上都挤满了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总统在大部分时间都站起来向群众挥手,我有时也站起来在他旁边挥手。他在巴尔莫勒尔停留了两天之后,就到契克斯首相别墅来。

上午十一时前往本森机场(皇家空军)。总统在正午十二时到达。

我们乘坐敞篷汽车到首相别墅。又是一个可爱的夏日。机场和沿路以及各个村庄都有许多善良的群众。又是一次非常热烈和亲切的欢迎。<sup>②</sup>

748 下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讨论,总统有点不耐烦。除了在住所和在车上之外,还有不少空暇打高尔夫球。可惜因为场地的草很长,打了许多的球,而最后拾回的球却不多。星期天上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谈。但因为上午十一时要到教堂做礼拜而中断了。

总统和我一同去。教堂挤满了人。因为礼拜的过程在教堂外面有扩音机转播,所以在教堂的院子里也挤满许多人。

午餐后,我们让“专家们”进来参加“核试验”谈判——主要是不使他们失望。但讨论没有[很大]进展,不久总统就感到不耐烦。于是我提议乘车外出。我们一起乘车到牛津——在马格达莱和基督教堂附近散步——然后乘车回家。总统感到很满意。由于我们这次外出没有公布,所以没有群众来。我又一次发现这几次在车上的谈话成为我们会谈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坐的是隔音的汽车,可以自由谈话。他同我谈到许多美国的事情,谈到美国的政策;谈到他对北约组织的希望和忧虑;谈到他准备怎样去应付赫鲁晓夫先生;谈到戴高乐。很明显,他对会见戴高

---

① 1959年8月27日。

② 1959年8月29日。



乐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我尽力替戴高乐说好话。如果没有戴高乐，法国可能会陷于无政府状态，或者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中。阿尔及利亚（不是他在北约组织和在欧洲的愚蠢姿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快来了——这就是肯尼亚和中非。戴高乐是唯一能够推行“自由”政策的人。他对待军队甚至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不是拿破仑一世。他是亲王——总统。我请总统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予同情。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是过时的，而且可能是很危险的。<sup>①</sup>

第二天，

总统和我乘车从契克斯首相别墅到圣保罗大教堂去。在路旁向我们欢呼的人群太多了，我们只好改乘敞篷汽车。现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东侧和美洲式的祈祷室，确实庄严华丽，祭坛后面的旧壁板比前漂亮多了。<sup>②</sup>

已经安排我和总统将举行一次关于世界问题的简短讨论，并用电视广播。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担心，因为既要避免发表危险的轻率言论，又要避免只谈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749

下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思考预定在下午七时二十分到七时四十分在唐宁街十号圆柱客厅同总统进行的电视讨论。整个房子都是技术人员和各类工人。电视广播之后，有一个约四十人的宴会。邀请客人在七时十五分来，各房间都为观众安置了电视机。

半夜，一切都过去了。讨论进行得并不坏，虽然我和他都很紧张。从观众传来的第一个议论似乎是……热烈的。宴会十分成功。总统提议“为女王干杯”；我提议“为美国总统干杯”。然后过了一会，我作了简短的发言，提议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健康干杯。他回答得很得体。丘吉尔、艾德礼和艾登都讲了话——都说得非常出色。<sup>③</sup>

报纸通常对这类电视表演总是有点吹毛求疵的，但这次总的来说都表示赞赏。当然也有人谴责我为了选举的目的来安排这次

① 1959年8月30日。

②③ 1959年8月31日。

宴会。尽管这次巧合可能有好处，但的确不是我有意安排的。第二天举行了一次怀旧宴会：

总统在大使馆宴请他的老战友——陆军元帅们（如阿兰布鲁克，亚历山大，蒙哥马利等），海军元帅们（如罗耶·迪克——A. B. 坎宁安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受伤而卧床在家），皇家空军元帅们（如特德勋爵，“轰炸机”哈里斯等等），还有摩根，汉弗莱·盖尔等将军和其他许多人。

被邀请的文官有我（作为前驻节公使而不是以首相身分参加）和我的老幕僚（梅金斯和卡奇亚）。

我要求总统不要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他的旁边，而把我只作为“盟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来排我的座位。这是一个好主意，使他能够把阿兰布鲁克和亚历山大安排在他的旁边。丘吉尔也参加宴会，他的座位排在美国大使的旁边。

750 这个晚上大家都很高兴，讲了许多事情，说了许多笑话……我说甚至在我当发行人的时候，也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作家欢聚一堂，大家听了很高兴。<sup>①</sup>

现在决定已经作出了。于是我在9月7日到巴尔莫勒尔去。先在阿波恩降落，同詹姆斯·斯图尔特谈了一次话。

六时十五分左右到达巴尔莫勒尔。我在晚餐前觐见女王。女王十分客气。我冒昧向她表示，首相本来无权“建议”解散议会，但从长远看来，皇上今天必须接受“建议”。首相“请求”解散议会，皇上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皇上这个最后的大权必须保持。处在民族危机的时候，这可能是极其重要的。<sup>②</sup>

女王正式同意我的请求。她认为时间选得很合适。

第二天，内阁在三时开会，一小时后发表公告：议会将在9月18日解散，10月8日举行投票。于是，在反复的深思熟虑之后，现在事情终于决定了。我们已经乘长风而破万里浪，现在我们是否有希望再被委以新的重任呢？

① 1959年9月1日。

② 1959年9月7日。

## 附 录 一

753

### G方案: 1956年9月29日

1. 联合王国将和墨西哥六国(比、荷、卢、法、德、意)关税联盟以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其他愿意参加的各国(可能有挪威、瑞典、丹麦、瑞士、奥地利)一起部分加入自由贸易区。

2. 我们不希望自由贸易区包括任何成员国的附属领地,但这一点,在我们了解欧洲对我国的主要建议的反应之前,在我们获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以前,还不能作定论。同时,我们将和我们的殖民地就可能牵涉到他们的利害关系进行磋商。

3. 自由贸易区将包括除食品以外的一切货物(从广义上来说,食品不仅是食品原料,而且还有制成品、饲料、饮料和烟)。把食品除外是个基本的条件。为了国内农业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英联邦的利益,我们决不能作任何妥协。

4. 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关税(除纯属财政关税外),保护性限额和其他保护性措施(如出口的税收和控制手段、出口的补助)将在规定的十年左右时间内逐步降低,最后完全取消。

5. 对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物资征收关税,我们应该保留现有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并遵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其他地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是自由贸易区与关税联盟之间的基本区别。我们要继续允许英联邦货物免税进入我国市场。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向我国出口时所享受的关税特惠条件将不受影响。

6. 我们必须坚持,墨西哥六国不得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歧视我们。这就是说,整个自由贸易区降低关税的日程应该统一。

7. 为国际收支平衡以保护英镑,我们应保留根据现有规定对数量进行限制的权利。自由贸易区的行动只能根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规定的原则进行,除非作出决定各成员国必须实行更严格的规定。

8. 这些建议与共同进行更自由的贸易和支付的政策,以及与可兑换性 754

是完全一致的。在向世界范围内减少贸易屏障的道路上，它们是向前跨进了一步。自由贸易区的范围以及它对欧洲以外关注的程度将确保它不致于发展成一个关闭性的地区集团。近年来，我们在减少和取消加拿大以及美国进口物资上所作的定额限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应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下去。

9. 自由贸易区的国际管理工作可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内由一个“管理局”来负责（应是官方部长级的）。这个管理局只包括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章程第十四条进行工作。这一条款规定，一个小组可以在没有得到非本组成员的积极支持下照常开展工作（假如它们同意这个小组的规定，那是另一种情况了）。

## 附 录 二

### 内阁成员：1957年1月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

枢密院长：索尔兹伯利侯爵

内政大臣兼掌玺大臣：R. A. 巴特勒勋爵

大法官：基尔默尔子爵

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

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

联邦事务大臣：霍姆伯爵

殖民地事务大臣：艾伦·论诺克斯-博伊德

苏格兰事务国务大臣：约翰·麦克莱

国防大臣：邓肯·桑兹

贸易大臣：戴维·埃克尔斯爵士

农业、渔业和粮食大臣：德里克·希思科特·艾默里

劳工和国民事务大臣：伊恩·麦克劳德

住房、地方政府大臣兼威尔士事务大臣：亨利·布鲁克

教育大臣：黑尔什姆子爵

电力大臣：米尔斯

交通及国内航空大臣：哈罗德·沃金森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查尔斯·希尔博士

## 附录三

756

### 共同目标宣言

美国总统和联合王国首相举行了三天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国务卿、外交大臣和其他顾问。会谈结束时，两位领导人发表如下声明：

#### I

我们两个多年的知心朋友分别领导着各自的政府，现在又聚会一堂。我们两国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各国都有着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而我们两国之间更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

认识到，自由世界各国人民的最深切的愿望只有在确立了正义和平的事业后才能实现。因此，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怎样坚定不移地更好地利用我们两国所拥有的精神、文化和物质力量，完成我们应该担负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将无疑地为实现和平迅速创造良好的条件。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为自由世界保证充分的安全。

自由世界各国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汇集在一起就大大超过了共产主义世界。我们承认，苏联统治者们通过集中力量，有重点地进行发展，应用科学，并用奴役他们人民的方法，是可以取得惊人的物质成就的。专制主义经常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但代价总是很惨重的。世界各国人民无有不渴望得到思想上和经济上自由的，而在受奴役的人民一旦他们看到别国人民享受着自由的光荣，这种渴望就将更强烈。就是专制主义者，由于情况逐步演变，或者面临即将来临的暴力革命，也不得不允许自由有所发展。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原则。就是在苏联控制的势力范围内，自由的精神也已开始暴露出来。如果自由世界各国能坚韧不拔，如果他们能充分利用一切潜力，紧密团结合作，极权主义对他们的威胁就一定会收敛退缩。

然而，为使自由的种子牢固地扎下根，并结出丰硕之果，自由世界各国有必要把共同的军事力量加强到足够强大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他们的威胁。同时，自由世界军事开支的总额必须保持在与个人的自由相称的水平。否则，我们就有失去我们正奋力维护的各种自由的危险。

这些想法是我们会谈的中心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派克先

生也参加了我们的部分会谈。

为实现这些理想,为树立榜样,我们认为这种榜样是能够而且也应该在自由世界各国得到推广,我们达成下列谅解:

## II

1. 自由世界各国进行集体防御和相互支援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的,即各国自给自足的概念现已过时。自由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通过真正的合作,共同利用各国的资源,在多方面分担任务,他们才能向前发展,各国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两国一致同意,今后将依据这种精神而采取行动。

2. 我们驻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代表将催促北约各国作出更大的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发展工作,以保证获得更稳定的集体安全,支持根据去年12月理事会作出的扩大特遣部队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活动范围的决定。

3. 美国总统将要求国会修改“原子能法”,这对于加强大不列颠、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之间亲密的、有成果的合作,可能是完全必要的,可取的。

4. 由伦敦裁军小组委员会的西方代表提出的、经北约各成员国批准了的裁军建议,是达成一项协议合情合理、公正可靠的基础。达成这项协议将减小战争威胁,减轻军备负担。无止境地储存核武器,盲目地扩大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必须得到制止。在控制和减少军备的初级阶段,有效的可靠的视察是一个核心问题。

5. 我们正努力争取裁减军备。但在没有裁减军备的情况下,国际安全不仅要依靠各国防御性屏障,而且还要依靠核武器的威慑力和报复力,作为防御性屏障的支援力量。只要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继续存在,自由国家必须有所准备,保卫他们各自的安全。由于自由世界的各种防御协定纯粹是防御性的,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反对外来威胁的,因此,这些协定要维持多久是无法预见的。各国是不能通过单干就能确保自身安全的,只有通过集体的防御措施才能真正有效。这些须按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由安理会调配部队才能很好地完成。但如果苏联坚持使用否决权,拒绝执行这些规定,就必须采取另外的措施,就应该有一种更强烈的集体安全感。由这种集体安全感产生的机构已经存在,这就是在由差不多五十个自由国家参加制订的为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集体防御性措施。这个集体的所有成员,以及愿意参加的其他自由

国家都必须充分了解现有的和未来的安全防御的总的能力。而且,还应有更大的可能性,以确保一旦为了共同安全的需要就能有效使用这支力量,并保证这支由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力量不得为任何国家,不是为了自己和共同的防御而为别的目的遭到滥用。

我们两国把我们所拥有的核武器威力认为是保卫自由世界的一个可靠保证。

6. 我们两国准备和所有保卫安全的伙伴商讨这些想法。就北大西洋联盟来说,12月会议可以认为是这样性质的一次会议。这一点已和北约秘书长斯派克先生讨论过。

7. 除北大西洋公约外,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巴格达条约以及其他安全条约,是保证条约签订地区不受侵略的强大堡垒。还有一种性质不尽相同但却是极关重要的盟友,这里有英联邦,在西半球有美洲国家组织,另外美国还和一些国家分别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和议定书。

8. 我们认为集体安全防御上的种种努力必须以经济合作行动作为后盾。目前,整个自由世界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改善贸易条件、扩大经济贸易的好机会。在欧洲,一个和欧洲共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正在制订过程中。这是值得令人鼓舞的。我们认识到,特别是在比较不发达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幅度的提高,经济上要有个扎扎实实的、效果明显的发展。

9. 我们还注意到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特别一致认为——

由于苏联对土耳其的威胁,条约签字国所承担的义务就显得十分重要,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的规定,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进攻就是对所有成员的进攻。

通过自由选举统一德国,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先生和我们两国以及我们的法国盟友都是赞成这一点的。可是,不断背弃诺言,一再压制东欧的自由,破坏着国际信任,同时侵犯 759 权利的事件,愚蠢危险的行动,屡屡发生。

### III

总统和首相都坚信,随着他们之间达成的谅解越来越在自由世界深入人心,其影响也就越来越明显。只要合理调整自由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安全就有

保障,共产主义专制的危险将能排除,一个公正的永久的和平定将能实现。

## 附 录 四

760

### 关于塞尔温·劳埃德辞职一事同他的通信

1958年2月24日

亲爱的首相先生:

我反复考虑了昨晚我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但我还是认为我应该恳求您接受我的辞呈。我相信,没有我,政府将会更强。

您会记得,我在1956年11月底就想过辞职,当时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曾请求您接受我的辞呈。现在我想我要坚持这一点。

对于您个人对我的友谊和鼓励,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您的衷心感谢的。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我竭尽全力,艰苦工作,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

我认为事情很清楚,由另外某一位接替我的工作,您的工作将更好做。

离开政府后,我将能更好地支持您的工作,我一定全力以赴地这样做。

您的

塞尔温

1958年2月25日

秘密私人信

亲爱的塞尔温:

我收到了您特有的心胸坦阔的信,但我的回答却是要求您继续履行您的职责。首先,您对一系列艰难的谈判心中已经有数。我认为要把谈判进行下去,对此您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恰当。有些谈判还是有希望获得成功的。第二,关于有人对您的攻击,我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您对这一点还必须有所忍耐。我们绝对不能允许反对党和大众报刊联合起来把一位大臣赶下台。第三,如果我接受您的辞呈,政府就会受到严重动摇。我将被认为是屈服于风暴的压力,在对待其他大臣上,将出现连锁反应。我知道我这样要求您是太难为您了,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我认为,我党对这种近似人身攻击是  
761 非常气愤的。当然,在比较风平浪静的时候,如果您想调换一下,搞一些不太繁重的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现在不是时候,无论是从您的角度还是从我的角度,都不行。

738



请不要忘记,在过去,政治生涯和现在一样坎坷不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我还是非常赞赏您提出的辞呈,因为我知道您是出于最高尚的愿望才提出的。

您的

哈罗德

1958年2月27日

亲爱的哈罗德:

感谢您2月25日的来信,感谢您在信中说的一切。在目前情况下,我接受您的意见,继续战斗! 您对我的谅解与鼓励,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您的

塞尔温

封面  
目录  
正文